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

1987

1996

2000

2008

2016

2020

2022

2025

范疇 著

- 為何台灣陷入統獨二分法,而忘記了自己的戰略地緣優勢?
- 貿易戰只是表層,美共文明衝突已經開始,台灣該怎麼做?
- 台灣社會紛擾之源之一的「國家定位」問題,並非無解?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

1987

1996

2000

2008

2016

2020

2022

2025

范疇 著

- 為何台灣陷入統獨二分法,而忘記了自己的戰略地緣優勢?
- 貿易戰只是表層,美共文明衝突已經開始,台灣該怎麼做?
- 台灣社會紛擾之源之一的「國家定位」問題,並非無解?

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

1987

1996

2000

2008

2016

2020

2022

2025

范疇 著

- 為何台灣陷入統獨二分法,而忘記了自己的戰略地緣優勢?
- 貿易戰只是表層,美共文明衝突已經開始,台灣該怎麼做?
- 台灣社會紛擾之源之一的「國家定位」問題,並非無解?

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

1987

1996

2000

2008

2016

2020

2022

2025

范疇 著

- 為何台灣陷入統獨二分法,而忘記了自己的戰略地緣優勢?
- 貿易戰只是表層,美共文明衝突已經開始,台灣該怎麼做?
- 台灣社會紛擾之源之一的「國家定位」問題,並非無解?

2022
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

范疇 著

2022
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

范疇 著

目錄

序　言

上　部：台灣的危局與現實

第一章　為什麼**2020–2022**年是台灣的十字路口？

- 「五個算總帳」的日子何時到來？
- 台灣人傻到不懂得自己優勢？

- 2020–2022年：台灣應變十二字訣–不掉隊、不插隊、除肉桶、固社區
- 2020–2025年：台灣解方的最後窗口

第二章　台灣如何從「統獨二分法」中脫身

- 凶機重重，台灣別再中計：中共不等於中國

- 2020年台灣不能真的傻掉
- 當傻統遇上傻獨
- 2018年地方選舉中，民進黨不自知向中共期待的路線靠攏
- 中共統戰介入2020年大選，台灣該不該怕？

- 中共最怕台灣的五件事
- 「反併吞」應該定為台灣國策

- 「國安議題」與「台灣定位」是兩回事
- 開開腦洞：統一、統二、統N
- 大一統，大二統，大多統，自獨，被獨
- 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講話」時空錯亂，台灣人隨之起舞
- 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書

第三章　中共如果武力犯台
- 台灣地緣優勢新角色：從「第一島鏈」到「南海通道的中途島」
- 中共武力犯台的機率？台灣必須在大棋局下看自己
- 五年內武力解決台灣？
- 失意軍頭：習近平的豬隊友

- 中國有多少人真心想吞台？
- 中國解放軍何時可攻台？
- 「和平」是台灣的底線嗎？
- 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台灣？
- 當百分之一機率發生時，你拿不拿槍保衛台灣？
- 為什麼不招募百分之五十女兵？

- 太平島的使用，應該國際競標

・台灣如何防止中國「金融犯台」

第四章 從灰犀牛到黑天鵝：美共文明衝突下的台灣安全
・拿破崙已經死了，但中國不知道
・川普是不是「小明同學」？台灣應該了解的川普

・川普之道：「商道」、「政道」與「兵道」
・川普的「地產世界觀」下的台灣
・萬一川普演化變成季辛吉？
・「貿易戰」其實是「經濟行為規範戰」
・美國明白了，中國還沒有
・皇帝身邊策士看不懂的一局

・川習會平淡中透露的殺機
・川普三招封住中國崛起的咽喉
・台灣值多少錢一斤？
・當軟磨遇上硬攻：美中台大盤解讀
・美中尋找新均衡，台灣秤砣放哪裡？
・習近平是否會吃下川普的「台灣誘餌」？

・川普等於要求中共政體變革
・當北京碰上紐約
・美對中「四爪戰略」下的台灣牌
・美中對撞沙盤推演
・美對中「貨幣戰」、「主權戰」的前兆？
・彭斯出任務：「中共不等於中國」、「反共救中

國」

・沒有「美中關係」了，只有「美共關係」
・美中文明對撞下的台灣處境和角色
・「川局」與「習局」對撞誰會贏？
・G20後中共的幾種可能

第五章　中共危機是台灣轉機：中國的癌細胞切片

・世界上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
・中共不等於中國：單一切片看中國是危險的
・中南海政治學：中共的思維方式
・從「鄧氏約法」到「習氏約法」
・抓不到「權本主義」，任何中國分析都是白搭

・海馬不是馬，「權場」不是市場
・中國沒有「市場」，只有「黨場」
・「權本主義」下的金融危機
・中國富豪，都只是「庫房」的身分
・共產黨的本質最終還是要共你的產
・中國正在上演「雙國記」

・中國什麼形狀？「二字型」社會
・大象經濟學
・腐敗也是一種生產力？
・中國腐敗3.0版

・看懂中國經濟的三隻眼睛
・金融決定中國命運
・中國「不透明政鬥」下的失真市場
・中國的噩夢：人民幣匯率

・十九大前的預言：2018將是中國「銀根子」年
・人民幣兌美元何時破七，甚至破八、破十？
・中止變革的中國金融及習近平經濟
・習進平能駕馭「海歸派」和「華爾街派」嗎？
・中國面臨的系統化矛盾

・習近平想幹什麼？改造」和「法西斯」的一線之隔
・與習近平班子聊聊台灣和中國
・2022年：中國回到毛澤東時代，還是選總統？
・2022年：中共的終局時刻，五種可能的中國
・一國多港：香港的第四種想像

・請關懷香港，司法獨立才是民主的保障
・香港「反送中事件」之於台灣的三大意義

第六章　台灣的「國家定位」的解方
・「無印良國」台灣，不用舊情綿綿！
・「無印良國」的時機到了！

・如果中華民國的邦交國降為零
・要下架的不是「中華民國」，而是「Republic of

China」
・台灣的Realpolitik：再論「Republic of China」下架
・川普如果向台灣借名片

・黑天鵝：「中華民國ROC」的品牌轉移價值
・如何破解憲政僵局？台灣何妨先自己「一國兩制」

第七章　誰做總統才能讓台灣洗心革面？
一、台灣大選的前世今生（**2014–2020**年）

・2020年選出的總統、立委，必須對台灣的未來三十年負責
・2020年總統的X個條件
・媽祖告訴我的台灣總統條件
・2020年台灣大選的詭異在哪裡？
・2020年大選的本質是中美大戰
・說不出口的2020年通關密碼

・2020年台灣人心中必須拿掉的「等式」
・郭台銘想清楚了嗎？台灣想清楚了嗎？
・2014年「世代翻轉」是2020年的前世
・2020年的黨、人、政策
・2018年、2020年的「國民黨紅利」和「中國因素」

二、需要翻轉的政治體制和文化

- 推翻××黨，還是推翻剛性政黨？
- 要××黨倒之前，你得先了解何謂「政治生態學」
- 法治的基礎及最後防線
- 法治無進步，台灣就會倒
- 台灣民主打幾分？
- 立法院不改，台灣不會好

- 在政府這件事上，台灣只有兩條路可走
- 大政府不去，台灣不會好
- 台灣不能只換外套，更要換內褲
- 增設「黑機關」，還是裁剪「白機關」？
- 改革公務員體制救台灣
- 為什麼沒有流浪公務員？

- 政府機器變成立委的二奶、議員的小三、人民的賤僕
- 被「球員兼裁判」卡死的台灣經濟
- ××的資策會：兼論台灣的數位經濟
- 國營企業「所有權人缺位」：被少數人綁架的台灣
- 有權利罷工，但有權利罷公嗎？

- 2020–2025年：台灣需要一個「平行政府」
- 如果台東是個獨立小國？
- 高雄，何不當作中立國家？
- 2025年之後的憧憬：邦聯議會制

下　部：台灣的主體性與未來

第八章　世界座標下的台灣主體性：是誰？在哪裡？往哪去？怎麼去？

- 一個演化價值論者的台灣四問
- 跳出框框：台灣主體性解析
- 台灣主體性的根基：平民三精神 + 頑逗主義
- 一個台灣，三種座標

- 台灣三論：歷史論、宿命論、演化論
- 課綱豈止該微調，應該花十年徹底大調
- 台灣必須突破的「地緣宿命論」
- 台灣的選擇：地緣悲情之子，還是領先東亞轉大人
- 地緣限制不是問題，語言國力才是問題

- 華人是新加坡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台灣人」的定義
- 你的認同對象是什麼？

第九章　腦力犯台：台灣應該自省的文化問題

- 百年一滴的遺憾與展望

・台灣為何找不到主體性？
・與其擔心別人武力犯台，不如自己先腦力犯台

・別當「百姓」，進化成「公民」吧！
・漢文化的文明罩門：江山觀
・一場洗淨「江山觀」的競賽
・台灣文化的罩門：先祖觀
・弱者症狀：台灣的致命傷
・台灣「魯蛇文化」三問
・台灣必須從比爛邏輯脫身

・「轉型正義」不能被片面偷渡
・急於「去××化」 不如「迎台灣化」
・愚蠢低級的「故宮」分遷計劃
・藍綠的五十道陰影和達文西密碼
・「台中人」做台灣總統？
・「二二八」才是讓北京恍然大悟的通關密碼

第十章 「隔壁大象」永遠在，但台灣有機會做象伕
・為何台灣沒比現在偉大？
・中國可因台灣而演進
・台灣也沒躲過的那隻幽靈
・「方塊字使用者」才是切開中台關係的那把刀
・「方塊字圈」政治文明的雁行理論

後　記

序言

嚴格說，這本書雖然充滿了切身觀察、分析及預測，但是，這些幾乎都不是筆者寫作的初始動機。真正內心深處的動機其實可以歸結為一件事：建構一個協助讀者理解現狀的「感知架構」（MindSet，或可稱「思維架構」）。因此，請讀者不要用任何「價值觀」、「立場」來看待此書。

本書所要傳達的「感知架構」，融合了2011—2015的七本書中的要點，以及2015—2019的新體認，因此也可視為整整十年來筆者對台灣、中國、區域以及世局看法的心路歷程。這十年，個人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七十餘年中，最具結構性變化的十年，無論從經濟型態、政治體制、科技變局、人類意識的角度都是。我感到非常幸運，不但歷經過時代的困苦，也見證了四個國家的經濟飛躍—台灣、新加坡、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體會了台灣民主由幼兒到青年，還看到了濃妝豔抹之前的「素顏中國」。最幸運的是，在我各處創業三十年、累積了足夠的人生實務經驗之後，才遇上了台灣戰後七十年的真正轉折期—也就是本書分析的2020—2025這個時間節點。2020開始的接下來五年，我認為是台灣近代歷史四百年來，首次被迫自我選擇的「轉大人期」。

並不是說台灣過去沒有被迫選擇的經驗，事實上，四百年來台灣人一直在被迫選擇。但是這一次，卻是被迫「自我」選擇。有自我和沒自我的被迫選擇，差別大了去了。其本質的差別，有如一個人第一次婚姻是奉父母之命，但在不幸福離婚後的第二次婚姻，卻是「自我」的選擇，賴不了別人。如果一個人一次、兩次、三次結婚，卻每一次都以破裂告終，那幾乎可以百分之百確定，問題不在別人，就在這個人自己。

這個比喻方式，或許很多人看了不舒服。但我認為這比方是貼切的。台灣已經一人一票了二十幾年，政黨輪替也已經三次，民選總統換了四個，如果還走錯道路，那只能說台灣選民的自我認知能力還差得很遠，怨不得任何人。有人會辯稱：政壇人物都那麼爛，爛蘋果怎麼挑都是爛的。這種賴皮的說法我完全不能同意。1989年台灣人口是一千八百萬，現在是二千三百五十萬，這之中不可能缺少能幹的人、正直的人、有領導力的人，但為什麼他們在台灣的政治中出不了頭？或者說，為什麼他／她們即使出了頭，也幹不了事？這還能賴誰呢？

這本書，目的就是為台灣提供一個面對自己時的「感知架構」。不一定對，但也不一定錯。我只能說，人在面臨命運大轉折時，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感知架構」是很危險的。十年、二十年後，必然有高人能夠提出一套更完善的「感知架構」，但那時可能已經太晚了，因為2020─2025這五年就是台灣人四百年來首次、但也是最後一次用「自我」來轉變台灣命運的機會。一定要澄清的是，我並不是說台灣的命運在2025年之後就決定了，而是說由「自我」決定命運的機會就過去了，以後的日子再好，也是「被迫」決定的。「自我」，還是「被迫」，才是問題所在。

一個好的「感知架構」，一定是理性、感性兼顧的，因為這就是人性。因此，此書中，根據議題，有非常理性甚至冷酷的一面，也有非常感性的一面。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在應該理性的時候感性，應該感性的時候理性。不論是為政還是做人還是經商，失敗的最大源頭恐怕就是理性問題用感性處理，感性問題用理性處理。而事實上呢，這可能就是台灣的最大問題所在。

另外要自白的是，由於書中內容記錄的是過去五年的思路歷程，而且架接的都是當時的事件，但編輯成書的目的又是為了預視、警示未來五年的景況，因此可能在順著章節閱讀的時候，會出現時空交雜的感覺。若是，筆者先在此抱歉了，因為我覺得保持事件當時的原汁原味是很重要的，若在成書時強行修改，反而會把當時（例如四年前、三年前）的預見，變成在放馬後砲的感覺。比較

欣慰的是，許多幾年前所寫被認為「異端」或「另類」的看法，今日已經成為主流。本書中還有許多在2019年年中看來像是「天馬行空」、「天方夜譚」的預測，讀者就當開開腦洞好了，但搞不好到了2025年，其中某些「現在的不可能」會變成「未來的現實」。

范疇2019年6月12日

於台北

上部：台灣的危局與現實

上部：台灣的危局與現實

第一章

為什麼2020—2022年是台灣的十字路口？

第一章

為什麼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是台灣的十字路口？

「五個算總帳」的日子何時到來？

2020─2022這三年，對台灣極為凶險，因為有五個算總帳的日子都落在這三年之間。即使只發生一件，台灣都不見得吃得消，何況，五本帳簿環環相扣，骨牌效應下連環算總帳的機率，並不算小。

這「五個算總帳」的發生概率，各界分析不同，但我的觀察判斷，其順序排列如下：

一、首先是「中國經濟算總帳的日子」，相對應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會不會硬著陸，從此一蹶不振？

二、其次是「美國政府對中共一黨體制算總帳的日子」，相對應的問題是：中共的一黨專制會不會被迫鬆動？

三、第三是「台灣的國家定位算總帳的日子」，相對應的問題是：台灣如何由當前的「統獨二分法」脫身？

四、第四是「中共對台灣算總帳的日子」，相對的問題是：中共會不會武力犯台？

五、第五是「台灣人民對政府弊端算總帳的日子」，相對應的問題是：台灣能不能政治體制翻轉？

先澄清個概念，「算總帳」不一定會立刻帶來「結帳」，但結帳之前一定得先算總帳，這是事態的規律。因此，我們可以把算總帳視為結帳動作的開始，從算總帳到結帳，過程可長至十年，可短至數年。這幾本帳，其實老早就開始算了，本書提出的命題是：在2022年結束前，五本帳其中的數本會開始算總帳，也就是上述五個相對應問題的結帳啟動，而台灣未來數十年、甚至百年的命運演化

方向，可能就大致決定了。

中國經濟可不可能近期被算總帳而硬著陸？看法分兩派：一派認為，所有數據和現象都指向中國距離硬著陸已經不遠了，甚至是進行式；另一派認為，不要小看了共產黨手中掌握的工具，此次必然和過去一樣，化險為夷。這是數千篇文章在爭論的議題，雙邊道理此處無法羅列，但想指出一點一般經濟學界忽略的視角：中共面臨的不是是否硬著陸的選擇，而是是否留在現代國際體系內的選擇。

中共若選擇再度封閉，基本上保持經濟體內循環，佐以近些年來累積的亞非拉接口（亞洲、非洲、拉美），那麼中國經濟可以在未來三十年都不用算總帳，國內鈔票自己印，國外和亞非拉小朋友們進行物資交換就可以湊合過日子了。

但若中共選擇留在現代國際秩序內，那麼在經濟行為及規範上不被算總帳是不可能的。經濟總帳一算，中共想不體制改革也不可能。這裡，就帶出第二本總帳：美國政府要不要對中共算算一黨專政體制的總帳？

當下看來，美國是要的，但北京沒看懂或還在裝不懂。美國在態度上，已經區別「中共」和「中國」，四十年來美國政府都承認「中共」代表「中國」這個主權國家，但是，任何時刻美國都有權以「非民選」理由將「中共」由政府地位降格為政權地位。所謂的「貿易戰」，不過是切片式的形容詞，其本質是美國對中共體制的「經濟行為規範戰」，根本上超出了金錢利益的範疇。這本帳，美國是一定要算到底的，何時何事會觸碰到中共一黨專政的底線，世人在密切關注中。

這第二本總帳的算法，台灣變數無可避免的落在公式中，這變數是有解，還是無解，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之前之後的「國家定位」議題就是關鍵。不但中共要介入2020年大選，美國也要介入，

兩片燒餅夾油條之下，很有可能2020年就成為台灣的「國家定位」議題算總帳的日子。其中的凶險，不用多說也知道。

當然，這就連帶出第四本總帳─中共對台灣算總帳。在2019年初再次重申不放棄武力犯台之後，北京已經急不可耐，開始積極部署各式各樣的「台灣的一國兩制」吹風研討活動，對台統戰越發猛烈。反作用力之下，台灣內部也會興起兩股反彈力量，其中一股是對「中國的一國兩制」的概念的追究，挑戰「一國兩制」該不該在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下進行。當下，台灣已經有人做出一項總結：「一個中國看新疆，一國兩制看香港，和平協議看西藏」。不是不能討論，而是討論時的事實現象基礎點在哪？另一股反彈力量，當然就是對台灣獨立的追求。

這四本帳，不論是算總帳還是結帳，台灣肯定是還沒有準備好，甚至是鴕鳥式迴避面對。由於四本帳冊是互動演化的，我也不知大局會往哪方向發展，但是我百分之百知道一件事：一個不敢面對問題的社會，只有選擇自殘或隨波逐流的下場。

四本帳之外，有沒有一本帳冊是台灣自己百分之百可以自己結帳的？當然有，那就是第五本帳─台灣公民如何清理台灣政治體制內的弊端和人民自己身上的陋習，以躋身世界上「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國家的行列。這本帳如果能結清，台灣就可以像是一棟底盤堅實的鋼骨大廈，防震級別由磚瓦結構的四級提升至七級。前述四本帳無論如何連動，台灣的防災係數都會大大提高。

這五本帳之間的環環相扣，其間標誌性的時間點，當然就是由以下三件事組成，依時間發生的順序如下：一、2020年初的台灣總統大選；二、2020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三、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三件事中每一件事的結果，都將牽動另外兩件事的結果。由於長期受到中共的封鎖，台灣社會的世界觀、志氣都落後於國際大局，自限、自娛於茶壺內的風波，難以從三百六十度的視野定位台灣；因此，大多數的台灣成年人（也就是選民），習慣於把上述的

第一件事：台灣的大選，當成「台灣的大選」，而無視於2020年大選對「五本總帳」中的第二件、第三件事的衝擊力道，總覺得無論台灣如何做，都影響不了上述第二件、第三件事。

把話說重一點，台灣由於過去四百年的「被殖民」以及「被作基地」的歷史記憶過深，因而「舊恨綿綿」甚至「舊情綿綿」，對於自己在地球上的地位不但認識不清楚，甚至喪失了追問人生的五個最重要問題的能力和勇氣：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在哪裡？我可以往哪裡去？怎麼去？

這本書的篇章，看起來有些駁雜，但其實是有一條主軸的，現把這條主軸的邏輯順序條列如下，也算是一種導讀吧。 但是必須提醒的是，本書內容的展開方式，並沒有完全依照這主軸邏輯，因而可能造成讀者一種「跳躍式」的感覺。但這是筆者的有意識的選擇而致，因為當前世界形勢逼人，時間不等人，所以筆者把「我現在在哪裡」（台灣的現實處境）、「我如何應變」（打開應變方向的腦洞）放在了本書的上半部，而把「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歷史及其遺留情緒）、「我可以往哪裡去」（台灣的世界角色），放到了本書的下半部。

這條主軸大致是這樣的：

一、台灣困於四百年「被殖民」以及「被作基地」的歷史記憶，被「舊恨綿綿」和「舊情綿綿」綁架，陷入了「凡事二分法」的詛咒，導致原地打轉，有限的資源配置錯位，原生志氣以及創造力大大被框限，也為覬覦台灣地緣戰略優勢的對手得以進行分化、分裂台灣。

二、台灣對以上第一條的自覺，是台灣唯一的脫困方式。沒有社會的自覺、每個人的自覺，台灣還會重複「被殖民」或「被作基地」的地緣宿命。但如果台灣得以進入自覺狀態，台灣的世界地位，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都會可持續的提升，用市井語言說，就是「走路有風，口袋有錢」。

三、台灣人的自覺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要達標，台灣還必須務實。務實分兩方面：政治和經濟。政治上的務實，就是不要因為任何「意識形態」或「基本教義」影響了對「現實政治」（德文Realpolitik）的誤判。也就是要清楚的知道在現階段對誰不掉隊，對誰不插隊。經濟上的務實，就是要打好法治（rule of law）和法制（rule by law）的基礎，然後善用對外政策的彈性，對全世界的經貿開大門、走大路。

四、台灣不大，但也不算小。可以左右台灣命運方向的不是比大小，而是善用台灣最大的資產—地緣優勢；在善用地緣優勢下，把台灣變成一個「四『流』國家」—「人流、物流、金流、資訊流」。

五、台灣還有第二個優勢，那就是文明以及制度的優勢，但是台灣人不能被沖昏了頭，以為單靠文明及制度就能保台灣國運。台灣人必須面對自己所處文化及制度中的惡端，通過公義力量來減少制度中的肉桶，通過法治來遏制以民主為名的投機亂法。

六、有數千年人類活動歷史的台灣，雖然地處人類文明遷移路徑的末端，但由於同時兼具「陸塊末端」和「海洋起點」的雙重地質特性，台灣的海洋遺產和陸塊遺產也造就了今日台灣。因此，即使在近四百年的「被殖民」和「被作基地」的框限下，台灣的現貌並不純屬歷史事件的意外，而也有一種真正台灣特色的原生文化力量，也就是筆者在過去的書中所詳細陳述的「平民三精神」—（1）誰怕誰？（2）人不能欺負人。（3）永遠不相信絕對權威。有邏輯訓練的讀者，應該可以看出，由這樸素的「平民三精神」的相互邏輯關係中，所有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法治」原則，都可以推導出來，而成為台灣的原生動力。

七、台灣社會紛擾之源之一的「國家定位」問題，並非無解，

但是需要創意、耐心、技能和志氣。同時，台灣人必須普遍意識到，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並不只是一個台灣的內部問題，而是一個牽涉到世界的問題。把時間拉長到未來五十年，因台灣國家定位問題所帶來的世局影響力道，大於英國是否脫歐、魁北克是否獨立。因此，台灣各界的「從世界格局看台灣國家定位問題」的能力，必須迅速提升高度。唯有讓國際充分理解台灣是一個足以牽動世界未來數十年運道的地方，才能最大程度的提升台灣的國防安全。

八、對於與俗稱「中國」（China）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台灣人必須從七十年來的最大觀念誤區中走出來－以為「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十三點五億人」。只要走出了這個觀念誤區，認清楚了以上四個對象之間不能劃上等號，台灣人的所有思維，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都可以豁然大開，海闊天空。

九、銅板的另一面，台灣自己對台灣也有類似的七十年誤區。過去以為「國民黨=台灣」，後來有人以為「民進黨=台灣」，好在2016年及2018年的選舉某個程度上打破了這個誤區，但是仍然有太多的台灣人擺脫不了「執政黨=台灣」或「政府=台灣」。可以說，台灣的政治進步，過去是，將來也會是一個又一個「打破等號」的過程。

十、當前世界上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中國問題」對遙遠的國度可能只是暫時性的，但是對台灣卻會是亙古的。道理很簡單：未來一千年，台灣不會往東位移一千公里，中國陸塊（無論其政治如何演變）也不會往西位移一千公里，這個鄰居是做定了。當前，台灣就像一家精緻的瓷器店，而隔壁住了一頭大象。但是，台灣與俗稱「中國」的這個大陸塊之間，雖然地理千年不變，但是關係和相處方式，卻可以改變。

十一、在可預見的將來，台灣和中國之間不會改變的最大公約數，就是雙方都使用「方塊字」，雖然文明、文化、制度、價值觀都已極大差異化，但是表達這些差異化的文字符號還是方塊字。換句話說，雙邊理性的人，只要不是在權力鬥爭的場域中，再大的差異都是可溝通的，不至於雞同鴨講。因此，只要雙邊理性的人，能夠打破上述第八和九條所述的「等號」，文明層次的溝通機會是存在的。

十二、以中國的體積和人口，世界必因中國而改變，不論這改變是好還是壞的。而由於上述「方塊字紐帶」，中國可因台灣而改變。若以地球上「方塊字人群」的高度和廣度來看，台灣是唯一可以改變中國的幹細胞。即使由純粹的實用主義來講，讓世界上、國際間意識到台灣的幹細胞地位，也是台灣必須主動取得的優勢。這個道理，可以歸納出一個論述：「世界必因中國而改變，中國可因台灣而改變，今天的中國處於病態，世界必須珍惜台灣的幹細胞地位，台灣更必須懂得善用自身的幹細胞地位」。

台灣人傻到不懂得自己優勢？

由於面臨前述五本帳，台灣人對台灣在世界上、地球上的定位，必須拿出自主態度來。

一聽到「台灣自主」這四個字，很多人，包括對台灣有很深感情的人，第一個反應可能是酸。容我換個方式來講同樣道理，看還酸不酸得起來。如下：人生固然多變，但一個人對自己的人生，必須拿出一種自主態度。對自己人生沒有自主態度的人，頂多做一個被別人同情的可憐人，想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發跡，門都沒有。

後一種陳述，很難有人看了會發酸語，因為你我都是人，除非不把自己當人。那麼，為什麼把「你」這個字，換成「台灣」這兩個字的時候，原來不酸的就酸起來了？很奇妙，是不是？每一個人

對自己的人生和利害都很有態度，但對自己所處的國家卻沒有態度，這反映了台灣的什麼問題？

再重複原始命題一次：台灣人對自己在世界上、地球上的定位，必須拿出一種自主態度，否則別人或許會喜歡台灣、同情台灣、利用台灣，但是不會真正的尊重台灣、提拔台灣。

不管你的國家定位立場如何，你都得承認一個現實：即使不談有史以來，至少二戰結束以來的七十四年，台灣吃的都是戰略地緣飯。也就是，所有盯著台灣的國家，看重的都不是台灣三點六萬平方公里的人文物產。台灣既不像歐洲小國有改變人類文明的思想家，也不像沙漠小國以色列可以爭氣的將農產品輸往全世界；台灣至今就是一個具有永久性地緣戰略意義、過去任由歷史因緣際會決定命運的島國。

對台灣虎視眈眈的中共，其喉舌《環球時報》對這點說得最赤裸真實：「要島不要人。」但這島上現在有二千三百五十萬人，我想問這島上的人的問題是：你要不要這個島？若不要，移民沒人擋著你，跨過海峽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身分證也沒人攔著你。但你若要在這個島上打拼你的生活方式，那麼請你面對世界拿出個態度來。

我們在台灣的人，可以有理想，想到百年、千年都可以，因為人沒有理想就不能算作人。本書中接下來，也會描繪一個理想中的台灣。但是，在2020–2022年這段凶險期間，我認為，台灣對國際及鄰居，最恰當的態度是：台灣人覺醒了，但並不自我膨脹，沒有傻到不懂得自己最大的資本就是地緣戰略優勢的地步。

在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中，有地緣戰略優勢的小國若身處凶險，應該怎麼做？一句話，就是西瓜偎大邊。中邊的，我們爭取其同理心，小邊的，我們爭取它對台灣態度的支持。

對台灣，理論上最大邊的西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現在它被惡霸中共一黨專制，連自己專制區內的民心都快要散架了，並正在使用威脅台灣之策以維繫其政權合理性。因此，把它當大西瓜來偎，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話雖如此，小國台灣也不能忽視隔壁住

了一隻生病大象的事實。台灣必須客觀理解生病大象的病理學和心理學。

在大象的病情未好轉、瘋性未除之前，台灣需要偎大邊的西瓜是那些足以牽制病象行為的犀牛，主力當然就是美國。但是，世道是現實的，投懷送抱式的偎大邊，也是不值錢的。西瓜偎美國大邊時，也必須拿出態度。最恰當的態度還是那句話：台灣人沒有傻到不懂得自己最大資本就是地緣戰略優勢的地步。

西瓜偎大邊時，被偎者會獅子開口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但偎者也要懂得說同樣一句話：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當下台灣最慘的狀況是：視中共為大西瓜的那派人，把台灣當作可以被白吃的午餐；而同樣的，把美國當大西瓜的那派人，也把台灣當作可以被白吃的午餐。兩種國家定位立場相反的人，竟然都不懂得將台灣的最大資本—地緣戰略優勢，化成有效政策，你說慘不慘？

不知道自己身價何在的人，最是可憐。為了實現理想或報仇，就可以把自己當作免費的或「一元吃到飽」午餐的人，最是可恨。

我不知道你的立場、想法如何，坦白講，那也不關我的事。但是拜託注意了，請不要笨到做不知自己身價的可憐或可恨的人，我可不會那麼輕易的讓你把我賣掉，我相信大多數台灣人也不會。

2020—2022年：台灣應變十二字訣—
不掉隊、不插隊、除肉桶、固社區

2020—2022年是台灣的凶險期，也是機遇期。時間不多，怎麼做，將決定台灣未來數十年的命運。

前文描述了國內的凶險，但比起國際環境的凶險，國內的紛爭還是次要的。我常說，國內固然紛爭不斷、政府失效，台灣就像一艘失去動力和羅盤的船，原地打轉、空耗資源，但是，只要再給台灣二十年的時間，隨著年輕世代成熟，台灣一定會展現新風貌。關鍵問題是，大環境給不給台灣這二十年的自然翻轉時間。

關鍵在國際環境中的兩隻灰犀牛（意指已可預見的大概率風險）：一隻就是眾所周知的來自中共的威脅，另一隻是世界經濟周期的下行。這兩隻灰犀牛相互推波助瀾，萬一再出現我們預期不到的黑天鵝，事態就會更加嚴峻。

為何把凶險期定在2020–2022年之間呢？因為這期間有三件大事：2020年台灣的總統大選、美國的總統大選，以及2022年中共的二十大。這三件事動態糾纏在一起，像一個三元方程式，三元都是變數且互相牽扯。美國已經懂得區別「中共」和「中國」，國策已定調在「盡量少傷害中國人民的原則下遏止中共」，然而2020年川普是否續任將影響到美國打「台灣牌」的方式和力度。2022年中共二十大的時間壓力，將決定習近平是否能再繼續連任至少五年以及中共的命運。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中，台灣的主體性定位這議題，已經沒有閃躲空間，而其結果又和誰勝出有著絕大關係。三件事攪和在一起，將會凶相畢露。

這三年凶險期，台灣如何做，才對台灣最有利？各方各派的意見，大家都已耳熟能詳，此處不再一一評論。個人認為，在可預見的灰犀牛及可能發生的黑天鵝境況下，台灣應該採取以下的「十二字訣」：（對美國）不掉隊、（對中共）不插隊、（對台灣）除肉桶、（對人民）固社區。

不掉隊

先說「不掉隊」。美國之所以關心台灣的安全，理由有二，一是台灣的「水岸第一排」東亞地緣意義；二是台灣證明了在方塊字文化圈內，也有可能經由人民自我努力而邁向民主。在這兩個理由下，美國願意提供台灣國家安全上的協助，但這協助是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不是基於台灣的主觀需求。因此，台灣的最佳策略不是強人所難，而是隨著美國的節奏「不掉隊」。這不僅包括要準確掌握美國提供的窗口機遇，還包括了對自身的民主落後之處果斷的

動大手術。

不插隊

　　再談「不插隊」。中共一黨專政統治至少面臨六個政軍方面的挑戰：南海石油及海貿的通路問題、新疆維吾爾族問題、西方是否允許香港繼續扮演門戶角色、朝核如何解決、東海釣魚島可能導致的中日衝突、台灣海峽問題。台灣多數人有個盲點，以為台海是中共或習近平最關注的問題，事實上，中共自己現在已經火燒屁股，台海對中共處境的顛覆性排在末段班，除非台灣自己插隊到前面。當然，不能完全排除中共狗急跳牆，拿台灣墊背的可能性，但那完全不在台灣的可控範圍內。

除肉桶

　　對於幾乎一定到來的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台灣藍綠政府向來以虛無飄渺的「創新大政策」來自欺欺人。這是開玩笑，因為台灣的「政治利益肉桶」結構一直存在，腐肉未去，何來創新？「權力肉桶」、「利益肉桶」只要打破，每年就能擠出上千億的財源，足以解決幾乎所有台灣的民生問題。這任務，寄望於政界、財經界、司法界「自宮」是不可能的，只能靠社會壓力、選票壓力以及輿論壓力。擠破膿包，拿回原本就屬於你的東西，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固社區

　　最後，在危機及困局時期，人民的焦慮感必然陡升，隨之而來的就是日益加劇的社會問題。此刻，廣義的「社區感營造」特別重要；通過設計和安排，在日常生活、家庭、教育、娛樂中注入種種人際交流元素，強化社區認同感和互濟機制，可大大緩和焦慮。還好，這方面的社區意識和人才，台灣相當充沛，只是需要再加一把

勁和創造新鮮的整合方式。

十二字訣，知易行難，但若怕難而不行，台灣將來會更難。

2020–2025年：台灣解方的最後窗口

之一

「解方」是「解決方案」的簡稱。複雜問題的解方，不可能一步到位，而需要分階段、分步驟。就像人體，單一系統出問題，送專科最直接，但若多重系統同時出問題，最好送急診。急診室的任務，就是在第一時間先把生命徵兆穩定住，判斷需不需要動手術或送加護病房。之後，才轉普通病房護理，然後，可能得做復健，最後，還得患者主動家居療養，最終才是康復。本系列論點是：2020–2022將是台灣的「急診期」，度過了，才會有2022–2025的台灣「機會期」，進行專科、復健、療養、康復。台灣若搞錯次序，操作步驟顛倒會出大事。

美國政府和中共之間，已經進入板塊大對撞。攤牌遲早要發生，即使過程中出現緩和，也僅是暫時。因為，地球大勢已經發展到了這一步。美國的權力核心–參眾兩院及白宮近年達到的最大共識是：美國二戰以來的傳統霸權已經撐不住了，非變不可。但如何變？共和黨和民主黨的解方相反；民主黨傾向於「強化既有體系並修補國際關係」，共和黨傾向打掉重練，而川普團隊就是打掉重練派中的急進派–即刻破壞再迅速重建。川普見人就打，其他國家避之而不及，但因緣際會，唯有中共這時自己送上門來。

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急速發展、其實是搭了美國傳統秩序的便車，同時又得利於美國被賓拉登扯住十年的空窗期，對這事實中共是了然於心的；北京本可就勢再拖十年，但派系內鬥已經達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習近平派只得採用對外擴張以滿足內部分贓之需，弄出個「一帶一路」，加上豬隊友鑼鼓喧天，不但拋開了鄧小平的

「韜光養晦」，連江澤民的「悶聲發大財」都做不到。做總統之前就對中國不滿的川普，設下關稅、科技兩局，請君入甕，衝突逐步升級，人在江湖的習近平不得不對美國發出白皮書檄文，並容許國防部長魏鳳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峰會中宣稱「打，奉陪到底。如果台灣從中國分裂，則不惜一戰」。

大勢下，台灣已經沒有「維持現狀」的餘地了！用文首的比喻，處境之複雜已經使得台灣到了必須進入急診室的地步了，此時此刻若台灣人民還以為「送專科」可以解決問題，那就太天真了！此處的「專科」，意思是指望台灣可以單用「兩岸關係」或「台美關係」或單方宣稱「保持現狀」就可平安度過此一劫難。

發出此感嘆，因為眼見各大眾媒體、社交媒體中，都還在用「專科醫生」的姿態相互辯論責難，親中熊貓派以為擺平「兩岸關係」才是解方，靠美派以為加速「台美關係」就可自保，而無數的機會派期待保持現狀下可賺機遇財，鮮有人警覺到，此次的美中板塊對撞，不管誰勝誰負，其引發的土石流，首當其衝的就是台灣，然而竟然眼下看不到幾個人在做「災前控管、防災措施」的工作。

必須再三強調，2020–2022年這兩年，台灣必須認識到自己已經進入急診室，應該以加護病房的規格看待自己。過去曾提出，台灣急診期的大原則就是十二個字：（對美）不掉隊，（對中）不插隊，（對政府）除肉桶，（對人民）固社區。

只有在度過2020–2022年急診期之後，2022–2025年台灣才談得上根據急診期所達到的結論，進行「看專科」、復健、療養的後續動作。若過不了急診期，那就根本沒有機會期待康復了。

急診期間的兩年，基本上是美中兩國打架，經濟架、科技架、金融架，也不排除軍事架。美中兩國將窮於應付對方，對台灣的基本態度將是「大人打架，小孩不要在旁邊鬧」。但是，即使台灣不做「麻煩製造者」，也無法制止美、中任一方、甚至雙方用台灣作為試探對方底線的試紙或調節溫度的空調機。因而，台灣必須有幾

手準備。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近期西方觀察家紛紛預警台海危機，中共事實上也已經進入備戰狀態，從絕對的外匯管制到社會生活的控管、到石油、糧食的儲備，美國也不斷進行台海兩端−南海及東海的奪島演習，然而台灣一般人有如視而不見，許多菁英甚至斥責那些喊出國王沒穿衣服的孩子。基本上，台灣社會還處在「事不關己、隔岸觀火」的狀態，同溫層之間清談、異溫層之間互罵，網內免費互打。

之二

前述2020−2022台灣的「急診期」，乃台灣的最後機會窗口。為何這樣說？因為在1996年台灣首次一人一票之前，將近四百年的時間，台灣的存在都是作為基地。即使到了今天，也不可諱言，台灣還是美國的半個基地，而中共的「要島不要人」說法，更赤裸裸的表明它要的就是讓台灣成為它永久的基地。台灣若願意繼續充當基地的角色，那也就沒什麼好談了。但是，倘若台灣人不再想做「基地的子民」而渴望成為符合其條件、有世界影響力的自主國家，那麼2022年就是台灣的最後機會窗口。

2020−2022年之間進入急診期，不是台灣自己的選擇，而是美國對中共攤牌大勢下的必然。因而，必須先說明大勢的背景。將近三十年前，美國鬆手接納共產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WTO時，期待的是中共隨著經濟的成長，能夠逐步放鬆一黨專政的鐵腕，而加入以美國為首的現代經濟體系。當時美國會如此想像，肯定已把台灣經驗當成座標，同樣語言文字下，國民黨可以，為什麼共產黨不可以？三十年後，美國終於明白了，共產黨就是不可以。這是一個花了三十年才得到的教訓，已經是美國參眾兩院兩黨和白宮的世紀大共識。因此，此次美國對中共的施壓，底線就是中共必須改變政權結構，而中共的底線是改革止於經濟。

美國其實還不夠了解中共的本質，他們還以為是在和一個「型態不同的政府」打交道，這個幻想將在2020─2022年之間被現實進一步戳破。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其實只是一個符號，這符號的真正內涵是：一群具有傳統江山觀加皇朝觀的家族和派系，冒充為一個「政黨」，然後再繼而冒充為一個「政府」，聲稱代表一個「國家」，內部的運作機制，乃家法大於黨法，黨法大於公安警察，公安警察大於司法的一個「以權力為本」的體系。美國人至今才慢慢了解什麼叫做「一套人馬、幾塊招牌」；絕大多數美國政府人員還不知道所謂的「中國國防部」只是一塊招牌，連獨立的辦公室都沒有，就只是一塊掛在中共軍委辦公室外面的招牌和一個網站。所謂的「中國外交部」、「財政部」、「中央銀行」，雖然都有獨立辦公大樓，但不過都是「黨部」的附屬名稱、附隨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沒有「政府」，只有派系高層和家族的力量組合。所有的「政府部門」，只不過是這一大團力量組合體的辦事員，但拿出的名片都冠以西方所熟悉的政府職稱。西方被哄了三十年，以為是在和一個政府打交道，即使有明白人也甘願被哄，因為這個派系家族集團讓西方有錢賺。

當下美國已經快要認清中共的本質，也學會了應當區分「中共」和「中國」。美國對中共攤牌之際，台灣能否安然度過急診期？若度不過怎麼辦？若度過了，2022─2025年如何轉化至康復期？台灣人可以揣摩一下以下幾個問題，因為答案，都隱藏在這幾個問題當中。

一、當中共被美國逼到牆角時，其中某些派系會不會狗急跳牆，藉著武力迫台，以扳倒另一派系？

二、若中共武力迫台，其專政下的人民心態會產生什麼變化？

三、若中共武力迫台，會動到什麼層次？台灣現在必須做什

麼，才能影響其層次？

四、美國會如何利用台灣的模糊國家角色，以達到其鬆動中共一黨專政的世紀目標？

五、台灣對美國利用台灣模糊角色的底線在哪裡？台灣想換回什麼？

六、中共一黨專政若被鬆動，中國會出現哪幾種可能性？

七、若中共選擇走回當年蘇聯的鎖國爭霸老路，一拖數十年，台灣如何定位自己？

八、無論出現上述哪種情況，中國都會出現巨大土石流，四處竄流之下首當其衝就是台灣，如何準備防災？

九、若台灣有幸度過急診期且進入康復期，對台灣最有利的康復方向是什麼？

十、以上九個問題，你認為是實質問題，還是無病呻吟？

坦白說，這是一個魔術方塊，任何方向都可以轉，但每轉一次都牽動其他層面，越早研究這個魔方的結構，台灣就越能保護好自己。

之三

想解決一件事，必須有個目標；沒有目標，根本談不出解方，談了也是白談。這裡假設，台灣渴望成為符合其條件、有世界影響力的自主國家。若這個假設不成立，台灣願意繼續充當他人基地的角色，還是「怕死、愛財、好做官」，那也就不用談解方了，大家隨波逐流、逆來順受就可以過小日子了，甚至可能過得還不錯。

關鍵字是「自主」。就像一個人，角色是老闆可以自主，但角色是員工時同樣可以自主。自主，其實就是獨立判斷、十字路口時自己選擇方向，然後願賭服輸。自主，一定是和「承擔力」（accountability）聯繫在一起的，一個凡事怨前人、困境賴他人的人，絕對稱不上是一個自主的人。國家，也一樣。是不是一個自主的國家，就看它在十字路口時，有沒有獨立決斷力、有沒有勇氣選擇不確定的道路，如果事後發現選錯了，是否願賭服輸。

前文說，2020—2022年是急診期，急診室內的台灣，坦白說，在美國和中共雙邊壓力下，談不上自主。處事的大原則就是已經提過的十二個字：（對美）不掉隊，（對中）不插隊，（對政府）除肉桶，（對人民）固社區。

但是，若安然度過急診期，2022—2025年的療養、復健、康復期就在望了，屆時，目標和自主這兩個問題就無可迴避了，簡而言之，就是「國家定位」的問題。

「國家定位」是台灣四百年來最大的一件事，然而如同所有大事，它是有制約條件的，也就是無法百分之百任性而為。以下列出幾項最關鍵的制約條件：

一、雖然不能任性而為，但是一定得滿足利害相關人的自主感；在這裡，利害相關人就是所有具有公民身分、居住在台灣的人；他們必須感到，這個國家定位是他們自主接受的。

二、國家定位必須走出過去四百年做他方基地的角色。

三、台灣是其所處區域中的利害相關方，不可能獨善其身，也不可能不和區域鄰居交往，這包括了韓國、日本、東南亞，是的，還有中國；當所處區域中發生問題時，台灣的國家定位必須能夠成為問題解方的一部分。

四、經歷了過去三十年的民主歷程磨難，台灣有義務把自己在政治文明中的優點和缺點，提供給區域中的其他鄰居參考，並於必要時提供諮詢及援助；是的，這裡包括對中國。舉例而言，台灣三十年來沉澱出的「任何單一政黨都不等於台灣」這個寶貴經驗，就應該轉化為「任何單一政黨都不等於中國」的認識，提供給中國社會參考。再如，方塊字（漢字）文化下發生在台灣的各種民主障礙，也應不忌諱的提供給同樣使用方塊字的中國社會參考。

五、眾所周知，台灣的國家定位是個難解的套，牽涉到兩個利害相關的巨人━民主化的美利堅合眾國與目前一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解套的方式一定得比大小、比肌肉，那麼台灣就不必談自主解套了。但任何博弈中，都有巧勁的成分。雖然美中雙邊都視台灣為棋子或工具，但台灣必須有能力在現實中拿出帶有巧勁的解決方案。

六、2020━2022年急診期中的台灣，雖然不適合對國家定位做出最終行動方案，但是卻非常適合進行兩件事：（1）積極討論其牽涉到的各方面制約條件；（2）積極順勢提高台灣的世界能見度。這裡要說一句比較難聽的話：台灣若被世界視為一個扶不起的阿斗，那麼世界就不會尊重台灣最終選擇的國家定位。

最後做一說明：本系列之所以把2025視為「解方的最後窗口」，其實是基於一個預測：民主美國與專政中共的攤牌結果，不會拖過2025年。等結果出來，台灣若還提不出一套帶有巧勁的自主性解方，那極可能就又是隨波逐流做他人的基地了。那不是我的選擇。

第二章

台灣如何從「統獨二分法」中脫身

第二章

台灣如何從「統獨二分法」中脫身

【前言】

魔術，叫做障眼法；而統戰之術，也可以叫做障腦法。障眼法的訣竅在快，快到你看不見；而障腦法的訣竅在慢，慢到你自己不知道被引導。好的魔術師，靠的是年年創新招，讓你拍案驚奇，好的統戰師，靠的是耐性—年年用同樣幾招，讓你習以為常，以為那就是你自己原來的想法。魔術玩的是手技和道具，統戰玩的是情緒、抽換概念和新聞事件。本章，從各種角度為讀者分析—「統獨二分法」何以成為最高的統戰伎倆，以及台灣的國民、民進兩黨如何半推半就的落入統戰陷阱。

凶機重重，台灣別再中計：
中共不等於中國

過去四十年，中共做得最成功的一件統戰工作，就是使得世人—從美國到歐洲到台灣—相信「中共等於中國」。於是，美國人以為「美國政府」在與「中國政府」打交道，而渾然不覺其實是在和「中國共產黨」打交道；所謂的「美中關係」，根本是一個不對稱的關係，一國的政府和另一國的一個政黨，怎麼能關係對稱呢？

而台灣人，明明看到大量中國人民對一黨專政敢怒不敢言，卻也相信中共這個政黨，可以代表中國人民和台灣民選出來的合法政府簽協議。台灣儘管已經一人一票選舉了二十多年，卻還未脫幾百年來被專政統治的奴性，不論是親中共者還是仇中共者，都把「中共」視為「中國」的當然統治者，以至於親中共者閉眼不提中共的人權問題，而仇中共者「恨屋及烏」，將怒氣轉發到大量無辜的中國平民身上。

台灣人會把中共和中國劃上等號，有其歷史因素，而這歷史因素同樣也是個笑話。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以前，中共對台灣犯下的最大認知錯誤，就是「國民黨等於台灣」；由於這錯誤，中共從來沒有真正理解過台灣，認知上永遠落後於台灣的現狀一步，因而每一步對台政策的效果都適得其反。但是，現在中共算是認知到了「國民黨並不等於台灣」，而且，跡象顯示，它也開始避免再一次犯下「民進黨等於台灣」的錯誤。於是，它開始對台灣平民或選民下功夫，極盡統戰之能事。

相對的，反而是台灣還沒從「中共等於中國」這迷信中覺醒，而且越來越篤定。最明顯的現象就是：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世代，現在把中共對台灣的打壓和惡行，一律怪罪於中國人民。這個錯誤，將來會使台灣付出代價，正如中共過去在「國民黨等於台灣」信念下付出了它的代價一樣。

事實上，國民黨對於台灣，只是一個歷史階段中的現象；中共對於中國，終將也只是歷史長河中的階段現象。經過了近代歷史的教訓，中國人民腦子裡是有一個理想政府的念頭，而中共距離那理想很遠，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民心裡是清楚的，甚至多數的共產黨員心裡也是清楚的。雖然今天中共已經是一個「大到不能倒」的專制政權，但是形勢比人強，要不它被迫自我改革，要不它等著潰散。今天，如果在中國做一次真正匿名的民意調查，詢問所有人民（包括共產黨員）：中共的一黨專政還能不能再維持三十年，我的觀察與判斷是：回答「YES」的人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換句話說，在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對未來的憧憬之中，中共或許現在是一個「大到不能倒」的團體，但是中共並不等於中國的未來。

台灣社會已經習慣於和專制的中共政權打交道，其實沒有多少機會和中國人民打交道。但台灣社會必須開始有心理準備：遲早有一天與你打交道的對象是中國人民，而不是中共政權。因而，台灣當下不區隔「中共」和「中國」的反中情緒是危險的，因為這就把盆中的嬰兒和髒水一起倒進陰溝裡了。

中共是清楚這點的，因此它藉著台灣社會的反中，作為槓桿點，挑起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並定調為「反台獨」。就像2012–2016年的國民黨一樣，中共正在想方設法保護「中共就是中國」這張神主牌，其試圖用來說服中國人的基本邏輯是：台灣受到美國、日本的保護，只有中共才能擊退美國、日本，收復台灣。台灣越「反中」，就越會強化這套邏輯在中國人民腦中的強度。因而中共才得以動不動就恐嚇台灣社會：不要與中國十三億人民為敵。

其實，事情完全可以不這樣的。台灣人只要看穿中共的統戰伎倆，不要被其「中共就是中國」的障眼法迷惑，清楚的區分中國和中共，讓中國人民知道，台灣社會並沒有那樣膚淺，把中共當成全中國。

把話說得更直白一點，台灣社會已經被「國民黨就是台灣」刻板印象愚弄了幾十年，難道現在還要被「中共就是中國」再愚弄幾十年嗎？台灣內部的許多政客，不管藍綠，都要為這愚民現象負起大部分的責任，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明明知道禍首是中共，卻因為自身接受中共的餵食，或已有不可見人的把柄握在中共手中，因而不敢喊「反共」，而只敢喊「反中」，把大量無辜的中國人民拖下水，刺激中國人民對台灣社會的敵對心理，大大升高了台灣社會未來和中國人民打交道的障礙。這點，不可原諒、罪無可赦。

在中共持續進行「台灣事務內政化」的當下，台灣社會必須表現出對「中共不等於中國」的理解，並強調「國民黨、民進黨或任何政黨，都不等於台灣」的事實；唯有如此，台灣社會才能夠得到中國社會的理解，並勾起中國人民對「為什麼台灣能夠使國民黨不等於台灣」這件事的追根究柢。相信我，這才是台灣當下最好的防身之道，也為未來與中國人民打交道留下餘地。

台灣民眾在意識上還分不清「中共不等於中國」，在2018年選舉年間發生過兩個案例。一個發生在柯文哲身上，另一件發生在韓國瑜身上。讀者可以等著，2019年和2020年的大選年，同樣手法將被施用於某些總統候選人身上，而且不分藍綠，只要達到目的就

行。

以2018年柯文哲選情為例。中共的喉舌機關中央電視台，於其第四套節目「中文國際」中，密集的在一周時間內兩度報導柯文哲2018年的高漲選情，並兩次提到了柯文哲乘勝參選2020年總統的可能性，以及柯營組黨的徵兆。這個動作，央視沒有在其國內主頻道（CCTV1）播出，因為那是中共治下十三億人觀看的頻道，倘若在這個頻道播出，只會引起人民對台灣公開選舉的嚮往。北京選擇的播出頻道，是面向境外的CCTV4，目的當然就是要讓台灣媒體轉播，製造事端。

台灣社會，如同事前編好了程式一般，膝蓋式的反應如噴泉一般的射出；藍綠、統獨的對立，再一次在北京按下按鈕之後引爆。

2018年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從中國施壓國際航空公司改台灣名稱，到操弄停辦原定在台灣舉辦的東亞青運會，到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造訪「85度C」後逼迫台商表態，到薩爾瓦多斷交，台灣社會都解釋為「中國壓縮台灣國際空間、逼迫民進黨政府就範」。在此氣氛鋪墊下，央視捧高柯文哲的突發現象，很自然的讓台灣社會將其解釋為「中國操弄台灣選情」、「中共培養台灣親中人物」、「中國滲透台灣政治」。

實施在柯文哲身上的手法，在2018年底，中共在韓國瑜的選情上又再度用了一次。在台灣社會引起的效果，也正中北京下懷。

這裡想說的是，台灣社會此時此刻還用這種慣性思維、慣性情緒、慣性反應來看事情，不但看低了中國共產黨的手段，也看輕了區域大局的嚴峻性。在這種慣性思維下，台灣社會看不到接下來的凶象，因而可能害死自己。

別以為中共的統戰手法只會「抹藍」，這樣想就太小看「統戰」這門功夫的境界了。在統戰的需要下，中共還會「抹綠」。因為，只有在藍綠都保持適當溫度的條件下，中共才有隨其需要上下其手的餘地；藍的溫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同樣綠的溫度不

能太高，但也不能太低。這其中的邏輯，對付的不是台灣，而是美國。

在筆者看來，未來十年的大局中有「兩個不改變」。第一個不會改變的是美中對衝態勢。美國形成圍堵中國的同盟，已是不爭的事實，並且是兩黨、參眾兩院的多數共識。對於那些寄望於美國中期選舉共和黨敗落後、或川普總統因通俄門被彈劾而使得中共脫身的人，恐怕要大大的失望。即使民主黨已經在中期選舉大勝、即使川普被彈劾後副總統彭斯接班，美國全力圍堵中國的態勢不會改變。

第二個不會改變的是中國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一黨專政的中共已經失去了自我糾錯的能力，正在把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民帶向深淵，並且這種塌陷是結構性的，目前的塗脂擦粉只能掩飾外觀，不能制止內臟的腐爛。在中共執政下，政治就是經濟，經濟就是政治，並且政治和經濟都姓「黨」。中國必因中共而塌陷，但塌陷是逐步的水土流失還是瞬間的走山？引爆點是經濟還是政治？都有可能！

「兩個不改變」加在一起，合理的推論就是中共會通過對台灣下重手，外以抗美、內以延壽。台灣人心裡不是不知道，但總是覺得美國在圍堵中國的大戰略下，會軍事保護台灣。

這又是一種慣性思維的謬誤！誰提到「軍事」了？除了軍事，就沒有其他的「重手」嗎？別看低共產黨，那是一個「設局無上限、手段無底線」的組織。

中共《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明列，「……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其中並沒有定義何謂「重大事變」，亦沒有「軍事」或「武力」的字眼。

換句話說，如果台灣在國際眾目睽睽之下，因統獨顏色之爭，

內部發生流血內亂，中共就可藉機以各種方式介入台灣內政及周邊防務。那麼，請問中共有沒有能力在台灣內部激起一場因統獨顏色對立而起的流血內亂？看看新疆、西藏以及「六四」的案例，還有近來諸多要人各式神祕死亡事件，你就明白什麼叫做「設局無上限、手段無底線」了。

2020年的選戰中，如果掌權的民進黨或綠營以統獨顏色議題持續進逼聲勢高漲的候選人，在沸騰之中，只要任何一位深得人心的候選人發生意外，請大家自行猜想社會後果。不要忘記了，陳水扁兩顆子彈事件還未真相大白，連勝文遭槍擊案至今疑雲重重，台灣還經得起另一場來路不明的設局嗎？

深具梁山泊派系氣息的民進黨、猶望捲土重來的國民黨、聲勢不衰的柯陣營、咄咄逼人的基本教義派，請你們深思落入「統獨二分法」、「藍綠二分法」深淵之下的凶象！（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8月）

2020年台灣不能真的傻掉

什麼樣的台灣中共最樂見？那就是一個被統獨二分法撕裂的台灣，一個在二分法下永遠原地打轉的台灣。看清楚喲。中共最愛的不是一個贊成和中國統一的台灣，而是一個包含獨派力量的台灣。

沒有了獨派，台灣就會變成「麻煩製造者」。麻煩來自兩方面：首先，中共將失去和美國明爭暗鬥的最有份量的槓桿著力點。還有，台灣可不是香港，一個已經一人一票的台灣，若急著和中國統一，會把共產黨內的明白人嚇出尿來。因為台灣的民主制度、選民風氣雖然距離完善還很遠，但是喚醒中共治下人民的意識卻是綽綽有餘。

倘若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台灣公民成為急統派，中國人民瞬間就會明白「中共不等於中國」這個道理，那時中共就得開始擔心中國被台灣統一了。中共一點都不怕台灣的哪個人、哪個黨，但是它

怕死了台灣的一人一票、選民刁鑽、宗教開放、性別包容。如果台灣人想統一，那台灣就可以不費一兵一卒改變中國，成為人類本世紀最大的文明貢獻之一。還好台灣人沒有這個雄心和野心，否則中共就坐立難安了。中共懂不懂這點？廢話，當然懂。中國經濟靠出口，全國十大出口創匯企業中，就有七家是台灣人開的，而且多半是白手起家的台灣人；還好台灣人只愛賺錢，如果台灣人天生像中共一樣愛搞顛覆，習近平哪敢提統一？

不知你看懂了沒？中共幾十年來只敢對台灣談「一國兩制」，而不敢談「一國一制」，就是怕中國人民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一國一制，哪個「制」啊？

因此，中共對台灣的統戰方針，必須保持台灣獨派的一定溫度，不能太熱，但也不能太冷。熱了，要降溫，冷了，要加柴火。比方說，二十度到二十五度之間最合適。

所以，中共不能讓國民黨內的某些派系太強，否則弄假成真；民進黨內的某些派系也不能太強，否則假戲真做。但兩邊也都不能太弱，否則一個不分裂的台灣，引擎發動起來，對中共的威脅太大了。走這平衡鋼索，人家中共真的很不容易，你說呢？

但台灣人民太純真，多數看不懂統戰的這種最高境界。少數看得懂的，通常都會用這知識來賺鈔票或者賺選票。獨家祕方，哪能讓你無知平民看到啊！你的鈔票，就是我的家業，你的選票，就是我的權力。

2020年台灣的選情詭譎，但也無須抱怨，因為那只是時間到了。韓戰以後，雖然中間有些風風雨雨，但基本上台灣享受了六十年的區域承平，混得還算不錯。但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台灣過去二十年的內部紛紛擾擾，從一個角度可以視為發展過程的陣痛；從另一個角度，也可看成某種形式的還債。還什麼債？還搭上各種順風車的債，還自己懵懂無知的債。

二十年來的內部紛擾，算是還「內債」，但接下來三年的外部

紛擾，可能就會迫使台灣開始還「外債」了。還外債的起始點就落在2020年，這一局，看懂真的很不容易。台灣自己還在「網內免費互打」，多數人搞不清楚，其實2020年的本質不是什麼內部的藍綠統獨，而是外部的美國和中共之間要見真章了。

說來很奇妙，台灣人一直以為藍綠統獨是台灣人自己搞出來的現象。但相當程度上，搞出台灣藍綠統獨的不是台灣自己，而是中共和美國。台灣人不過是在打政治代理戰爭罷了。這狀況其實有點類似當年的中國，固然內有軍閥，但真正導致國共分裂內戰的是蘇俄和日本。

有人從藍綠統獨中賺鈔票，有人從藍綠統獨中賺選票。如果你屬於既賺不到鈔票也賺不到選票的人，那就不要隨之起鬨了。作為一個人，要從你自己的主體性考慮問題。同樣的，美國和中共都要從藍綠統獨中賺權力，台灣若既不懂得如何從局中取利，也不懂得如何藉由大局提升自己的主體性，那也真的是傻掉了。（本文原發表於2019年3月）

當傻統遇上傻獨

當遇上「統獨」這個議題時，台灣基本上只有三種人：傻統、傻獨和統獨油子。如果不明白「統獨油子」的意思，那就可以翻譯為「統棍和獨棍」；如果連什麼是「棍」都不十分明白，那麼再明白的說，「棍」就是「惡棍」中的棍的意思。

為什麼稱大多數贊成統或贊成獨的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為傻統和傻獨呢？這道理極其簡單：請把你印象中所有叫得出名字的統派知名人士和獨派知名人士，都列在一張清單上，然後問一個問題：這些人當中，哪個沒有移居外國的布局和實力？在最糟的情況下，也就是當中共攻打台灣的時刻，他們之中有幾個還會留在台灣？你覺得他們避難的腳步會有多快？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你，短至一天，最長不超過三個月。這些人給他們一個名號，就是「統獨油子」。

如果你是一個絲毫沒有移居外國的布局和實力的人，還在跟著統獨油子起舞，你說你不是傻統或傻獨是什麼？再請你判斷一下，台灣的傻統和傻獨，佔了人口多少比例？

統獨油子大略可分為幾類：有權力慾望為了選票的人，有利益慾望利用統獨分裂牟利的人，有七、八十歲自覺已經走到人生盡頭的人，腦袋糊塗被「舊情綿綿」或「舊恨綿綿」控制了理性的人。這些人，我也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不管他嘴巴裡怎麼講，他的內心裡面其實沒有「台灣社會」的觀念，也沒有關懷下一代的情操。他們對「下一代」的關懷僅限於與他們有血緣關係的親人。

你若覺得這個論證還不夠力，那麼請再問自己一個問題：一個真正贊成被中國共產黨統一的人，為什麼現在不立刻搬到中國大陸去落籍長居？請記住，那些經常造訪中國大陸的台灣賢達，包括那些在中國大陸貌似已經定居的台商，還有那些被中共豢養在北京的人士，他們中真正落籍中國放棄台灣護照的人，大概十個手指頭就數完了。為什麼他們忘情不了台灣的健保？為什麼他們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回台灣」來呼吸一下台灣的空氣？

同樣的問題可以問那些所謂真正贊成台灣獨立的人：為什麼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親人落籍外國？為什麼他們拿著外國護照或綠卡還長居台灣享受健保？為什麼他們在外國出生的子女的「第二語種」選擇中文，而不是台語？為什麼他們的錢要留在外國，然後以假外資名頭到台灣炒股？為什麼他們不願意自己的子女當兵捍衛台灣的安全？為什麼他們每個人都早已盤算好了「逃難路徑」？

為什麼這些統獨油子可以在台灣興風作浪？因為台灣有一大群的傻統和傻獨。傻統和傻獨，多半都是沒有布局逃難實力的人，都是真正為自己前途焦慮的人。他們雖然傻，但是卻有一票，都有嗓子和拳頭，所以「統獨油子」們把他們當成資源來擺弄。在筆者看來，「統獨油子」們，不管他們社會地位多高、智商多高，人格都是卑劣的，手段都是下流的，喊口號時理想無上限，行起事來手段無底線。

只要有機會，我掛在口上的一句話就是：統派、獨派，都是空中的蘋果派。這個命題，有理論的一面，過去也寫過很多。但是今天筆者只想指出，上面所述的「統獨油子」現象，就是我說這一句話的背後感慨！

傻統、傻獨們最好開始明白，今天瀰漫在台灣的膚淺統獨意識，其實是被引導、製造出來的幻象。製造方有兩個，一個是中共。你不要以為中共喜歡看到全台皆統派，如果這樣，北京恐怕尿都要嚇出來。因為如若全台灣一致上前擁抱中國，中共的統治基礎就會被「和平演變」。對中共最好的狀況，就是台灣統獨分裂。就像一服既可內用亦可外擦的萬金油，對內加強以民族主義為本的統治力道，對外可作為不得不擴軍的理由。因而，中共樂見的最美妙景象就是台灣內部傻統和傻獨分裂，從而上下其手、見縫插針。

製造膚淺統獨意識的另一方就是台灣自己的「統獨油子」，也就是「統棍」和「獨棍」們。他們的本質是權力、利益和情緒，但口號喊著喊著連自己在白天都相信了。

台灣的膚淺統獨意識，說穿了就是「共、國、民」聯合生產的陽謀。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三方多年來磨合出的一種合作模式，以遂共產黨的統治中國之意，以滿足台灣統獨油子的權、利、情。

在膚淺的統獨意識之外，台灣有沒有一條健康的出路？當然有，但必須付出精力和意志力的代價。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統獨油子們用來欺騙傻統和傻獨的最大兇器，就是讓傻統傻獨們相信天下有白吃的午餐。

健康的出路在哪？這需要傻統傻獨們從幻象中驚醒，大家一起跳脫膚淺的統獨意識，來討論探索。關於健康出路問題，我已經在好幾本書和無數文章中（數十萬字的論述及認證）拋磚引玉，有心讀者可自查自體會，此處不再贅述。

最關鍵的是大家是否承認台灣的傻統傻獨現象，大家是否勇於

指認出統獨油子，穿透他們的把戲和手段。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就抱歉浪費大家閱讀此文的時間了！（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10月）

2018年地方選舉中，
民進黨不自知向中共期待的路線靠攏

薑是老的辣。民進黨2018年選舉策略方向，完全凸顯了民進黨在中共對台大戰略之下，只是一塊玩「剪刀石頭布」遊戲的嫩薑。民進黨對「選戰」的理解，還停留在台灣島內的零和遊戲，也就是那種「只要打敗了國民黨和其他對手就算民進黨勝利」的膚淺二分法意識。在老薑如中共的全局圍棋思維下，要的就是台灣陷入二分法。二分，才有空隙、才有可資入手的矛盾。

之前曾提及：「台灣社會，如同事前編好了程式一般，膝蓋式的反應如噴泉一般的射出。藍綠、統獨的對立，再一次在北京按下按鈕之後引爆……台灣社會此時此刻還用這種慣性思維、慣性情緒、慣性反應來看事情，不但看低了中國共產黨的手段，也看輕了區域大局的嚴峻性。在這種慣性思維下，台灣社會看不到接下來的凶象，因而可能害死自己……2020年的選戰中，如果掌權的民進黨或綠營，以統獨顏色議題持續進逼聲勢高漲的候選人，在沸騰之中……請大家自行猜想社會後果。」現在看來，事態正往這方向發展。

民進黨只會意識形態的二分法，北京只需提供一點點觸媒，民進黨就對號入座，然後北京再小小力氣順勢推舟，民進黨就抓狂了。坦白說，這不能歸罪於國民黨，那太看高國民黨了；嚴格說，國民黨不過是在搭民進黨抓狂列車的順風車罷了。只能說，一直提不出對台灣方向的核心論述的民進黨，由於其內部分裂、由於其急於求成，由於其意識形態二分法的習慣，被人看透而加以利用了。

以2018年選舉中的韓國瑜現象為例。2018年選舉中他不過是在選市長，民進黨卻在意識形態的二分法下，用評判總統的高度打韓，這就已經犯了兵法大忌了。韓國瑜只需不理會那些有的沒有的

總統高度議題，僅僅在市長級別的範圍內倡論市政，就可令他的民進黨對手在黨的高調下手足無措了。民進黨，在市長選舉中把對手捧到了總統的高度。

在地方選舉中，完全執政的民進黨用「共產黨同路人」打擊國民黨，犯下了低級戰略錯誤。同樣的錯誤國民黨在完全執政時也犯過，那時他們把在野的民進黨全數打為「台獨同路人」。

台灣陷入意識形態、基本教義的牽絆久矣，多少惡行、私權私利，假借方方面面的意識形態和基本教義橫行，導致政務空轉、經濟落後。人民受夠了。所謂民怨，根本在此。選民已經覺醒，而政黨還未覺醒。只要一旦得權執政，政黨就會不自知的走上中共鋪設的離間道路上，這體現了台灣的政黨們都還沒有核心的台灣論述，也就形成不了全局戰略，只能玩玩「剪刀石頭布」的低端遊戲。（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4月。本書出版時，2020年的大選進程走到一半，希望執政的民進黨不要再犯2018年所犯的錯誤。）

中共統戰介入2020年大選，
台灣該不該怕？

中共肯定要介入台灣2020年大選，而且是全面性的、全方位的，這點不用懷疑。台灣當然該警惕、防範，但是該不該害怕？讓我們從政治的現實面來介紹一個另類視角：你真正該擔心的不是中共介入，而是中共不介入。

這還得從本書第一章提及的「第二本總帳」，也就是美國對中共算總帳的大局談起。在美國的利益下，美國密切關心台灣的每一場選舉。但通常不插手，要插手也是局部性的。為何美國不直接插手台灣選舉？一句話：因為不需要。美國知道台灣社會明白，在區域權力現況下，台灣的前途被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而決定，不管台灣哪個黨哪個人當政，美國隨時有能力主導台灣的動作。

那麼中共為何需要介入台灣選舉？也是一句話：因為中共還沒

有武力攻台的實力，從而需要從台灣社會內部下功夫，以買時間。

如果某一天，美國以明顯的手法直接介入台灣選舉，那代表台灣社會的政治方向已經脫離了美國對中共的大戰略。這是一個台灣社會需要注意的指標。

反之，如果某一天中共竟然停止對台灣選舉的介入，那對台灣將是一個壞消息。因為，那表示中共已經有了絕對信心，不管台灣哪個黨當政，即使美國軍事干預，北京都可武力收服台灣。

因此，2020年中共介入台灣選舉，台灣社會應該視其為中共實力不濟的表徵。軟性統戰介入力道越強，表示中共對其實力越沒信心。反過來說，台灣社會越擔心中共統戰介入，表示台灣社會越害怕中共。這在本質上是一場此消彼長的心理戰。換句話說，台灣的「害怕指數」越高，中共就越放心；台灣的害怕指數越低，對中共政權的穩定度威脅就越高。

不怕得罪人的說，台灣社會對中共行為及心理的偵測雷達，技術相當相當的落後，常常把誘餌彈當作實彈。用武俠小說術語來形容，就是把對手的虛招當成實招，有時甚至隨之起舞，暴露了自己的弱點所在。

舉個最常見的例子，就是把事態歸罪於「國台辦」，把氣出在它身上。國台辦在中共對台體系內，頂多不過是個三級單位，角色僅限於布達和折衝，功能類似外交部。倘若美國政府或民間，把俄國介入美國選舉的「通俄門」事件歸罪於俄國外交部，而看不清俄國情報系統和軍方的作用，豈不貽笑大方。中共對台灣的介入與滲透，包括國台辦、中宣部、新華社、政策研究所等等不過是門面單位。所謂的「親中台商」或「親共人士」也不過是小布偶和稻草人。門裡面看不到的操偶者，才是需要關注的，那是分布在軍事、情報系統內的十幾個甚至數十個單位。這些單位的意見也時常不統一，弄得門面單位進退失據。台灣社會和媒體對中共的行為模式，不能僅停留在看木偶戲、打稻草人的程度。

此外，台灣社會往往高看了中共的戰術，而低估了中共的戰略。以2018年的地方選舉介入為例，諸如網軍、舉辦親中活動等等都只是戰術，至多只是探測台灣體溫的溫度計，甚至是誘餌，看看什麼招數、什麼言詞能夠讓台灣快速發燒、快速失智。至於拉抬國民黨一說，更是中了計。中共何等老辣，玩弄「陰為陽用、陽為陰用」的陰陽辯證法爐火純青，怎會蠢到繼續用國民黨為其對台政策的主動力。國民黨對中共，只剩下用來分裂台灣的功能，必要時可用來祭旗。

對於中共在選舉期間介入，如同家裡防盜，門得加鎖，室內裝個警鈴，抓到就送交法辦，但這也就夠了。倒是以下兩件事，更令人擔心。其一，中共的溫度計發現某類意外可以激起台灣內部的永久分裂，並在投票日前據以行動。其二，投票結果出爐後，若一方險勝，敗方阻擋勝方上任，導致台灣的民主名聲倒退二十年，使得台灣人永遠不再相信投票，且自毀在國際上建立的民主名聲。

倘若2020年發生了上述所擔心的兩件事，那才顯示了中共搞政治的水平和台灣搞政治的水平之間的落差。這世上沒有比「台灣的民主法治失敗」這件事更能讓北京高興的事了。（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11月，原文名為〈你真正該擔心的是中共不介入〉）

中共最怕台灣的五件事

第一怕：中共最怕台灣沒台獨

中共千方百計防止「台獨」，台灣急獨派推出「台灣共和國」以對，並在年輕世代中佔有一定的支持度。其實，這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內心世界的舉動，甚至可說是正中中共下懷。

中共最怕的不是單純的「台獨」，因為在過去三十餘年之間，它已經成功的在國際間築起了擋死「台獨」的防線。中共最怕的是：在「民國」概念下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獨立」。再往深一層看，中共心底最深層的恐懼，是存在於中國大陸社會菁英內心的

「民國情結」，也就是那種「當年如果民國繼續存在，中國今天不知道會怎樣」的世紀大謎。近幾年，甚至出現了一個專有名詞來形容這種現象，叫做「民國鄉愁」。當然，這裡的「民國」，指的是北平時代的民國，而不是南京時代的民國。台灣社會、尤其是國民黨，不能過於自作多情。

「民國鄉愁」的概念是模糊的，而且多半是非政治性的，而是人心層次的；另外，時間段也是模糊的，有人依稀懷念北洋民國時的言論自由，有人感念對日抗戰時的民國。具有民國鄉愁的人並不認同國民黨，蔣介石只是個大軍閥，宋子文是個大惡人。但是民國時代，產生了許多高風亮節人物，經常被提出的例如蔡元培、傅斯年、胡適、梁漱溟等數百人。民國事蹟方面，諸如極為艱困情況下成立的重慶西南聯大開放自由，數學大師陳省生如何帶著數百頁手寫的曠世論文逃空襲，如何培養出日後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故宮文物輾轉數千里保存，報章雜誌百花齊放，積弱之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等。

這群為數不少懷念「民國」的人，其實絕大多數都是二戰之後的世代，也就是「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一代。他們懷念的是一種教科書上不談的、長輩口耳相傳的故事，懷念的是一種當今中國已經不存在的個性、人心、世界觀。他們之中的一部分，由於對台灣的情況不了解，也會錯誤的寄情於還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例如：在國民黨贏得2008年大選之後幾年，國民黨黨部收到大量來自中國的「入黨申請書」，人數每年數以萬計。再如：2011年廣東烏坎村四千人抗爭政府非法徵地，轟動了國際社會，遊行隊伍中出現了一幅橫幅，上書：「馬英九，你怎麼不出來說一句話啊？」

另一些人，甚至將這種情結移情至民進黨。例如：某位中國商界大亨，持續的到台灣收集民進黨的「抗爭文物」，從黨外時期一直到崛起，至今已經花了數千萬台幣，從旗幟、標語、刊物、照片到競選用品，無所不包。目前存放在台灣某倉庫中，打算有朝一日運回中國大陸成立「民主博物館」，以證明「中國人也可以搞多黨競爭體制」。

中國人民的民國情結，對現今的台灣人來說，應該看成個笑話，還是一個面對中共威脅的槓桿點？台灣社會對這問題的回覆，可能呈現兩極。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習近平怕的就是這個。現今中共一黨專政的合理性，幾乎百分之百來自「推翻了萬惡的國民政府」。不然，難道它的執政合理性來自推翻滿清？

習近平及他的理論班子，正在展開一場「歷史乾坤大挪移」，企圖將紅二代專政的合理性從1949年推翻國民黨，往前延伸至中共1921年建黨。如此這般的一筆勾銷「民國時期」的歷史、人物以及建樹。對今天中國大陸的有識之士而言，這代表了另一場新災難的開始。因為「民國概念」是中國未來發展進程中的唯一歷史參照物（總不能拿滿清為參照物吧）。

台灣社會並不明白，中國人民的「民國記憶」是台灣的防身武器之一。就像是丐幫的打狗棒，雖然只是一根細竹桿，但是符號意義非凡。民進黨若要拋棄這個符號，我本人並不反對。但我不贊成民進黨在還沒能力建立一套新的台灣論述、中共論述、中國論述之前，就棄打狗棒如敝屣，因為那等於是幫助紅二代解決心頭大患。

再說一次，「民國記憶」不等於「國民黨記憶」；前者是滿漢全席，後者只是其中的幾道菜。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說清楚。若還是不明白其中竅門，只需要記住一句簡單的話就可以了：中共這個專政黨、掌權的紅二代，為了維持他們的權力和專政合理性，需要「台獨勢力」的存在，甚於台灣。所謂的統戰介入台灣，工作內容包括了維持台獨呼聲在一定的溫度，不能過高，但也不能過低。美國當前對台獨的態度，恐怕也是如此。但是美國和中共要求的溫度不一樣。

如果哪天台灣在中共的假戲壓力之下突然真做，達到共識對北京說，來吧，我們來談統一吧，條件是台灣所有政黨都可以到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活動。那可真會把中共嚇出尿來，就像電影《楚門的世界》中的主人公，找到了一輩子所處虛擬環境的出口，踏入真實

世界，把節目的製作人嚇出尿來一樣。現實政治很奇妙，是不是？

第二怕：中國和台灣只差一個字母「S」

中國和台灣的距離，其實只差一個字母─「S」。台灣的政治運行靠「election」（選舉），而中國的政治運行靠「selection」（指派），比台灣多出了一個「S」。

習近平說，「制度差異不是障礙」。我說，制度差異就是一切的障礙。這一切的障礙就體現在一個字母上─「S」。什麼時候，中共能夠去掉這一個字母，什麼時候台灣人民就能坐下來和中國人民談，而且什麼都能談。

道理太簡單了，兩邊都是人，只要能夠順著人性，有什麼不能談的？但是，我的社會機制運轉靠選舉，你的社會機制運轉靠指派，怎麼談都是驢頭不對馬嘴，雞同鴨講。

選舉制度，就是每隔一段時間人民要究責。即使被你騙了一次、騙了兩次，第三次我還是可以換掉你。而指派制度呢，就是你永遠不必被究責，即使你指派了騙子，我也永遠不能究責你。

多了一個「S」，就是被套上了永恆的詛咒。為什麼是永恆詛咒呢？有人會質問，指派賢人和能人，不比意外選舉出一批自大狂或笨蛋更好嗎？抱歉！會這樣發問的人，都是不懂人性和權力之間關係的人。指派者和被指派者之間，就是權力關係。你有權力指派我，也就有權力不指派我，反之亦然。既然是權力關係，你和我都會想盡辦法成為指派者，而絞盡腦汁不變成被指派者。換句話說，你和我之間就是鬥爭關係。權力鬥爭是一個無止境的循環，就是永恆的詛咒。

能夠讓指派制度的權力惡鬥列車停下來的唯一機制，就是定期的選舉制度。在選舉制度下，詛咒不會是永恆的；選舉制度，至少讓良幣有機會驅逐劣幣。而在指派制度下，一段時間後一定陷入劣幣驅逐良幣的深淵。

習近平先生，您剛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您迫於儀式的需要而不得不做，這點台灣人民都了解。但您說「制度差異不是障礙」，這就是霸道了。為您撰稿者也是個外行人。請問：您2012年上台，是被人指派的還是人民選舉的？您在中共十九大時修憲改成終身主席制，是不是您想永久保持指派者的地位？您現在苦於應付的黨內鬥爭，是不是有一群人不甘屈就被指派者而想成為指派者？

其實，您在2013–2015年之間的時段，完全有機會甩掉那個多餘的字母「S」，踏出由指派轉向選舉的關鍵步伐，然後理直氣壯的持續您的中國夢。但您沒有做。造成您今天尷尬地位的原因，究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還是您貪戀永久指派者的權位？或許兩種因素都有，但外人無從得知。

但我可以鄭重的告訴您，制度就是一切的障礙。您身處的威權指派制度，是台灣社會幾十年前就丟到垃圾桶的制度，台灣社會是不可能再從垃圾桶裡撿回來。當然，您在講話中也提到，如果台灣不自己跳進垃圾桶，您不放棄把垃圾桶蓋到台灣身上的選項。抱歉！我要追問三件事：第一，您不擔心當中共把垃圾桶蓋到台灣身上時，其他國家發動一場淨化中共垃圾桶的行動嗎？第二，您不擔心中國人民已經受夠了指派制度下的垃圾，而趁著您蓋台灣的時刻紛紛起身推翻垃圾桶嗎？第三，您不擔心在實施垃圾蓋台灣的時候，您身邊的更大垃圾桶順便把您蓋住嗎？

其實您更需要的是一份「告中國同胞書」，讓中國同胞知道，台灣和中國之間的差異，只有一個字母–「S」。一旦中國同胞看明白了這點，台灣一定不會吝惜分享經驗，伸出援手。畢竟，兩岸一家親嘛。

第三怕：中共害怕「選民大於政黨」的台灣

台灣選民不分藍綠，積氣、積酸、積怨已久，這現象有著極為複雜的歷史背景。然而，台灣選民並不了解，事實上我們是多麼幸

運的一群人。例如七十歲以下的人一輩子都沒經歷過戰火、逃難和大饑荒，而地球上的其他數十億人都沒這樣的運氣，包括和我們鄰近的南韓、香港、新加坡和大多數的中南半島。中國，就更不用說了。事實上，今天我們可以用「選民」兩個字無愧的稱呼自己，已經把地球上至少一半的人類遠遠拋到身後了。

「言論自由的選民」，這是一個多麼高貴難得的身分！當然，這個身分不能沾醬油吃，也不能當大衣遮寒。但若我們不保護這個身分，有一天我們可能失去醬油，失去大衣。從這角度看2018年台灣地方選舉的過程和現象，我覺得台灣的選民，距離「用選舉改善台灣」這目標又踏近了一步。儘管我個人不願用「藍綠」的二分法來分析台灣社會，但為了方便，我還是要說：藍綠選民都是2018年選舉的贏家。我個人深感欣慰，雖然這場選舉的結果會讓台灣的政治形勢暫時一片大亂，但大亂之後的台灣前途將一片大好。

先談談這場選舉對台灣的內部意義，然後再談它和台灣外部大環境的關聯性。只有在全面了解了內部意義和外部關聯，我們才能徹底理解「言論自由的選民」的高貴意義和相關的風險，也才能讓選民決定自己在2020年大選時的選擇。

一、**2018**年選舉的內部意義　雖然這次選舉表面上是國民黨勝了民進黨，所謂的「白色力量」勝了國民黨，小黨又勝了大黨，但是本質上卻是「選民勝了政黨」。為何如此說？其基本理念就是人民比黨大。多年來我倡議一個道理–中共不等於中國。但是台灣社會不理解這句話，堅持說中共就是中國。逼得我不得不用一個例子來辯駁：三十年前若說「國民黨不等於台灣」，會被人笑死並被抓去關起來。現在，這已經是個常識，沒人笑也沒人會因此被關。2016年民進黨大勝全面執政，我說出「民進黨不等於台灣」，得罪了不少民進黨朋友。2018年11月24日，證明了民進黨確實不等於台灣。

腦力急轉彎來了，如果我今天說：「只要民進黨和國民黨（或

任何政黨）都不等於台灣，台灣的安全就無虞。」聽眾如何感覺？十年後又會如何感覺？

不知我說明白了沒有。2018年之所以是選民的勝利，理由就是它是一場活生生的「選民比政黨大」的例證，而且在台灣已經是一件板上釘釘的事情，沒有回頭路。再接下來的2020年、2022年、2024年……選舉，選民一定比政黨大。各位請想想，這對現在檯面上的大黨、小黨及準政黨，那是壓力多麼大的事。從此之後沒有政黨敢再明目張膽的把持資源、中飽自肥、不接地氣、空做表面功夫了。

換個文謅謅的方式說：「黨政一家」只適用於議會內閣制國家。而在台灣這種既非議會內閣制亦非總統制的怪異制度下，黨政一家就是最大的包庇惡源之一，並且會極其容易的走上「黨府一家」的權力淵藪。而2018年選舉的代表性意義就是：因為凸顯了「選民比政黨大」，因此也將從此打破了台灣怪異體制下「黨政一家」的惡習，進而擊破「黨府一家」的宿病。2014年，身為總統的馬英九帶著內閣為「黨內同志」站台，選民不以為怪；2018年，身為總統的蔡英文帶著內閣為「黨內同志」站台，大家也不以為怪。但是，我判斷等到2022年選舉時，不管那時的總統是誰，若還帶著內閣為「黨內同志」站台，可能就是必輸的公式。

2018年的另一絕大意義就是：繼2014年「柯文哲現象」之後，2018年的「韓國瑜現象」徹底的證明了台灣已進入世代翻轉，沒有回頭路了。恰如2014年「柯流」並不是民進黨的成功，2018年的「韓流」也不是國民黨的成功。這兩流甚至不是柯或韓本人的勝利，反映的是世代意識以及世代利益的翻轉；這要素始於2013年的太陽花運動，當年國民黨因為看不清什麼叫世代翻轉而失敗，此次當年街頭出身的民進黨竟然也看不清這點。

不能不讓人感嘆，老人老政治就是不行。老人老政治還把政治競爭當成碉堡戰，以為「擒賊先擒王」，把幾個主力碉堡打掉就行了。殊不知在新世代、新科技、新媒體下，人心已經不是碉堡而是

浪頭。碉堡打掉就打掉了，而浪頭打掉了，水分子立刻會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迅速形成新浪頭。

2018年的選舉，台灣的民主之所以向前跨了一步，就是內生的主體意識更加堅實了。這表現在統獨藍綠二分法的失效，統獨基本教義的弱化，選政策不選人，選人不選黨的趨勢明顯。此外，政黨「死不認錯」的時代過去了。任何死不認錯的政黨，不管是哪個政黨或大黨小黨，如果不學習即時認錯、果斷糾錯的能力，將來在台灣都沒有立足之地。儘管此次的勝選者還需要接受未來的行為考驗，但是選民已經清楚表明，他們需要「真人說真話，實人做實事，不貪汙，不勾結」的政治人物。因此，此次勝選者要小心了，若不依此行為準則，經不起傳統油水和政商勾結的誘惑，下次被淘汰的就是你。

二、**2018**年選舉的外部意義　談過了2018年選舉對台灣內部的意義，讓我們來看看它對外部大環境的衝擊以及隨之而來的風險。

台灣一海洋孤島，若言外部，當然就是隔海但是鄰近的國家。隔海之國，日本、韓國、菲律賓並無染指之心或力量，對台灣當然沒有威脅性。說的當然就是當下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大家談「兩岸關係」，但是我在幾年前就已指出，由於中共的視野已經擴展至整個亞洲，甚至整個地球，台灣早已不構成其戰略中的一個單獨對象。換句話說，世界上已經沒有「兩岸關係」，只有「台灣在中共戰略思維下的角色關係」。台灣若不跟上形勢，只會停留在以「剪刀石頭布」應付中共威脅的低級戰術層次。

在中共的亞洲戰略甚至全球擴張戰略中，台灣對中共最大的威脅不是軍事。要談軍事，日本、韓國、菲律賓對中共的軍事戰略威脅要比台灣大得多。台灣對中共最大的威脅在民主體制。因為台灣

已經證明了，同樣是使用方塊字的一個地方，可以成功的發展出一套幾個月之內就可以感動中國被統治人民的民主制度。要不是信息封鎖，台灣「選民大於政黨」的成果，在很短時間內就能令一黨專政的共產黨即使不死也得去掉半條命。

對於這點，台灣人自己幾乎已經忘記了，但世界其他國家可沒忘記。台灣選民過去生活在一個極端簡單粗躁的邏輯當中：國民黨親中共，因此中共比較喜歡國民黨，只要有機會就會扶植國民黨，打擊民進黨。這裡我要明確的告訴持有這種看法的人：這現象只是因為共產黨還以為台灣是一個「黨政一家」、「黨府一家」的地方，因此扶植某政黨或打擊某政黨，就能影響或控制台灣。只要台灣選民有一天向中共證明，台灣已經不是黨政一家、黨府一家，選民選政策不選政黨，中共馬上就會氣餒並抓狂，因為這完全超出了中共有限的經驗。

這就要回到上文所說的「中共不等於中國」的道理了。大家還記不記得，民進黨曾成功的發起萬民手牽手環島抗爭國民黨的運動。倘若台灣選民不分藍綠，哪一天數萬人手牽手環島，喊出「國民黨不等於台灣，民進黨不等於台灣，共產黨不等於中國」，經過世界媒體的傳播，中共就會被嚇死。說明白了嗎？地球上只要是人就喜歡自己作主。中國人，也是人。但現在只有共產黨可以作主，共產黨最怕的就是中國人發現自己也是人。

台灣人、中國人，都用方塊字，因此已經是自由言論選民的台灣人，是一群世界上最容易讓中共害怕的人。反過來說，中共最愛的就是使用手段讓台灣停滯在一個黨政一家、黨府一家的愚昧狀態。最好所謂的藍綠互相殺到死。因為這證明了使用方塊字的人中只有愚民和刁民，因而需要被威權統治。

2018年，恰巧也是世界重新定義各國自己與中共關係的年份。不論是美國、歐洲還是日本，都已經相當肯定了台灣的民主成就。然而這些國家也都知道台灣的民主和法治還是相當脆弱的。在未來兩年，尤其是2020年的總統大選期間，正是台灣向世界證明台灣的

民主已經進化到了「選民大於政黨」、「選政策不選黨」的高級階段。只要台灣的政府和社會，在接下兩年願意往這方向付諸行動，投下足夠的宣傳資源，加強那些已經對台灣民主有初步認識的國家對台灣的進步印象，其國安效果將遠遠大於添購戰機和軍艦。

你如何投下你的一票，就是台灣國防的武器，千萬不要忘了！

第四怕：民主自由之外，中共最怕性別和宗教

民主自由太抽象，中國有千年順民傳統，因此專政的中共雖然害怕民主自由，但那並不是它的最怕，因為抽象概念可以掰，可以統戰。中共最怕的是不能統戰的東西，那就是人的性取向和宗教。馬克思和列寧當年意識不到性別議題將成顯學，因此沒談，搞得中共對此完全無知，只懂得打壓。宗教，則是人類社會最具威力的組織發展形式，共產黨靠組織維生，對宗教恐懼至深。

同樣使用方塊字傳遞文化的台灣，卻已經跨過了這兩道門檻，宗教開放，性別議題包容程度亞洲第一，倘若通過相同的文字和語言，感染了中國平民，對中共專政的威脅，只會大於核彈。

2015年5月22日，世界最富有國之一、全球發展速度第七的愛爾蘭，以壓倒性的百分之六十二全民公投通過「無性別歧視婚姻條款」入憲。此舉將吸引大量的被歧視人才以及財富企圖進入愛爾蘭。十年之內，倘若愛爾蘭的移民和外籍人士工作、投資政策能夠聰明的運用此精神，這個島國的競爭力將一飛沖天。

接下來的十五分鐘，讓我們的想像力飛一會兒。

先出一道填充題：2025年，台灣可以成為全世界的「××」之都，並且因此人均收入翻一番，到達四萬美元，貧富差距急速縮小，政府稅收充裕。這「××」存不存在？如果存在，是什麼？電子？精密機械？機器人？APP？電子商務？3D印刷？觀光？休閒？金融？有機農業？文化？設計？建築？藝術？音樂……？

每一項產業的「奮起」，都至少需要十年的時間。但是若能全面啟動，或許可以達到上述填充題中的境界。然而，你覺得在當前的社會、政治動盪之下，可能「全面啟動」嗎？台灣環境的投資吸引力夠嗎？台灣的人才夠嗎？遑論台灣現在的人才外流趨勢。

我不知能不能要求你做一次「腦筋急轉彎」；那就是不從「產業」思考台灣經濟，而由「態度」來思考台灣經濟。「態度」也是一種生產力；因為態度決定高度，高度決定速度。

有沒有一種態度，可以用來盤活台灣整體經濟？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對世界的包容」。但自己內部都對立成這樣了，還「包容」呢？這需要一點解釋。

台灣的世界處境，現在像個孤島。長年的「孤島化」，使得台灣人民有點排外。但那多半是幾十年來被壓縮出來的「自保反應」；本質上，台灣是個移民社會，沒有台灣人真正憎恨外來事物，這從社會接受外來新娘這件事就可以看出。即使當前「反中」是主流，但是每年數百萬中國遊客中有幾個感受不到台灣那無比的包容力？

經濟生產力，講到底就是「人才流」。人才流帶來金流、物流、資訊流；越是人才，創新的力道越大。那麼，台灣現在人才外流，豈不是反作用？不對，出去五十萬人，可以進來一百萬人。但台灣薪水低、市容雜，除了「移民工」，還能吸引到任何高經濟生產力、高附加價值的全球人才嗎？

冒著被部分人追打的風險，容我學習一次現任教宗方濟各的態度：當前地球上有一批人，身在各行各業，渴望創新，具有爆發力，但不追求高薪、高地位，而只追求一個能夠包容他們／她們、能夠安靜的發揮所長的國家。這群人就是「同志族」。

是的，如果台灣能夠成為世界上、至少亞洲中，對同志族最包容的國家，給予最寬容的配套政策及法律，那麼十年之內，台灣的各種產業都會站上世界尖端。對同志族的包容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台灣何妨走在教宗前面，學習愛爾蘭，搶搭下一波文明的頭班

車？

對了，還有一件事。2025年台灣成為世界包容之都之後，中共就吞不下台灣了，否則它會得痢疾。一個對性別和宗教高度包容的台灣，這是北京無法接的一招，遇上了台灣強大的文明社會包容性，北京只能選擇躲避、顧左右而言他。

台灣，覺醒吧！！！融合力及包容力，才是台灣的世界出路！

第五怕：娛樂對中共專政的威脅

十年前，中國社會流行一種說法，而這說法也得到大量台灣人的買單：在中共執政下，只要你不牽涉政治、不搞組織，其實日常生活還是滿自由的。這說法，在中國已經破功，然而中共還在利用台灣人的無知，企圖將這說法打造成「一國兩制」的幻想基礎。

坦白說，十年前這說法有九成是對的，豐衣足食的人越來越多，只要肯冒險，賺錢並不難。社會消遣快速多元化，私密場合中高談闊論，大罵政府毫無顧忌。而且，1997年香港人相對欣然接受一國兩制，也是因為相信了鄧小平所承諾的「馬照跑，舞照跳」。畢竟，當時的上海、北京、廣州和無數的二線城市，也正在幾近瘋狂的追求跑馬跳舞。

風水十年轉，近十年來前述那個說法的可信度，逐步由九成降至七成、五成、三成，直到2018年只剩下一成。意思就是說，不談政治中「政治」一詞的定義被無限放大到「吃喝拉撒睡」都屬於政治範疇，而不搞組織中的「組織」二字的定義被擴充到拉一個微信群組都屬於「搞組織」。但畢竟現在還剩一成，等到連這百分之十空間都被抹去，那就等於是新時代、新科技下的文革來臨了。

2018年4月9日，中共勒令暫時下架「今日頭條」、「鳳凰新聞」、「網易新聞」、「天天快報」等四個新聞資訊的APP，十日再丟出震撼彈下令，用戶數達二點四億的「今日頭條」旗下同樣有

二億用戶的「內涵段子」娛樂類APP永久關閉。

那些來自中國網民的酸甜苦辣、搞笑、自嘲自娛、帶些小黃小黑的小影片、小段子，從此將消失了！台灣網民不會因此遺憾，因為台灣網路的生命力旺盛，自產自銷加上來自全世界的搞笑段子，台灣不會寂寞。但是，七億中國網民在防火牆內和世界斷線之後，現在連自娛自樂的活力泉源也被掐斷。

2018年中共「禁娛令」出台後，出現幾百輛汽車聚集北京廣電總局前齊鳴「叭叭叭」的抗議，還有路上陌生汽車以「叭叭叭」互相取暖問候的現象。但當七億群眾自娛自樂的通路都被完全堵塞之後，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社會效應？中共看來已經無暇顧及，準備硬幹到底了。你別看現在中國高鐵四通八達，網路無遠弗屆，「斷路工程」和「斷網工程」早已準備好。當技術由4G進化到5G時，監視全民的「天眼工程」和阻斷全民的「斷網工程」，可以精確到一百平方米的格子內。想像一下吧！

2011年埃及政府斷網，大批「魔獸世界」玩家無聊上街閒逛，後來的事你已經知道。看來，最終導致中共摔倒的可能不是政治經濟軍事，也不是言論自由，而是平民娛樂的自由。

「反併吞」應該定為台灣國策

前面說，對台灣最有利的是對美國「不掉隊」，對中國「不插隊」，然而，這兩者之間的分寸如何拿捏？平衡密碼又在哪裡？台灣還有人在附和北京所定義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以為這就是平衡點。也有人期待美國一步到位的承諾武力保衛台灣安全。這裡想說，前一種做法是找死，後一種念頭是等死。請容我將問題展開來談。

很明顯，中共在國內、國際形勢的巨大壓力下，為保一黨專政，需要喘息空間。因而其介入台灣2020年大選的核心戰略是「反

台獨」，話術就是「一國兩制」，以台灣議題換取其生存時間。在2020年反獨行動成功後，中共便會順勢使得「台灣已經不可能獨立」的命題在國際上造成板上釘釘的事實，然後再通過統戰文攻、軍事武嚇，瓦解台灣人心，徐圖它所謂的「統一」。

台灣方面，則因至今未能達到國內共識，因而非常脆弱，陷入了互鬥自殘。這正是中共所樂於看到的，也是其「大計」所要的結果–證明台式民主只能帶來一盤散沙。當前，台灣的各方主要勢力，正在朝著中共設計的方向發展，無論是獨派、台派、綠派、白派、藍派，都陷入了「非獨即統、非統即獨」的二分法。

我在此前反覆指出，「統獨二分法」本質上是中共、國民黨、民進黨及它們附隨組織三方的「共生陽謀」；中共用它來作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一黨專政的合理性基礎，國民黨用它來刷存在感及護票，民進黨用它來維持自身存在的基礎。現在，連獨派、白派都開始冒出「統獨議題才是票房奶頭」的傾向。中共的戰略已經成功了一半。

「統獨二分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兩邊政治勢力的共同「保生大帝」神主牌，這是台灣人民的大不幸，也是台灣超生、樹立主體性的最大隱形絆腳石，需要被破解。破解之道如下：

首先，在2020年的大選中，不要用「反中」、「反獨」作為核心訴求，而要開宗明義、毫不模糊的以「反併吞」為核心概念–台灣人民不見得反對模糊概念的「中國」，但是百分之百反對被中共體制「統一」；台灣人民不見得願意為「台獨」流血，但必須願意為「反併吞」流血。「反併吞」就是反對和中共體制合為一體，「反併吞」不等於「反中」，也不等於贊成「台獨」。

「反併吞」，就是台灣的最大公約數；台灣如果要辦國家定位公投，現階段公投的問題不應該是「你贊成獨立還是統一」，而應該是「你是否反對被中共體制合併」。

「你是否反對被中共體制合併」這個提問，應該出現在2020年總統候選人公開辯論中，作為是非題，而非申論題。所有的立法委

員候選人，也應該接受這個提問。民間相關的團體，也應該拿著這問題，白紙黑字的請候選人勾選並簽名。

當然選舉中還有很多很重要的內政問題，但在國家定位和國際政策領域，以上那個問題應該是唯一的問題；這問題之外的問題，都是扯淡。迴避這問題的候選人，很簡單，把他／她的名字從你心中劃掉就可以。台灣選民如果看不清這點，還去聽取、接受、駁斥所有其他阿里不達的迂迴表述，那就是台灣選民活該，將來受罪也只是剛好而已。

2020年之後，中長期來看，「反併吞」應該成為台灣的國策，一直到國際大局有了根本性變化為止。什麼叫「作為國策」，很簡單，就是不論是國內政策還是國際政策，只有一個檢驗標準：這項政策對「反併吞」是有利還是有害？有利則進行，有害則拋棄；至於有利還是有害，訴諸公開透明的辯論。例如，台灣以政府的身分和中國共產黨簽署「和平協議」，對「反併吞」是有利還是有害？某重大投資案的出資方，對「反併吞」是有利還是有害？修改某法條，對「反併吞」是有利還是有害？

另外，「反併吞」的種種政策，不能只在台灣內部做，必須把戰線拉到國際上，讓國際社會知道，請各國來評價、來監督。這是因為，世界其實並不關心「台灣問題」，但世界沒有一個地方不關心「中國問題」。唯有通過有效行動，讓世界知道，台灣的「反併吞共識」足以影響世界對「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規劃，才能使世人正視台灣的世界角色。

對「反併吞」立場的共識，才是當下美中對峙、國際全局下的平衡密碼。重要的話再說一次：如果台灣選民連「反併吞」的共識都達不到，而還花精力去聽取、接受、駁斥所有其他阿里不達的迂迴表述，那就是台灣選民活該，將來受罪也只是剛好而已。

「國安議題」與「台灣定位」是兩回事

2020年台灣大選，有三個政黨一定會把「國安議題」和「台灣定位議題」列為重中之重。這三個黨就是：民進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而且我保證，這三個黨都會「雞蛋炒鴨蛋」，炒到你分不出來哪部分是雞蛋，哪部分是鴨蛋為止。

為什麼這三個黨都會朝著「台灣安全議題」=「台灣定位議題」的模糊公式操作？因為民進黨要用這等式來爭取選票，國民黨要拿這等式來爭取北京的支持，共產黨要用這等式來嚇唬台灣選民。

「台灣安全」、「台灣定位」這兩件事一旦劃上等號，所有相關的政策都會變成「張飛打岳飛」。例如：買不買美國F-16V戰機這事，就可以被有心人從國安議題轉化為台獨議題。反過來，該不該正名制憲這屬於定位的議題，就可以被有心人轉換為國安問題來操作。

台灣選民，多半會落入這政治圈套。再度凸顯台灣社會長期思緒混亂、邏輯不清的毛病。

事實上，國安是國安，定位是定位，兩者應該完全分開關心、分開辯論。用最簡單的比喻：一個人的人身安全，和這個人的人格是否獨立是兩件毫不搭嘎的事。人格還沒獨立的人，走到街上一樣得注意自身安全。反之，每個人都百分之百有權利保護自己的安全，不管他人格是否已經獨立。

明白了這個最簡單的道理，就可以達到如下判斷：一、台灣買不買軍備、是否爭取美國的奧援，判斷基礎完全落在是否可增加台灣的國家安全，而和台灣是獨是統或是其他身分，應該分開判斷。二、台灣是獨是統或是其他身分，和台灣應該實施哪種政策才能提高國家安全，應該分開判斷。

選民看法可以不同，票投給誰是每個人的自由。但是腦中「張飛打岳飛」，任由政黨胡攪蠻纏，等同自我降低公民格調，遭政黨利用而不自知。

用一個故事來闡明這道理。法國作家雨果在《悲慘世界》這部描繪法國大革命的小說中，主人公尚．萬強，為了已經快餓死的女兒，打破了麵包店的窗戶偷了一塊麵包，結果入獄十九年。獄中做牛做馬，出獄後被一位陌生神父的義行感動，立志做一個有用的好人。改名換姓開辦了工廠，成為了小鎮鎮長，拯救了喪母孤女。後因被誣陷而再度浪跡天涯，帶著孤女，再度改名換姓。

他人格絕對獨立，但並不因為自傲於人格獨立而輕忽了自己和親人的安全。另方面，在安全有保障的時候，他做出了許多只有獨立人格的人才會做的事。他兩度改名換姓，為的是安全，為的是保持他的獨立人格。

什麼叫高尚、高貴？這就叫高尚、高貴。台灣必須從雞腸鳥肚的小氣中走出來，走向高尚、高貴。台灣的名字今天是叫「台灣國」、「中華民國」、「中華台北」，台灣必須保障人民、社會、國家安全，這兩件事情怎能張飛打岳飛，胡攪成漿糊？另方面，台灣要社會安全、資訊安全、國防安全，又干台灣的定位什麼事？

請政黨、政客們從齷齪的泥巴戰中走出來。任何人都不要用中國比台灣齷齪一萬倍這理由來自慰，不要聲辯美國的政黨鬥爭就不齷齪嗎？這種反應模式，就是在比爛。比爛的邏輯就是，自己肺癌一期不治療，理由是別人肺癌二期或肝癌末期。別人的肺癌二期、肝癌末期，干你的肺癌一期什麼事？你就不用治療了？一個用「你看它更爛」來安慰自己的國家，就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

2020年大選在即，怎麼投票？投給誰？大原則之一非常簡單，凡是把「國安、社安議題」和「國家定位」主體性議題混為一談，或用其中一項來論證另一項的候選人，不管是選總統或選立委，就把這個人從你的腦中劃掉，因為其人若不是沒把台灣放第一，就是頭腦不清，沒資格代表台灣。

開開腦洞：統一、統二、統N

為什麼是「統一」，而不是「統二」呢？「統二論」當然是針對「統一論」來的，但是，對比兩個概念不一定要從政治層次下手。在分析之前，讓我們每個人問自己一個問題：「統」的概念裡，一定只有「一」嗎？「統二」、「統三」、「統四」一直到「統N」，一定就是矛盾詞嗎？

「統一」的英文對應詞是「uni-fication」，在這個英文字的內涵裡，的確只有「一」的概念，但那是因為「uni-」這個元素，意指單一。若要創新概念造字，方塊字的「統二」就會被造成「bi-fication」，「統三」為「tri-fication」，「統四」為「quar-fication」，依此類推。

好，概念分析夠了，我們回到主題。今天的方塊字使用圈內的十四億五千萬人，絕大多數人都已經喪失了用方塊字造新詞的習慣和能力。失去了文字造詞的能力，就意味著失去了概念創新的能力，當然也就失去了認知創新、知識創新的機會。因為，沒有新詞，一群人就只能在陳舊的老概念上打轉。舉個小學生都會發笑的例子：當一個手提包是動物皮革做的時候，方塊字使用者自然的稱呼它為「皮包」。然而後來科技進步了，出現了人造皮，這時方塊字使用者的概念就抓狂了，只能用「真皮皮包」、「假皮皮包」予以區分。這都哪兒跟哪兒啊！

要跳出盒子思考，要創新思考，就得恢復造新詞的能力。因此，既然有「統一」的概念，為什麼不能有「統二」、「統N」的概念呢？一定要綁死在「統一」這棵樹上嗎？

前陣子遇到一位學識絕對淵博的思想家，他說在困惑了幾十年之後，他終於找到了一條能夠統一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出路。他說：儒家修的是今生，佛家修的是來世，而道家修的是延壽，三者的精神是有根本衝突的。他表示，他悟得的道理是：唯有在延壽的指引下既修今生也修來世，才能做到一個完整的人。

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結論，他正在努力進行「統三」的工作—把儒、道、佛三派「統三」起來。出現這種努力，其實一點不稀

奇，難道今天世界上的諸多基督教派，不是歷史上「統二」、「統三」、「統N」的產物？

人類的文明，就是一場又一場的「統N」過程；如果你願意，稱之為「演化論」也可以。所有的知識突破和創新，都是有傻子去「統N」的結果。之所以出現「解析幾何」，是代數學和幾何學被「統二」的結果；量子力學是光學和牛頓物理及諸多其他的「統N」結果；你我今天有大型飛機可坐，其要因之一是合金技術的「統N」結果；新加坡這個國家能夠小國生存，乃因為採取了種族上的「統N」結果；歐盟之所以存在，乃因為有一批政治家的「統N」努力。

容我非常嚴肅的無釐頭一下，按照「統N學」的道理，我們台灣自己內部可不可以來「統N」一下？我本人已倡議多年，台灣為什麼不能自我進行一場「邦聯化」的動作？與其在陳舊的「中央／地方」體制下糾葛ー中央以財政劃撥箝制地方、地方以選票要脅中央，為什麼不能讓台灣成為N個自治邦，類似當今德國的體制。詳情因早有數篇專文論證此點，不再贅述。但是，台灣社會自己能不能打破「台灣必須是一個剛性的統一國家」，從這個固化觀念中走出來，而考慮「台灣也可以是一個柔性的統N自治國家」這個可能性？

大家不妨讓想像力的翅膀飛一會：如果台灣自身邁向了一個類似德國的「統N下的自治邦聯」，這將使得台灣的內部創造力、競爭力提升多少？這又會給世界帶來多大的驚奇？給全球的方塊字使用者帶來多大的想像空間和期待？

「統N」就是包容力，在當今世界上，包容力就是吸引力和競爭力。台灣從未出現過影響世界結構的人物或思想，但若台灣自我先走出「統一」的框限，率先成為方塊字使用圈內的「統N」典範，這件事必然在未來對世界格局做出地球上只有台灣能夠做出的

文明貢獻。

「統一」是個由開闊走向窄化的概念，而從「統二」到「統N」是個拓寬出路的進程。方塊字使用者圈，迷信於「統一」久矣，需要一些傻子開始跳出框框思考，為什麼不「統二」、「統三」、「統N」？也許這傻子就是你。

大一統，大二統，大多統，自獨，被獨

我知道這一節的標題很怪，但在「統獨」問題上，台灣人民、尤其是2020年的參選人和廣大選民，需要開腦洞。

世界是複雜的，越重大的事情，越不能被限縮至二分法。台灣未來的世界定位，乃一重大事情，相信沒人會說不是。然而，台灣的政治話語已被限縮在「統獨」的二分法內，這點急需打破。打破成見，首先必須開腦洞。

先聊聊「統」這個概念。長久以來，「統」的定義都被共產黨和國民黨壟斷，年輕的朋友都知道中共想「統一台灣」，但未必聽說過早年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兩黨的思維習慣殊途同歸。其後國民黨雖然提出「不統不獨不武」，但在語境裡這個「統」字還是老概念。至於2018年選舉期間馬英九突然說出的「不排斥統一」，更是凸顯了老國民黨腦中的「統」的概念和共產黨一致。

開個腦洞。為何「統」一定是「一」呢？為何不能有「統二」或「統多」？換個方式說，除了「大一統」之外，為何不能有「大二統」或「大多統」？

有人用東德西德的統一來支持「大一統」概念。但是，這些人忘記了，統一後的德國是歐盟的主要推動者，而歐盟卻是個二十七個國家的「大多統」的雛形，即便德國本身，也是個「大多統」的

邦聯國家。然後，南韓、北韓的局勢，也可能發展成為「大二統」的新經驗。再說美國，美國是個「大一統」的國家嗎？我看不是，美利堅合眾國實質上是個「大多統」的聯邦國家。否則哪來「聯邦調查局」、「聯邦儲備局」之類的稱呼？

談過了「統」，再來談談「獨」。許多人把「獨立」和「主權」兩個概念之間劃上等號。但實情是如此嗎？烏克蘭已經獨立了二十七年，但俄國從未實質上尊重烏克蘭的主權。在俄國需要時，說打就打。伊拉克和敘利亞是不是獨立國家？有人尊重過它們的主權嗎？在台灣眼裡，日本當然是個獨立國家。但日本敢在沒得到美國同意之前施展一個主權國家的武力嗎？

非洲，充滿了獨立的國家，但請問有幾個國家具有實質上的主權？倒是以色列，人口只有七百餘萬，其中一百多萬還是穆斯林，其實質主權遠遠大於許多比它大上幾倍、幾十倍的國家。還有新加坡，你別看它小，北有馬來西亞，西有印尼的地緣威脅。但它採取徵兵制，所有男人都是軍人，一直到四十歲都還得定期回營軍訓。你打它試試看。另一個有意義的例子，就是庫德人，距離獨立還遙遙無期，內爭頻繁，但都願意為一個想像中的共同體拿起刀槍。

這反映了什麼道理呢？就是「獨立」有兩種，一種叫「自獨」，一種叫「被獨」。區別就在國民團不團結，願不願意用武力保護自己的國家。自獨的國家，才談得上實質意義的主權，而被獨的國家，主權是虛的或僅是部分的。

因此，地球上現在有四類群體：獨立有主權，獨立沒主權，還沒獨立而有主權，還沒獨立也還沒主權。這樣分類，粗躁了一些，但大致上如此。那麼，台灣的現狀屬於哪一類呢？支持台獨理念的人，腦中的「獨立」是自獨還是被獨？是否願意拿起刀槍來捍衛台灣呢？

結語就是，大環境是變化的，不是任何單方能控制的，世界是立體的，任何對「統獨」的思考軸線都不能是二分法。不幸的是，台灣現在被二分法綁架了，一部分人相信「非獨即統」，一部分人

相信「非統即獨」，大大的限縮了台灣內部團結的空間。老一代人在歷史情緒下如此，但年輕世代得打開腦洞，在立體的、多維度的思考下，審時度勢，創造一條對台灣最有利的路徑。

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講話」時空錯亂，台灣人隨之起舞

如果我有權力，我會宣布台灣已經進入緊急狀態—思維和意識被野火燎原的緊急狀態。

說的是習近平2019年1月2日的「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講話」。它不過是一場習近平在其國內政鬥進入白刃戰之際，急就章拼湊出的自救發言稿，充滿了老掉牙的時空錯亂及累積了四十年的邏輯矛盾。卻在幾小時之內把台灣的政府、藍綠政黨、政治人物、媒體輿論搞得野火燎原。逐字逐詞分析其「微言大義」者有之，怒罵駁斥者有之，謹慎附和者有之，用其打擊政敵者有之，順勢表態者亦有之。台灣這種杯弓蛇影的狀態，反映了台灣在主體性建構過程中的焦慮及脆弱。而事實上，2019—2022年這三年卻是台灣最需要冷靜、理性、團結的時刻。

以下這段話在2018年我說過兩次，現在2019年要再說一次，因為重要的話要說三次：「……台灣社會，如同事前編好了程式一般，膝蓋式的反應如噴泉一般的射出；藍綠、統獨的對立，再一次在北京按下按鈕之後引爆。」這次北京對台灣的按鈕就是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二十分鐘講話。台灣的政壇、輿論界、社交媒體炸開了鍋，匆促的回應和分析鋪天蓋地而來，加深了綠營的內鬨，擴大了藍綠的裂痕。這正是北京期待看到的反應，台灣又再度中計了！

本來真的沒興致評論習近平的對台講話，因為真正反映他的政治立場的講話，是一個月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兩個場合的講話，那裡面有他真實的政治立場和風

向標。如果一定要評論他這次的「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講話」，我只有八個字：時空錯亂、邏輯不通。就像台灣近來經常批評蔡英文總統的「文青文膽」不接地氣一樣，習近平的這次講話內容也是「僵化文膽」的不接地氣之作。以習過去表現出來的雄心，及以中共理論家的水平，竟然在如此重要的講話上如此不用心，訴諸粗暴的口號、敷衍了事，凸顯了他國內政治處境已到懸崖邊緣，已經無心無力細膩的應付台灣客觀獨立存在的難題。而台灣整體社會在長期的弱者心態和悲情主義之下，竟然把這膨風自救的演出，當作正經八百的一回事隨之起舞。這也凸顯了台灣對長期存在的「中國威脅難題」尚無中心論述的共識，以及自我信心的缺乏。

先說時空錯亂這件事。自1958年毛澤東通過彭德懷之口，發布「告台灣同胞書」以來，中共每次經歷大鬥爭後，出線的新領導人都要發表屬於他的「告台灣同胞書」。今天習近平的版本，之所以用「四十周年」為題，是以中共一黨專政下所屬的花瓶機構「人大」在1979年所發布的那份為起點。那是文革鬥爭剛結束、兩岸達成金門砲擊停止、具有代表性的日期。

讀者們、看官們，請注意一件事：「四十周年紀念」？這表示今天台灣一半以上的人口，當時還未出生，而五十歲以下的人，對「台灣同胞」這四個字恐怕是怪異感多於熟悉。以我在中國生活二十餘年的經驗，今天四十歲以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聽到「台灣同胞」這個詞，也會感到古怪而噗哧一聲笑出來。在日常用語裡，他們會說「台灣人」和貶義的「台巴子」，頂多用諧音搞笑的「呆胞」。台灣，在絕大多數五十歲甚至六十歲以下的中國人民腦中，不管他是看得起還是看不起台灣，老早就是一個獨立存在的政治實體了。

而2019年，在雙邊的五十歲以下人口都對「台灣同胞」一詞無感的現實下，習近平還在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這不叫不接地氣，什麼才叫不接地氣？紀念會上正襟危坐的中共黨員，不做鸚鵡就會被幹掉的中共媒體，像念經一樣的複誦「台灣同胞」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作為被指稱對象的台灣人，竟然也理所當然接下這

個界外球，本來可以贏一分卻因為搶接球而輸了一分。

時空錯亂的第二例。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的情境是黨對黨，共產黨與國民黨。四十年過去了，今天台灣不但國民黨不代表台灣，連民進黨都不代表台灣，沒有政黨可以宣稱代表台灣。而依然自認為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共產黨，竟然以為台灣還是四十年前的台灣，「願意和任何黨派談」。共產黨對台灣的無知，在此曝光無遺。台灣社會要警惕啊！要警惕的不是共產黨對台灣現狀的無知，那還是可以理解的；要警惕的是共產黨對它自己所處國度的人心，也是無知的。有一天它因為這點而翻車，可能因失控而衝向台灣。

時空錯亂的第三例─語境的錯亂。我曾提過好幾次，什麼「九二共識」啦、「一國兩制」啦，這些老梗早該從台灣人的字典中去除。如果為了引述或討論歷史而不得不用，至少得加上引號或稱之為「九二××」、「×國×制」等等。

這樣說並不牽涉到這些「老梗詞」的意涵，而是這些詞在十年前還有模糊創新的空間，但現在已被中共單方抹煞殆盡。中共要話語上的鴨霸權，台灣就不能給它鴨霸權。台灣政府、媒體和知識界，如果還鋪天蓋地的複誦這些老梗詞，哪怕是駁斥，也是中計。道理上，當中共採用「九二共識」、「一國兩制」進逼台灣時，台灣政府的正確反應應該不是駁斥或說拒絕，而是應該舉重若輕的對中共以及國際指出，老梗解決不了新局面，請更新腦袋，更新用語後再來談。

邏輯不通之處，僅舉其中最關鍵的一個例子。當你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這三個命題放在一起，問題就出來了：既然如此，為什麼只探索「台灣方案」而排除探索「大陸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屬於中國嗎？中共一黨專政的制度不屬於中國嗎？大陸人民不是人嗎？他們不能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討論「大陸方案」嗎？

談過了習近平講話中的時空錯亂，來談談台灣人隨之起舞這件

事。

台灣人會隨之起舞（撇開那些有意唱和的人不談），多半是因為情緒狀態和落入語境陷阱。台灣人會因情緒而失去理性，會掉入語境陷阱，主要是因為台灣人還受困於弱者心態和創傷症候群。很抱歉！我想不出更好的比喻，只能用「女權運動發展史」來說明這點。

台灣在尋找自我主體性的過程中，還處在類似當年女權運動的發展中期。猶記得七十年代，美國的女權運動雖然領先全球，但仍然處在「說NO」的青春期。典型症狀就是凡事只會說NO，我不要這個，我不要那個，拒絕男性威權，好像自己作為一個女人的所有不幸都來自男性沙文主義。一直要到1990年之後，女人這個群體中的年輕世代才開始找到自己的主體性，開始會說YES，我要的是這個、那個，我只要自己作主人，我的身體和心靈都自己作主，男性沙文主義隨他自娛自樂去吧。

以此為喻，台灣對中共霸凌的反應模式，還停留在人權運動的青春期，勤於說我不要什麼的NO，而拙於說我要什麼的YES。大家想想，這麼多年來，包括此次中共時空錯亂的「告台灣××書」，台灣人是不是還生活在「說NO」的階段？雖然蔡英文總統的「四個必須」在用語上已經從過去的「×不」轉換為「四個必須」，算是從「說NO」往「說YES」踏近了一步。但是，本質上還是「以中共的YES為座標」在發言，而算不上「以台灣自己的YES」為核心。

台灣人一向隨著「中共要的YES」起舞，豈是偶然？駁斥中共要的YES，固然可使國際上同情台灣。但國際是現實的，中共比台灣更懂這一點。台灣若要堅固自己的國際主體性，不管你是台派還是中華民國派，必須清晰的說出「YES，我要這個、那個」，並且圍繞著這幾個YES鋪陳一套核心論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坦白說，我還滿同情他的。過去幾年忙著清算政敵，忙著躲避被政敵清算，忙著經濟挖東牆補西牆。現在再碰上一個看穿中共本質的川普，十三點五億雙眼

睛盯著看他表現，你說人家容易嗎？屋漏偏逢連夜雨之際，倉促拼湊出四千多字的「告台灣××書」，無暇與時俱進只得容忍幕僚時空錯亂。還好事後有修補文匠為他整出個「習五條」，算是對黨內各派有了交代，也算是給世界上的中國專家們提供了猜謎材料。但台灣民眾心裡得明白，這不是一份值得逐字推敲的文件，隨之起舞更是洩漏了台灣之底。想要了解習先生接下來想幹什麼、能幹什麼的人，不如把時間花在研究他於2018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上的講話，那裡面才有天機。

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書

親愛的中國人民，值此2019新年之際，祝願你們十三點五億人，如同台灣的二千三百五十萬人一樣，都能多元相處，全年平安！我們之間，雖然相互的遊客和訪客都不少，但至今存在許多隔閡和誤解，希望藉著這個機會，能夠縮短鴻溝，增進互諒互解。人類歷史上，沒有解不開的結，我們雙邊，也到了該解結的時候了。

台灣土地上，的確有不少人，出於情感和事實上血緣的聯繫，願意稱呼你們為同胞。但是也有不少人，對「同胞」這兩個方塊字是無感的。因為台灣是個典型的多元種族混種國家，源自南島語系，四百年來混合了葡原（住民）、荷（蘭）原、西（班牙）原、漢原、日（本）原、日漢、百（越）漢等等數不清的混種，近幾十年來還加入了大量的越南、菲律賓、印尼血統。這二千三百五十萬人，當然都有同胞，但他們的同胞輻射整個亞太區域。

當然，由於人類地緣文化上的規律，台灣的這些人和隔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同質性。例如：我們之間都用筷子，都使用方塊字，中秋端午都會慶祝。另外，台灣許多人也拜中國沿海的媽祖、中原的關公，土地公廟更是無處不見，全中國的佛道，只要叫得出名字，台灣都有。

但你我之間的異質性更值得注意。其實用一句最簡單的話，就

能點出最大的差異所在，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致力於追求「統一性」，而台灣致力於追求「統多性」。「統一」所追求的就是消滅多元，而「統多」所追求的是多元並存。打比方來說：「統一」就像某家人年復一年每天餐桌上只有同一道菜，而「統多」就像某家人每天都要換著花樣吃菜。你說這兩家人能夠住在只有一個廚房的同一個屋頂底下嗎？

台灣人非常希望你們也能嘗試一下「統多」下的生活。這樣我們雙方就有共同邁向未來的基礎，畢竟「統一」和「統多」走不到一塊。比如說：台灣儘管有豐富的漢文化節日，但是台灣還有原住民節日、基督教節日和南亞穆斯林節日。再如，儘管台灣種族、文化多元且交混，社會意見紛爭，但是我們用「定期選舉」、「定期公投」這個機制來達到和平統多。警察是用來保障人身和財產的，不是用來統一維穩的。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採用的制度是鬥爭得權後的指定指派，政治用來統一意見，公安用來統一維穩。

當然，我們充分明白「一國×制」的先進文明之處，但事實上台灣在這精神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得強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是「兩」，而台灣的「×」老早就是「多」了。台灣在多元背景下，老早就邁向「一國多制」了。

台灣社會也能體會「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有條件善意，真的！只是台灣社會在這方面又更先進一些；台灣人會說「人不打人」，而不會用帶條件的「××人不打××人」。因為「××人不打××人」在語意上是很難自圓其說的。例如：新疆維吾爾人是不是中國人？打維吾爾人是不是反證了維吾爾人不是中國人？電視上有一個鏡頭，一位維吾爾人拿著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分證說：為什麼打我，我不是中國人嗎？

我同意，我們之間一定要有共識，共識雖然不是萬能的，但沒有共識萬萬不能。這個共識，就是制度的共識，就是「統一不如統多」的共識，就是「定期選舉比隨權指派優越」的共識。一句話說盡，就是要有對人性的共識。

有了對人性的共識，具備了對制度的共識，不要說僅僅隔著海峽，就算是隔著大洋，也能夠一家親。沒有這兩個共識，咫尺也天涯。

第三章

中共如果武力犯台

第三章

中共如果武力犯台

【前言】

中共解放軍還沒有能力登陸台灣，大多數中國人民內心深處不想攻打台灣。然而，這並不代表在中共內鬥形勢加劇，某人某派狗急跳牆，把台灣和民族主義連結起來，製造台灣內部的流血事件或啟動局部武力。台灣必須在統戰層面、局部武力衝突層面，從各種角度分析可能性，開啟各種腦洞，並做出準備。本章集合了四年以來，隨著前後局勢的變化，所做出的多角度觀察。

台灣地緣優勢新角色：
從「第一島鏈」到「南海通道的中途島」

近兩年來，「印太戰略」（印度洋／太平洋戰略）成為通用名詞，美國講，台灣也跟著講，但一般人沒去深刻理解這新詞的意義。

一般人的常識內，台灣是「第一島鏈」的重鎮。第一島鏈指的是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進入廣大太平洋的那一串島–日本島、朝鮮半島、台灣島、菲律賓島。第一島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等於把東海、台灣海峽、巴士海峽由海洋變成了湖泊。

在台灣還僅僅把自己視為第一島鏈重鎮的觀點下，中方的戰機飛到台灣東邊的太平洋叫做「繞台」，美國的驅逐艦和海巡艦穿越台灣海峽叫「護台」。台灣人這樣嚇自己，中共當然樂得在宣傳上順著這「台灣調」高歌，美國也樂得呼應台灣人的說法做個順水人情。

但戰略大局早已改變。中共的戰機從來沒來「繞台」。就像你去101的路途中順便去逛逛路邊的一家店，不能被說成你是為了經

過那家店才去101一樣。中共戰機飛到距離關島四百公里處折返，目的是告訴美國：我的中程機載飛彈可以打到你關島，然後回程順便近台一遊。

同樣的，美國海軍穿越台灣海峽也還沒到「為了護台而來」的地步，它是在告訴中共：我的艦隊可以從印度洋穿越南海，和我駐紮在日本的海軍對你夾擊。

戰略大局改變的背後道理，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頓，3月10日在等同川普的喉舌福斯電視台（Fox　News）　所說的一段話，表達得最為清楚。他說：「南海是地中海的兩倍大，全球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的貿易通過南海海道，而中國正在通過島礁軍事化，將南海變成中國的一個省……美國不會坐視。」

這才是「印太戰略」的意義。在新意義下，台灣的戰略地位已經超越「第一島鏈重鎮」，成為了「保障南海通道暢通的中途島」。

這地緣戰略地位的升級，對台灣是危機還是轉機？都是。有些人視為危機，有些人視為轉機，但不管你我的看法如何，你我必須明白，這世界大局不是台灣內部統獨藍綠自己打架能夠改變的。因此，只要你我認為台灣是個國家，只要你我在台灣納稅、投票、享受健保，你我就有百分百的權利和義務，保衛這個家園不受侵犯，並在受到侵犯時自衛。這是極簡單的道理，是不是？

中共武力犯台的機率？
台灣必須在大棋局下看自己

關於中共武力攻台議題，先做一些歷史回顧。對中共武力攻台的焦慮，2017年達到了高峰。前美聯社駐台十九年的記者彼得．恩納福（Peter　Enav）的分析文章，從政治面、軍事面、西方領袖害怕批評中國等角度，達到一個警世的結論：如果國際不行動、台灣不自覺，中國最快可在2018下半年武力犯台。此外，「台北論壇」

的蘇起先生所撰寫的〈美國在衰落，台灣需自強〉中，提到「川普上任已經六個月，任期過了八分之一，但政府高層五百七十個職缺竟然只有不到一成就任。國務院與國防部的東亞相關主管全部從缺。既然該負責、能負責的政務官都沒有到位，而政府最高層又分成『親信派』與『主流派』，美國就很難進行跨部會、跨國界的協調工作，以處理像北韓這樣的宿疾。當然也很難想像美國能在某地區（如台海）爆發危機時積極應變」。

這兩篇文章一前一後、作者一美一台，都透露出強烈的急迫感。所差別的只是前者意在激起國際（尤其美國）對台海危機的關注，後者在提醒美國當下自顧不暇，台灣需要審思「在台海發生危機時，美國一定會援助台灣」這個假設。

但在2017年同期，《紐約時報》分析朝鮮達到核攻美國本土的能力只差一年。隨即朝鮮在半年內成功試射第二枚（另有分析說是第三枚）洲際導彈，美國軍方估計此枚導彈已經具有抵達洛杉磯、舊金山的能力。而隨後發生在美國夏威夷州的「朝鮮核彈空襲警報」事件，將美朝緊張關係推向最高峰。

因此筆者提出「美國別無選擇，必須在十二個月內解決朝核威脅」，以及「中共在朝核問題得到解決之前，主動或被動的捲入某種形式的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極大」這兩觀點。並做出結論：我們很難想像中共會愚蠢到讓自己落入「兩面作戰」的境地—同時備戰台海及朝鮮半島。

此外，2017年發生的中印在洞朗地區的軍事對峙事件，導致印度爆發大規模的反中遊行。印度一份主要雜誌的封面地圖，已經把西藏和台灣從中國領土切除。這也是一個凸顯了中共軍事極度困難的標誌性事件。

雖然在陸地邊界問題上克制，但近年來中國覬覦印度洋的動作昭然若揭。中國拉攏印度宿敵巴基斯坦早已多年，經援、軍援不在話下，巴國則以允許中國鋪設至新疆的油管，以及出租緊鄰印度洋的軍港作為回報。印度的媒體「今日印度」（India Today）警告印

度政府，中國正在把巴基斯坦「變成中國的一省」，方法如同通過「新疆建設兵團」收納新疆入囊一樣。

除了以巴基斯坦牽制印度，中國還快馬加鞭的拉攏伊朗，形成對印度的雙重掣肘。中伊近來打得火熱；伊朗不但是中國的主要供油國，還指望著中國對伊朗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投資。早有消息傳出，伊朗也將對中國租借軍港；德黑蘭市現在已經出現大量中國人進駐，中國餐館星羅棋布。伊朗、巴基斯坦兩國歷史關係親密，雖偶有伊斯蘭教派衝突，但印度是他們共同的宿敵。只要中國對這兩國付出足夠的經濟代價，兩國協助中國勢力進入印度洋是理所當然之事。

伊朗與中國形成密切同盟，不但印度緊張，美國比印度更緊張。這是因為伊朗在地緣上兼具陸權和海權的意義。以陸權概念來看，若把中國西北、俄羅斯、中亞、印度、阿拉伯、東歐，甚至西歐北歐，看成一個巨大陸塊的經濟區域，伊朗正好就是輻射中心；從伊朗到這個經濟圈內的任何一點，都可以通過鐵路而無須船運。而以海權概念來看，由伊朗出發的海線，向東穿過阿拉伯海可直達印度洋，向西穿過亞丁灣可直達地中海，甚至連非洲東北部都在伊朗的海線範圍內。巴基斯坦、伊朗的雙掣肘，再加上印度大陸南角的斯里蘭卡也已經同意出租軍港給中國。一旦中國海軍入駐以上三國的軍港，中國就有限制印度海路的潛力。

中國只要在印度大陸東北角的陸地邊界再進一步，就可從南北兩向包圍印度大陸，這應該是中國對印戰略遲早必須跨出的一步。中國包圍印度之態勢，已經引起美國、日本的高度緊張；美、印、日在印度洋所進行的聯合軍演，其意義已經不亞於美、韓、日在東海的聯合軍演。大棋局下，印度的南方海路已被包抄，因此近日發生在北方的中印陸地邊界的軍事對峙，絕不可以偶發小事等閒視之。前述的兩項中國內部政治、經濟壓力，只要出現，對印度挑起戰爭肯定是中共「以戰保政權」的主要選項之一。

現在時間來到2019年，美國已經對伊朗進行接近朝鮮等級的全

球性制裁，從貿易到金融，同時印太戰略（印度洋／太平洋）成型。這形成了一個中國朝代歷史上的顛倒：軍事威脅從來都是北方或西北大於東、西、南，而今日卻俄國、中亞無事，東、西、南卻可能出大事；「一帶一路」的這個全球戰略夢想，恐怕會將先破滅於「一路」上。

筆者只要有機會就會大聲呼籲，台灣千萬不能再用「兩岸關係」來定位自己，這樣做是中了計了；不但中了中國的計，也是中了美國的計。台灣必須建構一種能力：從中國的東西南北地緣、海緣大局來定位台灣的行止。沒有這種整體框架看問題的能力，台灣就會落入一驚一咋、自亂陣腳。例如「五年內武力攻台」、「最早××年攻台」等等說法，就必須放到大棋局內來做評價，而不是在狹隘的「兩岸關係」下評價而失去方寸。

很多人相信中共遲早會走上「以對外作戰保政權」這一步。這並不是沒有前例，當年鄧小平發動對越南戰爭，中方傷亡慘重而不惜，但是一方面討好了美國，另方面收拾了中共內鬥派系而保住整體政權。當前，如果中共陷入類似處境而必須依賴戰爭解決，在中共一貫的「一石二鳥」思維下，當會在討好美國或討好俄國兩個方向中擇一。而台海問題並不是最佳選擇，印度問題或朝鮮問題才是。

此節的內容可以總結如下：我們必須了解中國對外作戰的內部政治條件，同時了解中國在亞洲區域棋局，以及世界觀感下的約束條件，才能做出對台灣最有利的策略及進退行止的節奏。

中共想吃的菜有很多，台灣要避免做出使自己變成「前菜」的不當動作。另方面，中共吃了會拉肚子而從此虛脫的菜也很多，台灣必須有把自己變成那道中共最不敢吃的菜之智慧。如何做到這點？本書隨後會提示一些方向。

五年內武力解決台灣？

2016年開始小道消息盛傳，至今未衰，說習近平必然在其任內「解決台灣問題」，文攻若失敗，就武攻。這種論斷，在台灣帶來了很大社會焦慮，也讓統獨氣氛走向兩極端，因為統獨都感到時間不多了，雙邊都開始以「抓巫」、然實則自殘台灣的方式，逼迫對方「出櫃」並形成陣營。是否會走上「武戰」姑且先不論，但在「統戰」上，台灣政界、媒體界的分裂式反應，已經證明台灣已經被中共打敗了。

這兒提供一個看問題的框架，談談「中共五年（十年、二十年）內武力解決台灣」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首先得提醒幾個經常被台灣人忘記的觀點：

一、中國已經是大國，大國可能打仗，但絕不會因為忍不住氣而打架；只有小國才會因為忍不住氣就出手打架。

二、打不打仗，絕對不是軍事決定，而是政治決定；這不但包括了對美作戰、對日作戰，也包括了對台作戰。

三、在未來五至十年內，足以導致中共領導人拍板作戰的因素，只有兩個：A．領導人的權位在國內面臨被反對派推翻的關頭，以對外戰爭來凝聚人心以自保；B．整個中國共產黨面臨專政被推翻，以對外戰爭來凝聚人心以自保。這兩個因素，可以起於政治鬥爭，也可能起於經濟壓力。

四、中共未來五至十年的外部挑戰，乃整個亞洲的區域圍棋，而非所謂「兩岸」之間的剪刀石頭布低級博弈。南海是中國國運的咽喉，釣魚島海域是日本阻撓中國海洋化的利劍，台灣海峽不過是一條支氣管，哪有冒著失去咽喉、不顧利劍穿心，而武攻一條支氣管的道理？

五、台獨不台獨，不是「復興中國夢」的要素，也不是「完成

統一大業」的要點（新疆、西藏還未完成「真正統一」才是要點）。

六、從中國內部政治來看，台灣雖然重要但不急迫。但從本書前述的台灣在南海通道中戰略地位的提升，台灣對中共的急迫性的確已經提高。

七、台灣獨立的真正殺傷力，在於中共黨內的反對派可藉此為由推翻領導人，或民間的整體怨氣可藉此為由推翻中共的一黨專政。

八、壓制台獨力量，用「三合一」的統戰手段就足矣：政治上威懾與懷柔並存、武力恐嚇、經濟壓制。

台灣的大用

台灣的角色在北京眼裡，絕不是什麼「拿下台灣，完成統一」的目標。台灣人真的是太小看共產黨了，尤其是小看了習近平。台灣存在的現狀，在北京高手群的眼裡，就是如來佛掌中的孫悟空，任你翻十萬八千里，到了天涯海角撒一泡尿，最終發現不過是在如來的中指根部自爽了一番罷了。雖如此，孫悟空還是不時有用的。例如利用懲戒孫悟空來噁心、嚇唬唐僧，或引誘孫悟空身入險境制衡小妖。最終的大用，還可將孫悟空壓在山下，以平息天界群佛群魔對如來的鬥爭，或是將孫悟空賣個好價錢，換取如來夢寐以求的珍寶。

因此，台灣的現狀—綠藍惡鬥，統獨互唾，正是北京最樂意看到的，甚至是北京通過統戰的正負手法刻意維持的，幾乎到了孫悟空應聲就進葫蘆的地步。如同過去的一貫作用，台灣就是北京用來調節國內外溫度的一台冷暖空調機，冷了不行，過熱也不行，總要隨著大環境的溫度用遙控器調節。唯一的一次遙控器失靈，就是2014年發生在台灣的「三一八」青年世代翻轉運動，但經過兩年，即使民進黨執政了，北京已經修好了它的遙控器。

作為幻想小說題材，如果哪天台灣在中共壓力之下，突然達到共識對北京說：來吧，我們來談統一吧，條件是台灣所有政黨都可以到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活動。那可真會把中共嚇出尿來，就像電影《楚門的世界》中的主人公找到了一輩子所處虛擬環境的出口，踏入真實世界，把節目的製作人嚇出尿來一樣。或者，《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畫蛇添足，外加一章描述孫悟空竟然找到了如來中指和食指之間的縫隙，走出了如來掌外，如來的驚嚇可想而知。

或許，以上的分析還不足以平息你對「五年內武力解決台灣」的擔憂。的確，生成噩夢感的「證據」太多了；從深藍人物的種種「你等著看」言論，到深綠人物焦慮下對中國的各種惡言，到國際政治學者的警言，到中國鷹派小報、「學者」的網上狂言，一直到美國藍德集團（RAND）的中美亞洲軍力消長的權威報告、美國政學界的「再見台灣」文章，在在都是證據指向「要對台灣動手了」。

由於這些一般人視為證據的消息如此密集的出現，再加上2017年和2022年兩場中共政權生死交關的十九大、二十大不久就到來，台灣人開始相信「近期內解決台灣」是有心理基礎的。因而，進一步做出觀察和分析是有必要的。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讓我們先從戰略分析開始。兩年前，流傳出一份解放軍將領的內部談話，真假先不論，其中的戰略分析的確為行家所言。他的核心觀點：在佔領東海（釣魚台海域）之前，不可能對台灣動武，因為那是打草驚蛇的愚蠢戰略。缺少全局戰略觀的人，可能認為這個單一條件不足為憑，那麼，讓我分享另一件「湊巧」的事。不久前，一位退休的台灣高級將領說：「先打台灣？仗沒有這樣打的。因為先打台灣極可能牽動日本，而中共的兵力不足以兩邊作戰；即使兵力再強，也沒有主動將兵力一分為二的道理。中共不可能先浪費一兵一卒在台灣，要動，也是先全力動日本，再圖台灣。」換言

之，項莊儘管劍舞得熱鬧，眼角所瞟的卻是沛公。

我們都已耳熟能詳，中共的軍中鷹派和學界及媒體狂人近兩年來「張口就來」的狂言。從央視的軍事名嘴說「明天開戰，四天就能完勝日本海軍」，到「美國航母敢進南海，中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將它擊沉」，到無知學者演講說「中國必須打台灣以在世界立威，因為男的不壞、女的不愛」，到最近中國微信平台上盛傳的「習近平談話：世界不管日本，中國就接管」（一周內就被中央刪文）。

台灣對這些「信息」的受眾，包括為其廣為傳播的媒體，還不明白的是：這些解放軍名嘴，在中共決策層內頂多只是被排在十層之外的邊緣人，這才容許他們出來做些宣傳，如果所說的接近事實，老早就因為「洩漏軍事機密」被喀嚓了。而那些叫囂得最厲害的小報如《環球時報》、小學者如金燦榮，距離決策中心恐怕連二十層都不夠。捕風捉影、滿足部分中國人民的自卑而自大，在中國本土都為有識之士不齒，只有台灣把他們當作「政治風向球」來看待。可以說，他們的衣食父母其實不在中國，而在台灣。因此，他們的存在不足為奇，他們越起勁，事情越不會發生。哪天他們的言論銷聲匿跡，那才是台灣應該開始擔心的時刻。因為北京真動心起念的時候，不可能容許跳樑小丑們「無意間猜中國家機密」，而會把他們的言論一律喀嚓。

美國權威軍事報告？

首先擺正兩個觀念。其一，美國是全球超級強權，真正權威的報告都是著眼全球的。對於美、中兩國在亞洲地區的軍事實力分析，真正的論點都基於一個假設：一旦中國在亞洲區域形成軍事優勢，中國不可能只滿足於亞洲，而會一步一步的威脅到美國的全球優勢。其二，報告中即使提到台灣，其著眼點也不是台灣的安全，而是日本和韓國的安全。這就是說，台灣若有任何重要性，也是基於一個不安全的台灣將直接威脅到日、韓的安全。而日本的安全牽

涉到美、俄之間的勢力消長，韓國的安全牽涉到朝鮮半島核子化的危險。換言之，如果能夠保障日、韓安全以及南海安全的前提下，以台灣作為交換籌碼不是不可想像的。

最近美國藍德集團發布了兩份報告，《美中軍事實力對比》以及《與中國開戰—想像不可想像的事》，一方面嚇壞了台灣的部分人（怕台灣是引爆點），另方面也樂壞了台灣的部分人（認為美國到時不得不保護台灣）。當然，這些都是有心理基礎但觀點偏頗的反應。

這兩份報告，涉及台灣的部分，都是以東海戰爭為背景，時間點都在2025年前後，也就是藍德集團預測中國總體軍力可以抗衡美國的時段。報告的數據可信度，不是小小台灣的能力所可證實的。不過，值得提醒的是：藍德集團乃美國「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美國艾森豪總統所提出的警告）的核心組織，其亦有大量「惡名昭彰」的歷史，其中最大的歷史罪過，就是用「嚴謹」的報告說服甘迺迪總統。當時的蘇聯已經擁有五百枚足以攻擊美國本土的洲際核子飛彈（事後證明只有四枚），而激出了隨後數十年的美、蘇武器競賽（這大背景也促成了尼克森感到不結盟中國不行了）。藍德集團後來「將功抵過」，促成了美國用軍事競賽拖垮蘇聯經濟的大戰略。

藍德集團此次是否重施故技，我們不得而知。中共方面，此時此刻肯定樂得看到藍德報告，因為這是美國人替共產黨背書—中國軍力要超過美國了，人民因而應該自豪，中共的執政合理性得到美國的背書了。中共無暇顧及的是歷史的後段—用軍備競賽拖垮蘇聯經濟的大戰略。

看到藍德集團的報告，台灣既不應該傷心，也不應該高興。因為人家大國玩戰略、下圍棋，台灣只有在思想上步步為營的餘地。在大國棋局之下，台灣真正必須認清一點，而且只有這一點：台灣是美、中、日棋盤上的一顆棋子，不多也不少，就只是一顆貨真價實的棋子。台灣絕對—再說一次，絕對不能誤會自己也是棋手而胡

亂移動自己的位置。棋子，從定義上說，就是一個可被交換、可被交易的對象，而棋手們步步都在斟酌交換和交易的公式，怎樣交換才對自己更有利、更值得。

台灣唯一能做的就是徹底的分析、了解各棋手的可能交換公式，A公式、B公式、C公式……，然後設法將棋手的公式導向最符合台灣利益的方向。這個功夫，必須隨時做。作為台灣人民，最應該問的問題是：政府有沒有在做這個功夫？做得到不到位？只要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YES，人民（尤其是立法委員、媒體們）就不應該追問細節，強迫政府洩漏國家機密。

至於中共方面，武力攻台的計劃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了，不但有A計劃、B計劃，現在恐怕連Z計劃都完備了，且不斷在「與時俱進」中。有攻台計劃不稀奇，沒有才稀奇。但如同前文所強調的，是否攻台、何時攻台，乃是遠遠超出軍事的政治決定。中共絕不可能口頭放棄武力攻台，即使「兩岸」簽署了「和平協議」，它也得留下武力攻台的但書。原因無它，就是前文所述的「台灣之大用」；好肉，只有放在冷藏櫃內，來日才能有大用，拿出冷藏櫃，幾天不吃或暫時吃不下，好肉就浪費了。為大政者，不會如此愚蠢。

黑天鵝會不會來？

讀者或許會問，如此說來，五年內武力解決台灣這檔事就不會發生了？五年不發生，十年呢？二十年呢？

只能這樣回答：如果世界大事能準確預測五年，那麼該去投資致富了。形勢，永遠比人強；黑天鵝，永遠存在。請回顧文首所說的「導致中共領導人拍板作戰的因素，只有兩個」，那裡面就充滿了黑天鵝，而且，凶險期間就在2017–2022年之間，這與「習近平處境」有著極大的關係。

海外許多中國流亡人士，斷言黑天鵝必然出現，而中共將「一夕之間垮台」。台灣也有許許多多人認為只要中共垮台，台灣就除去心頭大患了，從此王子公主過著小確幸的日子。這一點，可能就是台灣人世界觀、歷史常識中的最大誤區。中國海外流亡人士作如此期盼，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其背景和心情，但台灣社會必須了解，台灣不是中國，沒必要也沒有能力承擔中共垮台對台灣的後果。

台灣就像一家瓷器店，隔壁住著一隻大象，你不得不隨時關心這頭大象的生理、心理健康，哪怕它不願意你去關心。對於大象的主人，哪怕是個惡主人，你也得謹慎對待，儘管他時時威脅放開大象闖進你的瓷器店。倘若在中國政局、經濟還沒有穩定之前，中共一夕垮台，或中國經濟一夕崩盤，土石流的第一站就是台灣，這點台灣社會必須有清醒認識。

二十年或三十年後

很多人會問，中共的政治、中國的經濟進入穩定狀態，對台灣有什麼好處？答案其實也很簡單：中美日現在都有嚴重的國內問題，大家都需要時間來修補自己的船，最好十年、二十年不要發生大規模戰爭。中國的政治、經濟，只要不惡化到狗急跳牆的地步，給予人民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展望，台灣的軍事安全就無虞。事實上，中國內部包括軍方，都心知肚明一個「一翻兩瞪眼」的風險。那就是，如果中日東海開戰或中美南海開戰，只要中國輸一次，整個中國的民氣和民族信心就會「一夕回到解放前」，心境回到1895年，政權可能倒台，經濟活力可能倒退三十年。當下我們看到中國對台文攻武嚇，其實反映的正是其政治、經濟無法提供人民長期展望的側影。對台統戰，其實很大一部分也是為了對中國百姓統戰，硬漢姿態做給百姓看。

二十年後、三十年後呢？在《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一書中，我已作出如下的詳細分析：（大意是）現在世界，每五年就發生一次世代翻轉，潮流不可擋，無論中美日，包括解放軍內部以及

中國十三點五億人。二十年就是四個世代，三十年就是六個世代。誰知道四個世代、六個世代之後的社會面貌、人心走向？這其實是有證據的，一位新世代的中國學者告訴我，他默默的連續做了幾年統計調查，發現凡是到過台灣留學或自助遊的年輕人，都反對武力統一台灣。他們共同的看法是：「那麼好的一個地方，打它幹嘛呢。」

當然，今天的新世代影響不了掌權的老世代的決定。但是，下個世代呢？再下個世代呢？就像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新世代，影響不了老世代蔣介石的決策，但到了八十年代的新世代，就比較能夠影響蔣介石下一代的蔣經國。依此類推，今天台灣的新世代對於今天的掌權世代，影響力就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了。這是大自然的規則，世界的潮流，馬列沒看到，毛澤東也看不到，但習近平的班子肯定看到了。

台灣的軍事備戰

有戰沒戰，台灣的自衛軍事力量都得充分。這就像一個人即使生活再簡樸，銀行裡也得有儲蓄是一樣的道理。這些年來，台灣的軍人形象被社會氣氛糟蹋得不成樣子。軍人形象越不成樣，××年內武力攻台的說法就越具有威懾力，兩者之間形成惡性循環。多位曾任關鍵要職的實戰將領告訴我，只要排除非軍事的政治干預和商業利益干預，發揮台灣最成熟、最擅長的軍事科技，不追求一些二十年才能半生不熟的技術，集中力量於不對稱戰術，純粹就保衛台灣為目標，兵在精不在多，台灣軍事是可以達到足夠影響中國對攻台這件事的政治決定的。

然而，他們所開出的上述條件，今天在台灣並不存在，而且許多方面是背道而馳的。這才是關心台灣安全的人士，包括一般民眾，應該猛盯不捨的。而不是僅僅盯死某位士兵是否被操勞致死，某隻小狗是否被士兵凌虐致死。要知道，因為士氣低落、訓練不嚴

而致死的士兵人數，遠遠超出過勞死士兵的人數。而雄三飛彈誤射事件，若非台灣運氣好，距離「黑天鵝」也只有數秒之差。

在以上的分析框架下，真正可能讓台灣措手不及的黑天鵝，將出現在上述的「中美日利益交換公式」內。讓我們再度試問：當亞洲區域形勢，也就是東海和南海形勢，不管因為何種原因，出現了「一翻兩瞪眼」的險惡狀態，也就是倘若中美日其中任何一方因為內部、外部因素被逼到牆角的時候，美國是先保日本、南韓，還是先保台灣？當南海出現中美軍事戰略對撞而波及台灣的時候，美國是先保南海還是先保台灣？

前面說過，中美日現在都不想進行大型戰爭，那麼，依照歷史慣例，優選就是進行中美日三方都能勉強接受的利益交換了。你猜，在亞洲大棋盤上，足以讓中美日三方都嚥下一口氣的棋子在哪裡？沒錯，就是台灣人天天自我唾棄、自我矮化的「鬼島」。

時至2019年，固然美國和朝鮮的緊張局面因為「川金會」達到某種緩和，但距離解決朝核問題還遠得很。由於美中之間的態勢以及俄國介入朝鮮的新因素，轉折不是不可能。試想一種狀況：朝鮮的小金胖子同志，具備了五枚精準度僅有五百米、但射程可達首爾和東京的核子飛彈，美日韓會怎麼辦？當然，美國可以先發制人，精準幹掉這五枚核彈。但小金同志不是笨蛋，他一定會把其中幾枚部署在與中國接壤的長白山或鴨綠江邊上，而中國不可能允許在自己的邊界引發核爆，陰錯陽差之下，這其間引發中美大型戰爭的可能性是巨大的。何況，至今中國還牢牢把朝鮮握在自己手中，中國若停止補給，今天的朝鮮不但軍車開不動，連稻米青菜都吃不上。朝鮮，乃中國之禁臠，美國想碰，門兒都沒有。如果那時再恰巧某南海國家，例如越南，出來攪動南海平衡，整體形勢就更逼人了。

不能打，咋辦？利益交換唄。中國以軍事行動或祕密任務保障朝鮮半島無核化，美日韓除了默認中國接收朝鮮北部礦產資源之外，還必須付出什麼戰略代價，才能換取中國的具體行動？當年鄧小平訪美後，即於1979年為美國代理了一場懲越戰爭，美國付出的

代價是對中國的各種經濟開放，包括促成後來的WTO會員資格，從此中國搭上國際經貿秩序的列車，扶搖而上。那麼，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朝核威脅由中國去勢之後，事態變成美國出任文攻台灣的角色，而對台灣武嚇的角色繼續由中國扮演。如此中美日韓以「解決台灣問題」為代價，重造東亞格局？在這場景下，幾年武力解決台灣，就已經是個不相干的問題了。

五年前，小金同志的爸爸金正日還在世的時候，我曾為文三篇，預警「決定台灣命運的可能不是台北、北京、華盛頓，而是平壤」；這個可能的局面，今天依然存在。

結論

台灣的自衛能力，在軍事、社會文化上各佔百分之五十。軍事上，台灣要自力達到讓中美日任一方都深切感受到，台灣雖然成事不足，但敗事卻有餘（足以影響中美日在利益交換公式上的考量）。這點，在政治方略上可以辦到。

社會文化方面，台灣必須成為一個文明素質高，民主行為成熟，法治彰明，對國際投資、國際人才包容力極強的所在。對宗教、性別、非主流價值觀的包容力超乎尋常的寶島，令得對手投鼠忌器，吞下去就會拉肚子的一個先進國家。

對於社會文化保台灣這一說，我好像聽到一些譏嘲聲了。

但，會譏嘲就代表尚未心死，只是恨鐵不成鋼。哀莫大於心死，倘若心已死，其實是不會關心中共是否五年內武力解決台灣這問題的。這是篇長文，若讀得到這裡，即使對其理想有所譏嘲，其實也反應了內心的另一半是健康的。

2019年，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嚇的確有所升級，也達到了令台

灣恐懼的效果。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些軍事動作，主要是針對美國的新印太戰略部署而來，一石二鳥的順帶影響台灣2020年選情。

如同前文指出，動不動武本質上是個政治決定。但習近平上任以來，尤其在第二屆，軍事與政治已經開始出現脫節現象，政治派系的鬥爭，往往牽動解放軍派系的誤判和蠢動。雖然習近平力圖撤換所有將領，但這豈是幾年之內可做到的。因此，對台軍事政策出現擦槍走火，也不令人意外。以下就是一個案例。（本文大部分文字寫於2016年，根據事態進展而略作補充，但所論依然適用今日。）

失意軍頭：習近平的豬隊友

已下台的前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洪光中將，2016年12月17日在一場大型公開活動中說，中國武力攻台的時間在2020年前後，並且「一百小時內」拿下台灣，世界華人媒體競相報導。他中氣十足的喊出這番話，心理上反應出對2016年2月間習近平定案的「軍改方案」不滿，並且實質上威脅到了習近平在次年十九大進行「臨門一腳政改」的權威性。從習核心班子的眼光來看，這番公開發言對外政治影響極其惡劣。

聽到王洪光言論的台灣讀者，想來都氣憤異常，以為那是中國「鷹派」送出的信號。其實，台灣社會並不了解中國政治的奧妙，此處容我進一步分析。

2016年2月，習近平拍板定案，在打掉解放軍中幾隻大貪虎後，推出構思已久的「軍區改戰區」世紀計劃，廢除原有的以城市名稱命名的七大軍區，改以用地理方位（東南西北中）命名的五大戰區。「軍區」及「戰區」兩名稱一字之差，但本質上卻是由蘇聯軍制改向美國軍制的巨大變革。這是一場天翻地覆的權力結構轉移，造成許許多多將領在能力上和心理上的不適應。管理學的常識告訴我們，這場牽涉到二百餘萬人、六十年老傳統的組織變革，至

少需要五到十年的時間才有可能穩定下來。

我們必須在這個大背景下，來看已被退職的前「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洪光的激進發言，細細品味其說話方式和內容所透露出的政治內涵。同樣的，對於以前和日後的解放軍退休人士、在職邊緣軍官、打著官方旗號的邊緣媒體所發表的類似對台言論，都應該放到這大背景下來評價。在進一步分析前，讓我先歸納一個評價的原則：會叫的狗不會咬人，亂叫的狗一定被主人罵；一句話，當它是狗就可以了。

一言以蔽之，「軍區」改「戰區」，就是作戰指揮系統的改變。原來的「軍區」，本質上接近「山頭」，而新制下的「戰區」，在指揮系統下就代表「去山頭化」。原來的「山頭軍區」有什麼問題呢？最為膾炙人口的事件就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身為軍委主席、黨總書記、國家主席的胡錦濤，竟指揮不動成都軍區前進汶川救援，導致總理溫家寶講出「你們是人民養的，你們看著辦吧」。等到一周後成都軍區派人進入災區，連重型設備都未帶，士兵只有鐵鍬。

再遠一點的例子。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鄧小平調不動北京軍區，只能由其他軍區調兵入北京。在老的軍區制度下，中國有人戲言，對日戰爭不可能，因為如果對日用兵，一定得用上瀋陽軍區，那就可能部隊路經北京時就順手「把北京給端了」。

因此，習近平若要做政改，甚至經改，必須先做好軍改，這道理再簡單不過；軍事若不統一，連中國大陸內部都稱不上已經統一。在新的「戰區」制度下，戰區的最高將領只負責執行來自中央軍委的作戰命令，而無作戰行止的決策權。從西方的組織概念來看，這叫做「軍隊中央化」；用中國共產黨的術語來講，這叫做「黨指揮槍」。雖然中共從第一天開始就喊「黨指揮槍」，但事實上六十餘年來從來沒有真正完全實現過，否則毛澤東也不用一天到

晚怕被暗殺，所以他不斷分散、撤換軍權，甚至發動文革以自保。習近平要改變這歷史詛咒。

那麼，重點來了。在習近平的軍改新制下，是否作戰、何時作戰，是個百分之一百的政治決定。任何將領，除非在軍委會議中發言，都不得隨著一己的看法對外發表軍事政策。你能想像美國太平洋戰區的一個上校、中將甚至司令，即使退了役，在一個公開場合或電視上斷言美軍何時進攻南海某島嗎？若是真的，他將被以洩密罪軍法審判，若是假的，他至少會被撤職或取消一切軍職福利。

由於習近平的軍制改革尚在襁褓之中，因此像已退職將領王洪光（以及其他類似身分人士）這樣的公開發言，或許習核心還來不及制止。此人於習近平掌權的2012年去職時正值六十二歲，究竟是因為能力或心理不適應而被去職還是其他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原職副司令的「南京軍區」，掌管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個省軍區及上海警備區，對台軍事在其範圍之內。倘若他所講的「2020年前後攻台」屬實，那麼他就犯了國家洩密罪，連帶的提供他消息的昔日同袍也犯下了國家洩密罪。倘若他所言只是嘴砲，那麼他就是在挑戰習近平新軍制下的「作戰指揮決策出自中央軍委」的天條。

習近平正在進行一場影響全球的行動，不管世人同不同意他的方向，也不論其方向是否會成功，像王洪光將軍這樣的脫序演出，反映的還是那種「軍區山寨頭頭」的舊有傲慢，使人不得不懷疑，「習核心」是否已經真的樹立？軍改是否會順利？在職將領和去職將領之中是否存在無視於大局的反噬潛意識？如果連解放軍的嘴都管不住，還談得上管住槍？

尤其在美國總統川普全力修理中共之際，習近平或許不怕神一樣的對手，但一定得懲罰豬一樣的隊友。這是好話，豬一定聽不進去，但希望習能聽得進去。

中國有多少人真心想吞台？

這一節，可能不少人認為只是「一廂情願的自爽文」。但是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作為一個從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的親歷觀察者，以及具有二十幾年直接接觸不同年齡層、城市／農村居民、高層／底層無數朋友的人，文中所描述的現象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事實的基礎。

對於身在中國的讀者，在表達不快之前，請先問自己一個問題：你是否能區分中國和中共？與中國統一是一個議題，被中共統治又是另外一個議題。你周遭的人，包括你自己，願意被一黨專政的中共統治到永遠嗎？請表個態，如果中國人表態不願意被中共一黨專政統治到死，那麼與中國統一就是台灣人願意探討的議題。請你表態！

中國究竟有多少比例的人，真心擁戴共產黨吞併台灣（無論武攻還是文攻）？

中共文宣機構，包括那些被中共文宣半洗腦的台灣人，這問題的標準答案是：十三億人。因為中共文宣一天到晚說「台灣不要低估了中國十三億人的意志」（沒常識，應該說十三點五億人啦，那才是最新的總人口數字）。

我來算給你看：扣掉百分之三十學齡前兒童，剩下九億八千萬。台灣目前在中國工作、就學的成年人約八十萬（不含兒童和罪犯）。你若稍微了解中國社會生活，就會知道台灣人的正直、友善、包容，都會讓他們身邊的中國人感受到台灣有一種中國再過五十年都培養不出來的優點，因此每一個在中國的台灣人都至少會讓一百個周遭的人感受到台灣價值，而覺得台灣不應該被共產黨併吞。這又去掉了八千萬。

不久前在一次北京的涉台閉門會議中，一位研究台灣的少壯專家不避諱的說：「我發現凡是到台灣讀過書和自由行的年輕人，都對台灣有好感而開始質疑統一。」這群年輕人有多少？至少五十萬人吧。同樣的社會學原理下，他們對台灣價值的好感和對共產黨宣傳的質疑，會潛移默化轉變五千萬人。

同樣的，過去十七年，中國到台灣旅遊的團客總人數是二千六百萬人，其中有多少比例感受到台灣社會的待人接物和包容價值？算百分之三十吧，那就是七百八十萬人，回國後傳播的範圍就是七億八千萬人。我不知道你認識多少中國人，我認識無數，其中只要有家人到過台灣遊的，無一例外回家後就四處宣揚台灣的生活價值。

哎喲，這樣減一減就只剩下七千萬人了。再算一個一些讀者可能會產生不快的數字，但是科學就是科學。台灣是亞洲對同性關係最寬容的國家，凡是亞洲人都知道。根據科學文獻，同性傾向佔人口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就取最低的百分之四來說好了，上述九億八千萬成年人中，就有四千萬人會覺得台灣才是他們／她們的聖地，去掉這些知道台灣包容價值的群體，剩下三千萬。當然，這群體和前面所計算的群體會有重疊，但數字幾乎可以不計。

算下來，那麼衷心擁護共產黨的宣傳，一心想要併吞台灣的中國人有三千萬？不然不然，請容我由另一種結構性的分析來看問題。

台灣社會所稱呼的「中國人」其實可分三種：一、 一心要併吞消滅台灣的。二、 恐懼第一種人的威權，口中附和但心底知道若併吞台灣，其實是對未來的中國不利的（這包括許多中共高層黨員）。三、可以被洗腦的普通人，但可被洗向A方向，也可被洗向B方向。

第一種人是掌權的極少數，頂多二萬人，甚至少至數千人，他們是台灣的敵人。第二種人有幾億人，是台灣要懂得如何爭取統戰的人（可惜現政府幾乎完全不懂如何做，或故意不做以騙選票）。第三種人本來就是牆頭草，可以不必理他。

再進一步說，那些真心想併吞台灣的最多二萬人當中，絕大部分已經家人移民國外，因此中國境內死守共產黨真心賣命的台灣敵

人，只有數千人。懂得了這，就不要上了統戰機構和五毛的當。

我聽到一些人的評語了：解放軍就有二百萬人，這是硬碰硬的實力，怎能說中國真心想併吞台灣的人只有數千人？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下節談。

中國解放軍何時可攻台？

前節〈中國有多少人真心想吞台？〉，結論是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一心一意想要併吞台灣，使台灣置於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的人，可能只有數千人。文末自我提出一個大哉問：中國解放軍人數就超過二百萬人，何以解釋該文的結論？本節就此問題作一解析。

首先，是否武力攻台，乃政治決定，而非軍事決定。這個原理，舉世皆然，包括ISIS等恐怖組織都不例外。今日世界，已非千年前某國王或某家族一口氣嚥不下就可宣戰的態勢，甚至連近代的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等人物都已不可能再出現。還能夠「一觸即發」的戰爭，大概只還存在於非洲或中東的部落文化下。

上一次解放軍一心一意想啟動攻台的時間是1950年，由陳毅、粟裕集結了五十萬大軍於福建沿岸，但終因史達林想保留國民政府以制衡中共，而首先發動朝鮮戰爭，下令毛澤東把軍隊調入朝鮮戰爭而作罷。

在那之後，武力解放台灣就逐步變成了蘇、中、美三方權力棋盤上的政治議題，而非軍事議題。發展至今天，可說已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決策，玩家則只剩下美、中二國。

但這並不意味解放軍沒有攻台計劃，事實上計劃天天在進行，沙盤推演恐怕有幾十套。對所有軍事可能做推演乃軍人的天職，美國連登陸英國的沙盤推演恐怕都有好幾套。台灣人民需要關注的，不是解放軍攻台的恫嚇之言，而是台灣自己的國防、國安做的沙盤推演夠不夠格，還有中、美之間的政治角力態勢變化。

那麼，解放軍的「攻台能力」何時成熟？這問題，有點像在問你家何時「有能力」買120寸的最先進電視。如果家裡不買冰箱、冷氣機、洗衣機，如果客廳大小都超過一百平米，相信多數家庭都「有能力」買120寸的電視。這完全看你分給「買電視機」這個決定的預算比例有多少。

中國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在江澤民1999年割讓了相當於三十個台灣大小的爭議性國土給俄國之後），接壤的周邊國家有十幾個。新疆和西藏面臨著分離化和自治聯邦化的壓力，還有朝鮮背叛的風險，處處都需要軍力預算，這還沒說它想把南海內海化所需的軍力。邏輯上來講，中國的「強大軍力」足以解決上述的任何一個問題，就像倘若「傾全家之力」，很多人也可負擔一台120寸的電視，但人們不會這麼做。

還得考慮中國的內部分裂壓力。習近平在第一任內進行了徹底的軍事結構改革，目標是「能打仗、會打仗、打勝仗」。換句話說，原來的解放軍人數雖多，武器雖多，核彈導彈一個不少，但是卻「不能打仗、不會打仗、打不贏仗」。原先的七大軍區改制為五大戰區，原先的「部隊、武器、糧草分隔管理」供應鏈，改為學習美軍的「人、器、糧」一體化；這個絕大的動作，至少需要十年的時間才能初見成效，距離美國二戰以來不斷演進、修正、深化的軍事協作能力，還有幾十年。舊軍制下，最大的威脅是「不能戰」；1950年的韓戰和1979年的中越戰爭，中方慘烈的程度，至今仍是保密的敏感話題。新軍制下，最大的風險是「人、器、糧」一體化後的軍事政變。

最後，還有「玻璃心」問題。中共一黨專政的唯一立足點是洗腦後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唯一立足點是不能打一次敗仗。否則，民心可一日瓦解。

想像你是中共領導人，你會何時真心想攻台？

「和平」是台灣的底線嗎？

以上，談的是中共武力攻台的可能性及可行性其實並不高。但是，即使機率只有百分之一，台灣也得備戰。「武」這個字，字源概念上就是「止戈」—以戈止戰，在威脅下，備戰才是和平的基礎。

我的青年時期在新加坡度過（1969—1973）。新加坡小國寡民，當時只有三百多萬人民，北邊有人口大它幾十倍、土地幾百倍的馬來西亞，邊界只有幾公里的柔佛海峽，西邊有人口大它一百倍、土地大它近千倍的印尼，距離一百公里左右。

雖然身處兩個有敵意的國家之間，像是夾心餅乾，經濟條件薄弱如雞蛋殼，但是新加坡政府咬牙強調十八歲以下青年的最主要任務就是接受教育和學習，徹底採取英國學制，從制度到教科書，從通識到就業技能。十八歲是新加坡男孩的破繭時刻，管你學業優劣，先當兵再說，此刻是他開始真實意識到「原來新加坡如此危險，任何敵方只需要動動小指頭，新加坡在幾天之內就可以不復存在」。新加坡沒有「當兩年兵然後退役」這一說，四十五歲以前定期或隨時接受國家徵召，回營訓練。

新加坡是講究「和平」的，世界上沒有人相信新加坡會攻擊鄰國，但那幾乎是「終身役」的「戰備制度」，今天依然如此。

2015年希臘財政危機最高點，我恰巧在雅典，平民一天只能提款五十歐元，用餐時我給五美元小費，換來那位巨漢侍者的一個瞬間軍禮和響亮的「感謝你」，刻在腦中至今鮮明。財政再緊，人口少於台灣的希臘軍費不減，每年向德國採購的軍備佔德國軍備出口的百分之十八，而德國也因為要保持自己國內的軍事工業，大力支持希臘度過難關。窮得要死還要軍備，怕的是誰？希臘公民普遍認為，近在咫尺的土耳其由於歷史上的「大鄂圖曼主義」，隨時可能染指希臘。雖然憲政廣場上的示威老人對我說，希臘人恨死了政客和議員，當一屆議員貪汙個千萬美元不在話下。

希臘人愛不愛好「和平」？衰弱如希臘，「和平」是不是它的

國策？鏡頭拉回台灣。講到底，「和平」就是不打仗、不動武。那麼，台灣在世界上的立場，是不是不打仗、不動武？台灣對其他國家的底線，是不是不打仗、不動武？如果是，台灣要軍隊幹嘛？

往下談之前先澄清一點：本文中的「台灣」，隨讀者高興，可以用「中華民國」或者「台灣共和國」替代，因為名稱與文中講的道理，風馬牛不相及。

瑞士是中立國家，連正式的軍隊都沒有，但是瑞士的國策是不是不打仗、不動武？

瑞士人是山民，歷史上驍勇，但因國家小，經不起打，因此力求和平，從不挑釁。但瑞士人不是耶穌，被打右臉不還手還把左臉也湊上來，因此瑞士青年必須接受射擊訓練，有槍的家庭可能過半。

台灣人也不是耶穌。在和平這件事上，台灣應該清楚的劃出底線，以免他人誤會。這條底線就是：「台灣盡一切力量追求和平，但是不放棄在遭到武力攻擊時使用武力自衛」。

劃底線是每一個國家都該做的事，除非自認不是國家。一個國家不劃底線，就會有其他國家來幫它劃底線。當然，劃底線也可以講究修辭的藝術，但若修辭過了頭，就喪失了劃底線的意義。比如說，也可以把底線劃成如下：「台灣絕對不做一個任人欺負的國家」，但這樣修辭的「底線」模糊度太高了，底氣不足。

選舉到來，有人敢喊「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也有人敢喊「台灣正名制憲」，但就是沒有候選人敢劃底線，因為恐共或懼美；選民像沸騰的水，媒體吵得煞有其事，但沒有人要求候選人的底線政見。

台灣人民只敢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的權力鬥爭下，喊統喊獨，以親中仇中內部自我分裂、辯論該不該親美親日。也有人喊出什麼「和中親美」，但是，台灣沒有人敢於在與任何第三方交涉

時，劃出所謂「和平」的底線。這樣的地方，別人看得起嗎？

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台灣？

這又是一篇需要讀者先綁好心理安全帶的文章。過去，筆者曾經明確表達過兩個觀點：一、在（隔壁）大象的病情未好轉、瘋性未除之前，台灣需要偎大邊的西瓜是那些足以牽制病象行為的犀牛，主力當然就是美國。二、期待美國一步到位的承諾武力保衛台灣安全，這個念頭是等死。

看似矛盾？再加上一個看來更矛盾的問題：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台灣？

台灣要解套，不開腦洞是不行的。先繼續問幾個腦洞問題，這個腦洞開了，才能有意義的談下去。請回答以下三問題：

一、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關島？

二、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夏威夷？

三、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南韓？

關島是美國領地，美國自己打自己？夏威夷是美國一州，美國內戰？南韓是美國盟友，不打北韓打南韓？問這三個問題，是不是腦子進水了？

沒進水。答案如下：當關島、夏威夷、南韓被敵人佔領時，美國就會出兵關島、夏威夷、南韓。

歷史並沒有那麼遙遠。1945年5月31日，美國對台灣島進行「台北大空襲」（請見維基百科），死亡數千人，傷者二萬人。而當年，如果不是麥克阿瑟將軍的「菲律賓情結」，美軍登陸的將不是菲律賓，而是台灣，摧毀的不是馬尼拉，而是台北。

1945年8月9日，美國投下的第二顆原子彈，第一目標是小倉市，但因當時天候問題，被投彈的是第二順位的長崎市，死亡八萬人。這次投彈計劃，你猜台北市排在第幾順位？第十四位。台北，是在排行榜上的。

當一個戰略要地被敵人佔領時，美國就出兵攻打，管你是誰。試想，1941年，如果日軍不止偷襲珍珠港，而也派兵登陸，你認為美國會不會「出兵攻打夏威夷」？戰爭，就是戰爭，不是外交，不是吃飯談判。

現在，回到這篇文章的標題：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台灣？答案是不是很簡單了？當台灣島被美國的敵人佔領時，美國就會出兵攻打台灣。請注意，是「被佔領時」，而不是「被攻擊時」。

戰爭，也講究成本。麥克阿瑟沒能用更低的成本在1942年守住菲律賓，然後在1944年到1945年以數倍的成本，才奪回菲律賓。事後回頭看，美國一定懊惱，早知道就應該在成本較低的時刻果斷行動。

台灣島是兵家必爭之地，這句話大家都聽過，但聽懂了嗎？「兵家必爭」，就是當「兵家們」盯上你之後，命運就不由你決定了，而由「兵家們」決定了。因此，台灣的國防戰略思維，絕不能落在「打勝、打敗」的概念上，而應該聚焦在如何提高敵人的成本和如何降低朋友和自己的成本的概念上。

誰是敵人？就是第一個向你展開攻擊的那一方。誰是朋友？就是在你被敵人佔領之後，會攻擊你的敵人，幫你收復失土的那一方。我們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以台灣的實際國防力量，什麼樣的戰略、戰術安排，才能提高敵人的成本，才能降低朋友和自己的成本？

換個更精確的方式問這問題：如何在戰爭發生之前，就使朋友清楚判斷，什麼才是他們最低成本的時刻和方式？如何在敵人發動戰爭之前，就使敵人清楚認知，台灣有決心和技能，使敵人付出最高成本？

台灣能主動做的，就是使「兵家們」清楚知道他們各自的成本點。「兵家們」只有在清楚知道成本點之後，才不會輕舉妄動。但是，台灣目前內部在國安議題上的分裂不團結，使得「兵家們」極易誤判自己的成本點。這就是台灣的凶兆所在。

「兵家們」目前不清楚以下三個疑點：一、台灣人有多少比例願意為保護自己的土地、制度、生活方式而流血？二、台灣的各級「政治菁英」，有多少會選擇在危難時留守台灣？三、2020年的總統參選人中，哪一個人有意願使敵人付出最高成本？哪一個懂得降低朋友的成本？這三個疑點，將使得朋友無法做兩個決策：一、在台灣流血多少人數之後，才值得朋友的大兵為台灣流血？二、當台灣危難時，在哪階段介入才對自己的成本最低？

2019年一季，美日舉行了「太平洋奪島演習」，為了什麼？「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台灣，是否應該開始挑選一組「內鬥外行、外鬥內行」的領導團隊了？

當百分之一機率發生時，你拿不拿槍保衛台灣？

一場四十歲至五十歲男女的餐會上，什麼樣的問題可以保證現場氣氛頓然凍結，主人客人皆尷尬，而且沒人接得上話？試試這個問題：各位願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為保衛台灣而流血？

現在換成一群六十歲至七十歲的男女，題目由「孩子」換成「孫子」，你猜結果？

你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嗎？這可能是全台灣人最忌諱的問題，誰經常問，誰就會被拋出社交圈外；即使在家中，也會遭白眼。

現在說三個真實的故事，都是我的親身實驗。在聊天中，我向一位做過市議員的三十歲年輕女性提出這個問題：如果中共傘兵落地，而你身旁有槍，你會不會拿起槍保衛台灣？她沉默了幾秒鐘之後，對我說：我建議你以後不要向台灣的年輕世代提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問她。這次她不用思索電光一樣快的回答我：因為如果你問他們，他們會恨你！

我也吃驚了。不喜歡被問這問題很自然，但怎麼會到「恨」的地步？

過一陣子，在一場嚴肅的討論中，我對一位雖然才二十七歲但已經江湖經驗老到的研究生，男性，發出同樣問題：你會不會拿起槍保衛台灣？哈哈，我又吃驚了。他考慮了一會說：那要看美國的第七艦隊那個時候在哪裡，如果離台灣很近，我就打，如果離台灣很遠，我就跑。

看到這兩個案例，你有什麼反應？這兩位的反應，在你的反應範圍內嗎？如果你還沒感到意外，那麼我再講第三個案例。這次，二十三歲，女，剛大學畢業。聽完我的問題，她睜大美麗的雙眼望著我發呆，我以為她沒聽懂，就再複述了一遍問題。她這才開口，說：你問的問題不可能發生啊，如果中共要動武，一定是先派無人機過來掃射，怎麼會有傘兵呢？聞言我哈哈大笑，世代差距果然存在。

三個故事說完了。你如果把這當笑話聽，那就讓我們來設想一個情況，看看還好不好笑。現在，把發問對象換成2020年總統候選人，管他／她代表哪一黨或藍綠統獨，你猜他們／她們會怎麼回答？管他／她姓蔡、姓賴、姓吳、姓朱、姓王、姓張，還是姓柯、姓韓？

如果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候選人被問到這個問題，管他／她姓川普、姓歐巴馬、姓柯林頓還是姓桑德斯，你覺得他們／她們會繞著彎子迴避這問題嗎？

我建議在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的公開辯論會中，一定要把這問題加進去，而且是用YES／NO的是非題方式，而不能用申論題打混：不管為了什麼原因，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你會不會讓你自己、你的兒女、你的孫兒女，參加戰鬥保衛台灣？雖然我已經知道，台灣的各黨派、政府的中選會、各主要媒體，都沒有種敢接受這個題目。

我甚至懷疑，讀到這裡還沒生氣、還不「恨」本文作者的讀者，數量並不太多。如果全台灣的人都在迴避這個問題，那麼台灣

的「國家定位」議題，過去幾十年究竟在鬧什麼？

如果一百年前被定位為「怕死、愛錢、愛做官」的台灣社會文化，經過了這一百年，還加入不了一點點「賽德克．巴萊」的精神，那我建議修憲，規定只有純原住民才能參選總統和立委，或新進從越南、印尼移民過來的公民也可以考慮。

如果一條流浪狗，連續被三個主人拋棄，還沒意識到自己必須改變成一隻狼，那麼，是不是活該做流浪狗？

據傳，當年八國聯軍攻進北京城時，聯軍統帥瓦德西大惑不解，問：為什麼北京人不抵抗，男人寧可上吊殉國，女人寧可跳井自殺，也不拿起家裡的菜刀幹掉我們一、兩個士兵？大哉問！

哎呀，我是不是破壞了大家的心情，真是罪過！

為什麼不招募百分之五十女兵？

就像所有其他部門一樣，小小台灣的軍事部門處於大大的超載狀態。台灣的將軍比例，超過中東小鋼砲以色列，全球僅次於北韓；台灣的軍人總數，竟然有很長一段時間超過日本的軍人總數。

台灣的軍事目標只有一個：保家衛國。人若犯我，我必自衛。四面環海的小島國家，自衛之道僅有一個選擇：戰略問題交給政治，軍事上只走戰術，而且必須是絕對不對稱的戰術。在這原則下，當下的二十二萬軍人是一個超大數量。雖然馬政府時代曾有裁減至十七萬至十九萬人的計劃，但我曾私下請教過一位已退的國防部長：如果裁至十萬人，夠不夠保家衛國？答案是：在設備、科技、組織相應配套革新的情況下，可以的。再經請教多位曾任關鍵要職的實戰將領，結論是：只要排除非軍事上的政治干預和商業利益干預，發揮台灣最成熟、最擅長的軍事科技，不追求一些經過二十年才能半生不熟的技術，集中力量於不對稱戰術，純粹就保衛台灣為目標，在精不在多，十萬軍力是可行的。

如果總數控制在十萬至萬人，募兵制的可行性就大增；如果再提高女性比例，幾乎可說一定可達標。台灣軍隊當前女性比例為百分之八點二，美國是百分之十三，法國和澳洲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而北歐的挪威高達百分之二十六。各國女兵的軍種分布依次為空軍、海軍、陸軍。

如果把台灣軍中女性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呢？不要說我搞笑，請見理由。其一，台灣社會當下，女青年的向上心高於男青年。雖然僅佔軍中百分之八點二，但已經在各個角色出頭天，從飛行官、傘兵、電子兵一直到陸戰隊，其表現優異的比例，超過男性。這已是軍界都知的事實。其二，在台灣文化下，女性傾向追求「成就認可」。而男性除了「成就認可」之外，還會猛追權力和金錢利益。而軍隊必須職業化，不能成為權力場和利益場。其三，台灣只打自衛戰，靠的是具有不對稱威力的武器設備、精巧的操作、細緻的流程，這正是女性的長處。雄三誤射，如果現場是一群受過訓練的女兵，不太可能發生。倒過來說也一樣，如果是有目的的發射，女兵肯定強過男兵。

十萬至十二萬職業軍人，男女各一半，這樣的配置，我比較有信心。

太平島的使用，應該國際競標

對於太平島的使用，據報導近兩年來有人士建議政府，可以租借給美國。若事態往這方向發展，個人覺得並非最佳方案。甚至這思路會使太平島的作用，由台灣手中的一張好牌變成一張爛牌。

台灣對太平島擁有實質主權（de facto sovereignty），當然可以基於國家利益，對太平島做出任何處置。但是，太平島處在最敏感的南海區域，一個世界戰略界一致認為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區域。因此，太平島怎麼用，不但牽涉到台灣自身的國安，也牽

涉到南海諸國的安全和中美在南海對撞的機率，乃至整個世界的安全。

處置太平島的尷尬局面，來自以下的幾個事實：如果台灣恢復駐紮正規軍隊，等於是主動挑釁中國及南海諸國；如果台灣退守，中國就會伺機入駐，因此美國不會同意且南海諸國亦不樂見；如果台灣將其租借給美國使用或默認美國可使用，則會給中國口實而急遽拉高台海緊張局勢。

動也不是，靜也不是，尷尬。如果只是尷尬倒也罷了，怕的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或美國先利用太平島出招，逼迫台灣表態。待到那時，台灣就處於完全被動的凶險境地。

除去了駐軍、退守、租借美國三個選項，還有沒有第四個選項？幾年前曾想建議一個另類方案，但因過於敏感而未成文。但在今天南海、東海局勢日益緊張，中美對撞大盤已然形成之下，也不妨將這另類方案提出供各界參考。

台灣雖然在國際上缺少法理主權（de jure sovereignty），但包括無邦交國在內的許許多多國家，都接受台灣的實質主權（de facto sovereignty）。並且，所有國家都知道，台灣最不需要的就是軍事衝突。

這極為特殊的世界地位，其實給了台灣一個極為特殊的條件：作為一個缺少法理主權的國家，台灣其實沒有完全的義務遵守以「法理主權」為先決條件的國際法或國際仲裁，而可以有創意的施展實質主權。

以太平島的處置為例，辦法如下。一、台灣向國際宣布太平島為「中性化領域」（Neutralized Zone）。二、台灣把太平島劃分為兩塊，對聯合國內所有成員國之中的任何二國，開放租借太平島，展開公開透明競標。請注意，以上說的是「中性化」（Neutralized）而非「中立化」（Neutralitized），這兩者在國際法上有著微妙差異；後者的提出需以法理主權為基礎，而前者不

必。因此，台灣可用參加WTO的主體身分進行此競標。

競標條件只有五項：一、一美元起標，競標期內出價最高的兩方得標。二、租借期為九十九年，只得作為和平使用。三、得標兩國與台灣簽訂協議，租借期內互不武力侵犯並協防台灣安全。四、太平島海域內若產生經濟利益，台灣可得其中一定比例（例如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五、倘若流標（競標者不符合前述條件或沒有國家競標），則此標案永久有效，台灣隨時可再度啟動招標。

這個處置太平島的方式的好處是：一、將太平島這個變數，由南海衝突的公式中移除。二、保障了台灣的國家安全。三、最高分貝的向世界表達了台灣追求區域和平的願望。

台灣社會幾十年來都把「缺乏法理主權」視為台灣最大的劣勢，殊不知在法理主權和實質主權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彈性運作空間。有些模式，只有像台灣這樣的「夾心餅乾」國家才能倡議。

台灣必須跳出盒子思考。如果台灣可以如此對南海和平做出貢獻，那麼東海和平呢？誰說台灣只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台灣也可以成為一個不沉的「中性寶島」，也就是「A Neutralized Formosa」。

台灣如何防止中國「金融犯台」

此文討論的是台灣在2020─2022年之間的各種「防身術」，和香港有什麼關係呢？答案是：金融貨幣避險。筆者判斷，人民幣及港幣可能於近期崩跌（參照〈美對中「貨幣戰」、「主權戰」的前兆？〉一文），而台灣金融資產和投資標的，高度和人民幣及港幣相關。無論是人民幣或港幣中任何一者，若和美元脫鉤，台灣的相應損失，據業界估計，各在五千億至一兆台幣之間。若在目前巨大

政治經濟壓力下，兩者皆和美元脫鉤，那麼台灣的總和損失將達一兆至兩兆台幣之間。這是台灣難以承受之重，因此必須敲警鐘。

台灣應該做「金融漢光演習」

2008年，美國五角大廈做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金融珍珠港」兵棋推演，假設遭遇到不友善的金融突襲，結果慘烈潰敗；整個兵推過程被記錄在《下一波全球貨幣大戰》這本書中。

台灣六十年沒發生戰爭，但每年還在做軍事的「漢光演習」，沒有一個台灣人認為這是神經病。但是，倘若政府來做一場公開的「經濟漢光演習」或者「金融漢光演習」，恐怕許多人會認為那是神經病的行為，包括政府官員和企業家。

事實上，我甚至懷疑在所謂「民主化」以來，歷屆政府可曾做過任何認真的經濟兵推和金融兵推（即使是祕密的）─假設台灣面臨瞬間大範圍、高撞擊的經濟危機、貨幣危機，該如何提前偵測到指標？如何應對？如何防禦？如何復原？

這是中央銀行、公股銀行、金管會、經濟部、國發會、國安會、國防部的集體失職。這樣的責備對不對？是不是神經病？我們只需要問自己兩個問題就可回答：一、萬分之一機率的彩券你是不是也在買？二、為了千分之一的戰爭可能性，每年舉辦漢光演習你覺得值得嗎？

經濟兵推和金融兵推事實上不用花錢，不做或沒想到該做的原因只有兩個：一、自欺的鴕鳥心態。二、不敢面對現實，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推諉習慣。

當然，這兒主要指的是來自台灣的大象鄰居─中國的經濟形勢。該做這兩種沙盤推演的「領先指標」其實已經到處都是；全球所看到的中國房產、金融、股市、私企的危機，其實一句話就說完了：今天連習近平都不知道衍生債務有多少？錢窟在哪裡？術語叫做「流動性的系統危機」。

這也不稀奇，就像2008年時美國政府也不知道錢在哪裡，只能再印鈔票解燃眉之急。飲鴆止渴惡化了國內的信用危機，蔓延到境外，就成全球金融危機。

問題是，中國的經濟體質，迴轉能力可能連美國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當下被政治強力摀住的經濟和金融系統性危機，若不幸在中共二十大前後內爆，以台灣與中國將近一半（甚至遠超）的貿易相關度、台商在中國的投資數千億甚至近兆美元的事實，政府現在不做兵推演習，難道打算讓企業「大難來時各自飛」？

慎防台灣成為「香港的備份」

下文將論及，圍堵及遏制中共已經是美國板上釘釘的共識。而台灣在這大戰略之下，很快的會被美國「借名片」，並提出了四種美國向台灣借名片的方式。另一端的中共，過去數十年的對台戰略一直在「武力征服」和「和平一國兩制」之間游移，但是在新的美國大戰略下，我們不能忽視中共對台可能產生一種妥協式的新策略定位：把台灣當作過去的香港來用，或稱「香港的備份」。

在1997年英國把香港歸還中共政權之前，尤其在1979年美國承認中共政權之前，香港是北京和世界的經濟窗口，一切西方對中共的封鎖，北京都利用香港作為貿易、金融、技術的突破口。香港成為中共與西方經濟交道的代理站、緩衝區、化妝室、中轉站。而今，美國的制共大戰略已經傾向把香港等同於上海，開始對香港設防，甚至可能直接將香港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一體適用於美中貿易條款。這都是由於中共片面違反對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而開始肆無忌憚的打壓香港言論自由、跨境任意逮人、破壞香港金融信用以圖家族私利的結果。

一段時間後，在美國圍堵制共大戰略下，香港作為中共與西方經濟交道的代理站、緩衝區、化妝室、中轉站的功能，將大幅下降，中共必須找一個替代角色以作為補充點。台灣就可能進入中共

的眼簾。

這樣說，好像有一個矛盾點。既然美國將向台灣借名片以圍堵制共，加上台灣社會的主體性追求，台灣又如何可能成為「香港的備份」呢？但如果台灣人有能力跳脫二分法的簡單國際觀而用馬基維利現實政治邏輯來看世態的話，應該就能意識到這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有了意識，才可能進行防災準備。

過去曾論及，美國和中共政權將在幾年內達到一種新狀態，主導未來二十到三十年的亞洲格局。這個時間點，最可能落在2022年之前，因為從現在到那時，有三件事將迫使美國和中共做出各自的決斷：關係到誰是總統的美國2020大選、關係到習近平終身制是否能實現的中共2022年二十大，以及台灣的2020大選。

在此分析下，從半年到2022之間，視事態演化，美國會向台灣借名片。但借哪一張、如何借，目前尚無定論（請參考本書第六章〈川普如果向台灣借名片〉一文），然而必然落在美國大戰略光譜的兩端之中。這光譜的一端是打趴中共、改變中共一黨專政的體制，另一端是繼續承認中共是中國的唯一統治方、但是拖延中共全球野心至少二十年。但在馬基維利現實政治下，這光譜兩端的中間，存在各種可能的灰度。

可能的灰度之一，就是美國向台灣借用某張名片以助其戰略目的，台灣的安全得到比現在更高的保障，但是對中共對台灣的非軍事利用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共方面則暫時不提武力統一或一國兩制，退而求其次把台灣視為「香港備份」，放軟身段以卸下台灣公民的心防，以替補香港喪失的與西方經濟打交道的代理站、緩衝區、化妝室、中轉站的功能。

台灣的自由放任，若說世界第一恐怕也不為過。但是台灣的民主法治程度，距離其享受自由的應有匹配度相差甚遠，尤其是法治方面。試問，這樣狀態的台灣，能夠抗禦來自中共的全方位軟性「香港備份」攻勢嗎？

過去已在幾本書、數百篇文章中論及，台灣雖有選舉，但是若政治體制不改，公民意識不提升，台灣是難以長治久安的。這些該改的政治體制諸如「黨府一家」、誰執政誰通吃的「江山觀」，而選民該提升的部分主要在丟掉「政府是用來給我好處」的「百姓觀」，而代以「投票是用來挑選政策」的「公民觀」。

有人用「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句話來警示台灣人提防中共，但有人想到過「昨日香港、未來台灣」的可能性嗎？「自己的台灣自己救」這句話，應該提升到「自己的台灣自己長進」的高度了。但我不確定多少人知道這兩句話之間的意義差別何在。

一國兩幣，還是一國一幣

2019年，倡議多年的「大灣區」計劃，北京正式啟動。這個涵蓋珠江三角洲九大城市加上港澳的經濟區的面積是台灣一點五倍、人口七千萬的核心產業群，比起北京的「一帶一路」全球計劃實際得多了，因為「一帶一路」操之在人，而「大灣區」操之在己。

「大灣區」對台灣經濟當然是個挑戰，但挑戰是長期的，短期的是風險─匯兌的風險。主要風險在於：一至三年內，北京對包含香港在內的大灣區，將維持現存的「一國兩幣」─人民幣及港幣，還是會走上「一國一幣」─取消港幣？

港幣眼下所存在的貨幣壓力，外人未必得知。首先，美國白宮團隊已經數度暗示，既然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國兩制又明顯受到破壞，那麼香港作為WTO獨立經濟體的地位，已經沒有基礎。未來白宮對香港可能採取與中國本土一視同仁的政策。

其次，港幣對美元匯率老早就已經突破香港當年所承諾的一比七點八久矣，貶值的下行壓力巨大。北京現在玩的花招，美國看在

眼裡，那就是在人民幣外匯短缺的狀況下，通過港幣的信用和流通性，換取外匯。因此，港幣現在的實際發行量，究竟超過香港官方發布數字多少，很值得探究。

中國八、九十年代的主要金融手法之一，就是支使自己完全可控制的國營企事業之間互開發票，進行虛假交易，以美化財務報表以及虛增GDP。當年全中國企業都知道的一個笑話是這樣的：兩個國營企業的老總打賭，只要對方吃一坨狗屎，就開一張十億人民幣的發票給對方，結果兩人都吃了狗屎，兩家的業務額各增十億，國家GDP增加二十億。今天，若中國、香港兩地金融機構玩同樣的把戲，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大灣區之後，類似的把戲機會就更多了。

因此，港幣會不會虛脫？會不會主動或被迫與美元脫鉤？台灣必須納入今後的「金融漢光演習」，因為台灣在香港投資風險巨大。甚至，港幣會不會因為人民幣的金融壓力而被「統一」為人民幣，成為「一國一幣」？如果是這樣的話，台灣如何應對？

中國內部現在的通貨膨脹、人民幣購買力低落的速度驚人，北京在人為的支撐「境外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並依此調節港幣換取外匯的通道。但這遊戲玩不久了。

第四章

從灰犀牛到黑天鵝：美共文明衝突下的台灣安全

第四章

從灰犀牛到黑天鵝：美共文明衝突下的台灣安全

【前言】

2018年初美國發動對中國的圍堵，筆者第一時間就判定這絕不是什麼簡單的「貿易戰」，而是美國耽誤了二十年之後，對中國發動的「經濟行為規範戰」。北京一開始沒看懂（事實上到現在還沒完全看懂）。直至本書出版時，事態已經升級為全面地緣政治戰，困局中台灣首當其衝。本章收集了兩年以來的事態分析，許多在兩年前和一年前做出的預測，現在已經成為事實。

本章對川普總統這個人，多有著墨。雖然本章對川普的評價和判斷，多數寫於2017–2018年間，但是從他2019年對華為公司還有關稅談判中所出的重手，足以看出筆者一、兩年前對他的策略之判斷是正確的。

本章各節所述，時間軸上有些交錯，但要點可總結如下：一、川普及其團隊，以及參眾兩院，已達到一個最大共識：美國二戰以來的傳統霸權已經撐不住了，非變不可。二、但如何變？廣義的共和黨和廣義的民主黨的解方相反。三、民主黨傾向於「強化既有體系並修補國際關係」，共和黨傾向於「打掉重練」。四、川普團隊就是打掉重練派中的急進派–先破壞舊有秩序再重建。五、由於中共的傳統宮廷權力結構，習近平身邊的策士不是看不懂就是不敢對他說實情，加上習的政敵上下其手，導致白宮很順手的就把中共列為頭號對象。六、川普以中共為頭號對象，打掉傳統的國際多邊結構，是對是錯、是否成功，不管他是否連任，五年後見真章。六、台灣成為白宮和中南海棋盤上的關鍵棋子，有危機也有轉機。但台灣當下陷入選舉瘋狂，沒人關注美中土石流的災害控管，這是凶兆。

拿破崙已經死了，但中國不知道

這一節是寫給中國人看的，不是寫給中國共產黨看的。當然，中國共產黨有將近九千萬的黨員，他們也都是中國人，也是目標讀者的一部分，只是希望不要誤會此文是專門寫給中共看的。

拿破崙，還有他之前、之後的所有帝國打造者，都已經死了。即使出現「換頭延壽術」，今天世界上，已經不可能再有一個國家，靠著一小撮核心領袖配上數百、數千位死忠人士，就能夠打造出一個帝國了。簡單決斷的說一句：那個時代、那種歷史條件已經過去了，而且永遠不會再來。

或有人說，現在美國不就是一個帝國？以全球百分之四的人口佔用了全球百分之二十五的資源，而且到處煽風點火，手伸入了全球每個地區？

這些現象是事實，但有一個重點不能不察：美國沒有拿破崙，過去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原因很簡單：美國內部的權力和勢力太分散了，分散到了「拿破崙們」一冒頭就會被壓下去，哪怕這些好漢舉的大旗是「美國夢」、「復興大美國」、「美國第一」。

美國是個霸權，但靠的不是拿破崙精神；拿破崙精神是「法蘭西夢」、「復興法蘭西」。要理解美國得以形成霸權的本質，不能從美國政客口號（管他叫川普還是她叫希拉蕊）中理解。該追問的問題應該是：一個權力勢力如此分散，誰也不怕誰的數億人社會，究竟是通過什麼樣的人民態度和社會機制，導致它能夠形成並維持霸權？

先把美國霸權是善是惡、對世界是利是弊這問題放一邊。它證明了一件事：不需要拿破崙式的英雄，不需要使領導人上斷頭台，一個國家也可以稱雄世界、維持地位、給予公民信心。

雖然中國的人均收入還不富裕，但總體經濟已經世界第二；雖

然中國的人口壓力世界第一，但假設人類的平均IQ是100，中國的IQ總量也是世界第一。中國未來是否能有面子的立足甚至稱雄世界，關鍵在於能不能通過態度和機制，把那世界第一的IQ總量的潛力發揮出來，而不在於有沒有拿破崙、有幾個拿破崙。

因此，中國目前所面對的所有內內外外壓力，其最終命運都可以歸結到一個疑問上：中國人民有沒有相應的態度，掌權者有沒有見識及心胸以設置相應的機制，使得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IQ總量，轉化成為生產力、自信心和文明力？

懸念，不在於有沒有拿破崙，而在於是否意識到拿破崙的世界已經過去了。

弔詭的是，拿破崙的世界距今才兩百年就已經一去不再來了，而近期才被北京大學考古學隊證實的四千年前大禹治水事蹟，其歷史教訓卻依然存在。水，只能導，不能堵。拿破崙，已經不成為學習對象，但，大禹卻不能不成為學習對象。

在信息飛速扁平化，科技三年一翻轉，青年世代價值五年一翻轉的世界中，民意如流水這句話，已經由比喻成為現實。堵得了一時，堵不了十年。中國急迫需要的是治水專家，而不是堵水專家。然而，我們看到的現實是治水專家越來越少，而堵水專家越來越多。

更觸目驚心的是，堤防越築越高的時候，越來越多人以為拿破崙的時代條件還存在於今世。

世界已經不一樣，美式霸權也正在式微中，世人正在期待一個「大禹式」的大國。世人最害怕的是，橫空出世一個「××復興」的另一個「拿破崙式」大國，這裡也包括俄國。如前所論，美國霸權即使沒落了，過程中也不可能出現拿破崙。正如當年英國霸權沒落了，也沒出現拿破崙。但是壓力下的俄國呢？壓力下的中國呢？世人沒有把握。這份「沒把握」之心，如同其他民意，只能導，不能堵。

中國要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要幾百年站得穩穩的。與這目標最為背道而馳的公式就是：上面一群拿破崙，下面一群義和團。這其中的道理，值得所有中國人琢磨。

與中國「拿破崙情結」下的「習近平現象」，對比鮮明的就是「川普現象」。川普現象將深刻影響台灣的前途，這已不用多說。美國與中國的對衝，已成定局，要了解這場對衝的本質，還得先對川普以及習近平的特質及處境有所了解。這裡，先談川普的劇本，下一章再談習近平的劇本。

川普是不是「小明同學」？
台灣應該了解的川普

世界上每個國家的領導人都有多面性，美國總統川普也一樣。喜歡他或討厭他，那是個人私領域的事。但在公領域中，台灣人必須從「台灣優先」的角度去抓到川普的特質，就像川普從「美國優先」的角度去抓世界政治一樣。因此，底下對川普的觀察與分析，無論是讚揚或批評，都基於一種務實態度─如何與川普政府打交道才對台灣最有利。

小明的故事你聽過很多了，這裡是一個。老師問王同學：你口袋裡有九塊錢，然後你去向小明同學借一塊錢，現在你口袋裡有多少錢？王同學回答：零塊錢。老師大怒說：你根本不懂算術。王同學回答說：你根本就不懂小明。

再來一個真實的故事。1987年，當時四十歲的川普出了第一本書《交易買賣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裡面說了一個他小時候的故事。他和小他兩歲的弟弟在玩具間裡玩積木，川普想堆砌一棟大樓，但發現自己的積木不夠，就和弟弟說，你的積木先借我一下，等一下還給你。他弟弟出去了一會，回來後發現哥哥川普把所有的積木堆成了一座大樓，他吵著要拿回自己借給哥哥的積木，伸手去拔那些屬於他的積木，這才發現哥哥川普已經用強力膠把所

有積木都黏起來了，大樓已經成型，回不去了。成年後，川普的弟弟提起這件事說：難怪你會變成現在這樣。

了解川普的交易原則，其實不難，因為他自己都已經完全說出來了。在《交易買賣的藝術》這本書中，他提出來的原則如下：

一、交易就是要獲利，而且要為了享受交易過程而交易。

二、交易的最高境界就像畫家作畫，在白色的畫布上完成作品。

三、交易越大越好，越大越爽。

四、不管嘴巴上怎麼說，心裡永遠不能關閉任何一種選項（options）。

五、不管對方通過中介開出什麼價錢，永遠說不夠，一直到見到真正做決策的背後大老闆為止。

六、不管數字上看起來多誘人，最後還是得相信你的直覺。要記得：你這一輩子所做過的最好交易，可能就是那筆被你拒絕了的交易。

七、守住你的風險下限（downside），如果那交易帶來好處（upside），好處自然會變成自走砲，不需要你擔心。

八、選項（options）越多越好，即使在交易完成後，你也得至少準備六種供選擇的進行方案，因為事情在中途很可能發生變化。

九、了解市場，親自調研，不要相信別人給你的數字。

十、沒有槓桿點就不要做交易。

十一、最好的槓桿點就是你的實力。

十二、你的槓桿點必須是對方想要的、需要的，最好是對方不能放棄的。

十三、有的時候，唯一剩下的交易槓桿點就是對立衝突（confrontation）。

十四、交易成不成很難說。因此，盡可能在同一時段內進行多場交易，這樣交易成功的件數就會增加。

十五、最後，交易談定後一定得如約交貨，不能偷斤減兩。

以上是我由書中整理出來的十五條原則，幾乎每一條都可以用來衡量川普接下來一張一張「台灣牌」的背後用意。幼年的川普，或許就是一個「小明同學」，但成年的川普，早已比小明高明，而且講究「公平交易」，但對價關係還是由他說了算。

此外極為值得參考的是，美國大選投票之前，知名的「總統心理學」研究者，美國西北大學教授Dan P. McAdams在《大西洋月刊》發表的一篇長文，細述了川普的人格特質。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結論是：川普若成為總統，將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會演戲的總統，他的演員功力，強過好萊塢出身的雷根總統，而且不需要劇本。台灣，也得會演急智戲。這點是我比較擔心的。

川普之道：
「商道」、「政道」與「兵道」

若問一百個傳統的職業政客，可不可能用大企業集團的治理方式來治理一個國家？答案一定是「不可能」。然後你會被訕笑。企業治理用的是商道，治理國家用的是政道；前者講究競爭和效率（efficiency），而後者講究權謀和效果（effectiveness）。

現在川普來了。他要證明給你看，管企業的方式也可以用來管國家，而且效果會更好。不但如此，他還狂到要用商業方式管理國際關係，要世界等著看。如此，他只可能有三種結局：第一，全球

抓狂、美國抓狂，然後他被請下台。第二，他自我悔悟，連換幾次內閣，摸摸鼻子，改商歸政。第三，他成功推翻二戰以來的世界秩序典範，改寫政治學課本。

以商業思維打先鋒，武力做後盾以建立地球秩序，其實不是新鮮事。整個大航海時代都是這樣幹的，荷蘭人的私營東印度公司也是這樣來到台灣的。我們或許會認為那是四百年前十七世紀的事，在今天的「主權國家」體系下，政府才是國家的代表。這看法沒錯，但並不完整。

這裡和政治學者、國際關係學者抬個槓。若先不談軍事武力，只談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請問今天地球上的秩序，是由各國「政府」維持得多一點，還是由蘋果公司、Google、臉書、電信相關公司、富士康、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航空公司、海運公司、影視娛樂相關公司（如好萊塢體系）維持得多一點？

如果把這些種種公司統稱為「商界」，那麼維持世界秩序的究竟是商道多一點，還是政道多一點？究竟商界是政界的配套，還是倒過來，政界是商界的配套？

軍事武力可稱為「兵道」，一個大問題來了，兵道應該維護的是商道還是政道？大航海時代，兵道維護的是商道，所以當時多數戰爭的本質是維護商業秩序的，例如鴉片戰爭。一旦兵道為政道服務，亂子往往更大，例如一戰、二戰。冒出的人物例如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

美國的兵道，二戰剛結束時多為商道服務，後來逐步為政道服務而成霸權。如果一個在政治上白目無知的川普，能夠將兵道往商道這方面傾斜，其實也不錯。

台灣一直試圖在理解川普的政道和兵道，但疏於理解川普的商道，這可能導致台灣在2019─2020年之間，錯失關鍵時機點，或者誤判形勢而犯下致命錯誤。

川普的「地產世界觀」下的台灣

2016年12月2日，在美國傳統基金會和友台人士的運作下，就在季辛吉與川普會面後奔走北京之際，準總統川普打破一貫美中外交禁忌，接了蔡英文總統的電話。這件事對台美關係、美中關係的餘波盪漾至今。那通電話是川普以「台灣牌」試探中共的開始，他在掂量台灣有多少積木可以借給他玩。即使在就任以前，川普貼身團隊的腦中就已有一個「中國關係」的雛形社區圖，而在這張圖中處於「水岸第一排」（第一島鏈）的台灣，被他選中為「中國關係」的槓桿點。台灣已經坐上一趟不知終點為何處的雲霄飛車。不論過程如何，我們都得了解川普的交易風格，並且永遠記得一個交易原則：有借有還，再借不難。

川普當選後，世界各國措手不及，都把他的政策宣言視為「黑天鵝」事件。達到的初步結論無非什麼「美國重返孤立主義」、「扭轉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放棄亞洲霸權」、「華爾街要遭殃了」等等。但我一直認為，「川普主義」絕對不是什麼黑天鵝，頂多只是一隻灰天鵝，或一隻因基因突變而長出幾束黑毛的白天鵝。未來的台美關係也應該作如是觀，不要因為剛好遇到突變長出的黑毛而樂，因為那黑毛也有可能置台灣於死地。

原諒我用如此簡單的比喻來看川普主義，但往往最簡單的比喻才能觸及事情的本質。川普的骨髓是個大地產商，川普主義就是「地產世界觀」；地產的本質，就是一個項目一個項目的評估。相對而言，其他的經濟活動如貿易、金融，靠的都是「流動性」，輸贏不來自單一固定項目的成敗，而來自「網路式的系統成敗」。

地產商不會像其他企業一樣，把產品當作自己一輩子的孩子，而是追求每一個項目的獲利了結。然後協助組建「所有權人管理委員會」，擺脫地產商和該項目的最終責任關係，但若可能則繼續賺管理費。

在國際關係上，在「地產世界觀」下，每個國家都可視為一棟大樓，每個區域都可視為一個社區；自己的大樓、社區自己負擔管

理費，若需要第三方的服務如保全，對不起，請付費。

在「地產世界觀」下，倘若川普不了解什麼叫「第一島鏈」，那只要告訴他那就是「水岸第一排」，他三秒鐘就了解了，用不著長篇大論的分析。再如，川普不喜歡TPP，並不是他不了解自由貿易可以賺錢，美國不可能什麼都自己做而不要國際貿易，而是他用地產商進行「都更」的概念看十二個國家組成的TPP。如果你是地產商，你願意進行十二棟產權人不同的大樓的「聯合都更」嗎？（一棟文林苑就可以搞死你，何況十二棟聯合談判）。川普要一棟一棟的分開談判處理，他認為「聯合都更」是最笨的事、吃力不討好賺不到錢的事。

台灣，對川普而言就是一棟有產權爭議的大樓，他個人不會有什麼偉大的理念來介入產權爭議，但是美國憑什麼不能向這棟大樓出售機電設備和保全服務？何況，台灣是「水岸第一排」內一棟好樓，砸爛了會影響整個水岸第一排的價值和財源。因而，他不會允許任一方做出砸爛台灣的動作，包括台灣自己。

相對於川普，希拉蕊代表的是二戰後主宰美國的「流動世界觀」，也就是通過系統性的資源流動（貿易、金融、資訊、人才），築成一個牽一髮動全身的霸權網路。這個網路，近五年來已經嚴重鬆動，修補費用已經超過了美國國力，這就是川普的「地產世界觀」能夠脫穎而出的大背景。

川普必然同樣重視美國的地球霸權，在軍事上和流動性資產上，他不會讓一步的，只是定價標準和價值組合不同罷了；必要時做交易，一棟一棟的「地產觀」會讓交易的決定更容易、更快速。作為水岸第一排中一棟單獨的大樓，台灣不能高興得太早，因為在「地產世界觀」下台灣就是一棟樓。東協十國，就是十棟樓，雖然這十棟樓有意共用穿梭社區和捷運站的聯合巴士。中國就不是一棟樓了，而是美國最大的地產競爭商，川普會用地產商對地產商的競爭邏輯來定位中國。

總結：川普的國家經營核心概念是「交易」，他罵希拉蕊、民

主黨的話都出自內心，但真正的信息是：你們的生意策略太爛了，雖然肥了高管，但搞得公司賠錢、員工薪水低落，換我來表演給你看，保證公司賺錢、員工加薪、市場佔有率還重返第一。這條「川普公式」下，任何交易都可能。台灣不能誤會了，得步步為營、如履薄冰，不能把交易關係當愛情。同樣的，北京也不要氣憤得太早，請教一下王建林、王石、任志強這樣的地產界人士，可能比請教學界或季辛吉還更管用。

萬一川普演化變成季辛吉？

你討厭川普嗎？如果是，我打賭你多半討厭的是川普的「價值觀」。怎麼可以在貿易上只顧美國的單邊利益？怎麼可以強拆偷渡客的家庭？怎麼可以不顧人類命運，退出防止地球暖化的巴黎協定？

但若換一個角度，改由「秩序觀」切入，將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川普。政治的內涵，就是「權力及利益的秩序」；無論是美國的開國元勳或被稱作「獨裁者」的那些人，其腦中都有一種對於權力和利益的秩序觀。人們可以因為自己的價值觀而同意或不同意某種秩序觀，但是在思維邏輯上不可混淆這兩個層次，否則只會越辯論越糊塗。

舉個例子：季辛吉的成名作–聯中制俄，並不是因為他在「價值觀」上認同中國而不認同蘇聯，這兩方在當時都是極端的共產主義一方，在主流的「美國價值觀」下都是惡棍。推動季辛吉的是一套他對世界的秩序觀–哪種秩序最能保持世界的權力穩定，以及維持美國的最大利益。他的上司尼克森總統，原來在「價值觀」上是個堅決反共分子，但在「秩序觀」上被季辛吉說服，因而才有了美中建交、蘇聯解體、東歐解放，也直接形塑了今天台灣的尷尬地位。

那麼，驅動川普做出那許多古怪動作的是他的價值觀，還是他

的秩序觀？在這問題上，台灣必須絕對清楚辨識，否則誤判的代價台灣承受不起。

川普之前，世界似乎已牢牢釘在「價值觀掛帥」的理念上。不但西方如此，連明顯踐踏人權的中共，都被迫絞盡腦汁構思種種歪理來證明它的價值觀才是正確的，甚至ISIS都要用價值觀來解釋自己的行為。種種發生在地球上的大事件：金融危機、難民危機、氣候危機、伊核危機、朝核危機，眾人多用「價值觀」來作辯論的基礎。一直等到一個叫川普的人出來大喊：夠了，不要再虛偽了，一切問題都是因為舊秩序無法再支撐現況了，世界需要一個新秩序！

弱勢小國如台灣，別再管川普的價值觀了，那和我們沒什麼利害關係。我們必須深究的是川普的秩序觀，萬一川普是個季辛吉呢？他在四處打爛舊秩序，那麼他要建立的「川局」新秩序長什麼樣？台灣要如何成為得利者而非受害者？這才是政府、媒體、學者應該致力的方向。

「貿易戰」其實是「經濟行為規範戰」

美國對中國中興公司的禁運令，事實上已經調查醞釀了好幾年，從歐巴馬政府時代就開始了。但大多數人，尤其是中國人，還把它視為川普政府對中國經濟制裁的起始動作。

國際政治上，尤其是大國之間，永遠有一股「形勢比人強」的力道，有如氣候、地震的力道不因人而改變。川普也好，習近平也罷，這股力道都不因人而變。政治人物、政治勢力、各領域領導人、主流菁英倘若對形勢力道所發出的前期信號具有超強敏感度甚至直覺，即使不能緩和形勢，至少也能先做足防颱防震的準備。

對美國過去半年來所喊、所做的經濟制裁，中國當前至少對外還處在「叫板」和「奉陪到底」的架勢，「美國不過紙老虎一隻」的輿論氣氛也甚囂塵上。中國一方面在南海加速軍建，空軍進入西

太平洋順道繞台，另一方面外交上則期待利用北韓棄核機遇調整美國氣焰。這些動作，我總結為：美國及其西方和亞洲盟友，已經掌握到了一股「形勢比人強」的要素，因而兩黨一致的對中國發出了一個信號。而北京由於其內部的政治、經濟高壓鍋，只能由過去的下圍棋改為下象棋以因應，甚至退化到玩起剪刀石頭布。

這個以美國為首、西方盟國發聲支持、亞洲沉默支持的信號是什麼？可扼要描述為：中國聽好了，不管你過去做了什麼好事（例如在西方經濟危機時支撐了世界經濟體系），也不管你過去做了什麼壞事（例如搭上西方打造的WTO自貿體系而又鑽盡空子），我們（西方建置的體制）都已經承認你是一個地球大國。但是，現在我們要求你拿出大國的格調，以「對等」的方式和我們打交道。

這個要求「對等」的信號，指的不是具體事物的等值，而是行為上的規範。川普雖然不喜歡WTO等多邊協議，但是整個WTO基礎精神就是「對等」。對於弱國小國，WTO也會放寬對等原則。但是救急不救窮，WTO是不容許永無止境的閃躲對等原則的。由於WTO的對等效能日益衰微，因而才會出現許多區域性（如東協、TPP）的「小WTO」多邊組織。川普的驚世立場是：管你WTO，還是NAFTA、TPP，任何國家要跟美國打交道就得在行為規範上「對等」，不能逃票或搭便車。

川普要求中國在經濟事務上以對等行為和美國打交道，非常弔詭，這不正是對北京多年來喊的「中國崛起」、「新型大國關係」的承認？中國人應該高興都還來不及呢！但事實上中國是沒有能力做到和美國對等的；一對等，政府採購就得更開放，金融管制就得鬆綁，資料數據就得透明化，知識產權就得像美國一樣嚴格保護，兩國間的相互投資就得遵循同一套會計準則，政府就不得直接干預匯率，網路就不能鎖在長城內。

任何具有中國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以上的任何一項，都是要求執政的共產黨搬一塊石頭砸自己政權的腳。若做到完全對等，那就等於是……（佛曰不可說）

要說「高尚性」，川普當然比不上歐巴馬，甚至你若要稱呼他為「痞子生意人」，我也沒有意見。但是，正因為他的痞子性格和牛仔作風，他僅僅把對中國的「對等性」的要求限制在經濟領域，而不像那些高尚的西方政客，扭捏作勢的把什麼「普世價值」、人權等等高尚議題作為條件。這其實是給中共保留了一條執政保權的出路。西方國家目前的輕微發聲，以及亞洲小國的沉默，其實發出的信號是：中國如果在經濟事務上接受美國的對等性要求，這或許是對中國不利的，但卻是對世界有利的。

因此，切莫把美中當下的衝突稱為「貿易戰」，這種淺層思維將影響我們對形勢的判斷。這是一場美國對中國發動的「經濟行為規格戰」。中國只有兩種選擇：一、即使抗拒美國這單一國家對中國的經濟行為要求，至少也得回到WTO對大國的規格，如此才能繼續保留在國際貿易的軌道內。二、中國不論是因為民族主義的面子還是強國因素所需，奉陪到底的結果只能是將經濟對抗拉高到軍事對抗。十九世紀的西方，其實最初也不過是要求清廷表現「經濟對等性」，但朝廷中多數人看不懂、不願看、不敢看。結果如何？就是升高到軍事衝突。

美國明白了，中國還沒有

川普於2018年啟動的美中貿易戰爭，初期有人說最終打不起來，有人說川普是個不懂國際貿易本質的無知莽漢，是端石頭砸自己腳。總之，在中共一句「奉陪到底」下，沒人認為美國會贏。剛開戰時，這看法在台灣也是主流。後來中共破功，早期評論者也就摸摸鼻子，但這是後話。

台灣靠貿易立國，從貿易或經濟角度評價川普的動作，也是視野上的無可厚非。但是，美中兩國是大國，都有印鈔能力，其實誰也不缺那一年二千億美元的收入差額。大國之間無小事，美國啟戰，外行人看關貿，內行人必須看政治。

政治還得從拿破崙談起，他說：中國是一頭睡獅，千萬不要把牠弄醒。拿破崙，有遠見啊！但毛澤東也有遠見，他在六十年代制定了中國應付西方的國策：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澤東算是吃透了拿破崙的遠見：中國獅子醒了，但不能被西方發現，因此還要繼續裝睡。

這一裝睡，就裝了四十年。中國真是一個有耐性的陰柔國度，四十年中，忍氣吞聲加入WTO，但入關後陽奉陰違，勒緊十億人民褲袋為外商打工，順利搭上全球自由貿易通道的便車，快馬加鞭的利用了美國被賓．拉登困住的十五年戰略空窗機遇期。共產黨中央是想繼續裝睡，但是兩個因素使得他們無法如願：一方面，中國經濟體和國際接軌的程度已經到了難以用官方虛假數據遮掩的地步；另方面，老百姓，尤其是先富起來的那一批人，實在忍不住衣錦夜行了，他們要騎鶴上揚州。雙重壓力下，中共中央自2008年起，半推半就出台了新的九字策：冒出洞、廣散糧、試稱霸。

這就鬧出麻煩了。川普之前的歐巴馬、希拉蕊等沒搞過市場競爭的法律人，完全缺乏當年尼克森綜觀世局的領導人能力，僅僅基於簡單天真信條就認為只要中國富裕了，中共就會向西方價值、西方政治制度靠攏。毛澤東的九字策以及鄧小平承襲的「韜光養晦」，完全統戰了美國新一代的天真政治人物，一直要等到「莽漢生意人」川普的出現。

川普不算什麼偉大的政治人物，他只不過是一名精明生意人，看穿了中國是一頭裝睡了四十年的醒獅，他不允許這醒獅繼續裝睡。貿易戰若不行，還有科技戰、金融戰、軍事戰。反倒是中國還沒看清楚大形勢，企圖用貿易戰的邏輯止戰，繼續搭美國秩序的順風車。這將是妄想，因為不只川普，整個美國已經認識到中國裝睡了四十年的事實。

皇帝身邊策士看不懂的一局

上文說到整個美國政界已經達到共識：中國已經裝睡了四十年，不能讓這隻早已醒來的獅子繼續裝睡了。既然美國已看穿，那麼2018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一輪美中談判破局，乃是預料中的結果。美方提出的要求招招封喉，擺明了就是要中國遵守國際規範，不能再裝睡。中方全數拒絕也不令人意外，因為這些條件的內涵遠遠超過貿易戰，甚至超過經濟戰，直接威脅到了中共的一黨專政。

第一輪談判前一周的4月28日，中國官方的高端經濟智庫，廣邀西方媒體的意見領袖前來解惑。因為中方一直還不明白，美國究竟要什麼。受邀者包括調查水門案的老牌記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史丹佛大學的奈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還有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會後弗里德曼於5月3日美國談判團出發前，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評論。意思就是中國還沒搞清楚，美國既不是在打一場貿易戰，也不只是在打經濟戰，而是在打一場世界權力戰。同日，馬丁．沃爾夫在《金融時報》發文說：「美方在貿易談判中的目標令中方費解。」

談判破局後，美方代表私下對媒體說：中方派出的代表偏經濟理論，對國際貿易的實務和規則不熟。西方媒體因而分析，這可能是習近平在十九大後全面換班子的結果。

顯然，中共的決策體系一直到現在還沒搞明白，中南海深院內的習近平也還沒明白事態的性質，以為這是一場貿易戰，而不知川普要打的是一場「經濟行為規範戰」。在規範戰下，中國只有兩種選擇：即使抗拒美國這單一國家對中國的經濟行為要求，至少也得回到WTO對大國的規格，如此才能繼續保留在國際貿易的軌道內；或者，中國不論是因為民族主義的面子還是強國因素所需，奉陪到底的結果只能是將經濟對立拉高到軍事對立。十九世紀的西方，一開始其實也不過是要求清廷表現「經濟對等性」，但朝廷中皇帝身

邊的人多數看不懂、不願看、不敢看，看得懂的人又不敢直言稟告。結果如何？就是升級到軍事的路子，然後中國後代子孫將此段歷史片面定調為「侵華」。

川習會平淡中透露的殺機

讓台灣提心吊膽的川普、習近平首度會面，從頭到尾兩人發言平淡，好像只是行禮如儀—哈囉，你好，我的看法如下—拜拜，下回見。

兩人在六日晚餐前的一個多小時密會中，必然各自陳述了對朝鮮半島局勢、南海問題、經濟問題、台海問題的立場。但僅僅一個多小時實在說也談不到什麼細節，只能走過場。川普在接下來的晚宴中對記者特別強調說：會談中我什麼都沒得到，一丁點都沒有。次日的工作午餐，美中代表對著面排排坐，習近平做開場白時，川普連傳譯耳機都沒戴。即使他事前看過中方稿子，這也是不禮貌的任性表現。若佐以他和安倍會面時，也在安倍開場時不戴傳譯耳機的現象，似乎可以做出結論：川普在談判習慣上，會選擇性的輕蔑對手。

除了平淡，還是平淡。但從一件事中，或可看出這是川普在談判步調上的故意作態，就像他不戴傳譯耳機一樣的作態。

中國人的基本禮貌，講究三件事：來者是客、伸手不打笑臉人、打狗看主人。正宗的美國人，也就是不講究來自歐洲文化的美國地方人，完全沒有這一套。這次匆促成局的川習會，應該說是習近平的主動；在年底中共十九大的決戰來臨之前，習不能容許任何的黑天鵝事件，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而川普被普遍認為是最大的黑天鵝。因此，對習而言，越早弄清川普對中國還有習政權的真實態度越好。 應該說，首度川習會上，中方最擔心的就是川普有失待客之道，使得習近平在中國人面前丟面子。

現在會面結束了，川普也接受了今年稍晚回訪習近平，似乎雲淡風輕，沒有任何失禮之處。但，是這樣嗎？我們來看看那二十四小時之間所發生事情的時間順序。

美國東部時間4月6日下午2點，習步下飛機。兩個小時後，估料習剛剛抵達下榻處休息，四點鐘川普下令空襲敘利亞空軍機場，5點40分美艦發射第一枚戰斧飛彈，最後共發了五十九枚。川習密會中，川普並未透露此事，一直到了晚宴快結束的8點30分，川普才在席間告知習，美國剛剛攻擊了敘利亞。坐在川普旁邊的習，雖然口頭上表示理解美國的動作，但他心中作何感想外人實在難知；尤其是，在美國發射第一枚飛彈後這三個小時之內，倘若中國的軍事和情報系統未能得知任何情報，那代表中國在全球軍事上已經大大輸了一著。

以上的時序敘事，顯示了幾點：

一、川普沒經過聯合國協商、國會同意就動武，表現出他可以做出不顧政治後果的決斷。原來世人以為習才是川普的第一叫牌對手，但在習踏上美國國土的一小時後，原來和川普「哥倆好」的普丁立刻易位變成川哥的第一對手，習弟反而成了第三者。

二、川普的目標是「美國第一強」，此目標高於疏離世界既有系統的「美國優先」。世人不能誤會他一定不會參與干預美國以外地區的紛爭。

三、俄國是敘利亞阿薩德的保命掮客，川普可以翻臉如翻書。這對作為朝鮮金正恩保命掮客的習近平，必然有某些啟示作用。

世事難料，永遠有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當下的習近平，至少在十九大之前，期望世人將他視為一個「最按牌理出牌的人」，不會主動惹出任何麻煩。在他啟程赴美之前，他腦中的博弈想象是一個

圍繞著朝鮮核武問題、南海問題、美中經濟問題、台灣問題四大議題所形成的取捨局面。不料，恰巧在此時發生敘利亞毒氣事件，而川普的一個動作，二十四小時之內就把美中之間的單純、邊界清晰的博弈局面，添加了邊際極為模糊的國際博弈元素。這將使得回到中國之後的習近平，重新估量川普以及北京腦海裡的博弈算盤。

此類國際事態瞬間物轉星移的事件，在川普的商人交易談判的特性下，接下來的半年之內還會不斷發生。川普對習近平十九大前急迫感的了解，以及中國在此次「雲淡風輕」川習會後對川普的新認識，將在接下來兩、三個月內碰觸出許多令人算不準的火花。

台灣就處在接下來兩、三個月的美中煙火秀中，切不可因為此次平平淡淡的川習會，而輕忽了自己必須準備的「十八套劇本」。朝鮮半島的困局擺在那裡，金正恩也懂得年底的十九大對習近平是如何的重要，韓國和日本社會的焦慮越發明顯，台灣內部的躁動力量也不一定按捺得住。台灣可以有最好的期望，但也必須有最壞的準備。

川普三招封住中國崛起的咽喉

中國能崛起到今天的地步，靠的是三件表面上看起來不相干的事。當然，這三件事只是過程中的必要條件，並非充分條件；充分條件還得加上中共的痛定思痛，還有中國人的自奮自發。然而，川普的新秩序觀，雖然不是完全針對中國，卻也正好大幅削弱了中國那三個必要的崛起條件。

閒話不說，直接切入該三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三十餘年來，中國事實上是接受了美國在二戰後所創建的「美國秩序」，才得以在經濟上如此順風順水至今。這點，連習近平都承認，在不久前與歐巴馬會面時，歐巴馬直接不

客氣的提醒習先生：別忘了，中國能有今天，是因為搭上了（美國所花力氣建立的）世界經濟秩序的便車。習的回答也很大氣：現在中國歡迎全世界來搭中國的便車。

再往前的一個實景：當年在加入WTO的臨門一腳談判中，朱鎔基總理親自坐上談判桌，坐在朱身後的中方WTO談判代表龍永圖，不斷的給朱遞條子，提醒他這個不能答應、那個不能同意，但朱鎔基卻什麼都答應。遞了幾張條子之後，朱忍不住回頭呵斥說：龍永圖，你不要再給我遞條子了！朱知道，當時若再不搭上WTO的便車，中國經濟就要穿幫了，龍永圖的視界不及於此。

而今，川普和支持他的美國選民已經極度不滿中國（還有其他國家）從「美國秩序」中得到的好處，而要求改變遊戲規則。這情緒合不合理值得辯論，但川普不可能用辯論解決問題，他會直接去做。不但在貿易規則上，更具殺傷力的是美元霸權下的貨幣戰爭。在貿易戰、貨幣戰雙重打擊下，例如外傳的在2017年聯儲會升息六次，中國是吃不消的。中國經濟（含所謂的內需）依靠進出口，而人民幣還不具國家信用，其信用支撐點至今靠的還是美元外匯存底和參與美國秩序的信用，失去了這個「便車」，中國將成經濟孤島。

換個通俗方式說，川普等於是告訴中國：別再想搭便車，請補票，你若覺得搭這車不划算，請下車。至於補票費用是否太不合理？以川普的個性，他會說：來談呀，我喜歡做交易。

第二個因素，就是台灣因素。這說的不是台灣幾十年來在中國的將近一兆美元投資。固然，若非台商早期在中國的數千億美元投資和經驗加持，中國的經濟起飛至少得晚上十年。但今天再來談當年勇已經沒有意義。這兒說的是另一件可能許多人想都沒想過的事實：台灣的存在以及兩岸間的緊張，對北京而言其實是一項重大政治資產；北京一直說「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最大障礙」，而事實上這個「障礙」對北京非常好用。三十年來北京利用台灣議題來調節中美關係的溫度，爭取到了許多其他的好處。這是中共一直遮掩

的「陽謀」，而台灣人不察，也不斷的予以配合演出。

北京對華盛頓善打「台灣牌」，也是美國讓中國在很好的條件下連搭便車二十年的關鍵原因之一。川普團隊算是看穿了這點，將「台灣牌」反過來打，等於明白告訴北京，你若繼續玩台灣牌，我也開始玩台灣牌。在美國的新態度下，中國利用台灣問題作為換取未來穩定成長空間的條件也喪失了。

中國得以崛起的第三個因素，聽了會嚇一跳，那就是「賓．拉登」因素。「九一一」恐攻，美國大陸本土歷史上第一次被外人攻入，美國引以為奇恥大辱，不殺賓．拉登不行。結果這場追殺行動，從出兵中東一直到巴基斯坦刺殺，一共花了十年，導致了「亞洲戰略空窗期」，而這十年正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關鍵十年。一直到賓．拉登被擊身亡，美國才騰出手來「重返亞洲」。但也這才發現，中國在亞洲的力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所能忍受的戰略紅線。

亞洲佔全球經貿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生意人川普不可能退出此區域，他只會以更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式重整亞洲秩序。例如：聯手俄國、日本、印度牽制中國，並釋放出美國在中東、歐洲的包袱將資源轉移至亞洲。

在川普新政下，世局將改觀，「美國秩序」將被重新定義。已經深深捲入「美國秩序」脫身不得的中國，將被逼迫再一次的痛定思痛，才能應付新變局，甚至新常態。

台灣值多少錢一斤？

川普正拿著一桿大秤，掂量著台灣的斤兩，看能賣出多少錢，有沒有賣相？

美國駐聯合國前大使、據說川普已內定為副國務卿的約翰．波頓（John Bolton），早在2016年蔡英文總統勝選的次日，就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美國可以打台灣牌〉一文。文中明確指出，

就像當年尼克森打出「中國牌」抗蘇一樣，基於蔡總統的立場，美國打出「台灣牌」以對付中國的時機已經到來。

波頓文中的「台灣牌」，目的在於逼迫中國放棄南海島礁填海建設軍事基地，他說：如果中國不退讓，美國可通過外交升級的階梯，逼使中國注意。美國可以在國務院內接待台灣外交官，將美國在台辦事處由民間機構升格為外交機構，邀請台灣總統官式訪問美國，允許美國最高階官員前往台灣處理公務，甚至最終恢復完整外交承認。

川普當選了。在英川電話會之後，川普本人又在「台灣牌」的對價上加了幾碼，除了南海島礁建軍議題之外，又加上了朝核問題，關稅和人民幣匯率議題。台灣，在川普的秤桿上越來越值錢了。

至少到現在為止，川普和他的團隊的動作，可以推論出兩個結論：一、台灣就是一顆不折不扣的棋子。二、美國會討價還價，但若過程中因擦槍走火，中國軍事封鎖台灣甚至武力侵台，美國不打算捲入。

川普和他團隊看台灣越看越值錢，但僅僅是值錢而已，還沒貴重到韓國、日本、沖繩、關島、夏威夷的地步。從波頓的「外交階梯論」和川普的「交易論」來看，川普政府在就任之前把台灣的價碼喊得震天價響，以中國的反應作為定價標準。然後在就任後，開始和中國談條件、做交易。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立場很明確：一中原則不能做交易。換言之，碰上了川普這號總統，看來是非得做些交易不可，但一中原則不在交易項目之內。美中對撞是世紀級別的重磅大事，當時間點到來時，美國做出轉彎，直接逆轉一中原則，並非不可想像之事。但事態是否會發展到那一步、何時會發展到那一步，還是未知數。台灣需做預備。但也必須了解，在這過程中台灣必須承擔的對價風險。接下來分析可能的對價風險。

洋蔥第一層：南海　洋蔥一層一層的剝，我們先假設川普政府打算將南海島礁建軍問題當作打台灣牌的唯一對價。如果中國願意交易，那中國要什麼？中國的價錢是什麼？要美國讓出台灣（例如停止對台軍售、終止一切承認關係）？太便宜了中國吧，而且美國國會不可能接受如此廉價的交易，這等於是用手中的一隻鳥去交換天上飛的一隻鳥。

洋蔥第二層：南海＋朝核　洋蔥再剝一層。如果川普政府在南海議題之外再加一碼：中國出手收拾朝鮮的核武計劃。台灣對美國再重要，也沒有韓國、日本加起來對美國重要。因此，南海加朝核，對美國是划算的。雖然台灣具有阻擋中國突破第一島鏈的作用，但是韓國和日本的安全更為關鍵。

即使美中都覺得交易划算，朝鮮的金正恩會怎麼想？核武就是他的命、他的立國之本。何況，雖然他的哥哥金正男已被暗殺，但金正男的兒子金韓松還在人世。在這形勢下，他最終如何在美中之間找到平衡點呢？

洋蔥第三層：南韓、沖繩、關島　如果中國方面在台灣和南海議題上讓步，同時同意制裁朝核，而提出的「對價」是美國退出南韓，同時減少在沖繩、關島的駐軍，那就是太平洋戰爭的格局了。

對於川普政府，這是不可能的事，會讓他笑掉大牙。然而，中國在過去十年間所表現出來的鷹派太平洋戰略意圖，卻正是這樣。這也是此次川普顧問群執意顛覆中美過去三十年的關係，試圖改變「擁抱熊貓」的心態而進入「屠龍」心態的大背景。

中國海軍早在還沒有買入第一艘烏克蘭航空母艦之前，就已經直白的透露過，等到中國航母成軍，美國就應該把（國際換日線）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交給中國管理，美軍退出西太平洋。（見〈習近平是否會吃下川普的「台灣誘餌」？〉一文）。

美中對衡的態勢下，解放軍空軍、海軍頻繁「環繞台灣」的現象，台灣社會不能自我膨風，認為那就是衝著「兩岸關係」而來。我已一再提醒，今天世界上已經沒有「兩岸關係」的問題，而只有被打包在亞洲區域關係、世界大局關係內的「如何用台灣作為槓桿」的問題。

解放軍軍機的飛行路線的確是繞著台灣航空識別區的邊線進行，也確實有著擾亂台灣民心的作用，但是其本質意義卻是另外三層：試探美國對逼近第二島鏈（也就是沖繩、關島）的反應、挑戰日本的真實底線，還有為將來推出南海航空識別區做出準備。

洋蔥第四層：日本及俄國　洋蔥剝到這兒，就碰觸到世界大局的核心了。美國清楚知道，要維持過去二十年的世界「現狀」，已經超出美國的國力了。在這現實下，美國若還想保持川普口中的「美國第一」，世界秩序的典範必須做出顛覆性的思考。就如尼克森、季辛吉當年在越戰耗盡國力之後，為了美國繼續第一，顛覆性的聯中制蘇；今天的美國在陷於中東、阿富汗泥沼的時刻，只有聯俄一途，才可能騰出手來遏制中國。只要與俄國達成經濟交易（例如維持油價）、政治交易（例如西方從烏克蘭、敘利亞抽手，默認俄國收服波羅的海三小國），俄國極有可能讓美國在中東喘一大口氣，打擊ISIS、穩定土耳其，甚至令中亞國家對新疆局面做出某些動作。再遠一些，通過對印度的協力支持以換取印度對西藏局面的影響，都不是不可想像之事。另方面，日本對俄國的了解遠超過美國，在聯俄制中這件事上，日本不會缺席。

川普個人有沒有能力是一回事，美國國會是否支持是另一回事。但是，川普的個性及雄心（有人稱之為「無知」），在中國軍力崛起這事實下，他是一定會去試圖改變世局均衡的典範。幸或不幸，他有可能用台灣作為衡量對價的一顆關鍵棋子。

以上這四層洋蔥，無論川普和習近平之間的「對決」止於哪一層，台灣都在被「待價而沽」。而台灣除了「激怒中國」、「讓中國下不了台」的軟實力之外，並無硬實力。因此，在川普掂量「台

灣賣多少錢」的同時，台灣自己必須艱難的開始思考「台灣值多少錢」這問題。這問題的答案，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很醜陋；最浪漫的這一端，可以是波頓所說的「最終恢復完整外交承認」；而最醜陋的一端，也可能是美中玩博弈沖昏了頭，逼近決裂時才互讓一大步。有如甘迺迪與赫魯雪夫在最後一刻徹底讓步，俄國由加勒比海撤出核彈，美國由中東撤出核彈。夾在中間的古巴，因而沉淪了四十年。

無論台灣多少錢一斤，都不能成為世紀大交易的犧牲者。川普團隊的姿態已經告訴北京，美國會用台灣做對價的棋子，美國會外交保護台灣但不會武力保護台灣。台灣的應對之道不好找，但不是完全沒有，關鍵在執政團隊心態的開放度和封閉度。洋蔥不管剝到哪一層，台灣都得要有準備，而「知道自己價值多少」是最重要的，那樣台灣才有可能找到最佳方案。

當軟磨遇上硬攻：美中台大盤解讀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板塊對撞，強震即將到來，台灣身處其中，震幅難免，但是應該避免成為震央，並做好防震措施。

先為「大盤」下三個定義：一、震盪的時間跨度至少十年。二、導致板塊對撞的壓力性質，至少累積了二、三十年。三、形勢比人強，大盤走勢不因美中領導人是誰而改變。

從第二點談起。美國的國際舉動在二戰之後，不論是馬歇爾援歐重建計劃、重整日本憲法體制、韓戰、越戰、對蘇聯冷戰、通過以色列制衡阿拉伯勢力、通過聯中制俄、台美斷交及美中建交，一直到今日的印太戰略圍堵中國、對中開啟貿易及經濟戰爭，無一不基於一個戰略主軸：禁止地球上出現任何一股足以與美國權力抗衡的勢力，不管那勢力是一個國家、一個聯盟還是一種宗教、一種思想。

美國的這個全球戰略主軸，和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無關，與華爾街哪家公司當權無關，與哪個產業、哪些公司當紅無關；只要美國察覺地球上出現另一股勢力想與其抗衡，美國魂就會冒出來指揮美國身體的每一部分。這個「美國魂」可以用幾百本書來闡釋，但實質上一句話就可表明，那就是川普藉以當選的那句話：美國第一。

來看此次板塊對撞的另一方：中國。中國是一個以柔性的「天下思維」包裝硬性的「皇朝體制」，立足於地球數千年的國度；儘管不同族群，甚至不同文化由北方、西北方的陸地進入而交融，但任誰一旦品嚐到了皇朝體制的滋味，再發現了天下思維的軟磨功，誰都抵抗不了那權力的誘惑。不管是胡人來了，佛教來了，共產主義來了，西方經濟來了，最終還是歸於皇朝體制，以天下思維為軟磨統戰工具。

這「中國魂」，也可以用幾百本書來闡釋。但還不如毛澤東的一句話來得簡明扼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源自明朝朱升的「九字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是中國版的「中國第一」大戰略，與美國版的最根本差別在於，「美國第一」走的是「硬攻」路線，而「中國第一」走的是「軟磨」的路線。

十八、十九世紀被西方和日本打得七葷八素的中國，並未忘情「中國第一」。經過毛澤東的折騰之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其實只是披著軟磨功大衣的皇朝路線。鄧那句著名的「韜光養晦」，不就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文言版嗎？舉凡加入WTO、誘引外資進入中國、致富之後的國際收購等等動作都是在大戰略下進行的。隨後，中共一黨專政帶來的政治、社會壓力，使得2012年上任的習近平不得不用對外民族主義來維持專政，這就打破了「緩稱王」的戒律，提早曝光了「中國第一」的魂魄。美國開始不安，但一直要等到精明莽漢川普，才點破了中國的軟磨功夫，端出硬攻路線伺候。

賓．拉登就是過去三十年所累積的摩擦壓力造成的「大盤」盤

勢；川普和習近平，都不過是盤勢下的必然產物。而不大不小的台灣，由於歷史及地緣，處在其中。此盤勢的形成耗了幾十年，解盤之道，至少也需十年。台灣或許無能協助解盤，但至少得培養出一種見識：不要在板塊對撞的十年期，變成震央。美中板塊在印太的對撞點，至少有四處：南海、東海、朝鮮半島、台海。當下台灣還排在末段，順勢而為、軟磨前進就好，千萬不要插隊！

美中尋找新均衡，台灣秤砣放哪裡？

川英電話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台灣社會輿論的認知，一直有個足以自傷的天大誤會。產生這類誤會也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坦白說也難怪；一言以蔽之，這誤會就是「以台灣為中心來理解」一切與台灣地位、安全有關的事件。例如：台灣社會認為，因為民進黨執政才會有川英電話的發生。再如：中共戰機、航母的行蹤是為了「繞台灣一圈」。

台灣極少人從另一個角度評估這現象。例如：即使2016年大選是國民黨勝出執政，川普是否照樣接通國民黨人的電話，並在推特上稱其人為「台灣總統」？中國解放軍是否因為「善意」的國民黨執政，就不會進行戰機、航母突進第二島鏈的海域？

川普和解放軍的動作，是因為考慮「台灣」的內部社會政治而做出來的嗎？還是美中在東海、南海的戰略格局已經發展到了必須尋找新的平衡點的地步，而與台灣民主不民主、綠的藍的當家一點關係都沒有？台灣島內的政治氣氛、人民的意象，真能牽動地球上這兩大帝國之間的大局算計？俄國普丁出兵佔領克里米亞，真是因為克里米亞人民傾向俄國統治這事實？美國協助烏克蘭制裁俄國，真是因為烏克蘭已經具有一人一票的選舉，而且在聯合國已經具有二十六年的主權國家地位？

如果放下「以台灣為中心」的思維反應，而從華盛頓和北京的

大局觀點，尤其是軍方的觀點來看，可以得到幾乎完全不同的評價。華盛頓已經達到結論：二十年來對中國的「融合」（engagement）政策，換來的只是中國猛搭「美國秩序」的便車而壯大。現在反過來想以「中國秩序」挑戰「美國秩序」，在當下全球動亂不安的狀態下，這是必須改弦易轍以「圍堵」（containment）政策加以制止的。而從北京結論看：中國的經改已經到頭（也就是搭乘美國秩序的便車效果已經用盡），再接下來必須開出自己的一班列車，才可能繼續發展，因而把整個東南亞半島視為中國的腹地以發展才是唯一的出路。東南亞有五億人口，大致處於未開發狀態，海道控制全球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運輸。若這一塊落入美國、日本、印度、澳洲手中，中國的經濟循環在中共一黨專政下遲早要內爆；反過來說，若這一大塊為中國有效控制，中國與美國在地球上平分秋色的格局就鞏固了。

簡單來說，華盛頓為了維繫美國霸權而不得不在現在圍堵中國，而中國除了抵抗美國進擊這一壓力下，還有一個美國沒有的壓力，那就是中共的一黨專政保權。對美國，這是一場未雨綢繆的二、三十年的持久戰，而對中共，這很可能就是一場「一翻兩瞪眼」的五年求生戰。

這就是大局；無論是川普或不是川普、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這都是大局。只是川普的出場方式黑天鵝了一點，民進黨的進場方式著急了一點，如此而已。即使事態不這樣發生，也會在另外一種形式下發生。

接下來會怎樣？不管怎樣，反正不可能是美中兩方毀滅性的對撞。經濟和內政上，美中都經不起一場直接的戰爭。尤其是中國，領導班子和整個共產黨的存亡還要等待2017年十九大、2022年二十大的細緻處理呢。雙方容許各自的軍方擂胸叫囂，也是各自紓解壓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目前的虛擬交手比劃下，應該說是中國比較心虛一些。君不見，還未上任的川普不過是打打經濟和政治的嘴砲，中國就忙不迭地以軍事行動回應，這種「以上駟對下駟」、「以槍砲對嘴砲」的膝蓋式反應，透露了中國已經打不起經濟嘴砲

和政治嘴砲，中乾只能以外強粉飾。

台灣若以為中國的軍事動作是對著台灣而來，就犯了前文所言的「以台灣為中心」的致命誤會。戰機到台灣東部外海，固然也有證明解放軍已經有由東部入侵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向美國證明，再過不久就有防堵沖繩的能力。遼寧號二級航母到台灣東部，意思也差不多，最重要的目的是證明遼寧號可以到南海保護新建的人工島礁基地。而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並沒有因為和川普正鬥著火熱而忘了國家，立馬派出駐紮本土聖地牙哥的航母開進南海護權，這和遼寧號是否繞了台灣一圈毫無丁點關係。

台灣社會必須開始有一個意識，那就是：台灣對中國、美國，現階段都沒那麼重要！中國的軍力投射布局，前線不是台灣，至少是沖繩甚至關島；即使騷擾釣魚島、台灣島成為常態，也不過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沖繩、關島）。往南，前線更不是台灣島，而是繼承自中華民國說法的南海九段線海域。美國的戰略布局，可以說和這完全一樣。台灣如果出現在中美兩國的語境中，不過是被用來說事，緩衝雙方的真實意圖罷了。

認識到這點，對台灣的定位和安全有什麼意義呢？最重大的意義，就是台灣不要自我膨脹的「以台灣為中心」，而迫使中美在尋求新均衡點的交鋒過程中「不得不」釘死台灣的位置。唉，乾脆把話用白話文說明白吧，意思就是不管是「統派」還是「獨派」，都不要把中美交鋒的過程看成「機會點來了」。這並不是說新形勢下台灣沒有新的機會點，而是新的機會點，只會發生在中美經過交鋒（不知時間多長）而達到雙方新的均衡點之後，並不在過程中。再打個通俗比方，當鍋子中還在熱火快炒的時候，不要冒然伸手去取肉，否則肉拿不到反而手被燙到的機率太大了。這時只能心中想、眼睛盯住某幾塊肉，等到菜炒好入盤的時候，視菜色的鋪陳花樣再判斷哪一塊才是自己吃得上、消化得了的肉。在這過程中，台灣社會該怎麼過日子還是怎麼過日子，集中精神來改善台灣那些已經拖了幾十年的內政問題。

在中美交鋒尋找新均衡點的過程中，由於中美雙方都會用台灣來說事，用各種對台姿態來嚇唬對方，台灣必然會不時成為世界新聞焦點。台灣也不能浪費了這寶貴的宣傳機會，但是，還是那句話，對國際的宣傳絕對不能「以台灣為中心」，那將只是自己爽。因為世界關心台灣，關心的不會是台灣本身，而是台灣在大局中的角色。因而，台灣的對外宣傳，上至總統，下至社會團體、青年，都必須要把自己對台灣的認知提升到「亞洲和平」、甚至「世界和平」的高度–在中美兩巨獸擂胸互探新均衡點的時候，台灣是具有高度世界意義的，這是台灣提升自己格調與世界地位的絕佳時間段，不能浪費在向世人訴苦的低端活動上，那只會讓世人覺得台灣終究還只是個小媳婦。

在這段宣傳期，執政的民進黨必須有包容各黨各派、知識充足、有英文溝通能力的各類人士。否則，以民進黨當下的體制內人才種類和數量，不足以全面擔當這項任務。

台灣，只是個秤砣。但是，當此中美之間交鋒尋求新均衡點的時候，台灣並非完全沒有影響未來百年世局的地位和角色。當然其中的運氣成分很大，人不一定可以勝天，形勢通常也比人強。然而，除卻了運氣和天意的因素，台灣人自己的眼界和高度，一定也是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因素。除了高度，還是高度，而要達到高度的第一條件就是不能自我膨脹。（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1月。今天回頭看，欣見民進黨政府的確在國際言論上放大了格局。）

習近平是否會吃下川普的「台灣誘餌」？

二戰以後，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只有一個：不允許地球上出現足以令美國彎腰求饒的勢力，不管那是哪個國家、哪個聯盟、哪個種族、哪個地區。為此，美國從軍事、政治、經濟、金融、文化、制度規範多方下手，打造一個天羅地網，即使某方能突破其中一道防線，也無能突破所有防線。

這戰略終極目標，沒有因為三十年和蘇聯的軍備競賽和冷戰而

改變，沒有因為歐盟的形成而改變，也不會因為中國的崛起而改變。民主黨和共和黨鬥爭得再兇，也從未影響到這目標。在台灣議題上，共和黨的尼克森拋棄台灣擁抱中國是為了這目標，同樣是共和黨的雷根反過來支持台灣也是為了這目標。

川普也不會改變這目標，即使他哪天真的瘋了、傻了，也會被彈劾下台。因此，那些期望川普會把美國帶回二戰前的「門羅主義」或「孤立主義」的國家和人士，可以免了。在川普執政下的美國會從亞洲撤退？那是在做夢。不管在地球上的什麼洲，美國都不會撤退，最多就是找幾個臨時代理充當先鋒。

中國近年來成為美國這個終極戰略目標的威脅者，但事實上中國目前的真實國力距離威脅美國還差得遠。但由於民族主義已經成了共產黨的兩大執政合理性基礎之一（另一基礎是經濟萬年成長不墜的神話），使得當局不能不繼續鼓動「超英趕美」的社會情緒，不斷對內對外宣傳「再過幾年就能把美國怎樣怎樣」的高調。連當年劉華清將軍訪美時都公開對美國軍方劃下道說：以國際換日線為界，從夏威夷算起，以東的太平洋歸美國，以西的太平洋歸中國。

這是標準的「一邊一國」思路：換日線以東歸美國，以西歸中國。然而，美國的底線是「一球兩制」：宇宙中只有一個地球，整個地球是神聖不可分割的，地球的憲法由美國制定，但美國可以容許中國在其周邊保持一種特區身分，特區內馬照跑、舞照跳。

習近平上台後，不管是迫於國內形勢還是真的要在任內恢復漢唐雄風，中國的「一邊一國」呼聲高入雲霄，並且不時付諸行動。美國則一改過去二十年的「融合」（Engagement）策略，改以「圍堵」（Containment）對應，這就是歐巴馬「以亞洲為軸心」（Pivot to Asia）策略的大背景。

川普來了，設防圍堵中國的力道只會更強。但在他剛剛勝選的當下，南海爭議中的熱點國家菲律賓和越南也才剛剛開始巴結中國，支持部署薩德系統的南韓朴槿惠又在對手（可能是中國）的醜聞操弄下準備下台，日本充當代理的代價又太高，於是他聰明到裝

傻接了蔡英文總統的電話。

川普雖然已經成為總統，但他這幾年來對全球事務還在繼續採用競選時慣用的策略，那就是：不斷的試探對手底線，以爭取下一步的策略縱深和彈性。這個遊戲，他一直會玩到在任的最後一天。像一艘驅逐艦，隨時丟一、兩顆深水炸彈，根據音波的反射，以測對手的潛水艇在哪裡。

世界形勢比人強，以亞洲的人口和經濟實力，川普不可能不繼續「以亞洲為軸心」，只是要換一種玩法。現在他在探索新玩法的邊際，看起來，他及團隊中合他脾胃者，已經打算通過「以台灣為軸心」（Pivot to Taiwan），作為未來新的「以亞洲為軸心」（New Pivot to Asia）的先探部隊。他扔了一顆深水炸彈，聲納雷達正在收集北京和台北的聲波反應，這樣就能知道究竟水有多深。

這顆深水炸彈，對台灣是轉機還是危機？從博弈邏輯來看，後續境況有四種組合：一、台北興奮，北京震怒。二、台北興奮，北京不言。三、台北不言，北京震怒。四、拳頭打到棉花，台北、北京均淡然。

不論哪種組合，川普應該會在2020年競選年間，繼續再扔幾顆磅數更大的深水炸彈，直到美國測出北京的底線為止。但台灣不能誤會這是川普在替台灣測試中國對台灣的底線，台灣不是沖繩或關島，還沒重要到美國犧牲自己的利益為台灣著想的地步。川普要測的底線是中國對美國忌憚到什麼程度。另外，川普團隊還得要測出亞洲其他國家對事態的反應。作為談判和交易高手，他必須先知道每個利害相關方的屬性究竟是可以誘之以利（reward-based），還是只能脅之以威（fear-based），以了解每一個國家對中國的真實態度。

美國雖然有許多肯定台灣所代表的民主價值的仗義學者、退休官員，為川普的這一舉動背書，但這不能和即將執政的川普團隊的動機混為一談。仗義支持台灣，不等於執政時就會犧牲美國利益而

支持台灣。

這是一場圍棋，但如果台灣政界將其視為一場台北與北京兩方博弈的剪刀石頭布，那就糟了。川普可以川普，但台北不能川普。川普背靠的是美國，台北背靠的是台灣島。

在大國棋局之下，台灣真正必須認清一點，而且只有這一點：台灣是美中日三國圍棋盤上的一顆棋子，不多也不少，就只是一顆貨真價實的棋子。台灣絕對，再說一次，絕對不能誤會自己也是棋手而胡亂移動自己的位置。棋子，定義上說，就是一個可被交換、可被交易的對象，而棋手們步步都在斟酌交換和交易的公式，怎樣交換才對自己更有利、更值得。台灣能做的，只有步步為營，抓對時機去影響棋手之間的交易公式，導向對台灣最有利的方向。

中國和美國，現下都被自己國內的事務搞得焦頭爛額，都無法負擔一場因台灣而引起的戰爭，但是用台灣議題，互測對方虛實和忌憚程度，卻是比劃招數的現成工具。在美中拉鋸試探過程中，台灣單方引起擦槍走火並非完全沒可能。試想，假設雄三飛彈誤射時間發生在當時川英電話的次日，後果將如何？

蔡英文總統在川普任內的多次發言，已將焦點由兩岸關係提高到區域和平的高度。但其實日後發言的高度可以提得更高，強調美國和中國之間在亞洲的和平相處，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地區，具有世界意義，並主動通過國際媒體向世界各國徵求意見，請教各國領袖，台灣能夠如何促進美中在亞洲的和平共處。

這樣，無論川普政府接下來再拋出什麼樣的深水炸彈，台灣都可以在這樣的高度上大氣的迴旋，既不玩剪刀石頭布，也不做圍棋盤上的被動棋子。台灣，得掌握能動性以及視野的高度，於此歷史轉折點上，比的是高度，而不是心機。

至於對北京，我的建議是不要輕易吞下川普拋出的「台灣誘餌」，而做出任何具體的行動。那樣既被對手探到底線，又會激怒台灣的民心，賠了夫人又折兵，非智者當為。（本文原發表於**2016**年**12**月）

川普等於要求中共政體變革

2018年4月美國對中國中興公司的禁運令，事實上已經調查醞釀了好幾年，從歐巴馬政府時代就開始了。但大多數人，尤其是中國人，還把它視為川普政府對中國經濟制裁的起始動作。

國際政治上，尤其是大國之間，永遠有一股「形勢比人強」的力道，有如氣候、地震的力道不因人而改變。川普也好，習近平也罷，這股力道都不因人而變。政治人物、政治勢力、各領域領導人、主流菁英倘若對形勢力道所發出的前期信號具有超強敏感度甚至直覺，即使不能緩和形勢，至少也能先做足防颱防震的準備。

對美國過去半年來所喊、所做的經濟制裁，中國當前至少對外還處在「叫板」和「奉陪到底」的架勢，「美國不過紙老虎一隻」的輿論氣氛也甚囂塵上。一方面南海加速軍建、空軍進入西太平洋順道繞台，外交上則期待利用北韓棄核機遇調整美國氣焰。這些動作，我總結為：美國及其西方和亞洲盟友，已經掌握到了一股「形勢比人強」的要素，因而兩黨一致地對中國發出了一個信號。而北京由於其內部的政治、經濟高壓鍋，只能由過去的下圍棋改為下象棋以因應，甚至退化到玩起剪刀石頭布。

這個以美國為首、西方盟國發聲支持、亞洲沉默支持的信號是什麼？可扼要描述為：中國聽好了，不管你過去做了什麼好事（例如在西方經濟危機時支撐了世界經濟體系），也不管你過去做了什麼壞事（例如搭上西方打造的WTO自貿體系而又鑽盡空子），我們（西方建置的體制）都已經承認你是一個地球大國，但是，現在我們要求你拿出大國的格調，以「對等」的方式和我們打交道。

這個要求「對等」的信號，指的不是具體事物的等值，而是行為上的規範。川普雖然不喜歡WTO等多邊協議，但是整個WTO基礎精神就是「對等」，對於弱國小國，WTO也會放寬對等原則，但是救急不救窮，WTO是不容許永無止境地閃躲對等原則的。由於

WTO的對等效能日益衰微，因而才會出現許多區域性（如東協、TPP）的「小WTO」多邊組織。川普的驚世立場是：管你WTO，還是NAFTA、TPP，任何國家要跟美國打交道就得在行為規範上「對等」，不能逃票或搭便車。

川普要求中國在經濟事務上以對等行為和美國打交道，非常弔詭，不正是對北京多年來喊的「中國崛起」、「新型大國關係」的承認？中國人應該高興都還來不及呢！但事實上中國是沒有能力做到和美國對等的；一對等，政府採購就得更開放，金融管制就得鬆綁，資料數據就得透明化，知識產權就得像美國一樣嚴格保護，兩國間的相互投資就得遵循同一套會計準則，政府就不得直接干預匯率，網路就不能鎖在長城內。

任何具有中國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以上的任何一項，都是要求執政的共產黨搬一塊石頭砸自己政權的腳。若做到完全對等，那就等於是……（佛曰不可說）。要說「高尚性」，川普當然比不上歐巴馬，甚至你若要稱呼他為「痞子生意人」，我也沒有意見。但是，正因為他的痞子性格和牛仔作風，他僅僅把對中國的「對等性」的要求限制在經濟領域，而不像那些「高尚」的西方政客，扭捏作勢的把什麼「普世價值」、人權等等高尚議題作為條件。這其實是給中共保留了一條執政保權的出路。西方國家目前的輕微發聲，以及亞洲小國的沉默，其實發出的信號也是：中國如果在經濟事務上接受美國的對等性要求，這或許是對中國不利的，但卻是對世界有利的。

因此，切莫把美、中當下的衝突稱為「貿易戰」，這種淺層思維將影響我們對形勢的判斷。這是一場美國對中國發動的「經濟行為規格戰」。中國只有兩種選擇：一、即使抗拒美國這單一國家對中國的經濟行為要求，至少也得回到WTO對大國的規格，如此才能繼續保留在國際貿易的軌道內。二、中國不論是因為民族主義的面子還是強國因素所需，奉陪到底的結果只能是將經濟對抗拉高到軍事對抗。

當北京碰上紐約

川普上任，台灣不是唯一的焦慮方。全世界都在焦慮，因為他要以一種交易家的風格敲擊舊常態，建立新常態。美國過去的那種裝腔作勢，外交和威權互用的國際操作手法將成為過去式，取而代之的是曼哈頓、尤其是布魯克林區的直通通的打交道方式，濃縮為一句話，那就是「你要，還是不要」？這種生存和競爭文化，只有在布魯克林生活過、在華爾街生存過或在曼哈頓中城區猶太店裡買過東西的人，才能體會和適應。舉一個小例子，或許能更清楚的傳達這裡要傳達的訊息。在曼哈頓街頭如果行人闖紅燈，他會得到一個尖銳的「叭叭」聲，不然駕駛就會探出頭來吼一句：老兄，你買了保險嗎？一位紐約作家曾經總結過：紐約人天天都在憤怒狀態中，但紐約人直接，誰也不願意把今天的憤怒帶回家，他一定會找個方式把怒氣移交到另一人身上，變成那個人的怒氣，誰接到最後一棒誰倒楣。各位，川普的特質就像是一位典型的在商場瘋狂競爭過的紐約布魯克林人。

歐洲政治家會覺得不習慣這種風格，中國領導人更是從跟美國打交道以來，沒見過這種味道的對手。從毛澤東、周恩來見尼克森、季辛吉，一直到鄧小平和雷根總統談判，以及後來所有的中國領導人和美國領袖打交道，總結的經驗都是美國作為世界領袖，雖然政治上一定也是說一套做一套，雖然笑臉背後一定有刀，但至少過程中是有端倪可尋的，外交上那一套做作是不會少的。但習近平還不知道的是，中國那一套外柔內剛和外剛內柔並用的套路，用在川普白宮新團隊身上是無效的。川普在美國對外政治上是個新物種，老一代的毛、鄧由於有過白手起家的豐富經驗，或許還能知其一二。但繼承江山而來的二代，除非當下重組認知結構，否則會誤判連連。打個不甚恰當的比方，這就像台灣繼承家業的富二代，如果碰上和郭台銘做生意，其挫折感是可想而知的。

形勢逼人而來，台灣此刻不得走錯一步，因此這裡就直話直說

了，希望被得罪者不要介意，我們為的都是台灣的前途。小英總統的國安團隊，如果還有這個團隊的話，若還處在「剪刀石頭布」的美中台關係的算計思維下，極有可能在過於急切或者過於保守的反覆中，導致台灣被置於非常不利的位置上，甚至導致擦槍走火。請注意，這兒說的包含了「過於急切」和「過於保守」兩種狀況；急切和保守之間，時機才是一切（Timing Is Everything）。而要切實的掌握Timing，有幾件功課必須做好做足：一、真正去體會創業家看世界的格局。二、徹底了解交易家的心態和技能。三、徹底深入體會習近平作為紅二代的心境，以及他在中共內鬥擂台上的困難處境。四、中國經濟的真實壓力。五、川普團隊對舊常態（現有的美國秩序）的憎惡程度和理由。六、川普團隊對於新常態（新的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的圖像。

話再說白一點：那種溫吞吞的國際政治理論，即使不拋棄，至少也得先放到一邊。以2019年的現實為起點，來思考判斷發展中的「川普世界觀」和「川普走向」。若還是拿著過去三十年的「美中台關係」或「兩岸關係」為基礎來做分析，台灣人可能某天早上突然發現，台灣這條船的錨已經被別人釘死了，或者船上那本來就很小的引擎被拆掉了，而只能別無選擇的隨波逐流。換句話說，台灣政界得跳出盒子思考，不要拿過去國民黨在美中台關係上的經驗為對比，也不要參照民進黨過去和美國政界打交道的經驗，而要把今天作為起點，由五年、十年後的未來世界，倒推回來評估現在。如果學者們一定要拿某種「歷史感」作為參照座標，坦白說，與其拿過去三十年的國際關係為參照座標，還不如拿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的重商主義作為座標，這樣事態可能還看得更明晰一些。

毫無疑問，川普團隊的共同核心信念如下：美國國力已經因為舊常態而下降，若要保持霸權，必須打破舊常態，建立新常態；打破舊常態的槓桿點在改變美中關係，而改變美中關係的槓桿點在台灣議題（以及後文討論的朝核問題）。這裡要懂得的一點是：槓桿點只在撬動現狀的過程中有用，一旦達到目的後（或交易完成、新常態穩固後），槓桿就不再是槓桿。槓桿自己必須清楚的一點是：

你不是目的，而是過程；這道理，對中國和台灣一體適用。從川普的世界新常態尺度來看，中國就是槓桿點；從美中新常態的尺度來看，台灣就是槓桿點。

當下，對川普團隊的世界觀的想定，細數起來恐怕不下幾十種，全球各個國家的各個政黨派別，都在以自己對「美國」的理解還有二戰以來的國際政治經驗，猜想川普究竟「想做什麼」。有時，極端的想定才可以讓人們面對現實，逼出一些自己過去「想都不敢想」的看事情角度。「極端」二字用於川普，大概沒人會反對。因此，以下提出一個極端的想定，作為供大家跳出盒子思考的基礎。請繫好安全帶，因為，那真的很極端。

先回顧一下前文所提出的三點假設：一、川普要打破舊常態，建立新常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過美中關係，最大的槓桿點就是台灣。二、川普的新常態就是美國在經濟上、軍事上重返世界第一，越快越好，順我者昌、逆我者辱。三、重整世界秩序的最好方式不是文攻武嚇，而是大家坐到我的談判桌上來做交易；只要接受我美國的老大地位，沒有不可交易之事。

得再提醒一次的是：中國，只是川普「美國第一」的槓桿點。他是個生意人，我不覺得他對中國有特別大的惡感，或對中國的民主自由有任何的使命感，當然更不會對台灣的前途有任何的使命感。在特定的形勢下，搞不好某一天他對德國領袖的惡感會更超乎他對中國領袖的惡感。例如：當有一天德國的歐盟政策妨礙到他「美國第一」的目標的時候。

在「美國第一」的霸權思維下，美國在關鍵時刻從來不手軟。例如：1985年雷根總統強迫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簽下「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日圓迅速在兩年之內升值百分之五十一，德、法、英的幣值雖然也升，但沒有日本那麼慘。究竟西方國家之間比較親，美國又在1987年簽下「羅浮協議」（Louvre Accord），協助法德英幣值脫離困境，而日本卻因此進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至今無法恢復。

在關鍵時刻，美國沒有那些外交上文謅謅的一套，幹了就是。再往前，1971年尼克森突然單方宣布，美國退出二戰後「布萊登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的金本位制，美元與黃金脫鉤。兩年內全球貨幣都被迫和金本位脫鉤，這個動作帶來的美元霸權一直至今。

政治上，尼克森派季辛吉1971年祕密訪華，實施聯中制俄的全球大戰略，這是個連美國國會事前都不知道的「黑天鵝」動作，十餘年後導致蘇聯解體。台灣，也在這大背景下變成今天這樣。

請問，以上的「美國第一」動作中，有任何「民主自由法治」的考慮嗎？有任何人權的普世價值考慮嗎？做強迫性的快速交易，不是川普的特權，而是任何美國總統的特權。文謅謅、慢吞吞的外交，只有在美國確定自己第一的地位穩固的時刻，才會是原則。川普，不過是直通通的大嘴巴說出來罷了。

好，如果假設川普團隊決定在五年之內重返「美國第一」，而在今天世界經濟整體敗壞、ISIS當道，中國又是最大絆腳石的現實條件之下，川普會怎麼做？能怎麼做？

從川普已經公布的政策方向中，一條極端的路線可以想定如下：

一、川普只是想美國重返第一，並不是想賠進美國打爛全世界。在當今世界壓力還有各自的國內問題下，美國和中國都沒能力打一場戰爭。至於代理戰爭，例如通過台灣議題、南海議題，使得代理人（日本、台灣、南海諸國）去打一場局部戰爭，引起美中直接戰爭的風險還是太大。因此，通過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使中國屈服於美國秩序之下，乃上上之選。

二、如果中國不吃這一套，狠手就是令中國的經濟「內爆」（implosion），以導致其政治內爆。例如：通過半強迫半

吸引國際企業投資由中國轉向美國（降稅、提高關稅、查美國企業國外稅等等），透過金融手段一直到人民幣崩潰。「正常思維」的人說，金融手段是「七傷拳」，也會打到美國自己，況且美國財政早已達到債務上限，已沒本錢打金融戰。但這是正常思維。如果川普拿出當年黃金脫鉤或廣場協議的狠勁，強迫其「友邦」購入聯準會資產倉庫中的爛貨（例如2008年次貸危機前後，中國還是友邦時，就強迫中國買入至少四千億美元與「房地美／房利美」[Fannie Mae/Fredie Mac]有關的問題債務），以擴大美國政府財政的餘地。再加上企業降稅以緩衝升息後的利息支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如此，通過境內、境外金融貨幣政策，美國可以搜刮全球一次，並使中國內爆。

三、容許新興國家的幣值下貶，這會嚴重威脅到中國對美國、歐盟的出口競爭力，因為中國對這些先進地區的出口多為低端的消費品，可替代性很大。加上國內通膨，外資大搬家，中國經濟不硬著陸也難。在中共二十大（2022）的政改壓力下，經濟硬著陸一定帶來政治硬著陸，中國發展可能倒退十年。

四、退出（至少暫時）全球排碳條約，全面開放國內石油開採（包括頁岩油），很快成為石油輸出大國。通過影響世界油價的收放，拉攏或打擊中東國家，對俄國示好以聯俄制中，打擊ISIS的最大財源–石油收入。同時，通過某種對南海石油航道的控制，收緊中國石油的進口方便性。中國的戰略石油儲備量不超過九十天，還怎麼打仗？每天穿梭在中國道路上運送食物、貨品的數百萬輛卡車，還開不開？運送數億人的鐵道系統，還通不通？

以上的極端想定，是不是賤招？當然是賤招。但是當年的無預警美元和黃金脫鉤不是賤招？廣場協議強迫日圓瞬間升值百分之五

十一不是賤招？2008年前後強迫各國購入美國壞帳不是賤招？如果孫子兵法的「兵不厭詐」你認為是對的，那麼為什麼「政不厭賤」就是不對的？

如果以上事件發生，台灣內討厭中國的人，先不要高興。因為，若中國產生土石流，不論是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首當其衝的就是台灣。若是洪水般的土石流，台灣島被淹沒都有可能。

美對中「四爪戰略」下的台灣牌

川普核心團隊對中共的總體戰略越來越清晰，可以視為一個四層金字塔，由下往上分別是：關稅貿易戰、經濟行為規範戰、科技戰，以及亞洲全局秩序戰，或可簡稱之為「四爪戰略」。前兩爪，間接牽動台灣經濟的起伏，第三爪科技戰則直接衝擊到台灣經濟的支柱—電子業。金字塔最上層的第四爪，朝核問題、南海問題和台灣牌構成關鍵三要素。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之間內鬥激烈，但在中共政權本質這件事上，卻已經形成以下共識：如果中共繼續其一貫執政方式，中國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因此，即使共和黨在2020年底選舉失利，繼任的民主黨也不會改變上述的「四爪戰略」。在此大勢下，可預期川普的白宮一定會在未來的十八個月中，一爪一爪的進逼中南海。

關稅貿易戰，只不過是川普的起手式第一爪，況且川普是在先打過盟友加拿大、墨西哥之後才對中國動手。第二爪「經濟行為規範」，諸如取消國家外貿補貼、開放市場、停止盜竊知識產權、人民幣自由兌換、開放網路等等，才是川普現階段的目標。然而中共心知肚明，每一項都是死穴，一旦這樣做了，等同一黨專政基礎鬆動，也等於美國不動武而勝。

中國的有識之士眼睛雪亮，川普是用關稅貿易為切入點，倒過來逼迫中共的經濟行為，而經濟行為的規範化，又會倒過來逼迫中

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因而近來網上出現戲謔說法：「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特朗普（川普）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倒逼師。」

習近平班子豈會不了解這點？川普要的合約內容，簽了，等於葬送了共產黨專政的未來；不簽，就等著川普的第三爪和第四爪。若先簽了再賴帳，你看川普像是容許賴帳的人嗎？

目前中共用的是「拖字訣」。朝核問題下的川普、金正恩越南二度會，拖住了川普一個月，再通過無休無止的談判，希望再拖川普幾個月。但白宮已經放出強烈訊號：不可能讓你再拖多久，第三爪、第四爪已經準備伺候。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頓，3月10日在等同川普喉舌的福斯電視台（Fox News） 說出以下三段話：

一、「……中國在美國的統戰，包括影響媒體、選舉，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外國對美國的滲透……這對美國保持其作為開放自由社會是個核心威脅……」

二、「5G通信系統內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用來實現間諜功能，不單只是芯片……美國是以全球眼光看待制裁中國科技設備，而且這件事與貿易議題完全無關。」

三、「南海是地中海的兩倍大，全球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貿易通過南海海道，而中國正在通過島礁軍事化將南海變成中國的一個省……美國不會坐視。」

當福斯電視台主持人追問進一步細節時，波頓說：「如果我還是個人公民身分，我可以告訴你許多，但我現在不是。」那麼，讓我們來看看波頓還是個人公民的時候說了哪些話。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的次日，波頓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文章〈美國可以打台灣牌〉；文中的「台灣牌」，目的在於逼迫中國放棄南海島礁填海

建設軍事基地，他說：「如果中國不退讓，美國可通過外交升級的階梯，逼使中國注意。美國可以在國務院內接待台灣外交官，將美國在台辦事處由民間機構升格為外交機構，邀請台灣總統官式訪問美國，允許美國最高階官員前往台灣處理公務，甚至最終恢復完整外交承認。」

第一爪、第二爪何時結束？第三爪何時加力道？牽涉台灣角色的第四爪何時加壓？除了上述波頓傳遞的訊號，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萊特西哲於3月12日參院聽證會中說：不管談得成談不成，幾星期內就會有結論，美國不等了。

台灣何以面對美國的「台灣牌」？兩年前我在一篇文章〈抓好停利點和止損點〉中說的原則，今日依然適用，如下：

這場「以台灣為槓桿進行的美中爭霸賽」何時結束？沒人知道。但在上述的大局分析下，台灣必須想好自己的停利點和止損點。個人覺得停利點有二，其一就是「迫使」美國與台灣在十二個月內簽下FTA，當然台灣也必須有所回報（川普只做交易，記得嗎？），那就是以具體行動獎勵台灣大企業到美國投資、創造就業，以對美台FTA的成形做出貢獻。

第二級停利點，就是「促使」美國政府正式承認台海兩岸分治的事實。這點，其實北京也是默認的；美國的正式承諾，撇開中共的面子問題，其實是大大有助於亞洲和平，也就是有助於世界和平。正式承認分治地位的方式也有很多，台灣也必須跳出盒子思考，保持給美國的名目彈性。

停損點，就是台灣在必要的時刻，也要勇敢的對白宮說NO，借你用一下可以，但是台灣不會接受最終變成美國和中國交換利益的棋子，尤其是台灣不會打代理戰爭。

美中對撞沙盤推演

已然成形的美中對撞，其源頭的本質既不是「貿易戰」也不是「經濟戰」，這種視角太淺了；甚至不是已被討論多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所謂的「兩霸必有一戰」。也有人用「冷戰開端」形容，將美中態勢比喻為當年的美蘇對撞，將中共比蘇共。以上這些說法都不算錯，但是沒有觸及本質。

觸及不到事態本質，就會帶來誤判、輕判，結果多半是災難。本文嘗試提出一個對美中態勢本質的視角，以及在此視角下對未來半年的沙盤推演。這僅是個假設性的想定，並不是論斷，但倘若能提供台灣在美中對撞下如何自處的參考，就已經達到撰寫本文的目的了。

筆者看法是：美國此次衝撞中國，固然有前述的各種因素，但本質上是泛基督教信仰傳統，看穿了中共「單方定義的中華文化」下的權術特質、機巧、得寸進尺、陰陽辯證兩面性，也同時看透了中國人民的順民性格。這兩者相輔相成的具體證據就是十四億人與集權體系共生而不悖。此證據向美國揭示了中共的陰柔比蘇共的陽剛更可怕。在彭斯副總統十月四日的檄文式演講中，無處不是對中共本質的揭露，以及對中國人民的善意告誡。因而我在近日的其他文章或訪談中，將彭斯的講話定調為「反共救中國」，並對台灣的對策提出了「不掉隊、不插隊」的建議。

在此本質下，我們來做一些沙盤推演；請記住，這是推演，不是論斷。

沙盤前提是：美國已經鐵了心，並且準備好了，無論付出什麼代價，要求中共結束一黨專政。其決心及力度，比起要求朝鮮去核，只會大不會小。如果中共同意（很大的如果），美國會協助中國重建；如果中共以牙還牙、奉陪到底，美國也雙倍奉還。中國人民只要對集權覺醒，美國也願意領導西方國家協助中國。

沙盤內容是：滿漢全席一百零八道菜，一道一道上，各種關稅制裁、科技制裁只是小碟前菜，中間主菜是清除南海、台海、東海航道的所有障礙，必要時強行拆除海道上的攻擊性軍事設施。若發

生軍事衝突，則上大菜—貨幣戰及金融戰。

這滿漢全席沙盤，前菜部分，已然發生，各界早已分析得相當透徹，此處不贅述。先來談談主菜。清除攻擊性軍事設施，美國不可能單方進行，而一定會邀請盟國以見證者身分參與，包括了日、英，甚至印、澳。過程也不可能完全順利，清除結果也不可能一次畢盡其功，但一定是實質性的。過程中若僅僅發生雙方都有台階可下的小型軍事衝突，並且雙方都同意先下台階，那麼滿漢全席可能停止上菜一陣子，但是上述的美國終極目標不會改變。

倘若軍事衝突升級，大菜大概長這樣，但次序可以隨時變化：宣布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公布對中共企業制裁名單，全球連動制裁（如同此次對伊朗）；以美國國內法起訴中共高官貪瀆，凍結其在美資產；對承接政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償還「中華民國」巨額美債（七千億至一兆多美元，詳見下節〈美對中貨幣主權戰前兆〉），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手中的美國政府債券（目前一點二兆美元）為扣押品，中止其國際流通。由於美債券無實體，僅有CUSIP交易號，因此在實務上完全行得通。

凡沙盤推演，必出現黑天鵝。例如：西方隱藏百年的老勢力，可能以非政府的途徑在滿漢全席中出菜。或如：中共加速與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建立「石油人民幣」關係，試圖顛覆美元而導致美國提前實施貨幣戰。那麼沙盤中有阻尼減震器嗎？也可能有的。例如：中共黨內鬥爭提速而達到「變更政體與美國和解」的共識。

沙盤推演中，台灣如何預防土石流自保？如何自我提升？如何達到前途共識？可能才是你我最應該關心的問題。

美對中「貨幣戰」、「主權戰」的前兆？

2012年曾掀起風波，之後沉寂的「中華民國美元債券誰來還」的問題，2019年再度浮出美國政局的檯面。這筆涉及二萬多名美國

公民的「1945年中華民國美元債券」，2012年的價值被評估為七千五百億美元，而今議題再現江湖，評估值已達一點二兆至二兆美元。

根據美國證交所（SEC）法規，只要美國總統簽字，美國政府就有權向中國索討這筆債務，但歷任總統都對此案打太極拳，布希總統叫債權人協會（ABF）去問中國大使館，中國大使館說你去問台灣。當年台灣是國民黨執政，倒也作出了反應，說中華民國承認其債務，但由於現在無法向大陸地區收稅，因此請美國安排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三方一起坐下來談。北京當然不肯談，否則豈不等於承認了中華民國的地位。隨後在李登輝總統時期通過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三條明示，此類債務「國家統一前不予處理」。

2012年前後，四十位美國眾議員向歐巴馬總統施壓，說只要你大筆一揮，就對我們的選民有交代了。但歐巴馬還是打太極，因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國務卿希拉蕊還說：「你最好不要得罪你的銀行家。」當年適逢一位相識的美國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造訪，於私宴中，在他六杯茅台下肚之後，我問了他一個敏感的問題：「中國不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嗎？美國怎麼辦？」這位精通國際政治的諾貝爾獎得主，神祕地看我一眼，然後說：「你以為美國打算還中國這些債嗎？」當時我視為笑談，在國際金融規範下，美國即使想賴帳也沒有辦法。

但當時的美國總統叫歐巴馬，現在的美國總統叫川普。當「中華民國美元債券誰來還」再度浮出水面時，我心中一驚，原來薑還是老的辣。試想，如果川普威脅公布及凍結中共高官在美資產，或者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繼承「中華民國」的所有債務，否則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違反「一個中國」原則，視同中美三公報作廢，北京如何應對？

這招並非無先例。美國證交所歷史上曾在總統簽字授權後，執行過四十七宗類似國際債務，都是由後任政權繼承前任政權債務，

包括了共產國家如波蘭。即使是中國本身，也在和英國的香港回歸協議中承認了「中華民國」對英國的部分舊國債，並於1987年償還英國債權人。

川普團隊鐵了心要圍堵中國，已是板上釘釘。軍事，只是姿態。貿易、科技封鎖，也只有施壓作用，唯有貨幣戰、金融戰才能達標。大生意人川普，不會不明白這點。

雖然最近中國已經開始放出「以黃金兌換人民幣」的風聲，但是全球金融投資界都知道，人民幣的真實價值是以美元外匯儲備為錨，一旦中國的美元儲備大幅縮水，人民幣的價值將一瀉千里。中國當前的外匯儲備等值約當三點二兆美元，這數額已經接近經濟運轉的紅線，何況其中一點八兆還是美國國債。

在極端情況下，若美國宣布對中國手中的美國國債，以上文描述的理由實施「假扣押」，人民幣的信用及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匯率將如何？雖然這是難以想像的極端場景，但是川普對朝鮮、伊朗的手段極不極端？誰若還認為川普不敢走極端，大概就是一年來沒有好好看新聞。

此事倘若發生，那還不僅僅是貨幣戰罷了，簡直就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主權的挑戰：你究竟是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是不是一個主權國家？中共代不代表中國？

「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這個國家」，不管你名字叫什麼，若這隻黑天鵝飛來，你的對策準備好了嗎？

彭斯出任務：
「中共不等於中國」、「反共救中國」

川普的白宮對中國戰略，在2018年底急轉直下，表現在副總統

彭斯10月4日在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的那場演講。有關該演講的報導、視頻、翻譯、內容整理，網上隨手可得，此處不再贅述。

此文純粹從解析的角度，以及純屬個人的觀察，來介紹這場轟動全球的演講。說它「轟動全球」，並不是因為全球主要媒體都詳盡報導，而是全球主要國家的政要，都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不管同不同意、願不願意，自己國家的政治、經濟命運與這場演講綑綁在了一起。這些切身的國家，當然包括了「事主」中國，也包括了寧可天下無事的台灣。

倘若僅僅允許我用一句話來總括彭斯的這場四十分鐘演講的內容—請繫好心理安全帶了—我會用「反共救中國」五個字。絕大多數人可能會用類似「堅決表達美國第一」、「圍堵中國的宣言」，甚至「新冷戰的開端」等等語詞來形容彭斯的這場演講。但請容我解譯一下，為何這類看起來已經很嚴重的語詞，還遠遠未捕捉到其內容的重磅性。

閱讀彭斯這場演講的內容，必須拿出閱讀《人民日報》的功力才行。其實在聽完演講之後，我個人是大大吃驚的，美國人，尤其是川普，一向直來直往、直話直說，而彭斯的演講若只看其表面內容，其實不過是過去幾個月的「新聞綜合」，裡面都是媒體老早報導、人盡皆知的事件和看法，沒啥新信息，也沒新觀點。其實，這場演講之水深，不亞於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

殺氣和弦外之音，恰恰就表現在「沒啥新玩意」這態度上。就像一個冷靜的律師，在採取法律行動之前向對手重新知會一次手頭的證據；就像一位法官，在判案前宣讀一次控訴內容。沒有動怒，沒有恫嚇，只是一次行動前的最後知會。

川普習慣動怒，也善於恫嚇，這是他的談判技巧特色，但也是個性缺點。因此，這次的演講行動，如果交給川普執行，人們可能會預期對中政策下一刻就出現戲劇性的轉折，所以，這次由彭斯出任務，其力道會比川普出任務更顯決斷。北京一直認為只要川普被國內彈劾或共和黨輸了期中選舉，美國對中國的施壓力道就會緩

和，中共就可動之以情、誘之以利。但我數月前就為文指出，北京最好祈禱川普不被彈劾，因為「中共比蘇共更可怕」這結論已經是美國兩黨共識。若川普被彈劾下台，法定繼任者彭斯的氣質，比川普更適合執行美國的決心。說句題外話，一位痛恨川普的美國政治學巨擘曾對我說：如果當時是民主黨獲勝，希拉蕊會對中國更硬、更狠，雖然手法上會加上一些女性的婉約。

彭斯演講，從遣文用字和段落結構來看，前後呼應出兩個屬性，多數人不察，西方除了一線政治家，二線政治家也未必嗅出味道，但是習近平及他黨內的對手，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事實上，十三點五億中國人民中識字的，只要拿出閱讀《人民日報》社論的功力來，都能感到這份文件是何方神聖及其路數。

第一個屬性是「反共」，是以中國共產黨為發言對象，列舉其「罪狀」，以及發出最後通牒。只要是訓練合格的共產黨員，讀完這份約莫八千字（中譯）的稿子，就可清楚完整的知曉美國如此對中的態度和原因，至於同不同意，美國已經不在乎了。

第二個屬性是「救中國」，以中國人民為訴求對象，列舉美國一百年來對中國的善意歷史，並表達依然具有「救中國」的情懷。廣大的中國人民，是否會因為對共產黨的忠心或基於民族主義的憤恨，而對彭斯演講中的善意情懷嗤之以鼻，目前還看不出來。看不出來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全面封鎖了演講內容，但是隨著民間的傳播，我們很快的就能看到中國人民反應的真新聞和假新聞。

「反共救中國」兩重屬性是有邏輯辯證關係的：因為想救中國而反共，通過反共以救中國。因此，彭斯演講的開場不是先列舉中共的罪狀，而是美國歷史上以及當下對中國人民的關懷。例如他先說：……當中國歷經屈辱與剝削的「百年國恥」之際，美國拒絕加入列強，主張「門戶開放」政策，如此一來我們能與中國自由貿易，保有他們的國家主權……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來，我們身為盟友，為打擊帝國主義而並肩作戰。二戰之後，美國力保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成為戰後世界的一股重要影響力。

這一段，彭斯首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的繼承性，清楚表達了美國的「一個中國」國策–不管統治中國的政權叫做大清帝國、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只認中國人民。

再來，彭斯開始承認美國自己在對中國友善的歷史中所犯下的錯誤：蘇聯垮台之後，我們認為中國勢必成為一個自由國家。二十一世紀前夕帶著這份樂觀，美國在經濟上向中國敞開大門，帶著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前任政府之所以這麼決定，是希望自由之風蔓延到中國的各個角落。除了經濟之外，更是在政治領域，希望中國能夠對完整的人權概念重拾尊重，包括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私人財產、個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但我們的希望均告落空。

彭斯接著表達了養虎貽患的遺憾：……但是，中國共產黨1949年掌權後不久，開始遂行威權擴張主義……現實上，中國的經濟靠美國：過去十七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九倍，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很大程度上源於美國對中國的投資。中國共產黨還使用一系列不符合自由與公平貿易原則的政策，包括關稅、配額、貨幣操控、強制技術轉移、竊取智慧財產以及產業補貼。這些政策在傷害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用來建立中國製造業的基礎，其中犧牲最大的就是美國。

彭斯點出了美國的爆發點–中共不但試圖改變世界秩序，竟然還膽敢跑到美國境內全面統戰，破壞美國國家秩序：藉由「中國製造2025」計劃，中國共產黨指示政府機構與企業界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獲取美國的智慧財產權。要求許多美國公司交出商業機密，當作是在中國做生意的代價。北京並協調、支持併購美國公司，以獲取他們的創作所有權。最糟糕的是，中國的安全機構在幕後主使……一場全面協調性行動，以破壞總統、我們的議程和我們國家最珍貴理想的支撐……中國共產黨政府正在獎賞或脅迫美國的工商企業、電影製片廠、大學、智庫、學者、記者、地方、各州和聯邦政府官員。以影響美國公眾輿論、2018年選舉和2020年總統選舉……鎖定

美國的州和地方政府與官員，並利用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分歧……跟中國正在美國各地所做的事情相比，俄羅斯正在做的事情是小巫見大巫……

最後，彭斯回到對中國人民的喊話，暗示了為什麼中共不應該以現有狀態存在於中國大地，因為集權越演越烈：……曾有一度，北京慢慢地走向更大的自由以及對人權的更大尊重。然而近年來，中國朝著控制和壓迫本國人民的方向急轉彎……到2020年，中國的統治者試圖落實歐威爾式的體系，也就是所謂的「社會信用系統」，建立在幾乎控制人們生活各個層面的制度上……宗教迫害：在宗教自由問題上，中國的基督徒、佛教徒和穆斯林正在經歷新一波迫害潮的衝擊。

彭斯整場演講，其中台灣人最應該驚心動魄的一段話是：……自去年以來，中共已說服三個拉丁美洲國家與台北（Taipei）斷交，轉而承認北京。這些行動威脅到台灣海峽的穩定，美利堅合眾國對此予以譴責。儘管我們政府將持續遵守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所反映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國始終相信，台灣（Taiwan）對民主的擁抱為所有華人（Chinese）展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

這段話再度揭示了，台灣以民主的方式保持一個中性的政治實體的地位，乃美國繼續支持台灣實質主權的要件。翻譯成白話文，就是美國需要台灣作為一個美國向全世界展示的「反共基地」，而非一個「反中（人民）基地」。若要以警語表示，連美國都懂得「中共不等於中國」這件事了。與此事生死相關的台灣，至今還無能區別「中國」和「中共」？

台灣夾在美中棋局之間，此時此刻對美國的最佳政策，應該就是「不掉隊、不插隊」，順著美國為台灣提供的空間，爭取任何可加強台灣實質主權的機會，不要為美國添亂而成為麻煩製造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佳政策應該是「區別中國和中共」，對中國民間釋放大量善意。讓全世界知道，台灣社會是成熟的，懂得中共不等同於中國這個道理，就像台灣已經了解了國民黨不等同於台灣、

民進黨也不等同於台灣，台灣是台灣公民的，不是哪個政黨的。這樣，才算是呼應了彭斯的那段話：台灣（Taiwan）對民主的擁抱為所有華人（Chinese）展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

彭斯出任務，為中國提供了一條出路，為台灣搭建了一個舞台，並且暗示了「出路」與「舞台」之間的有機鏈接。若台灣看不到這點，那就只能說是高度和氣度不夠格。

沒有「美中關係」了，只有「美共關係」

全球秩序已經進入二戰以來的最快速動盪期，雖然我們還不知道未來長什麼樣，但是已經可以肯定的是：過去人們習慣用「十年」（decade）的概念來看國際關係，但是現在誰還用「十年」來評斷未來，誰就一定是輸家。當下，比較合適的概念跨度是「五年」甚至「三年」。這狀況，就像三十年前投資玩家還在用「年、月」概念分析股票市場，後來被迫用「日」作為單位，因而才出現「當日進出」（day trader）的玩法，而到了今日，如果不用「時、分」作為單位，不能稱為股市行家。

國際政治上，舊概念也一樣在快速失效，但人們還沒意識到。例如：「美中關係」–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一直到今天還被認為是一個分析世局走勢的基本概念。在此概念下，之前人們會談論究竟美中關係是融入關係，還是圍堵關係，再如：近來人們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所謂的「兩霸必有一戰」，或用「冷戰開端」來捕捉美中關係。然而，形勢變化如此之快，本文要提出一種新視角：兩、三年之內，世界上可能不再存在所謂的「美中關係」，取而代之的是「美共關係」，當然這裡的「共」指的是中共。

這並不是繞口令，而是有實質意義的。「美中關係」原先應該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

的關係。但打了三十年的交道，美國內部達到一個共識：和美國打交道的對象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專政的團夥，只是這個團夥印了一張國家的名片。

一旦達到「中共不等於中國」的結論，接下來就是更令人不堪的疑問了：中國是不是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中共能不能被歸為西方所發明的共和體制下的一個政黨？真正共和國體制下的美國政府，能不能把中共一黨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從政治實務來講，共和國體制的美國政府當然可以（也避免不了）和地球上的任何政權打交道，不管這政權名片上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王國、朝鮮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美國與對方的交道方式及長遠關係，卻會依對方體制是獨裁、黨治、法制、法治，而在政策和手段上做出區隔。

一旦美國判定，它打交道的對象不算是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正常政府，而是一個以自我權力、自我利益為核心的政權，它對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及手段，就會產生相應的改變。當下，這場改變正在微妙進行中，世人雖然還在使用「美中關係」這個詞，但相信在兩、三年之內，人們就會很清楚的意識到，過去意義下的「美中關係」已經不存在了，剩下的是「美共關係」。屆時，美國盟友圈內的國家，在意識上和政策上，都會轉向諸如「英共關係」、「日共關係」、「澳共關係」的軌道。

美國副總統彭斯在10月4日的那場著名演講中，明顯區分了中國和中共，其實就是打響「美中關係」向「美共關係」轉向的第一槍。現在，球落在中共這邊，中共用什麼方式回應美國，將決定美國轉向的速度。而現實上，中共內部鬥爭持續處於白熱狀態，因而舉棋不定、舞步怪異。

台灣很尷尬，一旦「美中關係」向「美共關係」轉向定型後，台灣會希望自己成為什麼？美國會希望台灣成為什麼？中共會如何對待台灣？這三大問題，台灣應該開始思考了。

美中文明對撞下的台灣處境和角色

2018年中，當世界稱呼美國對中國的制裁行動為「貿易戰」時，我寫了幾篇文章分析那絕對不是什麼貿易戰，而是一場「經濟行為規範戰」。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的演講，人們理解為「對中國的批判」，我認為那是錯誤的理解，應該稱之為一場「反中共不反中國」的宣言。而當全球都在討論兩霸相爭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時，我則認為美中之對撞，絕不是西方歷史上傳統的「馬基維利式霸權」對撞，而是一場人類前所未有、近年才看到苗頭的文明、體制、價值觀的對撞。

只有提高到文明、文化的高度，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場美中對撞將持續多久，有哪幾種可能的發展路徑，以及其最終的結果。身在台灣的我們，一般最多都只用地緣政治、經濟連鎖效應來判斷台灣在局中的角色，甚至很低端的（抱歉）把它和老早已經脫離現實的統獨思維「送作堆」，或為情緒發洩，或為騙選票。

由於歷史的偶然性和地緣的必然性，台灣在這場人類文明高度的美中對撞態勢下，得到了本來一個小島得不到的文明意義，或者說歷史角色。至於要不要承擔這份文明的意義，及發揮這個歷史角色，這完全取決於台灣二千三百萬公民的意願和意志。然而也不能不說的是：我曾連續在三篇文章分析到，美國在此場對撞中遲早會向台灣「借名片」，中共也會不遺餘力的阻止美國向台灣借名片。在這場摔角賽中，台灣等於是一家精緻的瓷器店，隔壁住著一隻大象，遠方一隻犀牛對著大象衝來，後果不是瓷器店所能掌握的，只能先把貴重的東西固定好。

既然是文明的對撞，我們就來談談文明。首先要闡明兩點：一、中共不等於中國，它只是一個現在統治中國的政權。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二戰後出現的國號，雖然這名號擠進了國際體系，但是這國號背後的體制本質，還沒有和世界國家治理的潮流

接軌。

那麼，在人類文明的位階上，「中共」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處在哪個位置？這個問題，由於語言和文化隔閡，西方學者絕大多數只取得到皮毛，我猜西方的學界，還要再花幾十年才能搞得比較清楚。事實上，在方塊字世界裡，這問題已經回答得差不多了。

「中共現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為模式」，是一種西方世界沒有經驗過的現象，甚至是多數今天活著的中國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新常態」。簡化一千倍的講，它是一種以經過肢解再勉強縫合起來的「江山觀」、「天下朝廷」、「大一統觀」為體，駕馭在列寧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剛性政黨骨架上的新物種。借用清末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體用論為比喻，它是一個「皇學為體、列學為用」的混血兒。

美國是世界霸權，這沒有問題，我們也不用去美化它。美國警覺到的格局問題是：對中共這新物種的潛移默化、和平演變已經證明無效。那麼，究竟是應該把它打掉後讓中國重練，還是接受這個新物種改變世界的雄心，對未來一百年的美國比較有利？

當然，這是一個學者或思想家才會問的問題，政治家只看短期，美國總統只看四年。對政治領域而言，答案當然是前者。

倒是台灣自己要判斷清楚，台灣究竟只是上述「新物種」身上的一個新器官，還是自己就是另外一個獨立物種？如果想做後者，台灣在自我演化的過程中，是否洗得淨「皇學為體、列學為用」的因子？台灣過去的「一人一票選父母官」的百姓觀，以及「誰選贏誰通吃」的江山觀，洗得乾淨嗎？

如果我說，在這場人類未見的文明對撞中，把自己身上的江山觀和百姓觀洗得乾乾淨淨，就是台灣的文明意義和歷史角色，不知你是否覺得這要求太高了？

「川局」與「習局」對撞誰會贏？

川普和習近平兩人都在企圖改變地球的格局。公平的說，始作俑者是習這一方，他的「中國夢」乃前朝「大國崛起」的變裝版本，具體實施方案就是亞歐通吃的「一帶一路」。川普橫空出世的當選，固然有著美國社會的諸多內部因素，然而來自中國赤裸裸崛起的刺激，卻是川普意圖改變世界秩序的主要推動力。

在時序上，「習局」在先，「川局」在後；無論是習近平的本意，還是因為擋不住政敵的「捧殺」作亂，習近平對行之有年的美國秩序之挑戰，就是川普「容俄制中」、「重建印太、改造美歐」的原動力。

一開始，連美國社會都看不懂「川局」，歐洲也懵懵懂懂，中國就更不用說了。川普北打加拿大、南打墨西哥、西打歐洲、東打中國，退出TPP、羞辱WTO，全世界的自由主義者、全球主義者，無不狂批川普為破壞既有秩序的瘋子，認為他腦中只有美國，沒有地球。

這種評價川普的角度，在知識分子群中，今天還是常態。但是，估計半年之內，至多一年，世人就會逐步品味出「川局」的奧妙。某些恨者會更恨他，但某些原來對他吐槽的人會豎起拇指說聲「讚！原來是這樣」。

筆者兩年來寫過一系列文章分析「川局」，此處不贅述，此短文僅歸納其要點如下：

一、今天人們所稱的「美國秩序」、「自由貿易體系」，都是由二戰後美國一枝獨秀的條件下演化而成，這包括了WTO、世界金融機制等等；時至今日，美國即使依然強大，但已經無法繼續支撐這個秩序，美國人其實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民主黨以及自由主義派，還想繼續打腫臉充胖子，直到川普這個聰明莽漢生意人跳出來說：夠了，美國不能再為過去的「美國秩序」買單了。

二、川普雖莽但不傻，當年的交易避稅高手，怎會不明白關稅

之有弊無利？怎會不清楚強強聯合「合建、共賣」的優勢？他會傻到堅持只跟散戶做單邊交易的地步？在打亂原先的混亂關稅體制，世人以為他是「單邊主義者」之後，他立馬快速和歐盟開啟「零關稅」談判。估計在歐日之間已經建立了零關稅同盟之後，接下來川普也會很快與印太板塊的印度和東協建立類似零關稅或低關稅機制。中國還要玩已破落的WTO關稅遊戲，美國不跟你玩了。

三、世界安全體系上，制裁核武在兩年內就可威脅美國本土的朝鮮，以及幾年內就可威脅印度、中東的伊朗。破格安排川金會先安撫住朝鮮，就在世人懷疑成效和金正恩不放棄小動作的當下，估計川普會在近期內對伊朗下重手，不排除軍事行動，殺雞給猴看，使得金正恩不得不服而配合美國開出的條件。

相對而言，已經進行了四、五年的「習局」–以經帶政、以金援帶軍事的「一帶一路」策略，在失去了傳統美國秩序的便車效應之後，必將疲態畢露。當前習近平進退兩難，只能令人同情。國內經濟、金融壓力如山重，政敵群起而攻之，紅色家族紛起而利用之；國外「撒幣外交」試圖以人民幣代替美元，但沒有一個國家買單。更讓習難堪的，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紅色家族外逃的數以兆計美元資產，以及龐大的「以金干政」情報體系，已經引起西方國家的普遍警覺，遊戲玩不下去了。

簡要而言，「川局」揭示的是美國的牛仔本性，而「習局」揭示的是中國的天朝專政本性，兩局在地球上對撞，最終輸贏勝負如何，由你自己判斷。台灣在此兩局下的進退，則建議「九字策」：（對川局）不掉隊、（對習局）不插隊、（對自身）除內弊！

G20後中共的幾種可能

當下美國正在和中共算總帳，帳算下來，中共的命運會出現哪幾種轉折？又會如何牽動被它一黨專政的中國？回答這兩個問題，需要衡量的變數很多；很多人認為善變的川普是變數之一，但這看

法是不對的。所有的變數，都在中共這方。

何出此言？可以總結為一句話：今天美國對中共的壓力政策，反映的是美國參眾兩院、共和民主兩黨之間的共識，而中共表現出來的種種抗壓舉動，反映的並不是一個「政府」的政策、也不是一個「政黨」的共識，而反映的是派系鬥爭下的分裂。

請注意，以上所說是觀察這場大戲的密碼；若沒掌握到這密碼，不要說後戲看不懂，就連已經播放的前劇，多半也是錯看。

首先普及一下這密碼的背景知識。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其實只是一個符號，這符號的真正內涵是：一群具有傳統江山觀加皇朝觀的家族和派系，冒充為一個「政黨」，然後再繼而冒充為一個「政府」，聲稱代表一個「國家」。說中共「黨天下」，其實是客氣了；當年的蘇共才是「黨天下」，而中共的真相是「家＋派系天下」。

為了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現代國家接軌，中共才搭了一個大型「影視基地」，叫做「政府」，負責拍片和剪接。主要演員都是那些分屬家族和派系的一小撮人，五千萬名製作人員，其他十三億人都是被指揮的「群眾演員」。基地內其實都是布景，「國防部」只是一塊招牌，連獨立的辦公室都沒有，就只是一塊掛在中共軍委辦公大樓外面的招牌和一個網站。所謂的「外交部」、「財政部」、「中央銀行」，雖然都有獨立辦公大樓，但不過都是「黨部」的附屬小名、附隨機構。西方被哄了三十年，以為是在和一個政府打交道，即使看明白的人也甘願被哄，因為這個派系家族集團讓西方有錢賺。

現在，美國看懂了中共一半（還有一半沒看懂，但那是後話），要算總帳了。公平的說，川普這個人算帳太精，不願既往不咎，也不認美國自己過去合法、非法得到的好處。但美國要算的是三十年的總帳，而不是什麼幾千億的關稅、也不是被偷盜的知識產權，甚至不是什麼軍事爭霸。總帳的真正內涵是：在已經到來的科技環境下，中共勢必對外輸出「科技化集權技能」，以中國為輻射

中心，助長全球的集權國家，形成人類文明未曾見過的集權體系。

由於是國家共識，美國政府不會停手，一直到中共的集權輸出能力受到控制為止。固然美國會夾帶一些其他「美國優先」的目的，諸如遏制中共軍力、維持美國地緣霸權等等，但是這些夾帶的項目都不足以完全解釋美國接下來將對中共下的「重手」。

回到中共命運這主題。中共「竭澤而漁」的集權經濟體制，絕對經不起美國的全方位壓力，而其家族派系的權力尋租、利益分贓的結構，也絕對經不起當下的金融、貨幣、就業、物價壓力的挑戰。派系嚴重分裂之下，所謂的「中共」已經分裂出幾條路線：（1）妥協收買派：與白宮妥協，同時收買美國政商界和媒體。（2）顛覆美國派：介入美國2020選舉。（3）吃草派：吃草三年，也要與美國鬥爭到底。（4）法西斯派：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加速擴軍，脫離美國軌道，強化「一帶一路」軌道。最後還有一派。（5）取而代之派：實質削弱習近平，另人主政。

這幾條路線相互交錯，因而過去大半年間，中共對美國舉棋不定，出台的「政策」也多次反覆。川普的白宮也出現過反覆，但美國的反覆乃基於國內越來越強的共識，中共的反覆則基於內部分裂下的路線鬥爭，兩者的「反覆」不能放在同一水平線評價。

美國的反覆，已經升級到要求中共開放網路、解除宗教禁令、停止侵害人權。這三項都是可讓「一黨專政」一槍斃命的要求，不管哪一派系，都不可能接受。事實上，中共對這三項都在加速收緊，也已說出「打，奉陪到底」。形勢之下，即將於六月底到來的G20，除非出現奇蹟，不然習川不會談，不然就是會談時一翻兩瞪眼。

所謂「奇蹟」，指的是雙方以美國的條件達成協議。若奇蹟出現，代表的是上述的「取而代之派」已經讓習坐不住了，而川普也同意伸出援手，那就是世界的幸運了。（本文寫於2019年6月7日）

第五章

中共危機是台灣轉機：中國的癌細胞切片

第五章

中共危機是台灣轉機：中國的癌細胞切片

【前言】

不久前，與一群來台遊歷的年輕創業者聊天，他們來自深圳、上海、北京，以及美國矽谷。年紀多在三十餘歲至四十餘歲，行業多半是創投、科技，背景有普通家庭出身、媒體出身，還有紅三代，有些人來過台灣多次，有些人第一次來台。他們人數約二十人，之間交情很厚，因此都敢放真言，但也會打趣的說：這些話在台灣講講可以，回國後可不敢說。

大家溝通用的工具，當然是在中國稱為「普通話」、在台灣稱為「國語」的語言，否則，齊魯語、吳越語、粵語、台語、英語交織，豈不雞同鴨講？這群人屬於中國新生代，也就是七十後、八十後，少量九十後。既然身在台灣，最關心好奇的問題是：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最後會變成怎樣？台灣當下詭異的政局會如何發展？

三個小時聊下來，大家達到的最大公約數結論是：一、中國現在是有巨大問題的。二、中國的巨大問題的主因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三、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共的施壓，對未來的中國未必是一件壞事。四、台灣如果被統一，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是一件壞事。雖然如此，他們對台獨這件事，還是語帶遺憾，但看得出來，那點遺憾是出自文化感情，而不是政治立場。

面對這群在我眼中算是年輕人的下一世代，我提出了一個視角後，大家都頓然顯出釋懷的表情。台獨不台獨，統一不統一，當下就不是問題了。這個視角，成為了幾個最大公約數之間的最大公約數。

視角是這樣的：大家都使用方塊字，今天全世界使用方塊字的人有大約十四億五千萬人，其中十三億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千三百多萬在台灣，其他五千多萬人分布全地球。既然大家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問題在中共體制，而大家又欣賞台灣的民主自

由趨勢，那麼如果大家關心「方塊字文明」的未來發展，台灣就是「未來方塊字文明」的幹細胞。而今，中共把台灣的獨立存在視為威脅它的癌細胞，是不是搞顛倒了呢？其實，中共才是「未來方塊字文明」的癌細胞。請問，你是要保護幹細胞，還是保護癌細胞呢？

接下來，就是對這群年輕實幹家最大困惑的解答：中國和台灣未來關係的變化，就要看究竟是幹細胞改變台灣的速度快，還是癌細胞改變台灣、中國的速度快。這群年輕人都是聰明人，不用我再演繹了，大家轟然稱是。

老實講，我不知道如果面對的是一群同樣年齡層的台灣年輕人，這個「最大公約數視角」，能不能帶來同樣的接受度？能不能擊穿被「統獨二分法」、「藍綠二分法」主宰的台灣社會？

對台灣年輕世代，我只能這樣說：如果不能接受「未來方塊字文明」這個概念，那麼就應該努力學通至少一種外語，例如英文、日文、德文、法文，甚至阿拉伯文、泰文、越南文，達到聽說讀寫流利順暢的地步。如果一個台灣年輕人，只會讀寫方塊字、只會說聽懸掛在方塊字底下的口語，那麼我有一個壞消息要給你，就是那個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陸塊，方塊字人口是台灣的六十倍，而且未來一千年不會向東西南北任何方向移動，永遠只距離台灣十多公里。

但如果你對「未來方塊字文明」這個概念不排斥，那麼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態勢可以立刻主客易位，因為一個身體被癌細胞快速擴散的患者，到頭來最珍惜的就是可以救命的幹細胞。國際上，大多數民主國家，也都珍惜台灣的幹細胞地位。

把話說到底，關鍵還是台灣自身的幹細胞濃度、新鮮度夠不夠？認不認識癌細胞？繁殖速度是否足以抵禦癌細胞的入侵？你是幹細胞，還是癌細胞？這是一場幹細胞對癌細胞的戰役。

以下各小節，可以視作對「中國癌細胞」的切片；從文化切片，到社會切片、經濟切片、政治切片。最後，討論大家心中最大的問號：**2025**年以後的中國長什麼樣？

世界上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

用世界的尺度來看，無論是從文明的角度還是從政治的角度，世界上沒有所謂的「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天天用台灣做文章，那只是當下統治中國的中共所用的話術統戰，用意在於搞混世人的焦點。

而所謂的「中國問題」，其核心關鍵只有一個，那就是「一黨專政」的問題，其他都是次要問題。全球的學界、政界和輿論界，早已失焦多年，放著核心問題不談，只關注枝節問題，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要的：你們大家儘管談「中國」、儘管批評「中國政治」，甚至譴責「中國人權」，一切都可以，只要你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一黨專政」這要害就可以。

「一個中國原則」，就是中共話術統戰的登峰造極之作。世界上本來就只有一個中國，它現在的名字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把台灣扯進來，是為了避開人們發現「一個中國原則」這命題，在邏輯上推論不出「一個中國必須由中共一黨專政」這命題。

同理，中國當下正在推行的「台灣的一國兩制」也是欺世之語；為什麼不是「中國的一國兩制」呢？因為，在話術上，如果用的是「中國的一國兩制」，那麼在邏輯上就得討論「中國的一國兩制可不可以不由中共一黨專政」這個問題。

而台灣社會竟然還數十年如一日的圍繞著中共的話術統戰做反應、做駁斥。這顯示了台灣在語境上掙脫不出中共話術的罈子，這是台灣人語言能力、思辨能力低落的現象，不過這是後話，此處不

表。

台灣想百分之百擺脫「中國」，這是一個錯誤。未來一千年，台灣不會往東移動一千公里，中國也不會往西移動一千公里，這鄰居是做定了。而且，兩邊使用的都是方塊字，台灣要取回話語權、定義主體性，必須加強自己國民的語言能力、邏輯思辨能力。首先，從區別「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這三個層次開始。

「中國」（或「中華」），是一個以方塊字為聯繫的文化概念。孔子思想用方塊字傳了下來，鮮卑人李世民（唐太宗）學了方塊字，愛新覺羅．玄燁（康熙帝）也學了方塊字，同樣的，你也學了方塊字，否則你不會在讀這本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近代的國家概念，而近代的國家概念還在演化中。例如簡稱為「英國」的「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國家概念還在演化中。而簡稱「中共」的中國共產黨呢，充其量只是一個政黨的概念；目前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的這個近代國家，當前由中共一黨專政。說它「充其量」是個政黨，因為實質上它和民主制度下的「政黨」不一樣，本質上它是個專制政權。

必須承認的是，中共是人類政治現象中的一個新物種，它是東方皇朝主義、梁山泊主義、史達林主義的混血產物。如何面對這個新物種，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新課題。地球上的人類，尤其是西方人，一直到最近三五年，才意識到這個新物種的特徵和本質。就像對新型病毒，學術界應該給「中共」這個新物種一個科學編號，因為它的專制DNA演化和適應能力特強，可以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不斷的發展出新的專制病毒，本來只是接觸傳染，現在已演化到空氣傳染。

由於歷史因素以及共同使用方塊字的因素，台灣可能是人類為了預防或治療這新型專制病毒，而提煉出疫苗的唯一地方。喜歡或不喜歡，這是台灣無可迴避的，也是可以對人類政治文明做出絕大

貢獻的角色。但是，過去幾十年的台灣還沒完全清理乾淨自己體內的專制病毒，需要趕緊加油提煉，才能無愧的向世界提供疫苗。

換個方式說，如果「中國」這個模糊概念還要有健康前途的話，台灣就是世上僅存的幹細胞。這顆幹細胞的主體獨立性，對世界就是其珍貴性所在。在中共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的人民，在物極必反的道理下，遲早會擺脫中共話術而理解到這一點。遲，還是早？最遲不會超過十年，最早可能就兩、三年，時間點的拿捏，台灣人得學會。但在學會之前，台灣人的腦洞必須開，那就是懂得區別「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這三個範疇。

中共不等於中國：
單一切片看中國是危險的

腦筋急轉彎問：大象怎麼吃？答案是一片一片切來吃。再問：中國這麼大，怎樣才能理解它的本質？答案是：它太大了，大到了沒辦法用一個本質來形容它，只能一片一片切開來理解。

然而，用少數切片來拼湊我們腦中的中國是危險的，尤其對台灣而言。其他國家誤判中國，沒有立即的後果，但台灣若誤判中國，後果是立即的。

沒在中國生活過的台灣人，看到的切片有限，其中最典型的包括：中共官員對台灣的擠壓態度、中國團客的行為、網上五毛黨的攻擊、網上憤青充滿敵意與粗鄙的言論、娛樂新聞中的明星。其次是新聞中的中國成功企業家、文青、在台陸生、中國網上的時評、自由行陸客的高水平。而台灣人幾乎完全看不到的是：胡同內的大爺大娘、悶聲發大財的中小企業主、大量的小白領「月光族」、失業蝸居的畢業生、城市農民工的生活狀態、總數超過八億的農民、偏遠山區村民。

台灣看得到的中國切片，不管是人物還是事件，最多只佔中國全貌的百分之二十，其他的百分之八十台灣人看不到、看不清。這對台灣不是一件好事；你家開的瓷器店隔壁住了一頭大象，你能不去主動了解牠的脾氣、生理結構、心理狀態？

距離台灣人理解力最遠的是以上所有切片人群的心理世界。這個距離有多遠？幾乎就像習近平距離太陽花青年的心理世界一樣遠。因為，中國人不管屬於哪個切片，基本上都不會和台灣人、香港人交心，他們知道自己身陷中國，因而對他們眼中「同文同種」的香港、台灣，有某種說不出來、講不明白的「近鄉情怯」的幽傷，也不知道交心之後會鬧出什麼事來。總而言之，與香港人、台灣人交心就是政治不正確的。相對的，他們對洋人交心的可能性反而大得多，因為沒有近鄉情怯的顧慮。

要台灣人「全面」了解中國，確實不容易。先不說一百多年來的生活經驗差距，單單以體積尺寸來看，一個台灣人若想要隔著台灣海峽「全面」理解中國的方方面面，恐怕得花上半輩子的腦力、精力。因此，台灣人沒必要也沒可能「全面」了解中國。事情得倒過來看，真正必要的是台灣人不能「全面誤解」中國，或者把自己對某些切片的印象當成整體。

中國的面積是台灣的三百倍，人口是台灣的六十倍。中共這部機器，固然給人「大到不能倒」的印象，但事實上，它的黨員人數只佔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六；在過去，它曾經以人口百分之三的黨員比例統治全中國，但那是基於兩個條件：民智未開加上民族主義。今天，民智已經大開，民族主義宣傳逐步失效，中共只有自我改革或被迫改革兩條路，否則難以想像再繼續執政二十年。

從現在到未來的二十年間，台灣當下那基於百分之二十切片的刻板印象，將無法應付台灣人看不到的百分之八十中國所蘊含的力道。喜歡不喜歡，這都是現實，因為中國就在你隔壁，它是你的鄰居。台灣人若還相信「中共等於中國」，以為只要中共垮了或改邪歸正，台灣就可以置身事外的過自己的小日子，那就必然要為此付

出慘痛的代價。

把話再說到底，一般的台灣人真正「全面」了解台灣嗎？或許，包括台灣人自己對台灣，都還處在一種「滿足於少數切片」的理解階段；若是這樣，又如何能期待台灣人全面理解那個面積比自己大三百倍、人口多六十倍的鄰居呢？台灣人又如何能客觀認識自己、客觀認識對方，然後為自己的未來負責呢？

台灣人現在還不理解百分之八十的中國長什麼樣呢？本章接下來，將一片一片的切給你看。有時，也會切出一些「與中國無關」的病理切片，因為中共不等於中國。路漫漫，客觀的知己知彼，應該是台灣的基本功。

中南海政治學：中共的思維方式

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感受到的中共威脅無非是表面的「武嚇」及「統戰」，但對中共最核心的機制──一種截取了中國政治幽暗面，以及蘇聯政治殘暴面而成的怪胎思維，幾乎沒有任何認識。

中共的思維方式，效用足以擊敗當年的對手國民黨，至今還在愚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忽悠了美國將近四十年。

這種思維機制非常獨特，可說是舉世無雙，無以名之，只好依照當年西方針對蘇聯所發明的新詞「克里姆林宮學」（Kremlinology）的前例，發明一個新詞「中南海學」（ZhongNanHaism）來代表它。

蘇聯時期，西方有一門學問叫做「克里姆林宮學」，專門研究蘇聯共產黨的體制以及思維方式。若缺少了這門學問，西方政治家容易在關鍵時刻對蘇聯的外交、戰略、政策做出誤判。

今天，也應該有一門學問叫做「中南海學」，但是西方一直沒把這門學問當一回事，直到最近。過去不在意因為兩個原因：第一，西方雖然和所謂的「中國」打了五百年交道，但終究對中國的

文字、文化隔閡太深，不像蘇共雖然是個怪胎，但畢竟是列寧改造了馬克思思想之下的產物；馬克思和列寧都是西方歷史鍛鍊出來的德文使用者，他們的思維方式對西方世界是有清晰脈絡可循的。第二，由於中共是蘇共調教出來的學生，因此西方習慣於用蘇共的模式來理解中共，而不知道即使在中共發展的早期，中共內的思想家老早就把中國歷史中的「造反術」如梁山泊的游擊騷擾戰，和蘇共的「鬥爭為綱」、「組織戰」、「統戰洗腦」融合成了一體。接著，熟讀歷史和古書的毛澤東，在建國之後又把中國固有的幾千年「宮廷統御」、「陰陽相依」融入了中共的體制思維。對西方人來講，要了解這樣一個胎兒，其困難度不亞於要求大清朝的儒生去理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牛頓和洛克。難怪西方出不了「中南海學」。

「中南海學」駁雜深奧，只能慢慢道來。這裡先從中共幾個階段的思維介紹起，日後再陸續觸其精義和理論。

1921年中共組黨，主導的思維是馬克思對階級經濟的人文批判，以及對中國傳統宮廷統御的憎惡，列寧的階級鬥爭方法看來是最佳的實施工具。一段時間後，中共發現資本家和工人並非中國的主要矛盾點，地主和佃農之間才是掀起矛盾的下手點。於是，「鬥地主」和「農村包圍城市」成為主要戰術。

毛澤東是一個打通了中國「陰陽並濟」思維和馬克思傳承自黑格爾的「辯證、正反合」思維之人，因而他可以抬頭看江山、低頭裝孫子；他可以在失敗之際到重慶高喊「蔣委員長萬歲」，然後徐圖反敗為勝之道。說這點是啥用意呢？就是如果有一天習近平先生到華盛頓高喊「美國萬歲」，世界請不要驚訝。

建國之後的中共，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內部鬥爭。昔日的同志關係立馬變成敵我關係，因此之前用來鬥爭國民黨的手段全數用在內部領導權鬥爭之中。對地方幹部及傳統鄉紳勢力，通過「三反五反」徹底清洗一遍，乃至升級到農民起義式的文化大革命。這又有什麼當代意義呢？那就是如果有一天外人發現，近幾年的反腐及

精神淨化運動，不過是三反五反和文革的老片新拍，世界請不要驚訝。

中美建交，乃是對馬克思、列寧思想和蘇聯「第三國際」的徹底背叛。推動者是毛澤東，他再度施展了能伸能屈、陰陽並濟的本事，模仿明朝朱元璋策士朱升之計，定下了中國奄奄一息時刻的九字策：深挖洞、廣積糧、不稱王。

九字策，在鄧小平手中濃縮成了四個字：韜光養晦。鄧死後，江澤民與時俱進的將其再轉化為五個字：悶聲發大財。在這種由剛轉柔的陰陽思維下，中國步入了一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供養百分之十五的黨員加城市菁英的時代。

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由於缺少了「中南海學」，看不懂這局面。除了極少數的人，大多數人認為「中國」這個國度，終於走上了現代化的思維，市場經濟及普世價值指日可待。

「中南海學」—中共的目的論、工具論

西方人過去三十年對中國的期待—逐步融入西方現代化以及市場經濟的軌道，在2017—2018年間，終於破滅了。他們等到的是一個貌合神離的中國；一個在硬體樣貌上比西方還要西方，但在精神上越來越像十九世紀、甚至十八世紀大清王朝的中國。簡要的說，就是一個信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權力體制上絕不讓步，相信只要在「船堅砲利」上抄襲到位，就能光大自身的中國。

西方世界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把「中共」類比於「蘇共」，而把中南海內的思維模式歸於「共產主義」的範疇。殊不知對中南海而言，「共產主義」也是「西學」，是拿來「用」的，這包括了抄襲並青出於藍的蘇共「黨幹部體制」（nomenklatura）；中南海的「體」，也就是核心的精神，其實是「王朝統御」和「宮廷政治」。

看不到這點的人，恐怕永遠也看不懂中南海。共產主義、民族

主義、國家主義，乃至市場經濟、科技主義、船堅砲利，對中南海而言，都是工具，都只是拿來用的「西學」，都不是思維的主體。那麼，主體是什麼呢？就是以自己為核心，建立一個萬世萬代的王朝。這種主體思維，可以用一句中國古訓清楚的表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請讀者注意其中的幽微性；修身是鍛鍊自己的心智，齊家是擺平利害相關者，治國是讓隸屬於自己的人民安於生產而不亂，平天下是讓萬邦服氣而不挑戰自己。這一套思維的核心作用點是個人自己，而不是外在的「人民」（百姓），也不是「國家」，更不是「天下」。但由於要「齊家」，因而需要宮廷政治；由於要「治國」，因而需要統御之術；要「平天下」，因而需要一套對外關係的模式。

以上說得太抽象了？讓我們落實到現實狀況。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南海一切作為，不管是經濟政策、政治內鬥、軍事建設、對外關係，其決策的心理最深層出發點，既不是人民，也不是國家，不是民族，不是世界，而是掌權階層的自我，包括了自我的利益、自我的目的。

只有在洞察了這套 「一切由自我目的出發」的思維密碼，我們才能真正了解，為什麼毛澤東會在「計劃經濟治國」餓死了三千萬人之後，還可以若無其事？為什麼可以發動文革，以一小撮人之外的所有人為芻狗？為什麼天安門學生抗議事件會以出動坦克鎮壓為結局？為什麼民族主義成為今天保權的最後工具？為什麼北京城在利用了外地民工作為建設工具之後，可以幾天之間鐵腕驅除「低端人口」？為什麼所有人民集體創造的財富，可以為一黨及黨內的少數家族服務？

既然是由自我目的出發，一切合乎我目的的事物，都可以隨時用「拿來主義」當成工具，當然也可以隨時拋棄。中共有一句著名的話，「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除了資深黨員，很少人理解這句話的精義。這句話可以翻譯為：天下沒有不變的道理，一切問題都

要根據當時當刻的情況和條件，能屈能伸，怎樣做最符合當下的自我利益就怎樣去做。

這是極端的現實主義，其間沒有上帝、沒有公義、沒有普世價值，只要能維護自我、達到目的就可以；該施威權就施威權，該裝孫子就裝孫子。從游擊戰到統戰，從經濟到政治，從軍事到外交，莫不如此。這並不是西方共產主義的產物，而是中國傳統「打天下建立王朝」下的典型兵家、法家、陰陽家思維。

今天，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衝突，其本質並不是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而是中國傳統王朝下陰陽家、法家、兵家思維模式，與西方的宗教有神論、人世法律治理、權力制衡傳統之間的衝突。

「中南海學」—不懂中國農民就不懂中國共產黨

西方專家對中南海思維的隔閡，還有一個根本的原因：他們頂多看到了中共的皇朝特性，而不知中國社會內的農民個性與中共紅朝之間的死扣關係；而事實上，這種死扣關係並不始於中共，而是歷史的延續。中共與西方世界的格格不入，至今仍可解釋為一種農業皇朝與科學工業國家之間的思維方式對沖。

中國以農立國，中共接管的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民社會，而中共得以擊敗國民黨的三大要素內—蘇聯的武器和政策支持、國民黨與農村的徹底脫節、以毛澤東為主的農民思維—與農民有關的就佔兩項。因此可以說，不懂農民就不懂中國共產黨，不懂農民思維就不可能懂得中共思維。

中國農民思維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1）世道是零和（zero-sum）的，飯只有一碗，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反之亦然。（2）命運在天，風雨由天，人不與天爭。（3）環境是周期的，冬去春來、秋涼冬至；掌握周期中的播種、收割時機就是一切。

（4）境況不好就熬，就忍，米沒了就吃糠，糠沒了就吃土。

農民思維，經過聰明人的思想提煉，就成了儒家、道家的世界觀；而在銅板的另一面，專精於統御農民思維的法家也自然應運而生。兩千多年來至今，儒、道、法三種思想並不是平起平坐的，現實中，一直是法家思路披著儒、道的外衣以統御農民思維的人民；文謅一點講，中國傳統的統御術，可描述為「以法（家）為體，以儒、道為用」。

這件事實，到了中共建朝，並未改變，只是「為用」的工具與時俱進；毛澤東時期，用的是列寧共產主義，鄧小平後的改革開放，用的是西方技術和經濟通路。到了習近平的前後，一度試圖引入孔孟，行不通之後又返復到毛路線，形成一種「口稱聖賢，舉毛澤東的旗幟走鄧小平的路」的怪異舞步。

以法家統御思維為主體的中共，自然必須專精於「術」。「術」這個字，涵蓋了一切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用來控制、影響一切相關要素的技能。從政治、經濟、文化到社會治理、人民思想無所不包。一言蔽之，就是「術為法之用，法為術之體」。

術有軟硬；硬的，就是威脅，軟的，就是統戰。此處以軟術為例。在控制、影響人們思想這個目的上，「術」的實施方式稱為統戰，其內涵就是：通過無底線的一切手段，控制及影響人們的思維模式，使其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逐步趨向於符合本方的利益，並做出相應的行為。統戰絕對不是硬邦邦的教條，而是根據對象的處境和心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人而異、因事而異的做出改變。

總結以上，所謂的「中南海學」或中共的核心思維方式，就落在三個概念上：體、用、術。「體」，就是統御江山的法家思維；「用」，就是由一人、一家、一黨的固權固利出發，把世界上的任何人、事、物都視為工具；「術」，就是因人因地因時的取用或拋棄工具，以達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

吃透了「體、用、術」這三個概念的精髓，我們若將其和雕刻

在德國國會大廈門頭上的三個字–「真、善、美」相比較，就可充分了解中西文化在追求上為何格格不入，以及為何中國成為一個現實驅動的社會，而西方成為一個科學、宗教、藝術驅動的社會。

最後說句題外話：台灣，究竟掙脫了幾分「體、用、術」的思維？民主法治在台灣，會不會落入「拿來用的工具」呢？

從「鄧氏約法」到「習氏約法」

當年鄧小平的一句話，力挽狂瀾，穩住政權：「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這句話，等於是執政者與人民簽下了一個契約–甲方向乙方承諾改善乙方的經濟生活，乙方則同意讓甲方繼續執政。這個執政者和人民之間的默契，可以稱之為「鄧氏約法」。隨後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其間的各種政治動盪，乙方基本上都概括承受了，因為經濟生活確實在不斷改善中。

時光來到了2012年，「鄧氏約法」受到了嚴峻的挑戰。雖然乙方的經濟生活還在改善中，甚至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改善。但是，這時已經無人不知，「鄧氏約法」下所產出的最大塊經濟肥肉，其實都落入了甲方口袋中。乙方開始追問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中國有那麼富裕嗎？富裕到了甲方拿走了那麼多肥肉，而我還有房有車有存款？我的財產是真實的嗎？穩當嗎？

讓我舉一個實例。一位四十餘歲的國有金融企業副總，姑且稱他為李先生，名下有兩處北京房產，市值千萬人民幣，銀行裡有幾百萬人民幣的存款，夫妻月收入五萬人民幣。放到任何一個其他國家，李先生一家三口應該都是小富人，此生應該無憂。但是，李先生對未來的人生卻有高度的不安全感，甚至不知道他的身家十年後還是不是他的？還值多少？重點是，李先生還是個黨員。

李先生的不安和質疑，代表了三十餘年來那先富裕起來的「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若連這個族群都有如此感覺，那更不用說那些身處其他「大部分地區、大部分人」的不安全感了。「鄧氏約法」在甲方的權力結構現實下，三十年下來究竟是黑貓還是白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富裕起來後，接下來怎麼辦？鄧小平把問題留給了後人。

2012年習近平執政後，給出的方案是「治黨、打腐」。治黨打腐不是新方案，因為已經喊了三十年了，結果是越治越貪、越打越腐。貪腐的現象控制不住，有些人歸咎於「只打蒼蠅、不打老虎」；但也有明眼人指出，貪腐本來就是過去三十年經濟起飛的原動力，沒有腐敗這潤滑劑，中國經濟也不會崛起。將這兩種看法放在一起，其實透露了中國經濟模式內的一個最根本的矛盾：不打老虎，中國的貪腐會越演越烈，人民不可能繼續容忍，而若打了老虎，其嚇阻效應將使得國家經濟機器的運轉失去潤滑油而停擺。

事實上，習近平的2012─2017年第一個任期，正是落入了這種兩難；習的「打虎無上限」動了真格，拉下了如前常委周永康、軍系最高領導徐才厚、郭伯雄，以及數位在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無數的省部級幹部，的確讓人民看到了魄力和決心，但是其派系株連的寒蟬效應，也使得國家行政機器陷入了整體不作為。

很顯然，「鄧氏約法」在中國的權力結構下，進行了三十餘年之後在兩個方面都已經走到了盡頭。其一，即使是那些一部分地區的一部分「先富階級」，都已經開始感受到強烈的不安全感。其二，以「打大老虎」來解決結構性貪腐問題已經陷入進退不得的兩難。

中國當下急需一個甲乙雙方的新約法，這任務落到了習近平身上，我們姑且稱之為「習氏約法」。「習氏約法」必須涵蓋三個層面：（1）如何在把貪腐這個「生產力元素」從黨機器、國家機器中消除後，行政機器依然可以恢復運轉。（2）如何讓「已富階級」對自己的合法資產安心。（3）如何讓「未富階級」對未來生

活有信心。

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正如習近平的博士論文導師、人稱國師的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在最近一篇文章所說，習近平的改革落入了兩個陷阱：左陷極權，右陷權貴。文中說：「為了壓制住權貴集團，很容易走到極權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權貴佔了上風，很可能又是一場對社會和民眾財富進行掠奪的戰爭。無論哪一種，結果都不堪設想。」

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總體來說，實質上又再次處於當年鄧小平面臨的局面。但這一次形勢更為險峻，甲方執政的合理性能否持續，端看中共十九大所提出的「習氏約法」內容，乙方是否買帳了。但從十九大後習政府越來越高壓的手段來看，除非他及時回頭，否則人民對他的新約法是無法買單的。從現在到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就會見真章！（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8**月）

抓不到「權本主義」，
任何中國分析都是白搭

對「資本主義」沒概念的人，你很難使他搞懂2008年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同樣的，抓不到「權本主義」精髓的人，很難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

七年前我撰了一個詞–「權本主義」，用來捕捉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現象的本質；因為找不到相對應的英文字，也同時杜撰了「Powerism」這個字。常用的西方政治學概念，諸如「威權社會」、「獨裁社會」、「專制社會」，雖然經常被人用來形容中國，然而，這些概念或多或少都沒抓到要點；有些缺了一點什麼，有些又過於誇大了一點什麼。

三十年前還有西方學者將中國類比為蘇共統治下的社會或東德社會，那也是搞不清楚狀況。後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成長和社會自由度，推翻了以中共類比蘇共的理論基礎。後來，看到了

中國人、中國經濟以飛快速度「見錢眼開」，到了窮凶極惡的地步，又有人發出「一切向錢看，比資本主義還要資本主義」的論述，而冠以「國家資本主義」之名號。

這些看法都有其道理，但也都不完整。照理來講，台灣應該比西方人更了解中國的本質。然而，檯面上的人物，不管藍綠，經常接觸的都是中共官員；不管是親中還是反中，基本上多是被中共理論統戰的一群人，只是對統戰的內容正負反應不同罷了。結果就是，今天台灣學界、媒體界對中國的分析手法，多數來自西方觀點，是愛是憎，反正西方也有兩派，各取所需就是了。

稍微解釋一下什麼是「權本」主義。從字面上來看很好理解，就是「以權為本」嘛。但什麼才能稱得上「為本」？這裡容我用市井語言來說明。俗話說「知人知面不知心」，講的就是一個人的「本」，在一般情況下看不出來，只有在被逼到死角或面臨抉擇的時候才看得出來。對於事態，每個人都有他的第一反應，但在社會化或組織性下，他那真正的第一反應是不會表現出來的，因而「聽其言」是沒有用的，一直要到利害攸關的時刻，「觀其行」才是準確的；那就是這個人的「本」。

因而，「權本」的意思就是，舉凡大到政治、經濟，小至生活境況，今天生活在中國的大多數人（不敢說全部），心中第一反應就是「算權」，而不是「算錢」。換個方式說，首先得要看清楚自己和對方的權力位階誰高誰低、誰強誰弱，然後才做出相應的社會化或組織性的反應；高明者會相應的講理，低俗者可能就直接講利害。

舉個小例子。在中國開會，無論官民，坐在越前面的權力越大，越靠近領導的權力越大（台灣官場亦如此，民間則鮮有此禁忌）。再舉一個生活小例子。北京市是全中國「以權為本」的高潮點，由中國人經營的豪華五星級飯店，無論大堂或電梯都豪奢，但若你坐電梯直下停車場，你會嚇一跳，電梯內外猶如兩個世界，停車場通常幽暗雜亂。道理何在？因為坐車後座的人位高權重，通常

都在飯店大門就下車，停車場是給司機用的，和權重人士無關，因此可以輕忽隨便。

以上僅僅是「權本」反應的兩個極小的切片，但見微知著。從另一切片下手：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必須講關係，「有關係則沒關係，沒關係則有關係」，但「關係」是什麼？「關係」這詞學問大了，它不是人情、不是感情，甚至不是交情；它是一種權位相互掂量、相互交錯之下的處理事務的學問。解放軍內的買官、賣官，不是有錢就可以，還得「有關係」。那就是你要買個三級官，單憑和二級官有交情還不夠，你得先打通你上級的上級的關係，使他向你的上級「打個招呼」，你的上級才敢收你的錢。再如，你的小孩要上知名幼兒園，除了錢（叫做贊助費），還得打通校長關係，承辦人員才敢放行。或許，你是個醫院的大夫，校長想著誰不生病呢，將來還得要靠你挪病床呢。以權壓權，以權易權，這才是「關係」的真諦，也是必然從上到下一路腐敗的底層邏輯。

以上說的，都不是重點。真正的重點是：在中國，權本主義原本就大量存在於皇朝帝制的中華文化之中，經過了共產黨六十年來的教化，已經深入到了每個組織、每個機制，甚至每個人的骨髓肌理。上自中央政治局、公檢法系統、國營企業，下至民間企業、工商城管，甚至一個小區的居民委員會，無不在權本反應下運作。外人有個誤會，以為中國這些年來的經濟成長靠的是資本主義的應用，事實上骨子裡靠的是權力的活絡化和市場化。錢，只是權的附屬衍生品，從來不是真正起作用的核心要素。拉雜談這麼多，對台灣社會有什麼意義呢？意義多得說不完，限於文長和讀者的耐心，此處先只談其中的兩重意義。

首先，台灣人得意識到，自己並沒有完全擺脫「權本主義」的流弊。雖然已經有民選，但我們的中央／地方官僚體系中，權本還是潛規則。我們之中還是有人習慣於搞（中國式的）關係，政黨輪替不見得會改變這點，還得要靠青年世代來革除陋習。

其二，在台灣與中國的兩岸關係上，台灣人多數還放任執政黨做代理人。照理來講，執政黨既然被選出，本來就應該代理民意。然而，台灣的執政黨，不管藍綠，習慣上都把兩岸關係當作政黨與政黨之間的談判來對待。問題在於，台灣的官員倘若是萬中挑一的好手，對方可是六十萬中挑一的好手（中國人口為台灣六十倍），因而中方即使只是派出中層代表，但其IQ、談吐、見識、論述能力、親和力，都會使台方代表「驚豔」，其表達的「善意」很容易為台方聽進去。但別忘了，中國官場是個百分之百權本主義的賽場，其中層官員甚至高層官員，不管他個人想法如何，到時哨子一吹，立刻就會歸隊望中央，任何過去的人情、感情、交情、政策態度，都可瞬間消失。

在中國權本主義之下，台灣政府必須學會一件事：兩岸關係，不能想像成政黨與政黨之間的交道，而是政府（台灣）與政黨（中共）之間的交道。不管台灣各級政府打交道的對象是誰，你都是在跟那個政黨中那一位權力最高的人打交道。而且，對那位權力最高的人，不必花精力去研究他的性格、意志和好惡，因為他也是權本主義中人，個人的性格、意志和好惡，到了關鍵時刻都不會起作用，台灣只需要隨時了解他的權力處境並加以因應就可以了。而這種理解中國的角度和技能，正是台灣現下最缺的，也是造成兩岸交道節節緊張的台方因素之一。

而台灣人民呢，最需要學會的一件事就是：雖然在過程中亂象叢生，但台灣正在由「權本主義」向「人本主義」演化，這點今日中國望塵莫及。我們要相信人性，六十年前的中國，社會上還是存在許多人本主義精神的，當下正在被喚醒之中；台灣，就是一個座標。這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道，不是任何執政黨所可以代理的。

海馬不是馬，「權場」不是市場

2018年引起中國社會巨浪的「假疫苗事件」，和幾年前在台灣

引發社會震盪的「假食用油事件」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看懂其中的本質差異奧妙，對台灣人民至關重要，因為這牽涉到台灣人對中國這個國度、尤其是對中共這個組織的正確理解框架，而這理解框架若發生偏差，不但對台灣的自我認知有著巨大影響，甚至有一天可能關係到台灣的生死。

先說結論，然後再細細分析。簡略的說，台灣的「假食用油」是一個發生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的事件，而中國的「假疫苗」是一個發生在「權本主義」下的事件。或者換一種措辭方式，前者是「市場經濟」下的邪惡，而後者是「權場經濟」下的邪惡。

「資本主義」（Capitalism）大家都明白，就是經濟活動的一切大小事，都以金錢掛帥為核心思維而展開，活動的場域稱之為「市場」。「權本主義」（Powerism）是我多年前自創的新概念，意指所有的經濟活動，甚至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無一不以權力為核心運作邏輯，其場域只能稱作「權場」。

之所以自創「權本主義」這新詞，乃是因為看到西方經濟學家看不懂中國經濟本質，而發明許多似是而非的名詞如「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套來套去都脫離不了西方世界所熟悉的「資本主義」，而不知他們面對的並不是一個變種的資本主義，其實質上是一個不同的物種。這個謬誤，有如把海中那個長得有點像馬的魚類生物，稱之為「海馬」一樣，使得無知的人認為牠也是馬的一種。

在權本主義的權場下，權是本尊，錢只是分身。權力要轉化為金錢，必須通過經濟學所稱的「尋租」過程。權力，比起金錢更為隱晦，這是因為金錢可以數量化、可以記錄；即使在邪惡的領域，都不容許有「糊塗帳」，金錢分贓是一門算術而不是藝術。權力，就不一樣了，它可以被感知卻難以計量，它可以被交換卻無法記錄；它像機器一樣放著太久不用會生鏽，它像肌肉一樣不用會退化。因此，世界上有各式各樣資源的銀行，但絕不會出現「權力銀

行」。

市場活動由於以金錢單位計價，因此講究的是「佔有率」，而權場活動難以計量計價，因此除非不玩，要玩這遊戲就得「寡佔」。這裡就要導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任何有官方參與的經濟活動，最終一定是朝「寡佔」的方向移動，哪怕在過程中出現某些看起來像是「市場競爭」的現象，那也只是「海馬」而已；海馬不是馬，牠的生理結構、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完全和「馬」不同。外商或台商，倘若在表象宣傳下誤把海馬當作馬，最終的結果只能有兩種：遺骨於中國戰場，或者自己原來的馬退化成海馬。

中國假疫苗事件，乃原先家族長期寡佔下產生的不良劣質山寨品，在家族政治奪權白熱化的境況下，被對手曝光的「權場事件」，而不是台灣資本家為了多賺幾文錢而發生的「市場事件」。市場事件可以通過信息透明、輿論監督、代議士揭發而改善，而權場事件沒有可供改善的社會機制。

今天台灣不少人落入了「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簡單思維而看衰台灣。我的看法是：天下沒有完全乾淨的政府和商人，但有些國家至少會洗腳，而有些國家連臉都不洗。台灣的身子已經洗了二分之一，應該加緊繼續洗，千萬不要看到腳臉都不洗、只搽脂抹粉的他人，就嫌自己不夠美。（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7月，原名是〈假疫苗的罪魁是「權本主義」〉）

中國沒有「市場」，只有「黨場」

中國的大城小鎮無一不熱鬧，從食衣住行到房地股票，看起來都交易熱絡。但其實，中國雖然「交易」行為無處不在，卻沒有「市場」，有的只是一個由黨的神經系統組成的「黨場」。聽著有點玄？我來盡量把它說明白，因為這點和台灣的經濟未來有絕對的關係，也和你荷包裡的錢有絕對的關係。

世人以為，中國過去的三十幾年間，已經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政治上再折騰，至少有一大部分經濟活動已經回不去（計劃經濟）了。站在人來人往的上海鬧區，我若對一位經濟學家說：你看到的現象不能叫做市場。他恐怕會問我是在哪個山洞中冥想出來的。

讓我打個岔，從另外一個情境切入。如果台灣的所有公司行號，不管國營還是民營，不論上市還是私營，公司組織圖上都有一個「黨部」參與，並監視公司的決策和日常操作，你覺得台灣還能不能被稱作是一個「市場」經濟體？

中國的事實，遠遠超過上述的假想荒唐情境。共產黨規定，任何組織內只要有超過三名黨員，就必須成立黨支部。這包括了所有的公司、團體、社區，是的，還有家庭。有玩笑說：一位富商家裡僱了一個司機、一個奶媽、一個園丁，如果他們恰巧都是黨員，那麼他們就自動形成了黨支部，按規定必須向「上級組織」匯報。

中共黨員將近九千萬人，全國總就業人口七億七千萬人。這代表什麼？平均每十人的單位，內部就有一名黨員；統計常識告訴我們，三十人以上的從事經濟活動的單位，不論是現代化的公司還是傳統的工廠或農業單位，都有黨支部。沒事的時候沒事，有事的時候，黨中央的意思可以一條鞭的行使到經濟活動的神經末梢。

或有人笑說，都什麼時代了，現在大家都向錢看，那些百萬、千萬個黨支部，不過徒具形式罷了，抵不過老闆的恩情和加薪。這話，在經濟不斷增長的時候，的確不錯，但如果在經濟衰退時呢？當「黨」的恩賜和威懾大過老闆的時候呢？當「黨」有一個攸關生死而非貫徹不可的目標之時呢？

西方投資人近幾年來抱怨中國「過於干預市場」，例如干預物價、強迫企業加薪、偏袒內資企業、用國家隊打壓或哄抬股價等等。這些，都是喝慣了迷魂湯之後的抱怨。中國從來就沒有過公開透明自由的市場，那些貌似「市場」的現象，不過都是為了吸引外資，在「主隨客便」策略下，客人想吃什麼菜，廚房就做什麼菜端

出來罷了。

中國的經濟現在面臨大衰退和結構調整的雙重困難，若不做出極端動作，黨的執政合理性就會遭受根本威脅。到時候，遍布所有經濟單位的黨神經系統，都會隨著黨意抖動起來。但是，中央的理論班子一定會提供一套合乎西方「市場經濟」邏輯的解釋。相不相信它，就看人有多蛋頭了。淺碟子經濟的台灣、口袋深不過中國同業的台商，接下來幾年最好多用「黨場」、少用「市場」來判斷自己的處境和行止。

「權本主義」下的金融危機

中國經常被形容為「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或「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我覺得這兩種形容都不夠準確，甚至是誤導，因為這兩種稱呼都把中國的經濟現象視為一種「資本主義」的變種。但事實上，中國過去三十來年的各類古怪現象，都不是資本邏輯所能夠導引出來的，而只有權力邏輯才能解釋。因而，2011年我在著作中發明了一個新詞—權本主義（Powerism）。

「權本主義」的最核心特色就是：西方所謂的「資本」，在中國只是權力的一種屬性，而在資本主義下，權力只是資本的屬性。用「本尊」和「分身」為比喻，資本主義下，資本是本尊，權力是分身；而在權本主義下，權力是本尊，資本是分身。

用權本主義來解釋中國經濟現象，一切清晰而明瞭。例如：中國的股市起伏，其實大多是依政治權力起伏而定，若看不明白中共中央權力鬥爭及其所屬派系的權力拉鋸，就不可能看明白股市。再如：中國並不存在西方經濟學所稱的「房地產」（Real Estate）；Real Estate的市場性基於一個假設：房地有產權。而中國的房地，並無產權，只有一定年限的使用權。因而，中國房地的本質比較像是長期債券，只是一種依賴權力信用撐起的金融產品，而不是硬資

產。

權本主義下，中國所有的「資產價值」都屬於統治者所有，權力換手，價值就換手。這就是為什麼中共的內鬥如此腥風血雨，為什麼「民營企業家」有機會就將暫時擁有的資產轉化為現金外逃到資本主義國家。不但民營企業金錢逃亡，就連國營企業經營者、權鬥落敗者也金錢逃亡，甚至連當權者都要為自己將來可能的權力垮台而預留金錢逃亡路徑。近來發生在中國權力人物、富豪身上的一連串鬥爭、逮捕、死亡事件，莫不源由於此。

資本主義下的西方金融危機，多數起自金融商品的過度衍生，以及其帶來的債信鏈條斷裂。權本主義下的中國，一旦發生金融危機，一定起自權力將資產轉化為資金而後外逃掏空經濟地基。

中國富豪，都只是「庫房」的身分

1992年鄧小平南巡深圳撂下狠話：改革開放才是硬道理。當時中國最有錢的一批人被稱作「萬元戶」，也就是身家達到不可思議的一萬元人民幣的那些生意人。

1992年，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茲的資產是五十九億美金，股神巴菲特是四十八億美金，香港的李嘉誠三十八億美金，台灣的蔡萬霖三十四億美金。中國的「首富群」，資產平均是這些世界首富的幾百萬分之一。

2016年，僅僅二十四年之後，中國的「十億（美元）翁」數量從零達到世界第二，以二百五十一名次於美國的五百三十六名，香港則有五十五人，台灣三十三人。「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製造富豪的速度也是資本主義的十倍甚至百倍，真神奇。

事實上，中國的「十億翁」的數量遠遠不止檯面上的那二百五十一名，所有的紅色家族、官場家族都不在會計制度的雷達上。習近平已經、即將打掉的老虎，也都不在西方媒體的統計表上。絕大

多數通過特權、套養殺，代持、抵押、擔保、空殼上市、私密小金庫、海外曲線上市圈錢、與西方投行相互勾結而得的財富，都在地下或影子裡。

舉例而言，2018年的兩個新聞人物：大年夜從香港被綁回中國內地的肖建華，以及滯留美國公開爆料的郭文貴，都是一般外面人聽都沒聽過的普通出身、非紅非官的「小人物」，前者的「明天系」、後者的「盤古會」，出事之後被爆，兩人控制的資產加總起來在一點五兆至二兆人民幣之間，也就是二千億至三千億美元之間，富可亂國，什麼世界首富都比不上他們，比爾．蓋茲、巴菲特、索羅斯的創富速度比起他們只是幼稚園。

洋商（包括台商）到今天才逐漸明白，中國沒有「市場」，只有「權場」，而在權場內站對「立場」，才是保全之道。並且，中國沒有「私產」，只有「江山」，任何人的私產都只是暫時的使用權，能用多久，得看江山最後落入誰家。幾乎所有的中國富豪，都只是「庫房」的身分，身家即使過兆，也不過是「代持」；江山換了，代持者也說換就換。西方媒體所統計出來的二百五十一位「十億翁」，若有一人能夠逃脫這「江山邏輯」，我會感到很意外。外資，尤其是台商，對此不可不察，否則不但和尚會跑掉，連廟都會長腳跑掉。（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3月，原名〈中國商場上那些事兒〉）

共產黨的本質最終還是要共你的產

如果美國聯儲會（央行）突然宣布，亞馬遜、Google、臉書這些靠客戶數據吃飯的公司，必須交出他們的數據，放到政府主導的統一數據庫中，你覺得這三家公司的股價在市場上會不會應聲而倒？ 甚至跌掉一半價值？

這事真的發生了，但不在美國，在中國。2018年1月4日，中國

央行宣布成立全國統一的個人徵信平台，稱作「百行」，包括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騰訊徵信以及其他六家，都將「提供」客戶個體的信用評級記錄，總人數可能不小於億。中國央行說，若沒異議，央行將於九個工作天後的1月13日實施。

百行平台，阿里和騰訊兩家大咖都僅持有百分之八的股份，另外六家大小不等的公司也持有百分之八的股份，代表官股的「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獨大持股百分之三十六。阿里巴巴和騰訊等於在靈魂上被繳械了，沒有數據主控權的新經濟公司，等於是被拔掉牙爪的老虎。妙的是，股票市場對此事毫無反應。究竟是大家覺得這類事發生在中國不稀奇，還是因為阿里和騰訊的市值已經大到了投資圈必須自己騙自己以維持其價格？

中國私營企業正在經歷一場鋪天蓋地而來的政府收編，企業界稱之為「公私合營2.0版」，參照經驗是19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徹底消滅私人資本勢力。人們一度認為，鄧小平以來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已經使得私人資本道路難以回頭了。人們錯了，開放只是權宜之計，共產黨的本質最終還是要共你的產。之所以為2.0版，因為國家之手不僅伸入了傳統資本財、金融財，更重要的是對數字財富的掠奪，大數據乃重中之重。

聰明如馬雲，早就深刻了解到這中國特色。早在2010年，他就開始安排官家、權貴入股阿里，並每隔一段時間就放話「隨時準備把公司貢獻給國家」。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他甚至敲鑼打鼓的向官方高調喊出「新計劃經濟」，表示中國從此的商品供需問題，完全可以用大數據的分析計算來達成，資本主義那隻無形的手用不上了。這就是馬雲能夠一路風生水起的主要原因，他識相。然後，2018年第四季，馬雲果然就「被退休」了。

阿里和騰訊，已經大到了國際投資人必須騙自己？或者，誰都不願相信自己會是最後的老鼠。（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11**月，原名〈大到投資人必須騙自己？〉）

中國正在上演「雙國記」

今天的中國，存在兩個國度，一個亮麗光鮮，一個陰暗深沉；這兩個國度交織而無法切割，使得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陷入矛盾，難以安身立命。正如英國作家狄更斯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雙城記》小說中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

三十年來，台灣都無法擺脫「以中國為座標」的潛意識；中國經濟崛起之前，台灣人傲慢且自豪，中國經濟崛起之後，台灣人懊惱且自卑。過去幾年，我一再呼籲台灣應該「就台灣論台灣」—以一個三點六萬平方公里、二千三百萬人的條件來評價台灣，而不是和一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十四億人的鄰居來對比。但是現在看來，台灣在心態上回歸自己這件事還遙遙無期，媒體上依然充斥著「中國如何如何、台灣如何如何」的對比情緒。既然這樣，就讓我們來認識一下真實的中國—一個正在上演「雙國記」的中國。在看清了中國的「雙國」本質之後，至少台灣社會不會再瞎子摸象。

雙國的一面是富裕和進步，如中國人如何花錢不手軟、五倍薪水到台灣挖人、太空人上天繞月、航空母艦下水、手機刷卡通行無阻、高鐵地鐵四通八達、阿里巴巴金融創新、騰訊公司股票市值進入全球十大、領導人周遊列國備受禮遇……

雙國的另一面是專制戒嚴、高層鬥爭足以敗國、國家債務的無底洞、貨幣信用危機、人民財產安全感缺失、多數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網上發言不當人會消失、舉辦國際盛事時買菜刀要身分證、環境汙染百年浩劫……

中國的知識界有一句名言：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台灣人看到的中國富裕人口大約是兩億多人，台灣總人口的十倍，嚇死台灣人了。但是，這只是中國人口的七分之一。極少極少數的台灣人（或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看過那其他七分之六人的狀態。

如果台灣人一定要和中國比，至少要知道那是一個「雙國」，才不會莫名其妙的失去了自己的理性。

中國什麼形狀？「二字型」社會

在財富和權力的分布圖上，多數的國家，可以描述為「橄欖型」或「金字塔型」。橄欖型反映中間階層佔大多數，富人／窮人、強勢／弱勢各佔小部分，而金字塔型反映出尖端菁英是極少數，底層人民佔大多數。前者代表的是財富均衡、權力穩定；後者代表權力和財富逐步向上集中。

那，中國社會是什麼形狀？多數人可能直覺的回答，當然是金字塔型。若在十年前，這個答案的確是無誤的。當時，中國的經濟急速崛起，中小私人企業老闆賺得缽滿盆滿，科技新貴如雨後春筍冒出，城市居民的房產價格三年翻一倍。雖然這些「先富階級」僅僅佔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但是底層人民往金字塔上方移動卻是不爭的事實。當時西方國家都認為中國不可能再走回計劃集權經濟的老路；事實上，若你坐上時光穿梭機回到2008年的北京、上海，在街頭向任何一個人描述今天中國2018年的景況，你都會被當成一個無知的瘋子。

中國人民開始意識到金字塔底層往上層移動的通路出現堵塞，時間大約在2012年。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那年出版了科幻小說《北京摺疊》，小說中的北京市變成一個摺疊成三層的生活空間，三層中的階級森嚴、禁止往來。

坦白說，這部小說低估了事態。發生在2018年北京市、上海市的殘暴驅除「低端人口」事件，以及全國開始密布電子眼、全面監控網上信息、地鐵車廂檢查私人手機等等事態，已經把中國全國切割成了兩種人：實施監管控制的階級，以及被監管控制的階級。

這兩個階級，不是以財富劃分，而是以對權力的效忠度區分。

一個低財富的人，只要站對了隊伍，就能通過權力的暴力成為監管控制階級。例如一個只受過低教育的城管或公安。一個再有財富的人，只要不接受權力的指揮，就立刻落入被監管控制的階級。例如2018年間被軟禁、被失蹤、被下台、被自殺的無數資本富豪。

中共執政下的中國，已經證明不但不可能成為橄欖型的社會，甚至不會成為金字塔型的社會，而只能走上一個「二字型」的社會−上下兩層以權力區隔、永無交集的平行線社會。記住「二」這個字型，你就了解了中國社會的形狀。

大象經濟學

2018年6月上旬，上海台商傳來消息，市面上出現錢荒，人民幣吃緊。6月中旬，中國各省出現私募基金周轉不靈甚至倒閉的消息。6月下旬，中國央行救市，國有銀行及商業銀行的準備金下降百分之零點五，此舉的救市效益，從七千二百億到三點二兆人民幣的說法都有。同時，上海股票指數跌至五年新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至三年新低。

這一切，和台灣有什麼關係？

身處中國大陸塊旁二百公里，台灣就像一家精緻的瓷器店，隔鄰住著一頭大象。這頭大象只要跺一跺腳，店內的瓷器可能就摔破幾件，若翻個身，店內的貨架可能就要晃。倘若大象起興到瓷器店裡散步，店的損失就大了。

這地緣要素，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因此，台灣必須要比其他地方更懂得大象生理學和大象心理學。本短文談的是大象生理學中與台灣最為直接相關的一部分−大象的經濟結構。

西方經濟學家一直到最近幾年才意識到，西方迄今為止的各種經濟分析模型，用在中國大象身上可能只是瞎子摸象。金融投資界的分析就更不用說了，他們的目的只是從中國賺錢，挑選的分析方法不過是怎麼好賺錢就怎麼分析。

但台灣這樣不行，因為台灣就住在大象身旁，直接間接的經濟相關度高於百分之五十，再努力掙脫，相關度恐怕也永遠不會低於百分之四十。不管雙邊的關係如何變化，在你我這輩子都是如此。因此，台灣對中國經濟的判斷，絕不能用一、兩年為時間尺度，而至少必須用五至十年作為尺度。

長期經濟很深奧，我只能用容易懂的一個概念來做比喻─企業的榮衰成敗。中國常常對外誇耀，說自己只用了三十年時間就完成了西方強國二百年才能企及的成就；事實上這樣說也沒錯，不論從基礎建設、GDP總量、城市面貌，今天的中國和三十年前的中國相比，至少在城市中，可說是換了一個樣。我本人就親歷了這個過程。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家公司，用老牌大公司十分之一的時間就做到同樣的營業額，你會不會心生一點疑問？請注意，這裡說的是「營業額」，而不是「市值」。「市值」可以因為投資人的心理而飆漲，而「營業額」是硬碰硬做出來的。

只有在以下情形中，「營業額」才可能以火箭速度飆升：一、產品太好，供不應求。二、生產成本低於所有競爭對手，價格最便宜。三、具有無限的現金流，不計成本削價出售。

個人認為，在中國經濟表面超速繁榮之下，其本質是：改革開放頭三十年，動力來自上述的第二條，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動力來自第三條。

歸納至最關鍵的一句話：今天支撐中國經濟（以及整體「國力」）的是現金流，而不是真實利潤或附加價值。看似無限的現金流，來自無限的印鈔票（侵蝕信用）、土地財政剝削家庭儲蓄、剝削環境成本和以龐大人口下所謂的「市場」，誘惑吸納外資。

以上模式，民間其實有非常貼切的俗喻：「八個茶壺五個蓋」、「擊鼓傳花」，以及「割韭菜」。

就在幾年以前，美國及西方多半的經濟學者甚至政客，對此中

國模式還不知不覺，他們腦子定錨在「十四億人口的龐大市場」，殊不知中國的內需「市場」，只是一個百分之八十五被剝削人民支撐著百分之十五菁英消費的假象。

歷史偶然冒出了一個熟知企業財報如何造假的美國總統川普，且他已決定刺破中國模式。

大象會掙扎、會發脾氣、會找小動物出氣，這個過程可能長至十年。住在大象隔壁的瓷器店老闆和店員，必須有充分的防災準備，貴重物品要照顧好了。

腐敗也是一種生產力？

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的超人類經驗崛起，佐證了一個道理：腐敗也可以是一種生產力；但同樣的，中國經濟目前陷入困境，也佐證了另一個道理：長期依賴腐敗，將使得腐敗成為國家前進的核心制約因素。

中國的經驗，若不從道德而純粹從學術角度看，其實是為人類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科研樣本，客觀研究者足以從中萃取而獲得若干諾貝爾獎。在「腐敗學」這個領域中，可以抽離出的一個重量級問題就是：究竟在什麼條件組合下，腐敗可以成為促進生產力的要素？在什麼條件組合下，腐敗會變成制約生產力的要素？

我不是學者，但有幸成為坐在擂台前第一排的觀察者二十餘年，親眼見證了中國經濟以超人速度成長，因而也近身觀察到了「腐敗」如何作為這部龐大機器的潤滑劑；可以說，倘若缺少了腐敗潤滑劑，中國經濟總量不可能在這個「以權為本」的文化環境下，在1990–2010年之間以平均百分之十幾增長。

那麼，這個「腐敗潤滑劑」的成本有多高？不久前我與一位知名的中國經濟學者（抱歉姑隱其名）同意於一個公式：把期間的GDP加總，乘以百分之三十，就是中國經濟中的腐敗成本。以這公

式，1990–2010年間，中國經濟總產值的四十兆美元（IMF數字），其中的十二兆美元流入了腐敗方。

胡錦濤、溫家寶於2010年左右都在官方媒體公開表示，再不控制腐敗，將面臨「亡黨亡國」，證明了腐敗因子的「反生產力」已經大過了「生產力」；繼任的習近平把「打腐敗」作為施政核心，固然有其「選擇性打腐」的政治鬥爭成分，但也是看到了中國經濟過度開發後的「新常態」，已經無法承受百分之三十的腐敗成本。

「打虎」的結果之一，就是習近平執政五年來，原來還有部分沉澱在中國經濟循環內的腐敗金錢，巨量快速的外逃，導致了2015–2017年間的流動性危機，並將外匯存底侵蝕到了紅線。

中國經歷了三十年的「沒有腐敗就沒有增長」的特色經濟模式，十九大後中共面臨如下的致命兩難：拿掉腐敗可能就拿掉了經濟，不拿掉腐敗可能就拿掉了政權。如何解開這兩難，是一個諾貝爾獎等級的問題。

中國腐敗3.0版

這兩年來震撼力道不亞於亞桑傑維基解密的「郭文貴爆料」事件，其中最值得世人警惕，也往往被忽略的一點是：中國的結構性腐敗，從八十年代的1.0版本，進化到本世紀初的2.0版本，已經在2008年前後進化到極為成熟的3.0版本。

習近平2012年一上台就以反腐敗為施政主軸，但一直到2016年，儘管他打掉了多隻「大老虎」，如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等數百號「貪官」，但這些人頂多也就屬於1.0版本 和2.0版本。3.0版的老虎，要到2017年初才浮出水面。

1.0版的腐敗，簡單來說就是「和珅版」，在中國朝廷集權傳統下已經進行了千年，大致上就是一種基於權力和實體資產交易進行

的腐敗，如在土地、天然資源、黃金、買官賣官等等的弊端。在1.0版腐敗下，腐敗者還是要通過「做工」付出勞動力。隨手舉例，李鵬家族被視為「把持水電系統」以累積財富，周永康被認為是通過掌控石油系統的國際貿易而起家。

但是，在看了2.0版的腐敗技巧後，我們才突然感覺，1.0版的腐敗分子真的不容易啊；李鵬畢竟打造出中國水電的基礎，周永康畢竟在中國一窮二白的時候，為國家賺進了白花花的石油銀子啊。

1.0版腐敗建立於實體資源操作，而2.0版就進化到只需通過權力創造「政策資源」就可辦到；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前開始一直至今的房地產價格狂飆中的腐敗因素。誠如郭文貴爆料中所說：大家都以為通過權力拿到土地就是房地產的最大腐敗，從土地賺錢那是小兒科，那是1.0版，2.0版是通過「容積率」翻兩倍、翻三倍！

3.0版就是證券的金融化。紅二代、官二代留洋歸來，在西方大銀行、大投行的指導下，佐以中國官有銀行的權力配合，將中國一切有形、無形的資產「證券化」，然後將所有的證券金融化。哇啦，1.0版本下需要腐敗二十年才得以積攢的二十億美元，在3.0版本下，只要具有權力通道和財金技能，就能在一年之內化為兩千億美元洗出境外。想想，1.0版本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還得把珠寶鈔票藏在床底呢，多辛苦啊！

看懂中國經濟的三隻眼睛

中國經濟放慢，股市暴跌，房市凍結，人民幣無預警貶值，外匯存底劇降，許多人感到「突然」，尤其近年才入手中國股市、債市、匯市、房市的台灣嬌客。過去看不懂中國，只是賠點（或少賺點）錢了事，接下來再看不懂，恐怕就不只是賠錢的事了。綁緊安全帶，因為震盪還在後頭。

台灣對中國經濟的一廂情願，部分原因是做了西方的「跟屁

蟲」。俗話說，「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這就是西方國家二十年來與中國的關係。最赤裸裸的例證，就是希拉蕊還是美國國務卿時說的話：「中國現在是美國的銀行，你和你的銀行說話的時候不能太大聲。」

中國做了二十年的「世界銀行」和「世界低價工廠」，中國說自己多健康，西方政客及分析師就說它有多健康；搞政治的說中國成績斐然，做股票的說A股看漲，做外匯的說人民幣就要國際化了，搞投資的說中國馬上變成世界市場。反正中國政府願意做凱子，人民又有一股對沖百年自卑感的需要，西方配合演出就有錢賺，何樂而不為？

就是在這大背景下，西方一步一步的把原來只適合用來推論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分析模型，套用到中國現象之上。而聰明的中國人，尤其在一批一批留洋歸來、熟悉西方經濟術語的人士操盤之下，也越來越熟練於修剪數字，中西合璧的打造出一個「中國經濟不會倒」的高大形象。外神加內鬼，外神緊吸，內鬼緊貪，今天中國十億的底層工人及農民，成了世界的「駱駝祥子」（老舍筆下的黃包車夫，一天不拉車，一天就沒收入），而為數三億的城市「先富階級」，也都成為了套利、尋租、投機、脫產的高手。

中國的經濟，在數字上堆砌出了地球第二大的體量，然而那是「吃老本＋吃未來」、蠟燭兩頭燒的結果。環境的破壞已慘不忍睹，因此有內部學者推斷，首先使中國巨人折腰的不是其他經濟要素，而是水源。

如果那套由中西逐利者共同捏造的「西式經濟分析模型」不可信，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觀察、推斷中國經濟的動態呢？現任總理李克強在當遼寧省委書記時曾說漏嘴，說自己從來不信任中國政府的西方式數據，而只看三個樸素的數據：火車的載貨車廂數、用電量、銀行貸款數。英國《經濟學人》因而出台了「李克強指數」。

其實，李克強說的還不是真正的天機。真要看懂中國，只需要

三隻眼睛：經濟眼，看城市中大叔大媽的消費傾向；政治眼，看農村中農夫農婦的怨氣噴量；社會眼，看工廠中男工女工的失業率和薪資滿意度。

只讀檯面上的經濟報告，或只看北京三環內、上海浦東的人，誤判中國是必然的。

金融決定中國命運

列寧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將被自己編織的繩子吊死。1929年的西方大蕭條，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嘯，似乎使得這句話越來越真實。但在當下，非常弔詭，全世界最失控的資本主義卻發生在中國━這個依然撐著「共產黨」名號的國度。共產經濟吊死了蘇聯，中國因即時拋棄共產經濟而得以倖免；然而，三十年後，中國的脖子卻已纏進自己編織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繩套中。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金融的大問題是「三角債」，即國企與國企、與地方政府間你借我錢、我借你錢，最後誰也還不出錢的問題。前總理朱鎔基以成立四大不良資產收購公司、重整銀行系統、發展股票市場、國退民進、加入WTO、大舉引入外資等策略，緩和國內信用危機，奠定了中國經濟崛起的運作平台。

然而，在一黨專政、法制為黨所用的情況下，引進的資本主義很快就餵養成了中共特色的怪獸；黨的系統及其家族，作為怪獸的母體，各級政府以及各級國企、民企，孕育出一圈又一圈的小怪獸，爭食著母體的奶頭甚至排泄物。

過去二、三十年的高速成長，就是這樣來的，整個過程可說是「有西方資本主義之形而無其神」。在成千上萬的官、民小怪獸交織下，當年的「三角債」，今天用「三百角債」恐怕也不足以形容。全國內債總額沒有人說得清楚（相當於三倍GDP的二百兆人民幣左右）；更要命的，負債方和債權方之間的環扣鬆脫，經常說不清楚究竟誰欠誰多少。

比起今天中國的金融失控，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根本不算什麼。好消息是，中國金融體系還沒與世界接軌，因此其泡沫還屬於「悶燒型」，即使爆了，也只會給世界帶來實體貿易層面的衝擊，而不至於引起全球性的信用危機；壞消息是，台灣和香港不但貿易與中國掛鉤，在中投資也佔很大比例，一旦中國金融泡沫破裂，將受到實體面和金融面的雙重夾擊。

中共現在的狀況是：得了資本主義的病，卻拒絕服用資本主義的藥。關起門來用集權主義玩資本主義，中國再大，也到頭了。

中國「不透明政鬥」下的失真市場

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高達世界第二。但是，西方財經金融界，卻長期輕忽一個絕對是「中國特色」的要素：中國的集權金字塔頂端的政治鬥爭，已經由傳統的「槍把子」、「筆桿子」，延伸到了「銀根子」。

換個方式說，就是經過了三十年搭乘西方貿易秩序、金融軌道的便車，中國的高層政治鬥爭神經系統，已經深入了其經濟、金融系統，而西方的經濟、金融分析界，卻未給予這套政治神經系統足夠的權重，乃至於「失真」成為常態。

西方的金融財經界不會爽快的承認這點，他們會說：政治本來就是建立分析模型的一個要素，無須特別突出中國的國內政治。不錯，我們天天在西方的主流財經媒體和投資機構的報告上，讀到世界各國的政治和經濟、金融相關性分析。南非的政爭如何衝擊南非股匯，日本央行政策如何影響股匯，英國脫歐公投導致英鎊大跌，川普上台後的政策如何影響美國經濟，OPEC石油陣營內部政治鬥爭將衝擊油價、美元、黃金等等。

但是，請問：當前正如火如荼的中共派系鬥爭，若習近平派大獲全勝，對中國股市、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倘若反

習聯盟成功，又是如何？這點，西方財經金融分析家完全噤聲。為什麼？因為中國的政治鬥爭完全不透明，不到最後一刻不知結果。更糟的是，即使結果出來了，他們也無法預測走向，因為他們長期輕忽了中國「銀根子」的真實政治動態。

三十年來，中國為了搭上國際貿易、金融流動的便車，搭造出了一整套的「金融好萊塢布景」，銀行、證券交易所、監理單位、券商一應俱全，該有的都有了，熟悉西方那套操作機制的「海歸專業」人士也進入了這些行業。看不懂電影的西方人士就把劇情當作真實了，極少數看得懂的就趁勢撈一把，把真正的主宰高層政治鬥爭要素當作不傳之祕的私家菜，而不會公諸在報告上。

西方市場上，金融機構的利益和任務就是賣金融產品，哪怕它是複雜衍生、建立在不透明資料上。有關中國的金融產品，目前大多落於三類：不懂的，裝懂的，和裝不懂的。投資散戶必須警覺這點。（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9月。接下來有關人民幣幣值的兩小節，發表於2017年初。兩年前的預期，當時願意相信的人不多，但今天已經是分分鐘鐘可能發生的事。）

中國的噩夢：人民幣匯率

決定中國下一步命運的其實不是政治或軍事，甚至不是所謂的經濟，而是人民幣的匯率。

如同美國、歐洲和日本，中國的經濟也被其本國貨幣綁架。但是，人民幣與美元、歐元、英鎊、日圓相比有一個特殊處：它還不能自由兌換，而且十年、二十年內可能都看不到真正自由兌換的日子。

中國能夠安度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有賴於人民幣與其他自由貨幣之間不能自由兌換這道防火牆。這道防火牆，而今卻成為中國經濟成敗的關鍵因素。就像家裡裝鐵窗，平日固然可以防盜，但在家中著火時卻成了障礙，自己出不

去，救火隊也進不來。

人民幣的匯率，一向都是中央政策決定，而不是市場決定。因此，它和世界自由兌換貨幣之間的流通關係，需要人為手工調節。在經濟以百分之十以上速度騰飛的年代，人民幣頂著美國的壓力硬是不增值，長期維持人民幣「便宜」的地位，吸引了大量外資進入中國。而在當下世界經濟不景氣、中國GDP增速下滑的環境中，人民幣卻又不得不頂著壓力不敢貶值，深怕貶值後大量外資和內資出逃。以今日中國經濟的種種結構性缺陷、習以為常的種種貪腐和不規範、政情以及企業的投機自保格局，一旦發生大量的內外資出逃，足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得經濟機器停擺。

其實，投資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全球金融投資界的共識是：人民幣一定得貶回與中國目前經濟壓力相符合的水平，只是不知道是緩貶還是急貶。單單2016─2017年，人民幣對美元就緩貶了百分之四左右，但是若取國際貨幣基金（IMF）的一攬子貨幣為基準，人民幣對美元在同期已經貶值超過了百分之十。同期間內，中國境內的外資、內資在這段期間並未閒著，明面的出走量已經超過八千億美元，加上暗地的出走（例如假進口真換匯），恐怕總量不下於八兆美元。而中國傲人的外匯存底，已經由四點二兆美元降至三點二兆美元；內部經濟學家分析，在今天中國的複雜經貿、外交關係下，外匯存底的臨界值就是三點二兆美元，也就是說，若低於三點二兆美元，中國的對外經濟和國際承諾，可能就轉不動了。

由於不透明，外人很難統計，人民幣的總量究竟要保持在什麼水位，才能維持中國國內經濟的運行。然而幾乎所有中國國內經濟學者、國際經濟學者已經形成一個共識：2008年中國增發的四兆元人民幣，帶來了如黃河決堤一般的後果，衍生出不下於二十兆的信用債務，加上其他例行的中央、地方債務，中國的總體債務不低於GDP的三倍。此外，由於中國的國有經濟佔量至少六成以上，這些債務中有大量存在於國有體系中，也就是一旦出現連環倒債，整個國家經濟機器就會停止運轉。這個局面，比起十幾年前朱鎔基總理所面對的「三角債」問題要嚴重得多。但當年尚可搞「四大不良資

產收購公司」加上「公轉私」策略以脫困，今天不論從性質還是總量來看，故技重施也是無效的。

雖然貨幣還未接軌，但在實體經貿上中國幾乎完全嵌入了國際體系。驟然的人民幣匯率失控，必將導致實體經貿的失控，這不是中國甚至世界能夠承受得起的。因此各國政府，並不希望看到人民幣匯率失控。中國經濟失控的後果，美國前財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在回憶錄中說得最清楚：那些一直唱衰中國經濟的人，最好開始祈禱他們的預言不會成真；一旦中國經濟垮台，對世界的衝擊是無可預估的。

有了各國政府的共識，我們還需要擔心人民幣匯率失控和隨之而來的經貿失控嗎？絕對的需要，因為當下漂浮在地球上方的貨幣游資總量，早已和實體經濟脫節，成為了一個具有自由意志的怪獸，不受任何政府的節制。2008年的所謂金融危機，就是這隻怪獸的一次發威，西方各國政府拿出了吃奶的力氣才聯手暫時壓下怪獸，不料以社會主義自豪的中國，為了證明大國已經崛起，竟然率先於資本主義國家，硬是量化寬鬆（QE）了四兆人民幣，大搞超英趕美的各種遊戲，為資本主義政府緩了一口氣。接著，西方國家也開始QE、QE，再QE，更加養肥了2008年的那隻怪獸，直至祭出前所未聞的負利率政策，都傷不到怪獸一根毫毛。這隻怪獸現在有多大呢？有報導說是二百兆美元，也就是美國GDP的十倍還要多。不要說各國央行和財政部因為利益不同而難以聯手，即使奇蹟發生，各國政府聯起手來，都未必能夠和此怪獸角力。對於人民幣的貶值難題，各國政府雖然態度上關懷，但也只能自求多福，事態若出現不可收拾，各國大概也只能束手看著中國內部「樹倒猢猻散」。

回頭看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進程，困境可以這樣形容：慢慢貶是等死，一次貶足是找死。如果慢貶，等於是招攬別人（包括國際游資和國內人民）來淩遲；但如果想一次貶足，關鍵問題在於，可能全中國沒有一個人知道什麼水位才叫「足」，外國專家想幫忙也幫不上，因為連中國政府自己都對情況、數字不清。說一件真事：不久前遇到一位中國經濟學家，請教他人民幣對美元應該貶到多少才

能穩住中國經濟？他回答說：我看不到底。不死心再試探問：一比七點八（約等於再貶百分之十六）過不過分？這位學者有點不耐煩了，說：老弟，在中國貨幣領域我屬頭三名，我再說一次，我–看–不–到–底 ！！

十九大前的預言：
2018將是中國「銀根子」年

　　中共十九大定下的班子，首要必須收拾的殘局，不是清理政治鬥爭的戰場，而是巡捕已經散落四處的銀元金錠，並且縫補已經破漏的錢袋子。否則，中國已經百孔千瘡的金融大衣，只要世界刮起一點點金融陣風，就會捉襟見肘，甚至衣不蔽體。

　　人人知道中國歷來槍桿子出政權，但卻少人知道，中國歷來也是銀根子垮政權。遠自歷朝歷代，近自民國混戰，哪一方的垮台之前，不是物價飛騰、庫房空虛、資不抵債？

　　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硬傷，已經被天朝的海歸化妝師、國家的面子擴張工程、西方配合中國好面子特色所策劃的採陰補陽外交，以及國際金融玩家為了買賣產品所做的種種阿諛奉承，掩飾了起來。

　　而在中國的「權本主義」下，再大的經濟壓力，都不會在政治格局改變之前曝光，但就像地殼壓力，一旦釋放就是一場地震。中共1978年的十三大，政治格局改變之後的鄧小平，走上改革開放，地震開始。從「八九天安門事件」到後來的國企改革，所帶來的巨大痛苦，才有了後來「大國崛起」的條件。然而，鄧氏地震的「開放經濟、保住專政」半套路線，卻種下了種子–今日中國的經濟貌似強大，但專政下的扭曲經濟結構又再一次威脅到中共專政。

　　十九大，正是這樣一個權力格局的拐點，只是經過了三十年的累積，經濟的壓力不再來自貧窮，而來自扭曲的結構本身，而且所

有扭曲的結果都集中表現在一件事上：金融。

2008年之前，中國的經濟成長單腳站立在一個點上：製造出口。2008年至大約2016年，成長方式變成單腳站立在政府瘋狂投資上，「鐵公基」遍地開花，土地財政、房地產氣球式虛胖。外加2013年出台的一帶一路、長期耗資數兆、數十兆美元的對外投資計劃，加以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陸面、海面擴軍計劃，同時2016–2017兩年間發生的近二兆美元的資金外逃，至今，中國的金融周轉已經難以為繼；實質的國家、地方、企業、影子銀行的加總負債接近GDP四倍、外匯存底的十三倍。

十九大後的2018年，新班子如果不能用果斷的地震方式處理，重整「銀根子」問題，中國的前景不妙。（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12**月）

人民幣兌美元何時破七，甚至破八、破十？

這不是一篇經濟論述，更不代表投資指向，這是一篇對人民幣背後政治角色的評論。推出人民幣產品的金融機構，從不點破人民幣是一種「政治怪幣」的事實，而僅將其當作一種有跌有升的重要幣種來販賣；自從IMF（國際貨幣基金）將其納入SDR（特別提款權）幣種後，人們相信人民幣越來越國際化，越來越可以用正常貨幣邏輯來判斷其升貶。

這裡要大聲提醒的是–人民幣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幣種」，而非「經濟幣種」。任何用經濟學、金融學，甚至（西方）政治學邏輯來推斷人民幣（以及人民幣定價的資產）的人士，只要在這「政治幣賭場」裡一直玩下去，已經賺到錢的遲早會連本帶利賠出；至於晚近才進場的機構或人士，攔腰折損都不要感到意外。

人民幣背後的政治原理，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那就是「一黨專政的國家，不可能出現市場經濟意義下的貨幣」。當一種貨幣的存在目的是為了維持一黨專政，儘管在過程中產生過市場作用，但

當專政地位受到威脅時，所有的國家資源，包括財稅、產業、股市和貨幣，都會脫離其經濟本質，無一例外被當作救黨的工具。

人民幣兌美元的政治歷史大致如下：1979年至1993年從一點五五貶至十一；1994年一夜之間升值近百分之四十（十一至八），之後維持平穩達十一年。2005年在美國壓力之下，進入快速升值通道，八年升值百分之三十（八左右至六點一五）。

四十年來，人民幣的匯率變動都是為了保持一黨專政，近來所謂「國際化」的動作及速度也基本上循此路線。當前人民幣已經明確進入貶值通道，主宰其速度的即便是「經濟」，也是因為經濟形勢已經威脅到了一黨專政的可持續性。

在黨治超越法治的中國，全體人民都明白：手頭資產無論是現金、股票、房產，決定其價值的都不是市場，而是黨中央的政策。只要有風聲傳出，不是狂買就是狂拋，才有幾年前大媽瘋狂買黃金保值的風潮。政商界就更懂得這個道理了，這才有二十年來大小官員、商場大亨瘋狂脫產海外，以及兩年前被指派救股市的「國家隊」，自我賣空套利的巨大醜聞。

人民幣兌美元何時破七，甚至破八、破十？中共黨中央事前會把防止美元資產外逃的功課悄悄做足，但預留給各界的應變時間，不會超過幾個月，到時不要感到意外。

中止變革的中國金融及習近平經濟

美國前財長、高盛前主席亨利．鮑爾森的中國回憶錄，坦白得出乎我的意外，任何想了解中國經濟起飛二十年緣由的人，都可讀讀這本書。書並不難讀，多半是故事，淺顯易懂，譯筆通暢。

難得的是，它坦白，不忌諱敏感議題。這在美國寫中國的高官回憶錄中很少見，或許出自二十年與中國打交道的感情，或許出自鮑爾森覺得自己對中國這樣一件世紀大工程只完工了一半而感覺遺憾。總之，他把他作為一個美國人的立場和價值觀都講出來了，或

許有許多中國讀者，尤其是社會主義左傾的讀者會認為那恰恰就是西方對中國定位的陰謀，總之鮑爾森沒刻意淡化他的看法。但單就這一點，此書值得讀。

中譯本可說是同步上市，因為離英文原版上市才兩年，原書名“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ed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與中國打交道─美國前財長的二十年內幕觀察》）。我想請讀者特別注意這個書名，因為我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覺得這是鮑爾森先生煞費苦心所折衷出來的書名；我個人強烈感覺，這本書的名字也許改為《中止變革的中國金融》，或者《中國金融變革中斷史》更能反映出書的內容和作者背後的嘆息。

從高盛（Goldman Sachs）董事長退下，改任布希總統第二任的財長雖然才四年，但加總前高盛經驗和財長退下後的「鮑爾森基金會」經驗，他的確和中國打了二十年交道。巧的是，這二十年也恰巧是筆者本人在中國創業投資、與中國打交道的二十年。說這倒不是為了高攀，而是鮑爾森的二十年，與我的二十年雖然同期，但事實上是在一個平行時空內。他的二十年，就像天上王母娘娘宮殿中的二十年，而我的二十年，就像地下凡夫俗子孤身取經的二十年。平行時空交錯來看，天上與凡間的許多事情其實是勾連著的。當他在中南海紫光閣和朱鎔基總理討論如何去除國有銀行壞帳、整頓大型國有企業的時候，我正在以一個台灣人主持的顧問公司（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為中小型國有企業排除股權障礙，由計劃型功能化管理模式走向流程型模式的時候。在那段中國最困苦的時段內，貴至總理一直到一個只有數百人國營公司總經理的痛苦是一樣的；鮑爾森兩次提到，他看到朱總理大冬天在中南海接見他的時候，黑色西服褲管露出的一截白色「秋褲」，這種外交上的「失禮」和主人只對解決問題感到急切的場景，恐怕是只有當年身臨類似現場的人才會印象如此深刻。

當年中國國企改革的最大痛苦之一就是國家保障終身職的冗員太多，被強迫下崗的工人們抬著棺材到領導家門前抗議都是常態，朱鎔基毅然決斷執行「買斷工齡」政策，否則，中國有限的經濟活

力早就被「政府養一輩子」的退休金吃垮了，哪還談得上今天的發展？中國走過的這一段，鮑爾森都看到了。

朱鎔基、王岐山及中斷的金融改革

太多的人物、太多的小故事，而鮑爾森描述的都非常到位。然而，幾乎貫穿鮑爾森中國回憶錄中有兩個人：朱鎔基和王岐山。用鮑爾森自己的話來講，「我的同類人」。實際、沒廢話、劍及履及、說出的話做不到就率直道歉；鮑爾森讚賞他們，但看來也不完全同意他們對如何解救中國的看法。在重要的事件轉折點，這兩號人物總會在適當的段落中出現。讀者可以清楚看到朱鎔基和中國電信上市的關係，以及這件事對整個中國央企改革的關鍵性。王岐山身上，我們則看到了中國四大銀行試圖改制為現代金融機構的過程。這其中出現太多西方金融財政習慣中想都想不到的創意和技能，實在值得2017年的世界金融界深思。

雖然他沒直講，但從鮑爾森的脈絡和語氣來看，他感到最遺憾的事就是中國的金融改革在2007–2008年間開始緩速、停頓，甚至開倒車。這與我個人的經驗時段是百分之百吻合的；以下是我個人的說法，而不是鮑爾森的說法：2008年北京奧運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分水嶺，一方面全國因奧運的宣傳而舉國振奮，連當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都成為了全國一心的加分事件，另方面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得中國人相信西方開始沒落，中國人的世界即將接管世界。因此，接下來中央政府的四萬億（後加碼至十二萬億）人民幣超發，被政界、學界、老農引為中國拯救世界的證據。一言以蔽之，2008年是中國人開始忘記鄧小平遺言「韜光養晦」的一年；從此，中國崛起論取代了韜光養晦論，一直到今天。

當然，鮑爾森的專長是財政、是金融，他不會在政治議題上過多著墨，但如前所述，我強烈感覺到他這本書的書名應該是《中止變革的中國金融》或者《中國金融變革中斷史》。因為，字裡行間

他都指出中國的金融改革哪裡哪裡沒做到位，如果當年一鼓作氣做到位，今天的中國經濟、資本市場將會大不一樣。說這並不是認為他一定對，只是點出來讓本書讀者知道，世界上曾經有一個親身上場打過拳擊賽的人，告訴你如果在四局下半場選手再堅持一會，冠軍獎杯可能就是他的。

2008年中國中斷金融變革，顯著的一點就是太子黨已經成長到了可以栽培的年齡。而在國家有錢之後，各方各派的尋租之手也開始插入西方投行，如摩根士丹利、高盛以及許許多多知名金融機構。鮑爾森雖然沒提這過程太多，但是他也沒忌諱這議題。事實上他是有遺憾的，如果不是這項中國特色，他認為中國可以參與國際事務更多。一些驚心動魄的臨場變化的「綠燈如何被滅掉」的小故事，加深了這方面的可讀性。

習近平面臨的中國經濟

我想，所有讀者可能最好奇的是，鮑爾森對習近平今天所面臨的中國經濟處境的看法如何？他在本書的後半截中提到了許多，於此也沒必要再次重新一條一條整理，讀者自己看書就行了。此處，只提出幾點比較重要的，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照前後文細細體會：

一、對習經濟處境的一般看法：已經知道問題及解決方向，但還無法有效落實。例如：習近平在2006年就知道浙江沿海地區產業必須高端化，但由中小企業掛帥。

二、對體制的看法：摸著石頭過河＋胡蘿蔔棍子已經不行了，需要現代化體制。

三、鮑爾森預測：經濟減速和債務水平飛漲同時出現，中國大規模舉債注定要出問題。坦率地說：中國金融系統，特別是信託公司，面臨清算只是時間問題。

四、中國今天的金融問題搞不好還是書中所描述的，沒有流程

整合，一塊牌子幾個運營班子，貸款政治化，隱藏壞帳，壞帳越理越多。

五、財政部、人行、四大銀行、中金公司、匯金公司，都是通的。收稅、發債、存貸、利率、匯率對政府其實是一盤棋。A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呆帳，到了B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就成了資產。

六、鮑爾森開出的藥方：加速向內需驅動經濟轉型，加速金融部門現代化，構建私企融資活力充沛的資本市場。

結論：中國近乎四十年的增長模式已經完成了使命。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揭示出來的快速、循環式衰退和結構性缺陷，已成為中國發展模式的終結者　。與朱鎔基並肩作戰「國退民進」的鮑爾森，感嘆的特別提到了習近平經濟顧問劉鶴的一篇文章說：中國私營企業提供了百分之九十的就業，百分之六十五的專利發明、百分之八十的技術創新。而私企正在流失死亡中，2008年至今國進民退，效率低下，寡頭霸佔資源、揮霍資本、限制競爭、遏制私有經濟機會。

鮑爾森這本書中，既沒有中國經濟崩潰論，也沒有中國經濟崛起論，但看過後的西方人如果還不懂中國經濟的本質，只能說瞎或笨。

如果要讓我簡單的總結，作者似乎像一個困在玻璃房內，急切的想向外界比手劃腳表達一個意思：中國的經濟就像一部車底底盤（金融體系）還沒完工的車子，開上無限速的高速公路。中國的發展速度超過了人類已知市場機制的速度限制，而且只有單程油料，沒有把回程的油料（經濟發展的外部成本如環保、人口老化）算上。

這類回憶錄的書，最精彩部分可能就是不經意透露的真實小故事，或者說，只有真實小故事才方便揭露的大道理。例如，此書中提到，2007年中美第三次經濟戰略會議在北京香山舉行，中美正值

人民幣匯率爭執，鐵娘子吳儀直接了當的問鮑爾森：「美國想要人民幣調整多少？給我一個數字。」身為美國財長的鮑爾森，儘管和吳儀已經熟透了，甚至他心中可能已經有一個數字，但還是只能謹慎的回答：「中國應該讓市場來決定貨幣的價值。而在中國讓市場決定其貨幣價值之前，應該至少根據經濟的現實來確定其貨幣價值。」前一句話不正是大學一年級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廢話嗎？而後一句話，就帶著政治暗示了。鮑爾森看吳儀無反應，只好加了一句：「你們應該讓人民幣大幅升值。」但也不忘補了一句：「有個應該是更優先的話題：為什麼中方不再繼續進行金融市場改革了？」

為什麼提這故事，因為新任的美國總統川普也在逼迫人民幣升值（雖然時過境遷，現在人民幣不貶值就萬幸了），而川普的財政部長很可能就直接告訴中國人一個數字，儘管那是違法動作。中美之間的經貿交道方式和鮑爾森時代已經大不一樣，德州式、曼哈頓式的作風可能讓中國官員極端不習慣，他們會開始懷念鮑爾森這樣的紳士。

作為個人意見，我也想提醒中國官員，在關鍵時刻，美國從來不會紳士（倒過來中國也一樣）。我還記得在2008年奧運前後，一位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在私人餐敘上直接對我說：「中國想要經濟超英趕美，這有什麼難的？明天宣布把人民幣幣值提高百分之三十，當天就可以辦到了。但中國人不要以為，他們借給美國人的錢會得到歸還。」這就是真實的小故事比大故事值錢的地方。鮑爾森回憶錄中就有許多這類大時代下的小故事。（**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2月**）

習進平能駕馭「海歸派」和「華爾街派」嗎？

世人都在關注習近平的下一步。外有美國領頭的「堵中聯盟」，內有已然形成的「黨內抗習聯盟」，加上全國經濟的「壓力

山大」，習近平可說是內外交困。

眾多分析中，有一要素長期被眾人忽略，那就是：習近平是否駕馭得住黨內的壯年海歸高層幹部，以及那些與西方金融利益糾纏不清的「華爾街之友」們？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史，其實可視為一場「國際接軌」史，其間最重要的就是與美國的供應鏈以及市場的「雙接軌」。雙接軌二十年來，順理成章的，黨國金融機器的高位上，坐滿了美國訓練出來的官僚幹部，而黨內高層、家族二代中也充斥著被華爾街輸送利益、向華爾街輸送政策的人物。形象的說，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勢階級，和美國常春藤系、華爾街之間的關係是你儂我儂的。少了這層脈絡，中國的經濟走不到今天，中共家族的腐敗也到不了如此駭人的程度。

習近平不是這個圈子裡的人。真實學歷他只到高中，沒留過洋，早期仕途不順，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期間的「洋式腐敗」擦身而過。他沒有江澤民在上海歐風社會從小學鋼琴的經驗，沒有朱鎔基、王岐山和華爾街交杯歡談的磨練，也不像李克強在北大讀書時就會背誦美國獨立宣言，他就是個崇尚毛澤東氣魄的陝北漢子。

習近平身邊的小圈圈親信，多半都是像他一樣，沒有留洋經驗，與西方金融圈沒打過交道的本土派。在集權過程中，習可以打掉本土大老虎、收拾軍中頭領，但是黨國經濟、金融的運轉，卻少不了留洋派和華爾街派。這種境況，像極了當年的毛澤東。當年在打下江山後，中共內部的本土派和留洋派之間產生了基本路線的矛盾，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是吃過巴黎麵包的留法生，大量的黨內要員、幹部也都是蘇聯一手訓練出來的菁英。他們在觀念、思維方式上都與湖南農民毛澤東有著根本差異。

為了集權，毛澤東最終採取了與蘇聯老大哥決裂、徹底清算留洋派的路數，導致了蘇聯叫停對中國的經濟及技術輸出。以史鑑今，困境中的習近平，會不會以激烈手段與洋派、華爾街派決裂，還是會屈服妥協，世人尚不得知，但是時間並不站在習近平這一

邊。

中國面臨的系統化矛盾

「矛盾」一詞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就是兩者只能擇其一，不可能兼得。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對此有一簡明描述：圓形的方形（Round Square）；誰都有能力畫出一個圓形，誰也都可畫出一個方形，但是沒有人可以畫出一個「圓的方」，儘管在語言上它是合乎語法的，但在系統邏輯下是不可能的。

當我們談到「系統」時，強調的是它的自洽性（self-consistency）和運作的穩定性。寫過軟體的人都知道，一個系統中只要有一個「矛盾」，系統就不具備穩定性，如果「矛盾」超過一定數量，後果不是「當機」就是系統內耗空轉。

當然，國家、社會不是工程系統，而是一套具備彈性，可自我容錯、演化的有機體。然而，如果把一個國家的柔性機制強力推向「系統化」的話，那麼那些原來雖不相容但可化解的抵觸，就會逐漸變成「矛盾」。近年來，中國政府經常發出對「矛盾擴大化」的警惕，以及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所強調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正透露出了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中國瀕臨系統化過程下的矛盾風險。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正在積極避免落入「圓的方」的境地。

從台北看北京，我感覺中國政府及領導人，面臨的系統化矛盾或即將被進一步系統化的矛盾，有以下幾點。

從外部環境、也就是中國所處的世界環境來看，最大的矛盾就是繼續保留在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和中國自創的世界秩序之間的矛盾。這兩種選擇，如果給予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本來可以用演化的方式並存，但倘若急於「系統化」而求速成，那麼它就會變成一個「圓的方」的問題。

不管中國人承不承認，中國這三十餘年來的經濟崛起，事實上是基於鄧小平的一個決定：積極加入美國領頭的世界經貿秩序，最顯著的節點就是當年朱鎔基總理不惜代價加入WTO。自那刻起，中國的貿易型態、生產規格、金融規格與世界經濟接軌的法律規格，都納入西方的軌道。沒有這一轉折，中國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績。

自2008年北京奧運開始，中國表現出急於自創一套世界秩序的雄心，走出自己的路。幾乎每一個年份，官方宣傳都釋放出類似「十年之內就能如何如何」的訊息，並且出台一連串的強力「系統化」動作。心急，就帶來了一個無解的矛盾：自創就要破壞現狀，維持軌道就不能自創。這矛盾可以這樣描述：今天所定下的所有經濟成長目標，脫離了現狀的西方軌道和規範，就不可能達到，而若繼續依循西方軌道，多年來的「中國已經強大了」民族主義宣傳和動作，又會成為繼續留在西方軌道上的障礙。要圓，還是要方？總之，「圓的方」是不可能持續的。

其次就是權力結構與經濟結構之間的矛盾。這點，中國的知識界已經討論了三十年。過去由於中國還有極大「粗放成長」的紅利空間，但今天這空間已經不存在，在權力結構不改的前提下，經濟結構改革不可能。換個方式說，權力結構越系統化，經濟結構的改革就越不可能；反之，經濟結構改革若要達標，權力結構就必須脫離系統化，轉向彈性柔化。

第三，可能是最關鍵的，就是人民動機和官方強制力之間的矛盾。如果假設「集體化的動機」強過「個性化的動機」，那麼唯一的出路就是官方的強制力系統加上民族主義。如果看重人民的個人動機，那麼官方的強制力系統就必須鬆綁。三十年前流行的一段順口溜，很能說明這種因為追求系統化而產生的矛盾死循環：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圓或方，到了做抉擇的時刻，否則難以擺脫這順口溜的詛咒。

對一個國家社會來講，時間是個神，追求速效的系統化就是個

魔。古語「欲速則不達」，台灣俗話「呷緊弄破碗」，說的就是這個。中國將來要是失敗，就是敗在這三個系統化矛盾上。

習近平想幹什麼？
「權力改造」和「法西斯」的一線之隔

（本小節發表於2016年，筆者未更新其內容，因為它記錄了當時的情境。現在是2019年中，回過頭看2016年的場景，足見在短短三年之間，中共的當權派距離徹底的「權力改造」越來越遠，而離「法西斯」越來越近。）

2012年習近平接任時，繼承的是一個六十餘年的病體，一個屢次暴病卻一次又一次諱疾忌醫的中國共產黨。毛時代的三反五反，死亡三千萬人的大饑荒未見檢討，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也平反得不乾不脆，鄧時代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准翻案，江澤民對法輪功的迫害連提都不能提。接下來的胡、溫「庸政」十年，雖然經濟總量拜十三億人口之賜達到了世界第二，但人均產值仍僅達七千美元，國土環境已被蹂躪不堪，幹部普遍腐敗，公檢法、武警肆虐，全國各地的「群眾事件」每年高達七十餘萬起。整個共產黨的狀況，已經到了連胡錦濤─國家主席、軍委主席、黨總書記三位一體的絕對領導人，都不得不悲悵的公開在官媒上吶喊：再這樣下去，亡黨亡國。

習近平接手的就是這樣一個「不能再這樣下去」的共產黨。六十餘年疊加糾纏的沉痾，以區區十年的任期，他能怎樣？他該怎樣？

十八大之前那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至今（2016）將近三年，而尚未達到最高潮。根據中共不成文的制度，在2017年的十九大，必須敲定幾位二十大（2022年）的候選接班人，現在距離十九大僅僅剩下兩年時間，而習近平的「打腐掃雷」工作僅僅完成一半，他將為自己留下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地位？作為「紅二代」，他又如何為父輩打下的江山作出交代？

在上任初期，黨內的改革派以及廣大的社會菁英，對他抱以厚望（這也是他得以擊敗對手出線的主要原因）。法政界發出強烈的「上位改革」呼聲 ，認為共產黨的問題，必須先由憲法改革下手才有成功的希望。維權律師界、知識界則認為只有「依人權治國」，中國才有希望。甚至許多人相信，習近平唯有做台灣的蔣經國或新加坡的李光耀，中國才能重生。那時，北京有學者公開在中央黨校的演講中呼籲：將「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社會黨」（或「中國社會人民黨」），逐步開放黨禁。

蜜月期不過半年，一開始還到「慶豐包子鋪」吃包子的他，很快的在收緊言論、圈禁公知（公共知識分子）、逮捕維權律師等等一連串動作下，失去了人們原先對他的厚望。但另一方面，選擇性的打擊腐敗、收拾大老虎的果斷立威動作，也得到了市井小民的人心。

公平的說，到目前為止，習的真正意圖，還不能論定。因為，共產黨內權力結構極為複雜，可說是千絲萬縷、撲朔迷離。習的種種帶來負面評價的動作，也有可能是對敵對陣營的暫時妥協，一種「黎明前的黑暗」，或者用其班底的話語說，「收緊是為了更大的開放」。據可靠人士透露，在上任之初，習曾經對貼身智囊團表述過一個意思，他認為蘇聯的改革方向是對的，但是過程是失敗的，因為太倉促、太粗糙，導致了蘇共的垮台。前後歷經了戈巴契夫、葉爾欽、普丁三任的來回折騰，因而弄到今天的樣子。吸取蘇聯的教訓，他需要二十年的時間，細緻但一鼓作氣的改革體制到位。

在總書記十年任期下，如何連續執政二十年？其實只要權力鞏固，就沒有不可能的事。2016年7月通過的「國安法」，將習所創建的「國安會」直接拉到憲法中的第一級別地位，法源甚至比「一黨專政」還要紮實。在此結構下，日後其實只需掌握國安會主席以及軍委主席兩個地位，就可以是國家的實質領導人，就像一個公司的董事長。新任的「黨總書記」一職，可以被降級成為類似CEO的角色。至於「國家主席」，可以僅是一個榮譽職。消息人士說，本

來習有意在2017年「香港模式」成功後，於2022年二十大推動「香港模式」的全民選舉，但「佔中事件」徹底打亂了這方向的步驟，在中國全境實施「香港式全民選舉」的想法胎死腹中。

但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即使共產黨「徹底」改革，要改革到哪裡去？是早年新加坡的「開明專制」？還是蔣經國的半推半就式開放黨禁？抑或「香港模式」起死回生？在今天中國經濟的結構性下行壓力下，加上中共黨內複雜的權力鬥爭格局，集中權力以進行改革者，在對手壓力、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衝擊下，很容易自覺或不自覺的走上「法西斯」的方向：威權主義＋軍事國族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全民控制。若是那樣，中國的歷史將進入另一場劫難，能否再度翻身就很難說了。

習面對的，可能是全球最艱難的任務。但是，用權力改造權力，與法西斯之間只有一線之隔，是否跨過線，有的時候不是強人一人心願所能控制。作為台灣人，我們不希望看到中國走向法西斯，台灣具有豐富的經驗能夠幫助中國避開法西斯的歪道。在這個歷史關口上，只把台灣當作「統一」的對象，實在是愚蠢的下下之策。保持台灣的「無印良國」地位，是中國走向「天下」的唯一槓桿點，捨之不用，既愚且昧，非男兒所當為。

與習近平班子聊聊台灣和中國

2012年，在密切觀察中共十八大前後的事態發展下，我將薄熙來被黨內元老清算事件的始末，寫成了《中國號超級拼裝巴士駛向何方?》一書，書中描述了習近平上任當時中共的政治、經濟困境。

2013年，通過觀察以及對中國內部大局的判斷，我意識到一件事：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習近平若拒絕成為元老派的傀儡而想留下真正的歷史地位，在中共的鬥爭結構及歷史脈絡下，他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打破成規，連續執政二十年。

接下來兩年他的選擇性反腐、肅清政敵、軍區改戰區等等一連串動作，無一不符合我對他的猜想，於是在2015年底我出版了《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一書，並描述了一種他連續執政二十年的路徑：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並修憲、降格常委制，並比喻為「總經理制改董事長制」，這樣便可以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時，將總書記身分交給親信，而他本人繼續以國家主席加軍委主席統領中國。

然而該書中提出了三項執政二十年的要件；缺少了這三項要件，連續執政二十年的試圖不會成功。這三要件可簡述為：一、開放黨內差額競選。二、由縣級（含）啟動真正的一人一票直選。三、與美國簽署一項「台灣永久中性化協議」（中性化Neutralization，而非中立化Neutrality）。

第一要件的作用在於給予九千萬黨員希望，以化解白刃相見的黨內鬥爭。第二要件的作用在於給予十四億人民對「終將民主」的期待。第三要件的作用在於補充已經捉襟見肘的「中美三公報」之不足，將台灣這個變數，由中美對撞的公式中移除，以作為南海紛爭、東海紛爭之解決方案典範。

這三個要件是連續安全執政二十年的必要前提，沒了三要件，連續執政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沒有落腳點。然而，習近平先生在第二任初始的2018年，就搶先進行了取消主席任期制並入憲，而把三個必要前提甩到一邊。這個「不先買票就上車」的動作，不但為他帶來了「習皇帝」的外號，也激起了黨內的激烈反彈，更刺激了世界對中共的警惕心，促成了美國以圍堵中國為第一戰略的決定。

不顧三要件而搶先上車，造成了習近平當下的內外交困，這不能不說是包括習近平在內的習班子對內外局勢的整體誤判。之所以走上誤判的道路，黨內的鬥爭激烈當然是主要驅動因素之一，但是習班子的知識廣度不夠，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本來習近平想定的連續執政二十年，腦中的鏡像應該是俄國的普丁或新加坡的李光耀。但他本人及身邊的小圈子智囊，可能對中國以外的歷史理解不足，很快的就陷入了中國傳統的天朝帝國「中

國夢」，以至於沒看清普丁之所以能夠執政二十年，前提是普丁早已放棄了前蘇聯對原共同體的「絕對主權」概念，而李光耀之所以能夠執政四十餘年，乃基於擅長經營管理「一人一票」的機制。

習近平及其班子若還想通過「國家主席連任制」在2022年二十大之後繼續領導中國，唯一的實現路徑就是在國際上修正其對南海、東海的「絕對主權」概念，至少要表現出某種「共享主權」的誠意，以及在國內表現出「黨內民主」、「讓一部分人先享一人一票」的具體作為。除此之外，繼續連任領導人一事，沒有任何合理性及合法性的基礎。

如今內外形勢已到了這個地步，即使習班子有意，也未必來得及，何況無意呢？若要補救，還得趕快，時間並不站在習近平這一邊。

2022年：
中國回到毛澤東時代，還是選總統？

中國會回到毛澤東時代嗎？十年前問這問題，全世界大多數的人大概都會嗤之以鼻的視為蠢問題。看看大小城市的高樓、看看上海的市容和夜生活、看看遍布全國的高鐵高速公路、看看出國旅遊的人數。回到毛澤東時代，你瘋了嗎？

但是，若你經常和中國的「知情者」接觸，你會察覺這不是一個假議題，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真恐懼。知情者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是學者、思想家、由知轉商的企業家、媒體人、退休老幹部以及大小的在位者。

「毛澤東時代」意涵太豐富，有人把它和「文革時代」劃上等號，有人聯想到一人說了算，有人想到鬥爭的人頭落地，也有人想到理想、熱情下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但討論總要有一個疆界，因此這裡將「毛澤東時代」濃縮定義為：

一、旗幟鮮明的設定外部敵人（如蘇、美），用來合理化對內部的一切極端手段。

二、對外鎖國，只和屬於「敵人的敵人」的國家打交道。

三、對內信息鎖國，以階級劃分為工具，關起門來使國內政敵互咬。

四、人流、物流、金流，一切管起來。

五、將台灣作為「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最大槓桿點，口稱一個中國，暗地裡保持一個大中國、一個（台灣）小中國，以襯托中共政權存在的合法性，以及一黨專政的合理性。台灣的存在，對毛澤東有極大的工具性，對外是中共政權調整國際關係的空調機，對內是支撐中共一黨專政的合理化樑柱。

六、「毛澤東困局」就是中國多數皇帝的困局—心比天高、命比紙薄—想一人把一百年才能做完的事在有生之年做到，因而「夢想無上限、手段無底線」，結果是「呷緊弄破碗」。

習近平的接班，完全是中共十八大權力鬥爭下各派妥協後的安全牌，各派僅視其為當年華國鋒一般的過渡棋子，沒料到他深藏不露的內心世界，棋子變棋手，拉一派打一派。演變至今，尤其在美國出了個川普之後，習近平已經明顯的落入了上述的「毛澤東困局」，很自然的會讓人產生一個大哉問：陷入「毛澤東困局」的習，會不會使得中國回到「毛澤東時代」？

雖然中國政局中的「毛化」跡象顯著，但我個人的看法是：不會！因為，整個世界、中國國內條件都已經大不一樣，尤其重要的兩個因素是：一、美國這個還是地球霸主的國家，已經兩黨形成共

識盯上了中共。二、當年「以權力鬥爭為綱」的中共，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後，尤其在「八九天安門事件」後，已經轉化為「以利益（財富）自保為重」的家族幫派組合，斂財機制一旦斷裂，就會「樹倒猢猻散」。

中共現在「壓力山大」，外有美國霸權要求它經濟補票、政治收斂；內有強烈通縮、物價高漲、失業普遍；上層幫派家族互鬥，中層幹部消極抵制，底層百姓焦慮煩躁。這不是習近平一人或一個派系能夠掌控的局面，即使他有毛氏之心，也無毛氏之運。

那麼，中國會往哪裡去呢？個人認為，世界上已經沒有命定論或歷史決定論，只能用演化觀點，一步一步的來追蹤中國的方向，而習近平本人或本幫，或許具有三成的決定力量，其他七成就看中國國內形勢及國際形勢。

一切都拖不過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國內外壓力下，以下兩個極端的想定都是有可能的：一、中國正式樹立「具有若干毛澤東特色的法西斯體制」，走上與整個現代西方國家火車對撞的軌道。二、中國以「類蔣介石」或「類香港」模式（請見本書相關章節），間接、超額選總統，重燃世界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期待。

對這兩種極端，台灣都得有所心理準備。台灣社會需要的心理準備，包括兩方面。其一，無論上述兩種狀況哪一種發生，中國必然進入比現在更專制的狀態。即使出現上述的第二種苗頭，過程中也一定得先更專制一陣子。胡溫時代有一句名言：現在收緊是為了將來的開放。但我從1992年親歷至今天，中國從未能擺脫一個詛咒：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其二，部分台灣讀者心中可能在想：讓中共走上蘇聯或法西斯路線，那它不就會早早垮台，而台灣就更快自由了？我只能勸心中有這念頭的人多讀讀歷史，多了解一點今日中國人民的焦躁感和勢力板塊，因為中國內部的非和平演變，其將產生的巨大土石流，不論是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首當其衝的第一站就是台灣。這點不可不知。

本書的上半部中分析，美中的攤牌已成局，台灣這棋子對美、

中都太好用，選不選邊恐怕已經不是台灣自己的選擇（無論台灣誰當政）。我的思考方向已集中在如何「災情控制」（damage control）上。略簡化的比喻說：台灣已陷入「台積電困局」─在美中攤牌下沒有不選邊的餘地，因而只有做好自己在最糟情況下的災情控制。然而，本書出版之時，台灣選戰已經打到無人有時間思考災情控制， 我覺得這是凶兆，只能不斷敲警鐘。

2022年：中共的終局時刻，五種可能的中國

所謂「終局時刻」指的並不是遊戲結束的時刻，指的是歷史格局的交叉路口，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走上了其中的一條路，三十年甚至一百年內就難有回頭路。就像俗話說的「過了這村就沒那店了」。那麼，為什麼把「終局時刻」定在2022年？這是什麼神祕的年份？

2022年和算命及推背圖毫無關係，僅僅是因為2022年是全體中國人、九千萬共產黨員「解疑」的那一刻。在十八大時，十三點五億中國人對習近平有著這樣那樣的幻想，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間，習近平的作為讓改革派失望、保守派狐疑，然而2017年的十九大，習近平仍然讓人存有足夠大的想像空間。這個想像空間，將在2018─2022年之間定格。一旦定格，中國究竟是走向地獄之路，還是天堂之路，還是徹底打掉重練，就不會再有懸念！所有人都會進入「該幹嘛就去幹嘛」的人心狀態。而台灣呢，也將隨著這終局時刻，做出對台灣最有利的決定。

此時此刻，把各種蛛絲馬跡放到歷史格局下觀察，可以推測2022年「終局到來」時定格的四種中國方向。

第一種中國：法西斯的中國

十九大習近平的報告長達空前的三萬二千字，耗時三個半小時，但其中真正屬於他的意思，可能也就是萬把字，其他的兩萬字

是派系妥協下的不得不言；這也顯示了，十九大時的習，並不如外界（尤其是台灣）媒體所言，已經達到了個人權力的頂峰。軍權（槍桿子），只能說是初步穩定，政權（筆桿子、刀把子）或許達到了七、八成，而經濟權（宏觀調控）大約只掌握了五成，至於金融權力（銀根子），大多散落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從大的來說約在百家，從小的來說約在五百家，習能夠直接控制的有個兩、三成就算不錯了。

習近平的權力軟肋就在「銀根子」，而其威脅就體現在2018年。槍桿子（解放軍）、筆桿子（國內外統一戰線宣傳）、刀把子（政法公安情報）在體制上都屬於中央集權的結構，因而利於通過各種人事、組織改造而集權，唯有金融「銀根子」，本質上就屬於捉摸不定的流動性通貨，今天在這，明天就可在那，難以集權。打個比喻，金融就像中醫學所說的「氣」，金融學就是一種氣功，沒練過氣功的人，即使有六塊肌，也不過是傻大個一個。

上文說過，中國這三十餘年的「經濟崛起」，搭的是美國為首的世界經貿秩序的便車，這趟便車的火車頭就是深入全球肌理的金融系統，這套系統已經自我成精成妖，現在連始作俑者的美國自己都難以掌控，何況是邯鄲學步、亦步亦趨的中國？

金融系統，三十餘年來已經以極其扭曲的方式深入了中國整個經濟的肌理，從國家到高官到知識分子到市井小民，無人能夠擺脫對其的路徑依賴。而當下，耍弄這套扭曲系統遊戲規則的人群，並不在習班子內。反而，由於過去五年名為打腐實為整肅的「反腐運動」，已經令這群耍弄金融的人進入更為隱晦的狀態。

習近平不可能不處理這群為數龐大、散落全國的金融大小玩家油子，否則他沒有勝算。但由於金融的散落性、流動性、隱晦性，收拾對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祭出法西斯的手段–以民族主義為由、以富國強兵為指標，強力對每一家銀行、每一家企業、每一個個

人，嚴厲進行對金流的控制。而這時候，筆桿子和刀把子就是關鍵中的關鍵工具。

走筆至此，需要特別提醒的一點是：過去是槍桿子出政權，而今日的中國已經邁入了「銀根子垮政權」的階段。搞不好習近平本人由於其人生經驗和知識框架的限制，還沒完全看清楚這一點。但他身邊的年輕幕僚，只要是忠心的不可能看不到這點，那就看習本人的傲慢度和氣度了。

看明白了這點，就會知道所謂的「民族主義」、「富國強兵」，或許是一種面對世界的長期策略，但至少在未來五年的短期之內，這些口號宣傳的主要作用還是國內的集權工具。在最糟的情況下，假設習近平無法在兩、三年內迅速的將扭曲的中國金融扳正，而必須持續的使用法西斯手段，那麼到了2022年，在執意執政二十年的境況下，法西斯方向就極為可能成為中國的「新常態」。例如武力強制性的重新分配：有錢的吐出錢來，進行類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2.0版」，全社會重新洗牌。

第二種中國：家族壟斷的中國

前述當前中國的金融甚至資產，極大比例掌握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從大的來說約在百家，從小的來說約在五百家。若不認清這個「中國特色」的財富格局，世人很容易就誤會中國的經濟未來掌握在那些經常登上西方媒體、經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敲鐘的「年輕創業家」手中。中國的經濟和財富是個「權本主義」的場域，任何用資本主義邏輯去推斷中國的人，終將會在這個誤會上跌跤。在中國，凡是在西方會計學計算下身家超過十億的「無背景年輕人」，其財富中的大部分不過是為權貴代持，因而有機會就想脫產出逃。

1991年，在「八九天安門」幾乎亡黨的事件之後，鄧小平以兩條「鄧氏約法」穩住了中共政權。第一條，「黨讓你發財，和你交

換政治權利和思想自由」。第二條，一黨專政從毛式集權改為橫向「常委分權」，以及縱向的「中央／地方分權」。然而在「以權為本」的中國，這樣做的代價就是分倉式的腐敗。近年來的事實證明，鄧氏約法已經走到了盡頭。

習近平過去五年的作為，似乎在向人民提出新的「習式約法」：你給我集權，我還你一個不腐敗的美好未來。然而，許多人內心深處擔心這會走回毛式集權，已經通過耍弄銀根子而獲得天價財富的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和其團夥更擔憂。

在2018–2022年的博弈中，並不排除這些家族們團結起來和習近平叫板談判，以至於出現一種妥協後的結果：家族之間停止鬥爭，不分背景身分，全力擁護共產黨保持一黨專政。但是反對黨內一人專政，形成以下的格局：共產黨走向一個比較內部民主開放的平台，一件諸多家族共同享有的外衣，中國由黨國一家逐步邁入國家家族化，以門閥仕紳集團瓜分地盤資源，家族與家族間達到一種競爭博弈下的平衡。

這時，傳統的血緣、鄉親、門生軟關係取代了一部分的上下權力硬關係，雖然做不到「以法治國」，但是「以法制國」在上層的兩、三億人群中還是可能的。

這時的中國，出現兩個沒有交叉點的平行世界：上層兩億人的富貴世界，和下層十二億人的糊口世界。世人今天看到的驚世高鐵系統、機場系統、高速公路系統、華廈美食，單單靠這富貴的兩億消費者就足以運營。至於平行的糊口世界，以中國人易於滿足、害怕災難的天性來看，只需要在「糊口區」上下加碼減碼就可以維穩。

至於家族壟斷的中國，能夠維持多久？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誰知道呢？坦白說，再過二十年當人類徹底進入AI化的世界後，到時威脅人類、國家、政府、家庭生存的問題，極有可能和現在的問題組合完全不一樣。從人性的普遍短視這事實來看，擔憂二十年後的人本來就是少數，何況是歷來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的偉大中華社會文化下的中國人呢？

第三種中國：遲到了五十年的蔣介石

2012年對習近平抱有希望的人，經常提的模式是戈巴契夫模式、李光耀模式，那已是過去。今天對習近平還抱有希望的人，尤其是流亡海外還有「民國情懷」的中國人，期望的是台灣的「蔣經國模式」。然而，莫說十九大以來發生在習近平身上的「小毛澤東現象」，從現在到2022的短短兩年半之間，習即使有心，中國的環境也遠遠未達當年蔣經國在台灣所擁有的環境條件。

以中國現有條件還有習近平現在的政治處境，習最多只能做到過世前的蔣介石一心知肚明政治不改革是不行了，但先抓住機遇搞好經濟，政治開放的問題就留給下一代。為什麼說「遲到了五十年」呢？因為，蔣介石恐怕一直要到死前十年，也就是距今的五十年前，內心才真正承認政治不開放不行。

從人道觀點下的中國人民福祉，還有台灣的持續前進，我們當然寧可希望習近平成為遲到了五十年的蔣介石，也不願看到他在中國政治鬥爭形勢逼迫下變成小毛澤東。過了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之後，人們就可以對習近平做出最終的歷史評價。

第四種中國：「一國多港」

中國十三點五億人口加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面積，其中的錯綜複雜，小小的新加坡或台灣的外來經驗，難以完全適用。那麼，中國有沒有「內生經驗」可以用來應付這個千古難題呢？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香港經驗。世界上有一批人，包括學者和政治家，認為中國只有裂解成幾塊，才可能解決其問題。但在個人觀察下，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朝統一」慣性，是有其地理因素的，相信夠格的歷史地理學家，若詳細研究比較歐洲、中國、美國的地緣特性，應

該可以印證我的個人經驗。然而如前所述，若中國繼續其權力集中、一條鞭治理的方式，中國是沒有前途的。眼前，中國其實有一個千古難逢的機會，足以在「皇朝統一」和「必須分裂」的兩極端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結束數千年來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詛咒。

這辦法就是「一國多港」—中國大陸全面香港化。

換句話說，就是把香港視為一個「自治邦」（而非現在的「特別行政區」），將香港的「基本法」和「間接選舉制」映射到中國各個省分，真正體現中國國號中「共和」二字的精神。在這方向，可以參考印度、德國、瑞士的聯邦自治體制。

香港經驗，算是中國的內生經驗，也是中國社會已經相對熟悉的經驗，足以大用。這一可能性，下文將有專節論述，此處且先打住。



以上的四種中國，哪一種會在2022年成型？我只能說，天知道！人所能通過觀察而知道的，只有從2019年到2022年的習近平作為中而越來越知道。最終變成哪種，要看歷史格局中的勢力消長而定。不過，領導人自己內心的傲慢度和氣度的角力，也不能說是非關鍵的。

如果以上的四種在中國都沒出現，那麼唯一剩下的就是第五種中國：分裂為幾大塊的中國。

一國多港：香港的第四種想像

香港的命運被決定了嗎？我認為遠遠還沒有；倘若對三十年後的香港命運感到悲觀絕望，那只是想像力不夠之故。

即使真的五十年不變，香港的「現狀」也只能維持到2047年。距今三十年的時間並不長，因而香港人著急了。當下，著急者基本分為三個方向前進：一、在北京解釋的「基本法」體制框架內爭取

改善。二、通過不斷抗爭，要求基本法體制固化在「港人治港」的神聖原則下，在北京與香港之間建立一道民主的防火牆。三、香港獨立。

第三方向–香港獨立，值得多說兩句。許多人認為那只是年輕人的小打小鬧，不足成事，因而未予足夠重視。這絕對是錯誤的看法，理由有二：一、如果不足成事，為何北京於2016年痛下殺手，以不符宣誓儀式為理由，拔掉兩位被一人一票選出的年輕議員的就任資格？二、北京真正怕的還不是獨立宣言的「成事力道」，而是它的「敗事力道」；中國自己當下處於多事之秋，在2022年的二十大之前，習近平必須做出政體改革，否則面臨溫家寶、胡錦濤、習近平三人都親口說出的「亡黨亡國」、「會被推翻」境況。在二十大的大動作之前，「港獨」和「台獨」一樣，足以敗習近平的大事。

把時間拉長，把歷史長卷攤開，香港真只有前述的三個方向嗎？回頭看看中國歷史，放眼看看世界環境，讓想像力飛一會兒，香港沒有第四條出路嗎？

這裡提出一種「第四方向」：「一國多港」，也就是港人自己把香港視為一個「自治邦」（而非現在的「特別行政區」），將香港的「基本法」和「間接選舉制」以民主原則完善，使得「香港自治」的模式，能夠成為中國人民民主化要求之下的一個顯著選項，繼而映射到中國各個省分，為整個中國提供一條體制改革的可能性，使得已經黔驢技窮的共產黨多一條自我救贖的出路，體現中國國號中「共和」二字的精義。

前文提到的一個觀點，中共因為民族主義的招式用過了頭，面子上已經無法承認俄國、西方、日本、台灣、新加坡的經驗可參考為下一步的「中國模式」；中國急需從「內生經驗」中提煉體制改革的模式，而「香港經驗」是一種當前還被中共接受的「內生經驗」。這個機會點稍縱即逝，再過幾年，可能中共連「香港模式」都在面子上無法推廣了，那將是中國的浩劫。

前文寫道：「中國有沒有『內生經驗』可以用來應付這個千古難題呢？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香港經驗。世界上有一批人，包括學者和政治家，認為中國只有裂解成幾塊，才可能解決其問題。但在筆者觀察下，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朝統一』慣性，是有其地理因素的，相信夠格的歷史地理學家，若詳細研究比較歐洲、中國、美國的地緣特性，應該可以印證我的個人經驗。然而如前所述，若中國繼續其權力集中、一條鞭治理的方式，中國是沒有前途的。眼前，中國其實有一個千古難逢的機會，足以在『皇朝統一』和『必須分裂』的兩極端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結束數千年來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詛咒。」

有中國讀者對此提出一個疑問，我相信該疑問非常合理，因而引述如下供參考。該讀者理性的問：「你說的一國多港搞聯邦制，問題是為什麼要搞聯邦制，聯邦制在大陸老百姓心中沒有市場啊，世界上其他國家搞聯邦制是因為沒有辦法整合，所以最後妥協搞了聯邦制。」

對於這合理疑問，我做了如下的回應：「多謝討論。你說的也很有道理。此文預設了『形勢比人強』（內部以及外部）。中國歷史上分分合合，一直到1949年之前，聯省自治（或區塊自治）都是（當時形勢下）可能的路徑之一。1949年到現在，中國的『統一』都是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才得以實施。除非我們假設一黨專政可以再持續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否則當前所謂『統一政體』是否可以再持續？中國三千年來，從來沒有在民主或類民主的情況下統一的經驗，因此，倘若有一天民主或部分民主化了（例如在某種形勢下不得不開放黨禁和言論自由），統一的局面要靠什麼樣的體制才能維繫呢？這是個今天關心中國（不論是因為感情還是利害關係而關切中國）的人，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啊。」

中共當局喜歡搬出「十四億人民」作為擋箭牌，但事實上，走到今天這種狀態的中國，其下一步發展，並不是由「十四億人民想法」而決定。這並不是說中國的走向與人民的想法無關，而是指出一個現實：中國已經被鎖死在「一黨專政」的結構中，任何「人民

想法」或政治理念，都得基於一個足以替代一黨專政的可行方案。反對一黨專政者，如果腦中想的是「革命推翻共產黨」，那在方案這件事上就沒有什麼好討論的了，因為革命不是一種「替代方案」，而是打掉重練。

過去一百年，中國已經實驗過革命，也實驗過一黨專政下的統一，兩者都已證明政治上是失敗的，擺脫不了前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詛咒。唯一在中國還沒有完全實驗過、但近一百年屢屢被部分試驗的，就是某種形式的聯邦自治制度（如清末民初的東南自保運動、民初的聯省自治行動，以及陳炯明在福建辦得有聲有色的地方自治政府等）。

從大歷史角度看，今天的香港經驗，若陸續的推進中國內地，先由深圳、廣東、福建等地開始，然後逐步深入、深化。這在今天雖然只是一種想像，但也保不準哪天不會變成一種唯一的選擇。

不論人們如何評價鄧小平，他在制度上創新的膽識，至今中共無人能及。第一次創新，他提出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若非他的這項堅持，中共可能早已亡黨，中國也可能動亂至今。他的第二次創新，就是香港人當年可接受但今天不愛聽的「一國兩制」。中共黨史學家可以考證，當年鄧小平及他的智囊苦思出「一國兩制」，是否本來就內藏為將來「一國多港」鋪路的智慧？正如鄧小平1992年南巡後定位深圳為「經濟特區」，隨後在全國鋪開經濟特區的策略，盤活了暮氣沉沉、不改就死的中國經濟；1997年布下「香港行政特區」的椿子，難道為的不是將來盤活中國的政治？

今天的習近平，不能只坐享鄧小平打下的經濟椿子，而忘記了他打下的政治椿子；鄧小平遺留下的「兩條腿走路」這一句話，乃是他記取了毛澤東以權亂政的痛苦教訓，並且預見了中共的困境之後而淬鍊出的警句。只盤活經濟而不盤活政治，等於是單腿跳行，中國政治必然權錢腐敗，人民必然見不到文明蛻化之日。

中共接下來面對的政治體制挑戰，絲毫不小於當年鄧小平開放經濟之前的經濟挑戰。我們甚至可以說，開放經濟三十餘年之後，中國剩餘的經濟動力和僵化的政治體制惰性之間的衝突已經進入「死亡交叉點」，值此關頭，只有勇於顛覆性的制度創新，中國才有繼續發展的機會。一國多港的樁子已經打好了，所差的只是複製的勇氣罷了。

香港人千萬不要小看了自己，認為香港已經落入了「只有狗搖尾巴」的命運，事實上，香港的制度優勢、法治實力、公民素質三者加總起來可以「尾巴搖狗」。

與其等待被決定命運，香港為何不以「一國多港」作為自己的政治底線，用十到三十年的時間拿回自己的命運和世界地位？香港的律師團體和法院體系，在亞洲可說是首屈一指，只要這個群體不怯懦，加上中國內地的有識之士，加上共產黨不改革體制就「亡黨亡國」的大形勢，誰說這不是一條可能出路？香港雖小，但也在呼喚一位大政治家。

然而，對於香港和北京，這個歷史機遇只有兩個時間節點：2017年的香港特首選舉，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過了這兩個村子，前面就沒有店了。現在，第一個村子已經過了，只剩下第二個村子，北京及香港，你們得想好了。（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11**月）

請關懷香港，司法獨立才是民主的保障

台灣若想有朝一日成為方塊字政治文明圈的雁頭，首先就得移除對香港的冷漠和無知。一般台灣人把香港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未意識到，香港人對法治的要求遠遠大於台灣，法治土壤上若有一天長出民主，其成熟度將超過還不那麼講究法治的台灣。

台灣人消費香港的「一國兩制」有一段時間了，「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也早已變成台灣政治賺選票、名嘴賺眼球的辯論主題。但其實，台灣人對香港的境況是冷漠無知的。

2019年6月9日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逃犯法例」（遣返法、送中條例）。當日，在香港和台灣都是端午長假的最後一天，香港人忙著準備遊行，台灣人則忙著過端午。儘管遊行日期幾周前就已公布，且遊行前十天就已預估人數將超過四十萬人，但台灣媒體對此漠不關心，沒有一家派人到現場採訪，百分之九十九的台灣人不知道有這件事。當天下午遊行開始時，台灣的電視台有零星照片和偶爾的跑馬燈，凌晨一點鐘，香港本地媒體還在繼續直播政府大樓前鎮暴部隊和群眾的對峙，直播一直到凌晨四點左右，台灣的電視台連跑馬燈都沒了。港媒直播的留言串中，我赫然看到一句話：「台灣新聞你們怎麼可以不報導這件事！！」

直到次日，發覺遊行人數突破百萬，台灣政治人物才出來割稻尾，但口氣和目的還是為了選票考量，電視節目雖有討論，但獵奇和渲染成分大於關懷和知識。台灣民眾對香港即將頒布的「遣返法」的關注，僅止於一個問題：台灣人將來在香港會不會被無故遣送中國啊？一直要到6月12日的「罷工、罷課、罷行」衝突升級至流血，台灣媒體才全面跟進，但依然是「以台灣選舉為中心」的在理解香港現象。必須再次重複上面指出的視角：香港日後若能冒出民主，在其法治傳統的土壤上，香港民主的地基將比台灣的民主堅實。中共害怕香港民主，甚於害怕台灣民主，單單基於這點，台灣就必須珍惜香港、幫助香港。

台灣社會對於香港境況的無感和無知，非常危險。一方面顯示台灣一般人的世界觀狹隘，對於人道和人權的關懷僅限於台灣，另方面也沒體認到，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近鄰香港的動向和台灣的前途，其實處於同一生態環境，台灣可向香港學習的經驗甚多。本節討論兩個視角，台灣或可藉著香港處境來進一步了解自己。

該次遊行參與者一百萬人，這是2003年香港「反二十三條」遊行人數的兩倍，代表了香港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點五；以人口比例計算，這就等於台灣的三百二十萬名成年人為了一件事自動上街遊行。即使把年幼、年長者人口比例高估為一半，也代表了至少百分之二十七的香港成年人，在沒有一人一票的環境中，用腳進行了投票–不再相信「一國兩制」下司法可以獨立。綜觀世界，如此看重司法獨立的地方並不多。

2019年五月，《紐約時報》披露，德國給了兩個香港公民「政治難民庇護」–參與2017「旺角騷亂」二十五歲的黃台仰和二十七歲的李東昇。這是歷史上第一起香港公民獲得外國庇護的案例。黃台仰對《紐約時報》表示，他獲得庇護是因為「香港當局被認為是利用司法機構來迫害香港人」。國際特赦組織也感到驚訝，說黃、李二人獲德國給予庇護，反映「香港的人權狀況與世上最差的國度有得比……反映國際社會認為香港現況有多嚴峻」。

讀者如果把這事僅僅理解為西方的「人權關懷」，那就大大低估了其後座力。國際政治是現實的，西方政府一旦認定「一國兩制」破壞了香港的司法獨立，恐怕更關心的是香港的「產權獨立」和「金融獨立」。已經一連串發生的中國公民在港被擄、財產被清算事件，早已為西方敲了警鐘。港幣的超發以換取美元外匯供北京使用，也已經是半公開的祕密，此刻港幣與美元之間的掛鉤，正在搖搖欲墜之中（參考第三章〈一國兩幣，還是一國一幣〉）。

一言以蔽之，在美國對中共算總帳的當下，一個逐步「被中共化」的香港，隨時可能成為美國對中共政策的標的，將香港歸類為算帳對象的一部分，把對中共的政策，一體適用於香港。而就在此刻，一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告訴世界，香港的司法獨立又被抽掉一根柱子。

香港若殞落，珠江三角洲九大城市形成的「粵港澳大灣區」計劃亦將隨之殞落。這是因為，香港的人身安全、資產安全、股市獨立、貨幣獨立、司法獨立，代表的是整個大灣區的支柱；當世界失

去對此樞紐的信心，所謂的大灣區就會成為一個失去軸心的鐘錶，只是一堆散落的齒輪。香港曾是亞洲兩大貨物、金融樞紐之一，當它殞落，得利的是新加坡，大量國際企業的區域總部、轉口貿易、財富將奔向法治健全的新加坡。當下，雖然許多企業還在香港運作，但多數企業主和富人，已將銀行帳戶轉遷新國，因為擔心香港帳戶隨時可被封。近在咫尺的台灣，除了回流台商之外，恐怕享受不到這外溢效應，一方面因為台灣的商業法治遠落後於過去的香港和現在的新加坡，另方面外人眼見台灣內部還在辯論「一國兩制」的利弊，他們害怕兩次掉在同一個坑中。

至於，「是誰把香港搞壞的」？這問題還需要問嗎？一般人會說：當然是中共。但是，當下處於選舉敏感期的台灣，應該再往下細問一層：中共的哪個派系？認識到這是一個應該追問的問題，可以幫助台灣選民去思考一個過去不曾思考過的問題：發生在台灣的統戰，並不一定來自單一的中共派系，也可能來自不同派系，他們的統戰目的和手法，甚至可能是相衝突的。

中共派系的分類，最簡單的分類法是分為兩派：習派，反習派。這種分類法，適用於過去七十年的所有中共領導人，如毛派／反毛派，鄧派／反鄧派，江派／反江派。我們就採用這簡單分類法。

習近平上任之初，只是個派系妥協的過渡性選擇，他本人毫無班底。隨後一連串的反貪整肅，可視為他假戲真做，選擇性打腐以建立自己班底的大躍進。被他整肅的總株連人數達到一百二十萬人，人人不知自己是否是下一個倒楣鬼，於是形成廣大的反習勢力。從1997年之後的十五個年頭，香港早已成為中共既有派系的地盤，利用香港的特區地位所延伸的盤根錯節利益，與2012年上任的光桿司令習近平可說毫無干係。

2014年的行政長官是否普選的爭議，後來演變成為「佔中」的巨大事件。先請問：壟斷香港的行政長官指定權，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比較有利？

2017年在香港「被失蹤」的肖建華，其人至今生死未卜，而其旗下的三兆人民幣資產，一直到兩年之後才被拆解（台灣的銀行界因此損失重大）。可問：他從香港被非法遣返，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有利？被賤價肢解的鉅資，最終又會流向哪派？

接下來就可以問了：在當時美國制裁中共的巨大經濟壓力下，強推特首一人特批就可遣返中國的「逃犯法例」，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有利？哪個家族具有如此強烈的動機，於6月9日夜間十一時零七分，數千市民和鎮暴部隊衝突、現場情緒高漲之際，指示特首發出絕對不更改立法日程的全民告知？哪個特首如此愚蠢，不等第二天群眾退去之後才發出絕不退讓的公告？是哪方巴不得事情鬧大？好在，香港市民並沒有吞下這個魚餌。

從現在到2020年一月的投票日，台灣將經歷許多社會風波。當風波來臨時，台灣社會心中請記得兩件事：行政獨立、司法獨立才是民主的最大保障，以及起事的那一方，不一定就是想把事情鬧大的一方。（本文寫於**2019**年**6**月**10**日凌晨四時）

香港「反送中事件」之於台灣的三大意義

6月16日，要求撤回逃犯條例的民意讓兩百萬港人走上街頭，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不僅宣布暫緩，更首度向民眾致歉。但來不及了，香港市民的要求已經升級為三點：林鄭下台，撤件，平反6月9日百萬人遊行的「暴動」罪名。若這三點做不到，市民要求恐再升級至：議員普選，甚至特首普選，也就是回到2014年「佔中」時的訴求。

事實上，現在香港跟北京都陷入了混亂，北京沒有料到會有這麼多港民上街頭反對，另一方面，中共內部派系問題也喬不攏。這或許顯現出中國一國兩制的失敗，但無論如何，未來一千年，香港在地理上是脫離不了中國，包括台灣也是。

我們和香港就像間瓷器店，倚著中國這隻大象，大象隨意跺個

腳，就會造成極大損失。這次的反送中事件，對台灣又有什麼影響呢？

影響一：「過去香港、明日台灣」，台灣恐成為香港的備份

從外部的角度來看，香港有兩個台灣所不具有的角色，一是百年來最大的世界金融中心；第二，香港也是這二十年來，中國權貴家族隱藏財富、洗錢逃難的基地。

說穿了，這一次送中完全不是為了「台灣那件事情」，而是共產黨內有一批人想把過去香港的逃難財追回來，換句話說，他們並不是出於正義性，而是真的錢不夠。

兩年前，富商肖建華在香港被捕，也因此爆出他通過香港的金融中心機制，總共在中國內外，為中共數個家族藏匿了估計有一兆美金的資產。然而像肖建華這樣的將自有或代持資產藏在香港的共產黨權貴，大大小小少說還有個一百個。

最近很多人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但那其實只是從政治面看問題，我認為從經濟面看應該改成「過去香港、未來台灣」。如今演變成這個情勢，老共看來是非丟掉香港不可，但香港沒有了之後，他們要找備份，那就是台灣。也就是說，以台灣替補香港喪失的與西方經濟打交道的代理站、緩衝區、化妝室、中轉站的功能。

明天的台灣不能變成過去的香港，從統戰的角度來想，台灣應該要防範，不能讓中共的手伸向台灣。

影響二：香港動盪帶來的金融衝擊

除了要防範台灣成為香港的備份之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

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為三點零二兆美金。扣除未來十八個月

要出手的一點八兆，以及隨時可以撤走的外資約一兆美金，手上真可以用的，其實只剩下四、五千億。這個金額，絕對無法轉動全中國的經濟。

老爸破產了，於是看上了「兒子」香港手上的四千多億美元外匯，但在一國兩制下動不了，才會有最近一連串的動作。而在技術層面，他們還有一個選擇，就是直接讓港幣消失。事實上，作法非常簡單，中國其實只要把人民幣貶到七點八五，馬上就可以宣布人民幣港幣一比一，港幣也就正式被消滅。

這是最壞的情況，但我覺得這件事不遠了。因此我們現在必須要想的是如果港幣垮了，或是與美元脫鉤，台灣金融機構會有多少曝光風險？

根據金管會統計，截至今年4月，包括保險、證券、銀行等金融機構，總計在香港的總曝險金額高達九千八百三十九億元新台幣，這還沒加上當前人民幣曝險的部分。此外，中國如果真想要滅港幣，一定會迅雷不及掩耳，所以台灣金融業不要以為你還有時間準備。而且以現在電子交易的速度，全世界的基金、游資如果要從香港股市抽走，一個鐘頭就抽光了。所以，如果北京要做這件事，不會給你超過一個鐘頭的時間。

台灣真的是需要做「金融漢光演習」，只是大家普遍都還沒有警覺性。

影響三：凸顯出「台灣式民主」的弱點

從6月9日事件爆發以來，香港走上街頭的人數之多，以及不分男女老少的凝聚力，令台灣社會十分驚訝，甚至可以為這部分下另一個定義–香港的民主正式開始跟台灣競爭。然而這對香港人來說，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他們走上街頭的本質卻與台灣的民主很不一樣。

台灣的民主是從威權時代解放，雖然是經由抗爭得來，卻缺少

了法治的根基。但是台灣人民很驕傲，一直驕傲到現在。但香港不一樣，他們在英國統治時期打下了法治的基礎，只是後來被中國統治。但這個從法治土壤長出的民主，一旦鑽出來，可比台灣的民主還要深化得多。

我們的驚訝，更顯現出我們對於民主的誤解。台灣因為有一人一票，見到新加玻人、香港人都很跩，但看到也有一人一票的日本人就不敢講話，其實是因為台灣法治太薄弱。日本東京前市長，違規報銷約值三十萬台幣就得下台。安倍如果敢貪一千萬日圓，光是有這樣的輿論出現，他也一定要請辭。

這是民族性的問題，所以我常說，台灣人還沒擺脫幽靈。那名為習慣於威權系統、習慣於服從的幽靈。我們沒有公民意識，只有百姓意識。候選人都必須打著「照顧百姓」的招牌，誰以「公民意識」為訴求出來選，肯定選不上。

香港此次兩百萬人運動，相當於每兩個成年人就有一個走上街頭，給台灣的啟示就是：民主誠可貴，自由價更高；但為法治故，二者皆可拋。台灣選民必須意識到，法治土壤薄弱所長出的民主很脆弱。台灣下一任總統不管是誰，如果沒辦法在司法獨立的面上扎根，台灣民主還是非常不穩定。

香港應該怎麼做？

回想當年董建華的二十三條，五十萬人上街，之後雖宣布暫緩，但後來還是默默通過了。這次也一樣，北京一定會宣布暫緩，但接下來看的就是香港人的決心。

我建議香港公民應該認識到，所謂暫緩只是威權方的緩兵之計，運動應該持續下去，但是必須避免爆發性的動作，以免給威權方武力介入的藉口。香港公民的最大資產就是國際眼球，因此應該採取持久性的定時定點罷工罷課，堅持到底。目標已經由香港公民自己提了出來：下台、撤件、平反、普選。青年團體，應該以十種

語言向世界持續發聲。因為，這是香港人能夠自主決定命運的最後機會窗口。

當下正處西方對中共的覺醒期和美國對中共制裁的高峰，錯過這個時機，香港就沒有自主爭取的下一步。白宮也已經透露，倘若G20有川習會，川普可能會與習溝通香港問題。但若是等待美國介入，最後得到的頂多也是美國的「安排」，不會是香港人的自主。

香港在英領時代沒有公民權，然而今天香港對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權並不滿意。然而一個地方、一個人擁有自主權、公民權是多麼重要的事。你如果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叫做「香港人」，就應該繼續下去，一直到得到普選目標為止。

在策略面上，香港人其實可以好好想一想，有沒有什麼是中共害怕的，甚至是西方也怕的，應該拿它來當作談判的籌碼。如果香港不見了，世界各國損失多少？如果香港不見了，中共各大派系家族損失多少？不過，千萬要確保安全，走定時定點的「都市游擊抗議」效果最好！

很明顯，香港人因為過去的背景關係，比較世界化，也比較都市化，所以發生什麼事情，就會受到世界的關注。將來台灣也可能面臨一樣的遭遇。但台灣世界的眼球關注度遠遠比不上香港。香港如果有兩百個年輕人組織起來用十種語言向世界發聲，台灣就應該有兩千個年輕人組織起來用十種語言向世界發聲。我現在所說的一切，台灣都要看清楚。

台灣跟香港其實是命運共同體，一定要讓世界十大語言的頭三大新聞報紙每天都看得到這個新聞，配合國內定點定時的行動，讓世界知道「你在乎」。

這次，台灣一定要撐住香港。

第六章

台灣的「國家定位」的解方

第六章

台灣的「國家定位」的解方

【前言】

在過去兩本書中，《與中國無關第二季》（**2014**）、《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2015**），都有大幅篇章介紹一個觀念，「台灣的第三種可能」ー作為無印良國和中性化的台灣。在「無印良國」概念的基礎上，隨後又發展出本章後文將介紹的「借名片」和「轉移名片」概念。這些在常人看來屬於另類的概念，其實都是跳出盒子思考的結果。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需要大家跳出傳統的盒子思考！長期以來困擾台灣的「憲法困境」問題，本章最後一節也提出了一個解方。

「無印良國」台灣，不用舊情綿綿！

當一個群的版主由本群脫身另組新群，舊群還能維持多久？你原來以為，沒人邀請你加入舊群，你就沒有社會地位。現在連版主都開始脫群另組新群，你還遺憾自己不在舊群內嗎？你還舊情綿綿嗎？

你知道我說的是哪個群。1942年，二次大戰正激烈時，美國總統法蘭克林．羅斯福組了一個群，暫名「聯合國」，拉攏了二十六個群友。二戰在1945年結束，五年後的1950年，群主美國將群友擴充到五十名，將「聯合國」這個機構正式化。

聯合國這個群，當時反映的是戰爭後的國際食物鏈，群主和四個大盟友出任「一票否決」的常任理事。隨著地球上權力格局的變化，會員越來越多，會員之間拉幫結派，有時像擂台，有時像派對。「聯合國」這個群組，早因量變和質變之間的交互作用而變質，脫離了西方自1648年「西伐利亞協議」以來進行了三百年的「區域自主立國、區域自主主權」的原則，今日若羅斯福總統再世也認不得它了。

聯合國如果還具有任何實質性，那麼世界上也不會陸續冒出各式各樣獨立於它的組織，從WTO到IMF到APEC到地球氣候組織到上合會。這現象反映的其實就是「聯合國會員卡」這個概念是虛的，擁有這張身分證並不能真正保護你什麼，遇到事情時拿出這張名片往往是沒有用的，伊拉克、敘利亞、烏克蘭拿出身分證呼喚群友起了作用嗎？所謂的「常任理事」，五個之中哪一個依照群規辦事？

創群的美國，現任版主川普，經常驚嚇地球人。2018年9月26日，他在聯合國大會上向所有的群友宣布：「美國從此絕對不會再把自己主權（所能決定的事）交給（聯合國）這樣一個非由選舉產生、不必負最終責任的全球官僚機構。」

這等於是版主在心理上已經準備退群了！對於「類聯合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川普早已表明美國未來不會在冠著「全球主義」大名的多邊貿易架構下進行貿易談判，而在行動上他也已經證明他做得到—他拆散了前任歐巴馬總統的「泛太平洋貿易協議」（TPP），撤回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改以和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各簽雙方貿易協議，歐盟也有意配合，南韓、台灣都會很快被安排進入新軌道。

經濟上已經發生的模式，需要多久才會延伸到政治場域？從事態發展看，只能這麼說，如果未來兩年中的某一天，美國宣布退出聯合國，我們也不要太驚訝！

今年七十三歲以下的人，從一出生就活在聯合國的世界裡，觀念上很難接受一個沒有聯合國的地球，腦子和潛意識裡，相信的是「除非再爆發世界大戰，當前的聯合國不可能消失」。若你這樣想，請注意，由「世界關貿組織」（比聯合國還大兩歲）擴大而成的WTO，號稱經濟聯合國，今天已經名存實亡。那麼，地球是否因此停止經貿了？

對於一個版主過去沒在群裡保護你，而且版主自己都打算退群的群組，你還那麼在意那張會員卡嗎？有實質意義嗎？

現在世界上除了一個國家，所有國家都認可台灣的實質國家主權，只是台灣少了一張那稱為「聯合國」的會員卡。少了會員卡，影響了你的方便性，但可沒控制住你的行動力和靈魂。在一個本身就垂垂可危的架構中，沒有會員卡，就做一個「無印良國」又何妨（詳細論述請搜索「無印良國」一詞）？只要品質好，勤做市場，商標和口碑自然實至名歸。

老版主即將退舊群，正在積極四處建新群，台灣還是將精力用在加入各個新群吧！不用舊情綿綿了。

「無印良國」的時機到了！

2017年6月13日，發生巴拿馬斷交事件。但是，究竟是誰被巴拿馬斷交？

在世界上拖累台灣的，絕對不是「中華民國」這四個方塊字，而是「Republic of China」這三個英文字。被巴拿馬斷交的是「Republic of China」，而不是「中華民國」，因為巴拿馬根本不認識方塊字。

台灣現在稱呼自己的英文字用的是Taiwan，而過去，德意志人曾經稱呼台灣為Thaiwan，更早的時候荷蘭人稱呼台灣為Tayouan（大員），更更早的時候葡萄牙人稱呼台灣為Formosa。有史以來，地球上從來沒有任何一方和Taiwan（或Thaiwan或Tayouan 或Formosa）建立過外交關係，但是曾經有一百多方和Republic of China 建立過外交關係。過去四、五十年間，世界上許多方選擇了和Republic of China這個稱號劃清界線，因為他們不承認台灣這個小島代表China。

各位讀者，讓我們先把腦子弄清楚，巴拿馬的舉動，只不過是不再承認台灣代表China，因為台灣自己稱自己為 Republic of China。它沒說從此不和台灣做生意，不准台灣人入境。如果台灣

和巴拿馬之間的貿易因為所謂的斷交而下滑，那只是反映了台灣自己不爭氣，拿不出巴拿馬非買不可的產品。

誰規定了「中華民國」這四個方塊字的英文稱號必須是「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的憲法沒規定，這只是一個被用了很久很久的習慣罷了。相信今天在台灣，包括贊成「一中同表」，甚至贊成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人士，沒有一個活著的人認為中華民國在地球上代表China。

今天在台灣，相當一部分人對「中華民國」這四個方塊字有感情、有認同。這非常合理，現行的憲法就叫做中華民國憲法。另一方面，由於歷史因素，另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中華民國」這四個方塊字有排斥感，這兩類人共存，也沒什麼奇怪，台灣是個多元開放的社會，思想言論自由。美國有人燒國旗，蘇格蘭一樣有人要脫英。

一切的一切，都反應出一個事實：台灣的社會在認同問題上不管如何分裂，都具有一個最大公約數：台灣不代表China，中華民國也不代表China。這一點甚至是二千三百萬人和十三點五億人雙方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妙不妙？求同存異，這一點就是最大的同，也就是大同。

真弄不明白，台灣二千三百萬人不管在客觀上或是主觀上，都不認為中華民國代表China，那麼為什麼英文的稱號還要繼續叫做Republic of China？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嗎？如果我是北京，我一定不會容許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和Republic of China 斷交，而會保留幾個百萬人口以下的小國家繼續承認Republic of China；因為，如此才能證明台灣確實是China的一部分。

「中華民國」這四個方塊字的國號，只有修憲才能改；但是，Republic of China 這三個英文字的稱號，不必修憲就能改。改了之後，願意用新的英文稱號和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我們無限歡迎；不願意的，唉，讓它去吧。那麼，「Republic of China」要改成什麼呢？改成「Republic of Taiwan」？這是自己往槍口上

撞，但台灣是個思想言論自由的社會，願意往槍口上撞，也是每個人的自由，只要願賭服輸，旁人無權阻止。

個人淺見，可以將「中華民國」這四個方塊字的英文稱號，改為「Zhong Hua Min Guo」。倘若不爽漢語拼音，那麼改為「Chung Hwa Min Kuo」 或者 「Diong Hwa Min Kuo」也可以。這其中進一步道理，請見本章底下兩節：〈要下架的不是「中華民國」而是「Republic of China」〉，以及〈台灣的Realpolitik：再論Republic of China下架〉。

世界上至少有一百一十九個國家或地區承認台灣是一個「無印良國」，因為來自台灣的人可以入境免簽證。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包括我們的鄰居，進口台灣貨或者出口貨物到台灣，都要經過台灣政府的海關。所有重要的世界排名，台灣都和其他的國家並列。

所謂的主權（Sovereignty）問題，筆者曾為文深論，請參考《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2015），另也曾經在台北的TEDx做過一次演講《國家新型態的關鍵》，讀者或可參酌。

聽說，緊接著巴拿馬，Republic of China還面臨著一連串的邦交國斷交危機。這是遲早得發生的事。但是如上所述，北京一定會替Republic of China 保留幾個小小小小的邦交國，否則，它豈不是在世界上自我承認了台灣和China無關？

我建議，當下一次發生斷交事件時，台灣一定要把握住那千鈞一髮的時機，對世界宣布，Taiwan 並不代表China，Taiwan停止使用「Republic of China」這稱號，改以「Zhong Hua Min Guo」（或上文中的另外兩個選擇）。「中華電信」不是老早就已改為「Chung Hwa Telecom」了嗎？（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6月，原名〈後主權概念的台灣：「無印良國」時機到了〉）

如果中華民國的邦交國降為零

2018年一年之間，與Republic of China 斷交的國家有三個：多明尼加、布吉納法索、薩爾瓦多。

這三次斷交，從台北的走過場低調面對、北京的淡然，以及華盛頓無痛癢的呼籲北京不要單方升級事態，看起來真的沒什麼重要，就像一場大家都不奇怪的茶壺裡的風波。但是，若把格局拉大來看，它並不是一場「本來就一定發生」的茶壺內風波，而是一場攪動美中勢力板塊對衝、凸顯北京困局、台北困局、華盛頓困局的巨大漿糊缸內的風波的開始。

三國和「誰」斷交？

要說明狀況以及其巨大後座力，可以由一個最簡單的然而華盛頓、北京、台北三方都回答不出的提問：請問，這三國是和「誰」斷交？被斷交的對象，是那個英文稱為「Republic of China」的中華民國，還是那個英文稱為「Taiwan」的台灣？

台灣的大多數媒體，包括政府人士的發言，稱之為「多台斷交」；除了政府最正式的官方文件中，「Republic of China」是不見蹤影的，而社會民眾即使在私下交談中，大概一千個人只有幾個會用「多明尼加和中華民國斷交」這樣的語言。北京方面，絕對不會使用「多明尼加和中華民國斷交」，因為中華民國對北京來講並不存在。但是，敘述此事時總要有個主體對象，總不能說「多明尼加和×斷交」吧？因此，北京無法迴避「台灣（Taiwan）」這個字眼，只能打補丁的加上一些類似「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世界上只有一個China」等等的定語。華盛頓在美中三公報約束下，不能說出「Republic of China」，只能依循台灣關係法的慣例，指謂台灣這個島嶼為「台灣（Taiwan）」。美國自始至終都只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但從未認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這都哪裡跟哪裡啊？這三個國家斷交的對象究竟是「誰」？這個如此簡單的提問，如果讓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或孔子來回答，

或許可以講清楚，但在二戰以後縫補拼湊、強國上下其手的「國際體系」邏輯下，完全講不清楚。換句話說，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漿糊缸內的問題。

這問題留在漿糊缸內已經四十年，不斷在發酵，遲早有一天會發酵到缸體承受不住的地步，漿糊就要噴炸了。請原諒我用一個不太文雅的俚語來比喻那一天：當屎噴到風扇葉的時候 （When Shit Hits the Fan）。那一天將發生在何時？觸機是什麼？沒人知道。但是，多明尼加斷交事件，可以被視為那一天的凌晨零時一分，而秒針還在轉動中。

北京的困局

先來看看北京為何處於困局。「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的邦交國，在三國斷交後，只剩下十七個。北京心知肚明，在這十七個國體中，除了梵蒂岡需要北京踩油門才能建交，其他的十六個，北京只需要把腳離開煞車，這十六個國家就會自動投懷送抱。

與梵蒂岡的建交油門，北京只需再做一些技術性的讓步，就可畢功。其他十六個，北京只需不踩煞車，個個就會對號入座。但是，大哉問來了，如果令「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在地球上一個邦交國都沒有，「台灣（Taiwan）」就自然而然的代位，「台灣共和國（Republic of Taiwan）」在邏輯上就只差臨門一腳。屆時，台灣島上還舊情綿綿的依戀「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的人士，就頓時失去立足點，北京就痛失台灣島上還對和平統一抱有期望的內應力量。

事實上，這正是法理台獨派的深切期望：讓北京搞砸「維持現狀」，為改變現狀的正名制憲鋪陳國際道路。北京當然明白這一點。

那麼，北京究竟要給「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保留幾個邦交國，才能維持脆弱的平衡呢？五個？十個？相信這是一個中南海內經常在辯論的話題。天真的激烈派認為，這是一個偽問題，因為當時機到來時，武力收服台灣就可以了。這些天真的激烈派，坦白說，都不是得到共產黨真傳的人；一個得到共產黨真傳的人，應該有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高度的思維框架，陰陽互用、造勢不成就順勢，而不是以為靠打架就能得天下的人。

然而為什麼中南海內的高人無法說服天真武力派？正因為高瞻遠矚，這些高人深切認識到一點：台灣的背後還有美國，世界上最希望保留「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的人或許不是台灣島上的國民黨或深愛中華民國的遺老遺少，而是美國白宮。又得向讀者致歉，為了撥雲見日，不得不再用一個不雅的比喻：有時，小三存在的意義，並不在於小三的優異或感情，而在於箝制大房的囂張，婚姻關係維繫不下去的時候，永遠保有和大房離婚、扶正小三的威嚇餘地。

以上是北京當前兩難的困局。這個困局，十年之前，哪怕在五年之前，北京都還沒把它當作一個真實的困局。因為當時北京還相信，中國的經濟會直線成長，軍力也會直線成長。但最近這十年、五年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脆弱已是無人可以否認的現實。至於整體國力，容我插播一個案例：美國對中國中興集團的芯片（晶片）禁運令，瞬間使得中南海明白，中國的所有科技硬體包括軍事，只是沒有靈魂的軀殼。由於過去三十年中國只重權勢和金錢，扼殺了發展靈魂所必需的制度與環境，因此即使現在開始改過修煉，自己的靈魂還在二、三十年之外。

台灣的困局

回過頭看台灣的困局。如前所述，百分之五十的台灣民眾對這三國斷交無感，但等到梵蒂岡斷交（將中華教區中心撤離台灣），

台灣社會勢必會大鬧並自殘一場。至於其他十六國倘若一個一個的斷交，台灣社會的反應大概也和2018年三國斷交一樣，有些人傷心，有些人酸言酸語自嘲，有些人樂見。

如前所述，如果北京蠢到讓所有十六國和中國建交，對台灣可能是去了一個心理包袱，對美國而言則是坐實了中國單方改變現狀的企圖。何況，台灣內部的法理台獨力量，其實並不真正在意北京把十六國都搶走，因為那是「中華民國派」以及「華獨（保持實質獨立）派」的損失，法理台獨派的加分。

台灣當下的困局，來自內部的因素遠遠大於來自外部的因素。台灣社會內部目前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陣營：保持現狀派、實質獨立派、法理台獨派和不反對終極統一派。各「派」的真實力量比例，其實非一般民意調查可確認，因為幾乎所有的民調都採取暗示性或限縮性的提問方式。另外一種粗躁分類的方式就是把人民的感情狀態分為「台派」和「非台派」，甚至分為已經嚴重失焦的「綠營」和「藍營」（或泛綠、泛藍）。

台灣的政治現況，其實處在一種「動態的分裂」當中，隨著議題的不同還有輿論導引力道的不同，人們（尤其年輕世代）會把自己歸納到不同陣營。在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動態的分裂很難走到威脅社會生存的懸崖邊緣，但是台灣的民主程度目前還只走到「一人一票＋（幾近放浪的）言論自由」階段，一般人民還沒有完成從「百姓」演化到「公民」。因此，「動態的分裂」在台灣，缺少了民主程序和法治的足夠保障，幾乎毫無例外的投射到頻繁交錯的選舉活動內。不誇張的說，台灣現在可形容為天天在選舉鬥爭，無事不牽扯選舉鬥爭，因而整個社會處於原地打轉或說鬼打牆的狀態。

生活層面有許多美好事物的台灣，在政治層面，幾乎可以用三種狀態道盡：一群為了選票而刀刀見骨的人物＋一群明哲保身、自求多福的人士＋一群嘲弄世態的游擊戰士。固然台灣不缺火爆性的社會、經濟議題。例如勞工待遇、軍公教年金、核能、空汙、食安、同婚等等，但是在所有議題中，最具可燃性、一點就爆的，依

然是前述（儘管分類粗糙）的所謂統獨、藍綠議題。

在還有十七個邦交方的當下，再來幾例個別的斷交事件（除了梵蒂岡），相信也不至於成為牽動上述「動態性分裂」的要素。但是，還是那個老問題：究竟要等到剩下幾個邦交國，才會成為台灣內部廝殺自殘的燃點？北京的邏輯應該是：每次接近台灣選舉，若綠營勝面大，就來他個兩、三個國家斷交，若藍營勝面大，就不進行建交。然而，這又牽涉到前述的背反定律：邦交國越少，法理台獨的籌碼就越多。

你說，這是不是一個扯不清、理還亂的漿糊缸？

美國的困局

美中兩國的摩擦，已經進行了四十年，但累積的壓力現在已經到了板塊對衝的階段。板塊對撞將發生在亞洲，而亞洲境內有四個可能的對撞點：朝鮮、南海、東海釣魚島，還有台灣海峽。目前，雖然北京對台灣的文攻武嚇動作不斷，但我認為台灣在四個可能撞點中，還處於末段尾端。美國的戰略困局，來自這大格局、大歷史、大地理；早已實質獨立的台灣還剩下幾個「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邦交國，完全不在美國的戰略雷達上。但是，當一個邦交國都不剩的時候，或者當邦交國數量降到「黃金交叉點」之下，而導致法理台獨聲浪高漲的時候，美國的「台灣困局」就開始了。

我認為，美國不會願意陷入「台灣困局」，在對中國壓力升級還是降級、對台關係是升級還是降級的分寸上，美國有自己的節奏和尺度，而那節奏和尺度，絕對環繞美國利益而進退。這點，白宮和中南海之間絕對有某種默契，如果有一天這默契被打破，那絕對不會是因為中美的一方愛台灣，而會是因為中國或美國的執政黨愛自己。

台灣可以積極做的事

如前文所提，台灣在大歷史下，目前還只開發自己到一種「次民主」的階段。其實，若台灣人用心用力把台灣的民主成熟化，在一人一票、言論自由的已有基礎上，終止糊弄民主機制、加強法治、人民發自內心的將自己由自憐自悲的「老百姓」轉化成為有理有節的「公民」，並讓全世界的地球人都看到台灣的這份努力，用盡一切自己可掌握的資源和力道，對各國人民宣傳，開放人才政策，讓世界走進台灣，那才是台灣在未來的最大安全保障，威力勝過核彈及航母。

三國的斷交，若台灣人有如上格局，那麼真的只是芝麻綠豆小事一樁。但是若台灣人缺少格局和視野，發了霉的芝麻綠豆也可讓人腹瀉，甚至死亡。其實，不止斷交事件，所有中共對台灣的其他文攻武嚇事件，都可以用同樣的格局和視野來對待。台灣人，你說呢？

台灣的國際身分，也就是「國家定位」問題，目前懸在半空中。基本上，各種立場可以歸納如下：

一、堅持「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二、堅持「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Republic of Taiwan）或其他類似名稱主體。

三、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論」，交由目前二千三百萬領取「中華民國」身分證的人公投決定台灣地位。

四、贊成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統一下的「一國兩制」。

五、傾向接受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託管地位。

六、傾向接受美國一國的託管地位，如波多黎各或帛琉。

七、傾向直接向美國申請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

八、主張以日本國作為以上三傾向的主體。

以上是八種立場，可能還有更多的其他立場（例如，以中華民國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八種立場，支持的人或多或少，雖然頭四項的人數最多，但根據歷來民調，加總起來也不超過台灣成年人口的百分之四十。換句話說，超過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台灣民眾處在「最好什麼都不要動」的心態。問題是，世局的動盪方向，並不容許「什麼都不要動」，台灣人民面臨抉擇的時刻，很快就要到來。2020年大選的慘烈狀態，就是很多人感受到「一翻兩瞪眼」急迫感下的焦慮現象。

頭四項立場雖然支持者不少，但眾所周知，這四個方向在法理上、民意上、現實國際權力結構上，都有許多窒礙難行的因素。台灣人已經耗費了太多的精力在進行重複的辯論。

但是，除非是絕對的死硬派或基本教義者，大多數人並不會反對務實的階段性解決國家定位難題。只要人們肯開腦洞，願意接受另類思路。開腦洞的必要條件，就是跳出盒子思考，不受你爸爸、你長輩、你老師、你朋友、你敵人、教科書、國內外權威的框限。要知道，所有的國際法、國際規範、國際習慣，都是在特定環境下由人創造出來的，在「國際政治」這個領域，沒有上帝。台灣地狹人多資源少，生存的考驗就在於創造力夠不夠，敢不敢跳出「殖民地思維」和「被作基地」的習慣反應。

因此，接下來讓我們的想像力飛一會，跳出以上八個立場的盒子來看台灣的「國家定位」。我們將從三個（不見得互容）的視角來看問題：台灣改英文名稱、台灣被借名片，以及台灣進行品牌轉移。當然，這些可能性都有賴合適的國際條件，但在思想上，我們總得有備無患吧？

要下架的不是「中華民國」，而是「Republic of China」

首先聲明，這不是一項政治主張，而是基於現實政治（Realpolitik）所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對於各種政治主張，無論是「台灣獨立」還是「終極統一」，甚至包括筆者本人多年來倡議的「後主權時代的無印良國」，本文都無意牽扯。

世上有一種局面，叫做「僵局」，意指身陷局中的各方都沒有能力壓倒他方，卻又都不願被他方壓倒。長久以來，台海就是一個僵局，但造成僵局的主因並不出於台灣和中國的關係，而出自美國和中國的關係。而數千里之外的美國之所以介入台海成為僵局的一方，其基本考慮還是為了保護其全球霸權規劃下的東海、南海兩區域。中國成為僵局的一方，主要考慮其實也是台灣島的區域戰略位置，而不是為了台灣島這一點資源和人口。

台灣是被歷史牽拖進入這場僵局，中美、中日的僵局不解，台灣無能破局；而倘若中美、中日的僵局有解，台灣就有可能海闊天空。那麼，台灣有無可能協助中、美、日三方打破僵局呢？我個人認為是有的，只是台灣在先天上的資源、人口實力不足，這份助力無法表現在戰略層次，而只能表現在戰術層次；若換由負面的角度來看台灣在僵局中的角色，台灣在戰略層次無論如何努力，也一定成事不足，但若台灣在戰術層次犯下錯誤，卻是敗事有餘。

現在，我們就由戰術層次，來看看「中華民國」這稱號的問題。近來，由於蔡英文總統一反民進黨傳統，公開承認並使用「中華民國」這稱號，而引起台灣社會，尤其是綠營的不同意見，倒是北京方面把這視為一種民進黨回歸善意的信號。然而北京的反應卻也是扭扭捏捏，一方面高興於蔡氏與「一邊一國」保持距離，另方面又在其國內媒體、官式文件上拒絕「中華民國」一詞。

其實，這是北京的腦子長期被水浸泡下的制式反應，難道北京不知道，禁用「中華民國」一詞的後果，就是逼迫台灣使用「台灣共和國」一詞？從上述的僵局形勢來看，北京禁用「中華民國」，其實是一種「麻煩製造者」的作為，只會惡化僵局，完全無助於打

破僵局。

這裡要給北京提個醒。自從尼克森、季辛吉訪問中國，直到中美兩國建交、中美簽署三個聯合公報，乃至隨後三十餘年對台灣的國際圍堵，所在意的都是「一個中國」的問題。但請注意，「一個中國」乃四個方塊字，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看不懂方塊字。北京真正在意的是英文版的「one China」□世界上只有一個China，沒有兩個China。現在讓中共最不舒服的是：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護照上印刷的是 「Republic of China」，政府公務員名片上都加上「R.O.C.」三個字母縮寫，和「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只有一字之差，連美國政府官員在公開演講中都不時口誤，稱呼中國為「Republic of China」。

在中共和廣大中國人民的印象之中，「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若容忍「中華民國」就等於容忍「Republic of China」，這是對一個中國原則明目張膽的侵犯，是可忍孰不可忍？請問北京，是不是這樣呢？如果是，那就讓我們在戰術層次上來解決這個問題，將這問題從中共的國際大戰略內移除。

以上的分析說給北京聽，但其實也是說給台灣聽。今天若在國際上做一份意見調查，問「台灣是否代表中國」，答案絕對是NO。同樣的，今天若對十三點五億中國人和二千三百萬台灣人做一份民意調查，其中的最大公約數將會是：台灣不代表中國。這不就結了？我們為什麼不順著民意走呢？為什麼還硬要用 「Republic of China」這個英文稱號呢？還有比這更自欺欺人的事嗎？

不用「Republic of China」，用什麼作為英文稱號呢？總得有一個吧？按台灣人的意思，那就是一個清楚響亮的「Taiwan」!然而，倘若台灣的護照封面上只印上一個大大的「Taiwan」，恐怕第一個巴掌打下來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飛湧入台灣島斥責、威脅台灣的官員，恐怕是來自華盛頓而非北京。北京只會在幕後欣賞這一齣戲。因為，在國際大局產生根本變動之前，美國無論誰當政，

都將把台灣此一舉動視為威脅美國利益的嚴重事件，台灣將成為美國眼中頭號惡化僵局的麻煩製造者。「Chinese　Taipei」如何？不可能，台灣民意不可能接受，那將代表台灣在國際上的徹底淪陷。

多年來，我在文中、書中、演講中，反覆提出一個台灣英文稱號的解決方案，一開始人們視為搞笑，但隨著亞洲僵局的步步惡化，也有人開始正視這個提案。提案就是：台灣作為一個國家（country）實體的英文符號，採用漢語拼音的「Zhong　Hua　Min Guo」!如果台灣有人不喜歡用漢語拼音，那麼用台語拼音的「Diong　Hua　Min　Guo」也可以。同理，用羅馬拼音、拉丁語拼音，或原住民語拼音都可以，重點是改用英文以外的拼音。

用拼音改這個稱號有以下好處：

一、徹底杜絕了兩個中國（Two China）的國際誤解。

二、徹底符合了國際認知和台灣、中國雙邊民意的最大公約數。

三、台灣官員可以大方的在名片上印出國名，不必躲躲藏藏的用「R.O.C.」。

四、懂得漢語的人都知道這就是「中華民國」的意思，保持了某種情感和政治上的相關性、聯想性，而不懂漢語的洋人看了霧煞煞也無所謂。

五、漢語拼音正因為洋人難識，因而「Taiwan」一詞會保持其慣用語的身分。

六、中華民國憲法中，並未規定其英文名稱，因而改動不必修憲，不牽涉統獨問題，沒有憲法層次的困難，取得民眾同意後，由行政院直接向國際宣布即可。

七、各國際組織，其中大多數向來都用「Taiwan」或其縮寫「TWN」來指謂台灣，不會引起各國更動文件、數據庫的困擾。

改英文稱號，也會帶來一些小麻煩，例如和所餘的十七個邦交國的存續關係。但事實上，十七個邦交國的存在，實質上只是一個面子問題，而且多半是「Republic of China」的面子問題，而不是台灣的面子問題。須知，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和「Taiwan」建交，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和「Taiwan」斷交。他們建交和斷交的對象都是「Republic of China」。他們若因「Zhong Hua Min Guo」英文稱號而藉故解除邦交，那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由他去吧。其所帶來的國際媒體注意，反而會使得改名一事得到更多人的認知。

改英文稱號會不會傷到台灣人的自尊？我認為不會。首先，你的身分證和駕照上原來就沒有「Republic of China」這三個英文字；再來，將來拿著一本護照，封面印著大大的「Taiwan」，小小的「Zhong Hua Min Guo」，既不會產生今天外人對護照的誤解，也顯得更有獨特標誌性，也不用貼貼紙了。

英文符號改為「Zhong Hua Min Guo」，就是「世界上沒有兩個中國的問題」一語的最佳注解。舉幾個小案例作為結束：「中華電信」原來稱作「China Telecom」，後來為了避開世界上不能有兩個「China」的困境，因而改其英文稱號為羅馬拼音的「Chung Hwa Telecom」，現在不是活得好好的？「中華航空公司」早前也遇到兩個中國的問題，但由於其代號已經植入全球航空系統的電腦中，中國只好作罷。而「Republic of China」或「R.O.C.」本來就已經不存在任何全球性的資料交換系統中，更改完全不是問題。

「Zhong Hua Min Guo」上架，「Republic of China」下架，才能維持「中華民國」在架上，從而進一步擦亮「Taiwan」的品牌，帶來讓人驚奇的效應。難道台灣今天最需要的不是國際品牌效應嗎？難道北京不想化除Two China的骨刺嗎？在現實政治的場域，這對北京和台北，都算是朝向破解區域性、世界性僵局的一步棋，走不走棋就看智慧了。

台灣的Realpolitik：再論「Republic of China」下架

Realpolitik是德文，一般翻譯為「政治實務」或「務實政治」，這概念有比較嚴格的定義，就是「以現實條件及已經存在的因素，而不依據意識形態或道德命題，進行一國的政治和外交」。

在台灣，當年的蔣介石總統是位反Realpolitik的大將，1963年至1971年期間，即使有法國和美國的斡旋，他寧可被迫讓出聯合國席位，也不願意台灣以非「Republic of China」的名號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留在聯合國，因為「漢賊不兩立，世界上沒有兩個中國」；當時的中國則是Realpolitik的高手，知道美國對中國有所求（制衡蘇聯），因而堅持台灣不得以任何形式留在聯合國，否則寧可等待，因為中國等得起，美國等不起。

在1971年台灣被迫讓出聯合國「China」代表之前幾年，倘若蔣介石總統願意用Realpolitik思維，以漢語拼音的「Taiwan」、甚或古老的「Formosa」，試圖把台灣以另類方式保留於聯合國，今日台灣的國際身分將大不相同。但是這個「倘若」，已經無法探討，只能是個歷史懸念了。

蔣氏父子之後的李登輝總統，起手式就是Realpolitik思維，因而才會有國統綱領與1992年的歷史性兩岸會談。後期，他開始捨棄Realpolitik，改走理念或意識形態方向，並由陳水扁總統繼承。馬英九總統的路線，則是重返Realpolitik，其堅守的、模糊度極高的所謂「九二共識」即為代表，儘管他的路線可以被解釋為兩種反向的目的：其一，抵制來自中共的統一壓力，避免火車對撞，這種解釋被中國許多人標籤為「獨台」。其二，保留台灣和中國的統一香火，這種解釋被台灣許多人標籤為「終統」。

上任後的蔡英文總統，堅決反對所謂的「九二共識」，然其任期內最大挑戰，依然是在Realpolitik 和理念、意識形態政治之間的選擇和拿捏。人民選舉將她推上了總統大位，但在美中日的亞洲Realpolitik 局勢中，台灣島內關起門來的理念政治操作，如何在區

域中或國際上跨出去？跨得出去嗎？在台灣島內的政治氣氛，以及民進黨內的派系挾持下，她不能直接繼承馬英九的Realpolitik　路線，那麼「蔡氏Realpolitik」的路線在哪？邊際在哪？動作在哪？

毫不帶保留的說，由於多年來的內部政治氣氛，台灣幾乎已經喪失了對外Realpolitik的能力，甚至連對外理念政治的能力也幾乎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情緒政治的能力。這使得任何政府，管它是國民黨、民進黨還是什麼黨，都難以推出理性的、連續的對外政策。各黨各派系，在權力、利益、面子的交錯下，就像盆子裡的一堆螃蟹，誰想爬出盆子，半途都會被其他八隻腳的螃蟹拉扯住而不得掙脫。

因而，在面對中共威脅這件事上，台灣社會一直是邏輯貧乏的。台灣的多數人，還把「中共威脅」這議題定義在兩岸之間的博弈，而那是三十年前的舊狀況。今天的事實是，中共老早就沒把台灣視作「兩岸」的問題，而是把「台灣問題」視作區域整體性甚至國際操作的棋子來看待。換句話說，中共方面在下圍棋，台灣是一顆尚未落盤的棋子，但是台灣方面還停留在過去三十年和中共玩剪刀石頭布的老舊心態。圍棋變化千萬種，而剪刀石頭布的邏輯變化只有九種，以猜拳的技能下圍棋，在Realpolitik上能不受制於人嗎？

台灣還在玩剪刀石頭布這件事，透露出兩個信息：一、台灣人還沒有面對自己的真實處境。二、台灣人還沒有打開自己的眼界。這兩者，其實是一個銅板的兩面；由於拒絕面對真實處境，因此打不開自己的眼界。

台灣人只要正視現實（跳出選舉語言，以現實條件及已經存在的因素進行下一步的思考），就能夠打開眼界（以區域政治、國際政治全局探索Realpolitik的寬度）。這裡尤其需要提醒的一點是：全局觀，就是換位思考的能力，一種由其他方的處境來思考自身定位，以及由換位思考衍生出來的Realpolitik作為。請注意，「其他

方」也包括了中國，如果「逢中必怒」，那是絕無可能達到全局觀，也是絕無可能跳脫猜拳模式而達至Realpolitik創新。

接下來，我們把台灣的Realpolitik空間，分為區域層次以及全球層次來探討。

美國的世界戰略，說到底只有一條紅線：不允許地球上出現一個足以抗衡美國的國家或地區，不論這國家叫做俄國還是中國，不論這地區是美洲、歐洲還是亞洲。今天我們在世界上看到美國介入紛紛擾擾的事務或戰務，都只是基於這條紅線的衍生品罷了。地球上任何地方，只要出現了直接或間接威脅該條紅線的狀況，美國都會視為國家利益而進行處理，直接的威脅就動武，間接的威脅就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

中國還沒有劃下全球紅線的能力，但是中國有一條亞洲地區的紅線：亞洲乃中國的勢力範圍，美國僅可在中國的同意之下參與亞洲事務。很明顯，這是兩條衝突的紅線，若外交或經濟手段化解不了這衝突，那就是火車對撞，以武力解決。用個台灣人都能理解的比喻來形容目前的態勢，那就是美國希望「一球兩制」：我可以容許中國作為地球上的一個主權特區，在你內部隨你怎麼搞，但中國之外的區域聽我的。而中國呢，最終希望的是「一邊一國」，以太平洋及阿拉伯海為界，西半球歸美國管，東半球歸中國管。

拿個地球儀來看，中美紅線衝突的焦點在亞洲，而台灣在這火車對撞的「衝突公式」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因為台灣深深的陷在東北亞的釣魚台領土爭議、東南亞的領海爭議當中。台灣在這兩項爭議下的立場和動向，雖然不能決定中美兩國亞洲紅線的勝負結果，但是若要敗任何一方的大事，卻也能成為極大的干擾因素。秤砣雖小，其位移卻也可影響千斤之平衡。這也就是不論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還是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不時必須對外宣稱台灣不會變成「麻煩製造者」的原因。

過去認為，台灣位於中國進出太平洋的「第一島鏈」要衝，因

而為兵家必爭之地。然而，隨著軍事科技及系統的顛覆，這種看法已經越來越不成立。即使繼續以「防禦島鏈」的舊觀念來看問題，要衝也已經不在角色搖擺不定的台灣島，而在日美共治、角色明確的沖繩島。

以上的描述，其實足以推衍出一條台灣Realpolitik的路線，那就是：將來的台灣，其實可以試圖將自己從中美的紅線「衝突公式」中移出，而扮演一個可能促成「和平公式」的角色。但是，這需要台灣主動提出方案，而非像現在這樣只敢被動宣稱自己不會製造麻煩。甚至可以說，台灣越被動的隨波逐流，就越會被一步一步的拖進中美衝突公式中而最終不得自拔，成為中美雙方代理戰爭的棋子。

在中美的亞洲紅線對撞之前，台灣可以採取哪樣的Realpolitik主張呢？在《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2015）一書中提出的建議是中美簽署「台灣永久中性化（neutralization）協定」，但現在對撞已成事實，看來本章下面提到的「借名片說」和「名片轉移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多年來，台灣社會陷入一個迷思：台灣的國際地位，由國際是否承認台灣的「主權地位」而定，以至於這個迷思成為台灣政客的最大提款機。

「Sovereignty」這個概念被翻譯成方塊字的「主權」，可能是台灣幾十年來政治災難的最大源頭之一。首先，「Sovereignty」這個字眼中沒有「right」（權利）的含義，而只有「power」（權力）的含義；它不像「人權」（human right）乃天生權利，而是一個以實際權力為基礎的概念。實際權力，靠自己培養，自己的實力越強，就越有宣稱Sovereignty的資格。聯合國，不過是個權力的俱樂部，裡面有些國家真有實際權力，但多數是權力的附庸。例如：烏克蘭由於其地理位置，在俄國和歐洲的權力之間搖擺，即使「主權獨立」了二十六年，俄國還是說打就打。再如：伊拉克、敘

利亞都是老牌的「主權獨立」國家，美國也是說打就打。

台灣的另外一個觀念災難（也同樣是政客的提款機），就是「國家」這個方塊字詞的多重意義混淆。雖然國際間普遍不承認台灣是個「國家」（state），但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沒有人不承認台灣是個不折不扣的「國家」（country）；這就是為什麼雖然台灣的Sovereignty State的地位不被承認，但台灣的護照卻可在一百六十個國家（State）內免簽通行的道理。

作為一個因為實力不足而不被承認Sovereignty、但實質上不折不扣的國家（country），台灣有兩個需要努力的方向：一、加強自己的實力，不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二、加強其Realpolitik 的醒悟及能力–「以現實條件及已經存在的因素，而不依據意識形態或道德命題，進行一國的政治和外交」。

在世界全局觀上，由於以上所述的「主權」、「國家」概念的誤用和濫用，台灣已經養成妄自菲薄的惡習，即使是年輕新世代，許多人已經表現出不符合其年齡的酸氣沖天，並以「酸民」自嘲。台灣若想要有明天，這個心理上的惡習必須先去除。意識到妄自菲薄不可取之後，台灣應該開始體察自己在國際Realpolitik場域中可扮演的角色。

首先，台灣必須自我回答一個問題：台灣想在國際的Realpolitik場域中和那個被承認為代表中國的「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競爭誰才代表「China」嗎？或換個方式問，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還想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競爭哪個政府才代表「中國」（China）嗎？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台灣卻從來不敢面對，頭埋在沙子裡，哪裡還談得上Realpolitik 呢？

讓我們都來面對這個問題。讓我們每個人問自己：如果國際上請求台灣以「Republic of China」名號回到聯合國，重新代表「China」，你願意嗎？請認真想一想再回答。

如果你的答案是：願意，那麼你認為中國大陸的人民會同意

嗎？你認為台灣有能力在國際上代表中國嗎？你願意擔起「China」這個稱號的所有國際名聲和責任嗎？

如果你的答案是：不願意，那麼，為什麼你不願意？

再請問，你覺得如果海峽兩岸舉辦公投，只問如下問題：你認為台灣代表「China」嗎？雙邊會有多少人會說：是的，台灣代表「China」。

麻煩你再做一個動作：把前文中的「台灣」這兩個字，用「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替代，然後把以上幾個問題再走一遍，看看你的答案有無不同。

如果我沒猜錯，你的結論多半是：不管是「台灣」這兩個字或「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今天都不代表「China」。

那麼，為什麼台灣或中華民國的外文國號叫作「Republic of China」?當然你會說那是歷史原因。但是，為什麼一個明明只有三點六萬平方公里、二千三百五十萬人民的島嶼，要在世界上和一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十三點五億人民的巨大陸塊競爭「China」這個國際稱號？台灣島嶼硬用「China」這個稱號，島嶼上的人民不高興，島嶼對岸陸塊上的人民也不高興，天下有這種損人又損己的道理嗎？

儘管世界上的多數國家屈於中國的尺寸和經濟誘惑，不承認台灣的「主權國家」（Sovereignty State）地位，但幾乎所有國家或政府都知道台灣是個不折不扣的國家（country），而且台灣不願意隸屬於「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遑論被其政府統治，此乃全球眾所周知之事實。台灣或中華民國已經完全沒有必要用「China」這個字眼去證明以上的事實，恰恰相反，繼續使用「Republic of China」只會削弱國際上對「Taiwan」這個字眼所代表意義的認知。

事實上，台灣是個憲治國家，這部憲法叫做「中華民國憲法」，這是民進黨總統蔡英文女士也承認的事實。在這部憲法中，

並沒有規定「中華民國」的對外英文（或其他文）的名稱；所謂的「Republic of China」只是一個約定俗成、沒有憲法拘束力的歷史用語。若改變「中華民國」四個字，那叫改國號，必須修憲，而改變「Republic of China」，無須修憲。

這裡就涉及一個最根本的Realpolitik下的問題：台灣想不想繼續用「Republic of China」這稱號和「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競爭對「China」的代表性？台灣是否想繼續用「Republic of China」來抵擋中國對台灣在國際上的政治威脅？這種抵擋方式有效用嗎？繼續使用「Republic of China」，對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究竟是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這是台灣的Realpolitik 下的最基本問題。

認為有利的一個觀點是：在美中亞洲對撞之下，不論是因為美國想先發制人或者因為中共政府「面臨垮台」，倘若發生中美在亞洲地區的大戰，美國可能會再度承認「Republic of China」。然而，即使在這種極端的設想之下，台灣也不過是成為美國代理戰爭的棋子，這是台灣人要的嗎？除去此等極端的場景，保留「Republic of China」還有其他好處嗎？除了情緒上的滿足？

退一步想，即使如部分人所願，台灣最終被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的一員，而徹底接受美、日的軍事保護，那也和「Republic of China」這個稱號無關。別忘了，美中所簽署的三個聯合公報中是明白承認「One China」的，其對台灣的國內法照顧叫做「Taiwan Relations Act」，而不叫做「ROC Relations Act」。

除了保留「中華民國」同時將「Republic of China」下架這條路，還有其他擺脫困局的機會嗎？有，請往下看。但先做一個提醒：以下所設想的場景，需要在某種國際大局下才有可能。有關相對應的國際大局，讀者可以先回想一下書首所論的「五本總帳」，那五本總帳之間的環環相扣，與本章的內容有密切關係。

川普如果向台灣借名片

台灣現在有兩張名片，在當前世界大勢尤其是美中大局下，短至六個月，長不超過四年，我估計美國會向台灣借用名片。問題是：美國想借哪一張？台灣借不借？在什麼條件下出借？這三個問題，台灣民眾得事前想清楚了，否則到時手忙腳亂，內部互毆，自己把自己搞得半死不活。

這兩張名片，一張我稱之為「世界名片」，上面印的是：名「Taiwan」，字「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TPKM），號「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這張名片的用途是公民通關、稅務關務、結盟、參與世界組織。另一張名片，我稱之為「國際名片」，上面印刷的姓名是「Republic　of　China」，簡稱「R.O.C.」這名片的用途是與為數不多的國家保持國與國外交關係，以及安慰部分民眾。

在台灣從事獨立運動的人，訴求的是從第二張名片中獨立出來，但他們面臨一個邏輯上的不可解：即使通過國內的公投或立法將　「R.O.C.」消滅了，第一張名片下的字與號，依然無法消滅，因為那是台灣當前的世界通關證。東奧正名運動的公投，之所以被一些人視為引火燒身，就是這動作危及了台灣的世界通關證。

自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以來，美國把台灣視為一個政治實體，稱之為「Taiwan」，立下「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並協助台灣維持「兩張名片」的翹翹板現狀；當台獨工作者試圖消滅第二張名片的時候，美國就幫助其對手，當親中親統者冒頭時，美國就加碼台獨工作方。

2018年是美中關係分水嶺；「反中共不反中國」、「反共產體制不反中國人民」成為共和、民主兩黨的共識。川普並不是始作俑者，他只不過是其中的激進派，加速了力道罷了。川普公開斥責北京打壓台灣（Taiwan）以第二張名片與邦交國的關係，彭斯副總統則以第一張名片公開稱「Taiwan為世界所有華人（Chinese）的民主標竿」。

台海並不是美國的關心重點，佔亞洲貨運航道百分之六十的南海才是。但是，對依賴民族主義統治的中共，若被逼到政權存亡的角落，台海比南海更能決定中共的存亡。中南海和白宮都知道這一點。因此，倘若美國的意圖僅限於拖延中共的軍事及經濟發展，那麼軍事衝突點就會聚焦南海，波及台海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畢竟比較小。然而，若事態發展到美國認定只有改變中共政體才能遏止中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向台灣借用名片，因為唯有通過台灣名片的力道，才能動搖甚至瓦解中共的統治，那時引爆點就是台海。

若美國向台灣借名片，關鍵是借第一張還是第二張，或當借第一張無效後，繼續借第二張？借第一張，動作可能包括加強台灣關係法、促成台灣加入世界組織、放寬對台軍售、促成台灣成為「第一島鏈安保同盟準成員」等等。若借第二張，等於撤銷美中三公報，實質承認國際上有兩個中國的存在。

當前大勢下，美國向台灣借第一張名片其實已開端，而台灣並未反對。台灣現在得問自己：假設美國要借第二張名片，屆時的執政政府同不同意？美國也可技巧的避開「China」和「Taiwan」這兩個字，而用例如「two Chinese nations」（兩個華人國家）這樣的字眼。台灣人同意嗎？台獨工作者同意嗎？

這種尷尬，可稱之為「兩張名片的背律」。台灣若想在思維上擺脫這背律，唯有徹底認清：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本質乃是體制差異，而不是其他。無論是現有的兩張名片，還是台獨工作者期待的第三張名片，都沒必要和「反中／親中」、「反共／親共」的二分法掛鉤，三張名片的最大公約數其實是「非共」—台灣絕對不接受共產黨體制的統治。只要達到了「拒絕任何威權體制或其山寨版」的最大公約數共識，出借哪張名片或印第三張名片，甚至眾人還沒想像到的第四張名片，都只是順勢而為的技術性問題。政黨之間當下用二分法互毆，坦白說，非笨即私，只會害了台灣。

上面提到「第四張名片」的可能性，這就繼續來聊聊這第四張

名片的可能長相。

未來幾年之內，台灣就必須面對我所謂的「一九七一抉擇」。根據史料及還健在的當事人口述，1971年美國為了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示好，逼迫蔣介石所專斷的中國國民黨政府讓出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但給了蔣氏一個選擇：以「Taiwan」的名義留在聯合國，蔣氏經過考慮後拒絕。1971年是台灣接下來命運的一個歷史節點，隨後的一切，包括上文所提的頭兩張名片，都因緣於1971年的那個決定。今天還有人需要爭取第三張名片，也是源於那個歷史性的決定。這三張名片，都與「以中國為座標」脫不了干係。

我判斷，幾年之內台灣就會再度遇上「一九七一抉擇」，只是這次在不同時空下乾坤倒轉，變成美國必須向台灣借用名片以遏制中共。美國向台灣借哪一張名片的時局背景以及對台灣的利弊分析，請參考上節，此處不贅述。此節要續談的是：台灣本身還有沒有意願及能力，跳出「以中國為座標」的思維框框，構思一套「以世界為座標」的第四張名片，哪怕是一張虛擬的名片。

中國太大了，大到了不能倒，但這並不必然意味中共大到了不能倒。當下美國、甚至全世界，都意識到了中國是擋不住的，但是中共統治中國的方式是可以擋下來的。我個人倡議了多年的「中共不等於中國、反中共統治體制不必反中國人民」，在美國副總統彭斯的2018年10月4日演講中被表達無遺，相信快則半年、慢則兩年，就會成為全球共識。共識形成時，就是美國向台灣借名片的時刻，也就是台灣再度面臨「一九七一抉擇」的時刻。

第四張名片，其實就是一場台灣主體性的行銷。行銷學的ABC是：不要問你自己有什麼，要問客戶群體需要什麼。那麼，現在世界需要什麼？所有的國家都知道，不管中國的影響是好是壞，世界必因中國而改變，但是各國都在苦求一個改良中國的方案。美國領頭的國際共識方案將是：遏制中共體制，盡量不傷害中國人民。這方案中有個必要元素：台灣的示範作用。可以說，少了台灣這個元素，世界將得不到一個改良版的中國。這，就是台灣的客戶需求，

就是台灣主體性的行銷方向。

用一句話總結「第四張名片」的精髓：不管好壞，世界必因中國而改變，而中國可因台灣而改良。為什麼？因為台灣的民主掙扎經驗、把人當人的文明提升經驗，在中國和台灣都使用方塊字的條件下，最容易感動中國人民。把話說白了，連川普、彭斯和美國共和、民主兩黨都看到了這個「中共的七寸」，而把中共視為主要威脅的台灣人，竟然還看不清這點？

把人當人的法治、民主、自由下的文明提升，是百分之九十九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的企求；讓他們有這個指望，就是台灣主體性的最佳安全保障。台灣人民與中國人民之間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對照關係。台灣的法治、民主、自由做得越好，台灣的主體性就越能在國際上得到伸張，因為滿足了世界的「客戶需求」。

這就是我所謂的「第四張名片」。至於名片上印刷的字眼是什麼，建議社會上把氣度、眼界放寬一點，不管是和頭兩張名片掛鉤，或是和第三張名片連結，都不要太在意，台灣主體性的實質化才是最重要的。否則，上述的「一九七一抉擇」機會，可能又像上次一樣，一逝不回，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

黑天鵝：「中華民國ROC」的品牌轉移價值

本文描述的是一隻台灣無法控制的黑天鵝，即使牠轉向，雙翼捲起的風也會強烈波及台灣。首先描述一下這隻黑天鵝的長相，然後再分析其成因。請繫好心理安全帶。

基於內生原因，中國經濟將在2019下半年至2022上半年之間結構性硬著陸，同時伴隨著內部政治鬥爭、階級鬥爭的白刃化，導致中共內部家族及利益集團無法收場的局面。美國川普政府正在進行的圍剿中共行動，其實只是觸媒，沒有川普，上述景象一樣會發生，但可能晚個兩、三年。

以今日中國的經濟體量以及那十三點五億張必須吃飯過日子的嘴，中共的國家機器若瞬間散架，全球受不了；地球承受不了一個政治敘利亞化或經濟泡沫化的中國，台灣也承受不起其土石流。全球有能力協助避免中國陷入滅頂的國家，也只有美國了。但美國並不想武力介入，也沒有能力對中國這樣一個龐然大物提供救市的「馬歇爾計劃」；只有在出現某種內部自生的秩序力量，中國才能得以救贖，無解的中共才能找到一個下台階。黑天鵝是：美國在中共無法收場之時，想破腦袋，發現最有利的和平解決方案，就是「協助中國人民，向台灣借中華民國ROC的名片，以利中國人民啟動內生的民主化」。你的安全帶繫緊了嗎？

所謂的「兩岸關係」，其實只是中共的統戰話術，台灣海峽的風雲早已融入區域甚至世界。今天地球上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而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必須仰仗台灣主體性的存在，也許台灣人自己不這樣看，但世界是這樣看的。

中國之所以成為人類的問題，並不是因為它是中國，而是因為如此龐大的國家竟然還由一黨專政。美國政界乃至整個現代政治圈，已經達到共識：若讓中共繼續一黨專政下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是當代秩序的最大威脅者，有甚於當年的蘇聯。這裡引用一位俄國專家的描述，這是我見過最到位的見解：「美國之所以認為中共的一黨專政比當年蘇聯更危險，並不來自中共的軍力進展，而是因為在數位科技下，中共必將其數位專制體制推廣至全球。」

一黨專政這顆地雷必須由中國拆除，但基於國際現實考量，最終的「中國方案」必須是一個美、中、日、台，乃至歐亞都能接受，並且大家多少都得到一些好處的和平方案。

解除中共對中國的一黨專政，並不意味要「推翻」中共，因為如前所述，直接推翻中共，對世界秩序的代價太大。美國的大方向，其實在2018年10月4日副總統彭斯的演講中已透出端倪：中共不等於中國，反中共一黨專政是為了救回中國；台灣已經證明一黨專政是可以打破的，台灣是座燈塔。

什麼意思？說難聽是美國要打台灣牌，說好聽是美國將向台灣借名片。要借的這張名片，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台灣共和國」，因為那違背了政治進程的邏輯，不符美國的當下利益。要借的名片，最可能是「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因為英文名字裡有個「China」。那美國是要重新承認台灣是中華民國而搞兩個中國？別天真了，美國怎會替自己添亂。

先岔開話題，再繞回主論述。1949年，中共黨內辯論究竟應該保留「中華民國」國名還是另取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拍板後一段時間，毛澤東後悔不已，說當時應該沿用「中華民國」才對，可免去許多改名後的麻煩。鄧小平在世時，告訴蔣經國「什麼都可以談，包括改國號國旗國歌」。2012年習近平剛上台之際，中共黨內熱烈討論「中國共產黨」可不可以改名為「中國社會黨」或「中國社會民主黨」，這是中央黨校人士讓我親眼看到的文件。台灣和中國的年輕世代大約都不知道這些歷史事實，但是總聽說過中國海內外許多知識分子的「民國熱」或「民國情懷」吧。2012年，中國也熱議「頂層設計方案」，也就是修憲的民主方案，當時一位上海的法學學者說：修什麼憲，抄一抄1946年版的中華民國憲法就行了！

回到主論述，請繫緊安全帶：如果在國際、國內高壓鍋形勢下，中共喪失一黨專政的地位，那麼1946年滯留後被迫改名做花瓶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可不可以妾身扶正，恢復「中國國民黨」的名字？在喪失一黨專政後，如果習近平（或任何其他替代者）被迫拿出當年鄧小平「什麼都可以談，包括改國號國旗國歌」的氣魄，方塊字國號改回「中華民國」，英文國名也改回「Republic of China（ROC）」，國旗、國歌則可改可不改，而人民並不反對，是否完全不可想像？

這景象下的最大困難，就是很多台灣人會不同意，一方面出自感情問題，一方面出自政治恐懼。「中華民國」（ROC）名號被拿走，那台灣剩下什麼？台灣會不會更危險？這兩方面的顧忌，解析如下：

首先，台灣並沒有被拿走什麼。全世界早就都稱呼台灣為「台灣」（Taiwan），美國與台灣的實質關係也叫做「台灣關係法」（TRA）、「台灣旅行法」（TTA）、「在台協會」（AIT），絕大多數其他國家在台灣的代表處都是「台」。因此，在「中華民國ROC」被品牌轉移之後，台灣剩下的，就是「台灣Taiwan」。

再來就是台灣的安全問題。上文已說，「最終的『中國方案』必須是一個美、中、日、台、歐亞都能接受，並且大家多少都得到一些好處的和平方案」。請特別注意「和平」兩字，美中對衝固然已成定局，但除非不得已，美國人並不想和中國人打仗，中國人也不想和美國人打仗。日中之間，也是一樣。

說到這裡，又得先岔開一下話題。2015年12月，筆者在《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這本書中，提出了一條中國和台灣和平共處的方案。筆者建議習近平在解決權力問題後，先做三件事，然後做第四件事，然後再做第五件事。簡要說，第一件事就是將主要資源投向民生，第二件事就是開放縣級以下一人一票選舉，縣級以上仍保留中央直派（這動作不需要修憲）。這兩件事啟動了，將為他帶來國內、國際的絕大名聲及威望，為第三件事打下堅實基礎。第三件更是大事，因為中國所有的國安威脅，包括新疆、西藏、南海、東海、台灣議題，都來自一個誤區–民族主義下的「絕對主權」迷思。而既然中國和美國都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命題，且台灣議題永遠存在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威脅性，那何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向美國提案，在已經存在的中美三公報之下，再簽署第四公報–「台灣永久中性化協定」（The Permanent Taiwan Neutralization Agreement），以之向世界宣示中國的和平誠意，並以此緩和所有因民族主義、絕對主權而來的國家安全威脅。

這裡，「中性化」（Neutralization）概念是關鍵，其與「中立」（Neutrality）有本質的不同；「中立」只能由當事者（台灣）本身宣示，而「中性化」不需要台灣的同意。其中法理，有如當年美國與台斷交，與中建交，並不需要徵求台方的同意一樣。並且，在第三方協定的「中性化」下，台灣無須放棄武裝。

做完這三件事，就可以進行習近平念茲在茲的第四件事了─連續執政二十年。我書中建議習近平採取「總經理制改董事長制」，也就是「黨總書記制改為國家主席制」，這樣在2022年的人大（人民代表大會）中，打破同額陋習，仿效香港的超額間接選舉制度，而他本人一定高票當選董事長（國家主席），而不必打破中共「總書記十年制」，另選「總經理」（總書記）就可以了。

在這四件事的基礎上，習近平已經具有足夠的威望來做第五件事：開放黨禁。書中舉了個例子：新加坡一開國就是多黨制，但是第一次投票就贏得百分之九十六票源的人民行動黨，通過法治下的開明專制，得以在連續執政五十年之後，還能保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支持度，因此中國共產黨實施逐步民主化有什麼好怕的？在那本書中我預言，如果習近平不走這條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只剩下一條不歸路─法西斯國家，終有一天被國際圍剿。不幸的是，習近平在2017年搶先做了第四件事，而置頭三件事於不顧，這樣一來，第五件事更加做不到了，走上了不歸路，自我踏入被國際圍剿的境況。

而今，在國際上習的「中國夢」已破滅，在國內，揠苗助長的土地財政已不可持續，黨內派系鬥爭已進入白刃期，家族天文數字貪腐頻出，靠與官府勾結的企業家逃的逃、死的死，比較真實的民間企業家一籌莫展，社會邁進數位化的嚴控。中國藉以發展的四大經濟利多─人口紅利、土地財政、美國秩序下的出口便車、人民幣信用，一件都不復存在。即使沒有外部的壓力，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難以再支撐自己的肥肉體量。

更為關鍵的因素是：中共已經徹底對人民毀約。中國老百姓明白得很：一、你照顧我食衣住行。二、再給我發財機會。三、再容許我在有限領域內作土皇帝，我就放棄我的小領域外的自由意志和政治權力。這「約法三章」是中共一黨專政合理性的唯一基礎，現在一章都沒了。除了權力核心幾千人，十三點五億中國人民都在等待一隻和平的黑天鵝。但必須提醒中國人民，向台灣取回「中華民國ROC」名片，可能是唯一的一隻和平黑天鵝。如此，前文所敘述的五件事，依然可行，全世界將鬆一口氣，中國未來依然可光輝。

「中華民國ROC」是個品牌，歷史上政治實體之間的品牌轉移層出不窮，想想歐亞大陸上發生過的那許多案例。就在兩周前，馬其頓共和國（Republic of Macedonia）才將「馬其頓」這品牌轉移給希臘，解決了雙方爭議多年幾乎開戰的歷史殘留問題。

「中華民國ROC」這品牌當然也可轉移，雖然東方人不太習慣這個概念。一個「非一黨專政」的中國，對台灣來說無論如何都是個好消息。對美國和日本來說，他們信守了「一個中國」的承諾；而中國共產黨當然會抗拒，但是全世界的建交簽約對象都是中國政府，而不是中國共產黨，因此任何國家都沒違約問題，只是簽約國改了個名字、開放黨禁罷了。

至於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要不要改名去掉「中國」兩個字，還是選擇回到中國加入中國國民黨，那是每個人的自由選擇。再說，屆時的「新中華民國」真的會很需要台灣的多黨化轉型經驗，應該對伸出援手的回歸中國國民黨員歡迎都還來不及。

這隻控制權不在台灣的黑天鵝如果飛來，過程中會有許多艱辛，但是正如英國脫歐、馬其頓贈名一樣，雙邊人民都有許多人反對，法律及實務的細節也需要摸著石頭過河，歷程需要數年之耐心。過程中也不能排除局部擦槍走火的可能，此處特別要點出的是：中共在目前內外高壓鍋的境況下，勢必落入「熊市心態」–只要能保本，什麼手段都可以。

保本就是兩點：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中共家族的既得利益。在保本心態下中共會不會狗急跳牆–武攻台灣以「救市」？這可能性是存在的，故台灣必須做足內政及國安功課以避開陷阱。但如果成交，這將是川普此生所啟動的最大、最有意義的一筆交易。而習近平呢，如果還是他作主席，將青史留名。

如何破解憲政僵局？台灣何妨先自己「一國兩制」

以上所論的台灣國際出路各種可能性，都可能因為台灣當下的「憲政僵局」而難行。因此，討論一下台灣如何破解「憲政僵局」是必要的。

大家不要再自己騙自己了，台灣的民主和法治若想再繼續深化，遇到的障礙是「體質」的問題，這情況就像醫生對病患說：你的身體毛病百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沒有用的，吃這個藥那個藥也只能治標，小手術沒用，大手術你的身體狀況承受不了，唯一的道路就是你自己先改善體質，然後再談吃什麼藥、動什麼手術。

這個導致台灣長年以來原地打轉、分裂無解的「體質」問題是什麼呢？容我再用烏鴉嘴重複一次：拜託大家不要再自己騙自己了，誠實面對它吧。這個使得台灣永遠處於「原地打轉、分裂無解」的體質問題就是：小小三點六萬平方公里面積、二千三百萬人的島嶼，披著一件原來為一千萬平方公里面積、五億人口設計的憲法及剛性法系的大衣；小身軀拖曳著巨漢的大衣在世界上行走，多年來百孔千瘡，現在已經拖不動了，只好停下來，自己掐自己以防昏死。

剪裁這件大衣，叫做「修憲」。大衣確實已經改過幾次，但都是補破網式的小打小鬧。然後，眾所周知，在老大國民黨和新貴民進黨以及某些特定人士的「陽謀」之下，未來改大衣的可能性被實質凍結。換句話說，那個阻礙台灣往前行的體質問題，被包上了一層水泥「控固力」，把台灣的制度創新、法律進步、行政協作、適才適任的出路，整體堵死。

難道要說第三次？拜託大家不要再自己騙自己。台灣社會不分藍綠統獨，只要是自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這個體質問題的根本性，但是只有極少人敢於面對它，多數人不是在消耗這個體質所餘的殘羹剩飯，就是困於邏輯概念：修憲已經不可能了啊，除非用違憲的手段去修憲，或者革命。

其實，大衣的量身裁剪是有解方的，就看裁縫敢不敢違逆當年

師傅的規訓，開開腦洞，跳出盒子思考。限於文長，只能打一比喻，以期拋磚引玉。

我現在用的是蘋果電腦，它的操作系統是 MacOS。但是，我在MacOS底下安裝了一套微軟的Windows操作系統，兩套操作系統並存，切換著使用，視工作性質而定。使用起來相當的順暢，因為已經有高級的軟體工程師，把兩套原先互不相容的操作系統的底層協議代碼（protocol）給轉換連結了。憲法，或任何下位法，都是建構於最底層的法學概念，只要打通了法學概念，上位／下位是可以互通無礙的，就像人們可以在ios　底下執行Windows的應用，因為有高手把最底層協議代碼打通了。

當然，這兒的MacOS操作系統是「中華民國憲法」的隱喻，而Windows操作系統是「台灣基本法」的隱喻。這裡不敢掠美，有關「台灣基本法」的研究、草擬，早已有法學耆宿、學術界高手進行多年。只是台灣勇敢面對「體質問題」、也就是那件不合台灣身材的大衣問題的人數太少了。

直白講就是：要解決台灣的「體質問題」、「不合身大衣問題」，在修憲已經被實質凍結的狀況下，其實也可以不修憲，另外根據用戶實際需要，設計一套「台灣基本法」就可以了。

2020─2025年是台灣勇敢面對自己的最後一次機會。這道理其實並不難懂，我們會對年輕人說，二十五歲到三十歲是你面對自己的最後機會，過了三十歲，你就會被捲入社會的大染缸，然後你的人生路徑就被環境控制了。同理，在當前世界格局即將產生巨大變動的時刻，台灣若再蹉跎五年，未來就只能隨波逐流，人生定案了。

與其等著讓人強施「一國兩制」，台灣為什麼不先自己一國兩制─一國兩套互通的操作系統？至於老的憲法，還是有巨大品牌價值的，哪天無償贈送給有需求的他人使用，也未可知呢。

第七章

誰做總統才能讓台灣洗心革面？

第七章

誰做總統才能讓台灣洗心革面？

【前言】

本章分為兩段，上段談「台灣大選的前世今生：2014–2020年」，下段談「需要翻轉的政治體制和文化」。這兩段，其實之間的關係是有機的。台灣雖然已經一人一票了二十年，但是事實上還只是一個自由超過民主，民主超過法治的國家。這現象，與新加坡正好倒過來，新加坡是一個法治超過民主，民主超過自由的國家。換句話說，台灣的民主還很脆弱，因為法治還相對落後，而落後的法治又帶來政客們藉著「自由」之名對「民主」的機制上下其手。2019年上半年，台灣政壇出現的各種滑稽詭異現象，正是表徵。

因此，台灣需要進行一場政治體制的大翻轉，以強化法治和民主。政治體制翻轉，說起來很容易，事實上極為困難，因為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什麼樣的人民就出什麼樣的政體。人民的公民意識、公民文化，才是台灣法治、民主、自由進步的最深層障礙。這問題，在本書下半部有更深入、但也可能令讀者不快的討論。

本章最後兩小節，提出兩個概念–「平行政府」和「邦聯議會制」，但筆者認為，只有跳出框框做另類思考，台灣才能有根本性的解套。

一、台灣大選的前世今生（2014–2020年）

2020年選出的總統、立委，必須對台灣的未來三十年負責

美國總統川普從現在到2020年11月，面臨是否能勝利續任的挑戰。由中共一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從現在到

2022年年底，面臨是否能擔任最高領導超過十年任期的挑戰。

這兩個人的時間都不多了，而他們在未來十幾個月的作為，會決定世界格局的根本方向三十年，就像1980年美國雷根當選總統影響了世界格局三十年，1989年中共的鄧小平對「天安門運動」的決策，影響了中國三十年。

1988年，李登輝出任總統這件事，也影響了台灣隨後的三十年。

三十年，看來是一個領導人改變政治格局的基本時間單位，但並不是每次領導人的改變都是大格局改變的起點，多數的領導人只是用來維持現狀。

問一個關鍵問題：2020年台灣的總統大選，是不是一次決定未來三十年的拐點？我想大多數的人會說是，即使那些說不是的人，恐怕頂多也只是把拐點往後拖四年到2024年。台灣之所以沒有時間了，問題並不出在台灣，而出自台灣在美國、中國衝突拐點的夾心餅乾地位。

對這問題，我個人的答案是：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從2014年開始，我就堅定認為，2018–2022年是台灣的「終局」（end-game），但也都了解我所謂的「終局」並不是說台灣就此完了，而是說台灣未來命運的大方向，不論是好是壞，就定案了。會如此堅定的認為，其「達文西密碼」很大一部分在2015年底出版的《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那本書中，還有很大一部分在2015到今天我所寫、但分散在不同媒體的數百篇文章中。

從我2014年說起到今天，五年過去了，而剩下的時間也只有兩年多。過去五年裡，台灣有一半的人認為事態越來越好，另一半的人說事態越來越壞。這種「一半一半」的現象，才最令人擔心。台灣的「二分法」、「兩極化」的文化越來越明顯，糟到了講道理的人越來越少，願意聽道理的人也越來越不耐煩。

然而我是個演化論者，演化論者不會花時間去找罪魁禍首，而會從生態原理去看問題。生態原理說，凡是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

雖然反作用力不一定是從被作用的地方發生，而可能從一個原來認為不相干的地方發生；另外，人世間的規律是物極必反，雖然冒出的人物或事件可能是變異物種。

2014年的「柯文哲現象」是變異物種，2018年的「韓國瑜現象」也是變異物種。誰知道從現在到2020年投票日還有什麼樣的變異物種會生出來。變異物種不一定是新生的，也可能是老物種出現突變。例如：柯文哲是青年世代翻轉下的新生物種，但是韓國瑜卻是老國民黨生態下逼出的變異物種，他們各自吸引當前生態環境中的族群。2019年4月份冒出的郭台銘，則可視為美國政府與中共政權對撞生態，以及台灣政治生態下的新舊混合變異物種。

2014–2019年可說是台灣的生態變異期，2020–2025年可視為變異之後的考卷繳交期。生態考試的結果，台灣是升級是留級還是降級？2020年當選的總統及立委，將負起一半的責任，另一半責任由民間自負。

2020年總統的X個條件

從區域大局、世界大局看，2020–2025年是美中對撞的「終局」（end-game）期；從台灣內部的小局看，也是台灣命運的「拐點」（inflection point）。大局小局，相互糾纏，但塵埃落定時，台灣未來三十年命運的走向就在此一局。

檯面上就這幾個參選人，台灣選民滿意不滿意，都得選一個出來。理想中的投票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投給那個我最滿意的人，另一種是排除那個我最不順眼的人。第二種方法叫做「負數票」，但可惜在台灣還未立法。因此一向以來，當選民看不上任何參選人時，或者不投票，或者投廢票。我要說的是，如果這本書你已經讀到這裡，應該已經了解了2020年不同以往，關係到你的餘生還有後代的生活方式，因此請一定出來投票，並且，不要只憑「感覺」投票，由於感覺是口號創造出來的，因此也不能憑口號投票。

許多人認為「我這一票改變不了大局」，你錯了！投票的道理和買彩券的道理一樣，假設有兩種彩券價格相同、獎額相同，但是一種的中獎率是兩億分之一，另一種是兩千萬分之一，你買哪種？當然是後者，中獎率高的那一種，對不對？在民主投票上，台灣是後者，美國是前者，台灣只有將近兩千萬的選民，而美國有兩億多選民。台灣的一票，比美國的一票，值錢多了，中獎率高多了。同樣的，台灣的一票，比起日本、南韓、英國、法國……都值錢多了。

正因為值錢，你的一票，可以成事，也可以壞事。選口號、選感覺、選人、選政黨，坦白說，都太廉價了，辜負台灣選票的價值了。要選，就選：一、清晰明確的政策。二、落實政策的毅力和能力。三、號召、容納、管理有效執行團隊的能力。

選政策，可粗分為兩方面：對「大局」的應對政策，對「小局」的改革政策；大局操之在他人，只能智慧應對或應變，小局操之在己，需要見識、毅力、執行力。困難的是，大局和小局，需要不同的人格特質，前者需要彈性、柔性，後者需要剛性、執著。我們不能夠期望出現一個超級大總統或皇帝，同時兼具兩種人格特質，因此，團隊建設能力和領導力，乃此次選舉的重中之重。

大局的形勢，迫人而來，幾年內就要見真章，我將其濃縮歸納如下：二十年經驗下，美國兩黨已經達到三個共識：一、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國大到不能倒，但中共並非強到不能被鬆動。二、中國這個國家必須納入現代國際體系，才對美國和世界有利，途徑就是鬆動中共的一黨專政。三、除了從經濟、金融對中共下手，鬆動一黨專政的最強有力的要素之一，就是「使中國人民意識到台灣是個參考座標」。因此，2020年台灣大選中選民必須要做的抉擇是：要做被美國政府保護的小弟，還是做被中共政權綁架的肉票，對自己餘生和後代更讓人安心。

大局牽動台灣的小局，選民此時最應該問的問題是：如果中共

被迫體制改革（一黨專政被美國壓力鬆動），所產生的土石流衝擊台灣，誰最有能力指揮台灣的防災工作？如果中共鐵板一塊毫不鬆動，會不會狗急跳牆拿台灣開刀？屆時，誰最有相應技能和格局保護台灣的國家安全？

如前述，雖然大局操之在人，但台灣內政的小局還是操之在己。這些關乎台灣未來三十年的內政，擇其要者列於下：

一、如何打破纏繞了台灣二十年、使得台灣原地打轉的「左右分歧」（分配先於創富還是創富先於分配），找出一套「創富等於分配」的經濟機制並化為有效政策，讓台灣人（尤其年輕世代）口袋有錢、走路有風？

二、如何打破制度性肉桶（分贓）、剔除藍綠皆有的寄生利益權貴，使得財富能夠普及大眾庶民？

三、如何通過司法改革，保障台灣還脆弱的民主自由，不致沉淪？

四、如何打破「烏籠憲法」，使得台灣能夠在「總統制」、「議會制（俗稱內閣制）」中做出選擇？

以上四點，落實到2020年投票方向上，其實可以歸納成為一個問題：讓既得利益派（建制派）執政，還是讓非既得利益派（非建制派）執政，對自己比較有利？當然，這個問題，在「立委選誰」層面和「總統選誰」一樣重要。

有關「國際大局」的問題，本書前章已做論述。接下來，彙整了一些發表於2015–2019年的文章，深入探討有關「台灣小局」的各個層面。其實，在筆者之前出版的幾本書中，也有許多探討，有興趣的讀者或可回顧。

媽祖告訴我的台灣總統條件

媽祖很好用，誰都可以夢到。我夢到的媽祖，告訴我台灣的總統必須具備以下條件，「如果2020沒有這樣的候選人，那就等2024。」媽祖說。

神明都言簡意賅，媽祖只給了我一副對聯。上聯：和平底線是抗統；下聯：創富高點乃分配。橫批：清洗肉桶。

解籤如下。一個民主投票的國家不管大小，都只有兩件事—內務和外務。內務，就是那些幾乎百分之百自己人民可以用投票決定的事，錯了，只能摸摸鼻子怪自己，不能賴別人，甚至不能賴到你的敵人。外務，就是那些和別人之間的事務，雖然自己難以掌控甚至完全無法掌控，但是可以劃底線。

根據媽祖的指示，在外務上，台灣對世局沒有政治野心，只祈求和平，因此多數時候應該順著水紋航行，但若有大浪襲來，台灣船頭必須面對浪頭，才有可能度過。媽祖諭示，中共現在所談的「統一」，已經不是以前的「統一」，以前是「什麼都可以談」，現在是「只能談中共定義的一國兩制」，台灣已經沒有順著水紋航行的餘地，因此只能抗統，清楚劃出底線。

在內務上，媽祖開釋，台灣若走上「創富先於分配」，貧富差距將加大，社會民粹將加劇；但台灣若走上「分配先於創富」，那台灣就會又老又窮，遲早無餅可分。因此，台灣必須走上一條「創富等於分配」的政策道路。

對於橫批「清洗肉桶」，媽祖賣弄了一下概念，她說：台灣的政治體系、政府行政體系內有許多肉桶，裡面肥肉很多，被許多權貴小圈圈把持著，藍綠都有。媽祖罵我，說你們台灣人天天在鬧什麼年金改革、財政空虛，卻不知只要洗一洗這些肉桶，就能輕易每年洗出幾千億的財源，所有的年金、勞保、健保、長照、營養午餐，一次解決都還花不完。夢中的我不服氣，說有那麼多嗎？媽祖淡淡一笑說，單單你們台北市各單位的「小金庫」裡就不止兩千億了，這是你們的市長托夢給我的，不信你去問他。

媽祖接著問我：台灣有多少國家基金、公家基金、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小金庫，還有成百上千個公私不分的子基金、孫基金、姑嫂基金和名目古怪的協會，裡面肥肉誰在吃？

我問媽祖一個無釐頭問題，升斗小民，如何去清洗那幾百個、幾千個肉桶啊？這不等於要我去清除台灣海岸線堆積多年的垃圾？媽祖也會耍神祕，說：你以為我沒跟上你們凡人的時代啊？我每天看幾百個Line 群組和FB頁面你知道嗎？然後她當頭一棒喝下來：你沒看到嗎？自從2018年選舉以來，台灣的兩個大政黨已經各自分裂，完全沒有中心思想和政策可言，選民已經開始拋棄政黨，改成選人，但政策隨人走，所謂選人的現象其實是選民在選政策，你不會去看看哪個候選人敢把「清洗肉桶」放進政策裡面啊？

我對媽祖說：但候選人都選前一套、選上後一套啊，怎能相信他／她的政策口號？媽祖實在不耐煩了，教訓我說：你是死人啊？你們台灣人不是很會遊行嗎？立法院都敢佔，若當選人不兌現承諾，不會再去佔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和總統府啊？自己被摸頭，然後來拜我，有個×用啊？

我開始懷疑媽祖是不是蘇格拉底的化身，實在辯不過她，只能囁囁嚅嚅地說：好吧，那我開始自己動腦子，如果2020實在沒這個人，就等2024看看。

夢中媽祖轉身離去，竟然袍子背面繡著那幅籤聯：和平底線是抗統；創富高點乃分配。清洗肉桶。（本文寫於2019年6月7日）

2020年台灣大選的詭異在哪裡？

2020年的選情現況，只能用「詭異」兩字形容。每個潛在候選者，作態都好像是在做生命最後一搏。年輕選民或許只覺得熱鬧好玩，但四十歲以上選民卻普遍有「此局將定台灣終生」的焦慮。

這是台灣自有一人一票以來的第七次大選，距離第一次的1996年，中間經歷了二十四年。這第七次，相對於前六次，出現了本質的不同，歸納下來有七項；前六項，我覺得是台灣民主健康化的跡象，代表了過去「誰執政誰通吃」的剛性政黨文化的鬆動，雖然廝殺過程一樣醜陋，但競爭係數無疑在提升。第七項，我認為才是詭異感和焦慮感的源頭。

本質不同的清單是：

一、不再是單純的兩黨捉對廝殺，非政黨人士勝出不無可能，如柯文哲。

二、兩個主要政黨同時出現內部分裂，連政黨主席、現任總統可能脫黨參選的傳言都流出。

三、社會期待多年、但沒人相信可能的「企業大老參選」成真，如郭台銘。

四、傳統的「統獨／藍綠」意識形態對立，可能被「政治立場優先／經濟立場優先」對立所取代。

五、傳統政黨政治操作失效，選民投票傾向從過去的「選黨」向「選人」甚至「選政策」移動。

六、選民的投票認同，從「固態化」轉向「液態化」。

以上，都是對台灣有益的本質轉變，順其自然就可以了。但是，第七項才是對台灣選民的真正考驗，因為它會帶來台灣國運的轉折：

七、2020年的大選其實不是台灣在選總統，而是中南海和白宮在替台灣選總統；這項因素，有可能使得前面六項因素都

> 變成附屬因素，甚至由健康轉為不健康。人們不見得說得出來，但所有的詭異感和焦慮感都源於此「第七因素」。

中共全方位介入台灣2020年大選，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從它的立場看，這是它原本就一定要做的事。美國主動關心台灣大選結果，也是理所當然。但2020年令人豎起寒毛的不是台灣的內部政情，而是恰逢美國對中共的攤牌，以及台灣在攤牌過程中的位置（請參考〈美對中「四爪戰略」下的台灣牌〉）。

不久前被政府驅逐出境的武統論者李毅，於2019年1月份春節前，在北京參加了一場五十餘人的「智庫」閉門會議，會議視頻事後全程上網。會中諸人發言，點評了幾乎所有2020年大選可能參選人的特性以及中共對其運用方式，並掃描了所有的武力脅迫台灣「一國兩制」的方法。此會議視頻分為上中下三集貼於Youtube（搜索「2019年李毅教授暢談兩岸統一模式」），片子雖然長達三小時，但是值得所有台灣選民一個畫面不漏、一句話不漏的耐心看完。仔細看完了，你就會對當下發生在台灣的選情得到一種嶄新的認識，也會對從現在到投票日發生的一切事件，產生更接近真實的評價。

另一方面，4月25日美國　　　　「當下危機委員會：中國」（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在紐約曼哈頓舉辦的閉門座談會，長達兩小時的視頻，也可在Youtube上觀看。該委員會由美國政、經、軍、學界高層人士組成，屬於當危機來臨時隨時召集性質，二戰以來只召集過三屆，上一屆召集時的目標是協助雷根總統的瓦解蘇共計劃。這次是第四屆，目標是瓦解中共，而上次協助雷根政府制定瓦解蘇共策略的人士，也參加了這次第四屆閉門座談會。

要了解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為何會成為美中攤牌的戰場之一，以及其中所隱含的凶機和可能的轉機，可以從以上兩場會議的視頻

中，得到最基本的認識。但是，建議耐心的從頭到尾看完，不要跳著看，網上可能出現片段的傳播，但片段看不到全貌，沒看到全貌就抓不到危機和轉機所在。

美中對衝的大局，將使2020年的大選成為台灣命運的轉折點，而反過來，台灣2020年大選的結果又會影響白宮和中南海對大局的評量。你我的一票，對世界是有影響的。

2020年大選的本質是中美大戰

比起2020年誰做總統，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對台灣的命運更加重要，那就是：2020年投票時，台灣的選民究竟知不知道自己的現實處境？究竟有沒有不自欺的面對這個處境？如果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正的，那麼我覺得無論誰做總統，台灣都能保持自主性。但如果答案都是負的，那麼誰做總統都擋不住區域的大局，只能隨波逐流。什麼樣的選民，就會出現什麼樣的國家。台灣選民如果這次還不能「轉大人」，台灣這個國家怎可能轉大人？

歷來台灣的總統候選人，有不尋求美國或者中國背書的嗎？更準確的講，有不尋求美國執政黨或一黨專政的中共背書的嗎？當他們／她們提起行李，渡過太平洋或台灣海峽時，會有任何台灣選民感到奇怪嗎？然而，當你問台灣人：台灣是不是美國的附庸或中共的囚徒時，大多數的台灣人會拒絕承認，或者發揮語言的藝術和你爭論半小時。

這就是自欺。台灣像夾心餅乾中間的那層奶油，夾在美中霸權之間，而台灣人心理上不願意坦然面對。新加坡人絕對不這樣，從總理到街頭小販，從來都坦然面對自己夾在大國之間，在國家資源只有陽光和植物的現實上，自強發展到今天的地步。菲律賓人也不會這樣，他們承認自己實力不足，必須基於地緣現實才能施展地緣優勢。連金正恩都不會這樣，他大剌剌的、用台灣社會看來是不要臉的行為，把美中霸權玩得團團轉。

台灣可以有自主性，只要台灣人敢於檢討自己的文化，坦然面對地緣的現實，拋掉早已不合身的面子大衣。如果台灣十年或二十年前就進入坦然誠實面對自己的狀態，台灣早就不一樣了。事實上，等到今天來說這番話，已經有點多餘，因為，區域的局勢發展，已經不容台灣再閃避現實。從2020年大選這件事來看，台灣做鴕鳥的日子已經到了盡頭。

對中共的一黨專政攤牌，已經是美國兩黨的共識。我有幾十篇文章分析此事，短文無法贅述。2020年的台灣大選，落在雙邊牌局的正中心，此場選舉成為中美大戰的重要戰役，勢不可免。台灣人對此現實越坦然面對，就越能產生對台灣有利的結果。反過來說，越遮遮掩掩，扭捏自欺，後果就會越糟。坦然面對，拿出態度，台灣才能將損失降到最低，甚至將危機化為轉機。

說不出口的**2020**年通關密碼

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最終誰出線？陸軍雖然還沒有開打，但是空軍已經開始對幹，個人秀也開始登台。基於2016年美國川普當選總統、2019年烏克蘭諧星脫穎而出，世界體會到一個道理：票選國家領導人，靠的不是政策，靠的是人物，而在人物這件事上，靠的是選民的「感覺」。感覺有兩種，一種正面，一種負面。

而台灣2014年、2016年、2018年的三次選舉，好像也符合這種「選民感覺論」。2014年柯文哲的白色旋風，得利於選民對國民黨權貴印象的負面感，以及在反差之下柯的素人形象、人格特質帶來的正面感。2016年小英獲勝，靠的是選民對國民黨的負面憎惡感。2018年波及全台的「韓流」，靠的完全不是選民對國民黨印象的正面翻轉，而是對「最大黨–討厭民進黨」的負面感覺。

截至今天，2020年的前哨空戰，有意參選人和他們／她們的網軍，還在延續著「感覺論」的老路線前進–盡力提升對我方的正面感覺，盡力加重選民對對手的負面感覺。我認為，這是錯的，候選人將為此付出代價；2020年大選將是一場與過去完全不同性質的戰

場，通關密碼不再只是「感覺」。

就像人們對「假新聞」的辨識能力越來越高一樣，選民對自身「感覺」的辨識能力也越來越敏銳。多數人可能還沒法用語言述說出這點，但人們對那種「被空軍牽著鼻子走」的意識，已經浮現了。在「物極必反」的原理下，試圖影響輿論或群眾感覺的動作若做過了頭，效果一定是反的。

台灣已經是一個「過了頭」的社會。酸的人，已經酸過了頭；怨的人，已經怨過了頭；而硬拗的人，也早已硬拗過了頭。酸過頭，怨過頭，拗過頭，總要回頭，回頭的時刻已經到來了，我認為就是2020年。

為什麼？2020年有什麼特殊，能夠讓酸了一輩子的人停止酸、怨了一輩子的人覺得再怨也沒有用，硬拗了一輩子的人不敢再拗？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大局」，第二個是「認清了台灣自己」。

大局，指的是美國已經決心要和中共算總帳，中共試圖再施計拖美國幾年這件事告敗。一個要算帳，一個要賴帳，台灣被迫成為夾在中間的棋子。台灣選民還生活在過去選舉的激情中，以為2020年是一場「網內互打」的遊戲，而不知2020年大選的本質是中美大戰，其結果不但牽動美中對衝格局，然後此格局變化將直接影響到中共的黨內鬥爭態勢，以及美國共和、民主兩黨選戰內的「中共議題」的份量。

換句話說，美國會做出大動作支持其中意的候選方，而中共也會用大動作以暗助它中意的候選方。美中拉鋸下，台灣選民從現在到投票日會逐步意識到，2020年不是「網內互打」的感覺戰，而是一場務實的選擇戰─作美國小弟還是作中共肉票對自己的餘生最有利？面對如此嚴肅的選擇時，我估計過去一切的輕佻、酸語、怨言都會造成社會心理上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會自動收斂，取而代之的是空前的焦慮感。

未來一年，將是台灣人被強迫做遲繳的哲學功課的一年─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在哪裡？我可以往前走的路有哪幾條？選民在

認清了自己之後，投票時其實不是投給誰的問題，而是投給哪個台灣方向的問題。這個被迫自省的壓力，我認為將會使得過去的藍綠、統獨、左右、核能、環境、性別，巴肚還是媽祖等等選票議題，通通靠邊站。

但這並不代表台灣自己的內部議題不會發酵，而是在大生存壓力下形成更有高度的新意識方向。過去所謂的「中間選民」、「經濟選民」這樣的概念，將不足以捕捉住上述的新意識。我認為，在新壓力意識下將出現的是「建制派選民」和「反建制派選民」，用白話說，就是「親既得利益派」和「反既得利益派」的攤牌。而這兩派是跨政黨、跨藍綠、跨年齡、跨性別的。這裡，「利益」的概念包括權力、財富和所謂的「社會地位」，用世界語言來說，就是「anti-Establishment vs. Establishment」。

總結以上，2020年大選的投票方向由兩條主軸決定：一、作美國小弟還是作中共肉票對自己的餘生最有利？二、我是希望由建制派（既得利益派）當政，還是由反建制派（反既得利益派）當政？這是2020年的兩個通關密碼。

2020年台灣人心中必須拿掉的「等式」

要講民意或接地氣，大概沒有比以下更為一致的民意：台灣絕大多數人不希望發生戰爭，但是檯面上所有的總統參選人，不管是熊貓派（親中派）、老鷹派（靠美派），還是台派（自主派），沒有一人敢直接了當的說這句話：我做總統，就可帶領台灣遠離戰爭。也沒有一人敢說：我做總統，若發生戰爭，我會是最後一個離開台灣的人。若有參選人看了以上說法感到不服氣，認為他們／她們有說過類似的話，我的回答是：你說的都是文言文或詩的語言，請說白話。

不敢說白話，有兩種可能：一、自己也懵懵懂懂看不清形勢大局。二、覺得自己已經看清楚了，可是怕說出白話，反而會嚇跑選民。

對於選民，我有兩點建議：一、連自己都還懵懂的參選人，沒資格做你的總統。二、若你怕參選人說白話，那你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台灣已經到了大家必須說白話的關口，若到了這節骨眼，參選人還怕說白話，選民還只願意聽吉利話而心理上抗拒會被觸霉頭的白話，那有一天台灣可能會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針對文首的「民意最大公約數」–不希望發生戰爭，總統參選人有責任表態；如果你相信自己有能力和辦法使台灣不落入戰爭，那請你在投票日前至少三個月，把辦法講出來。如果你還沒想到辦法，但你將來作為三軍統帥時願意死守台灣，也請你講出來。

容我說明做出如此要求的理由。因為，幾次大選以來，台灣選民對現實的認知，都建立在浮沙般的假設性的邏輯上。假設性邏輯的句法是這樣的：「如果發生A，就一定會發生B」。例如：「如果台灣宣布獨立，中共就一定打過來」、「如果台灣不排斥統一，中共就不會對台灣動武」、「如果中共對台動武，美國一定會出兵保護台灣」、「如果……就一定……」等等等。

這種假設性的邏輯，製造出了種種假議題，例如「台灣應該追求獨立還是統一」，再如「某某參選人究竟是藍還是綠」。而假議題會刺激出真情緒，真情緒會帶來真對立。假，就轉成真；虛，就變成實。

假設性邏輯帶來假議題再刺激出真情緒，對於這個惡性循環，最有效的除魔之道，就是脫離抽象情境，回到切身的具體情境；在語言使用上，就是把「如果A……就一定B」的句法，改為「你會不會做A」、「你有什麼辦法使B發生（或不發生）」。

具體轉化，就是選民必須直接問參選人：你會不會進行獨立或統一？你有什麼辦法使美國一定出兵保護台灣？你有什麼辦法使中共不對台動武？而參選人，必須用大白話回答，不能繞彎子或者用詩的語言。

如果以上的論點讓你不舒服，很抱歉，就是要讓你不舒服，因

為我覺得台灣已經沒有時間了；而台灣之所以沒有時間，不是因為台灣自己的問題，而是因為中共沒有時間了。

以下，我列出一些有關台灣命運、你的命運的「不等式」清單，請大家補充：

一、美國兩黨已經一致反共，但這不等於美國會在台灣人自己不願意流血的情況下讓美國大兵先為台灣流血。

二、日本與台灣利害相關，但這不等於日本會在台灣人自己不願意流血的情況下讓日本軍人先為台灣流血。

三、中共還沒有登陸台灣的實力，但這不等於它沒有啟動對台「非登陸戰爭」的誘因。

四、中共即使不對台動武，但不等於它不會進行足以誘發台灣內部暴動的流血事件。

五、中國經濟垮台，不等於台灣經濟好轉。

六、中國經濟好轉，不等於台灣經濟單靠中國。

七、中共垮台，不等於台灣從此可安枕無憂。

八、美國堅決反共，不等於贊成台灣獨立。

九、美國堅決反共，不等於美國樂見中共立刻垮台。

十、公開支持台獨的人，不等於他／她會留在台灣和台灣共生死。

十一、公開支持統一的人，不等於他／她願意移居到中國大陸。

十二、台灣具有一人一票 ，不等於台灣不可能再度威權化。

十三、「××黨倒」，不等於台灣就會好。

十四、「中共」不等於「中國」。

……

2020年，台灣選民必須從心中拿掉這些「等式」，否則你投的一票難以有助於現實。

郭台銘想清楚了嗎？台灣想清楚了嗎？

郭台銘先生高調、高速參選總統，是個審時度勢想清楚後的決定，還是沒想清楚下的生涯第二春衝動？如果是前者，那麼他「想清楚了」的事情包括哪些？如果是後者，他「沒想清楚」的眉角在哪裡？

不論是哪種情況，他的參選對台灣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理由如下：以他打造事業帝國的高度、深度和份量（哪怕在國民黨提名賽中未出線），他所「想清楚了」和「還沒想清楚」的那些元素，只要被抽絲剝繭最終呈現出來，都會令選民更清楚理解到台灣處境的本質，從而對台灣的方向做出更理智的判斷。

多數選民、甚至某些參選人，還未意識到2020年的「一個本質，兩條主軸」。本質是：2020年台灣大選不是藍綠白大戰，而是美中大戰。最終決定投票傾向的兩條主軸是：一、要做被美國政府保護的小弟，還是做被中共政權綁架的肉票，對自己餘生和後代更讓人安心？二、讓既得利益派（建制派）執政，還是讓非既得利益派（非建制派）執政，對自己比較有利？

先談本質。二十年經驗下，美國兩黨已經達到三個共識：一、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國大到不能倒，但中共並非強到不能被鬆動。二、中國這個國家必須納入現代國際體系，才對美國和世界有利，途徑就是鬆動中共的一黨專政。三、除了從經濟、金融對中共下手，鬆動一黨專政最強有力的要素之一，就是「使中國人民意識到台灣是個參考座標」。

談過了「一個本質」，接下來論「兩條主軸」。

美國政府對中共，有兩黨共識；中共政權內對美立場，有三派半鬥爭ー習近平派；江澤民派；李克強、汪洋、胡春華等等出身共青團、立場搖擺但身處壯年的準備接班派；立場尷尬但仍有巨大影響力的王岐山算是半個派。未來兩年內，美國和中共的一切對撞，從經濟到金融到政治到軍事，都不是「國與國」、「政府對政府」的事，而是「A政府對B政權派系」的格局，唯有在此框架下做理解，才能解釋各種貌似詭異的現象。台灣社會，對事態本質的認知，太落後了，在爭辯時，還把「中國」視為一個國家單位，把「中共」視為一個整體政府。

說美國「圍堵中國」，是個錯誤的認知，「圍堵中共」才是美國意圖。無論從戰略地緣還是從政治標竿的角度，台灣都是美國不可放棄之處。基於相反的理由，一黨專政的中共不能放手台灣，得不到也得使台灣變成中共肉票。不止郭台銘，所有其他參選人和選民，越早認識到這個本質越好。因為2020年大選過程中，美國政府和中共政權都會祭出絕大的動作，迫使候選人表態、選民做出抉擇。

而郭台銘可能為台灣從「被迫二選一」的格局中解套嗎？五月赴美二度拜會川普前，他提出了一石三鳥的口號：台灣獲利、美國達標、中國轉型成功。從高度來講，這是所有可能參選人至今所提的政治遠景中高度最高的。但是，在上述的「本質分析」下，當未來落實到政策表態時，就會變成一個「不可能同時存在的三角」。

單提「台灣獲利」，將不可避免的撞上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問題，也就是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中共政權的「一國兩制」方向下的獲利，通不過台灣社會檢驗。雖然由美返台後郭先生公布說：「我指的『中國』依照我國憲法的規定就是中華民國！而台灣當然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從來就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是對中共政權「一國兩制」定義的公然挑戰，程度超越了過去的國民黨，不得不佩服郭先生勇氣可嘉，讓我們等待下一步的考驗。

另外，美國的「達標」是迫使中共政治轉型，而中共的底線是止於經濟轉型（但也是經濟有限轉型，部分放開）。郭先生的方略中，或許想清了經濟轉型的部分，但對中共的政治轉型以及台灣的走鋼索對策，有無足夠的理解深度，又是有待考驗。

有沒有解方，能夠將「不可能的三角」變成「可能的三角」？我認為有。過去半年，我屢次提出「美國向台灣借名片」的 「名片說」，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黑天鵝–「中華民國ROC」的品牌轉移價值〉一文。雖然我不認為現階段，包括郭先生在內的各個參選人能夠體認到這個解方可能是唯一的終極解方，但我想，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已經定調「中共一黨專政是人類文明衝突之源」之下，台灣尷尬處境下的危機，在適當的政治技能下，能夠變成促動世界的轉機。

再論第二條主軸。台灣當下的主流民意，尤其是年輕世代，乃「分配先於創富」，瀰漫的「反商」、「仇富」情緒，都源於此。直白說，這是首富郭台銘先生競選的最大障礙之一。

霸氣富人川普如果在台灣選總統一定選不上，但他在「百分之九十九vs.百分之一」反富運動發源地的美國選上了，為什麼？兩個因素：一方面美國文化下本來就佩服創業起家者，但這還是次要的，主要是川普的霸氣表現在「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氣概上。川普雖富，但他看不起華爾街的純金錢遊戲，他強調底層人民的工作權利，他允諾只要當上總統，對內，他會為人民創造一個「只要你肯幹，你就會不缺錢」的經濟環境。對外，他貫徹「美國優先」的原則。川普的政策主軸，其實可以歸納為十二個字：「就業回美、口袋有錢、走路有風」！這主軸，有機聯繫了「創富」及「分配」，二者不再矛盾。而對手民主黨，走的是福利社會路線，也就是分配先於創富，碰上了川普的「創富等於分配」路線，在開拓文化猶存的美國，自然不敵。

台灣在七、八十年代，也有過「創富等於分配」的日子。隨

後，由於創富不利，分配問題就逐日凸顯出來，在政治力、社會力催化下，一直演變到今日之反商、仇富。

經濟轉型，得靠提升產業、技術、人力的附加價值。二十七年前的1992年，施振榮先生的「微笑曲線」就已闡明道理，然由於長期黨同伐異、既得利益肉桶分贓、人力及人才排外，至今成效不彰。這導致台灣財富結構固化，也就是白話的「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帶來的肯定是民粹，沒什麼好訝異。但我一直認為，台灣最大的天然優勢之一，就是台灣這艘船「不大不小」，沒有大到難以轉向，也沒小到輕易翻覆，重新找到一個「創富等於分配」的方向和機制，比起絕大多數國家要容易得多，但有兩個前提：一、台灣要創富，經濟得轉型。二、需要打破制度肉桶（分贓）、剔除藍綠皆有的寄生利益權貴，如此財富才能普及大眾庶民。前者，郭先生有充分認知，但對於後者，郭先生有此政治魄力嗎？能夠組成一支方向一致的攻堅團隊嗎？

最後一個問題：當台灣的政治生存被逼到牆角時，郭先生會傾向於美國，還是中共？鴻海集團的百分之七十五資產在中國，台灣只僱用數千人。中共會放過他嗎？美國會放心他嗎？沒有了霸氣強人之後的鴻海，擁有百分之九十股票的其他股東還能信任鴻海的價值嗎？

只要想清楚了，有決心，這些質疑都可解決。解決方案是四個字：靈肉分家。百分之七十五在中國的資產，絕大部分屬於勞力密集產業，也就是「肉」的部分，而屬「靈」的部分如AI、雲端、生技，並不在中國，甚至不在鴻海名下。「肉」的處理，非常簡單：當前國際上PE（Private Equity）界充斥著一兆至兩兆美元的游資，找不到標的出路，把「肉」打包，出讓給PE集團就可以。隨著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的疲弱，鴻海本來就要轉型；「靈」的布局早就進行十年了，而轉型的臨門一腳，沒有比當前更好的時機。恰逢美國對中國「經濟行為規範戰」的高潮，北京被迫再度以優惠條件開放外資，「靈肉分家」的政治阻力大為下降，可說是千載難逢。

以上以郭台銘先生為焦點所論的2020年「一個本質，兩條主軸」，其實也是所有參選人必須面對的。

2014年「世代翻轉」是**2020**年的前世

上述的第二個通關密碼–我是希望由建制派（既得利益派）當政，還是由反建制派（反既得利益派）當政–其實從2014年就開始成型，2016年、2018年兩次選舉，不過是2014年的延伸和演變，只是政客、媒體都不察。2014年發生了什麼？那就是以「太陽花運動」為代表的「世代翻轉」。筆者在2014年底出版的《與中國無關第二季：三十年後的三種台灣》一書中，詳細解析了太陽花學運底層的世代翻轉因素。五年過去了，當時太陽花世代的學生都已進入社會，他們當時的意識翻轉，對2016年、2018年、2020年帶來了什麼影響？接下來，我再用幾個小節，切片式的予以描述。

一、「第三勢力」是錯誤的過時觀念

台灣的各式民調，除了那些明顯政黨屬性的，都一致指向一半或過半的選民對國民黨、民進黨失望，而期待「第三勢力」的出現。很自然的，目前聲勢如虹的柯文哲陣營，被影射為「第三勢力」，也有人期待年輕的時代力量黨或社民黨甚至綠黨。

本文認為，把「過半選民對兩大黨失望」和「出現第三勢力」這兩個命題合在一起談，甚至建立因果關係，乃是一種慣性的邏輯謬誤，反映的是一種長期控制台灣社會的落後思維模式。

先談個人觀察的幾個結論：一、在一個兩極分化的社會生態中（如台灣），即使過半選民對兩極都失望，也沒有產生所謂「第三勢力」的可能。道理在於，一個社會會分化為兩極，一定是民眾的思維模式就是兩極式的，這種慣性思維模式就會將任何「第三勢力」謀殺於嬰兒階段。二、「第一勢力、第二勢力、第三勢力」的

思維模式，還是「老百姓等著被明主拯救」、「一人一票選包公、媽祖、濟公」的中國式慣性價值；換句話說，在台灣期待第三勢力，反映出台灣選民還未由「百姓」進化到「公民」。三、「第一、第二、第三……」是線型思考，而人的意識、人的行為、社會變遷屬於非線性（non-linear）範疇；打個比喻說，「第三勢力」的觀念就像是牛頓物理學範疇中的物體概念，而事實上，「勢力變化」比較屬於非牛頓的流體力學或量子力學的思維範疇。

在十年前的社會生活型態下，採用「第三勢力」這觀念來分析台灣的未來展望，還比較有意義，因為那時的台灣政治，不論是掌權的國民黨還是爭權的民進黨，還是依賴嚴密的組織性在運作。然而今天，在去中心化的數位生活下，民眾的意識和行動力，已經不能依賴嚴密的組織來控制影響了；國民黨因沒看到這點而失敗，現在看來民進黨也將因為對此盲目而失敗。當然，任何其他方，若腦子裡還在想著通過組派系、組剛性政黨來成事，也必將鎩羽而歸。

政治，就是權力及利益的分布秩序。在今天及未來，任何企圖用「權力、利益中心化」方式來從政的人或團體，必然會因為落後於時代潮流而消失。「第一、第二、第三」都是中心化的思維，被困在這種思維下的人和社會，是無法跳出盒子思考而掙脫困境的。

那麼，什麼才是合乎現實、合乎潮流的觀念和思維模式呢？「生態」（Ecology） 和「演化」（Evolution）和「自組織催化器」（Self-Organized Agent）應該是三個不錯的觀念。

在「過半選民對兩大黨不滿」的事實下，許多人因為「看不到夠格的第三勢力」而擔憂、焦慮。其實不必，因為「第三勢力」只是個過時的觀念，用來分析今天台灣、展望未來台灣是用錯藥了。在過半選民對兩大黨不抱希望的背後，顯示了過半選民還有追求，還有生命力。在生態演進的觀念下，凡是生命必然會自我找到出路，解決方案往往是不依賴帶有高度目的性的組織，而往往是自生聚集的。

台灣應該停止寄望於出現一位包公、媽祖或濟公帶領什麼「第

三勢力」，而應該寄望於在當前社會生態環境中，因為大量人民的不滿意、不服氣、不服輸而產生出的生命力量，自我催化而成國家公民意識。新生的台灣，不應該是「百姓」與第幾勢力之間的關係，而是「公民」與政府體制之間的關係：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制衡，利益與風險之間的對等。

讓我們用「生態力」、「演化力」、「自生力」來分析台灣的未來，不要再期待「第三勢力」了！（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9月）

二、台灣選民已由「固態」轉為「液態」

2008年選舉，由於陳水扁總統案件墊底，國民黨大勝，當時的社會氣氛是「民進黨至少趴下二十年」。2016年，由於馬英九總統因素加上中共迫台壓力加劇，民進黨及白色力量大勝，當時的社會氣氛是「終於推翻國民黨了，它再也無法翻身了」。2018年期中地方選舉，由於蔡英文總統領導力不足加上政策步驟失調，再加上民進黨總體給人「吃相難看」的印象，國民黨反敗為勝。台灣選民的「翻臉如翻書」特性表露無遺，而且速度越來越快。

2016年的柯文哲「白色力量」現象，不但嚇壞了國民黨，也嚇壞了民進黨，藍綠通嚇。而2018年的韓國瑜「韓流現象」，不但嚇壞了民進黨，也嚇壞了國民黨自己，綠藍通嚇。

藍綠內部相信都有明眼人，但是作為政黨，兩次被「通嚇」，只能說是集體的失盲，也就是每個個人的IQ都120，但集體的IQ剩下80。否則，他們早就該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中體會到未來十年台灣變化的主軸。我認為，民進黨和國民黨這兩個政黨反覆表現出來的集體IQ剩80之現象，主因是這兩黨的本質都是列寧式的剛性政黨，他們都視選戰為攻打碉堡，視自身為山頭。中國國民黨的前身本來就是共產國際的培植對象，師弟就是中國共產黨，師兄弟共聚一堂於共產國際（蘇共）出資的黃埔軍校。而民進黨的前世在思想淵源上，本來就有共產國際扶植的台共文化因子，黨組織破殼而出

呱呱落地時，能夠學習的對象只有國民黨，前世加上今生，就變成了今天的民進黨，其組織剛性甚至已經勝出日益鬆散的國民黨。

這樣兩個剛性政黨，當然看不見、不願看見台灣社會及選民的彈性流體化傾向。而始自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具象體現於2016年的白色力量、爆發於2018年的韓流現象的社會力道，正是台灣選民已經由「石器時代」進入「洪水時代」，或說由「固體狀態」進入「液體狀態」的證據。民進黨和國民黨都沒有得到陰陽辯證法的真傳，因此與時俱進的能力低落。反而是精研陰陽辯證法的中共，抓到了台灣選民的「水性」，正在加以布局利用，以引導2020年選情。在與時俱進這件事上，不只國民黨，連民進黨都已經恐龍化。這是我對台灣的最大擔憂。

好在台灣選民的「翻臉如翻書」，主導力已經不在老頭老太，而在五十歲尤其是四十歲以下的人群。很多人會不同意，但我把這股力量歸納為兩個字：「真」、「實」。也就是說，新世代選民，將把票投給那個「看起來比較真」、「看起來比較實在」的人。至於他們有無能力區分真的真和裝的真，真的實和假的實，就是另外一個範疇的議題了。（本文原發表於**2019**年**3**月）



以下幾小節，就是一組我對這「彈性（水性）」力道的觀察和分析。有些寫於2018年投票前（已注明），並未因為此書出版於2019年而改寫，以證明其中的論點並非選舉結果出來後的馬後砲。並且，我相信，這裡所指出的大趨勢—選民開始求「真」求「實」，將於2020年大選中再度凸顯。

A．從慶富案看台灣的「實世代」

慶富案已經發生了很久，但至今無真相。政客們都想「抹掉」這個案子，但這更加證明了此案若透明化，對台灣政壇肉桶結構的衝擊力道。

經過三次政黨輪替，以及歷經「疑世代」、「仇世代」、「逆世代」三個階段，我感覺台灣正要進入一個新的世代─「實世代」。這是一個經過大量親近、觀察二十歲至四十五歲人群之後所下的結論，而且筆者相信，執政的民進黨、大敗後還在尋找轉型路徑的國民黨，以及對岸虎視眈眈的共產黨，如果還沒意識到台灣「實世代」即將崛起的現實，他們各自將付出慘痛的學費。

最近狂燒的國艦國造「慶富案」，貌似過去的「又一件弊案」，其結果也可能就像過去的弊案，找幾隻代罪羔羊，然後就不了了之。然而，其所帶來的社會關注度，事實上已經起了微妙的本質變化─公眾尤其是年輕人，已經逐步體認到，台灣的萬惡之源、人民所遭受到的一切痛苦、懷疑、無力感，都來自一個人民自己過去沒看到或不願面對的事實：現存政府體制內的肉桶分贓化、政客幫派化、文官虛偽化、武將推責化。簡單言之，就是威脅台灣生存、台灣安全的最大病症是一種跨政黨、跨意識形態，已經存續了幾十年的政府文化。此政府文化若不消除或至少減緩，台灣誰來當政，都避免不了整個國家的氣氛向投降主義、失敗主義邁進。

肉桶分贓、幫派、虛偽、推責環環相扣，國民黨、民進黨都曾經承諾予以手術式的切除，但台灣新世代已經看穿這種「由上而下」的政治承諾不值半毛錢，因為「政府」 現有體制太肥，任何掉入肥肉桶的人要他不吃肥肉或制止周邊人吃肥肉，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正在發生的事是：年輕世代已經不耐煩花時間去了解政客之間的辯論和解說，什麼正當程序啦、法律證據啦、行政道德標準啦。年輕世代的憤怒，將集中在一點爆發─少跟我來那一套，你實話實說就好，沒有實話實說的人，管你什麼職位、什麼程序、什麼誠懇面貌，你就是政棍。

「實」這個字，將成為2018年的關鍵字。要求實話實說的人是天真的，甚至會帶來災難。但是，年輕世代的積憤已經達到一個臨界點的結論：非天真不能救台灣。政府、政客、政黨若實話實說，這個國家可能會瞬間脫序、社會可能動亂，這些都可能發生，而這些也正是政府、政客、政黨用來愚民的最有力說詞。

但是我本人相信，而且我也相信大部分年輕世代相信，台灣在難以抗拒的外患以及沉痾日久的內憂雙重夾擊之下，只有天真的實話實說才能救台灣。再不天真的實話實說，台灣會被政府、政客和政黨拖死。

慶富案，只是當前的一個案例，但若靜心體會2014年到現在發生的每一個弊案，當可悟出每一件事的前因及後果，都是政府、政客、政黨拒絕實話實說的現象。

慶富案，擺明了就是一件肉桶分贓化、政客幫派化、文官虛偽化、武將推責化的循環效應案件。涉案的前後政府、跨黨政客，沒人在實話實說，他們都不天真，而民眾還在等待天真的人。

2018年、2020年的選舉花朵將落誰家？我的觀察是，民進黨、國民黨、第三勢力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線：誰先願意在各種內憂外患議題上實話實說，誰就會勝出。（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11月）

B．「韓流現象」與國民黨無關

台灣的公民，證明了他們不只喜歡為了美食而排隊兩小時，不只為了蠅頭小利而排隊，也願意為了投下自己的一票而排隊兩小時，即使坐著輪椅。

主導這次選舉的是所謂的「國民黨的成功，甚至不是韓國瑜本人的勝利，而反映的是以下的幾點：

一、台灣的民主向前跨了一步，內生的主體意識更加堅實；這表現在統獨藍綠二分法的失效、統獨基本教義的弱化、選政策不選人、選人不選黨的趨勢明顯。

二、世代意識以及世代利益的翻轉；這要素始於2013年的太陽花運動，當年國民黨因為看不清什麼叫世代翻轉而失敗，

此次當年街頭出身的民進黨竟然也看不清這點。

三、政黨「死不認錯」的時代過去了，任何死不認錯的政黨，不管是哪個大小政黨，如果不學習即時認錯、果斷糾錯的能力，將來在台灣都沒有立足之地。

四、儘管此次的勝選者還需要接受未來的行為考驗，但是選民已經清楚表明，他們需要「真人說真話、實人做實事、不貪汙、不勾結」的政治人物；因此，此次勝選者要小心了，若不依此行為準則，下次被淘汰的就是你。

還有一個現象是值得指出的，固然此次選舉還存在許許多多的負面選舉元素，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抹黑、造假、人身攻擊，但是客觀講，已經比過去的選舉輕微了許多。更重要的，此次選舉中的「幽默」元素，也比過去增加了許多。這些幽默，有些高級，有些低級，但畢竟反映出了人們尤其是年輕世代，擺脫悲情、自我療癒的能力提升了。

以上是對這次選舉的側面觀察。最後，還是想說幾句天真的話，因為，在一個背著幾十年老舊包袱、幾百年老舊文化的國家，也有可能只有天真的辦法才能挽救它。這段天真的話，原先寫於11月24日投票日的三周前，現在投票已過，在某些候選人的動作中也看到了一絲影子，然而我想這段話同樣適用於2020年大選，因此再提一次。如下：

2018年選舉的選民心態主軸，已經非常明顯，即使只剩下不到一個月時間，任何候選人只要花一分鐘，就此主軸對選民做出不可逆轉的表態，就能保證當選。

選民心態主軸是：

一、對於意識形態（或基本教義）已經厭惡，誰能夠擺脫意識形態，就自己選區的事務說實話、幹實事、不貪汙、不勾

結，我就選誰。

二、選民要求候選人所屬政黨自我反省、自我動手術，若自己不反省不動手術，選民就會幫你動手術。

此處代擬二百字的一分鐘表態文供各候選人參考，只要先於對手，在造勢場合念出這段文字，就能保證當選。如下：

「本人×××，雖然是××黨推舉的候選人，但本人公開保證，本人不受任何意識形態（基本教義）牽絆，對人民說實話、幹實事，整治貪汙和杜絕勾結沒有上限、沒有人情。並且，本人在所屬的××黨內，將用以上原則以最大力度影響黨內價值，促成黨內自我反省，對本黨過去所犯過的一切錯誤動手術，身家性命在所不惜」。

對於無黨籍候選人，只要依照承諾內容，改為無黨籍口氣即可。記住：誰先做此一分鐘表態動作誰贏。

台灣陷入統獨藍綠意識形態、基本教義久矣，多少惡行、私權私利，假借方方面面的意識形態和基本教義橫行，導致政務空轉、經濟落後。所謂民怨，根本在此。選民已經覺醒，而各黨候選人還未覺醒。

這段話的確有點天真，但是台灣已經到了「To Be or Not To Be，做自己還是不做自己」的天真關口。（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10月，投票前一個月）

C．選舉激情過後，想想宏觀現實

有關2018選舉的微觀討論和分析，已經充斥媒體，因此此文聚焦於選後的台灣宏觀大處境。首先，略帶傷感的說：此次選舉的勝負結果，恐怕對台灣當下的區域處境無關宏旨，並沒有使得台灣更

安全或更不安全。

但是，若把時間拉長兩年至2020年，宏觀之下就有討論的意義。這是因為，2020年大約就是美中爭霸戰的終局，而美中之間的終局，也就是台灣的終局。請不要誤會了，這兒的「終局」一詞，並不是指從此誰就完蛋的意思，而是路線鬥爭的結束點，從此路線和命運，不管是好是壞，就幾十年固定下來了。

中共的狀態和動向，對台灣社會人心的影響不但人盡皆知，並且公開討論頻繁。然而美國的狀態和動向，台灣人雖心知肚明但卻不太討論。為什麼有這差距？因為一方面台灣人比較信任美國，另方面知道台灣的命運其實靠美國保護，因此華盛頓比北京更得罪不起。話雖如此，台灣整體對美國其實並沒有一致的戰略思維；民進黨執政兩年以來，雖然對華盛頓所主動的事務採取「不脫隊」原則，從來不說NO，但是也保守謹慎的不採取任何主動，這大概是吸取了以前陳水扁被美國歸類於「麻煩製造者」的關係吧。

2018年是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轉折年份。經過了三十年的交往和世局的變化，美國兩黨達到共識，已將中共視為核心戰略對手。在川普總統赤裸裸大剌剌的性格推動下，以及彭斯副總統的細膩下，形成了一條戰略主軸─區隔中共和中國、反共不反中、反共產體制不反中國人民。

台灣政府及台灣社會在這件事上的反應相當遲緩，從2018年的選舉過程來看，台灣還是陷在「中共就是中國、中國就是中共」的情緒混淆狀態下。這對華盛頓來講，就是台灣已經從美國的最新定位「脫隊」了。

2018年選舉已經結束，其結果必然會使得民進黨和國民黨各自內部派系重組，料想兩黨的脫黨人物都會有所增加，加上世代翻轉因素，未來兩年台灣的政治生態令人難料。在這樣多變的政治生態下，最令人擔心的是台灣能否跟得上美國的腳步，還有因此而生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

有些人會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但我認為，在美國的新戰略下，

固然美國自己也會受傷，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體制，不死也得去掉半條命，在這境況下，中共實質上以武力對付台灣的條件並不存在，雖然恫嚇動作會不斷。以川普的性格和手法，一定會善用中共的弱勢，忽冷忽熱、忽前忽後的對中南海投出變化球。問題是：台灣看得懂川普的變化球嗎？台灣知道何時該被動、何時該主動嗎？

舉個剛剛發生的例子。美國本來並未明顯介入台灣的2018年選舉，但為何在最後幾周出動AIT的兩位前後任官員，對整體選情、尤其是高雄選情發表意見？執政黨和在野黨及台灣社會，究竟看懂了沒有？

試想，倘若美國與中共在南海發生中級以上的軍事衝突，在菲律賓已經明白投共的現實下，最適合美軍船艦和軍機補給的地點在哪？在美國有需要的時候，執政黨和高雄港會不會對美國有「配合不力」的狀態？倘若台灣令美國有如許擔心，白宮會對台灣做出怎樣的動作？

再如，倘若美國在和中共衝突之後，需要台灣對中國人民表達最大善意，台灣做得到嗎？

因此，當2018年的選舉激情過後，台灣應該冷靜下來，各政黨和社會，想想未來兩年對美國政策的最大公約數何在，對中國及其人民的態度上最大公約數何在，這才是要務。（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11月）

D．做自己，還是聽政黨的？台灣選民要求真人政治

2014年的地方選舉是台灣政治某種轉折的開始，雖有衝擊但還沒那麼明顯。該種轉折，在2016年的中央選舉中凸顯。現在到了2018年再次地方選舉，這個轉折的力道就再明顯不過了。

這個轉折，可以這樣形容：選民要求政黨自我反省、對自我犯下的錯誤動手術，哪個政黨拒絕反省、拒絕自我動手術，選民就會

替它反省、替它動手術。

2014年及2016年，民進黨打動選民的理由其實很簡單，其本質只是一句話：國民黨是個不知反省、不動手術的政黨，換我來做給你看。那些意識形態的話語和對國民黨執政的激烈批評，起到的作用不過是對本質問題的推波助瀾。

2014年柯文哲現象的崛起，可以解釋為：民進黨知道在台北市，單以意識形態話語和對國民黨的批評，還是打不贏國民黨。因此「禮讓」柯文哲，讓沒有任何政黨包袱的柯文哲去凸顯國民黨的不知反省、死不認錯。柯文哲沒有讓民進黨失望，他的外科醫生形象，和亞斯伯格型人格下的真人真語形象，徹徹底底的凸顯了國民黨的迴避問題、不知反省、不可能對錯誤自我動手術的黨性。

時間來到2018年，此時民進黨已經全面執政兩年，總統府、行政內閣、立法院都在民進黨的麾下。選戰由年初就開始打，當時選民對民進黨的期待其實很單純：黨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拜託表現出民進黨是個懂得、願意自我反省的政黨，對自己犯下的錯誤決策和不合時宜的動作，至少表現一些自我檢討的態度。人民其實非常期待民進黨是一個自我糾錯、不落入國民黨死不認錯老套路的政黨。

但如此簡單的期待，得到的回應卻是和期待相反。我認為，大多數人都覺得民進黨所犯的錯，很多只是步驟的錯誤而不是目標方向的錯誤，就如任何人際關係，只要表個態，然後自我糾正就可以過關。然而，民進黨內派系太多，真人太少，派系之間的相互牽制，使得少數的真人接連被排斥至體制外。

在此脈絡下，才能解釋何以在台北選區柯文哲現象得以持續，而且還進一步在高雄冒出韓國瑜現象，以致效果外溢至其他縣市。感受到威脅的民進黨，竟然還一個真人不出現、一句真話不脫口，繼續以老套路，把地方選戰當中央選戰來打，一步一步上綱到意識形態甚至基本教義的高度。

韓國瑜現象，並不是國民黨的成功。事實上，在還不到二十天

的投票日前，如果韓國瑜現象受到挫折，原因絕不會是來自民進黨的攻勢，而只會來自國民黨的過分消費韓國瑜現象。

韓國瑜現象，也不是韓國瑜政見的成功。他沒什麼政見，他只有一種態度：我是一個真人，說的是真心話。他說出口的話是否真的是真心話，他有沒有能力將飄在空中的話語落實為政見、政策，還是一個未知數。同樣的，已經執政台北市近四年的柯文哲，有沒有足夠的政績也是可以辯論的，但是他表現出一種「真人說真話」的態度。民進黨痛批柯文哲是「假人說假話」，這在事實的層面可以辯論，但是民進黨一路把真假的定位拉高到總統的級別、意識形態的層次，急速的拓寬了柯文哲對於「市政政績」的閃躲空間。

回到2014–2018年台灣政治轉折點這焦點。這轉折若不談清楚，到了2020年中央選舉時，民進黨、國民黨及其他政黨，還是會犯下同樣誤判。多數選民已經形成了一種概念，雖然他們嘴巴未必能現在講清楚，那就是：一、地方的事歸地方，中央的事歸中央。二、意識形態的事歸政治，生活的事歸經濟。三、任何沒有自省能力、糾錯能力的政黨都不可信。四、台灣最急需的是真人說真話、實人做實事。

對當下台灣的選情，民進黨的氣急、國民黨的興奮、中共滲台部門的得意，都是基於一種幻覺，以為選情反映的是民意對政黨的向背。事實上，台灣的選情越來越與政黨無關。台灣的民主在成熟中，2018年的地方選舉，已經從過去的「選黨不選人」進步到了「選人不選黨」，如果上天垂幸台灣，2020年和2022年的兩場選舉能夠再演進到「選政策、不選黨、不選人」，台灣的世界地位將煥然一新。

另方面，無黨無派的獨立參選人應該感到鼓舞，只要你是真正的真人，提出的是真實可行的政見，台灣的歷史不會讓你缺席。

（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11月）

三、沒有政黨認同，才能愛台灣

無私，才能叫愛。出於私心私利，可以叫做關心，叫做喜歡，但是不能叫做愛。

如果同意這個對「愛」的定義，那麼，在今天台灣政黨的格調之下，只要你認同一個政黨，你就離開了「愛台灣」這個境界。當然，人也可以在語言上死纏爛打，無限擴大對「愛」的定義，把所有的私心私利行為都包含在「愛」之內，但那恰恰顯示了人的格調。

公平地說，無私的愛，並不一定是公民社會的基礎。西方政治思想的要角，諸如盧梭、洛克、米勒、亞當．斯密，都沒敢把「無私」作為社會公義（Justice）的基礎，反而是把人人自私自利作為起點，而後研究如何在眾人之間建立妥協、制衡的機制。

欺騙、說謊、假公濟私等行為，之所以是惡行，乃是因為它抄小道破壞了公民社會賴以生存的制衡機制。當一個團體的文化主流就是這些惡行之時，這個團體就是公民社會的敵人。從這標準來看，台灣主流政黨的主流文化，就是台灣尚待完成公民社會的敵人。

更過分的是，主流政黨那種「隨時隨地、張口就來」的「愛台灣」語言。這種語言是一種幻術，它掩蓋了自私自利的那一面，把惡行合理化。它實際產生的作用，就是徹底破壞了一個公民社會需要的妥協、制衡機制。

台灣社會中，有許多愛台灣的人。他們在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對個人生活際遇，他們也都有抱怨甚至憎惡的對象。但對台灣，他們是無私的，搞不好他們連「愛台灣」這三個字都沒說出口過。

作為比較，我們可以取出一張白紙一枝筆，把主流政黨中對台灣這塊土地及資源無私心的人物，一個一個寫在紙上，看看你能寫下幾個，他們是誰？

盯著紙上的結果，你可能會一驚，原來愛台灣這麼難。

假設，你在這張紙上寫不出幾個人，那麼只有兩個結論：第一，「愛台灣」不能作為挑選政黨的指標。第二，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一個真心愛台灣的人，你就應該拒絕政黨認同這件事。

不認同「政黨」沒關係，你並不會失去你的政治權力，因為你可以認同「政策」。如前所述，即使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人，也可以在妥協和制衡的機制下，做出對台灣好的政策。我們要制止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人在「愛」的大旗下，規避妥協和制衡，做出只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政策。

什麼是「政黨」？除卻了政策，還有政黨嗎？在公民國家的標準下，一個靠口號充當政策先贏得選舉，勝選後再食言的團體，只能稱為「幫派」，而不能稱為「政黨」。

作為台灣選民，我們應該丟開政黨認同，進入政策認同的境界。把「愛台灣」留給自己吧，愛是很私人的事，別玷汙了它。

四、2020面對自己，十字路口在前面等著你

2019是台灣人無法再迴避面對自己的年份。誠實「面對自己」，這好像是在講什麼「心靈雞湯」的大道理，其實不是。在承平時代，或在一個大到足以慢慢改進的大國如美國、日本或印度，人們可以發明很多心靈雞湯來暫時迴避人生或國家的根本問題，但是在台灣這樣一個二千三百萬人擠在三點六萬平方公里（可用面積僅三分之一，一點二萬平方公里）的國家，當國家面臨十字路口大抉擇之時，沒有心靈雞湯這選項。

誠實「面對自己」是小國生存的必要條件，以色列、新加坡、瑞士、荷比盧三小國、波羅的海三小國皆然。但是，和這些其他小國比較起來，台灣顯然在逃避問題。台灣人抱怨國家很亂、經濟很亂、教育很亂、國防很亂、政治更是一塌糊塗的亂，但這些都只是

病症，而不是病源。要講亂，全世界公認的民主先進國家都很亂，美國、英國、歐洲也很亂，差別在於，以二、三十年的跨度來看，別人都能在亂中演進，而台灣卻在亂中原地打轉、停滯，甚至退步。病源就在於，台灣人在「面對自己」這件事上是懦夫，因此隨波逐流，世界經濟環境好的時候台灣就搭便車成長，環境不好的時候就「靠北靠姆」；國際政治環境有利的時候就小確幸，不利的時候就各取各種高尚的口號自相殘殺。

缺乏面對自己的習慣和技能，主要是一個深層次的心理問題，在社會層次就是文化問題。當然，這裡面有歷史因素，但若要一切怪歷史，我想很多人比我更在行，因此此處就不班門弄斧了。這裡只想說，一個人十八歲以前的命運可以怪過去，但十八歲以後就必須開始從自己身上找問題根源，也就是開始面對自己。三十歲以後，還在怪歷史、怪過去，就表示你的身分證、駕照、投票權，都只是廢物，甚至是拖累社會的工具。

面對自己，從最讓人難堪的地方開始。對此病的療法，手術式的最痛苦但最有效，心靈雞湯反而是毒藥。一位臉友日前貼出的感慨，可能可作為起點，他說：（台灣一切問題的根源就是）台灣人，好騙、難教、怕死、愛錢、愛面子、愛當官。笑人貧，怨人富！

很痛，但我們必須勇敢誠實面對。有沒有這些毛病，自己問自己；改不改，自己做決定。反正，別再怨天尤人了。十字路口在前面等著你。（本文原發表於2019年3月）

2020年的黨、人、政策

即將到來的一年，台灣存在一次扭轉未來的絕大機會，但這個絕大機會的銅板另一面，也是一個絕大的風險。在這僅僅只有短短的十二個月中，究竟是機會勝出，還是機會被風險扳倒，決定者是台灣選民。

絕大的機會是，趁著2018年的「選人不選黨」勢頭，選民在2020年大選時再進步到「選政策不選人」。若能進化到這一步，台灣安矣。

銅板另一面的絕大風險是：倘若2020年大選台灣陷入政黨的操作手法，退化回到「選黨不選人、不選政策」的愚昧時代，則台灣危矣。

2018選後這一個月中，大眾媒體及社交媒體中的熱烈討論，基本上可以分為三類：一、以「黨」為分析對象，民進黨如何如何慘敗，國民黨如何如何勝出等等。二、以「人」為分析對象，如蔡英文總統、賴清德院長、陳菊應負起什麼責任，韓國瑜如何風生水起，柯文哲為何險勝等等。三、以「政策」為分析軸線，例如一例一休、年金改革、能源政策如何導致勝敗等等。

這種「黨」、「人」、「政策」三個維度並列的討論，不管論證水平的高低，哪怕其中某些基調是譏諷嘲弄甚至惡意性質的，現象本身都是健康可喜的。因為只要能夠從多元維度探討事件，就已經代表了台灣的民主在深化中。

但是不能高興得太早，台灣的選民究竟能不能進一步的公民化，真正的挑戰還在2020年的總統、立委大選。如果在接下來的十二個月當中，大眾媒體及社交媒體中的爭辯重點呈現「政策—人—黨」的比重順序，則大喜。若爭辯順序是「人—黨—政策」，則台灣的民主素質不退不進。但是，如順序又回到「黨—人—政策」，台灣就有大憂了。

2018年選後才不過一個月，苗頭就有點不妙。大眾媒體及社交媒體中，重頭戲開始往2020年究竟是民進黨會輸還是國民黨會輸，究竟是姓蔡的還是姓賴的還是姓柯的還是姓朱的會贏？

看到問題了嗎？媒體討論及私人爭辯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人們在談「2020年哪幾項政策會決定台灣輸贏」這個真正關乎台灣興敗

生死的議題。

打個令人不快的比方，這就好像面對一個還在病中的病人，一群人對病情指指點點，但卻沒有人關心治療方案。

儘管2018年選舉中透露出一些「選人不選黨」的公民進步跡象，但想來很少人會反對以下觀察：包括2018年在內，台灣選民從來沒有以「政策」為主軸投票，而候選人也一貫的只以「口號政見」分勝負，迴避具體的政策。然後，勝選後一貫的政策胡亂，留下一大堆「爛尾政策」給繼任者。實情是不是這樣呢？這樣的台灣有望嗎？

在當前的區域局勢以及世界大勢迫人下，2020年可能是台灣在民主深化道路上的最後一次自我救贖的機會。台灣的各界及各人，如果從明天起不開始追問自己：2020年台灣需要一位持有什麼樣具體政策清單的總統、台灣需要持有什麼樣具體政策清單的立委，那麼台灣只能繼續做一艘失去羅盤及動力的船，隨波逐流罷了。而在2020–2022年一定來臨的驚濤駭浪之下，台灣恐怕只能落入「十分靠注定，零分靠打拼」的境況。

媒體們、教授們、企業家們、臉友們、Line 友們，讓我們來開始爭辯2020年的具體政策吧！哪些具體政策會讓台灣的贏面更大？哪些具體政策會讓台灣的輸面更大？台灣沒有再迴避的空間了。

2018年、2020年的
「國民黨紅利」和「中國因素」

2016年的大選，支撐民進黨空前大勝的樑柱，並不是那些空洞的治國大綱，其實靠的是「國民黨紅利」，也就是累積了多年的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雖然在策略上，民進黨把「國民黨」和「中國」劃上等號，但是如果民進黨人相信選民對中國的情緒也是2016年大勝的主要因素之一，那恐怕是一個天大的誤會，而這誤會將在接下來的兩場選舉，2018年及2020年，讓民進黨付出代價。

民進黨必須意識到，「國民黨紅利」已經快要被用盡，等到公教年金改革完成、國民黨非法黨產追溯行動碰觸到情理法的極限的時候，還想靠「國民黨紅利」競選的人，恐怕會被譏為「以鞭屍換選票」的無效動作。到時，所有的參選人，不論黨派，都得將真材實料放在陽光下供選民檢驗。

其實，以上所說的情況已經開始顯現。完全與「國民黨因素」沾不到邊的「一例一休」以及「彈性兩休」問題，徹底的暴露了民進黨執政團隊和台灣的經濟現實脫節，且不明白台灣各行各業的勞工心態及生活難處。如果在這項徹底被所有資方和幾乎所有勞方拒絕的政策上，民進黨可以表現得如此不接地氣，那麼人們如何去相信民進黨有能力去處理那些難度、複雜度更高的政策呢？例如如何挽救台灣經濟這樣的難題。

政府以及蔡英文總統本人的民調急速滑落，正是因為選民已經開始用事實檢驗真理，不再接受任何「假大空」的宣言和計劃。有人說：在公教年金改革即將通過之時，蔡政府的民調迅速拉拔了百分之八。但是即令為真，那也是殘留的「國民黨紅利」所致，僅能當作個案，不會成為通案。

我們知道，蔡總統在台灣內政領域的輕重緩急上，有她的看法、理想和抱負；她先啃最硬的骨頭，這點人們應該給她認可。此外，在啃硬骨頭時，她說了好幾次的「內閣不會溝通」確是事實。然而，她無法凝聚一群更具整合力、執行力的幫手，這也是事實。這是一個領導力和領導氣質的問題，那是賴不了別人的。作為最高領導，川普如此，習近平如此，普丁如此，當然蔡英文總統也同樣脫離不了這個必須自我提升、自我克服的挑戰。

民進黨已經邁入執政困難期，依照它的「選戰第一」的慣例和習氣，料想它會使盡吃奶力氣，試圖找出新的「國民黨紅利」，或盡力延長當下還在進行中的紅利取款動作。但是，即使殘留的「國民黨紅利」能夠在2018年選戰中起到某些作用，可以肯定的是2020年大選時也不會再有了，反而搞不好，國民黨或其他獨立參選

人還有「民進黨紅利」可資運用。

2016年決定勝敗的是「國民黨因素」，而不是「中國因素」；但是，「國民黨紅利」即將被用盡，真正的「中國因素」，將在2020年大選中出現，所有的參選人，不分黨派，都將站在同一水平面來面對它。

請讀者不要用老式的反應來理解這兒所稱的「中國因素」。老式的反應是看到「中國」兩字，就想到「兩岸」之間的關係，什麼「九二共識」啦、文攻武嚇啦、統戰滲透啦。這種台灣式的老反應，正是中國希望看到的、積極創造的。事實上，台灣在中共執政者眼中，老早就脫離了「兩岸」的狹隘框架，而已經是東亞區域、南海區域大棋局下動態考慮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希望台灣社會還只把自己理解為「兩岸關係」的一方，因為，讓台灣人民的眼光變狹隘，操弄起來比較方便。

台灣社會一定要開始培養一種能力，那就是永遠從中美、中俄、中日、中朝、中國和東協，甚至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關係的總體衡量之下來定位台灣，並以此詮釋所謂的「中國因素」。唯有從高度、廣度、深度著手，台灣才不會對中國的「對台動作」做出膝蓋式的反應，才不會那麼容易的被收納到「兩岸」概念的牢籠中，而玩起剪刀石頭布的低級遊戲。

從現在到2020年，隨著中美關係、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中國內部政局鬥爭、中國金融和經濟的動盪，中共會對台灣做出一連串的密集動作，可以是文攻武嚇，也可以是懷柔親善。倘若台灣社會在老概念下隨之起舞，而影響了自己2020年的投票傾向，那就中計了。

蔡英文政府當前的民調下滑，既與國民黨因素無關，也與中國因素無關，而是台灣選民在追究「我到底買到了什麼牛肉」，某個意義上顯示了選民的成熟。希望這種成熟能夠一直持續到2020年，以「有料沒料」、領導力、執行力作為投票標準，不要被「中國因素」左右甚至利用。（**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8月**）

二、需要翻轉的政治體制和文化

推翻××黨，還是推翻剛性政黨？

從「三一八學運」到「核四抗爭」，青年以及他們的老師們，要的都是「真正的民主」；這顯示了，單靠二十多年來的一人一票選舉形式，還不足以帶來真正的民主。這點我同意。如果今天台灣還有人堅信只要把一人一票進行下去，台灣就會真民主，那他不是高度近視就是高度重聽。

為什麼一人一票還不能真民主？有人說，那是因為有國民黨這樣一個政黨存在，推翻它，讓它在台灣消失，台灣就能夠真民主。等到了一個沒有國民黨的台灣，學運、工運、社運都不需要了，「三一八」不會發生，「核安」也不用再抗爭了。

這種論證很迷人，很方便，但如果說歷史有鐵則，那麼其中之一就是歷史會捉弄人。人以為只要當下去除了A，世界就會往B的方向前進。事實上，這種「想當然耳」是一個基本邏輯的錯誤；去除了A，只代表「非A」，而「非A」不一定帶來B，也可能帶來的是C、D、E……

以推翻國民黨為例，有人深信只要去除了「國民黨」這個A，「台灣政治從此沒有惡勢力」，這個B就一定會出現，但從來不去想可能出現的C：另外一個不叫國民黨的政黨繼承了惡勢力；或者D：惡勢力來自剛性政黨結構，只要是剛性骨架的政黨，誰當政都一樣。

推翻國民黨，台灣才有希望。如果這句話的意思是：推翻國民黨所代表的剛性政黨骨架，台灣才有希望，那麼我贊成。但如果這句話的意思是：推翻國民黨這個玩意，台灣才有希望，那麼我就不贊成。原因很簡單：剛性政黨講究組織紀律，它的存在目的是為了打仗、為了奪權、為了奪取權力之後的保權；在剛性政黨骨架下，

真正的憲政不可能，真正的法治不可能，真正由下往上的國民經濟動力也不可能。這是馬英九執政六年來帶給台灣的寶貴結論。但是，台灣人民看懂了嗎？只要剛性結構還在，即使不是馬英九，結果還是一樣。但同樣的，即使推翻了「國民黨」，只要剛性政黨還是台灣的政治主流，結果也還是一樣。

馬英九執政之初，好像要對國民黨的剛性骨架動手術，這從他吸納反對黨人士、與國民黨內傳統勢力切割可以看出。但隨後證明，他終究是個深受中國政治傳統薰陶的半吊子，三下兩下就失守了，不但最終沒有撼動那剛性骨架分毫，而且還投身剛性骨架，不惜損毀憲政分際，以黨之手腳騷擾政府之玉體，以黨之骨架匡衡立法之運作。

剛性政黨來自一對父母。父親是蘇俄列寧式政黨對早年國民黨的調教，母親是中國皇族把政的千年大傳統。這兩個文化因子，一個外來，一個內生，但卻一拍即合，乾柴烈火之下生出了兩個兒子：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若非孫中山先生早在俄國勢力進入中國之前就在西方精神下開發出了三民主義，後來的國民黨會更慘。而拒絕孫中山的共產黨，歷史已經證明，其剛性結構硬如磐岩，箝制中國至今。

馬英九以六百八十九萬票、立法院過半的條件之下，執政卻徹底失敗這件事，可以這樣來描述：一個沒有中心思想而自戀於一己歷史地位的人，闖入了一個空有剛性骨架卻已失去應有能力的政黨，左支右絀，徹底凸顯了其無能帶領國民黨轉型，同時也徹底凸顯了一個剛性骨架的政黨在開放社會中的邪惡性。

照理來講，反剛性威權統治的台灣民進黨，應該走上柔性結構。然而，又是歷史的捉弄，使得民進黨一旦成為一個「黨」，就有如醉漢一般的時柔時剛，凸顯了民進黨終究還是一個沒有核心價值觀下的一種集合。

歷史在兩方面捉弄了民進黨。其一，就像剛破殼而出的天鵝，第一眼看到的是隻大鴨子，就以為自己也是隻鴨子。除了國民

「黨」之外，早期的民進「黨」沒看過其他可能的「黨」，因此有樣學樣，也搞起了什麼「中央」、「地方」、「主席」、「常委」、「黨紀」、「人頭黨員充民主」的把戲，殊不知那是國民黨從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大陸軀殼帶來，硬塞在三點六萬平方公里的台灣軀殼上的剛性統治結構。這踏錯的第一步，使得成年後的民進黨就像大半隻鴨子，偶爾發出幾聲天鵝之鳴。例如：什麼兩個太陽、一個月亮啊，都是一種「剛性結構看問題」的思維反映。如果不是太陽只能有一個，怎麼會用「兩個太陽」這個概念來譏諷狀況呢？你能想像，美國人民會用「幾個太陽」來描述政壇人物的鬥爭嗎？「三一八」學運會用「太陽花」來作為渴望的象徵，難道不是預設了對一個「明主」、「明君」的期待？難怪當年中國用太陽花來象徵對毛主席的期待。歷史對民進黨的第二個捉弄，就是民進黨出身在一個「大政府」的年代。「大政府」與剛性政黨，是一對孿生兄弟；因為「剛性」的強處就在於「指揮」，在指揮力之下，一定傾向於大政府。這就像鴻海公司或中國的華為公司，在領導者的剛性指揮力強大之下，公司自然具有走上龐大之傾向。

大政府的指揮系統由上而下，不可能產生由下而上的動力；另一方面，大政府裡面好吃的東西很多很多。走進一個任你指揮的滿漢全席宴會廳，你能不動心？再加上一個「中央／地方」的椿腳結構，大家不搶食？人非聖賢，國民黨、民進黨都非聖賢，在「大政府」的結構下，誰執政誰通吃，你抵擋得了這誘惑？我恐怕抵擋不了。有句名言：壞人做壞事不可怕，好人在結構下不得不做壞事才可怕。說的就是這個。

台灣的「黨府一家」體制、大總統體制，加上「中央／地方」大政府體制，才是萬惡之源。而讓這三者沆瀣一氣的，就是「剛性政黨」的骨架。弔詭的是，「吃大政府」的誘惑，又強化了剛性政黨的個性、加重了大總統的權力。這是一個環環相扣、自我循環的迷宮，只有進口，沒有出口。

在這條惡性自我盤旋的大蛇身上，有一個七寸可以下手制服它，那就是：推翻政黨的剛性骨架！推翻了這骨架，台灣就可以憲

治，就可以法治，政府就會自然縮小，「一起吃政府」的惡習就會終止。

那麼，如何推翻剛性政黨骨架呢？道德訴求是沒用的，推翻國民黨是沒用的（記得本文開始所講的邏輯謬誤嗎），當下之道，就是學習德國訂立政黨法，徹底規範剛性政黨的行為，把它的習氣關到籠子裡。德國在二戰後，社會認知到民粹選舉的大總統容易走上黨政合一，也就是希特勒現象。還好馬英九無能做希特勒，但是下一個有能的總統呢？在今日台灣的剛性政黨、剛性政府文化加上大總統制，如果體制不改，遲早會出現希特勒現象。或許台灣太小，惹不出什麼世界大事，但是要葬送台灣卻綽綽有餘。台灣至少得有政黨法，才能避免這一天。

至於是否推翻「國民黨」，那是後話。在台灣有了政黨法之後，如果國民黨繼續荒腔走板，倒也不失為督促人們注重免疫系統的一個提醒。管它國民黨還是民進黨以及其他黨，哪個政黨願意對號入座做闌尾，就讓它去吧。

訂立政黨法，不需要修憲，立法院諸公婆就可以辦到。但是多年來，不論藍綠委員，都不願意走上這條路。你猜為什麼？你和我一樣聰明，你猜對了！

再來發動一場「×××佔領立法院」運動，立委不簽字承諾訂立政黨法就不退場，如何？老師們，全力進攻民間版的政黨法，如何？密室黑箱自然就會無生存空間，靠政治湯圓吃飯的人自然會陸續改行。政黨法不會讓政治不鬥爭，但是會讓政治越鬥爭越進步，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越鬥爭越退步。（本文原發表於2014年4月。眼看當下民進黨的內部選情風貌，不禁想起2014年太陽花青年從立法院收兵之後所寫的一篇評論，五年之後依然適用於今天……當年文章，一字不改重刊於此……）

要××黨倒之前，

你得先了解何謂「政治生態學」

1957年，毛澤東確定麻雀是害鳥，因為牠吃稻穀。毛主席一句話，全民響應，全國五、六億人同時發動，大人小孩拿著臉盆敲打，讓麻雀不敢落地而累死。幾周之內，全中國的麻雀多數死光，農民歡天喜地，吃稻穀的害鳥沒了。接下來幾年，中國四處爆發蝗蟲災害，吃掉了更多的穀物，因為，麻雀和蝗蟲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生態制衡。毛主席不懂生態制衡學。

二十年前，廣東地區開始發達，廣東人好吃蛇，尤其喜歡蛇貓共燴，稱之為「龍虎鬥」。餐館內供不應求，一時之間，農民開始到處抓蛇捕貓，結果是廣東境內老鼠大量繁殖，人民受不了鼠患，於是廣東省頒布了一條臨時令：從今以後若干時間內，餐館內點蛇點貓者，必須同時點一道鼠肉。中國人的生態知識進步了。

故事結束了。

要問的問題是：除淨了國民黨，台灣會怎樣？如果國民黨摘下招牌，從此「樹倒猢猻散」，台灣會如何？

人為使得物種急速滅絕，不管出發點是善意還是仇恨，帶來的多半是更大的災難。生態結構的改變，需要一點時間，需要一點知識，需要一點耐心；自然界如此，經濟如此，政治也如此。

主張「趕盡殺絕」的人，必須先知道「趕盡殺絕」的後果，這裡就需要一點生態學的常識。蔣介石不懂政治生態學，一心只想把共產黨趕盡殺絕，因此他失去了中國大陸；相較之下，蔣經國比較懂得政治生態學，因此他至今還被很多人懷念。

今天台灣相當一部分人，已經陷入了「趕盡殺絕」的迷思，具體表現出的就是「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然而，在生態學的常識之下，應該同時問出的問題是：

一、國民黨倒了，台灣就會好嗎？

二、國民黨這個台灣政治生態食物鏈的頂端角色，突然不見了之後，食物鏈中的其他角色會不會遞補上去？

三、國民黨徹底垮台後，那麼多的「政治必剩客」要到哪裡謀生？會不會和生態圈中的其他角色交配，而產生一種台灣人還沒見過的新物種？這新物種會長什麼樣？

至於「支那人滾回中國去」、「皇民說」這種追殺祖宗八代的態度，若在生態圈中散播開來，其後果就不敢往下想了。

國民黨馬上要換一個黨主席，許多黨員寄以厚望。但是，那真的不是一名黨主席的事，而是整個國民黨在台灣政治生態圈內角色的事；生態角色不改，國民黨不會不倒。為了台灣的前途，希望國民黨倒得慢一點，讓生態圈得以過渡。甚至，讓國民黨能夠徹底重新定位它在台灣生態圈中的角色，成為推動新生態的積極角色。

接下來就是難聽的話了。若真想重新定位生態角色，第一步就是「停止做殯儀館的化妝師，承認死的已經死了，自己重新做活人」。

許多人在人生挫敗之後，決心重生，因而剃光頭以明志。剃光頭，是個昭告天下的動作，「昨日之我已死，今後之我重生」。以國民黨今日之名聲及包袱，唯有「剃光頭」才有可能在台灣的政治生態圈中重新取得競爭的角色。何謂「剃光頭」？要者有三，分述如下：

其一，清理黨產。這點，已有諸多論述，此處不贅。唯一要點出的是：早年國民黨還在中國的時候，每多出一名黨員，就是多出一名分食者，而共產黨每多出一名黨員，就是多出一名貢獻者。原因無它，國民黨有龐大黨產，而共產黨無黨產。黨產，乃是國民黨內的萬惡之源。剷除源頭，勢必哀鴻遍野、敵人四伏，但若無此決心，國民黨必倒，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已經私吞黨產者，必須明白，此時不支持清理黨產，將會禍延子孫，到時「趕盡殺絕」者，不一定是台灣人民，在另一種政治境況之下，搞不好是中美共

同追殺；這是善意良言，你懂得的。

其二，修改黨徽，向麥當勞學習。台灣還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的人，無法認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在這不認同之下，自然很難認同「中華民國」的國號。

符號的認同，人類的大事也；符號認同，可以興邦，也可喪邦。歷史上，更動政治符號，幾乎就意味著流血。幸好，現代人在符號變更這門學問上，開發出了新的一套技能，它就叫做「品牌重新定位」（re-branding）。舉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麥當勞（MacDonald's）2006年將其沿用了數十年的貼著店名的M，修改為更圓融、不貼店名的M，而MacDonald's 的名字還是MacDonald's。為什麼它要改變M這個招牌店徽呢？新的就一定比舊的好看嗎？那可不一定。

麥當勞改店徽，為的是通過一次無人可以忽略的視覺經驗，告訴全世界：我不一樣了，新一代經營者要重新出發了，你等著看！店名不用改，麥當勞叔叔也不用改，改一個顯著符號就可以了。

國民黨大，還是中華民國大？今天台灣還處在國民黨就是中華民國的黨國時代嗎？ 國民黨如果真的為了中華民國，就應該主動收起傲慢，大聲的對世界說：國民黨只是中華民國的一個政黨，國民黨不是中華民國。

同意嗎？那麼，為什麼中華民國國旗上，畫著那麼大的一個國民黨黨徽？憑什麼民進黨、台聯黨、綠黨還有無數的其他政黨，要舉手向國民黨的黨徽敬禮？

答案只能有一個：要不中華民國改國旗，要不國民黨改黨徽。你說， 應該改哪個？國民黨大，還是中華民國大？

國民黨改黨徽，不過是它政黨內部的事，主席及中常委有見識、有魄力就行，一天就解決了，不必修改任何法律，也不會傷及

任何其他人的感情。然而，就這一個小小的動作，就可以讓台灣大部分的人，從此不帶保留的向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敬禮。青壯國民黨員也可在新黨徽下重做活人。

變更黨徽何等大事？倘若因此而失去了黨員認同，那還得了？不著急，麥當勞叔叔已經替你想好了，只需要把十二個稜角圓潤化就可以了，大小比例不變，顏色不變，保證所有黨員一見都認得。

其三，推動修改國歌「一個字」。通過修改黨徽，解除了國旗的認同障礙後，就可以處理國歌問題了。這個好辦，不需要修憲，在立法院推動就可以。國歌，也只需要動一個字，把「吾黨所宗」的「黨」字改成「人」或「民」就行了。

國旗、國歌的認同障礙消除後，其他議題該吵的還可繼續吵，但是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就有了共奔前程的基礎。

以上三者，就是國民黨不得不做的「剃光頭」動作。剃了光頭之後，國民黨或有重生機會。如果國民黨真剃光頭，民進黨應該也有所回應；即使不剃一次光頭，至少也得剪個短髮，以彰明其黨號中的「進步」二字。

國旗、國歌的認同問題，當然只是台灣立足世界的困難的一部分，此外還有你我都知的大問題，那就是「國號」的問題。再一次的，「品牌重新定位」（re-branding）這套博大精深的學問，也可用於尷尬的國號問題上。

台灣一向說中國在國際上打壓台灣。其實，彼岸對「中華民國」這個品牌並不那麼排斥，他們絕對排斥的是這個品牌的英文版本，Republic of China。這還得了，世界上只有一個「China」，台灣怎能叫「China」？其實解決這問題很容易，中華民國的英文稱呼可以重新命名為漢語拼音的「ZhongHuaMinGuo」。「中華電信」的中華二字，不是老早就由「China」改名為羅馬拼音的「ChungHwa」了嗎？

憲法中並未規定英文國號，只要心理上破除了對符號的迷障，「ZhongHuaMinGuo」與「Republic of China」有什麼不一樣？護

照封面印著方塊字的「中華民國」，相對應的則是「ZhongHuaMinGuo」，底下印著大大的「Taiwan」；中國看方塊字，台灣看英文，漢語拼音留給國際看，大家迷迷糊糊、大家開心，有何不好？

在此安排下，綠感情及藍感情者，都各自向中間靠了一步，而在中國看來，這樣總比台灣參加國際場合時，喜歡在名片上偷偷加注「R.O.C.」要好得多。

這項品牌重新定位的工作，必須由民進黨來推動，國民黨來半推半就的配合。其實「中國國民黨」沒有任何反對的基礎，因為在它自己的官方網站英文版上，老早就只稱呼自己為（羅馬拼音的）「KuoMinTang」或者簡化為「KMT」，而不見「China」的前綴；國民黨在台灣的公開場合發言時，也已經不加「中國」這前綴。過去有此智慧，今天總不會比過去笨吧？

至於北京方面的反應呢？昨晚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到北京竟然不排斥這個安排，嘴裡說不同意，心裡暗讚台灣的務實。看到了一個剃光頭的國民黨，一個剪短髮的民進黨，所有周邊國家心裡也都會放下一塊石頭。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句口號請繼續喊、大聲喊、用力喊、上街喊，一直喊到國民黨「剃光頭」為止。國民黨看起來無用，但在某種特定的政治生態圈內，正因無用，乃有大用，只要你懂一點生態學。一個發憤剃光頭的國民黨，對台灣的妙用無窮。（本文內容原發表於2015年1月，當時標題中的「××黨」是「國民黨」，因為當時的台灣青年口號是「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而2020年大選前，相信「××」會被許多人以「民進」取代。四年後來看，果然出現了如柯P、韓流、郭台銘等等生態變異。當年對兩黨的批評建議，今天無論「××」填入哪個黨，道理依然適用，是不是該嘆息呢？請讀者隨自己高興，「××黨」無論填入哪個黨，基本

的生態學道理一體適用。）

法治的基礎及最後防線

台灣以一人一票、政黨得以輪替的民主自豪；台灣社會對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探討熱情，在亞洲可說是名列前茅。這是台灣作為主體屹立於世的絕大優勢。但有一個問題，台灣社會至今怯於探討的是：為什麼在如此一個講究自由、人權且已經具有一人一票的國家，法治的觀念如此虛弱，導致不論哪個政黨執政，都可以玩弄法治而遂其攏權的目的？

難道民主的真義不正是權力的制衡？難道權力制衡的實施不是靠法治？如果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YES，那麼一個法治欠缺的國家，可以被稱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嗎？

法治的基礎落在哪裡？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的通識理解是：法治（Rule of Law）的三個要素是：（1） 對「公義」（Justice）的不斷探討。（2）對「良知」（Conscience）的認識。（3）對「流程」（Procedures）公開透明的堅持。

若以這三要素來評價台灣的法治，我會給（1）打七十分，給（2）打六十分，給（3）打不及格的五十分。若強行把三者綜合評分，那就是勉強及格的六十分。這評分完全是主觀的，沒有調查依據。我們也可以拿中國作對比，然後宣稱台灣已經九十九分，我們也可以拿北歐作對比，然後說台灣只有四十分。和別人比，其實都沒有太多意義，最重要的還是自己和自己的過去比，和自己的未來比。

在我看來，對這三項評分的基石，最後都落在一個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標準上：你對自己的Decency的要求。抱歉這裡使用了英文，實在是無奈。Decency這個英文字，幾十年來我想不出一個完全對應的方塊字詞。到現在為止，我能想到的勉強貼切的翻譯是「正派」或「正直」，再或「知恥」，但總覺得還是差那麼一點意

思。

這種因為文化差距而帶來的翻譯困難，或許可以用一個情境例子來凸顯。在電影《末代皇帝》中，溥儀問他的英國老師莊世敦，英國的Gentlemen和中國的「君子」有何差別？莊世敦回答說：英國人心目中的Gentlemen，就是he says what he means and means what he says（心口如一，說的就是心裡想的）。看出差異了嗎？方塊字文化教育下，「君子，和而不同也」–一個君子，只要表面行為不踰矩，「口是心非」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是屬於一種美德。換句話說，一個虛偽的人、一個假面的人，只要不得罪他人，就可以被歸為「君子」一類。而在英國文化下，這種人絕對稱不上一位Gentlemen。

方塊字文化傳統中，發展不出「法治」觀念，只有誰控制誰的「法制」觀念。法治社會需要大部分人具有Decency□一種自我內在反省的能力，一種不自欺的人性元素，它不是社會道德規範，它比社會道德規範更底層，它是一種支撐社會道德的最後內心防線。方塊字文化傳統下，並非完全沒有類似的元素。例如：「捫心自問」，一個人夜深人靜時，問問自己的行為及動機是否說得過去。這應該是人類的本能之一，但人類也有很多其他的本能，當一個人「捫心自問」的能力被其他本能掩蓋掉了，台灣會說「良心被狗吃了」，中國大陸會說「被豬油蒙了心」。這種內心防線，可以說是人類所有道德行為的最後防線，失去了它，人就會掉落至陰暗的深淵。

一個社會是否公道（fairness），是否講公義（justice），可以看它的三道防線在哪裡：司法的防線、社會道德規範的防線，以及捫心自問能力的防線。當司法防線淪陷之時，還有社會道德防線來評斷公道與公義，當社會道德防線也不保之時，我們可以訴諸人們捫心自問的能力。但是，當捫心自問的能力被遮蓋時，這個社會的公道與公義，就失去了最終的支撐點。

這三道防線在台灣，每逢選舉，第一道司法防線就臨近失效，

第二道的道德防線就成為工具，而第三道的捫心自問防線，不是被肉桶利益的豬油蒙了心，就是被人性內的獸性吃掉了。

你我都知道，單靠一人一票是撐不起「民主」的，即使再加上「自由」，民主還是可能瀕危。缺了法治談民主，後果就是君子盛行，偽君子假面者勝出。六十分的台灣，你是想向上比好呢，還是想向下比爛呢？那麼，你今天捫心自問了嗎？

法治無進步，台灣就會倒

雖然在本書〈說不出口的2020年通關密碼〉一文中總結，「……2020年大選的投票方向由兩條主軸決定：一、作美國小弟還是作中共肉票對自己的餘生最有利？二、我是希望由建制派（既得利益派）當政，還是由反建制派（反既得利益派）當政？」然而那只是在談大選，而不是在談台灣的生死存亡關口。

韓國瑜先生所說的「過去三任總統都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經濟和競爭力基本上已殘廢」，他的指責方向錯了！應該說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這三位法律背景出身的總統，最對不起台灣的不是經濟，而是背叛了他們的專業−法學。竟然連續二十年沒能為台灣的法治扎根，執政後被黨內的既得利益派系綁架，司法改革一次一次的夭折，然後到了大選之前自身也淪為利用司法漏洞的共犯。

不知道多少人說過（包括我本人在內），台灣對抗中共威脅的最強武器是自由民主。我要先自首:未來真正能決定台灣生死存亡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法治（Rule of Law）。因為，雖然沒有自由民主不行，但是法治不彰下的自由民主極其脆弱，而且我相信，很快台灣社會就會體認到這一點，但等體認到時，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歷史上，剛萌芽的自由民主，像散沙一樣由法治的漏洞中流失的案例，數不勝數。這經驗不僅適用於東方國家如台灣，也適用於西方國家。法治之所以如此難以扎根，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自由民主是人人追求的，但法治卻不是人人追求的，有時候，甚至是多

數人厭惡的。自由民主讓你像鳥兒一樣飛翔，但法治卻框限了你飛翔的路線和速度。由儉入奢易，但由奢返儉難；自由民主是一種奢侈，法治是一種自我約束。要由奢侈返回自我約束，需要成熟的公民，而台灣人民距離成熟公民還很遠，為達目的不惜玩法的政客還太多。

在正常國家下，經濟越發達越好，但台灣目前還是個不正常國家。已宣布參選的郭台銘先生的比喻雖然巧妙：經濟和政治是兩條腿走路，單腳前進走不遠。但是，他應該把這句話修改為「經濟和法治是兩條腿走路」，這樣才更貼近台灣的現實，也才能點出中共的要害。

法治，是台灣得以長久存在的唯一立足點，不是經濟、不是國際政治、不是軍事。經濟、政治、軍事，說變就變，操之在人，唯有法治，百分之百操之在己。忽略操之在己的要素，而去追逐操之在人的要素，只能說是捨本逐末。

法治，可粗分為兩大塊：與國際接軌所需要的法治，以及純屬內務、外國通常不會干預的法治。前者，坦白說台灣做得還可以，那是因為國際遊戲規則的強大壓力，例如金融法治在美國的CRS、反洗錢法，以及在歐盟的IFRS壓力下，不得不快速跟上。然而，在商業投資保障方面的法治，台灣在國際上卻還是不及格，否則國際資金也不會把「法規反覆、執法不力」列為投資台灣的最大障礙。這點，三位法律背景的總統，為了選票、為了黨派、為了攏絡既得建制利益，而令台灣的商業法治每況愈下，罪無可赦。經濟轉型且扎根的前提是法治，不是靠什麼能人或創意點子。

第二部分純屬內務的法治，在三位法律背景總統的治下，即使不說一塌糊塗，至少也是原地踏步。「司法改革」的不動如山，就是明證。下任總統及立委群，不論是誰，如果無能、無願攻克此一山頭，台灣好不容易累積的民主和自由，勢必流沙化，成為陷阱和亂源。

總結，以四句話提醒還沒有轉化成為公民的選民：一、法治無進步，台灣就會倒。二、 台灣是小島國家，沒有好法治就沒有好經濟。三、不受法治約束的民主自由是沒有繩子的風箏。四、法治是嚇阻敵人、保障台灣安全的最有效自衛武器。

台灣民主打幾分？

歷史並未終結，地球上的國家還陷在三種體制的激烈競爭、甚至鬥爭之中：集權、假民主，和真民主。簡單定義：集權國家就是以個人或少數一群人的理念、意志，實施對國家資源的壟斷，扮裝成所謂的「集體意志」以行打壓個人的自由意志；假民主，就是形式上具有權力制衡甚至一人一票，但實質上卻通過操弄機制以遂行集權之實；而真民主就是沒有裝扮粉飾的一人一票權力制衡。

若一代表集權，十代表真民主，世界各國都落在一至十之間；任何落在四至六之間的狀態，我稱之為假民主。合乎一的國家不少，如還在進行種族屠殺的部分非洲國家、今日朝鮮、歷史上的納粹德國等，但是一的國家已經不能撼動地球，當下足以撼動地球的應屬位居二的中國。合乎十的國家，如北歐的瑞典、丹麥、荷蘭，應可說當之無愧。號稱「西方老牌民主」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等等，我個人主觀上認為它們落在七、八、九之間。至於俄國，我認為頂多在三到四之間。

大哉問來了，台灣的民主現狀落在哪？台灣人自己，我猜多數會把台灣放在四至七之間，我則認為落在六。真正有意義的問題是：今日的台灣，正在往八的方向移動，還是往三的方向移動？這問題並不聳動，因為近代史已經證明，只要還不是真民主，民主是會倒退的，最知名的例子就是菲律賓和阿根廷。甚至美國，大量知識分子和學者，包括蘇聯解體後寫出《歷史的終結》一書的法蘭西斯．福山，都認定美國民主在倒退中。

如果說二戰以來世界學到的最大政治教訓，應該就是底下這

句：集權的崩潰，並不代表假民主就會從此往真民主移動！事實上，搞不好假民主往真民主前進的動力，還比不上假民主向集權移動的動力。這就是那句政治學名言的含義：防止民主崩潰，唯一的辦法就是提供更多的民主。

台灣民主現狀，不論落在哪裡，關鍵在未來數年執政黨和政府能否提供更多的民主。如果不能，倒退的力量將大於前進的力量。（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2**月，原名〈集權、假民主、真民主的世紀競爭〉）

立法院不改，台灣不會好

天下有一種狀況，叫作「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一萬名勇士，都衝不過一位獨夫把守的窄巷。台灣的政治，就處於這樣一種狀況；那一萬名勇士，就是社會運動者、知識分子、媒體人以及一切有良心、有公義感的人，而那一位把持進步通道的獨夫，就是立法院內的密室協商。

只要有了台灣式的立法密室協商，民主中的所有美意都會盡付東流，就像一鍋民主的粥攙進了一粒老鼠屎，就像一位白皙美女被毀了容。可以說，台灣特色的密室搓湯圓，就是專門被發明出來抵消民主動力的；前段的人民吶喊、打拚，中段的諸多立委提案辯論，到了後段密室，就在那幾張嘴、幾根菸、幾位利益代表的搓弄之下，或者消弭於無形，或者產生基因變種而異化成怪胎。

多年來，政黨當事者為這種行為辯護，說沒有了它，事情就辦不成、法案就通不過。政治、法律學者也包容它，因為「英國議會、美國國會也有」。媒體基於現實，記者們明知其邪惡，卻抵禦不住這種邪惡帶來的爭議及收視率。不明大義的人民，則因生活中充滿了走後門、搞關說，因此相信「政治本來就是這樣」。於是，密室協商就牢牢地長成民主體制中的獨夫；整個立法機制，不過變成了密室協商這獨夫的祕書行政團。

前美國總統柯林頓日前在CNN專訪中對政治協商下了一個斷語，堪稱政治學經典，「The constitution is nothing but about making deals.」（憲法的本質就在交易或交換當中）正是這類名言，被用來當台式密室協商的遮羞布。

人家的政治交易、利益交換，是在完整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制約之下的最後手段，然而台灣的密室協商，卻是破壞三權分立的起點。換句話說，在成熟的民主體系內，立法、行政、司法三方各自講完道理，還無法達成共識的時候，祭出利益妥協以便成事，那就像是飯後幫助消化的甜點。

然而在台灣，利益交換變成開胃菜和主食，「講道理」這件事，反而變成飯後幫助人民吞下既成事實的甜點。成熟的民主，在道理的外衣下穿著一件利益的內褲，而台灣卻像是內褲外穿的超人。如果依英美民主中的利益交換機制和原則，相當一部分的台灣立法委員，恐怕早已蹲在牢獄之中。

立法院是個機構，也不乏良心公義之士，然而作為一個整體，卻是台灣民主進程中的獨夫。名言說：「壞人做惡事不可怕，好人在一個惡體制下不得不做惡事才可怕。」台灣民主要進步，其實也很簡單，打破密室協商這惡制，就可向前跳躍一大步。再邪惡的政黨，沒有了密室協商的保護傘，也就比較容易治它了。

在政府這件事上，台灣只有兩條路可走

台灣一定需要一個「中央大政府」嗎？「政府」可不可以不「中央」？大大小小的決策，不能自治處理嗎？台灣會因此垮台嗎？

我們用網路生態為比喻，談談這個問題。曾經有個帝國，叫做微軟，一旦它佔領了中央地位之後，所有的應用都得經過它的朝廷—Windows作業系統，所有用戶都得向它交稅，然後它再用大家交

的稅來鞏固其中央地位。

手機出現了。這個小玩意裝不下帝國的中央系統，於是Google「農民起義」，弄了一個開放式的Android作業系統，大家免費掛靠。微軟帝國受不了，但還放不下「中央」的概念，於是拼裝出一個貫穿電腦和手機的Windows8，潛台詞就是「小事靠地方，大事靠中央」。

蘋果公司，原來想打造一個比微軟還要帝國的帝國，一切封閉，什麼都歸中央管。但是在嚐到了iPod、iPhone、iPad 行動裝置的利潤滋味之後，同時看到了Google的農民策略勢不可擋，於是在堅決不開放的帝王賈伯斯駕崩後，一步到位的喊出「農民起義已經過去了，現在應該進入公民自治的階段了」。

科技界內的敏感人士，已經聽懂了蘋果的策略。而於此同時，靠著農民起義三分天下的Google，卻經不起中央帝國的誘惑，把開放式的Android置於封閉式的Chrome作業系統之下，意圖用Chrome作為中央一統Android APP的平台。如果它成功了，現今所有APP的開發公司，都將為Chrome打工，又回到佃農身分，接受Google「三七五減租」的德政，就像當年所有Windows應用軟體的開發商都在為微軟打工一般。Chrome，才是網路。

相對的，蘋果今天的口號是「APP就是網路」，網路世界不能無政府，但只能是一個小政府，只管最基本的秩序和規範，其他一切靠公民自治。當下，由於行動裝置的功能還不能取代電腦，因此蘋果依然在維持它的ios作業系統，然而在不久之後，我們可能看到一個沒有龐大作業系統的蘋果公司，主要仰賴APP生態中的自治。

依您天天滑手機的經驗，還有世界走向「萬物相聯」的趨勢，您判斷這場三國演義，最終誰會得到民心？是微軟的帝國勝出，還是Google的大政府復辟，或是蘋果的小政府受歡迎？

早年戒嚴期的台灣，就像Windows作業系統，解嚴後，雖然開始Android化，各種APP群起，但是當年龐大的作業系統身軀還在，

各種大政府的組織機構和流程，箝制著民間力量的發揮，而民間正像機靈的APP開發商，猛鑽大政府作業系統的漏洞。這種不三不四的拼裝狀態，還能維持多久？

在政府這件事上，台灣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Google的策略，重振大政府的平台雄風，各種APP對號入座。二是走上蘋果的策略，「公民自治就是政府」。兩種策略，都有看頭，但若不三不四，不要忘了對岸還有個帝國呢。（本文原發表於2014年8月，原名〈大政府，還是小政府？〉）

大政府不去，台灣不會好

台灣很悶，大家覺得處於困局之中，人人都在找原因。最現成、最方便的罪魁禍首，也是政治上最正確的解釋有兩個：來自中國的文攻武嚇，還有被歸於萬惡之源的國民黨統治歷史。這兩項因素，已經達到了「信仰」的高度，也是目前台灣最大的票源發動機。

在「信仰」之下，人們不會去用心探討任何不在信仰範圍內的原因。然而，正如所有的人類組織，不管是公司、團體、社會，還是國家，一個越來越內縮得向信仰找答案的組織，只會越來越虛弱衰微。任何充滿活力的組織，一定是一個有能力打破信仰，跳出信仰框框找方案的組織。

我強烈主張一種框框之外的思路：台灣的活力被箝制，主要來自「政府」這機構。更準確的說，主要來自當下那個「具有台灣特色」的大政府型態。

台灣的經濟活力問題重重，原因主要來自「經濟部」這個政府組織；台灣的教育體制內，學生、家長、老師、校長個個怨聲載道，原因主要來自「教育部」這個政府機構；台灣的社會資源之所以原地打轉、人民稅款之所以被如此浪費，主要原因來自有權無責的大總統體制，還有被各方利益綁標、綁樁的行政院結構；台灣的

城市活力之所以低落，主因是那個「中央／地方」的財政劃撥不當比例，以及那種「中央以預算綁架地方，地方以選票挾持中央」的上下交相賊文化。

政府體制跟不上世界變化，執政方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機制，屁股往「政府」這個座位上一坐，就與民間社會活力脫節，自顧自的享用傳統政府體制的權力和利益盛宴。這才是台灣困局的根本，才是台灣的有限資源受到濫用和龐大的社會活力遭到箝制的主因。

台灣的普通平民還看不到這點，但我不認為台灣的社會菁英不了解這點。嚴厲的講：台灣的社會菁英中相當一部分就是共犯結構的一部分。企業主菁英，因為長期和政府利益綁在一起，因此靜靜吃三碗公不發言；學界菁英，因為還指望到政府做官因此也不出聲；媒體菁英，為了機構生存，寧可只在文首所述的兩種「信仰」上做正反文章。

大政府不去，台灣不會好！

台灣不能只換外套，更要換內褲

如果我說：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這句話你能接受嗎？嚇到你了嗎？請先收起情緒，聽我道來，再下結論不遲。

表面上看起來，共產黨在與台灣鬥爭，民進黨在與國民黨相互鬥爭，但只要細細體會，我們可以察覺到一個微妙的細節：不管是共產黨以消滅中華民國為最終目標，民進黨以建立台灣共和國法理獨立為最終目標，或是國民黨以保持中華民國的事實獨立為最終目標，它們三者的訴求都只限於台灣換一件外套，而沒觸及台灣換內褲這層次。

而事實上，台灣最需要做的事是換內褲。換了內褲，台灣不管將來政治定位如何，都會是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反之，若不換內

褲，台灣即使法理獨立了，在內也是資源內耗、人民不樂，對外也是其味難聞。

所謂「內褲」，其實就是兩件事：大而無當的體制，以及肉桶政治的結構。

體制問題，筆者過去已有數本專書和無數文章論及，此處僅簡要歸納如下。台灣小島僅僅三點六萬平方公里、二千三百萬人，穿在身上的卻是一件當年國民黨從中國大陸帶來的施於一千萬平方公里、五億人的大政府大衣，此件大衣就是橫跨二十幾個部會，縱含七層行政級別的「中央／地方」體制。台灣的政府比美國的政府還大；在「政府就是用來照顧人民的」虛偽儒家口號下，實際上是束縛了人民的活力和創造力，龐大的機構消耗了大部分的稅收，造就了超額的除了靠搞政治吃飯就別無謀生能力的群體，所謂的制度和法治，往往變成了政治寄生蟲的上下其手、見縫插針的工具。

再來，橫向二十幾個部會乘上七級行政金字塔，就是超過一百七十個的「權力尋租」小方塊。原本是美意的民主一人一票，變成了方塊權力尋租客的樁腳地盤，長年下演變成「中央以財政劃撥攏絡、箝制地方，地方以地盤選票威脅中央」的生態。「中央／地方」體制加上一人一票，不但沒有為台灣帶來真正的人民作主，反而成了民粹的催化劑。

這就是台灣的體制內褲，使得台灣成為一個「上下交相賊、左右來回推」的內耗系統。奇美企業的許文龍先生著書聲討「大政府」，台積電的張忠謀先生拜託政府放下「五加二」的身段，多將精神和資源放在為民間企業移除政治障礙，不是沒有道理。

再來談肉桶政治這件內褲。肉桶（pork barrel）政治走到極端就是制度性的自肥和分贓，它在台灣無處不在，躲藏在政黨、機構和利益綑綁幫派中。簡化而言，包括了：一、國營企業體系中的肉桶。二、國家補助的各種「亦公亦私」的組織，如工研院、資策會長年被少數幫派把持的肉桶。三、各種大型「公益團體、基金會」

的實質肉桶行為。四、中介剝削外勞體系的跨政黨共犯結構大肉桶，還有高等教育系統和產、官之間的研究經費肉桶。說起來，實在是族繁不及備載。

要清洗肉桶內褲，極為困難，因為已經深入肌理、枝葉繁茂，內行人說：派系太多，現在已經分食得很難看，殺得刀刀見骨。另方面，某些肉桶的形成有其當年的背景，甚至是當年的善意政策在時空變化之後成為了惡習。然而正如那句名言所說：「壞人做壞事不可怕，可怕的是好人在制度習慣下不得不做壞事。」今日的肉桶若不除，或至少加以控制，不但台灣的政治無出路，經濟也不可能好。

這也就難怪為何中國共產黨只強迫台灣換外套，從來就不觸及台灣的內褲問題，馬可以照跑、舞可以照跳。一方面，台灣倘若自力更生地清洗了體制和肉桶的內褲，那就是真正民主了，就具有對中國大陸「和平演變」的軟實力；另方面，台灣只要不換體制和肉桶的內褲，那麼對台灣上下其手、見縫插針的機會就很多了。

台灣的兩大黨，民進黨及國民黨，為何也都不急於換內褲，而只在換哪件大衣上打得死去活來，道理其實也是不證自明：對許多搞政治的人物，體制和肉桶就是他們寄生的母體、奶水的來源，怎麼可能「弒母」呢？

看來台灣還需要幾次世代翻轉才能得到救贖。青年世代，若你們看得懂，就隨時準備翻轉吧！

增設「黑機關」，還是裁剪「白機關」？

2016年蔡英文總統剛上任，便在府內設置「新南向政策辦公室」，被批評為凌駕於行政院之上的「黑機關」。如此破格，透露了兩個信息：其一，她當時了解手頭第一重任是經濟，不是政治。其二，她當時知道眼下的政府體制疊床架屋，地盤及責任不清，各部門新官上任三把火之後，各保各的預算、各吹各的號，號令不出

行政院的可能性很大。

總統被迫設「黑機關」是權宜之計，但以台灣政府體制的積習難改來看，這權宜之計恐怕行不通，真正的問題還是在「白機關」體制內，該裁的裁，該剪的剪，才是行政體制之正道。

自從六十幾年前，國民政府旗下那件原來打算治理數百萬平方公里、數億人民的體制大衣，強披在小小三點六萬平方公里、數百萬人民的台灣之後，這件大衣就極少剪裁，以致台灣一直處在「三十坪住家被隔為二十個房間」的狀態，橫向二十幾個部會，縱向七、八級行政單位，比起美國政府還要複雜。蔣氏父子執政時期，縱向以一條鞭威權打通，橫向設「政務委員」威權統領，大陸型政府的「條條塊塊」尚能運作，等到一人一票民主化之後，這件大政府外衣就成為拖累台灣一切的源頭，上下由原來的一條鞭變成節節鬆散的一條蛇，橫向的政務委員制只剩下無從著力的軟性協調，導致「上下交相賊、左右來回推」的現狀。

以台灣的實際體量，裁剪這件大衣，有兩個方面的考量。其一、結構性的變革，就是縱向的「金字塔科層」必須由目前的七、八層，減少至三層；橫向的「功能塊」思維（也就是所謂的罐頭心態，Silo Mentality），必須改為「跨部門流程化」思維。縱的要「扁」，橫的要「平」，綜合來說就是「扁平化」。扁平化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關鍵還是在整個預算機制得彈性化、數據整合得項目流程化、成效追蹤得即時化，而這三項改革，在現在的電腦平台技術下可說是小菜一碟，不去做它，凸顯的不過是官僚的無知和政客的地盤思維。

其二，就是人的問題。蔡總統2016年選前在美國哈佛大學座談會中被問到：為什麼台灣人相互憎恨？她當時的清純回答，讓我覺得她是明白的，她說：「我想是因為他們（搞政治的人）太多了。」多年前，我曾以「政治必剩客」來調侃台灣這種長年不剪裁大政府體制的後果，這不是哪個總統當政的問題，而是什麼總統當

政都會遇到的問題。李登輝當政、陳水扁當政、馬英九當政，對這件無效率的大衣不是剪錯了地方，就是不斷打補丁，導致台灣「吃皇糧」的人數越來越多，平均四十個平民養一個吃政府的人，比起中國大陸平均三十六人養一人不遑多讓。長年靠「吃政府預算」過日子的人，久了就會喪失其為社會生財的能力，甚至自身的謀生能力。其人如果早去企業界，可能就是「人財」或「人才」，長期留在體制內吃預算，就變成「人災」。一進一出之間，就是社會負債與社會資產差別之所在，餅永遠做不大，做大了也永遠不夠吃。

台灣的問題在經濟，經濟的問題在政府太大，政府一直無法裁剪在於油水過多，而油水太多的後果就是肥貓太多，瘦貓因而無幹勁。同樣在體制內，一隻權大油多無責的肥貓，可以使得一百隻普通待遇的貓失去幹勁，而會讓一萬名繳稅養貓的平民汙名化整個貓族。

過去二十幾年，台灣無論誰做總統，都只在談「把餅做大」，然而餅要做大需要許多不確定的條件配合，而這些條件不見得掌握在台灣手中；真正百分之百掌握在台灣政府手中的是「將餅做實」─徹底量身剪裁台灣的大政府，盤活既有資源。然而壞消息是，這個手術面對的是自己的黨內同志，還有許多團繞在政府餐桌旁的政治必剩客。2020年無論哪方當選，面臨的依然是這個問題。（本文原發表於2016年5月）

改革公務員體制救台灣

台灣的大事小事，幾乎無一例外，都牽涉到公務員體系。在「人民自治」的觀念下，公務員體系本來應該是配套機制：人民決定方向和目標，公務員體系予以細化，保障執行的效率。然而，在強大的傳統「官民結構」慣性之下，「官」把平民當作管理對象，而「民」把官當作提供照顧的義務方，官民永遠站在對立面。

更糟糕的是，台灣目前處於「官民兩超載」的狀態。二千三百萬人口，對於三點六萬但是只有一點二萬平方公里可用面積的台

灣，早已超載。倘若台灣人都把官府視為提供照顧的義務方，那麼這個官府得多大？官府怎能不被吃垮？

「官府」在台灣也早已超載。中國在大清末年，平均每七十二個百姓養一個「吃皇糧的」，也就是政府人員，這比例在今天的中國是每五十四個百姓養一個吃皇糧的，遠惡劣於大清。而台灣呢，銓敘部的公務員數字是三十八萬人，但若計入所有其他「吃皇糧的」，例如國營、國控企事業、種種亂七八糟的官方財團法人、基金會等等，總數應該接近五十萬人。以二千三百萬人口相除，今天台灣每四十六個人民養一個「吃財政」人士，負擔比中國共產黨政府還要重。台灣怎能不被這件「體制大衣」吃垮？

台灣現在流行「相對剝奪感」的價值觀，那就是「平均主義」，只要別人分到的比我多，我就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公平正義」就不存在，抗爭就有理。於是，各個族群團體要求「對等」，政黨在選票壓力下，也只能做加法。加來加去，台灣成為一隻等待最後一根稻草的駱駝。

如何打斷惡性循環？不動手術恐怕是不可能。那從哪裡下刀呢？當然是「吃皇糧」的體系。

第一刀，應該是那些「盲腸」性質的官方財團法人、基金會，也就是「靜靜吃三碗公」的那些單位。他們在哪裡？這太簡單了，只要允許，民眾一個禮拜就能把他們全部指認出來。第二刀，應該是國營企事業單位中的冗官冗員。第三刀，就是「公務員」體系中那些被民意代表硬塞進來的人員，還有那些一天工作不到四小時的老油條，更不用說那些佔著位置、遂行私事的寄生蟲了。

這三刀，都是領導們的事，也就是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的責任。如果說難做，那麼要你們幹嘛？

三刀下去之後，把台灣調整到每一百人負擔一個公務員的水準，就可以來談公務體系的效率問題。台灣社會變遷越來越快，但公務的老舊體制規章不動如山，就像新身體裡面的舊器官。舊器官已經接收不到新身體的信號，還在向無用肌理或者肥肉部位供應養

分。偶有新銳公務員想要革新，卻都落入「有功無賞、打破要賠」的尷尬境地。

處理了「官」這一面之後，就可以處理「民」這一面了。平民首先要認識到自己不是「老百姓」，而是「公民」，「政府」是用來配套自治的，不是用來吃的。認為「人生靠政府」、「政府永遠欠我」的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即使不變成善棍，也終究不脫愚人。

現下的台灣是政府、公民位置「兩不正」。官商勾結、政策失能，部分人民靜靜吃政府、部分人民只能刁鑽，其來有自。傳統的官民結構壓在一個超載的台灣上，「官府」出惡棍，「民間」出善棍，豈是偶然？（本文原發表於2014年6月）

為什麼沒有流浪公務員？

台灣有許多流浪教師，這學期兼了課下學期不知道還保不保，一個月三萬元收入還得南北跑，自付交通費。最近爆出，台灣也有許多流浪律師，奔波於事務所之間打零工。相信，流浪會計師、流浪樂師、流浪廚師，應該也不在少數。出個有獎問答題：為什麼沒人聽過「流浪公務員」？

喔，原來公務員身分有「終身保障」；「公務員」可以不作為，可以考績被打丙等（如果有的話），但他不會被解僱。所以，社會物種之中，沒有「流浪公務員」。

當一個企業出現開支浮濫的時候，管理會計上有一招，叫做「零基預算」（zero budget），也就是各部門的年度預算歸零，不允許以上一年花了多少錢作為下一年的預算基準，每年從頭來估量各部門、各項目的績效目標，然後才定預算。政府這個組織，在預算吃緊的時候，也可以祭出這招。

台灣政府財政接近破產，除了在財政上應該來一次「零基預

算」，在公務員人事上，也應該來一次「零基聘任」，打破公務員終身制度。聽起來嚇死人，但這種做法成功過。比較傷感情的是，成功經驗產生在台灣人口中的「萬惡中國」。

1980年代，中國死水一灘，因為全國人口的吃喝拉撒睡都由政府負責照顧，每個工作的人口都歸屬於某個公家「單位」；理論上說，所有工作者都是「公務員」。後來逐步開放私人企業，但是絕大多數人的心態還是「政府的存在就是用來照顧我的；政府的好壞完全看它把我照顧得好不好」。許許多多的「單位」，人浮於事，大家拖拖拉拉的過日子。

共產黨坐不住了；再這樣下去，財政必然崩塌，國家必然垮台。狗急跳牆之下，一些高人想出一個原來不敢想像的招數：買斷工齡。用白話文來說，就是國家養你到今天為止，你過去的貢獻，大家來想一個公式算一算，然後用一筆錢「買斷」你的「工齡」，從此你自己吃自己。

這個過程，大概痛苦了十年，抗議的有，跳樓的有，國營企業破產的有，哀鴻遍野。但是，在大數原則下，許多「被迫下海」的人找到了自己的頭路，氣氛之下，乃至有能人志士脫離公務員身分「自願下海」，而成就了諸如今天「聯想」、「海爾」這樣的企業。

中共有一萬個不可取，但其被逼到牆角之時的「壯士斷腕」魄力，卻難以抹煞。台灣不集權，因而種種「壯士斷腕」的辦法，只見於呼聲，而不見於行動。然而，以台灣當下的財政以及公務員的效能，加上人民普遍的要求政府照顧的習慣，有一天不但手腕將不保，恐怕連腳踝都要壞死。如此，台灣只有三條路：自己動手術、等死、被中國收服。後二者不可取，只有第一條是活路。

政府「單位」的零基預算，加上公務員的「零基聘任」，才是台灣的出路。希臘化？別自我貼金了，人家希臘在歐盟呢，台灣在台灣海峽，有「希臘化」的資格嗎？

政府機器變成立委的二奶、議員的小三、人民的賤僕

台灣人，拜託，不要再矇著眼睛自己騙自己了。多年來台灣的中央政府已經變成立委的二奶，地方政府已經變成議員的小三，而人民已經把政府這部機器當成自己的賤僕。你或許可以舉出幾個特例來駁斥這樣的比喻是錯的，那就請你拿張紙把那些特例寫下來，看看「民意代表」中有幾個把政府當成公器而非私器的，然後格外珍惜、支持這些人。

這樣的台灣，你還期望經濟大局會突破、社會公義會彰顯、荷包裡的錢會增加、下一代會比你更好？做的是什麼夢呢？

立委的二奶，議員的小三，人民的賤僕，三者環環相扣，這惡性循環不打破，管它紅橙黃綠藍靛紫，什麼顏色的政黨來當政，台灣的結果都是一樣的：資源被吃乾抹淨，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財政預算三分入壞人口袋、七分被糟蹋，公務體系持續膨脹然而無作為或不敢作為，老師不敢教真東西，學生覺得教育沒意義，少數有自救能力者遠走高飛，大多數沒有自救能力者像窩在盆裡的螃蟹，每人八隻腳相互拉扯。

立委能把政府當二奶，因為他們手握「二奶」的生計─預算，而預算掐在立委手中的政府公務單位，無論是甘願還是被迫，在台灣的政治生態下，無不以討好或妥協為終了。甘願做二奶的公務人士，有時本來就是立委的沾親帶故者，有些是識時務者，在計劃立項、採購、發標、執行過程，有意無意的順著立委的意向。於是，一連串的「以次充好」（以次品冒充良品）、豆腐渣工程、無用的形象工程、不能收尾的建設、蚊子館、只吃飯不做事的黑機關、財團法人就出現了。然後各種「後謝」以各種招待形式、回扣、合法及不合法的政治獻金、高薪職位酬庸，猥瑣的進行著。除此之外，在立委與立委之間的跨黨跨派利益交換之下，法規的核心精神被破壞、各種雞零狗碎的條款被夾帶，扭曲了法治環境的系統性和完整性。

地方議員能把政府當小三，除了上述的狀況，還加上了地方勢力的「票源」威脅力。地方公務系統，所受到的關說、威脅、利誘壓力，比起中央系統更加的直接赤裸裸。橫向負擔著來自議員的勢力，縱向又承受著來自中央上級的壓力，忽東忽西，毫無權責相符的行政原理可言，依法正派行事難上加難，正直者往往鬱鬱以終。

大家憎惡台灣的「官商勾結」，但是真有學者或媒體認真去分析「官商勾結交通地圖」內以立委、議員為軸線、樞紐、轉運站的比例有多少呢？重大的官商勾結飯局中，有立委或議員在場「調和鼎鼐」的又有多少呢？在這個轉型正義、那個轉型正義呼聲滿天飛的時候，竟然沒有人提出「議會行為轉型正義」，只因為立委、議員掌握了預算和政策的生殺大權，手持各種威脅利誘的工具，怕被報復或分不到糖果罷了。

立委、議員、地方勢力三股力量的利益、權力糾結，都在「民主」的神聖大帽子下進行著。在「一人一票」的精神下，公務系統做「公僕」倒也理所當然。但是，在台灣不成熟的「凡事以民主為帽子」習性下，台灣人習慣在對自己有利的事情上要求「人民作主」，但當事情對自己不利的時候，卻搖身一變，要求政府「為人民作主」，萬事責難政府，此時公務系統就變成了人民的賤僕。在今天台灣，政府機器簡直就不是個東西，施政時一會要縮手，因為「人民要作主」，一會要破格違法的強力介入，因為要「為人民作主」。人民對「民主」概念的兩面騎牆，益發擴大了立委和議員的公器私用空間。

在如此政治生態下，立委、議員、人民三方都在「吃政府」，而同樣是民選出來的政府首長，同樣需要為自己的權位打算而妥協甚至參加；在此一團亂麻糾結下，公務機器還要有所作為，那真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再重複一次前語：在此習性生態下，管你紅橙黃綠藍靛紫，什麼顏色的政黨來當政，台灣的結果都是一樣的。民進黨用「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句大實話取得政權，但選民不察的是，這句大實話在邏輯上推衍不出「國民黨一倒，台灣就會好」的結論。只要立委繼續把政府當二奶，議員繼續把政府當小

三，人民繼續把政府當賤僕，民進黨當政，台灣一樣不會好。這道理適用於任何其他政黨；當下，這道理正在被驗證中。

政權轉換，這對台灣是個大契機，但是這是個稍縱即逝的契機。我個人的看法，台灣社會應當開始從意識上杜絕「老百姓」這個概念，並摒棄「人民」這個字眼，把它們當作髒字，而開始全面的以「公民」這個概念和字眼替代。當你投票時，你是在「公民投票」，而不是「人民投票」；當你在爭取權益時，你是在行使「公民權利」，而不是「老百姓抗議政府」。「公民」是講究權責相符的，是自由意志下願賭服輸的，是不能在「人民自主」和「為人民作主」這兩種矛盾價值觀之間跳躍切換來和政府打交道的。

個人和媒體，都應該用「公民」的標準來監督立法委員、議員和政府之間的關係，不允許立委把政府當二奶，議員把政府當小三。政府行政機器和立法院、議會之間是獨立但相互制衡的關係，不是利益輸送、權力施壓的關係。而公民有權利把政府當公僕來用，但沒有權利把政府當賤僕來使喚或施壓。如此，台灣才會好！

現在台灣還在靠所剩不多的老本過日子，許多人還有小確幸的餘地，但若台灣每個人的意識再不翻轉，惡習再不革除，還在夸言某黨某人可以救台灣，或期待打死某黨某人就可以救台灣，那麼以當下其他國家的自覺、自我檢討速度，台灣人再次揚眉吐氣的機會，將一去不再返。（本文原發表於**2016**年**10**月。在性平原則下，也可將文中的「二奶」、「小三」兩詞替換為「二爺」、「小王」。）

被「球員兼裁判」卡死的台灣經濟

經營活動上的任何領域，只要是出現球員兼裁判，最好的結局頂多不過是平庸，通常的結局是形成剝削體制。這原理，就像政治學中所稱「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敗」一樣的顛撲不破。

而台灣這個島國的經濟，卻在違背經營學ABC的狀況下，走了

幾十年的球員兼裁判模式，其所造成的剝削體制，在許多關鍵領域內，已經侵蝕到骨子裡了。

許多人說台灣的民主已經變成民粹，言論自由無法無天，但是這個遭人詬病的毛病，至少防止了台灣落入「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敗」的政治陷阱。引人好奇的是，民粹和幾乎無底線的言論自由，為何沒有遏止「球員兼裁判」在經濟活動上造成的不公不義？

「球員兼裁判」是一條必定失敗之路，然而為何它對台灣的民主或民粹具有如此強大的免疫力呢？換個角度來問這問題：「球員兼裁判」具有何種吸引力，致使台灣的政府，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如此的飛蛾撲火呢？又具有何種慣性，致使台灣的人民，對其視而不見呢？

以發生在2018年的北農公司議題為例。北農「公司」的本質是黨國一家餘孽下的球員兼裁判的怪胎，根本稱不上是一家企業，不管誰出任董事長或總經理，都是政治鬥爭下的政治任命。無論是政治酬庸下的任命，還是依照能力適格原則下的任命，都改變不了「球員兼裁判」體制下的命運；台灣各地農戶若期待北農公司出現一位包公或媽祖來維護農戶的最大利益，那只是緣木求魚。

各界窮忙於追究被政治任命的總經理的「適格性」，卻完全無視於北農這個怪胎機構的「球員兼裁判」DNA，可說是撿了芝麻，忘了西瓜。輿論界不求矯正怪胎本身，卻集中火力辯論怪胎的帽子戴得正不正，只能說是中了巫術政治的蠱惑。

一個可被政治任命的「企業」，就是一個球員兼裁判的機構。北農若做不到球員和裁判分家，注定就是一套某方剝削農民的機制。這個「某方」，可以是官府，可以是商家，也可以是官商勾結的共同體。剝削的手法千千萬，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利多時做球員，利少時做裁判。

球員兼裁判的體制對執政方如此迷人，因為金錢和權力盡在其中。國民黨抵抗不了這個誘惑，現在看來民進黨也抵抗不了。北農，僅僅是其中的一個小樣本，試問，台灣還有多少行業充斥著球

員兼裁判的機構？觀光業有沒有？外勞移工業有沒有？能源業有沒有？金融業有沒有？交通業有沒有？動用國庫的國家大型投資計劃中有沒有？北農，剝削的是農民和農產品消費者，而更大的行業，剝削的是所有納稅人的稅金以及所背負的國債。

接下來不得不談，為何「人民」可以容忍執政方的球員兼裁判如此之久？若在球場上，觀眾老早就衝到場內了。而在台灣，此現象卻可延續達數十年之久，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倘若沒有人民的縱容，何以至此？

歸根究柢，還是台灣人民的公民意識薄弱，覺得繳出去的稅，就是潑出去的水。而完全沒有意識到，被選舉出來的執政者，僅僅是公民財富的理財代表，而不是有權收地租的領主。

台灣人民在政治民權上已經覺醒了，只要執政者出現絲毫的政治侵權跡象，自覺受害方便會哭天喊地，媒體也都擴大宣傳。但台灣人民在經濟民權上，卻還停留在懵懂的階段，對於制度性的腐敗源頭，往往一知半解。

再加上，台灣人民傳統上很容易被眼前的小便宜擺平。不滿？給你一點「補助」就擺平了。台灣人民看到「補助」就覺得那是天上額外掉下來的好處，近乎完全缺乏現代常識，不懂得今天的補助就是明天的債務、後天的稅負。

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大拖累，就是政府本身的「球員兼裁判」特性，導致政府既做不成合格的球員，也做不成公正的裁判，兩邊不搭，裡外不是人，致使資源一再空耗。最令人可懼的是，在這體制下，社會原生的合格球員出不了頭，只能選擇和裁判合汙或乾脆外逃。

這，才是台灣經濟的根本問題。

××的資策會：兼論台灣的數位經濟

這是一道填空題，看完了文中的鏈接資料，讀者自己決定「××」應該填入哪兩個字。

最近一位朋友寄了一份他的民間機構規劃的「2020年智能政府」簡報供我參考，內容紮實、系統思考完備。由於是民間所為，我大為訝異，回信說：這不是經濟部底下的資策會早就該幹完的事嗎？

然後，幾天前看到一家民間公司網站上的好文〈台灣的科技管理斷層〉，感嘆台灣軟體界的人才這麼多，但產值這麼低。細讀之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奶奶的，資策會集中了一、兩千位軟體高手，人數及IQ總和即使在全世界也排在前列，如果還不能把政府的資訊系統幹好，那從事商業活動也好，直接、間接的產值即使比不上矽谷同等規模的公司，至少也不能比印度的百人軟體公司差吧，怎麼弄成現在這副「不官不商、亦官亦商」德性？

接著，有人提供了兩段新聞給我看：內容是「年賺四十億！資策會安插專員，部會標案通吃」，看完兩則報導之後，不禁「掩蓋長嘆」（蓋上筆電的蓋子）！在台灣，你給一個小商人一些特權，他弄出個台塑集團；你給一個創業者一些方便，他給你弄出個鴻海；你給一些實幹家一些政策協助，他們還你一個精密機械產業鏈、自行車產業鏈；你給一位專業經理人一筆資金和一批人才，他變出個台積電。但你把所有以上：特權、方便、政策協助、人才、資金都加在一起給一個半官半商、不公不私的單位，它卻變成一隻拖累整個國家競爭力的攔路虎。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夠撬動地球。但阿基米德忘了說，如果你同時給他五個支點，他就只能讓地球轉不動。這種把一群IQ140的人，放進一個集特權、方便、政策、人才、資金於一身的半官半商、不公不私機構，集體IQ卻只剩下80的現象，在台灣豈只資策會一個單位？

經營管理學中著名的「彼得定律」說：如果你不定義清楚一個人的角色，然後依照該角色所需的能力來決定他的升遷去留，而只用當前職位的「考績」決定升遷，那麼每一個人最終都會被升遷到

他不適任的職位，這時候，整個機構的每一個職位上的人在能力上都是不適任的，因而沒有動能可言。這個定律，雖然談的是個人與機構管理文化之間的關係，但若我們把一整個國家作為觀察對象，把政府的一個個機構視為構成國家競爭力的單體，道理同樣適用。換句話說，如果在政府體系中，每一個機構的角色定位不清楚，那麼每一個機構遲早都會變成不適任，因而整個政府失去動能。

1979年成立的資策會，當時的角色是清楚的，就是促進台灣向資訊產業轉型，對台灣的經濟的確起了作用。三十餘年過去了（而這正是人類科技進步超越過去三千年總和的三十年），資策會的角色沒有隨之演化，反而成了一隻彼得定律下的恐龍，或是一個官方光環加持的媽寶。

彼得恐龍和官式媽寶是怎麼養成的？引用一位知情人士的評語：「坦白說，大家都很拼但已經不知在拼什麼。台灣政黨輪替下容有意識型態問題，但至少當年有憂國之人想方設法解決台灣的生存危機。（現在呢？）資策會的角色重點不只在軟硬體，更在雄心壯志下的破壞式創新，如果只要漸進式創新那麼解散算了。坦白說，今日資策會和工研院多肉食者鄙，少遠謀之士，偶見憂國之士卻少格局，所以大家都在爭取經費和執行計劃中麻痹自己。」

台灣還有多少這類沒有隨著環境演進自己角色的「會」、「所」、「院」？恐怕不計其數。這種台灣特色的半官半商、不公不私的類公務機構，做盡了體制的媽寶又不受體制監督，成為政府改革的攔路虎、民間活力的絆腳石。人民花錢養政府，政府花錢養恐龍，人民抗議恐龍，於是政府又花錢安撫人民，這種台灣特色的財務惡性循環，不是勒緊腰帶或加點稅可以解決的。因為失去角色定位的恐龍只會越吃越多，恐龍與恐龍之間互相創造職位和肥貓，形成「恐龍生命共同體」。

前行政院長林全看到民間創新界的反應之後，收回了口號式、一廂情願的「亞洲矽谷」計劃，給出的理由之一是「重點不在硬體，而在軟體」，還算有點勇氣。然而，既然知道了當今世界創新

經濟的重點在軟體，接下來要怎麼做呢？愛爾蘭沒有「西歐矽谷」，愛沙尼亞沒有「波羅的海矽谷」，以色列沒有「中東矽谷」，然而它們的數位經濟動力強過台灣數倍也不止。它們不過是不斷解除恐龍法條、排除恐龍機構，不斷為軟體人才和創業者移除擋路石；簡言之，就是相信年輕世代、將數位經濟的「控管權」下放、去中心化。

悄悄收回「亞洲矽谷」口號後的幾年之後，2019年的今天，這口號又悄悄的還魂了。台灣納稅人注意，前方熊出沒！

大破大立的做法，就是將「資策會」改為「資策的機會」。這兒說的不是什麼內部改組。台灣的千百個「會、所、院」，在不官不私、亦官亦商的文化下，早已積重難返，內部改組，不過是換一種吃政府的形式、讓政府再自我羞辱一次罷了。先得破，路徑只有兩條：解散它，或賣掉它。

解散它，人才得以釋出；專利和智慧產權部分，有國安價值的由政府配給國安單位，有一些商業價值的出售或估價給人員創業，有公益價值的就開放使用。數位經濟不是傳統經濟，傳統經濟講究的是「機構碉堡化」，而數位經濟的本質是海浪，講究的是如何讓水分子自由結合而自然形成浪頭。用傳統經濟的思維去處理數位經濟，猶如用牛頓力學去抗衡量子力學。

或整體賣掉它，讓民間商業機構結合外國商業機構來發揮那一、兩千位軟體高手的實力，若託付得人，最終生成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商業應用軟體企業也難說，畢竟那兒有一群IQ140的人才，看誰來用、如何用而已。

解散或賣掉資策會，那麼有關打通政府資訊平台的事誰來做？其實，這不是「誰」來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的問題。政府資訊平台是個系統化工程，主要障礙在於各部會、中央／地方政府的本位主義。台灣三十餘年來，公務機構不斷貼膏藥、打補丁，短褲改長褲，內衣改外裳，疊床架屋之後，導致「誰都知道問題在哪、但誰都不願做出頭鳥」的局面，出了事情只能左右來回推、上下交

相賊。政府打通資訊平台的困難，也就是這麼回事。這只需要行政院有魄力，勒令資料數據互通，系統規劃完善後，技術工程由誰來做都可以。講難聽一點，現在社會上的年輕技術人士，比起政府更清楚資訊平台對台灣行政效率的重要性，即使號召他們做志工，每天只發一個便當，他們就會拿出衝進立法院的精神，幫助政府完成這件工作。至於由誰來做系統規劃呢？不是有個單位剛改名叫「科技部」嗎？如果擔不下這個責任，要不要再改名叫作「不科技部」？

麻煩你在電腦上同時打開「工研院」、「經濟部」、「科技部」、「中央研究院」的官方網頁，快速瀏覽一遍它們各自在研究、執行的項目，你就知道在所謂的「科技、數位」領域，台灣是多麼的糊裡糊塗了。這些吃財政飯的單位，在科技、數位的大帽子之下，幾乎是在互相為對方創造就業機會和預算。我懷疑台灣能有一個人，從行政院長到以上諸單位的領導，畫得出一張這些單位之間的職責、任務和經費的交織圖。如果再加入各主要大學和一缸子的相關財團法人，結論就是「台灣不可能有人清楚國家的科技、數位經濟戰略」。選舉前後的口號和計劃，多為只懂部分領域、文筆不錯的秀才所為。在這樣一個數十、數百個主廚同時擁擠在一個大廚房的境況之下，政府的「五大關鍵產業」（姑且先不論這「五大」對不對），只會成為這些一團糊塗的單位互相刷存在感，以及鬥爭預算的平台罷了。

「研究」一詞，在台灣算是被濫用到頭了。一個國家，當然需要一些由國家供養只做研究的機構、一群不憂衣食但窮畢生之力只做研究的人物，但是比例只需要人口的萬分之幾，倘若比例來到千分之一以上，這個國家肯定是得了病。在台灣，「研究」成為了爭取甚至搶奪政府財政預算的大帽子，隨便掐指一算，靠「研究」吃飯的人，比例遠遠超過千分之一。而事實上，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所從事的活動，都是應該計算經濟效益的活動，然而在「研究」的大帽子之下，他們不需要對任何產值評估系統負責，直白一點說，就是一群有報帳權利而沒有收帳責任的人。這批不必受到產

值評估卻有預算權利的機構，不但消耗了國家財務，更要命的是它們像黑洞一般的吸走了成千上萬的高IQ人才，佔據了「創新」這概念的至高點，手中握著創新的名份，制約了廣大社會中的創新動機和資源。這點，不可原諒。

比起資策會，工研院的體量更大（超過六千人），在國內、國際的血脈聯繫，更為綿密，無法解散或出售。但是，它可以被拆分。拆分，對工研院並不陌生，過去已有不少成功的拆分案例（包括台積電）。拆分的目的只有一個：打破不公不私、亦官亦商的兩棲文化，讓研究的歸研究，商業創新的歸商業。

台灣政府在推動科技、數位經濟上，最急需的就是去除疊床架屋的混亂，從根上定義機構的角色，該解散的解散，該讓渡的讓渡，該拆分的拆分，終歸不出四條原則：釋放人才，開放資源，角色清楚，去除所有絆倒社會創新動能的絆腳石（包括法規）。

政府能不能夠將台灣的科技和數位經濟帶入世界軌道，就看此一舉。任何「關鍵產業政策」，都只有在適任的機制下才能進行。聽聞新政府在「軟硬結合」的口號下，有意合併資策會和工研院，這是一條最不可取的路線，其結果將是一個體型更大的「不公不私、亦官亦商」的包山包海機構，在疊床架屋的老機器下，一邊打補丁一邊吃政府。

數位經濟的要素之一就是「去中心化」，任何「強化中心」的政策都是倒行逆施。地球上的所有經濟活動，不分種類，未來五至十年之後都得依靠數位經濟環境才能進行。而台灣的疊床架屋政府體制就是一頭阻礙數位經濟的老恐龍，若不能帶動翻轉，十年後的台灣就會變成肥貓區和貧民窟對峙的狀態，淪落為「亞洲第一村」。今天圍繞在您周遭的人，哪些是恐龍邏輯的高手，哪些是「去中心化」的大破大立者？這可得瞧清楚了。或者，您根本已經不知不覺的將大破大立者排除在圈外了？（本文原發表於**2016**年**7**月）

國營企業「所有權人缺位」：被幾十人綁架的台灣

台灣因為有了一人一票和言論自由，及早掙脫了黨國體制。話雖如此，台灣也還沒洗淨黨國體制的餘孽，其陰魂依然在吸著台灣經濟的血脈。稱其為「陰魂」而非「陽魂」，因為過去明目張膽的腐敗，已經由地上轉入了地下，發展出了一套一套合乎民主法治規範的門面功夫，足以閃避台式的民主和法治。這正是所謂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陰魂有各種樣式，但代表作是台灣的國營企事業。「國營陰魂」的害處，可以用一句話來涵蓋，那就是「所有權人缺位」。既為國營，意思就是所有權應該屬於國家，而國家屬於你我納稅人。納稅人就像是股東，民主制度下，股東不分大小，一人一票，選出代理人，如立委議員和經營人，如總統制下的總統、內閣制下的政黨。但無論是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被選出的人的角色只是國家資產的代理者，所有權人還是公民納稅人。這關係搞清楚了，我們就可以追問一件事：對於「國營」的企事業，如何落實所有權人對經營者的績效監督？

台灣的現況是：所有權人幾乎監督不到，也就是「所有權人缺位」的現象。董事長和總經理都是政府指派，但在既非總統制又非內閣制的奇特台灣體制下，所有權人若要問責國營企事業，事實上找不到責任方。中油如此，台電如此，台鐵如此，台船如此，台車如此，華航如此……

所有權人缺位，幾乎保證了政府及其指派的經營層的失職，而上層的失職，又帶來了另一面的奇特現象，就是「萬年工會董事」的蔓生。然後，兩端惡性循環，沉痾越重，經營層換人也沒用，萬年工會董事想去也去不掉。於是，國營企事業吃政府，政府吃納稅人，國家的股東淪為食物鏈的最底層。

最懼人的例子，就是中油和台電。這兩家國營企事業，壟斷了台灣的能源政策，而能源政策終將決定台灣的命運，被政治化的能源政策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可以說比共軍對國安的威脅還大。中

油、台電兩家的員工總數是四萬二千人，官派高層人數加上萬年工會董事，人數不超過十人。二千三百五十萬台灣人的未來命運，被綁架在百分之零點二的人身上。這樣說算是客氣了，嚴格的說，是幾十人綁架了台灣。納稅人股東們，趕快想一想這其中的荒謬和可怕。（本文原發表於**2019**年**1**月）

有權利罷工，但有權利罷公嗎？

官方控股的華航，2016年空姐無預警罷工，並繳交「投名狀」（護照）以示官股（政府）不同意就誓死不出國之決心（沒護照就不能登機，中國的旅行社防脫隊的慣用技巧），夜宿官股公司門口大街，在新政府緊急抽換官派高層，迅速簽下七條要求之後結束。2019年，華航機師選擇春節高峰期無預警罷工。過程中不好評論，但結束後，不得不談談「無預警罷工」和「無預警罷公」之間的區別。

華航空服員罷工，管理層必然知道隨時會發生，但對原先計劃出國、返國的廣大乘客，卻是一場「無預警」的災難。交通行業罷工，當然會帶來社會成本，各國皆然。但是，在台灣的政治結構、政府體制之下，我們最好區隔出「罷工」和「罷公」兩個層次來看員工權益問題，這樣有利於社會對員工權益的意識走向更合理的方向，將來若再度修改「勞動爭議法」時也能更準確的解決問題。

罷工的手段，說穿了無非就是要造成對僱主的傷害，以爭取僱員認為被剝奪的權益，這也是舉世皆然。罷工行動中，永遠有兩個利害相關方：僱員和僱主，兩者都想討「公道」。而在社會契約上，政府向對立雙方都收了稅，因此不能偏袒任一方。政府的責任，在於不斷修正相關法律，提供仲裁機制，為雙方的行為劃下紅線，盡可能降低社會成本（無辜受害者也繳了稅啊）。

那麼，提出一個大哉問：如果僱主就是政府的時候怎麼辦？

A、B兩隊踢足球，原來應該中立的裁判，竟然就是A隊的大股

東。你說，這場球怎麼踢？踢出來的結果，花錢買票進場的觀眾會服氣嗎？更要命的是，如果這名兼A隊大股東的裁判，需要全場觀眾的投票才能繼續其裁判生涯，整場足球會演變成什麼狀況？合理的推斷，結果就是這名裁判臨場看多數觀眾支持A隊還是B隊，來決定兩隊的勝負。這種狀況，可以歸納為一句話：足球賽的政治化。

台灣就是這樣一個「賽事政治化」的國家。如果把罷工這件事比喻為足球，那麼整個台灣幾乎就是一個「奧林匹克所有賽事都政治化」的國度，而且已經進行了幾十年。這點不改，台灣不可能出現正常的政府，不可能有正常的賽事，國際上凡是要求正常比賽的球隊也會對台灣望而卻步。

世界各國多少都有官方為大股東的公有事業，但是台灣的比例絕大（可參考維基百科「中華民國公營事業」之條目，以及中山大學張玉山教授的研究報告。許多帳面上政府不是大股東的公司（例如華航），實際操作上通過協會、基金會持股，政府就是實質控股方。

從上述的「賽事政治化」分析來看，台灣在勞工權益、勞資糾紛、罷工這些事上，不但在政府為最大股東的領域內，根本上就不可能正常化，而只能政治化，即使在所謂的「私營」企業領域中，由於官股體系掌控了絕大的經濟資源，再由於私營企業家族化嚴重，與官股體系官商相護幾乎就是常態，其下的勞工權益、勞資糾紛解決方式，一定也是扭曲的、非正常的。

回到罷工問題。台灣有個與其他國家不一樣的怪異現象，那就是私人企業的僱員幾乎不罷工，而不惜上街遊行或罷工的聲音多來自官方控股企業。照理來講，在利潤掛帥的私人企業下，員工的權益更容易受到資方的擠壓，因而引起員工的抗議或罷工念頭。而在官方控股的企業下，官派的經營者只可能出現經營不善，或貪汙舞弊，而不會以私人企業的資方思維來擠壓員工，反倒是鐵腕追求效率的官派領導會被員工趕跑。但在台灣，私、公兩個領域內的勞資

意識顛倒了過來，由官股照顧的員工（也就是由國有資產照顧的員工）的工會極為強勢，而由私人股東照顧（也就是不用國有資產照顧的員工）的工會極為弱勢。

官有企業工會如此強勢，每天盯著公司的財務，罷起工來，原本應該是賽事另一方的大股東，還得忍氣吞聲，原來應該公正裁判的政府單位，還得把單一方捧在手心。相對照，私營企業工會不振、甚至無工會，平日沒有談判機制，員工權益往往到了企業倒閉或老闆落跑才發現投訴無門。「吃得到政府」的員工和「吃不到政府」的員工，同樣是人、同樣是納稅者，但權益落差如此之大，你說台灣奇怪不奇怪？因此，我建議以後將「罷工」這個詞語保留給私營企業領域的員工使用，而在官有企業領域內使用「罷公」，以凸顯在台灣這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現象。

官有企業工會的「罷公」技能，經過長年磨練，已經精進。此次華航空服員的行動，以正常「罷工」的目標來看，應該是傷害僱主，但盡量降低對社會無辜者的傷害。其中一項正常的做法應該是在事前就透露給社會「本工會可能於近期內發動罷工」，好令已有出國、返國行程的無辜者做出心理準備或改搭其他航空公司航班。你可以突襲你的僱主，但你不能突襲無辜者。德國鐵路公司（DB，也是官方控股）的工會在2015年連續罷工十一次，造成全年交通混亂。然而，每次罷工前，都會通知社會「我們在準備罷工了，請大家要有交通備案」，而梅克爾總理堅持聯邦政府雖然是大股東但絕不能介入談判，江湖事必須江湖了。最後工會達成滿意結果，但有感於聯邦政府的公正，簽署下了一份2020年之前只仲裁不再罷工的同意書。事情了結後，民調顯示，百分之六十一的火車通勤大眾對工會的表現滿意。這才是先進文明中的「官控公司罷工」，激烈且社會成本巨大，但從始至終的態度不是「罷公」。

此次華航空服員事件，可以稱之為「通過罷公以達罷工目的」，技巧上吃準了台灣「賽事政治化」的本質。時機上不但選擇了總統出訪搭乘華航班機的同日，也給所有乘客來個措手不及，效應相乘之下，新政府竟然緊急抽換官派高層、授意迅速簽下七條要

求。這是一次極為成功的「罷公」，但在台灣如此多官股控股的企事業體制下，其他方的員工也仿效進行各種不同形式、明的暗的、突襲無辜納稅人的「罷公」呢？

因而，本節第一段才提出，「我們最好區隔出『罷工』和『罷公』兩個層次，來看員工權益的問題」，也於此提出「賽事政治化」連鎖效應的預警。現有的「勞動爭議法」的內容，並不足以涵蓋這項台灣特色的風險。

2020–2025年：台灣需要一個平行政府

2020–2025年，台灣最需要什麼？我認為，台灣最需要的是一個由社會自發的「平行政府」機制。台灣現在雖然意見混亂，相互攻訐的負面情緒瀰漫社會，但我相信所有人之間，有一個共同認知：官方政府是無能定義核心問題、提供明確方向的。換句話說：政府的機能在台灣已經接近徹底失效。政府收了稅，但實質上卻變成資源把持者；台灣還在運轉，靠的是民間的打拼動力，政府變成一種寄生性質，消耗資源、甚至阻礙發展的機構。

過去二十年的選舉，藍綠輪番執政，已經證明了這問題無關藍綠，而是來自體制以及官府文化，什麼人進了這醬缸都會變成醬料。結論是有的，那就是來一場徹底的體制及文化翻轉，但每次觸及這結論時，各界菁英都會說「不可行」，因為修憲的空間已經被早年的國民黨和民進黨共同綁死。那麼，難道台灣就這樣一代一代的「後代被前代綁架」因果輪迴下去？

既然政府已喪失「動力引擎」角色，民間和社會就必須「自備引擎」，也就是這裡倡議的「平行政府」機制。民間平行政府雖然沒有法律上的公權力，但是它可以通過選票、輿論、社會行動，迫使官方政府離開寄生蟲的角色，由病菌轉為益菌。此處簡單勾勒其機制如下。

台灣民間力量活絡，人才、團體及企業資源都不缺乏。但由於

官方政府無能定義問題、提供方向，民間力量呈現「發散式」的蔓生，缺少一種「收斂式」的機制，儘管活絡卻只能成點而不能成面，更談不上共識。

因此需要一個公民自發的「平行政府」機制，將民間「發散式」的力量進行「收斂式」的匯總。此機制的目標是：促生最大公約數、核心議題排序、提供解方、施壓官式政府及代議士。這樣，公民投票的邊界和序列就成形了，「平行政府」就構成了選舉及公投的有力施壓機制。

必須收斂至政策的核心議題包括四個方向：民生重大議題，經濟創富議題，與台灣利害相關的國際議題，以及國安議題。

結合社會分散的力量，通過收斂的機制，形成翻轉官式政府的實質力道，困不困難？我只能說：相對於官式政府的不接地氣，台灣民間不缺人才、不缺錢、不缺問題的解方。但引擎點火剎那所需的推力，的確需要有心人。

如果台東是個獨立小國？

複雜的「中央／地方」體制，超出了台灣的承載力。複雜結構下的浪費，導致的結果是中央財荒、地方嗷嗷待哺。以台灣人口中的「偏鄉」台東為例，若非體制的桎梏，它其實可以不偏。

台東發展不起來，據說是因為那裡沒有經濟活動、住民找不到工作、人口外移，台東登記三十萬人，實際居住才二十萬人。又據說，那裡的人生活需要補助，地方開支的百分之七十五都依賴中央政府補助。

讓我們腦筋急轉彎一次。如果讓台東成為一個獨立的小國家，台東會怎樣？台東可以怎麼樣？我知道，這個想法，即使是個假想，恐怕也有人不能接受。台東是台灣的一部分，怎麼可以獨立？

且慢！大家是不是都聽過「台灣是祖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句話，你是否覺得這個邏輯很荒謬？如果是，那麼為什麼「台東不是台灣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句話不可想像？

台東的面積是三千五百一十五點二五平方公里，是台灣面積的百分之九點七五，但已經是新加坡的五點四倍，開曼群島國的三十五倍。開曼的人口數量只有台東的四分之一，國民所得平均四萬七千美元。小國，只要找對策略，就事論事，提高生活水準比大國容易得多。

倘若台灣容許台東獨立，台東人自然會想出一百種提高生活水準的方式；它可以成為東北亞的避稅天堂，它可以開放國際資金進入台東，它可以對全球旅遊人士落地簽證，它可以修築具有最佳雷達導航系統的機場，無論什麼天候，波音七六七以及空中巴士都能起降，它能引進數家頂級國際休閒公司，它能把遊輪外包停靠在鄰國台灣的高雄港，如果鄰國台灣缺乏資金，它可以用BOT方式支援高雄港建設遊輪碼頭，它可以用國際標準自由引進國際人才，它可以實施經濟造林，它可以用三倍的價錢賣綠色白米給鄰國台灣。

請不要告訴我說，那樣台東的自然生態、原住民文化會被破壞，那種說法只是台灣人的傲慢，只是一種偏鄉政策下的自我設想的預言。如果台東是個獨立國家，它就會珍惜自己僅有的資源；如果台東獨立，台東就不必滿足二千二百八十萬台灣人把它當作私家後花園的浪漫認知，也不必承擔「台灣最後一塊淨土」的壓力。

也請不要告訴我說，台東人口及人才不足。只要脫離了「就台灣論台東」思維，而進入「就台東論台東」的開放思維及策略，不但鄰國台灣的人才將心甘情願的大量移民台東，並且廣大的國際人才也會順著香氣而來。搞不好若干年後，花蓮以及屏東都會舉辦公投而自願加入「台東聯盟」。

台東發展不起來，絕不是因為它「地小、人少、交通不便」，而是因為它被大台灣所牽制住了，因為大台灣上的多數人把它當作一個「地方」，中央政策綁架了地方的發展戰略，強迫性的「一國

一制」，使它不得不落入「吃中央補助」的境地。台東人一輩子都不會奢望像台北人、台中人、台南人、高雄人那樣有朝一日入主中央，但他們卻不得不接受中央的統領。而中央呢，由於視台東為大台灣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斷的提供補助、不斷的安撫那兒的住民，期望換得他們的感恩及穩定。

放大一點看，這是不是有點像中國對台灣的態度？中國對台灣獨立的態度，是不是就像台灣對台東獨立的態度？

如果我說，台灣的中央／地方意識形態以及作為，其實很中國；台灣的生產力、創造力瓶頸，就在於「中央補助地方／地方依賴補助」的惡性循環，其實很中國，你會不會很氣憤？如果我說在面對世界時，整個台灣人民越來越像台東人民，你會不會拂袖而去？

抱歉抱歉，玩了這麼一個腦筋急轉彎遊戲。我真正的意思是，台灣在中國的暗示下，正在急速自我偏鄉化、自我邊緣化，而台灣其實不必這樣。弔詭的是，台灣其實還很中國，玩大政治者，抓著「中央」的概念不放，主要財政由中央統籌分配；玩小政治者，扒著「地方」的概念不放，日日喊窮要補助；日久天長，惡性循環。這樣下去，如果有一天台灣的中央政府的補助發不出來，你猜誰會來發補助？如果有一天台灣的地方政府拿不到補助，你猜地方會向誰討補助？

你和我一樣聰明，你猜對了！

在二十年前，台灣解構了黨國體制，今天必須開始解構「中央用補助控制地方、地方以選票挾持中央，中央有權無責、地方有責無權」的中央／地方體制，以十年為期。這任務包括了大幅縮減行政層級、大量縮編那超過美國、中國的中央部會數量。財稅結構上，應該大幅回歸地方政府，配以大尺度的政策鬆綁。有財稅專家會說，那樣台北就會肥死，台東就會瘦死，但我覺得那是不敢開放

現代金融工具之下的無謂擔憂。例如，可以仿效現代「國家主權投資基金」，成立「城市投資基金」，並立法要求六都的「城市投資基金」投資落後城市。我相信，由富裕的台北市成立一個國際開放式的「台北基金」來投資台東，其效能及結果，會遠超過由中央來認養補助台東。

把概念再往下延伸，香港因為沒有「中央／地方」的扞格，實現了交通上的「八達通」，一卡走遍香港。台灣有那麼大嗎？需要台北、台中、高雄各搞各的交通卡嗎？台北市的悠遊卡既然已經卓然有成，何妨將「台北市」捷運公司的股權開放，用真正現代企業的規制，開放台中市、高雄市投資入股？台北市悠遊卡現在可以在「台北市領土主權」的範圍內坐火車，但是火車開出了台北領土就不能用了。這些都是笑話，在中央／地方的體制作祟下，台灣已經錯過了足以傲視世界的「一國一卡」機遇，也錯過了利用現代企業機制創造經濟價值以緩和「中央／地方財政劃撥」的財務負擔。

台東真是個好地方，拿掉中央政策的手銬，讓它發展吧。台灣真是個好地方，卸下自我銬上的體制手銬，讓台灣發展吧。（本文摘自筆者《與中國無關》一書）

高雄，何不當作中立國家？

上節〈如果台東是個獨立小國〉，論證了台灣在中國式的中央／地方體制下，地方永遠像長不大要糖吃的孩子。如果擺脫了中央／地方的枷鎖，台東可以起飛。如果台東可以，高雄就更不用說了。

作為一個國家來構思，高雄有海港、有機場、有城市、有工業、有農地、有電廠、有休閒海岸，氣候溫和，和「鄰國」還有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相通，人口雖然只有新加坡的一半，面積卻是逾四倍。如果台灣容許高雄把自己當成小國，一個沒有軍事和外交負擔的中立小國，你說高雄可以如何發展？

目前，高雄發展跌跌撞撞，道理太簡單了。台北是首都，政策和金錢都在那裡，權力運作也都在那裡。多年來，高雄人才都被吸至台北，高鐵變成台北的「吸星大法」，「港市合一」喊了多年，但事實上卻栽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同調。

撇開政治條件，其實高雄的自然條件比台北好太多。有人說高雄人文條件不足，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手銬拿開了，人才自然會流向高雄。

短期內高端人才不夠？胡說。人才可以買，台北的退休或下台的政務官多如牛毛，出好待遇買來就成。高雄的心胸如果從池塘變成湖，國際人才也願意來，倘若高雄的心胸能夠變得和海一樣大，從中國招聘奇才都可以。

高雄發生氣爆，中央與地方互推，其實高雄可以乾脆一肩扛起，痛定思痛的把高雄當成獨立國度來擔責、來索權，回頭要求在地石化公司至少一半的稅繳在高雄。產生碰撞又怎樣？選民支持就可以。關鍵在於你敢嗎？決心夠嗎？執行力夠嗎？

高雄人沒意識到，自己比新加坡小國的條件好太多了。但因為缺乏主體意識，高雄老把自己視為台北首都的孤兒。或許，高雄需要一個「高雄李光耀」？

高雄只是一個例子。台灣的想像力，完全被政黨政治和中央／地方體制吞噬掉了。「六都」改制，不過是把十幾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在形式上變成六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過去「中央用補助控制地方，地方用選票挾持中央，中央有權無責，地方有責無權」的結構都沒改變，這是哪門子的體制改革？

如果六都這六個大漢，都沒有完整的「自我就業能力」，只能舉債度日，用常識來看，台灣還有希望嗎？六都之中，發展條件最好的應該就是高雄，只是高雄還沒有自己的「都格」，而「都格」的第一步，就是在概念上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小國來爭氣。高雄都長參選人，應該拿出「高雄總統」的氣魄，而不是擺出「台北媳婦」的哀怨。（本文原發表於**2014**年**9**月）

2025年之後的憧憬：邦聯議會制

通過修憲改變台灣的權力體制，已然勢在必行。當年把傳統的雙首長制（即行政院長任命需通過立法院），改變為比美國總統制更威權的「袁世凱式大總統制」，導致了台灣連續冒出了幾屆眾望所歸、然而上任之後隻手遮天的大總統，其「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後果，現在台灣路人皆知。所以，台灣政壇和輿論界一直有強烈的內閣制呼聲（按：所謂「內閣制」，實為「議會制」的俗稱。為了方便閱讀習慣，以下還是從俗，稱為內閣制）。

倘若僅為了解決「中央」的權責失衡，其實還用不著內閣制，只需做五個改動：其一，恢復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其二，降低立法院的倒閣門檻。其三，降低對立法委員的罷免門檻。其四，取消黨團密室協商制。其五，創建《政黨法》，規定政黨主席不得兼任總統，以及勒令黨產必須接受如上市公司的公開會計審查。

然而，即使以上五項全部做到，也只能緩和台灣政體內的「中央亂象」，而對於台灣的「地方亂象」毫無效力；更別說台灣特色的「中央以財政脅迫地方，地方以選票挾持中央」的普遍亂象。

而「內閣制」呢？今天支持內閣制的人士，可以大致分為兩類。其一，真心擔心台灣的「中央權力亂象」將拖垮台灣者。其二，在「奪權思維」下，不溫不火的贊同內閣制。而擔心內閣制的人士，大約也可歸為：擔心出現「一黨專政」；擔心出現「萬年總理」或「萬年議長」；憂心中共只須收買內閣成員和部分代議士就能「竟其全功」；擔心民選總統與內閣之間（幾乎必然發生）的激烈拉鋸等。

台灣若走上修憲之路，必須有個前提，那就是「向前看一百年，不向後看，也不向旁邊看」；換句話說：不能有任何「奪權思維」，甚至不能有「解決眼前問題」的思維，遑論等而下之的「政

黨利益思維」。

修憲，我們必須突破「內閣制」或「雙首長制」的思考桎梏，因為那只能解決台灣的部分亂象，也就是「中央」級別的亂象。修憲，我們需要往更深的層次看，一直看到骨子裡。

導致台灣政治、經濟空轉的亂源許許多多，然而撥開表象，究其根柢，實乃結構性問題。其中大者有三：誰執政誰通吃的「黨府體制」，以及縱向七層、橫向二十九部會的「大政府」，還有「地方以選票挾持中央，中央以財政控制地方」的「中央／地方體制」。此三者若不解構，即使修憲成為內閣制，即使推翻了國民黨或打倒了民進黨，台灣還是不會好；此三者可統稱為阻礙台灣現代化、效率化的「三隻老虎」。

如何同時解構這三隻老虎？曰：邦聯內閣體制。也就是把台灣的權力結構轉化為邦聯結構，將「權力分散自治」、「權力制衡」、「權責相符」的原則貫穿到邦，使得各邦沒有「中央」可吃，逼迫各邦「轉大人」。邦聯政府以及邦聯議會只須處理國防外交還有統籌「邦際」事務，邦內財務趨向「自負盈虧」，邦內事務「權責自負」。為了不陷入法律制度的繁瑣，可限制邦議會的立法權限，《民法》、《刑法》、《公司法》等都承襲目前的「全國一套法」精神。這套體制，即使不能一蹴而就，至少先在邦聯的精神下進行施政。

第一步，便是以六都為核心，將周邊城縣資源整合為六個虛擬的自治邦，國家財務稅收朝向「邦自治」方向移動。未來，由「中央／地方」體制轉變為「邦聯政府／邦政府」，內閣制貫穿全國，邦有邦內閣，邦聯有邦聯內閣，總統裁撤或者虛位化成為精神領袖。可研究爭辯的細節很多，茲事雖然體大，然而當前所熱議的「內閣制」，若不同時打破「中央／地方」制，恐怕換湯不換藥，切除了「中央」的癌細胞，仍保留「地方」的癌細胞。

或有人說：這不就是「地方自治」嗎？不就是百年前孫中山的理念嗎？差矣！「地方自治」這名詞，其實是走私自「朝廷／地

方」的偽民主概念。它是自相矛盾的，有「地方」就一定有「中央」，而有了「中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地方自治」，這就像有「父權」就不可能有「兒女自治」一般。

台灣的資源當下集中在中央，這是朝廷統治的變種，雖然可以「改朝換代」，但只要「中央／地方」的大政府體制存在，政黨就抵禦不了「誰執政誰通吃」的奪權誘惑，各級代議士及政場玩家就難免以「吃政黨、吃政府」為人生大志了。

「中央／地方」大政府體制，乃是當年由中國帶來的不合體大衣，這個體制，雖然對台灣的成長也曾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那究竟是為了「一黨專政」、「反攻大陸」而準備的體制；開放黨禁加上了一人一票的選舉之後，就變成一種舉世無雙的怪異民主毒藥。

試想，中央地方七層行政加上中央二十九個部會，就是二百零三格的複雜矩陣，而每個格子就是一個利益地盤，每個利益地盤內都有成百上千的小組頭、小樁腳。如此複雜的利益框架覆蓋小小台灣，在多黨制之下連動拉鋸，政策必然空轉，大選必然民粹。

一個原地空轉了二十年的台灣，絕不能歸咎於台灣缺少努力之人。事實上，台灣上上下下都有大批努力之人，但他們方向不同，拔河拉鋸之下，使得另一批私心自利的人，得以隨著一來一往的經濟空轉、政策反覆，順勢搜刮公共資產、人民財富。更可嘆的，許多原先還算努力之人，在失望甚至絕望之下，陷入了虛無主義，高者潔身自好，低者也就滑入了自私自利的通道。這不是藍綠問題，而是上述「三隻老虎」體制下的必然。

雖說世界上實施邦聯制的國家不多，且多半屬幅員廣大或民族文化複雜之國度，理論上來講，台灣小小三點六萬平方公里，不應當實施邦聯制度，然而在台灣「三隻老虎」的特殊背景下，邦聯似乎是唯一能夠同時解構三隻老虎之道。

下　部：台灣的主體性與未來

下部：台灣的主體性與未來

本書上部，談的是台灣在2020—2022年兩年間將面臨的危機以及處理方法。但危機中必有機會，只是看人有沒有「轉機」的心態和技能。本書下部，就專談台灣的機會，以及為了得到這個機會所需要的心態和技能。

讀者可能好奇，為什麼把期限定在2025年，而不是2030年、2040年或2050年？我的回答很簡單：因為中共沒有時間了。坦白說，雖然接下來會有一些討論「中國未來三十年」的話題，但是「中共」這玩意，它現在以一黨專政的形式統治中國，我看撐不過2025年。2025年之後，即使「中國共產黨」這個名字還存在，但是其形式和機制一定與現在不同。究竟今天我們稱為「中共」的這一大坨東西，到了2025年是變好、是變壞、還是散架？我們今天稱之為「中國」的那一片土地，彼時會呈現何種面貌，被置於何種治理機制之下？到時台灣和它的關係是怎樣一種關係？這裡面有極大的想像空間。

狀況是複雜的，有時需要檢驗切片以確定病理和病原，有時需要照X光片以探其結構。本書下部就來做這件工作。但是，請讀者一定嚴守一個視角：無論討論的對象、現象是什麼，筆者都是由「台灣優先」的前提出發的。

本書上部，談的是台灣在2020—2022年兩年間將面臨的危機以及處理方法。但危機中必有機會，只是看人有沒有「轉機」的心態和技能。本書下部，就專談台灣的機會，以及為了得到這個機會所需要的心態和技能。

讀者可能好奇，為什麼把期限定在2025年，而不是2030年、2040年或2050年？我的回答很簡單：因為中共沒有時間了。坦白說，雖然接下來會有一些討論「中國未來三十年」的話題，但是「中共」這玩意，它現在以一黨專政的形式統治中國，我看撐不過2025年。2025年之後，即使「中國共產黨」這個名字還存在，但是其形式和機制一定與現在不同。究竟今天我們稱為「中共」的這一大坨東西，到了2025年是變好、是變壞、還是散架？我們今天稱之為「中國」的那一片土地，彼時會呈現何種面貌，被置於何種治理機制之下？到時台灣和它的關係是怎樣一種關係？這裡面有極大的想像空間。

狀況是複雜的，有時需要檢驗切片以確定病理和病原，有時需要照X光片以探其結構。本書下部就來做這件工作。但是，請讀者一定嚴守一個視角：無論討論的對象、現象是什麼，筆者都是由「台灣優先」的前提出發的。

第八章

世界座標下的台灣主體性：

是誰？在哪裡？往哪去？怎麼去？

第八章

世界座標下的台灣主體性：是誰？在哪裡？往哪去？怎麼去？

一個演化價值論者的台灣四問

八年來的七本書，無論主題，其間都有一個貫穿性的問題：台灣的主體性落在何處？本書又再談這個問題，但深度和厚度，已經比過去更踏前了一步。角度很多，以下就陸續展開。

台灣是誰、在哪裡、去哪裡、怎麼去？以上統稱為「台灣四問」，近十年來所出版的七本書、近千篇文章，無一不是圍繞著這四個問題展開。多年來，眼見著台灣一次又一次的、大事小事的，主動放棄了建立健康的主體性的機會。偶有苗頭，卻又被藍綠陣營中的執意享用台灣資源的「建制派」給搞得烏煙瘴氣，彷彿不見人民抓狂不甘心。前世今生的「建制派」不分藍綠，他們在潛意識中都認為自己對台灣有功，因此對台灣的資源享有某種「主權」。台灣雖小，但對於目光如豆的人，卻還是一桌滿漢全席，爭食吃相著實難看，飢者不擇食，權者以合法掩護非法吞大餐，最終吃飽了還想打包。

什麼是「主體性」？

台灣至今沒有一個健康的主體性。「主體性」這個概念沒有什麼神祕的，它不過就是一個堂堂正正做自己、不以他人為座標的格調及氣勢。主體性必須被尊重，任何想「統一」他方主體性者，本身就是還沒找到主體性的一方。這道理適用於國家對國家、社會對社會、團體對團體、個人對個人。簡單的說，如果一個國家想用自己的主體性去「統一」另個國家的主體性，一個社會中的某一個群體想用自己認同的主體性去「統一」或「消滅」另一個群體的主體性，或一個人（如家長、老師）想把自己的主體性強加於另一個人（如兒女、學生），這些都是邪惡的。

健康的主體性，一定是自發自生的，並且貫穿潛意識、表層意

識、行為的。否則，虛偽、假面、人欺負人的邪惡必然產生。以下，就是扣緊「主體性」這個概念，對於「台灣四問」—是誰？在哪裡？去哪裡？怎麼去？—的扼要結論。

一、台灣是誰？

台灣的本質，就是一個海洋地緣的產物。沒看清這點，就看不清台灣的前世、今生、未來。

近代史前，台灣地表的人類活動以及和周邊海域的連結，就是海洋地緣性的。四百年來的近代史，發生在台灣的一切大事，更是與海洋地緣性相關的。

因此，理解台灣的前世、今生、未來，以及你我的認同傾向、自我主體性的定位，若不從海洋地緣的架構出發，不可能有清晰客觀的結論。今天存在於台灣的情緒糾結、政治紛爭也不可能有解，台灣人未來方向的最大公約數也無從建立。

歐洲、美國、日本，乃至韓國、東南亞，其政治家、知識人、人民，都了解及承認自己是所屬地緣的產物，只有使用漢字的中國人和台灣人對各自的地緣概念懵懵懂懂。缺乏地緣的歷史、知識、意識，就是今天台灣和中國走不出「統獨」思維怪圈的核心因素。

二、台灣在哪裡？

分為「外患」和「內憂」看這問題。先由外患談起。

外患：中國威脅。台灣現在看似混亂，很多人甚至用「無救」評價台灣。但是其實，隨著五年一個世代的翻轉，只要再給台灣二十年的安全期，在新世代逐步取代老世代之下，台灣必然內生出一個很不錯的、適合其尺寸體量、主體性固實的社會。關鍵是：有沒有這安全的二十年？現在手擁實質權力、口啣話語權的互鬥老世

代，允不允許台灣擁有安全二十年？即使允許，他們懂不懂得如何替台灣爭取二十年？

導致台灣得不到這安全二十年的根本因素，就是來自中國的「統一」威脅。中國是否會對台灣採取所謂「統一」的行動，主導權不在台灣，而在於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競爭態勢變化。筆者認為，美中之間的全球競爭態勢格局，將在2020─2022年之間定局。一旦定局，台灣的命運範圍，不論好壞，也就被限定了。因此，屬於台灣可以自主影響自己未來命運的時間，也就落在短短四年之間。台灣社會能否在這短短四年之間達到大共識，找到屬於台灣自己的最大公約數，很令人存疑，然不能不試。

內憂：「超載」帶來零和遊戲。台灣的許多惡劣現象，與中國這項外患有著直接的關係，但是，今日存在台灣內部的許多惡劣現象，卻與中國無關。這部分，可以稱之為台灣的「內憂」。

台灣內憂的根源，多數人歸結於「藍綠、統獨」這個慣性思維的框架下，但我認為，雖然那個框架有其強大的歷史和心理背景，但卻是一個沒有出路的慣性思維框架。看台灣的內憂，必須從更底層、更幽微的結構性因素下手。短文無法盡其細部，此處僅僅歸約為一個核心概念─「超載」：面積僅僅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可用土地僅僅一萬二千平方公里的台灣，已經老早超載了。不但物理上超載，心理上也超載。此超載現象不改善，台灣不會好。超載現象涵蓋台灣的每一個層面：政治結構超載（大政府）、政客密度超載、選舉制度超載、財政負擔超載、司法體系超載、制式教育超載、不當經濟政策超載、既得利益肉桶超載；最後，是的，連人口結構都超載。

超載，必然帶來「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因此台灣的權場、利場、輿論場、情緒場，無不陷入零和狀態，並且越來越招招見骨。人都希望自己看起來高大尚，因此超載的台灣下所發生的種種你死我活遊戲，無不被冠以諸如「藍綠、統獨、正義」等高

大尚的帽子，實則可能與獅群、虎群、猴群在超載之下的行為學無異。

台灣今天的年輕世代，不見得理解自己的低薪、無出路、被壓迫的真正原因，其實是這種「超載下的零和遊戲」下的現象。年輕世代的寶貴熱情，往往被那些在超載環境中玩弄零和遊戲的假面高大尚口號給消耗了、浪費了、耽誤了。

三、台灣去哪裡？

人若要問：我該去哪裡？那麼眼睛一定是往前看的，世界上哪有眼睛一直往後看才知道自己去哪裡的人？

百分之八十的力氣用在往前看，才可能知道去哪裡。百分之八十的力氣用在往後看的人，不管嘴巴怎麼說，永遠不會知道自己該往哪裡去。

往後看的人，容易產生歷史宿命論或絕對主義，也就是「一定會怎樣、必須怎樣」的傾向；在「一定」和「必須」之下，人難以跳出盒子思考。而往前看的人，容易產生演化的世界觀，腦子不容易固化，經常會問自己「Why Not」？

由於有主要外患中國的存在，使得台灣人習慣往後看，不習慣往前看。往後看的結果就是宿命論：一定統；或是絕對主義：必須獨。認為一定統的人，明顯的以中國為座標在思考自己的主體性，然而，認為必須獨的人卻沒意識到自己也是以中國為座標在思考自己的主體性。否則，從「哪兒」獨立出去啊？

統和獨，都脫離不了以中國為座標！若細細品味，人們當可發現，「統」和「獨」是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三黨，或紅藍綠三方，多年所培育出來的三方共同陽謀，目的都是為了保政權。台灣人民應該要有看穿這陽謀的能力和智慧，才能找到自發自生的主體性。

台灣擁有「實質主權」（de facto sovereignty），缺少的是源

自1648年西伐利亞協定（Westphalian Treaty）下的「法理主權」（de jure sovereignty）；今天地球上，若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脅迫，沒有一個政治實體否認台灣的獨立存在。這個現狀，我稱之為「無印良國」（A Nation at Large）。無印，也可做良國，就像任何一個存在的人，即使區公所受到脅迫而不給他發身分證，他依然可以做一個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人一樣。

台灣該往哪裡去？就是在演化論的心態下盡量往前看，把「無印良國」越做越好，一直等到那個脅迫區公所的惡人消失或改邪歸正為止。

台灣人得明白，中共不等於中國，道理正如國民黨不等於台灣、民進黨不等於台灣一樣。由於前述的地緣事實，未來一千年，無論台灣和中國的實質關係及法理關係如何，中國都不會從台灣身邊消失；中國人也必須明白，一個已經具有實質主權的台灣不會從它身邊消失。因此，台灣需要開發出一套中國人民聽得進去的台灣論述，而中國也需要開發一套台灣人民聽得進去的中國論述。

四、台灣怎麼去？

前文提到，中美對衝的格局，將在2022年前後定局，而台灣的前途也將在這大格局中定格。為什麼是2022年？其中的變數，不是美國，而是中國。美國決定遏止中國朝現在的路徑擴張、或遏止中共在中國的集權，已經是共和、民主兩黨甚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共識，已是板上釘釘，而中共高層尚未完全認知到這情況。

2022年是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年，從現在到那時，中共內部的鬥爭將越發激烈，而同時中國內部的經濟、社會高壓鍋將如山一般重。未來四年，中共的執政會朝法西斯前進，還是統治基礎水土流失甚至走山，無人可以預知。然路徑總不脫上述三個方向，雖然從歷史長河的視野看，三條路徑會不會最終經過折騰而邁向開放法治，同樣是未知數。

無論如何，2022年前後，中共會進入一種「拐點狀態」，而美國及西方會根據該拐點狀態做出定位，且十年、二十年的大格局就此定局。

要看清這格局，恐怕還需要一年至兩年的時間。在等待期間，台灣的最佳策略應該是以下的十二字箴言：不掉隊、不插隊、除內弊、固社區。不掉隊指的是對美國，不插隊指的是對中國，而除內弊則是無論結局如何，台灣都應該自己做的事。最後一項固社區，則是對中共拐點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土石流，台灣社區應該做的防災準備工作。

下文著重談「除內弊」，因為這是完全操之在我的部分；不做，台灣人只能賴自己，不能賴別人。

除什麼內弊？要細談，十張A4紙都列不完，但還是可歸約於前述的一個概念：卸載–對以下領域做出手術式的解構：政治的超載（大政府）、政客密度的超載、選舉制度的超載、財政負擔的超載、法治的超載、制式教育的超載、不當經濟政策的超載、既得利益肉桶的超載；最後，人口結構的超載。

落實到具體政策，以上領域的解構可以扼要敘述如下。短短四年的時間，做不到徹底，但做得到打好地基：

一、有關大政府的解構：合併縮減中央部會；全台行政區域縮編為三至五都；大幅調整財政劃撥比例、落實區域權責自治；從總統制朝內閣制移動；從中央統籌向邦聯精神移動；公務員終身制向約聘／續聘制移動。

二、有關政客密度的超載：中央部會由目前的二十七個縮減至十五個以下；行政級別由七級縮減至四級；除了關鍵公共服務，撤銷國營企事業；裁撤至少一半官方、半官方的周邊機構、基金、協會。

三、有關選舉制度的超載：消減或撤銷參選保證金；取消政黨

補助；取消各種民代補助金；取消行業或特殊身分的補助金（entitlement）；取消任何鼓勵兩極化的選區／投票制度。

四、有關財政負擔的超載：實施年度預算歸零起算制度；嚴格沒入各級政府、官方／半官方之小金庫。此範疇的節流，加上前述相關的節約，其金額足以大幅度緩和健保、年金、勞保、軍保，以及各種合理弱勢福利的壓力。

五、有關司法體制的超載：重新調整法、檢、調之間的公權力結構；縮減累訟、拖訟、纏訟的空間；改良當前如公務員升遷一般的法職升遷制度、注入實務經驗條件；必要時考慮將高階法官、檢察官納入人民選舉機制。

六、有關不當經濟政策的超載：啟用具有相關行業實務經驗資深者出任相關職務；以「權責相符、利益／風險對等」原則制定政務決策人之報酬；所有項目徹底實施陽光法條、日出條款以及落日條款。

七、有關既得利益肉桶的超載：縮減目前各級各種花樣的官派職位（據稱高達二萬個位置）一半以上；立法嚴限官方／半官方機構人員之兼職、多職。

八、有關制式教育的超載：降格教育部為教育行政署，僅負責行政、法務，將教學內容、方法、品質權力下放至一線單位（學校）以及教師；開放私立大學、學院，同時取消對私立學校補助；全國公私全科大學數量控制在二十家，其餘現在冠「大學」名稱者，改制為「專科、專所」，聚焦進攻高新尖技術或知識；大學修改為五年制（除非恢復徵兵制），其中一年為出國打工學分，國家提供適當補助，提升大學生的世界觀及謀生能力。

九、有關人口結構的超載：諸多原因如老齡化、低薪造成台灣

短期及長期的勞動人口結構問題；短期的缺工問題急需引入年輕勞動力，而長期需要謹慎補充新生代以調整結構，因此解決方案也得分長短。目前台灣實施的本勞外勞一體化、齊頭式的政策，本質上並未區分短期需要和長期目標，台灣的未來將為此短視付出無可逆轉的高昂代價。

從反面來看超載現象，就是不足；超載如同身體上的肥肉，肥肉過多，必吃掉肌肉的養分、消耗肌肉的支撐能量。因為超載，台灣被吃掉的肌肉包括：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內資外資的投資意願，人們看問題時的理性空間，政府決策的效力和效率，資源使用的合理成本，人民自我選擇的餘地。

2019–2022年關鍵四年中，在充分理解台灣的海洋地緣事實下，找到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在最大公約數的基礎上建立台灣的主體性，以不掉隊、不插隊原則應變外患，以手術式的魄力及決心打下堅實的除內弊基礎。

跳出框框：台灣主體性解析

台灣當下在地球上的政治困境可以形容如下：「世界」地位不斷上升，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一個國家，大概沒有其他國家不認可台灣是一個具有實質（de facto）自主權的政治實體；然而，台灣的「國際」法理（de jure）地位不斷下滑，因為自封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共的決心封殺。

台灣自己內部，幾十年來開發不出一套最大公約數的「台灣主體性論述」，原因有兩個：其一，社會大眾由於情緒，無法理性區分「世界地位」和「國際地位」這兩個層次，正如一個人無法區分自己的「人格」和「身分證」是兩種層次的議題，把「沒有身分證」和「沒有人格」混為一件事，以為一個無法取得身分證的人就等同失去人格。其二，搞政治的人明明清楚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議

題，但為了激化選票，故意把兩議題混為一談，上下其手，阻擋社會大眾的理性區隔能力。

如同上述，台灣是具有實質（de facto）自主權的政治實體，已經是「世界共識」。其之所以難以由「世界共識」進一步達到「國際」法理（de jure）下的共識，外部原因只有一個：中共的封殺。中共封殺台灣主體性的法理工具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事實上中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性是自己加封的，其合法性、合理性在境內都受到絕大的挑戰，這由境內不斷出現對其一黨專政的挑戰可得到證明。同樣的，國際上包括台灣在內，所有對「中國」的質疑，都不是基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性的挑戰，而都來自對中共一黨專政合法性的質疑。

因此，一定要分辨清楚的一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法理（de jure）存在，而「中共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現象只是實質（de facto）存在。中共想要消滅台灣的主體性這件事，不過是一個實質（de facto）存在的一黨專政下的政黨企圖強權消滅一個法理（de facto）存在的民主政府的現象罷了。這是事態的本質。

由於雙邊都使用方塊字，中共試圖用方塊字下的語境混淆特性，對台灣做統戰；諸如「一個中國」、「一國兩制」都是這種語境統戰下的產物。台灣社會由於在方塊字語意學能力的日漸低落，也由於對國際通用的英文的能力不足，很輕易就落入這種語境統戰的陷阱，也因而陷入了「統獨二分法」，從概念上無法跳出框框，形成長期隨之起舞下的自殘。

語境統戰最核心的兩個例子是「中國人」和「民族」，解析如下。若問生活在台灣社會的人「你是不是中國人」，相當一部分人會說「是」或「也是」。但是，如果問「你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或「你是不是被自封代表中國的中共統治下的人」，答案一定是百分之百的「不是」。因此，在台灣唯二具有真實意義的民調或公投問題應該是：一、「你願不願意成為被中共政權統治的人」。二、「你願不願意自己和家人為台灣作戰」。其他問法都是扯淡。

民族（nation）不是種族（race），包括1909年梁啟超等人發明的「中華民族」這個概念都不是種族概念。民族只是一個願意生活在一起的團體，可以跨種族、血緣、文化，加上一套憲政，就成為一個現代國家（country），再若得到國際的法理承認，就成為一個法理國（state）。因為方塊字下，nation、country、state　都翻譯為「國家」，因而統戰者和政客就有了攪渾概念、張飛打岳飛的空間。

現況下，台灣自稱為「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但即使熱愛「中華民國」的人，當被問到「是否代表China」時，多數也會說「NO」。看到方塊字和英文語意之間的矛盾了嗎？「中華民國台灣」這個詞，只是糊弄自己人罷了，因為它的英文是「Republic of China, Taiwan」，在國際上的作用正好相反。

台灣在世界上的主體性是結結實實、不折不扣的，但國際現實下，台灣，名「中華民國」（ROC），字「台澎金馬關稅領域」（TPKM）或「中華台北」（CT），號「台灣」（Taiwan）。因時因地因事，哪個好用，拿來用就是了，別上語境統戰和政客糊弄的當了。不客氣的說，中共糊弄台灣主體性議題以保一黨專政，而民進黨／國民黨用中共議題保選票，所謂的「兩岸關係」本質是兩邊政黨的權力寄生關係，互為保生大帝的關係。正在朝公民國家邁進的台灣，別因亂槍聲而跑偏軌道了。

台灣主體性的根基：
平民三精神＋頑逗主義

人要懂得歷史，但是人不能作歷史的奴隸。當思維方式、情緒狀態落入了爸爸所給的「經驗傳承」時，一個人就變成了半個廢人，哪怕他最後的「社會成就」再高，從「人」的標準來看，他還是半個廢人，因為他沒有實現作為一個「人」的天然潛力。

如此說來，古往今來地球上的多數人都至少是半個廢人，何以如此苛責台灣？道理其實很簡單：在今天台灣的處境下，台灣人沒

有資格作廢人，半個廢人也沒資格。沒資格的理由不用多說，我想你知道。

關於台灣未來的討論，必須回歸素樸、自然的人性，這可能是台灣找到主體性的唯一出路。事實上，今天在世界上，越來越多人開始要求他們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政客，用一種回歸素樸自然的思維來面對普通人。在這方面，台灣其實領先世界，但台灣人還不懂得珍惜，而自我放棄了他們在下一波文明中的優勢。

人類今天已經知道，真正的動能都來自原生精神；任何還能稱得上是「原生」的事物，都是最寶貴的資產。全球化時代，整個世界交叉影響，邊際越來越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種跨文化的概念也相繼形成，如在政治領域被視為「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等等。

但是，讓我們天真地問一個哲學問題：民主自由是從哪裡來的？它們的根是什麼？

電影《超人》中，女孩從樓頂摔下，超人飛起來一把撐住她，說：不要怕，有我撐著你。女孩往下一看，離地面還有一大段距離，驚悚的問：你撐住我？那誰在撐著你啊？民主自由等先進概念，就像超人，目前撐著許多國家，但是，什麼東西在撐著民主自由呢？

若拿這問題追問每一個民主國家，得到的答案可能不一樣。美國人可能說，我們的移民本質撐著它；而日本人可能說，我們的民主自由是麥克阿瑟將軍撐起來的。

那麼，台灣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民主自由，是靠的什麼撐起來的？總不會是靠國民黨吧？他們是被迫交出政權的；也總不會是孔孟儒家吧？如果它們撐得起民主，中國兩千年來不至於如此；靠的是美國？當然美國有示範作用，但是不屑於美國示範的國家多了去了，中國就是一個，歐洲民主國家也未必完全看得起美國式的民主。

很多人把台灣的民主歸功於當年的黨外人士或民進黨，這當然是正論，但是，黨外人士靠的還是成百萬的普通人民。就像《超人》電影中的女孩，我們可以追問，人民撐著你，但什麼在撐著人民？

如果我們回答說，是民主自由的理念在撐著人民，那就落入了邏輯上所稱的「自我循環論證」，用一個結果來充作論證的前提，其實是沒有解答。

撐著台灣走上民主自由的底層動力是什麼？搞清楚了這問題，我們也許就不必為台灣眼下的種種民主亂象而過度悲哀；只要原動力還在，只要年輕一代沒喪失這原動力，台灣的民主就會走下去。而且，台灣未來的民主之路也不必然走上美國模式或歐洲模式。

在提及台灣經驗前，還是要回顧下泛中華經驗，才知道自己的資產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史學家幾乎有個共識：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之下，西方的民主無法在中國生根。他們的論證可以歸納為兩點：其一，中國沒有強大的一神宗教，因而沒有一種超乎人世的準則；不像美國憲法或許多歐洲國家憲法，主導精神都是「以上帝為準」。在中國人的理解之中，所謂「憲法」僅僅是人世間的契約，既然只是人與人的契約，那麼強者就可以強行用契約來約束或欺負弱者，而弱者也必須遵守自己當時所默認的契約。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當中，就公然出現「共產黨領導」字樣，這等於是共產黨和中國十三億人的一紙契約，共產黨領導也就這樣合法化了。同份憲法中，「民主」一詞出現多次，但那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然而，在這種對憲法及民主的理解方式下，一百年前由滿清君主立憲就可以了，何苦浪費了百年又繞回原點？其二，西方民主在中國無法生根的說法是西方現代憲法起源自新興資產階級對王權、君權、神權的抗爭，是一種由下向上的約束，而不是由上至下

的約束。但中國傳統中對「法」的概念，卻完全是由上至下的約束，即使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說的不過是王子也必須遵守王法的約束；法，在中國從來就不是一種人民自發性的約束上位者濫權的力量。

這兩種對泛中華傳統的說法，一直要到了出現台灣經驗，才破了功。台灣的民主動力，既不來自超越人世的神旨標準，甚至連類似「天道」的概念都未介入，也不產生自新興資產階級的抗爭，事實上台灣的資產階級一直是股保守力量而不是變革力量，誰當政他們都企求穩定而向當政者靠攏。

台灣的民主，是一群不服氣的知識人結合底層人群而推動起來的。今天資產階級所詬病的「民粹」，其實也是這股底層力量的持續表現。台灣經驗，在泛中華傳統下是個異數。

既不來自天道神旨，又不來自新興資產階級，那麼支撐著台灣民主方向的神祕動能又是什麼呢？ 我一直在找答案，也做了些許拋磚引玉的分析。在《台灣是誰的？》這本書中，我曾經稱之為「X動力」，那時我還看不清楚，只能用未知的X來稱呼它。隨後，在《中國是誰的？》一書中，我提出了「平民三精神」為台灣現象的根本。在這裡，我進一步提出一個概念，那就是台灣人特有的「頑逗主義」。

平民精神，加上頑逗主義，在我的猜測下，就是台灣的X動力。台灣的順境或逆境，都有它的身影；讓順境更加順暢的，是它，讓逆境更加倒楣的，也是它。認清了它，就知道何時應該節制它，何時應該放縱它，台灣就能以最適當的速度演化自己，以最佳的節拍聯結世界。

這種自覺及體認，有點像武學中的氣功；體內單單有氣沒有用，必須能夠自我控制氣的流轉及節奏，才能健體，否則就會自傷其身。運動員的呼吸，打坐者的調息，瑜珈術的吐納，都是這個道理。平民精神、頑逗主義，這是台灣體內原生的兩股氣。掌握並有

節奏的善用它們，台灣就有了存在於世界的主體性，繼而運道蒸蒸日上；任意放縱它，台灣就會陰陽不調，找不到自己。

平民，就是普通人，普通的人。普通，不是平庸的意思，而是大家都具有的意思。因此，平民精神也就是普通人的精神；一個社會中，作為一個個人，大家都認可，不必辯論、不必解釋的共通精神。

但是平民精神在這個地球上並不普通。有些文化的主流是菁英精神，也就是菁英應該領導平民；有些文化講究的是權貴精神，也就是有權有勢者凌駕於平民之上；還有一種文化是原旨教義精神，不信原旨的就不是人；更有一類文化是贏家通吃的精神，誰贏誰全拿。正是因為平民精神在這個地球上還不普通，台灣的存在才顯得可敬和可愛，台灣的主體性就在這裡。

台灣的平民精神有三個要素。我們也可以用一些華麗甚至高深莫測的詞藻來形容這三個要素，例如「堅強」、「性善」、「勇敢」等等。但我寧可用普通人都懂得的語言來描述它。通俗的說，這三個要素就是：一、誰怕誰？二、人不能欺負人。三、永遠不完全信任權威。

讓我們體會一下，這是不是台灣人，不論政治立場、教育程度或社會地位，都接受的做人、生活原則？縱然有少數持異議者，也不會在公開場合否認這三點。

有人會問，那又怎樣？ 憑著這三點再普通不過的原則，台灣就能建立自己的主體性？甚至有人會說，如果不能先建國，這三點又有何用？

這裡必須再次強調：這三點在台灣看似再普通不過的人生態度，在這個地球上並不普通！如果你去過中國、遊過中東、看過非洲、認識中南美洲、見識過歐美與印度的貴族世家，你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學者也可能批評說，主體性何其偉大嚴肅的一個議題，豈能用

市井語言來詮釋？他們會引用人類文明、國際政治之類的術語、架構來分析，來佐證台灣的主體性很難建立。致力於台灣民主化的人士或許也會說：自由、民主、法治才是台灣主體性的根基。

這裡又不得不進一步說明，既然談的是「平民精神」，總得讓平民聽得懂、意會得明白。讓我們深深體會一下，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法治」，其人性根基是不是－一、誰怕誰。二、人不能欺負人。三、永遠不完全信任權威－根植於這三點？今天，西方很多國家的「民主」體系出現諸多問題，是不是就因為它們相對缺少這平民三精神的支撐，以至於在不信上帝、資產階級腐化後，「民主」就失去其支撐點了？

事實上，是先有普通人能夠聽得懂的語言，然後才是被深奧化、變得修辭華麗。當年在雅典廣場上，難道演說者用的是抽象語言？反之，今天的集權國家中，權貴者用的語詞難道不是「自由民主法治」？話說到頭，今天發生在台灣的種種惡行惡狀，難道不是在利用「自由民主法治」的抽象語言混淆視聽？

我們達到一個結論：人類必須回歸自然的人性狀態，失去了與自己自然人性聯繫的人，不可能引領人類到下一個文明高地。而台灣，需要保持它的素樸平民精神，否則台灣將被拖入抽象概念的泥沼。

其後果則是：輕則拖累台灣的文明進程，重則被善用抽象概念的國家操弄致死，例如中國或美國。

台灣的歷史是一部無奈史，想要當家作主而不可得。先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再來就是老國民黨的黨國主義，現在是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無奈之下，平民精神的誰怕誰、人不能欺負人、不完全信任權威三元素，長出了一個副產品：頑固的和你鬥，打不過就跑。這個心理階段，可以稱之為「頑鬥主義」。近三十年來，由於政治確實有了進步，「鬥」的成分猶在，但是越來越多的是「逗」的成分，形成了一種台灣特有的幽默，鬥中有逗，逗中有鬥。這新態勢，可稱之為「頑逗主義」。

例如許多外人不解的台灣現象，諸如電視名嘴肆無忌憚、立法院男女扭打，打完又一同喝酒吃飯、女總統候選人打扮成羅賓漢、男總統候選人扮財神等等，其實這些只是台灣鬥中有逗、逗中有鬥的頑逗主義的表現罷了。一位高官曾經玩笑說：你們不要抱怨繳稅，其實你們交的稅都是娛樂稅，回報是很高的。這話某種程度上指明了這一點。

頑逗，在台灣是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電視中的綜藝節目不用說了，連新聞報導都將頑逗進行到底；政治人物的說話，地方的民俗慶典，無不充滿了頑逗精神；年輕人的Kuso行動，也把頑逗發揮到極致。

不論是過去的頑鬥，還是現在的頑逗，它都是台灣人消遣別人、消費自己的主要生活方式。因為「誰怕誰」，所以跟你鬥；但因為「人不能欺負人」，所以轉鬥為逗；因為「永遠不完全信任權威」，所以要日以繼夜的頑幹。上至總統，下至販夫，在台灣若不頑逗就不易生存，就找不到存在感。

台灣的頑逗主義是把雙面刃，它可以讓台灣進步，也可以讓台灣陷入僵局。在過去，它發揮了推動進步的作用，但站在今天來看，它似乎越來越讓社會陷入僵局。每到了選舉，鬥的成分就壓過逗，選後再平息為逗，如此周而復始。

頑逗主義，有人視為粗俗，也有人視為沉淪，但多數的台灣人樂此不疲。這讓我想起了電影《莫札特傳》（*Amadeus*）中的情節：莫札特的本性極為粗俗，滿口淫穢，好與販夫走卒為伍，但他腦中生出的音樂卻是天籟，好像上帝選擇了一個極為粗俗的軀殼來發聲。我隱隱感覺到，台灣，有可能就是某種莫札特，頑逗主義就是它的軀殼，但是裡面可能提鍊出某種天籟。或許老一代也就如此粗俗到底，但是新的一代有可能從頑逗主義的粗俗中提煉出一種東西。

當然，這只是一種臆測，或許新的一代已經感覺到自己身上有

某種東西要出竅。這個疑問，只有新一代的人能夠回答。

總而言之，從頑鬥到頑逗，台灣的平民精神已經向前昇華了一大步，倘若不幸，日後又由頑逗退化為頑鬥，那將是台灣的災難。新的一代，今天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方向盤在你們手中。

一個台灣，三種座標

台灣目前是個分裂社會。舉凡統獨、兩岸、主權等重大對外議題，一直到藍綠、經濟、能源、教育、兵制等內部議題，不但全部沒有共識，連如何達到共識的機制都沒有。台灣，迷航了。

台灣社會中真實存在著三種座標，不同人用不同的座標導航，分裂是必然的，迷航也是必然的。這三個座標，分別是：以台灣為座標、以中國為座標、以世界為座標。同一件事情、同一個現象，在不同座標下會導引出截然不同的目標和論證。在這三種座標較勁之下，不論哪個黨執政，不論誰當總統，不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台灣都會陷在死循環中。因此，台灣的出路只有兩條：某座標強力勝出，壓倒其他，或者，創造協商機制，找出三座標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向前行。

美國、中國、日本社會中也都有多重座標的現象，但是人家是大國，其人口、地理、資源、經濟體量都還經得起折騰。小國家若長期處於多重座標下，結果只能是找死。台灣在地球上會永遠存在，但是存在的方式，將因那三種座標何者勝出或是否能找到最大公約數，而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簡而言之，座標代表的是願景。在第一種座標下，日後的台灣類似一個「亞洲第一村」或「海洋中的不丹」，去中國化持續進行，教科書完整反應台灣的真實歷史與磨難，種種本土文化不斷精緻化，社會公義、幫助弱小成為至高無上的台灣價值，和諧及綠色幸福成為主流中的主流，經濟的絕對成長論者成為社會中的政治不正確流派。

但由於長期疏離亞洲的地緣政治，加上抗拒與中國為鄰的地緣經濟，總體GDP的世界排名將由2014年的世界十七名、人均GDP三十八名往後滑落，但是內需市場經濟比例大幅提升，旅遊收入比例也大幅提升，台灣成為全球華人的幸福生活指標，國際媒體則可能定位台灣為「區域的綠色慢生活以及吃喝玩樂中心」。

想要達成第一種座標下的台灣，也必須付出深沉的代價；台灣必須讓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入美、日的安保系統，心甘情願的充任美日的戰略棋子，每當關鍵時刻便擺出乞憐的姿態。並且，萬一中美日三方之間在東海、南海出現武力行為，美日兩國基於「不能傷到本國青年」的國內政治壓力，至少在初期會採取「出錢出力不出人」的立場，在「大哥坐鎮、小弟先行」的原則之下，強押台灣打頭陣。

第二種座標下，台灣承認與中國為鄰的事實，一部分人心甘情願、一部分人不甘不願的進入中國經濟勢力圈，就像墨西哥、加拿大接受百分之七十經濟依賴美國一樣。台灣的國際地位，不知不覺的從目前的「美中共治」向「中美共治」傾斜。台灣人逐步喪失方方面面的自主性，就像一條小河與長江產生接口之後，勢必受到長江水漲水落的影響，長江氾濫，小河淹水，長江枯竭，小河無水；各種生態也將產生變化，大小的魚蝦鱉交互繁殖，但浮游生物依舊處於食物鏈的最下端。

前面這兩種座標，雖然在選票市場上，第一種的力量遠大於第二種。然而，在現實的利益市場上，卻可說是勢均力敵。許多嘴巴高唱第一種座標的人，其實內心深處並不完全排斥第二種座標，甚至在行為上早已悄悄的進入第二種座標。

第三種，也就是以世界為座標的願景，目前在台灣是被前兩種壓制的，理由很簡單，大家認為不可能。比如很多人認為中國不可能讓台灣世界化，很多人認為台灣社會的素質還攀不上「世界」這個座標。然而，在人心深處，誰不希望台灣在地球上走路帶著風

呢？

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掙脫不了前兩種座標，以世界為座標是沒有喘息空間的。眼下，胸懷世界的各方人士，只能在角落裡生存。有時，在一家小店、一個小舞蹈社、一家小企業、一個不知名藝術家的身上，我們才能看到以世界為座標的蛛絲馬跡。在政治界，可以說是免談；包括新世代，只要沾到權名利，很容易就被捲入前兩種座標。

眼下，美國在「重返亞太」的全球戰略下，正半勾引半強制的驅使台灣走向第一種座標，而中國正在通過「經濟內政化」策略，逼使台灣走上第二種座標。台灣享受「一台三標」的時間不多了，長則十年，短則五年，台灣人必須做出選擇，或者被迫選擇。至於是否可能在三種座標之間找到最大公約數，我個人認為是完全可能的，現在還來得及，重點是得要有機制。開玩笑的說，與其舉辦所謂的「國是會議」，不如舉辦「國非會議」，也就是用排除法來找到最大公約數。有的時候，減法比加法更有用。在願景這件事上，台灣已經遠遠超載了，應該到了卸載的時刻了。一隻駱駝，背著三副重擔，稻草也能壓垮牠。

台灣三論：歷史論、宿命論、演化論

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史觀是「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簡言之，典範就是一套自我邏輯連貫的概念框架，當一個框架無能解釋現實或者無法容納其他典範的時候，就會產生危機，經過激烈的辯證，典範之間就會產生轉移。

面對台灣的前途，目前社會上存在三種型態的典範，並已激烈交鋒；多數人稱呼自己的看法為「理念」，別人的看法則為「情緒」、「頑固」或「異端」。這很自然，因為在邏輯層次上，三種典範的內部邏輯都各自成理。三者我分別稱為歷史論、宿命論，及演化論。但名稱不重要，你也可以替它們取不同的名字，重要的是

三者在本質上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反映出來的是不同價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人格特質。

首先談談歷史論，這個典範的基本命題是：台灣的未來定位，不能脫離歷史事件及經驗。因此，要為台灣的未來定位，必須了解原住民史、大航海時代的荷蘭、西班牙、葡萄牙來台史、鄭氏王朝史、康熙收服台灣史、日本在台殖民史、美軍轟炸台灣史、國民黨敗退台灣史、二戰後國際論述台灣的身分史、國民黨統治台灣史、黨外及民進黨抗爭史、台灣經濟（當年）發達史等等。課綱調整事件中，各方所依據的道理，其實都出自於歷史論的本質。

宿命論思維典範的基本命題則是：台灣距離中國大陸塊不到二百公里是地緣事實，四百年來，文化、經濟上（除了日本殖民時代）都被中國的勢力氣場籠罩，至於台灣經濟高速發展的三十年，則是中國鎖國期提供的運氣，屬於歷史的「異態」，今天遭受到中國的強大政治、經濟壓力，只是回歸歷史常態。因此台灣遲早會被中國以某種嚴厲或者寬鬆的形式統一。此種邏輯把台灣的未來方向視為一種宿命，中研院社會所三個月前所做民調中也凸顯出宿命論的弔詭：百分之四十六點四人選擇「獨立」，但百分之四十九點七人預期未來被統一，而希望獨立的百分之四十六點四人群中，竟然有百分之三十七認為將來「會被統一」。

第三種看台灣未來的方式，也就是演化論，其實還不能被稱為一種「典範」，因為多數台灣人還沒有勇氣、信心和見識來思考「歷史論」、「宿命論」之外的可能性。這種連思考都不敢的狀態，凸顯了台灣已經落後於世界多遠，也間接證明了台灣社會，包括那些百分之四十六點四贊成「獨立」的人，其實在「典範思維」上還是非常中國的。因為，中國兩千年來的主流典範就是「歷史論」或「宿命論」。今天，「自古以來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論者，所依據的邏輯就是歷史論和宿命論。

演化論的核心命題就是：世間事物不論大小，都在不斷的演化（包括進化和退化），只是時間上的快慢罷了。從猿猴到人類，可

能需要一億年，國家主權觀念從誕生到被質疑，也花了四百年，但社會媒體（social media）改變全球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卻只需要十年。過去，人在演化過程中是被動的，但今天，人已經可以是演化的主要推手（agent）。

若從演化論來看台灣的未來，台灣大可以教育每個人都成為某種改變現狀的推手，小至烤出讓世界驚豔的蛋糕麵包，大至改變台灣在地球上的地位，只要台灣能夠刺激出典範轉移。

在歷史論和宿命論之下，不可能有歐盟，也不可能有互聯網。我們可以說，如果人類嚴格的受限於歷史論和宿命論，我們今天可能還在部落式的生活狀態下；所有的改革者和創新者，從鄧小平到賈伯斯，都不是歷史論和宿命論的信徒。

面對吧！從過去的「反攻大陸」、「亞細亞的孤兒」、「龍的傳人」、「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民進黨執政對台灣是災難」，到今天的藍綠各種選舉悲情，都擺脫不了歷史論和宿命論的基調。

「自己的台灣自己救」，這句話如果有任何真實的意義，只能來自於一場典範轉移，由歷史思維、宿命思維，轉移至演化思維。道理其實滿簡單的，因為整個世界的典範已經在朝向演化思維快速轉移中，台灣還在歷史論和宿命論中繞不出來，遜斃了啦。

課綱豈止該微調，應該花十年徹底大調

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先生曾經做過這樣一段表示（大意如此）：過去的中國人寫的中國歷史，都是民族史，都是自己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而我致力於從世界史的架構來撰寫中國史。

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卻足以撕開人的眼罩：原來，「中國」這個地方的人是那麼的自我中心；自戀是「我」，自憐也是「我」，只有傾軋或仇恨時才有「它」（參照許先生畢生力作《我者與他者》）。

這篇文章想談的其實不是中國，而是台灣。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微調」，在2015年產生如此爭議，在政治鬥爭的鏡花水月之下，鬧的其實是個「我是誰」的問題。一旦問「我是誰」，自然有個「它」；「它」不是「我」，它要強加於我，那就有我沒它。

走一趟歐洲，就知道台灣有多麼的中國；藍的中國，綠的也中國，大概只有原住民和東南亞新移民不中國。歐洲歷史上的戰爭和屠殺，比起中國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哪個「民族」或「國家」沒有殺戮過其他民族或國家？但是文明進展到這一步了，現在的主流意識是「公民社會」；社會的治理和秩序，大家都有意識的「歷史歸歷史，現在歸現在」。歷史部分公開透明，還有餘續的，有肩膀的男子漢（或鐵娘子）出來真心道個歉，仇恨放不下的，依法律程序處理。至於「現在」的部分，對不起，大家的公民權一致，管你爸來自海洋或阿爾卑斯山，血緣是湖南還是日本。

歐洲今天的體制，只允許「公民社會內部矛盾」，而不容許「敵我矛盾」。這並不是說，今天的歐洲不存在「敵我矛盾」，而是其體制、法律、普遍公民素質，都可以起到煞車的作用。隔著半個地球的中國，至今還在用「敵我矛盾」治理國家。現在眼看著威權之後，本來有希望走上公民社會的台灣，竟然無能擺脫自戀、自憐、有我無它的狹隘「民族式」史觀；所謂的「台灣意識」竟然只是「中國座標」和「日本座標」之間的糾纏，「從本土歷史看國民黨」和「從國民黨歷史看台灣」之間的敵我鬥爭。您說，在思維水平上，台灣是不是很中國？

高中歷史教科書的課綱應該跳到世界史的高度，徹底的大調整。而現在的課綱，連亞洲史的高度都沒有；在台灣島上的教育部，從第一天到今天，都還是某種「自我中心意識形態宣傳部」，誰執政誰提供史觀的原始部落。

台灣青年，已經進入世代翻轉，不幸的是，他們沒有機會嵌入世界青年世代的翻轉動力，而是陷入了自憐、自戀、有我沒它的

「類中國傳統」模式。此點不破，台灣沒可能進化到公民社會，不過是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戰爭罷了。換政府，就是換部落長老。學術界、企業界，紛紛圍繞著長老政客打轉，被犧牲的是整整下個世代。

台灣陷入目前狀況，自然有其地緣因素；倘若不是地緣，無甚資源的蕞爾小島，西班牙人、荷蘭人不會建寨，康熙不會攻它，日本人不會來，國民黨不會來，今天美國人也不會關心它；幾十萬人要獨立，早就獨立了。那時，哪有什麼課綱問題，大榕樹底下說說書、講講古就可以了。

既然地緣因素在過去決定了台灣的命運，台灣就是當今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台灣雖小，但是完全有資格、有必要從世界史的高度來了解自己、評價自己。但是，今天的台灣人膽子太小了，小到了只敢想台灣，不敢想世界，幾乎到了「村子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的地步。此時此刻，台灣的歷史「教科書」，應該徹底擺脫「民族史」（不管哪個「民族」），以「地緣史」替代。從世界的互動歷史來培養從小學開始的孩子，中學生、高中生就更不用說了。雖然不能和歐洲的數千年地緣歷史比較，但以荷蘭人1624年建寨起算，台灣這個海島近四百年來「被參與」世界的歷史也很豐富了，何況還有先民和南半球之間互動的史蹟。

「官定課綱」這玩意到今天還能生存，抱歉，這是歷史學界的恥辱。而歷史考試只能有一種正確答案，更是全體社會的恥辱。其實，只要出現十本真正能「跳出台灣看台灣」、具有世界史觀的台灣史大作，有沒有課綱也就無所謂了，或者說，具有共識的課綱也就會自然而然的產生了。十年之內，不知道台灣的史學教授、老師，有沒有能力及膽識辦到？

台灣必須突破的「地緣宿命論」

台灣新世代當下的主流傾向是「本島思維」，一種「只要島內萬眾一心、什麼敵人都不怕」的迷魂信仰，本質上類似中國大陸五

十年代的「大躍進」思潮，那時中國人相信的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中年及老年一代，不分政治顏色，雖然知道單靠「本島思維」行不通，但是頂多也就從「地緣思維」來思考台灣前途。循著地緣的邏輯思考，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陷入了一種深沉的宿命感，覺得台灣身為緊貼著中國大陸的一介孤島，再「自強」也難脫地緣的命運。身居社會棟樑的中老世代，即使贊成「台獨」者，大多數其實都已經做了「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裡」的兩手準備，或則家人已經「做出移民和脫產的動作」，或則已悄悄在中國大陸投資，還沒行動者，內心也在盤算。

當然，還有為數不少的人，不分世代，目前的價值是堅守本土，堅拒與中國大陸交往，也沒打算出國避難。然而，除了堅守陣地、說NO之外，他們其實也沒有突破「地緣宿命」的動力，頂多只是相信當中共出現犯台意圖時，美國及日本會出面阻止或調停。但即使如此，之後呢？他們的思維中沒有「之後」，逼問到牆角，他們的答案是「維持現狀」。

台灣人陷在「本島思維」、「地緣思維」、「現狀思維」中，原地打轉（還有打架）久矣！因此，台灣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喪失了從「人類」的高度和「地球」的尺度，來思索、定位自己。世界觀越來越萎縮，直至落入「村落化」的深淵。

別誤會了，「地緣思維」還是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中的基礎要素。政治上，二十世紀以來的主流就是「地緣決定論」，烏克蘭多難，是因為它與俄國接壤，越南內心緊張，是因為它緊鄰中國。美國為何最終決定繼續支持台灣島上的蔣介石？因為蘇聯史達林下令毛澤東「抗美援朝」，因而美國意識到台灣島的地緣重要性。

國際經濟上，雖然已經有了全球物流運輸系統，但是地緣依然主宰經濟。與美國接壤的加拿大、墨西哥，對美國的經濟依賴度都超過了百分之七十，而墨西哥的人口是台灣的六倍，土地是六十倍，加拿大的人口是台灣的一點五倍，土地是三百倍，連它們都擺

脫不了「地緣引力」。並且，今天世界上的各種經濟結盟，如歐盟、東協、RCEP，都是地緣思維下的產物。

政治地緣上，台灣落入美中對峙的所謂「第一島鏈」內，經濟地緣上，台灣離開中國大陸的沿海發達地區不過二百公里，而中國的人口是台灣的六十倍，土地是三百倍。

世事如此，很明顯的，「本島思維」和「維持現狀思維」絕對抵擋不住來自中國大陸塊的地緣引力。這與什麼主義、什麼政治立場、什麼普世價值無關，就如蘋果往下掉和牛頓的政治信仰無關一樣。

既然這樣，為什麼瀰漫台灣中老世代的「地緣宿命論」還需要被拿出來檢視呢？這是因為，雖然「地緣論」主宰了人類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但是世界上已經悄然興起一股「打破地緣」的力量，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層面上。此處打一比喻：互聯網興起後，請問「地緣」為何物？「國界」為何物？「主權」為何物？「國家」的概念有無改變？　Google如果關閉十天，其後果將比美「國」政府關閉十天還要嚴重；Line 如果關閉十天，柯文哲就無法施政。如果你說Google、Line都是強國的產物，那麼你如何解釋愛沙尼亞（Estonia）冒出一個 Skype公司，它是個百分之百座落於俄國地緣圈、人口一千三百萬，土地只比台灣大一點點的地方。

台灣經濟固然受到「中國地緣」的強烈影響，但是，Uber 對台灣交通經濟的衝擊，和「地緣」有任何關係嗎？韓國大叔的「騎馬舞」狂掃全球，是個「地緣」現象嗎？台積電這個公司發生在台灣，是「地緣」的結果嗎？

台灣中老世代的「地緣宿命」心態，正是台灣二十年來政治、經濟、文化走不出去的最大原因；什麼困難都長嘆一聲的賴到「地緣」上，無視於世界潮流，害怕改變，不思進取。這純屬心理問題。

強大的地心引力使蘋果往下掉，萬年來都如此，然而有進取心、有創意、鍥而不捨的工程師還是能做出火箭，擺脫「地心引力

宿命論」。人類的「突破地緣」的列車已經啟動了，能否在意識上、技能上，搶搭上這股力量的頭班車，可能是台灣唯一的自我救贖方式。

台灣的選擇：地緣悲情之子，還是領先東亞轉大人

寫作六年，這可能是其中最嚴肅的一個議題，但容我輕鬆開場，先「做出一個吸引眼球的動作」，從三個歷史穿越劇的場景開始。

第一個歷史穿越場景。近兩年網上出現一個笑問，而那肯定出自台灣年輕人的創意；該則網上瘋傳的笑話，首先例數今日荷蘭社會的經濟發達、福利豐厚、低工時，然後最後一句問到：當年鄭成功為什麼要把荷蘭人趕跑啊？

感到好玩，我也將此無奈的黑色幽默轉傳諸友，多皆哈哈，只有一位學識豐富的老友冷冷的回了一句：如果荷蘭人沒走，台灣就會是印尼。

的確，再細推敲，如果荷蘭人當年再實質佔領台灣三百年，台灣勢必印尼化，甚至成為印尼國在東海的「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一個五倍大的峇里島，至於我本人，肯定不會被生出來，這篇文章的讀者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恐怕也不會在世。

第二個歷史穿越場景。二戰後，若台灣被規劃為日本國所屬一部分，台灣將怎樣？依常理推，台灣會成為一個三十倍大的沖繩，主要經濟來源為農林漁，人民抗議的對象主要是美國駐軍，但蓮舫更可能成為日本首相。

第三個歷史穿越場景。1950年，毛澤東集結六十萬部隊，即將發動渡海佔領台灣，但在最後一刻，爆出朝鮮金日成統一半島的南侵戰爭，俄國史達林強令毛澤東中止侵台，將已經部署好的侵台部隊調往朝鮮「抗美援朝」。史達林出手這招，達到了一石二鳥之目

的一制止了美軍打到鴨綠江，同時保存了共產國際多年來培養的兩個相爭義子中敗落的一方：國民黨，以創造中國繼續分裂的局面，牽制越來越不聽話的勝方義子：共產黨。

如果沒有金日成和史達林，台灣今天會怎樣？合理的推斷，大概和今天的海南島差不多，成為內地人的旅遊聖地和東北人的退休天堂，也是中國的東海潛艇基地，而在那之前，三反、五反、人為大饑荒、文化大革命會先讓今天還活在台灣的人至少一半沒有存活的機會。台灣，會成為冒險家惡搞的樂園，馬雲現象一定還是發生在杭州，而不會在台北。

穿越了歷史三次之後，讓我們回到鐵一般堅硬的大現實。台灣，一直到今天，就是一個地緣的產物，它位於東海、南海要衝，又距離中國大陸塊不到兩百公里，台灣海峽平均水深五十米；未來一千年，台灣島都不會向東南西北移動。西半球的荷蘭人、葡萄牙人來台灣，為了地緣；日本要台灣，也是為了地緣；國民黨敗退台灣，因為地緣；韓戰後美國重新重視台灣，因為地緣；今天中國不放過台灣，還是地緣。

地緣，是台灣一切悲情的來源。然而銅板有兩面，韓戰之後，由於美國在地緣考慮下將台灣納入保護傘，國民黨治下的台灣得到依賴地緣向國際發展經貿的機會，也得到了台灣人向世界移民擴散的機會，因而地緣也是台灣一度成功的基礎。然後，美國走向聯中制俄，地緣再度成為台灣的噩夢，一直到今天。

這幾年發生在台灣的歷史課綱之爭，在我看來有些瞎鬧，無論是贊成中國史觀、日本史觀、西方史觀、台灣本土史觀，那都只是基於片面不完整的恩怨情仇。台灣倘若一定要有官定的歷史教科書，只有一種史觀是客觀的，那就是：地緣史觀。

未來百年、千年的台灣，無論是被中共武力統一，或是事實獨立、法理獨立，都不可能地緣獨立。然而同樣肯定的，在已經存在的過去四百年因地緣而起的歷史經驗下，即使未來台灣被中共武力統一，台灣對事實獨立、法理獨立的追求，也不可能消停。中共若

愚蠢到發動武力攻台，那就等於是在已經解決不了的北部新疆、西北西藏難題上，主動再為自己添加一個東南方向的高壓鍋。

對台灣地緣這話題，暫且打住，讓我們從東北亞中地緣、亞洲大地緣來看看未來。中國目前的領土橫跨東北亞，中亞和南亞，它的體積所帶來的地緣戰略，注定了台灣本身其實只是其中的一小點，並沒那麼重要；今天台灣具有超出其位置、面積的地緣意義，只是因為台灣被植入了東北亞的中地緣環鏈。

打個通俗易懂的比方，就像一家大公司，兩派各持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於是僅僅持有百分之二股份的那一方，就成為了必爭之地的關鍵少數。這兩派，當然就是中國一派，美日南韓為一派；三十年來，台灣都扮演百分之二的一方，但自2017年開始，台灣的百分之二地位已逐步被另一方侵蝕，那就是已經證明具有核子投射能力的朝鮮（北韓）。未來半年至兩年之間，視美中朝三邊關係的變化，台灣的地緣戰略佔股比例也有可能會因朝鮮而趨零。

台灣的戰略地位若因朝鮮而趨零，其實並不見得一定是壞事。相反的，如果台灣的戰略地位不斷被提升，而誘使了中共用武力併吞了台灣，其後想要武力封鎖台灣、軍事攻擊台灣的就會變成美國和日本了。因而，在東北亞的中地緣內，台灣的上策應該是設法保持當前百分之二的股份，以智慧遊走於大國的戰略縫隙之間，爭取時間打造國內的「最大公約數共識」，形成對外的精神堡壘；倘若因朝鮮因素而被迫戰略股份趨零，則中策應為通過手術式的變革，迅速擺脫當前桎梏台灣經濟生產力的各種結構性問題，包括變更名存實亡的雙首長制，以及深入骨髓的政治分贓、肉桶幫派習慣，以跟上時代的經濟、強化民心的凝聚力。至於被動的提高台灣的戰略股份，而引發中共的武力動機，則屬下策了。

環顧今日台灣政治氣氛，整個社會還停留在「小地緣」的視野框架內不得自拔；若台灣無能掙脫小地緣經驗下的恩怨情仇，台灣的最佳結局，也不過就是「做誰的羊仔」的選擇權罷了。台灣若還想爭取「不做羊仔」的主體性，那就至少得具備從東北亞的中地緣

來思考自身定位的能力。

從面積、人口來看，台灣都是東亞最小的國家。從負面角度來看，這是台灣最大的弱點；但由正面角度看，這是台灣最大的強點。為什麼？因為船小好轉身，人少容易凝聚共識。今天台灣轉不了身、達不到共識，自廢強點，完全是台灣自己內部文明素養不足、擺脫不了古早思維所致，不能賴其他任何人。

整個東亞的中地緣局勢，加上過去一百年發生在東亞的不幸歷史，使得今天的東亞，沒有一個國家的心理是健康的。中國不健康、日本不健康、朝鮮不健康、韓國不健康、台灣也不健康，各有各的冤情，各有各的心魔。這種因地緣歷史糾結而帶來的集體不健康，正是今日東亞安全的最大威脅來源，也是世界戰略學界把東亞視為最有可能引發下一場世界大戰之處的原因。

正在努力爭取主體性的台灣，如果能夠利用「東亞最小國」的條件，在最短的時間內，領先其他東亞國家，走出地緣悲情而「轉大人」，在國際上樹立「東亞心理最健康國家」的形象，這可能就是台灣無可替代的軟實力。

把話再說白一點，台灣有兩個選擇，其一是繼續浸泡在地緣歷史的恩怨情仇中，部分人仇恨中國，部分人仇恨日本，以悲情作為台灣生存的心理支柱，讓悲情在這小島上一代一代的延續鬥爭，讓別人有挑撥離間、上下其手、見縫插針的機會；其二，台灣人成熟起來，承認地緣的現實但拒絕地緣歷史下的恩怨情仇，成為東亞第一個成熟起來的國家。

選擇，在每一個台灣人的腦中和心裡；這個選擇的權利，沒有任何一個外方能夠剝奪。我的看法是，讓我們選擇第二條路。（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10**月）

地緣限制不是問題，
語言國力才是問題

台灣身居中國大陸塊旁，三、四百年來一直隨著中國的動向打轉，除了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三十餘年間，由於中國封閉鎖國，台灣才證明了單打獨鬥也能闖出一片天。但隨著中國經濟逐步對世界開放，這一代的台灣人才發現，原來當「台灣功夫」的老祖宗一旦甦醒，「地緣引力」就會開始發生強大作用；因此，部分台灣人開始相信「地緣宿命論」，另外部分人則相信，只要把大門加厚加鎖，就可以抵擋地緣引力。這兩種人的兩種信仰，目前正在台灣島上戰鬥，殺得鮮血淋淋。

但事實上，隨著交通運輸工具、通訊工具、社交平台的飛速進步，地緣已經越來越不能主宰人們稱之為「國家」這個單位的命運。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國民的語言能力，其實才是一個國家掙脫「地緣宿命」的關鍵能力。

歐洲是個最明顯的例子。雖然沒有這方面的統計，但是根據我個人的考察和切身經驗，歐洲各國的強弱，和一般國民能夠駕馭幾種語言成正比。經濟落後的，多為單語種國家，發達的國家，一般平民至少掌握兩種語言（不含方言），大學畢業者會三種語言，而社會菁英不能掌握五種語言就很難混。

歐盟中瀕臨破產的希臘，絕大多數人只會說希臘語，計程車司機只能用英語單字溝通，一般平民或許聽得懂簡單英語，但是無法交流。隔個海峽的南義大利人，則語言能力強大得多，因為義大利語屬於拉丁語系，與全球大約二十三種語言是親戚（例如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約有八億人之間可以有一句沒一句的溝通。

到了經濟更為發達的義大利北部，其語言國力就更明顯了，除了拉丁語系，一般人的語言能力更擴及日耳曼語系（德語、英語都屬於日耳曼語系）。到了德國、奧地利，多數年輕人都英語流利。法國人自尊心強，但其實英語、義大利語都還可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小國，更是不用說，掌握五種語言以上的人比比皆是。

歐盟二十八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但事實上，歐盟國民如果不會三種語言，連火車服務員都沒資格當上，因為火車動不動就跨越三個甚至五個語區。

國民基本上只會單一語言，幾乎是所有亞洲國家的共同問題，從柬埔寨、泰國、越南，到台灣、韓國、日本、中國。還先不談英語能力，如果一半柬埔寨人懂一些泰國文，柬埔寨馬上就能降低越南對它的控制力，如果懂得的是日文或中文，那就可以掙脫東南亞半島的地緣限制了。

那麼台灣的語言國力呢？這裡大膽的說一句：以台灣貧瘠的資源條件，如果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只會說中文，台灣沒有可能掙脫中國大陸塊的地緣引力。這與政治獨立不獨立無關；即使政治獨立了，單語台灣也只能作中國的附庸。

看到這裡不服氣的人，可能會舉出台灣過去的經濟奇蹟作為駁斥。但是前文已經提到，台灣在九十年代以前的經濟奇蹟，是在中國鎖國的條件下發生的，那段許多人還在回味的好日子（所謂的四小龍），只佔近代台灣經驗的十分之一時光，並不是台灣地緣史的常態。

也有人會說，腦力，而不是語言能力，才是國力的來源。這話對日本、韓國，甚至泰國來說都不錯，但是對台灣來講，並不到位。理由無它：若只會說中文，「腦力」就只能往中文地區擴散，中國是個中文大國，比賽中文能力和中文人口，台灣永遠是個弱國，這也是「地緣引力」的一部分。在這點上，台灣的處境比泰國還糟糕，一個只會說泰文的泰國人，他的「腦力」只能貢獻給泰國，而台灣不一樣。

新加坡算是一個突破「地緣引力」的國家，這與它的國民普遍具有兩種以上語言能力有直接關係。三十年前李光耀就對台灣媒體做出預言說：香港不可能取代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而上海不可能取代香港，因為金融行業直接和語言能力相關。

台灣必須快速的、大幅度的、手術式的提升其語言國力，否則在地緣引力之下，政治上、經濟上只能做附庸。焦慮於「主體性」的年輕世代，尤其要意識到，突破地緣是自己必須付出語言學習代價的。這說的不一定是英語，日語、韓語、越南語、印尼語、泰語也都可以。舉例而言，眼下台灣就有大量的東南亞新移民子弟，他們也是台灣開發語言國力的種子部隊的一部分，捨此優勢而不用，至愚矣。

華人是新加坡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的認知、人的情緒，都嚴重受到「心態」（MindSet）的影響；事實上，不論從心理學或行為學角度，即使斷言「心態決定認知、情緒、行為」，也不為過。語言是心態的外在表徵，因此，本文通過「華人」、「新加坡人」這兩組方塊字，來透析一下所謂的「心態」。

請別嫌我囉嗦，事實上，我現在使用的溝通工具是文字，而你讀到的也是文字，雖然你我視覺上看到的都是同一組文字，但是非常可能你我因為心態的不同，對同一組文字的認知、情緒反應會出現很大差異。例如：你我當下眼前的文字，在台灣叫做「中文」，在中國叫做「漢字」，在日本叫做「支那字」，在新加坡叫做「華文」，同一組符號有這麼多不同名稱，凸顯的就是「心態」的不同。為了擺脫心態的囚籠、保持討論的客觀性，因此一陣子以來，我堅持使用「方塊字」（也就是英文Character的翻譯）來稱呼你當下看到的文字符號。

回到本題：「華人」是「新加坡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選擇這個奇怪且刺激的題目，為的就是刺激。刺激的原因，你我都知道，就是這句法引起的聯想：大家已經耳熟能詳、有些人衷心擁護、有些人一聽就跳腳的「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組方塊字句子。

但是，「華人是新加坡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句法雖然類似，但反映出的心態是完全相反的；前者的心態是在對事實做描述，而後者的卻是一種企圖扭轉事實的威懾命令心態。

在事實描述心態下，馬來人、印度人也是新加坡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實上，只要是新加坡公民、拿新加坡護照，管你血緣、種族、文化背景，就是新加坡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公民就不是新加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拿新加坡護照的人，即使具有華人、馬來人、印度人血統或文化，是可以被新加坡分割的。

看見了嗎？事實描述的心態，和企圖扭轉事實的威懾命令心態，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心態，卻可以在文字語言中，以同一種句型、語法，魚目混珠、抽樑換柱。

我明白，以上太抽象了，謝謝你耐煩讀到這裡。那容我接下來用兩個具體的生活例子，闡明文字用語和心態之間的關係。

第一個是我經常引用的個人生活經驗例子。1969年，我由台灣去到新加坡，插班進入初中二年級。人生地不熟，上學兩周就被同學打了，原因是我用語不當，時常對同學說「……你們華僑……」。打我的同學，雖然只是輕輕一下，丟下一句話：「我們是新加坡華人，不是你們的華僑」。那時，新加坡獨立剛滿四年。

十幾歲的孩子，在家講福建話，在學校講摻雜著不三不四英文的華語，心態上認知、承認自己是「華人」，但不是「華僑」，但他同時也認知，他和我讀的學校名字就叫做「華僑中學」，當時新加坡最大的銀行叫「華僑銀行」。一下子，我就學會了幾個在那之前從來不會的用語：「新加坡華人」（Singapore Chinese）、「新加坡人」（Singaporean）。

正好五十年前，我在新加坡因為用「你們華僑」被打，五十年

後的今天，如果還有台灣人在新加坡說「你們華僑」，應該不會挨打。而會被新加坡人當成山頂洞人，你是從哪個山洞鑽出來的啊？

第二個例子，就發生在最近。2019年5月4日，新加坡辦了一場「五四運動百年回顧」活動。是不是很怪？五十年前就已經不承認自己是「華僑」或「中國人」的新加坡人，竟然回心轉意開始紀念中國的「五四運動」了？什麼心態？

新加坡前（華人）部長楊榮文（George Yeo），用英文發表了一場紀念「五四運動」的演講。其大意是：「五四運動」精神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一百年前「五四運動」中的強烈民族主義成分，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年中國是衰弱的、被世界列強看輕的。他的原文翻譯過來是這樣的：「如果『五四』的百年遺訓是不斷強調抵抗外國人，那將是錯誤的，中國一百年前激烈的民族主義是正確的，因為那是自衛。但今天需要的不是緊握的雙拳，而是友誼的雙手。」

這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批評，多麼的大氣！言下之意：我們新加坡華人，沒有否認我們曾經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中國在一百年後強大了，竟然還在用一百年前的心態面對世界，請自己檢討一下。

心態決定認知，而統戰就是通過語言文字，讓對方不知不覺改變心態的技能。新加坡華人了解這點。

「台灣人」的定義

這是個敏感話題，但越敏感的話題，越需要理性討論，而且越快談清楚越好，否則人人心頭掛個鐵球四處遊走，形同自虐。

概念上，我們可以用好幾種的標準來定義「台灣人」，例如種族來源的、血緣的、共同歷史的、共同命運的、社會階層的，然後混雜以上所引申出的政治立場的、價值方向的不下十種的定義方

式。

思想自由，誰怕誰呢？這是台灣今日依然傲笑江湖的大基礎，但是，終日傲笑，不思進取，最終難免落至晚景悽涼。

因此，在數十種「台灣人」定義中，活在台灣島上的這群人，最好盡快找到最大公約數，避開死纏爛打，以免成為一個需要「長照」的國家。要知道，希臘有歐洲「長照」，烏克蘭有俄國「長照」，如果台灣照目前這樣下去，你猜全地球上唯一有興趣「長照」台灣的國家是哪一個？

圍繞著「台灣人」這三個字所能帶來的定義和情緒，在政治上死纏爛打，已經幾十年了。台灣人若還想有出息，最好趕緊一致同意簡化「台灣人的定義」━凡是生活在台灣，不放棄國民身分證（或其他居留證件），有繳稅的人，就是「台灣人」。

別去追究別人家族有沒有排灣族、卑南族、平埔族血統了，別管人家老爸是生在河南、湖北或日本了，不要去比「台北大轟炸」、還是「二二八」、還是白色恐怖、還是「七七事變」所受的磨難裡，誰更偉大或卑微了，管她／他是嫁到台灣的越南女子，還是娶了台灣媳婦的上海男子。膚色髮色異己者，只要願意在台灣生活納稅、合乎條件，趕快給人家居留身分和公平待遇；擁有雙重國籍者，若幾十年沒在台灣繳稅，趕快取消他的健保卡和捷運打折卡。

幾千年來台灣就是個移民社會，在這個台灣島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在地猿人」演化成「人類」的事情，你的祖宗三代、三十代、三百代，都是台灣島以外的地方來的，並且近數千年來，都是跨海而來。若要比誰的祖宗在台灣比較久，台灣黑熊、梅花鹿會說「全部台灣人都給我站一邊去」。

不要跟我說台灣政治正努力進化到「公民社會」，輕易這樣說的人請先弄清楚「公民」意涵。

大多數發生在台灣的政治紛爭，從老頭子打架到年輕人打臉，

本質上都停留在努力退化到「誰才是台灣人」的爛事，而不是努力進化到「誰才是公民」的啟蒙上。

都2015年了，台灣都快被折騰得差不多了，這麼多人還是「公民社會」理念下的原始人。莫用裂解群體的「部落性」玷汙公民社會的「主體性」。（本文原發表於2015年）

你的認同對象是什麼？

以後在任何場合，只要有人爭辯所謂的「認同」問題，你只要問對方以下幾個問題，就可以刀切豆腐，使大家頭腦變清楚。

這幾個問題是：一、中華民國的實際控制領土有哪些？二、台灣（或者如果高興，台灣共和國）的實際控制領土有哪些？三、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重疊部分有多少？（答案只能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四、讓我們把重疊部分稱呼為X，你我是不是生活在X的領土內？五、X是不是屬於美國？X是不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屬於住在X內的二千三百五十萬人的？六、生活在X內的人，是不是應該保衛X？七、最後，你我是否應該認同X？

有關認同的辯論這樣就可以結束了。X的政府是民選的，不喜歡可以換。X的軍隊不應該有「認同問題」，他們效忠的對象就是X，如果有人入侵X，他們為X而戰，天經地義。但是在頭腦不清楚的狀態下，這個問題就會變成「軍人是為中華民國而戰，還是為台灣而戰」。其他類似的漿糊問題還有諸如「你認同的國家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國」？

你知道這類漿糊問題有多愚蠢嗎？如果不知道，讓我打個比方：如果你的名字叫「林大二」，你爸爸的名字叫「林大一」，有一天你爸爸為了某個原因改名叫做「陳大五」，有人問你「你還認不認同陳大五是你爸爸」或「究竟林大一還是陳大五是你爸爸」？你會怎麼回答？關鍵是你爸爸還是同一個人，還是你爸爸。你可以因為你爸爸的為人、性格、痛打過你，而拒絕認同他，於情於理這

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是，如果你爸爸本質沒變、財產沒變，僅僅因為別人給他取了幾個外號或者他自己去改了名字，你就因此不知道該不該認同他了，這不叫愚蠢，什麼才叫愚蠢？

然而這類愚蠢卻天天在台灣發生。選舉一來，上至總統、下至凡夫，智商都自動下降百分之三十，思辨能力瞬間滑坡百分之五十，聽到幾個名詞如「中華民國」、「台灣國」就丟掉一切教育和所學，膝蓋式反應井噴而出。敵人和對手比你自己還了解你，隨便耍弄幾個名詞、幾句話，就能讓你像木偶一樣做出預期中的動作。

個人糊塗就罷了，但若試圖用諸如「認同中華民國還是台灣」、「認同台灣還是台灣國」話題分化台灣社會的人，管他是政客、媒體人還是退休軍方將領，都是「X的罪人」，沒有資格做X的公民，應該移民到其他地方去（包括美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人或法律攔著他。

請記住，這個「X」就是我們的最大公約數，X軍保衛X人的生命財產安全，X人有義務依照法治原則剷除X內的不公不義，X人拒絕任何對X的武力併吞或制度併吞。這麼簡單的道理，還需要辯論？還弄不清楚？

我認同X這個最大公約數，你呢？如果你也認同，那不就結了？如果一個人不認同X的生活方式、或放棄了自己改變X制度缺陷的權利、認為生活在X中無價值可言，那麼地球那麼大，愛去哪裡去哪裡。

X的名字叫什麼？隨便你，在X領土上這屬於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但若一個人攻擊別人的言論自由，或影響社會治安，那麼就依法治理他。就這麼簡單。

回到文首的七個問題。有人對問題「五」的答案是X屬於美國，或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屬於日本。這很令人氣惱，但這牽涉到複雜的歷史感情，感情這件事是沒法辯論的。我只能說，感情

的歸感情，沒人攔著誰，單戀、痴戀、愚戀、死戀之事，乃人生常態，但若因此把心目中的「情敵」打傷或殺死，那就是法律治安問題了，非辦不可。

第九章

腦力犯台：台灣應該自省的文化問題

第九章

腦力犯台：台灣應該自省的文化問題

【前言】

本書第七章的前言中說：「什麼樣的人民就出什麼樣的政體」，這有可能帶來部分讀者的不快。但我一向秉持直話直說原則，在**2017–2018**年間，眼見台灣社會被中共的文攻武嚇影響，我心一橫，說出了一句話：「與其擔心別人武力犯台，不如我們自己先腦力犯台。」這其中道理，其實跟一句老生常談是一樣的：人的最大敵人就是自己，克服了自己，就所向無敵。第八章詳述了台灣的歷史遭遇和文化背景，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教訓呢？我們敢於面對自身文化中的那些缺陷和幽暗面嗎？如果不能，何來談主體性呢？但世界出現給予台灣的大機會，台灣又怎能做出令世人尊敬的大選擇呢？

百年一滴的遺憾與展望

如果有一種東西，一百年才能淬鍊出一滴，你覺得它有多寶貴？這樣說太抽象，換個方式說：如果有一種Espresso咖啡品種，一個小時才能淬鍊出一滴，你覺得這樣一杯Espresso的價值有多高？

真正屬於自己的文化，就是百年一滴。台灣，當下就處於那「第一滴」將落未落的關口，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你將難以理解一些政治老人的固執，年輕人「逢X必反」，更不用說為了幾棵樹、幾株花草、幾隻野生動物而拼死抗爭。

意識到「百年一滴」這概念，還得感謝一位朋友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她去日本，感覺到日本的各種風貌中，不論是古建築、小鎮市容、茶道、枯山水，都透露出一種核心文化：空、靈。她問：同樣來自漢唐文化、同樣經過長年的歷史戰亂，為什麼日本可以淬鍊出一種核心的人生心態，瀰漫於各種風貌之中。而台灣歷經荷西、

中國、日本的統治三百餘年，卻沒有核心的人生態度？

這朋友其實有答案，她的感觸是：只有當時間和心靈上有足夠的「餘裕」，才有可能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文化；而台灣的人，幾百年來都沒有被賦予「餘裕」，只有生存的拼搏，因此從來沒有機會發展出、享受過自己可以引以為傲的人生態度。但同時，幾百年來台灣人也從來沒有真正放棄過對「自己」的追求。

經過了經濟起飛期、政治解放期，台灣人開始有了「餘裕」，極為自然、就像任何社會一樣，台灣人進入了追求「屬於自己的」文化和核心價值。然而，核心的文化共識是百年一滴的事，區區數十年的火候，還淬鍊不出來。

台灣人有了餘裕開始追求自己，但同時期資訊時代來臨，世界進入了打開電視就能接收世界，乃至滑手機就能連結世界的狀態，這大大的打亂了台灣人追求自己的進程。台灣人的「第一滴自己」還在過程中，就陷入了各種紛雜的、別人的核心生活態度和價值觀之中。剎那之間，「淬鍊」的過程淪入了「成品選擇」的過程。

就像離岸三公里、還在海中浮沉前進的人，只要能抓住一個浮載物，不管是救生圈還是木頭或塑膠瓶，都會死死抱著不放。台灣，有些人抱住了「普世價值」，有些人抱住了「本土意識」，有些人抱住了「分配正義」，有些人抱住了「小確幸」，還有些人抱住了「環境保護」、「動物生存權」；當然，也有人抱住了「××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在今天台灣各種「死抱不放」的萬象之下，如果問一個問題：台灣自己的核心價值，也就是台灣存在於世界的意義、有別於其他國家的核心特色是什麼，有幾個台灣人答得出來？

當下的台灣，還處在「百元快炒店」的階段，菜色繁多，但都是快炒。台灣需要更多的耐心淬鍊「百年一滴」的人，也許你就是一個。

台灣為何找不到主體性？

如同地球上的許多地方，台灣是個地緣、人種、語言、文化雜交而形成的地方，但台灣社會至今沒有接受這個事實。台灣雖小，但由於特殊地緣，近代四百年來，幾大歷史基因於此混交：南太平洋原住民基因＋荷葡西大航海基因＋中華農耕帝國基因＋近代日本殖民基因＋美式民主基因。聽起來複雜，但這不過是地球的常態，比起歐洲國家，台灣單純多了。例如：今天通行世界的英文，在印歐語系中就是成形最晚、最為雜交的語言，而西班牙曾被伊斯蘭統治過七百年。

歐洲、美洲，老早就吸取了歷史教訓，承認只有接受人種、語言、文化的雜交事實，才能形成「公民」概念，公民才能組成現代國家。例如：在今天的「德國」這個國家，媒體界連「德國人」這個語詞都盡量不採用，而多以「德國」、「德國社會」等語詞進行公共對話。

但在古老的東方，人們在國家意識上好像還處在二百年前，還在搞「純粹化」，中國如此，日本、韓國亦如此。奇妙的是，台灣明明是東亞的人種、語言、文化最為雜交的地方，卻也假仙得把自己視為一個「自古（四百年）以來就怎樣怎樣」的地方，一些人急著「去中國化」，一些人急著「去日本化」，弄得中日戰爭還在台灣開打。另方面，明明過去三十年間台灣的新移民家庭及後代總人數已經超過了一百萬人，已經佔了台灣的百分之五人口，主流社會還對他們視而不見，好像把眼睛矇起來就可以停止人種、語言、文化的雜交演化事實。

一個拒絕承認這事實的國家，是不可能真正多元化的，也不可能找到主體性。由於拒絕承認現實，台灣陷在三種互不相讓的座標下：以本島為座標，以中國為座標，以日本為座標。不斷的內耗，就像盆子裡的一堆螃蟹，本來都可以爬出去，但相互拉扯之下誰都出不去。台灣若再不正視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移民國家，開始承認、接受各種移民文化，以多元心態培育公民觀，恐怕將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主體性。

有人說，台灣找不到主體性，都是對岸壓制的結果。這話部分對，部分不對；對的部分大家都知道了，這兒談談不對的部分。任何有意義的「主體性」，都得基於對「我是誰」的徹底醒悟；個人如此，國家也如此。「台灣」是個地理名詞，「當代台灣人」就是在地緣歷史的不同階段來到台灣、願意在此定居、拒絕被非民選政府統治、認同在台灣的生活方式、自願向政府繳稅的這一群人，管他是原住民、新移民，來自閩南、河南、日本、東南亞或荷蘭。缺少了這認知，台灣這塊土地哪有主體性可言？有了這認知，主體性又豈是非台灣公民所可壓制的？

台灣多數人還沒意識到一個有關中國的事實，那就是：中國至今也還沒找到它的現代主體性！台灣如果能先於中國徹底醒悟「我是誰」，不但可以率先成為東亞的第一個混交演化而出的公民社會（而不僅僅是一人一票的社會），也可以協助（甚至迫使）中國找到它在現代世界中的主體性。

中國其實也擺脫不了地球的演化規律，它也是一個人種、語言、文化的雜交體，只是相對於歐洲的快速雜合，中國是一部慢動作的電影。近幾年來，中國的許多民間學者開始重構中國歷史，從人種、語言、文化的遷徙及撞擊來解構傳統的狹隘王朝史，頗有可觀之作。

慢動作的中國，過去的確具有結實的主體性，也就是綿延不斷的「道統」概念。然而在清末民初，那個主體性已被徹底挑戰。早年的國民政府和後來接手的「人民」政府，一直企圖在西方的「西伐利亞主權框架」之下找到中國的現代主體性，然而主權框架所能提供的不過是一個國家的門面，一張國際身分證，並不是內生的主體性。

事實上，中國在被允許加入國際「主權俱樂部」之後，並未在現代世界文明下認真思考「我是誰」，繞了一大圈之後，今天又繞回了清末民初的前啟蒙階段，國力固然猛增，但本質未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套路，而沒有真正的哲學探底。一個找到了主權

但找不到主體性的中國，就像一個只有肌肉而無靈魂的巨人，終歸是令人恐懼的。

在東亞區域之中，台灣得天獨厚，最有可能形成一個真正的多元公民社會，只要承認了「我是誰」，停止螃蟹式的內耗，主體性將不請自來、實至名歸。到時，韓國、日本都得來取經，中國豈能無視？

與其擔心別人武力犯台，不如自己先腦力犯台

台灣年輕世代，我指的是大約二十歲到四十歲，總數六百多萬人的世代，正在形成一股六十歲、甚至五十歲的人都看不太懂的社會文化運動，我稱之為「腦力犯台」。為這現象取這名字，因為這場文化運動百無禁忌，以各種方式在挑戰甚至蔑視老一代的意識形態，只是執政的民進黨連門都還沒看到，還把相關現象理解為傳統藍綠鬥爭的一部分。

民進黨的這種因防禦心過重而帶來的視而不見，像極了2014年執政的國民黨看不到太陽花運動的前兆，將社會中的一切負面情緒解釋為綠營的鬥爭。一直到今天，多半的老派國民黨人士還把當年學生攻佔立法院，單純理解為一場民進黨所操弄的運動。我猜，幾年之後的老派民進黨人士，也將一樣的頭腦轉不過來，認為發生在2018–2020年之間的那些事，也都是「敵對勢力」弄出來的陰謀。

之所以稱當下正在漫開的新世代運動為「腦力犯台」，理由如下。首先，這場運動的場域不在街頭，而在網路，因此凡是在FB、Youtube、IG、Line上參與度不夠活躍的老派人士，看不到這股力量。太陽花運動發生過後，許多老派國民黨才第一次的聽說一個東西叫PTT，但即使聽過，他們也不會上PTT，即使偶爾路過PTT，他們也看不懂更看不下去。

簡單說，一個人如果每天耗在手機互動訊息上的時間少於三小時，就很難察覺年輕人已經開始用他們的腦力，而非走上街頭的體

力，以看似淺薄的形式在深刻批判台灣的政治文化。對新的世代而言，太陽花已經是過去式了，他們現在聚集的是腦力，而不是體力，他們現在想攻佔的不是立法院，而是那些造成惡質政治的體制以及混帳的人。

他們的前一代，也就是太陽花世代，對「犯中」比較感興趣，因為那時國民黨在當政。現在這一代，對「犯台」比較感興趣，因為民進黨已經在2016年推翻國民黨，儘管仇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情緒餘波不斷，但是他們已經開始懂得台灣有台灣自己的毛病，一切賴中國或賴國民黨解決不了問題。

很不幸的，已經全面執政的民進黨，陷在多年來的在野習性不得自拔，一切問題賴別人。這一套路，對老派民進黨、老派綠營依然奏效，但後太陽花世代已經不吃這一套了。

這場用腦力檢討台灣自身毛病的「腦力犯台」運動，已經跨越黨派。不信？等著看2018年和2020年選舉的結果，年輕人一定是選人不選黨，選價值不選口水。（本文原發表於**2018**年**6**月，選舉投票半年前）

別當「百姓」，進化成「公民」吧！

每次大選，都是對台灣人民的一次病理切片。每隔四年，將這切片拿到顯微鏡下，看看台灣社會的「公民細胞」比率有沒有增長，「百姓細胞」的比率有沒有降低。這兩種細胞在台灣體內的消長，就決定了台灣會不會好。

把國家當作一個有機體來看，「公民細胞」和「百姓細胞」的生存方式不一樣。前者是主動的，通過對母體貢獻能量換取自己的生活；後者則處於被動狀態，期待的是母體對它的養分輸送。

簡單說，公民是一種權利和義務對等、權力和責任相符的角色；而百姓則是一種權利義務和權力責任之間出現落差的角色。在

古代，或在今日的極權國家中，做公民還是做百姓，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但在自由的台灣，一個人選擇做公民還是做百姓，就不能賴給別人了。

台灣有許多權利與義務出現大落差的現象。例如，平均稅率百分之十二，卻期待福利比照平均稅率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的國家。再如，商人通過政商關係賺了大錢，實際稅率卻低於打工仔。甚至，在權力與責任上，受僱於政府公職者，利用政府內部消息「投資理財」，卻不用像上市公司內線交易一樣，受到法律制裁。

這些都不是公民現象，而是百姓現象。可以說吃垮台灣的，就是這些百姓現象。百姓細胞越多，台灣這個有機體就越加好不起來。一個稱得上是「公民社會」的國家，至少社會菁英都應該已經是公民，也就是引領國家的那群人，應該是一群權利與義務對稱、權力與責任相符的人。如果社會菁英都容許自己失衡，那麼如何期待平民成為公民，而不變成刁民？

每次選舉，都是一個絕佳的觀察點。如果選民多要權利而不要義務，候選人只企盼權力而不談責任，那麼就表示台灣還在「百姓意識」的霧霾中，而「公民意識」還在待產中。

選後一年，也是好的病理觀察期。如果還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團隊「有責無權、打破要賠」；立委有自由投票的權利，而不必對「黨團密室協商」負責，那麼就可以斷定台灣還僅處在百姓政治的階段，距離公民政治還很遙遠，眺望民主還有一大段路。2020年的立委選舉，參選的年輕人一定很多，他們對權利義務、權力責任之間的對稱性拿捏，值得期待和觀察。

講到底，台灣還是由一千多萬具有投票權的成年人決定的，他們之中的公民比率有多大、百姓比率有多大，決定了自己以及國家的命運。若只懂權利及權力，而無感於義務及責任，那要賴誰呢？

（本文原發表於2015年12月）

漢文化的文明罩門：江山觀

在漢文化下，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江山是誰打下來的，誰就有最終的支配權。這種「江山觀」，其實就是一種原始的動物性的盤觀，獅子老虎猴子身上都有，只是由於生態位和覓食範圍的不同，獅群、虎群的地盤感較大，至少在兩百平方公里，而猴群的地盤感較小，一平方公里可能就足夠了。

人類號稱萬物之靈，但花了幾萬年也沒洗盡這種原始的地盤感。資源不足或天災人禍時，為了生存而爭地盤，那算是無奈。然而，在衣食足而應該知廉恥的環境中，人若還順著江山觀行事，就不能不說是一種次文明的狀態了。

漢文化圈，或更準確的定義─主要依賴方塊漢字傳承文化的社會，目前就都還處於這樣一種次文明狀態。各種歷史典籍、文學藝術、民俗戲曲、日常生活邏輯中，江山觀無處不在。掌權者如此表現，人民也多默認。

今日江山觀最烈者，莫過於中國。共產黨認為打下江山後，他們及後代就天然具有最終支配權。所謂的「紅二代」這概念，說穿了就是江山觀下的概念。現代文明下的「國家」、「政府」，都只是披在江山觀內褲上的外衣罷了。有人批評中國還處在「人治」的階段，這其實是抬舉它了；實情是中國還處在「江山觀治」的階段，若真能落實「合情合理的人治」，中國人就該歡慶文明進步了。

國民黨也是江山觀的老店，只是後來被迫僅在台灣小島上進行江山統治；在2016選舉慘敗後，國民黨的江山觀可說已經被迫洗盡，剩下的堅持大多只是一種希望被合情合理對待的心情。

現在應該要擔心的是，民進黨對台灣的江山觀是不是才剛剛開始？看官須知，選戰也是戰，選戰打下的江山觀，和武力打下的江山觀，在價值取向上是沒有差別的。民主的內涵中，政府與人民之

間的關係是契約關係，而不是誰選贏誰就有資源支配權、誰選輸誰就應該服從的關係；換句話說，真民主是容不下江山觀的。

方塊漢字文化圈內的真正政治競爭，其實是一場看哪方的江山觀洗得比較乾淨的競爭。最終得天下人心的，必是江山觀洗得比較乾淨的那一方。

一場洗淨「江山觀」的競賽

聽說讀寫「方塊字」（含各種方言）的地區，人們腦中都有一種「江山觀」，認為「誰打下天下，江山就是誰的」。這種把「江山」當作戰功、政功下的獨佔權利，與現代的「國家」觀念是背道而馳的；只要江山觀不去除，現代國家就不可能形成。任何地區，只要人民或政黨腦子裡還有江山觀，這個地方就只是一個政權統治的地方，就不能被視為一個現代國家，即使它已經冠上了「國家」的稱號。

如果把「中華文化」視為一個泛稱，那麼江山觀就是中華文化中的一顆惡瘤。在以中文為承載主體的各種史書、民間故事、戲曲、小說中，江山觀是一種幾乎歷來不被任何人挑戰的價值觀。任何力量，不論是通過武力、政變、革命、起義，甚至選舉，一旦取得政權，就會油然而生「天下就是我們的」的傲氣。情況嚴重的，一鼓作氣推翻既有的資源、財物權利型態，隨心所欲的集中到我家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例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情況較輕的，在既有的體制法規下，把公有資源、私人產物，合法不合理的轉移至執政派系，例如至今已經政黨轉移三次的台灣。

最要命的是，在泛中華文化圈內，人們即使受過了高等教育、看過了世界，潛意識中還是接受江山觀的。即使已經老早脫離中國母體的東南亞華人，觀念上對黨國一家、黨政一家，基本上還是不予置疑的，即使其中有人略帶勉強，但究竟還是接受的。如果已經移民上百年的東南亞華人尚且如此，那麼台灣呢？中國本土呢？

為什麼要批判江山觀？因為江山觀是一種擁有權（ownership）的觀念，而非權利（right）的觀念，而現代國家（State）的存在基礎是基於公眾權利的，而非基於一家一姓、一黨一派的擁有權的。所謂的「主權」，用在民法、民事、公民社會上，是財產權利（Property Right）的概念，但是若用在國家（State）身上，只是「不被侵犯權利」（Sovereignty）的概念罷了，絲毫沒有誰主政誰擁有的意思。事實上，英文的Sovereignty被翻譯為「主權」，是一個極爛、極容易誤導的翻譯。Sovereignty State被翻譯成為「主權國家」是個百年錯誤，正確的翻譯應該是「具有不被侵犯權利的國家或政治實體」。

一言以蔽之，誰打下就屬於誰的「江山觀」是人類政治文明進化的障礙，它指向的是集權、極權、專制。一群人若能快樂的或默默的生活在威權體制之下，這群人不是在意識層次上已經徹底接受了江山觀，就是雖然口頭抗議但是在潛意識中還是接受江山觀的。同樣的，一群人民若是能看著執政方合法、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將公共資源包攬化、私囊化而不暴怒，那麼，這群人民其實內心深處也是江山觀的忍受者。

不論是在東南亞、台灣，還是中國大陸的華人，其實在我看來，正在進行一場誰先洗淨江山觀的競賽。這不但是華人圈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問題。目前，以中文（包含方言）為溝通載體的人數，佔到了地球總人數的五分之一，雖然中國大陸佔其中的絕大多數，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至少已經有了五千萬的華人，並且數量快速增加中。如果華人不洗淨江山觀，那麼有一天，江山觀就會危害到世界；如若華人成為江山觀的輸出者，那麼有朝一日就會成為世界公敵。

眼下，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華人已經洗掉了一半的江山觀。這是因為在英國的體制傳統下，「大憲章」本來就是一個由下而上的人民權利契約書，而不是一部由上往下的擁有權法律。台灣方面呢，由於國民黨濃厚的江山觀配上了島內華人意識深處的江山觀，使之烙印非常之深。民進黨由於這一輩

子只看過國民黨，因而也深深的染上了江山觀的思維。簡單說來，台灣的體制就是一個江山觀下的體制，若不變革，執政方不管是誰，一旦看穿了這一點，就會進入「不吃白不吃」的怪圈。

至於中國大陸方面呢？來點詩意的吧，看看毛澤東這半首〈沁園春〉就可知其一二：「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漢，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台灣文化的罩門：先祖觀

電影《A.I.人工智慧》中的小男孩機器人問他的人類養母：我是從哪裡來的？媽媽把他帶到工廠附近指著工廠說：你是從那裡來的。然後媽媽叫他：逃，快逃，永遠不要回到這附近。因為，凡是出現了自我意識的機器人都會被當作敵人而被召回重修。最終，小男孩機器人認定了收容他的養母和那個他生活過、叫做「家」的地方，就是他的終極認同對象。

義大利某小說描述一名農婦看到原野上一大群人迅速奔逃，她好奇問為什麼，一人邊跑邊對她喊：快逃，祖國來了。

祖宗、祖靈、祖國，不管你稱它為什麼，如果被它牽絆了，你很可能就不是一個獨立完整的「人」。這點，歐洲人最清楚，因為不需要歷史教科書，他們自己的生活經歷就知道，把先祖當成認同對象，輕則自尋煩惱，重則喪生於莫名。

愛因斯坦生於「萊茵河邦聯」中的一個小邦，那個地方後來被叫成德國；他在瑞士發展出相對論，然後回到柏林，希特勒掌權時逃到美國。如果他被「祖國」或「祖宗」的觀念牽絆，他可能早就命喪黃泉了。

中國共產黨稱為老祖宗的列寧同志，清楚知道自己身上具有至少六種血統，若要拜祖，恐怕得三百六十度旋轉著拜，因此他創立的國度也只敢叫蘇「聯」（蘇維埃聯邦）。再說中共教父毛澤東，

深讀歷史的他，當然知道湖南就是一個千年來混血而成的語言文化區域，因此向來為湖南共和國的「湘獨」打拼，並力主藏獨和疆獨。至於後來的事，那是後來的事了。

你看，從地球的西邊到地球的東邊，被「先祖」這個觀念綁死在一棵樹上的，絕對是異態而不是常態。那麼，台灣為什麼要將自己綁在一棵樹上呢？國民黨為什麼一定要向西去「認祖歸宗」呢？民進黨為什麼一定要向南去「尋親」呢？大家為什麼不能實實在在的實話實說，今天的台灣就是因為地緣因素以及幾個歷史的偶然因素而存在的呢？

台灣人實在應該向那個機器人小男孩學習。要認同，就認同養你的父母和那個你生活的地方，到此為止，拜託別再做什麼認祖歸宗和南向尋親的動作了，那是落後的象徵。（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11月）

弱者症狀：台灣的致命傷

首先聲明兩點：其一，「弱者症狀」指的不是「弱勢」；弱勢族群真實存在，而弱者症狀指的是一種社會症狀，一種明明不屬於弱勢族群，卻自我認知為弱者的集體心理偏移現象。其二，弱者症狀各國各社會都有，但是像台灣這樣嚴重、這樣被灌輸、這樣被操弄，搞得整體社會競爭力喪失，卻是在地球上難得一見的。

甚至，在台灣「弱者症狀」還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專屬代名詞，叫做「相對剝奪感」。若要具體例子，抱歉，那就直說了：在台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子、地產，但因為在「天龍國」中心買不起房子，就自認為是弱者；自己每年一百天假期，看到有人一年一百五十天假期，就自認為弱者；自己退休金所得替代率百分之七十，看到其他行業退休所得替代率百分之八十，就稱呼自己為弱者；自己大學玩了四年，看到苦讀者畢業後月薪是自己兩倍，就覺得被欺負；水電費明明位居全球最低位，聽到政府要漲百分之五水電費，就認為被欺騙了；明明自己只有三點六萬平方公里

面積、二千三百萬人口，看到土地大三百倍、人口是六十倍中國的頭百分之三人口比自己有錢，就認為自己弱勢了......不能再舉例了，否則三頁紙都寫不完。

這是一種基於若干事實但被無限放大的社會心理，並且蔓延到各個階層、各種社經地位、各個行業之中，其廣度及強度已經達到病理學上的「症狀」程度。患了這種病的後果就是：社會上大部分人的抗拒心高升至百分之八十，進取心降到百分之十，抱怨力高漲到百分之九十。

當弱者症狀內化到患者的價值觀、行為反應之中，這個人就算是完蛋一半了；當內化到社會各階層、各職業中，這個社會的競爭力在世界上就算一半完蛋了。台灣，當下處於臨界點；過去還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南韓、香港、台灣—之首的台灣，在患了多年的弱者症狀之後，固然還是亞洲四小龍之首，但是其他三小龍已經變成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台灣倘若再不將弱者症狀送進急症室，十年之後的亞洲四小龍，將是台灣、印尼、菲律賓、緬甸。至於台灣現在還能引以為傲的生活文明，在「相對剝奪感」的惡化拉扯下，十年之後是否還能維持社會的自尊心，也是個大大的問號。

弱者症狀的現象之一就是互貼標籤、互戴帽子。想想，人生在世，哪裡沒有高矮長短？性格不同、優勢智能不同、職業勞逸不同，正常社會中有種種不同的安身立命之道，在個人層面取長補短、以勤補拙；在社會層面，高的打籃球、矮的打乒乓，此乃健康生態。但在病態的弱者症狀下，以相對剝奪感為由，只要遇到不如人之處，第一反應就是替對方貼標籤，硬求面面均等。相對剝奪感是一種水漲船高之事，最終結果就是齊頭式平等，社會豈能不落得人人一年休半年、退休所得替代率人人百分之八十、健保人人用多繳少、水電物價漲不得，終至家庭均貧、政府破產。

弱者症狀，已經在台灣培養出了許多新物種，隨手舉例，台灣的「假弱勢」越來越多，看看假農民、假漁民、假低收入的人口比例就知道問題有多嚴重。更有甚者，長期靠著鼓動弱者症狀以謀

生、甚至牟利的「職業弱者」群體正在增加中。

在相對剝奪感的氣氛烘托下，原本還算有同理心的人，許多轉型為「正義魔人」， 以膝蓋式反應來判斷什麼是「不正義」。更為嚴重的，相對剝奪感不斷疊加下，許多好手好腳的人，演化成為報復社會的心理患者，過了心理臨界點就付諸行動。

在台灣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弱者症狀的另一層效應就是「凡事找政府」。在台式語境下，「人民」幾乎就是「弱者」的代名詞。試回想，在近幾年的任何遊行抗爭中，標語中沒有出現「人民」二字的？「人民」這一詞被濫用的程度，台灣有可能位居世界第二，第一是中國。由於人民是弱者，台灣社會又喜歡扮演弱者，因而「公民」二字雖然也被使用，但使用的頻率遠遠低於「人民」。這現象是有道理的，因為若使用「公民」，很自然的聯想就是「公民自治」、「公民精神」，而那是患有弱者症狀者最害怕的概念。

弱者症狀嚴重的國家，一定就是民主（Democracy）素養不夠的國家，一定就是把「民主」概念理解為「政府為人民作主」、而不是「人民自主自治」的國家。台灣是個奇妙的國度，有利可圖的時候，喊出的口號一定是「人民自主」，而圖利失敗的時候，一定就喊「為人民作主」，向政府「討公道」。

在台灣，「政府」也是個奇妙的概念。「人民」認為「政府」就是用來照顧人民的，而政黨在潛意識裡認為「政府」就是用來吃的，在野時一定把「政府」描繪為「對人民不公」，執政時一定同邀「人民」一起吃政府。但當然是政黨吃肉，人民喝湯。但台灣太小，國家資源實在經不起政黨、人民兩頭吃，因而「弱者症狀」和「相對剝奪感」越發的加強了，不但人民之間如此，連政黨內部也如此。「政府」在台灣真可憐，蠟燭兩頭燒，搞到最後真正的弱勢群體分不到資源，而那是一群連怎麼上街遊行都不懂、都沒力氣的群體。

在台灣，弱者症狀和另外一個不完全相同但卻高度相關的症狀，已經開始融為一體，那就是一般說的「受害人症狀」。兩者之

間相同的是，遇到人生挑戰或環境壓力時，第一反應就是自己是被欺凌的一方，甚至是被某人、某方「有意設計」的欺凌。這說明了在台灣，為什麼只要牽涉到多方的公眾事務，「陰謀論」往往是第一版本。一個凡事都傾向陰謀論的社會，本質上其實還是一個反科學的巫術社會─遇到令人震驚的現象時，先建構陰謀論的框架，然後才對號入座的搜覓屬於聯想性的證據。而巫術社會的反面是法治社會─不從陰謀架構下手，而由硬證據下手，待有足夠證據的時候，才開始建構解釋的系統。台式民主流於言論無邊際、輿論定罪，其實是弱者症狀和受害人症狀的雙重交互發酵的結果。因而，法治在台灣遠遠落後於民主。只要這雙重症狀繼續發酵，台灣就難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此外，在台灣最容易成功的政客，也通常就是那些善於操弄弱者症狀和受害人症狀的人物。換個方式說，不健康的社會心理，就是政客不用拿出解決方案，單憑玩弄上述兩種症狀就能夠贏得選票的溫床。

受害人症狀與弱者症狀之間的不同在於：後者是一種泛心理狀態，不需要特定的人、事、時、地、物條件，幾乎在生活中的任何層面，都可隨時觸發。而前者，通常需要特定的條件，才會被觸發。受害者症狀是可以通過理性而療癒康復，但是，弱者症狀一旦形成，不但難以療癒康復，而且患者甚至會不自覺的把自己推向「弱者」身分，不斷加強「你看，我就是弱者」的自我形象。

當一個人陷入不斷自我強化弱者症狀的時候，很多怪異的現象就會發生，例如：拿原本用來激勵向上的「吃苦當吃補」這句話，用於自我逃避向上機會的理由，使得不動腦筋、安逸於小確幸成為常態，以「吃苦就是吃補」將自己錨定在弱者的形象上，既浪費了自己的IQ，也使得社會動力不前。

「我配不配」，這個人人潛意識裡不斷問自己、但卻可能一輩子都未公諸於人的懷疑，可能就是決定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命運的最關鍵問題。我配成功嗎？我配月薪十萬嗎？我配做總統嗎？我配做超級有錢人嗎？我配做高級主管嗎？我配得上我的配偶嗎？

弱者症狀患者的一個通性就是不管是因為家教還是學校教育，他的潛意識給他的固定信息就是「你不配」。我們是窮人，配不上富家千金；你比別人差，配不上拿第一；我膽子小，不配冒險；我長得不好看，不配用這麼高級的化妝品；我是小老百姓，不配和貴族平起平坐；我是殖民地，不配做國家……

很少人會承認自己的「不配感」，但是潛意識中的「不配感」的威力，卻足以嚇阻我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事實上，前述的「吃苦當吃補」症狀，正是「不配感」作祟的現象之一。

誠實檢視自己潛意識中的「不配感」，可說是擺脫弱者症狀的第一步。整體台灣社會，也只有當家長和制式教育體制把對十二歲以前的孩子的態度，由「你不配」改為「你就是配」，台灣才有脫胎換骨的一天。台灣企業的員工管理哲學，如果能從「你不配」轉至「你配，而且你能做到」，台灣的經濟才有世界突破口。

台灣是全世界廟宇、神壇最密集之處，這不是偶然，而是弱者症狀的集體表現。弱者症狀患者對今生基本上是恐懼的，因而啟動心理補償機制，寄望於來生或極樂世界。坦白說，這是個很自然的現象，就像已經認定自己會窮一輩子的人，理財方式只能寄望於儲蓄，只因為儲蓄可以「零存整付」。今生既然已經注定是弱者、受難人，那就只能花錢消災，做足功課，湊足點數，好能進入西方極樂世界。神棍們自然樂於協助弱者症狀患者化解恐懼，因此，廟宇和神壇在台灣多半是一種業務經營，只是價碼極高，幾乎就是一種終身都繳不齊保費的虛擬保險業。

病態的弱者症狀，就是國家競爭力的煞車，因為它導致精力拉扯、做事比爛。它又是一個人的幸福感殺手，因為它讓人覺得自己不配幸福。當一個社會集體陷入弱者症狀，一個個人又如何跳出「相對剝奪感」的陷阱？台灣人特別憐憫流浪狗，但事實上全台灣又到處都是流浪狗。筆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為什麼只有「流浪狗」，沒有「流浪狼」？─台灣年輕人的處境〉，或可參考吧。

台灣「魯蛇文化」三問

前一節〈弱者症狀：台灣的致命傷〉文中，提到了弱者症狀下的一個心理狀態–不配感。文中寫道：「很少人會承認自己的『不配感』，但是潛意識中的『不配感』的威力，卻足以嚇阻我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整體台灣社會，也只有當家長和制式教育體制把對十二歲以前的孩子的態度，由『你不配』改為『你就是配』，台灣才有脫胎換骨的一天。台灣企業的員工管理哲學，如果能從『你不配』轉至『你配，而且你能做到』，台灣的經濟才有世界突破口。」

潛意識內的「不配感」，已經讓台灣逐日喪失了高尚感和自尊感，成為了一個普遍找藉口的社會。政客吃相難看，因為「反正對手已經吃了那麼多，我已經餓這麼久了，也該輪到我好好吃一頓了吧」；小民自棄，因為「反正也輪不到我，什麼地方找到能出一口氣的機會，就出一口氣吧」；媒體節目競相聳動、前言不對後語，因為「反正快撐不下去了，能博一天收視率就博一天吧」。

「不配感」有一個生動的同義詞–「魯蛇」；魯蛇心境，其實就是一種失去了高尚感和自尊感之後的失落。魯蛇不一定軟弱，事實上，一個鄰近魯蛇狀態的人，經常會奮起反擊社會，但在心理補償機制下，一定會找一個高尚到沒人可以反對的理由。

只有誠實檢視自己潛意識中的「不配感」，才能擺脫魯蛇心態的陷阱，而且越年輕時接受這個自我挑戰，就越能改善自己的人生和社會。過去三年，曾寫過幾篇有關魯蛇心境的文章，於此整合一處，與魯蛇和準魯蛇們共勉。

一、搵拿台灣，還是魯蛇台灣？

「魯蛇」，Loser也，二十一世紀台灣青年的自嘲語。那我就奇怪了，Loser叫「魯蛇」，那Winner叫什麼啊？網上沒看到，台灣

青年沒人稱呼自己為Winner。

填補空缺，這裡把Winner稱為「搵拿」（PTT上曾有人譯為溫拿）。搵，廣東話，「找」的意思。例如，「搵錢」，就是掙錢、賺錢的意思；「難搵」，就是不好找、難找的意思；「騎牛搵馬」，就是騎牛找馬。「搵拿」，望文生義，就是「有去找才拿得到」的意思。

換句話說，你如果沒在找，你就不可能拿到。已經死掉的人（古人，但擔心青年討厭文謅謅，因此用白話文）也說過，「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天助自助者」，說的也就是「搵拿」。活生生的當代人也都說過類似的話，例如台灣出身的名探李昌鈺說：「Winner總是從問題中找到方法，Loser總是從方法中找到問題。」

「三一八太陽花學運」，是一場「魯蛇的反擊」，還是一場「搵拿的反擊」？五十萬青年的憤怒，是「魯蛇的憤怒」，還是「搵拿的憤怒」？家長、教師、社會人士的送水送飯，是出自對魯蛇的同情，還是出自對搵拿的讚賞？

台灣青年社運，有一句鏗鏘有力的口號，「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這句話打的是一個心理突破點；青年的無力感、魯蛇感，累積成為憤怒，就像水庫中的水，必然要破閘而出。但是，破閘而出後，水流向何處？魯蛇感，能否因為集體釋放，而轉化成為搵拿感？或者，進一步變成更深沉的魯蛇感？

學運青年的動力來源，究竟是「魯蛇的憤怒」，還是「搵拿的憤怒」，這將決定台灣未來的格局。你對學青的支持方式、鼓勵方式，究竟是「魯蛇式」，還是「搵拿式」，將決定他們未來的格局。

二、魯蛇的天堂

台灣人有兩項大本領：吃政府，以及「一分耕耘、三分收穫」的兒童式幻想。這兩種本領若不退化，台灣遲早變成「魯蛇的天堂」，以及全球華人魯蛇的避風塘。

首先申明，「魯蛇」（Loser，輸家）在這裡沒有對人本質上的貶抑；人呱呱落地時都是「搵拿」（Winner，贏家），魯蛇是被修煉出來的。台灣這個島，曾經有過贏家時代，當前活著的人中也有贏家和輸家，只要即時警覺，未來台灣也不排除還有成為贏家的機會。但是，隨著時間以及世界的移轉，現在的台灣每增加一分魯蛇的功力，就為未來創造三分成為贏家的阻力。

台灣人無時無刻不在吃政府，權勢者大吃後、弱勢者吃；高教育者吃完後、低教育者吃；富人吃完後、窮人吃；而稅收水平居世界之末。選舉在台灣，大致上就是一場「誰更能允諾減稅、降費、加薪，而又把全民照顧得更好」的說謊大賽，結果當然是全民吃政府。

在吃政府資源這件事上，說謊者和自欺者、佔便宜者和被剝削者，最終弔詭的共同找到了一個心理出口：在台灣這個島上一分貢獻應該得到三分報酬、種豆應該得瓜的詭異病態期待。台灣公有資源的實情，可以用十六字概括：能吃就吃，吃了不放，越吃越窮，越窮越吃。

吃政府的環境，帶來賴皮成性；台灣人不魯蛇也難。魯蛇不魯蛇，和財富沒有絕對關係，甚至和所謂的「社經地位」也沒有絕對關係。只要是得過且過、隨波逐流、不求長進，或假面欺世者，都是魯蛇。富二代若不思進取，消耗祖蔭，窮人若篤定自己一輩子脫不了窮，他們都是魯蛇。強勢者只靠壓人吃飯，弱勢者只靠抗議吃飯，也都是魯蛇。領導失敗者賴罪下屬，下屬者只敢唯唯諾諾、卑躬屈節的應聲，還是魯蛇。教授靠論文抄襲或掛名維持地位，學生靠作弊畢業，二者同為魯蛇。

這裡談的是個人層次，台灣有太多結構性的問題，如官商勾結、官學相護、政黑聯盟，只能改變體制以去除。然而在個人良心

的層次，卻是自己一個人就可以改善的。良心告訴你明知不對，而不去糾正的人，都是廣義的魯蛇，即使你被歸類為人生勝利組。明明入籍他國多年、在台灣已不繳稅、卻還享受快要破產的健保？明明已不務農、務漁（甚至一生未曾），卻享受農補、漁補？將農舍權利改為皇宮別墅的人、用虛假發票報公帳的人……都是人生的魯蛇，現代文明下的次等公民，侵蝕下一代正直感的罪人。

台灣正邁向魯蛇的天堂，如此天堂，很快就會變成全球華人（是的，包括對岸）魯蛇的避風塘。

台灣必須從比爛邏輯脫身

「如果民進黨更好，台灣一定會更好」。請停止閱讀三秒鐘，感覺一下看到上面那句話後你心中產生的情緒種類。

「如果國民黨更好，台灣一定會更好」。再請停三秒鐘……如果時代力量、綠黨、社民黨、樹黨、親民黨、新黨、統促黨……更好，台灣一定會更好。這一次，恐怕得請您停下三十秒，體察一下你心中的情緒反應了。

不管你的情緒反應是什麼，料想你絕對不會反對下面這句話：如果你更好，台灣一定會更好。

聽到意見了，有講等於沒有講，更好就會變更好，不是廢話嗎？那麼，容我對「更好」下一個一刀兩斷的定義：不比爛！現在，請把「不比爛」三個字，取代前文中所有命題中的第一個「更好」，再讀一次看看。

是的，每逢選舉，台灣就進入比爛循環。這點你當然已經知道，但還是值得公開的、大聲的說出來，因為，敢於說出來的事，才代表自己已經勇敢面對，說不出口只在心中暗罵的事，都代表自己還沒有誠實面對。

舉幾個比爛的例子。每次批評民進黨的某事某人，接下來的就是排山倒海的「國民黨當年更爛」的論述；每次提到國民黨來台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就會帶來一連串的「日本入台時更爛」的反應；每次提到台灣的分裂惡鬥，就會出現標準反應：美國也惡鬥跟台灣一樣；出現某類令人難堪的惡劣事件，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中國比這爛一百倍；每次有人說台灣的制度比中國強，就會有人反駁說中國的建設比台灣強。例子太多，我想不用再舉了。

「比爛」有什麼不正常？比爛的說：全世界都有比爛現象，社會中總有一群人習慣用比爛邏輯來應付批評。

我們就來談談比爛的壞處。

首先，一個習慣比爛的人，一定是一個沒有邏輯思維能力的人。因為，別人是否肝癌三期，和你是否肺癌一期，一點×關係都沒有。一方用另一方的肝癌三期來安慰自己的肺癌一期，完全是自欺。自己的毛病必須自己治，和別人的毛病無關。

其二，習慣比爛的人不然就是心理防禦機制太超過的人，不然就是自我膨脹的人。這兩種狀態，都會令人沮喪、喪志。

其三，比爛使人陷入無能反省的狀態，比爛使人迴避問題不思解決方案。比爛，得到的是自欺的快感。

其四，比爛的習慣使人無法認知到自身的真實條件、真實處境，導致即使想「比好」之時，也無法面對自身的真實性。例子：台灣慣性的罔顧自己只有一萬二千平方公里的可使用面積，喜歡用大國和台灣比，尤其是中國和美國。談到再生能源就是德國法國歐洲，談到政治制度就是中國美國，幾乎全然不顧「尺寸」、「人口」、「地理」、「資源條件」這些要素，因而產生許多「科盲、理盲」的結論及相伴的情緒。

台灣怯於和自身條件相符的成功國家相比，因為一比就原形畢露了。以色列如果和周邊的阿拉伯國家比爛，以色列老早就完蛋了；新加坡如果有比爛的習氣，老早就被兩邊的馬來西亞和印尼壓得喘不過氣了。北歐小國、波羅的海三小國如果比爛，即使在獨立

後也難擋來自俄國的威嚇。

我又聽到駁斥了：台灣的所有困難還不都是因為中國！對不起，這也是在比爛的一種；中國扣住的是你的身分證，不是你的肉體和靈魂，只要肉體和靈魂自主，沒有身分證固然不便，但也絕不構成比爛的理由。

台灣政治中的比爛文化，使得台灣原地打轉，已經達到了令人厭惡的地步。直白的說：社會已經整體進入一種期待「不比爛」的執政團隊。隨著世代翻轉，可以肯定的是，三五年以後，選舉勝出者一定是不比爛者。

「轉型正義」不能被片面偷渡

過去兩年，「轉型正義」是台灣的顯學，不但媒體界會不斷使用這個詞，可能連高中生都能朗朗上口，其社會意義不可小覷。因而，弄清楚它的意涵，乃當務之急。

「轉型正義」，由「Transitional Justice」（以下簡稱TJ）翻譯而來。值得提出的問題是，為何原文沒被翻譯為「轉型司法」？例如，美國的Department of Justice為何就被翻譯為「司法部」，而非「正義部」？

「Justice」的概念至少有兩個層次，一個是道德層次，一個是司法層次；前者訴諸人性中的是非感，後者訴諸法律中的正當程序性。台灣的翻譯習慣，經常兩者不分，因而思路混淆，雞同鴨講，最終不是用程序壓倒是非，就是道德踐踏程序。

我們來看看ICTJ（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這個國際組織對TJ這個詞的用法。它的定義是─通過國家的一組司法以及非司法性的規矩，重新審視過往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事件。此些可用的司法和規矩，包含刑事起訴、真相調查委員會、糾正方案，以及各種機構改造。

明白的，ICTJ乃圍繞著「司法」以及「規矩」這兩個核心概念來定義TJ。因此，對於TJ的翻譯，應該以「轉型司法」更為恰當。

為什麼咬文嚼字？因為漢字裡「正義」這個詞，屬於道德範疇。例如我們可以指責某人或某種作為「不違法但有違正義原則」，顯示在漢字語境中，「司法」（或「法律」）和「正義」是不能等同的。再用通俗語言為例，一個仗義的人不見得守法，而一個守法的人也不一定仗義。

ICTJ幫助了許許多多的國家進行過轉型司法，它把自己的價值定義在三個層次：司法（Justice）、真相（Truth）、尊嚴（Dignity）。前兩者很容易了解，第三點非常耐人尋思。尊嚴，誰的尊嚴？調查真相、糾正錯誤，這是為了還被害者以尊嚴。然在司法原則下，對嫌疑犯只能做無罪推定，一直要等到司法（或專案審議庭）判定其有罪，才能執其刑，這也是人權的一部分。

道德感、是非感，確實是司法的基礎；一個不容許用道德感、是非感挑戰法律的社會，就屬於集權社會，例如今天的中國。然而，只有在被導引進入正當程序之後，道德感和是非感才算進入 Justice 的範疇。必須辨明這分際，我們才能理解為何 Justice 這個字，在某些語境脈絡下被翻譯成「司法」，而在另個層次的語境脈絡下被翻譯成「正義」。

倘若不辨明這分際，當年中共以「國民黨」、「右派」、「地主」、「黑五類」為名進行無規無矩的田間、街頭人民公審，媒體上的鬥臭鬥垮，也都可以隨意安上「正義」之名了。

在ICTJ組織的三個價值定義ー司法（Justice）、真相（Truth）、尊嚴（Dignity）之下，台灣社會還面臨另外一個共識標準上的挑戰：不管是用 Justice的司法含義還是道德含義，這項工作的歷史截止期要訂在歷史長河中的哪一點？是回溯到中國大陸漢人遷徙來台的那一時間點，還是回溯到甲午戰爭後台灣歸屬日本的那個時間點，或者是二戰後中國敗部的國民黨政府來台的那個時間

點？這三個時間點期間，都曾發生ICTJ所定義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事件」。

從人道、人權的原則看，在這三個時間點的選擇上，原住民亦可堅持TJ（「轉型正義」或「轉型司法」），先期台灣漢住民可以，後期來台的人群可以，甚至那些滯留台灣、隱姓埋名的日本人都可以。

在國際間孤立無援的狀況下，台灣做得成、做不成公民社會，才是台灣的生死所在，而公民社會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在道德感、是非感與司法正義之間的拿捏，具有價值標準的共識。標準低，也可以，總還有進步的空間，但雙重標準沒有進步空間。

台灣現在來到十字路口，一邊的路標寫著「習慣在被統治、起義抗爭兩極之間搖擺不定的百姓社會」，另一條路的路標寫著「脫離百姓意識，進入公民社會」；前者屬於中國風格，後者則是台灣主體性的出路。奇妙的是，這兩條路不管走哪一條，都可以用一人一票作為推進器。一人一票是把刀，可以用作手術刀也可用作屠宰刀；手術，需要流程和規矩才能治病，而屠宰，亂砍就可以了。

國民黨黨產處置的範圍及程序正義，想來還得鬧一陣子。社會和媒體對此議論多多，但奇怪的是，幾乎看不到對於一個議題的討論：不論多寡，被處置的黨產，用於何處？

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答案是：歸還國庫。這個答案，政治非常正確。但是，處置國民黨黨產既然被認為是一樁屬於社會公義範疇的事件，那麼，在社會公義的層次上，一句簡單的「歸還國庫」能夠解決環繞在這件事上的種種公義爭議嗎？

人民所繳納的稅費，歸於國庫，由政府統籌財務分配，固仍有其弊端，但仍屬現代國家、公民社會的常規機制。然而，國民黨黨產的處置，屬於一個台灣在邁入現代國家、公民社會之前的歷史遺留問題，我們能把所處置的黨產當作稅費一樣的納入「政府統籌分

配」的稅費機制嗎？

台灣的「政府統籌分配」財務機制，其間還未剷除的弊端，諸如「肉桶分配」、財團把持、團夥尋租等等，大家已經心知肚明，還需要多說嗎？難道今日處置國民黨黨產的緣由之一，不正是其黨產產生過程中存在的「肉桶分配」、財團把持、團夥尋租因素嗎？

而今，把一批過去因「肉桶分配」、財團把持、團夥尋租而形成的財富，再送入國庫大池，由弊端尚未剷除的「政府統籌分配」機制來處理，你覺得妥嗎？我覺得不妥。

個人認為，國民黨被處置的黨產，不論多寡，應該專款專用，而不能被送入「進去了就散落了」的國庫大池，才能完全體現此次處置國民黨黨產的公義性。

專款專用於何處？這點可以訴諸公論。個人認為，這筆專款，可以專用於那些已經威脅到台灣社會長久安定，但是傳統的預算還無能劍及履及的範疇。舉例而言，長照領域、育嬰領域，以及日益惡化但社會像鴕鳥一樣迴避的青少年吸毒問題。

國民黨黨產是一個積壓了幾十年的問題，既然強力處置了，最合乎社會公義的用途應該就是用來緩和台灣面臨但還經費不足的長期問題。如果這筆錢被放進國庫大池，被當作「額外收入」被分配、被爭奪，這不但不能化解黨產事件的各方戾氣，也會是對善良台灣民眾的一次智商侮辱。

長照、育嬰、青少年吸毒，都是傳統政客「口惠而實不至」的嚴重社會安定威脅，比起任何產業預算、工程預算、人事預算，不但油水少，成效還往往吃力不討好。這類領域，才是被處置的國民黨黨產的最佳歸宿。

國民黨如果還有真誠贖罪之心，而非只是求脫困，就應該在與執政黨談判中，堅持專款專用於公義項目的原則。至於用在何處，可交社會公論。當下執政的民進黨，倘若真的是在公義原則下處置國民黨的黨產，就應當實至名歸，還公義於公義。

我也知道，以上的呼籲，對國民黨、民進黨的「老政客」們等於狗吠火車。其實，我是寄望於國民黨、民進黨內的年輕世代。你們實在可以不必背負上一輩的恩怨，卸掉包袱，心理上輕裝上陣，把過去發生的不公義，昇華成為未來的公義。本文所談，僅為關乎台灣社會未來之一端，其他還有許多更關鍵的事項。你們也許還不夠力，但至少可以發聲吧。否則，要你何用？

急於「去××化」不如「迎台灣化」

春日的一個周末，新北市偏遠的淡水區、金山區、石門區，幾間國小和職校不約而同的舉辦兒童健跑、戶外賞花、學長返校回饋謀生技能的活動。還有名不見經傳的私人小舞社、結合西班牙吉他師的佛朗明哥舞蹈彩排。

同一個周末，我相信北中南各城市正舉辦著上百場的大中型活動，甚至上千場的小型自發性活動；北部的活動，可能「國際化」、「商業化」一點，南部的活動，可能更「鄉土化」、「草根化」一點。一個周末，若真去統計，全台灣城鄉可能有上萬場各式各樣的自發活動。這些活動有些有原住民元素，有些有中國元素，有些有日本元素，有些有西方的美國、歐洲元素，還有些東南亞元素。不過，台灣地理不大，這股具有台灣特色的力道，尤其是來自年輕世代的自發力道，融合而成一套台灣生活方式，台灣價值的多元包容文化，只是指日可待之事。

喔，忘了講一句難聽的話：以上所描繪的景象，動力都來自民間，而不來自官府，倘若一定要牽扯到政治，那也只能說官府在精神上不反對這些民間活動，因為選舉年到了。同一個短短的一周內，正在進行選舉鬥爭的官府和在野政壇人士，注意力焦點應該都集中在超大型的活動上，而不會放在那些芝麻綠豆但遍地開花的民間自發活動上。

這些芝麻綠豆、遍地開花的民間自發活動，若要歸納出一個特質，就是它們完全不是什麼「去××化」（××為填充題，請自由

填入「中國」、「日本」、「美國」或其他）的產物，而是簡單樸素的「迎台灣化」的自發產物。

「去××化」，在台灣是選舉顯學，也是政治權鬥魅影。這已經不需要再證明了，人民再蠢，經過三次政黨輪替，也已察覺以下規律：凡是在野時高喊「去××化」的人，等到自己執政時一定不再喊「去××化」，反倒是當時抗拒「去××化」者下台後，高喊「去××化」。

如，在野時喊「去核化」者，執政時一定不再高喊「去核化」，在野時高喊「去中國化」者，執政時一定忌諱這個口號；執政時不敢喊「去日本化」者，在野時一定大喊「去日本化」。

這證明了，台灣執過政的大黨，沒有一個具有中心思想，只有隨著權力而變的價值觀，而無核心價值觀，沒有發自內心的台灣論述。

台灣的政黨，只要執政，就必定與民間的生活方式脫節。這顯示了，台灣的主流政黨生態，都還處在一個「以權為本」、「以利為本」的狀態。這是一種次文明的狀態；有沒有一人一票？有！有沒有政黨輪替？有！有沒有和社會、人民的自發活動力、生命力結合？沒有！這就是次文明，一種倒退力和前進力糾纏掙扎的狀態。

那麼，大哉問來了。為什麼次文明政黨可以在台灣成為主流政黨？這顯示了台灣人民雖然不蠢，但也還不夠清醒，他們雖然「察覺」到了「以權為本」、「以利為本」的特質，但是還沒有「看穿」或「看透」，每到了選舉時，就情緒沖昏了腦袋。這也不得不說，台灣人民心中還有辮子，或是「××的五十道陰影」。

還在搞「去××化」（填充題）者，其實台灣素民的看法並無自覺，尤其是年輕世代對他們的厭惡已經接近極致。素民及年輕世代正在積極的進行天然無邪的「迎台灣化」，那是一種容不下任何極端「去××化」的生活態度。2018年和2020年將證明這點。

愚蠢低級的「故宮」分遷計劃

將故宮博物院打散分遷的計劃，既愚蠢又低級。但是，以「保持中華文化」為由的反對分遷者，此處要說聲抱歉了，因為我是支持台灣去中國化的，我只是多年來看到台灣去中國化的方式如此的愚蠢和低級，才為文點出台灣這樣做其實是在自殘、自我限縮世界地位、控制下一代的心靈空間。

把話說到底，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台灣主體論者、去中國化工作者或台獨工作者，請你花幾分鐘時間，來想想把已經國際知名的世界級文物館「台北故宮」拆分成數個零散無系統的文物館，這動作中的愚蠢性和低級性。

要把「台北故宮」－正式名稱是「國立故宮博物院」（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去中國化，我贊成。台灣有台灣自己的主體性，憑什麼把一個集中中國文物的博物館當作台灣的鎮國之寶？同樣的，憑什麼把一個「中正紀念堂」當作台北的鎮市之寶？我告訴你，憑的不是它們的中國符號象徵，憑的是它們是人類重大歷史的一部分，憑的是它們帶來巨大的觀光收入，憑的是台灣人容許它們屹立以向世界證明台灣人已經跳脫過去、迎向未來的氣度和拓展性。容許它們屹立，表示的是台灣人已經不用再依賴悲情吃飯，不用再靠著互毆自殘獲得權力。

要去中國化，途徑太多了，提高眼界、放開氣度，台灣人可以想出一百種有創意的方式來去中國化。人類歷史上恩恩怨怨的時代多了去了，為什麼有些民族有些國家就能在恩怨的基礎上文明不斷精進，而另些民族和國家就因為恩怨而不斷退化，集體IQ退化到80而惹人訕笑？這就是智慧和愚蠢、高級和低級之間的差別。

要把故宮去中國化，改個名字不就得了？人要是不喜歡自己的長相帶來的某種象徵性的聯想，整個容不就行了？至於非得把自己肢解，鼻子接到大腿上、手臂和小腿互換位置嗎？文徵明和蘇東坡的字畫本來就來自泛中國文化，你把它一個放到西班牙一個放到阿根廷，它們就不中國了？走遍全球，博物館的高低標準就在於「精

品集中」四個字，人潮、錢潮、讚嘆潮都在這四個字。大英博物館的埃及館藏引得埃及人氣得牙癢癢，但也不得不承認若非英國的現代文明高於埃及，這些人類瑰寶早就消失了。埃及精品在英國，證明了現代英國人的品味高於埃及人。對於中國敦煌精品，道理也一樣。

我在精心保存的德國紐倫堡希特勒演講廣場駐足嘆息，學到了一輩子從書本中、電影中得不到的深刻感受。那當下沖進我腦門的是當下德國人對保存人類歷史的尊重，而不是對過去德國人的蔑視。但是，如果當代德國人因為恥辱感而毀了那座廣場、消滅了黨衛軍的物件，我就會看不起當代德國人，認為他們是一群不懂得反省、不敢面對歷史的低級人類。

容我說句粗話，人都有屁，但脫褲子放屁就是笑話；同樣的，國家、社會都有恩怨和恨，但靠銷毀歷史物件來解怨消氣，就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容我說句重話，打散分遷故宮，會想到這個餿主意的人本身就是中國式的思維，本人就應該閉門檢討自己的思維方式是不是首先該去中國化。你這思維和中國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有何不同？正如史學家林毓生曾經感嘆過，中國「五四運動」時所採取的破舊立新方式，正是屬於他們想要打倒的傳統下的招數。

台灣若要有主體性，去中國化當然必要，但是用中國式的思維和方式去中國化，本身就是笑話，也證明了很多喊去中國化的人的思維底層就是中國的。台灣達到真正主體化的那一天，一定就是能夠平視中國的那一天，沒仰視，也沒俯視。

台灣是世界方塊字使用圈內的文明領頭羊，不要那麼畏畏縮縮、雞腸鳥肚，拿出氣度和高度來，就把現在的「台北故宮」正名叫做「中國故宮典藏院」（China Palace Museum），堂堂正正的平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鄰國，告訴世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蘇東坡的字畫，若非台灣的先進性，早就在中國文革中消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有一天會感激台灣的文明高度，就像今天埃及

的文化人感激英國人的文明高度一樣。

藍綠的五十道陰影和達文西密碼

藍綠分裂在台灣是個真實的存在，人人使用這個概念，但又那麼的捉摸不定。藍綠之分不能等同於統獨之分；我認識許多人意識形態上偏綠，但內心深處感到最終統一可能才是較好或不可避免的選擇；我也認識許多明顯被歸於藍營的人，內心深處覺得台灣應該盡快以台灣之名獨立。

藍綠之分也不能等同於泛國民黨和泛民進黨之差；我認識許多投票一定投給國民黨的人，內心深處對國民黨的失望並不亞於對民進黨的失望；我也認識許多投票非民進黨不可的人，內心深處對民進黨的失望並不亞於對國民黨的失望。

以上我所認識的藍綠人士，其中不乏深交者，我可以負責的說，他們都是善良的人，一心只想讓台灣更好，他們的另一通性就是都具有較強的社會公義感。為什麼這些同屬善良、具有社會公義感的人群會分裂為「藍綠」，甚至演變成為不共戴天之仇的「敵我」？

這對我是個謎。但是，今天早上起床時我有如雷觸，感覺頭腦極度清醒，然後就是通體舒暢，因為我覺得找到「達文西密碼」了。這感覺就像是一個曾經喝過水、被冰凍過、被蒸汽燙過的孩子，通過不斷的試驗發現到，原來水這玩意，在零度時會變為冰，而在一百度的環境中會變為蒸汽；它其實就是水分子，但在某些條件下會產生相變。在冰和蒸汽之間，水分子就是它們的最大公約數。

台灣的媒體和民調，習慣用藍綠分類，藍歸藍，綠歸綠，不肯承認自己藍綠屬性的則稱為中間選民。這是一種強行用冰、蒸汽、水三種相態分割水分子的無奈，但對台灣有害的約定俗成。如同馬基維利那句名言：政治就是創造敵我，政客們會昧著良心只從於冰

和蒸汽的相態互鬥，他們最怕的就是社會回歸到水的溫和狀態，但是媒體跟著政客起舞，學界失去從水分子的角度提供視角的能力，不能不說是一種墮落和怯懦。由於政客的無良、媒體的墮落、學界的怯懦，台灣這個社會中的「水」—溫和狀態的水分子，就被搞得七葷八素、無所適從，成為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充滿無力感，感到自己的善良和公義感只是狗吠火車，國家資源被政治陣營瓜分，人們的精神狀態原地打轉。

那麼，台灣的「水」在什麼條件下會變成「冰」和「蒸汽」？上文所述，其實導致水變成蒸汽或冰的，並不是大家以為的什麼「統獨問題」或「民進黨vs.國民黨問題」，那些只是表面的、經過抽象化的方便概念罷了。這裡就要提到今天早上發生在我腦中的「雷擊」瞬間了；這個雷擊，不一定完整，它可能只是「藍綠五十道陰影」中的一道罷了，但我相信那是掩埋得最深的那一道。

這陰影就是：藍，至少是深藍，不允許喜愛日本、討厭中國；而綠，至少是深綠，不允許喜愛中國、討厭日本。一聽到批評日本就跳起來，一聽到讚賞中國任何好處就抓狂的人，就是深綠；而一聽到批評中國體無完膚就跳起來，一聽到日本全面優於中國就抓狂的人，就是深藍。

這個雷擊般的領悟的意義是：如果今天生活在台灣、以台灣為家的人，不願或不敢面對自己心底的這道文化認同陰影，還停留在什麼「統獨」、「國民黨民進黨」的層次上打轉，台灣將永遠找不到屬於台灣的主體性，永遠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認為統一了或獨立了台灣才有出路的人，認為消滅了國民黨或民進黨台灣才會進步的人，其實都是自己還沒有找到自己主體性的人，遑論找到台灣的主體性？一群不敢從自己靈魂深處檢討並面對底層情緒的人，能夠造就一個正常幸福的社會？那是不可能的。

最為奇妙、也最莫名其妙的是今天台灣社會人口中的絕大部分，都是未經日本統治、中國統治的人；他們對日本的愛憎、對中國的愛憎，都不來自自己的親身體驗，而來自長輩、政客及媒體。

在哲學上、在人道上、在文明上，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你我都是環境意外的產物，都是億萬顆精子中的一顆在偶發條件下和卵子結合而成的獨立生命；你我作為個體來到這世上，憑的都不是你我的意志，甚至不是你我父母的意志，而是那天晚上的溫度、濕度及其他物理條件的偶合。打趣的說，如果那晚那刻大自然突然來一陣颶風，你我可能就不會發生，你我的「自我意識」也不會存在。既然有幸來到這世上，作為獨立的個體，你我難道不應該建立屬於自己的「主體性」，而不是讓長輩、政客、媒體來決定你的「主體性」？

歷史上的台灣就是一個地緣的存在，和中國、日本的等距地理位置，小島台灣無可避免的和中國、日本發生關係。未來一千年，這個地緣格局不會動，你如果以台灣為家，還不誠實面對這地緣事實帶來的歷史、血緣、文化影響，那你要怎樣？

在這地緣事實下，今天以台灣為家的人，可以選擇眼光向後看的投降主義、失敗主義、隨波逐流主義，或是選擇眼光向前看的演化主義。什麼是演化主義？就是在進化途徑上留下來的不是最強者，不是最弱者，而是最能適應環境條件者。作為「人」這個物種，適應能力的最主要來源就是充分洗淨心理陰影後的自主理性。而，只要「以中國為憎愛座標」和「以日本為憎愛座標」的那道陰影不除，台灣永遠不可能羽化為一個自主理性的社會。

倘若以下的這番話讓你很不高興，抱歉！如果你我親身經歷過了被日本統治、和日本打仗，那麼憎惡、討厭日本，叫做人之常情；如果你我親身經歷過了被中國統治、和中國打仗，那麼憎惡、討厭中國，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以上情況你我都沒有經歷，一聽到「中國爛」、「中國好」或「日本好」、「日本爛」就神經緊繃、發條上緊，甚至情緒抓狂，那你我在幹什麼？你我的自主性何在？

讓我們一起來面對這道底層陰影以及它所製造出來的其他陰影吧！政客們拜託多打開一點良心（你有的），媒體們拜託少點隨風

起舞（你可以的），學者們拜託提升一點學術的勇氣（你能的），大家實話實說。該研究中共的威脅就直接研究中共的威脅，該批判國民黨在台灣的作為就直接批判國民黨在台灣的作為，該評價日本帝國在台灣的作為就直接評價日本帝國在台灣的作為，該批判民進黨的作為就直接批判民進黨的作為。否則，躲在「親日、仇日」或「親中、仇中」的潛意識下，搞敵我意識的藍綠分裂，會把台灣搞死的。

地球上像台灣這樣處在地緣歷史下存在心理陰影的國家還有許多，但是像台灣如此不肯面對陰影，任由陰影統治人民情緒的國家，似乎並不多。台灣，應該開始誠實面對自己的一切，停止用高尚抽象的語言來掩飾事實。我對台灣民間的樸素性和包容性，有著高度的信心，任何願意用實話實說走出藍綠陰影的人，最終都會得到台灣民眾的認可。

「台中人」做台灣總統？

2017年與2018年之間，發生了兩件青年行動的事件：砍掉「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銅像的頭，以及在敗退台灣的蔣介石的棺木上潑漆。這兩現象，可簡稱為「八田與一砍頭」和「蔣介石棺木潑漆」事件。

做這兩件事的年輕人，有些媒體稱之為「極端」，有些稱之為「熱血」。先不管你的看法如何，且容我先講一個真實的小故事。

不久前在桃園機場，一位長相端正清秀的十五歲青年，引起了某位長年穿梭於台灣和中國的長輩的注意。此長輩看他一人獨身搭機，好奇的問他：你是哪裡人？十五歲青年回答：我從中國來。長輩說：聽口音、看長相，你比較像台灣人啊。該青年這才說出一段讓這位長輩嚇一跳的話，青年說：我爸爸是台灣人，我媽媽是中國人，所以我的真正身分是「台中人」。

現在，這位「台中人」，在台灣某地某校讀書。根據內政部移

民署的內部資料，目前在台灣，父母雙方一方拿台灣護照、一方拿中國護照的青年，總數約在五十萬人。

另外，父親是台灣人，母親是越南人、菲律賓人、印尼人等東南亞新移民子女，人數也在三十到五十萬人之間。

再提出三個現實中廣泛存在但媒體通常不願多談的數字：台灣本土漢人中幾乎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具有原住民DNA，台灣的日裔後代人數從三十萬到二百萬都各有推論，1945年到1949年間才抵達台灣的「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後代因為政治不正確，已經沒人在統計。

啊，還有一個更加政治不正確的數字：台灣人長住中國之後和中國公民生下的子女，按常識判斷，這數字應該也在數十萬人之間。

看了這些數字，你會怎麼定義「台灣人」？本書之前下了一個定義：凡是生活在台灣，不放棄國民身分證（或其他居留證件），有繳稅的人，就是「台灣人」。前節寫了〈藍綠的五十道陰影和達文西密碼〉，綠營和藍營中的許多朋友，有人贊同，有人批評，還有人贊同但是認為「不應該把話講得那麼白」。但是參諸「八田與一砍頭」和「蔣介石棺木潑漆」事件，我覺得那兩節講得還不夠白。

做出這兩事件的青年，還有那些氣憤填膺或拍手叫好的「老人」，很抱歉！你們的情感狀態，至少在這兩件事上，都還處於人類初級或原始的階段，你們都還活在過去的記憶裡，缺少向前看的格局。七、八十歲的「老人」倒還罷了，連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都還在以祖父、曾祖父的經驗為座標，定位自己今天和未來的角色。台灣的未來要靠誰？

台灣在世界上經濟競爭力的弱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老一代不交棒」，這點大概已無疑義。但大家沒注意到的是台灣的老一代不但在權力上不交棒，連情緒狀態都不交棒。老一代不但用權力綁架了年輕人，也用情緒綁架了年輕人。奇妙的是台灣的年輕人在權

力、社會資源、財富分配這些利益問題上，非常懂得老一輩的害處，甚至不惜走上街頭抗議。但在情緒和認知方式被老一代綁架這件事上，卻如此的綿羊，有些人不知不覺，有些人即使知覺了也悶聲不響。

在情緒狀態這件事上，台灣社會是如此的自閉，自欺欺人到了看不見事實的地步。再過十年，前述的台灣「新移民」、「新住民」、「新混民」，總數可能將到達三百到五百萬人。十年後，台灣的人口結構和認同結構將會是一個「新台灣」，今天還在企圖用「老情緒」面對「新台灣」的人，請問你到時候要怎麼辦？要怎麼做人？

二十年後，台灣一定出現相當比例的議員、立法委員，其身分是「台越人」、「台菲人」或「台印人」，請問今天對「八田與一砍頭」和「蔣介石棺木潑漆」事件氣憤填膺或拍手叫好的人，到時將如何自處？你們的初級和原始的情緒狀態，能夠應付一個新台灣嗎？你們是助台灣之人，還是害台灣之人？

請記住，三十年後的新台灣可能選出一個「台中人」的總統。不要說不可能。三十年前，你若說美國會選出黑人當總統，人們的牙齒都會笑掉；你若說台灣會選出一位女人當總統，那也是牙落滿地。

台灣人最好趕快從「藍綠的五十道陰影」中走出來，建立一套新的、基於事實的台灣論述，否則不但台灣的主體性無從建立，也將被世界潮流淹沒。

「二二八」才是讓北京恍然大悟的通關密碼

大家以為，台灣不願說出口的「九二共識」是中國還在堅持的通關密碼；但北京已經學聰明了，通關就是通關，你不說我的密碼，我就來破你的密碼。現在，北京已經恍然大悟了，找到了進入台灣的通關密碼，那就是「二二八」。

在「二二八」密碼下，中國隨著台灣人的意志，順水推舟出台了一套邏輯，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敵人：國民黨。國民黨竊據了台灣，國民黨是台灣人民和共產黨的共同敵人，消滅國民黨以平人民之恨，台灣回歸祖國。

逆著毛摸驢，驢不高興，那麼我就順著毛摸驢。「九二共識」的通關密碼你說不出口，那就讓我們來一起說「二二八」這個密碼，你作主唱，我來和音，這總可以了吧？

2017年2月23日，北京大張旗鼓的舉辦「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七十周年」大會，由籍貫台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協副主席主持。紀念的邏輯主軸是：七十年前的2月28日，英勇愛國的台灣人民發動了反對國民黨當局獨裁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與祖國大陸人民開展的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相互呼應，匯聚成了全國同胞愛國民主運動的巨大洪流，展現出台灣同胞薪火相傳的強大愛國主義精神。

把「二二八」的歷史納入中國近代史的軌道，對北京來講，一旦想通之後，小菜一碟而已。紅一代的「國共內戰」這一頁早翻過去了，過去是把國民黨當阿斗給面子，才有延續國共內戰概念的「九二共識」一說，現在不喝「九二」這杯酒，改敬你另一杯「二二八」酒。

2015年6月間，我在〈中國免簽，台灣天真到蠢〉一文中指出，自2008年開始北京對台灣的政策主軸就已經是「內政化」，文中寫道：「免簽，只是落實『內政化』的一個跨步，花招還在後面，而台灣的『政治家』們還在『維持現狀』和『九二共識』的免戰牌下打嘴砲騙選票。台灣需要真實有力的政治家，管他／她哪一派，都比現在這樣對台灣有利。」

2015年9月間，在提醒〈紅二代收服台灣，用國民黨祭旗〉一文中點出：「中共不但將『抗日首功』收納至其執政合理性的包裹中，連帶的也把『國共內戰』淡化成為一個『小插曲』，整個國民黨，變成中國百年現代化歷程中的小配角。」（此處所提兩文皆已

收錄於《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書中）

用上「歷史吸星大法」之後，中共已經把孫文（聯俄容共）、黃埔軍校（共產國際推動）、對日抗戰、國民黨敗守台灣，一一收服至「中共帶頭的中國百年近代化歷程」之下，如果它再集中國家內外媒體之力，把「二二八」納入中國百年近代化歷程的一部分，「給予台灣人民最高的抗暴榮耀」，你覺得會很困難嗎？

台灣自先民以來四百年，風也過，雨也走，地方雖不大，人口雖不多，歷史雖不長，但各種悲歡離合，該經歷的都經歷了，照道理講，今天台灣急著豐富自己的歷史，打開自己的心胸都還來不及，還有精力在情緒上往死角裡鑽？

這就像一個人，情緒上越不能自拔，人生境界就越不能開展，前途就越迷茫，最終的結果就是離自己的主體性靈魂越來越遠。就直截了當的說吧，台灣越悲情，就越不可能走出自己；「二二八」的這個黑洞的重力場越強，就越找不到主體性。到了今天，都政黨輪替三次了，小學生連誰是蔣介石都不知道，如果還在拿「二二八」作為主體性認同的基礎，那不是在愛台灣，而是在害台灣。當台灣的主體性只唯一落在「二二八」和打倒國民黨之後，要踢掉台灣的主體性就變成很容易的一件事：只要徹底把帳算到國民黨頭上並徹底追訴國民黨元兇，台灣的主體性就沒有基礎了。

簡言之，就是誠實面對自己！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若缺少一段百分之百誠實面對自己的心理歷程，它就不可能出現可持續的主體性。台灣必須同樣誠實的面對自己文化中的四類文化要素：先民的南太平洋文化要素、中華文化要素、日本文化要素，還有近五十年來的美國（西方）文化要素。站在這四類要素面前，我們得負面和正面都看，好處和壞處都正視。

學會包容未來之前，要先學會包容過去；學會包容別人之前，要先學會包容自己。

台灣的政治人，若學不會同時誠實面對這四類要素，成不了政

治家；台灣的人民，若學不會同時誠實面對這四類要素，成不了公民而只能停留在良民、順民、刁民的境地。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文化，今天在世界上最為世人所詬病的也就是它的政府、它的人民，無意願也無能力面對自己身上的各種文化要素，好像四千年來的中國只始於共產黨。今天，它想用同樣的伎倆來「吸收消化」台灣，而（不成材）的台灣也自動的將近四百年來的風雨，簡單濃縮到一個「「二二八」」的概念上供其作為通關密碼，如此天真簡單的台灣又如何自立於風雨飄飄、潮起潮落的未來世局中呢？

第十章

「隔壁大象」永遠在，但台灣有機會做象伕

第十章

「隔壁大象」永遠在，但台灣有機會做象伕

【前言】

台灣像是一家精緻的瓷器店，但旁邊住著一頭大象。未來一百年，台灣有三個選擇：一、咒罵、恐懼這頭大象，終日戰戰兢兢。二、投靠遠方的犀牛，使得犀牛和大象之間形成「威力平衡」。三、研究大象學，試圖把自己變成一個象伕。

作為象伕，台灣是有特殊條件的，這條件連犀牛都不具備，那就是台灣和中國之間有一個特殊紐帶—兩者都主要依賴「方塊字」為溝通工具。這倒不是說，使用其他文字語言的大小犀牛，無法和大象溝通，而是溝通的準確度和效率。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人類的文明，包括思維方式、制度、知識、情緒，都和其所使用的文字語言掛鉤。極端一點說，在某種文字的使用圈內，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字準確度、豐富度更高，它就會很自然的成為那個文字圈內的文明領頭羊。

七十年來，台灣和中國雖然都主要使用方塊字，但是兩邊方塊字所承載的意涵，已經出現很大的分歧。例如，台灣所使用的「民主」這兩個字，固然也存在於中國，但是意涵已經南轅北轍。中國人民，只有親身在台灣居住過一段時間，體會過台灣的社會現象後，才能理解台灣人使用「民主」時的意涵。反之亦然。但這種分歧，究竟遠遠低於英文**Democracy** 和方塊字「民主」之間的差距。因此，台灣比起世界上使用其他文字的國家，更有資格成為象伕。

犀牛和大象之間比的是大小、體力，而象伕和大象之間比的不是大小體力，而是誰更有溝通能力、傳播能力，誰的文明度更吸引對方。固然本書上部描繪了美國犀牛打算在**2022**年前鬆動中共的一黨專政，更預測了**2022**年之後中國的五種可能性，然而，這兒所使

用的「大象」一詞，並不等於「中共」一詞，而是對「中國」這個模糊概念的隱喻。因此，不管**2022**年之後，大象變成什麼樣，它還是在台灣瓷器店的一百多公里處，本書一再強調的台灣地緣意義，並不會改變。

你可以說，這是台灣的「隔壁大象」問題，台灣必須嘗試做象伕。把話說透，即使哪一天大象發癲了，懂得大象的人也比不懂大象的人更能自保和降低損失。

為何台灣沒比現在偉大？

達爾文的理論，至今不衰，就是因為他看出了物種的提升需要演化，而演化的最大驅動力量就是混交，越頻繁的混交，就越有可能產生適應環境的突變。生物界如是，人的社會也如是。

用演化論來看，世界最成功的混交共和國，就是靠移民起家的美國；美國因大量混交血緣和文化，而成其大。相對來看，日本因拒絕混交，而走向萎縮；台灣則因實為混交但心理上拒絕承認，而成其小氣。台灣沒能比現在偉大，其實是因為心理障礙、文化障礙，而不是演化條件上的障礙。

今天我們知道了，所謂的「血緣」不過是市井用語，真正的奧祕在「基因」。兩個人，一個來自北極一個來自南極，極可能在「血緣」上絲毫找不到一絲共同線索，然則實際上這兩人在基因上卻有著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性。兩個來自天南地北的男女，只要混交了，基因上那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點零一的差異，就可能激盪演化出原先並不存在這兩人身上的外貌、性格、才智上的變異。

台灣，是一個高度混交的國度。用通俗語言形容，台灣至少具有如下的混交：原民部落之間的混交、台灣原民與南島和太平洋島嶼原民的混交、原西（班牙）混交、原葡（萄牙）混交、原荷（蘭）混交、漢原混交、漢漢混交、漢日混交……台灣雖是個孤

島，但由於海緣因素，混交歷程並不亞於歐洲大陸或西亞大陸，完全不缺乏基因交換的演化機會。

以上「漢漢混交」一詞需要說明一下。皆稱為「漢」，何來混交？事實上，「漢人」這個概念和「西方人」這個概念的糊塗程度差不多。西亞大地上，南有數百、數千甚至數萬個經過無數個千年而成的族群，含混通稱為「百越」；北邊同樣有數百、數千甚至數萬個經過無數個千年而成的族群，通稱為「胡人」；那西邊呢？東邊呢？我有一位朋友，母親是上海人，父親是北京人，這是南方百越和北方胡人的產物，但他們及後代在通俗語言上都是「漢人」，這就是「漢漢混交」的例子。那麼，一個世世代代居住在高雄的男子，和一位世世代代居住在台北的女子結婚生子，該怎麼稱呼呢？

1945年到1952年，二百餘萬人口從東亞大陸上避難至台灣，哇，這下更熱鬧了，雖然這二百餘萬人大多數也都自稱為「漢人」，但事實上可說是百越後代和胡人後代的大集合。他們加入了原先存在於台灣的原原、原南、原太、原西、原葡、原荷、原漢、漢漢的混交生態中。

以上這三段文字，若讓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基因學家來描繪，可能幾十本書都寫不完。但我們五百字就一筆交代過去了，真正是無奈的事，只能求個大概念了。但我希望，讀者們腦子裡能夠形成一張圖像，那就是台灣雖小、雖為一孤島，但是由於海緣因素，形成了一個極為豐富的混交基因庫。

照理來講，台灣應該比今天偉大多了、聰明多了，因為豐富的基因庫帶來的演化可能性極為巨大。但是，台灣雖然具有幾乎相當於半個地球的基因來源，卻沒有成為一個更偉大、更聰明的地方。或許是台灣擁有豐富基因的時間太短，演化的層次還不夠，但時間不是唯一的因素，另外還有一個非基因、非時間的因素，那就是歷史上台灣人的世界觀被限縮了。打個比方，一個聰明的嬰兒若被放到一個封閉的罈子裡，即使他有愛因斯坦的資質，也演化不出一個愛因斯坦。

那麼，今天的台灣人可以自由進出這個島嶼，人人都有手機可以接觸全世界的信息，其世界觀應該就可以提升到足以匹配這豐富基因庫的水平了。但，卻又不然。這是為什麼呢？只能用泰國人養大象的例子來解釋。在大象小的時候，你把牠用繩子拴在樹上，牠掙不脫，日久天長之後，即使大象可以輕易推倒樹，象伕只需要在牠的脖子上繫上一條空蕩蕩的繩子，大象就不敢亂動了。這是心理學的問題，不是物理學的問題。

我們該問的是，那條拴在台灣社會心理上的「繩子」是什麼？哪些因素使得台灣這個豐富的基因庫，竟然產生不出相對應的演化進步？明明是依賴海緣才得以形成的豐富基因庫，卻演化不出拓展性的海洋世界觀，而淪落至內縮內鬥的世界觀？這，或許才是台灣主體性論述的關鍵問題。

中國可因台灣而演進

世界在問：中國有過去的文化，但是中國還有未來文明的希望嗎？對這問題，我一向的回答是：已經失去動力甚至死去的文明叫做文化，要重振文明，中國需要的不是回到物質世界，而是回到人性、重返人類。當然，這道理不止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其他許多還耽溺於過去輝煌的國家或民族。

中國和台灣之間，如果還有某種健康的關係可言，應可濃縮為以下兩句話：不論是好是壞，世界必因中國而改變，而中國可因台灣而演進。

在政治層面，台北和北京當下處於角力狀態，然而若把時間尺度拉長到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在文明的層面，台灣其實是中國未來文明的幹細胞，無論雙邊的政治關係如何。北京若聰明，此時就應該「看見台灣」，而台北若智慧，此時就應該「看見中國」。

什麼叫做中國「看見」台灣？北京當前的「中國夢」叫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一再指出，這是個錯誤的、至少是狹隘的詮釋，因為「復興」的概念是回到某種歷史，本質是向後看的。向後「復興」要復興到哪裡去？先秦的春秋戰國？那是個征戰分裂的時代。漢唐的「統一」盛世？那是個北方、西北胡人思想和科技輸入華夏的時代。復興到蒙元時代（Mongolian Era）？那是一個中國為蒙古帝國版圖一部分的時代。還是復興到大明朝？那是一個東廠西廠、錦衣衛橫行的時代。再來就是復興到大清帝國時代？大清是一個鬆散的帝國，滿人、蒙人、藏人平起平坐、而漢人是二等屬民的時代。

因此，「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根本就是一個方向錯誤的偽命題。如果要給予今天的中國一個期待的話，正確且科學的說法應該是「中國文明的偉大演進」；因為，「演進」是一個向前看的概念，而定錨在「文明」概念上，遠遠比定錨在「民族」概念上來得與時俱進。在文明演進的概念下，中國勢必得歷經從集權到法治、從控制到開放、從一元到多元的艱難過程。請問，世界上除了台灣能夠提供適合中國國情的正面、反面經驗，還有哪個其他國家可以？因此，台灣是中國文明演進的幹細胞，任何看不到這點的人，都不能稱作有識之士。

那麼，什麼叫做台灣「看見」中國？這有兩重意義。首先，台灣距離中國二百公里，這個地緣事實過去如此，今天如此，未來一千年還是如此。喜歡不喜歡，台灣都必須和中國打交道。在這個「必須」上，台灣的處境和韓國、越南、緬甸、泰國、馬來西亞，甚至日本，沒什麼兩樣。

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百公里距離內的國家，數量超過三十個。其中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漠視這個事實，自絕於中國而生存。台灣若認為它可以自絕於中國而生存，那將是個笑話。這道理太簡單了，因此台灣「必須看見」中國–適應中國的經濟、社會生理狀態，理解中國政治統治方的心理狀態。

第二重「看見中國」的意義，就在於台灣必須懂得「中共不等於中國」的道理。這道理對台灣人來說其實太簡單了，一個例子就可以解決。試問台灣人，三十年前的多數台灣人還以為「國民黨就等於台灣」，請問，今天來看這句話是不是笑話？

台北和北京的雙邊執政方，各有各的難處而選擇「不看見對方」，因此寄望於執政方是渺茫的。套用北京習近平先生的一句名言，台北和北京在雙邊關係的健康作為上，「竟無一人是男兒！」

中國當前釘死在「世界必因中國而改變」的壯志上，然而它竟然察覺不到「偉大復興」的概念，使得世人認為世界將因中國變得更壞而不是更好。而台灣這一邊，竟然完全認識不到「中國可因台灣而演進」這個對地球有著絕大意義的戰略制高點。在這意義下，台灣及中國，皆對不起世界。

正如人生任何事務，要健康，就得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期待中國與台灣的有識之士，從一樓坐電梯到十五樓，把時間尺度從三年拉到三十年，讓中國因台灣而演進，讓世界因中國而更好。

台灣也沒躲過的那隻幽靈

台灣已經夠辛苦了，照理不該談令人難堪的話題，但辛苦期或許正是最好的時機，通過逆向思考來檢視塵封已久、但卻依舊主宰著人們一言一行的幽靈。幽靈一詞甚有意思，稱之為靈，因為它是人們認知範式、情緒模式之源，況之以幽，因為其藏身本領高強，能夠不見天日的在一個文化中運作千年而不墜。

這裡試圖抓出這樣的一個文化幽靈，文短難以窮其理，識者請勿以學術究之，年輕讀者或可以用「抓寶可夢」來類比這樣一種試圖。捕捉這隻文化幽靈，可以轉化為對一個疑問的探討：同屬「方塊字文化圈」的台灣和中國，有沒有一種文化病理學的共同因子足以解釋當下那種一團漿糊、公婆互鬥但皆成理的政治亂象？

先得對「方塊字文化圈」下個定義：不論種族、血緣、口語的

差異，凡是以方塊字為主要閱讀、溝通媒介，並且通過以方塊字文本吸收他人經驗的人群所建構的文化圈子。歷史上，今天的日本、南韓、越南，都或強或弱地落在方塊字文化圈內，但隨著其脫離方塊文字、發展出自有的書寫系統，日本、南韓、越南都已經距離方塊字文化圈越來越遠。今天的中國無疑是方塊字文化圈幅員最廣大的國度，並且在大力打擊境內非方塊文字的傳承系統，如維吾爾文、藏文等。台灣幅員雖小，卻是個奇妙的地方，它的口語結構因為地緣歷史而駁雜，南島語、河洛語、客語、中原各地口語、日語乃至英語共處一堂，然而其閱讀書寫媒介卻合於一尊–方塊字。

因此，儘管今日台灣的種族、血緣構成複雜度，可能遠遠超過東北亞的其他地區，然而卻因為方塊字，與中國之間形成了一個切不斷的紐帶。文字紐帶代表了經驗、價值觀、認知結構、情緒模式之間的傳承，正如即使是「美國文學」也得用「英文」來寫作，「美國教育」也得用英文進行，所有採用英文字的國家如紐西蘭、澳洲皆然。

文字圈帶來的文化同質，甚至同構，乃人類文明演化常態。然而字母拼音文字系統下的「以音領字」和方塊字系統下的「以字框音」的根本差別，卻帶來了截然不同的文明命運。拼音文字具有分支的活力，差不多的一套字母，可以隨時隨地演化出多種文字書寫系統，因而可以承載經驗的創新、容許異族的存在。相反，固化為視覺形體、演化極慢的方塊字，卻受不了「文以載道」的強項誘惑，成為框限義理、阻礙經驗創新、拒絕分支的絕佳工具。

這，就是方塊字文化內的幽靈。這隻幽靈，具有強大的力場，總能在種族、血緣交雜之後，不同社會的秩序、價值觀衝撞之後，像磁場一樣把各種異態削足適履的定於一尊。從歷史經驗看，這隻幽靈成就了今日泛稱的中華文化，儒釋道、經史子集、詩詞小說戲曲均融於一體；但是同樣的一隻幽靈，也是不敵近代拼音文字圈的快速演化創新力道的重要原因。

這隻幽靈對方塊字文化圈的政治現象有著深遠的影響。前述方

塊字文化有定於一尊、抗拒分支的特性，表現在政治上便是集體主義、專制主義的大一統傾向。歷史證明，雖然是異族，只要吸納融入了方塊字書寫系統，便不由自主的進入這種傾向的軌道，此時，最為理想的就是郡縣制度，而非分封或邦聯制度。但是這也要看異族融入方塊字書寫系統的程度而定，如蒙古王朝並未深入方塊字書寫系統，因此整個帝國還保持分封狀態，而滿洲人的大清帝國在徹底接納方塊字文化的同時，還保持了滿語書寫系統，而且包容同為拼音文字的蒙藏回文，因而成就了滿蒙藏邦聯共同統治漢人的大結構。

滿清帝國因專制集權的固化無法與時俱進，不敵西方拼音文字文化的快速演化力道而垮台，其治下漢人喊出了「共和」的概念，其實質便是想要擺脫方塊字文化中的那隻幽靈，試圖以「存同求異」的價值觀重建一個新的政治體。然而，那隻幽靈的氣場太強大，以至於任何反專制、反集體主義的異端苗頭，幾乎是剛冒出就被擊倒。

鏡頭拉到當下台灣，所有「去中國化」的論述都在方塊字傳統下進行，所有轉型正義的過程中也不乏集體主義和專制的影子。記得史學家林毓生曾表述過這樣的觀察：「五四運動」中反傳統的人，採用的手段卻經常是傳統的。力圖更新文明的台灣，必須警覺那隻幽靈的存在啊！

「方塊字使用者」
才是切開中台關係的那把刀

「中國」、「中華」、「華人」、「華夏民族」等等字詞及其概念的模糊邊界，造成了一個大漿糊缸。想想，多少討論、爭辯陷在這個大漿糊缸中，繞來繞去最終只能以情緒收場。

這個漿糊缸中，融入了血緣、文化、習俗、認同的原料，如果再加上「祖國」、「炎黃子孫」、「老祖先」等等佐料的攪和，任何使用這些字詞所作的思辨，都變成不可能。多年來，我都在尋找

一個可以清晰定義的字詞，取代這個漿糊缸，使得相關討論得以清楚進行。

「方塊字使用者」這個詞，可能就是那把切開漿糊的刀。首先下定義：方塊字使用者就是當今還通過俗稱「漢字」（Han Character）為主要文字溝通工具的人群。我是其中之一，因為我在用方塊字寫這篇文章，你也是其中之一，因為你在讀這篇文章。所謂的「馬華」（馬來西亞華人），如果他用方塊字書寫、閱讀，那麼他也是一分子，同理延伸至印尼、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地區，美洲、歐洲甚至中南美洲、非洲。

常說的「漢文化影響圈」，如韓國、日本，雖然還有個別方塊字，但是其絕大多數國民已經不依賴方塊字為主要溝通工具，因此韓國、日本不在「方塊字使用者」的定義範圍內。

此外，在方塊字系統上吊掛著無數種語言（spoken language），例如東北話、上海話、溫州話、福州話、廣東話、香港話、廈門話、台灣話。這些語言當中，有些可以互通，有些幾乎雞同鴨講；試試讓一個說福州話的人和一個說溫州話的人用語言溝通，你會發現那比讓說義大利話的人和說法國話的人溝通還要痛苦。方塊字系統上吊掛的語言當中，有一種叫做普通話，作為不同語言人群之間溝通的最大公約數。

方塊字使用者分布全球，可分為兩部分，其最大宗約十三點五億人生活在今天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塊大陸地（以下簡稱「A組」），第二部分總數大約五千萬到六千萬人，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以下簡稱「B組」）。

以上這些乾巴巴的分析，可以用來做什麼？它可做的事情多著呢，不信我們來玩玩以下的遊戲。

請問，一個出生在北京，二十四歲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去到美國留學，三十歲取得美國公民身分、結婚生子的人，他是不是

「中國人」（Chinese）？他需不需要對「中華的偉大復興」負責？同樣的，一個出生在台北後來成為英國公民並定居英國的人，算不算是「台灣人」？需不需要對台灣的未來負責？這簡單的兩個問題，在前述漿糊缸內就可以讓人面紅耳赤甚至大打出手。

請問，一個三代前從福建移民到馬來西亞（或印尼，或……）、現在依然懂得用方塊字書寫和閱讀的人，屬不屬於「中國人」，應不應該被視為「華僑」（Oversea Chinese）？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他有沒有責任？

一個中國紅二代、官二代，十四歲被送到澳洲，成為澳洲公民，老爸還在北京當官，這孩子是「中國人」還是「華裔澳洲人」？他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和義務，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還是由澳大利亞政府管轄？當他與澳洲的中國大使館互通款曲，請問他是在「愛國」還是在「叛國」？

一個由台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轄區內生活定居了三十年，自願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及身分證的人，加入了當地政府任職，請問有任何不妥嗎？倒過來，一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轄區移民台灣，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的人，又有不妥嗎？

若要解開情緒的漿糊缸，清楚的認清「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這三大人生問題，請開始謹慎使用，甚至拒絕使用那一堆漿糊詞：「中國」、「中華」、「華人」、「華夏民族」、「祖國」、「炎黃子孫」、「老祖先」等等，轉而開始使用「方塊字使用者」這把利刀。如果要談前面所提「A組」和「B組」之間的關係紐帶，唯一可以把問題談清楚的概念利刀就是「方塊字使用者」。

「英文使用者」的處境遠比「方塊字使用者」複雜得多。但是環繞在「盎格魯撒克遜」文字傳統下的認同問題幾乎不存在，儘管世界上所謂的「英語」（spoken English）也是南腔北調。大家同為「英文使用者」，沒聽說過紐西蘭大學生抗拒莎士比亞，也沒聽過美國公民覺得自己在英國公民面前矮一截而不爽。

台灣社會是方塊字使用者無誤，就好像台灣吃飯用筷子無誤一樣。認清這點，對跳脫情緒的漿糊缸有助。

「方塊字圈」政治文明的雁行理論

上面論及，只有用「方塊字使用者」這概念取代諸如「華人」等等相關的概念，才能由那一團糾纏不清的漿糊缸辯論中脫身。這一節，由「文明」的角度切入，繼續深入討論。

上節中有一段話：「方塊字使用者遍布全球，可分為兩部分，其最大宗約十三點五億人生活在今天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塊大陸地（以下簡稱「A組」），第二部分總數大約五千萬到六千萬人，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以下簡稱「B組」）」。

由於方塊字承載了數千年來累積的文獻、典籍、文學詩詞，上至儒道法釋的思想，下至小說、戲曲、成語，無可避免的，凡是方塊字使用者，腦袋裡的意識和思維，都多多少少有某些共通性，也就是文化的紐帶。這是人腦的結構使然，就像盎格魯撒克遜文字，俗稱「英文」的使用者，無論身在地球何處，都避不開某種文化紐帶一樣。以突出的例子講，南非受英文教育的黑人和紐西蘭受英文教育的白人之間，其文化紐帶遠遠大於西班牙白人和魁北克法文區的白人。

「Civilization」這個字被翻譯為「文明」，而非「血明」、「種明」、「語明」或「祖明」，是有深刻意義的，因為文字的紐帶力量，遠遠的超過血緣、種族、語言、祖先來源的紐帶力量。

因此，前述的方塊字使用圈中的A組和B組，不管在地球的哪個角落，都具有文明的紐帶。話雖如此，由於歷史的因緣際會，A組和B組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這也不稀奇，就像同樣接受法文

教育的地區，法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和非洲法文地區的集權政治制度，也因為歷史際遇之不同而南轅北轍一樣。

從文明內政治制度的統一性來看，英文文明圈內最為統一。在英文圈內，我們幾乎想不出來一個不走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相對而言，西班牙文圈，發源地西班牙已經走上民主自由法治，而南美洲的西班牙文國家卻不乏還生活在極權或集權的政治制度下，儘管這A、B兩組西班牙文使用者共享政治制度外的一些文明紐帶。

回過頭來看方塊字文明圈內的A、B組，很明顯，在共享某種因方塊字而來的文明紐帶的同時，它們處於政治制度的競爭，甚至衝突。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獨立自主的台灣，具有二千三百萬人口，可說是方塊字B組中的最大者。尤其有意思的是，台灣的方塊字使用者橫跨了至少十幾種血緣族群，甚至幾十種；宗教上，全世界的教種，或多或少的在台灣都有一塊；性別價值觀上，台灣也是亞洲最寬容的。簡而言之一句話：台灣在地球上的方塊字使用者圈內，是最包容的一塊寶地。在法治上，儘管還有所不足，台灣也無疑是方塊字使用圈內最為民主自由的地方。

我們真的不知道，方塊字使用圈中的A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不會有一天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制度。或許會，但也或許不會。但如果─這是一個很大的如果，它有一天有意走上這個方向，那麼，台灣就成了「方塊字使用者」這一群大雁的雁頭。

從體積上、人口上、經濟上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是方塊字使用圈內的雁頭，台灣是遠遠落在其後的雁尾，這點無庸置疑。但是百年風水輪流轉，從未來文明的政治制度發展角度來看，台灣也有可能成為頭雁，港澳緊隨其後，而原來的頭雁變成尾雁。這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在經濟、軍事上強大，但是在人類文明的層次，它還完全找不到方向。

方塊字使用者圈內，屬於B組的台灣，人口只有A組的六十分之一，面積只有A組的三百分之一，但在政治制度的穩健性這件事上，比的不是大小，而是結構。一座結構失衡的百層大樓，地震來

的時候，其穩健性絕對比不上一座兩層小樓。

台灣絕不能妄自菲薄。要知道，文字的力量超越一切，同樣是使用方塊字，只要你的方塊字上所承載的理念和經驗具有吸引力，終究有一天你會成為領頭雁。台灣今天所需要警惕的是兩件事：其一，自我破壞了政治制度文明。其二，方塊字能力不足以承載你的理念、不足以表達你的經驗。若台灣能夠精進其政治制度文明以及方塊字使用的能力，有朝一日成為領頭雁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以上就是方塊字圈政治文明的雁行理論。

後記

如果一定要定位，筆者本人是個主張「個體價值」的人，我認為每一個人，上自總統、下至街頭流浪漢，都是「人」，都必須對他們說人話，也都必須刺激他們獨立思考。如果一定要用「世界觀」或「價值觀」來定性，筆者最願意被歸類為演化論者，萬物萬事之間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形成超出人腦所能預測的億億萬種可能性，而生命總會自然找到出路。

說「價值觀」太抽象、太文謅、太政客，但每一個人不管自己有沒有意識到，都有一套相對頑固的為人處事的型態。筆者自己，走到人生這個階段，才逐步察覺自己從有記憶以來，每當面臨人生拐點大事時（雖然當時不知道那就是拐點），所做出的選擇不脫以下的十六個字：「自備引擎、自備磅秤、自備藥箱、願賭服輸」。這四句話構成了一個行為框架、處世判斷的範圍，當然也構成了一種侷限。其中道理不必再引申，因為有感觸的人已經有感觸了，沒感觸的人在未來人生中多少會遇上這四句話其中的一句話。

由於主張個體價值，筆者從來不認為別人就「應該」同意本人的看法；每個人都有堅持自己看法的權利，哪怕看錯了，也只有在自己意識到時才會知道是錯的。因而，筆者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結論，都是自己下的。筆者不是傳道者，不是學術研究者，也不是資料數據控，因此「傳道、授業、解惑」三項無一及格，以此三項目期待或要求我的人一定會失望。但是筆者對「開腦洞」這件事–提供另類思路、異常視角，對自己很有信心（一笑）。

以上告白，是為本書後記。

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

作　　者／范疇
總編輯／富察
責任編輯／穆通安
企　　劃／蔡慧華
封面設計／許紘維
排　　版／宸遠彩藝
社　　長／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曾大福
出版發行／八旗文化／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8樓
電　　話／〇二～二二一八～一四一七
傳　　真／〇二～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專線／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信　　箱／gusa0601@gmail.com
臉　　書／facebook.com/gusapublishing
部落格／gusapublishing.blogspot.com
法律顧問／華洋法律事務所／蘇文生律師
出版日期／二〇一九年八月（初版一刷）
定價／五五〇元整
ISBN／978-957-8654-73-0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